主编　阎纯德　吴志良

Sinological History Series
列国汉学史书系

法国汉学史

许光华 著

學苑出版社

北京语言大学
列国汉学史书系
Sinological History Series

法国汉学史

许光华 著

學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法国汉学史/许光华著.—北京：学苑出版社，2009.5

（列国汉学史书系/阎纯德，吴志良主编）

ISBN 978-7-5077-3365-5

Ⅰ.法… Ⅱ.许… Ⅲ.汉学—研究—法国 Ⅳ.K20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78690号

责任编辑：杨　雷

责任校对：黄　勇

封面设计：徐道会

出版发行：学苑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2号院1号楼

邮政编码：100079

网　　址：www.book001.com

电子邮箱：xueyuan@public.bta.net.cn

销售电话：010-67675512、67678944、67601101（邮购）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 厂：河北永恒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尺寸：705 X 960　1/16

印　　张：22.75

字　　数：450 千字

印　　数：1500 册

版　　次：2009 年 5 月 第 1 版

印　　次：2009 年 5 月 第 1 次印刷

定　　价：40.00元

本书系之出版获澳门霍英东基金会资助

列国汉学史书系
编辑委员会

顾　问：季羡林　李学勤　汤一介　王路江

主　任：崔希亮

副主任：韩经太

主　编：阎纯德　吴志良

编　委：乐黛云　安平秋　许光华　刘顺利　吴志良
张国刚　严绍璗　李明滨　李海绩　陈开科
侯且岸　柴剑红　钱林森　耿　昇　阎纯德
阎国栋　熊文华

序

经过近30年多位学者的辛劳努力，现在我们可以说，国际汉学研究确实已经成长为一门具有特色的学科了。

“汉学”一词本义是对中国语言、历史、文化等的研究，而在国内习惯上专指外国人的这种研究，所以特称“国际汉学”，也有时作“世界汉学”、“国际中国学”，以区别于中国人自己的研究。至于“国际汉学研究”，则是对国际汉学的研究。中外都有学者从事国际汉学研究，但我们在这里讲的，是中国学术界的国际汉学研究。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国际汉学研究改变了禁区的地位，逐渐开拓和发展。其进程我想不妨划分为三个阶段：一开始仅限于对国际汉学界状况的了解和介绍，中心工作是编纂有关的工具书，这是第一个阶段。到了20世纪90年代，出现国际汉学研究的专门机构，大量翻译和评述汉学论著，应作为第二阶段。在这两个阶段里，学者们为深入研究国际汉学打好了基础，准备了条件。新世纪到来之后，进入全面系统地研究国际汉学的可能性应该说业已具备。

今后国际汉学研究应当如何发展，有待大家磋商讨论。以我个人的浅见，历史的研究与现实的考察应当并重。国际汉学研究不是和现实脱离的，认识国际汉学的现状，与外国汉学家交流沟通，对于我国学术文化的发展以至多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我曾经提议，编写一部中等规模的《当代国际汉学手册》，使我们的学者便于使用；如果有条件的话，还要组织出版《国际汉学年鉴》。这样，大家在接触外国汉学界时，不会感到隔膜，阅读外国汉学作品，也就更容易体味了。必须指出的是，国际汉学有着长久的历史，因此现实和历史是分不开的，不了解各国汉学的历史传统，终究无法认识汉学的现状。

我们已经有了不少国际汉学史的著作及论文。实际上，公推为中国最

早的汉学史专书，是1949年出版的莫东寅《汉学发达史》，尽管是通史体裁，也包含了分国的篇章。这本书最近已有经过校勘的新版，大家容易看到，尽管只是概述性的，却使读者能够看到各国汉学互相间的关系。由此可见，有组织有系统地考察各国汉学的演进和成果，将之放在国际汉学整体的背景中来考察，实在是更为理想的。

这正是我在这里向大家推荐阎纯德教授、吴志良博士主编的这套“列国汉学史书系”的原因。

阎纯德教授在北京语言大学主持汉学研究所工作多年，是我在这方面的同行和老友，曾给我以许多帮助。他为推进国际汉学研究，可谓不遗余力，所做出的重要贡献是学术界周知的。在他的引导之下，《中国文化研究》季刊成为这一学科的园地，随之又主编了《汉学研究》，列为《中国文化研究汉学书系》，有非常广泛的影响。其锲而不舍的精神，我一直敬服无地。特别要说的是，阎纯德教授这几年为了编著这套“列国汉学史书系”所投入的心血精力，可称出人意想。

在《汉学研究》第八集的《卷前絮语》中，阎纯德教授慨叹：“《汉学研究》很像同人刊物，究其原因是因为从事这个领域研究的学者太少，尤其是专门的研究者更是少之又少，所以每一集多是读者相熟的面孔。”现在看“列国汉学史书系”，作者已形成不小的专业队伍，这是学科进步的表现，更不必说这套书涉及的范围比以前大为扩充了。希望“列国汉学史书系”的问世成为国际汉学研究这个学科在新世纪蓬勃发展的一个界标，让我们在此对阎纯德教授、这套书的各位作者，还有出版社各位所做出的劳绩表示感谢。

李学勤

2007年4月8日

于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

序二
汉学历史和学术形态

历史是既抽象又具体的存在，是浩瀚无边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历史会让我们兴奋，也会使我们悲哀，有时会令人觉得它又仿佛是一个梦。但是，当我们梦醒而理智的时候，便会发现——自然史、时间史、太阳史、地球史、人类社会史，一切的一切，不管是曾经存在过的恐龙，还是至今还在生生不息的蚂蚁社群，天上的，地下的，看得见的，看不见的，一切都有自己的历史。一切都有过发生，一切都还在发展，一切都还会灭亡。

任何事物的发生都有一个有形或无形的孕育过程，“汉学”(Sinology)也是这样，其孕育和成长，就是中国文化与异质文化相互交媾浸淫的历史。这个历史，始于公元1世纪前后汉代所开通的丝绸之路，接下来是7~8世纪的大唐帝国、14~15世纪的明代、清末的鸦片战争和“五四”新文化运动，这种文化的碰撞和交流之潮时起时伏直到今天。这是历史，是汉学的昨天和今天，孕育、发生和成长的过程显现出的文化精神。但是，昨天有远有近，我们可以循蛛丝马迹探讨，找回其真；而今天，只是一个过渡，一俟走过，便成为昨天的陈迹。写作汉学史是一件艰难的劳作，尤其对象是遥远的昨天，尤其是“遗失”在异国他乡的昨天，更非一件易事。时至今日，朦胧面纱下的汉学还不为一些学人所认识，因此有必要取下面纱，让人们看个究竟。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后，尤其90年代以降，“汉学”(Sinology)便逐渐成为学术界耳熟能详的学术名词。中国大陆重提“汉学”(Sinology)至今，汉学就像隐藏在深山里的小溪，经过30年的艰辛跋涉之后，才终于形成一条奔腾的水流，并成为中国文化水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个变化是时代和历史变迁带来的结果，也是文化自己发展的规律。

那么，究竟什么是汉学（Sinology）呢？首先，这里的汉学非指汉代研究经学注重名物、训诂——后世称“研究经、史、名物、训诂考据之学”的“汉学”，而是指外国人研究中国历史、语言、哲学、文学、艺术、宗教、考古及社会、经济、法律、科技等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那种学问，这起码已是200多年来世界上的习惯学术称谓。李学勤教授多次谈到这个问题：“‘汉学’，英语是Sinology，意思是对中国历史文化和语言文学等方面的研究。在国内学术界，‘汉学’一词主要是指外国人对中国历史文化等的研究。有的学者主张把它改译为‘中国学’，不过‘汉学’沿用已久，在国外普遍流行，谈外国人这方面的研究，用‘汉学’比较方便。”① Sinology一词来自外国，它不是汉代的“汉”，也不是汉族的“汉”，不指一代一族，其词根sino源于秦朝的“秦”（Sin），所指是中国。

在历史长河里，汉学由胚胎逐渐发育成长。虽然在1814年12月11日，法国法兰西学院才有第一个被称为西方汉学起点的汉学讲座；但指代汉学的“Sinologie”（英文“Sinology”）一词则出现在18世纪末，早于由雷慕沙（Jean Pierre Abel Remusat）主持第一个汉学讲座的时间，更不会晚于1838年。从此之后，“Sinology”便成为主导汉学世界的图腾，约定俗成的学术“域名”。在世界文化史和汉学史上，外国人把研究中国的学问称为“汉学”，研究中国学问的造诣深厚的学者称为“汉学家”。因此，我认为，我们不必要标新立异，根据西方大部分汉学家的习惯看法，“Sinology”发展到如今，这一历史已久的学术概念有着最广阔的内涵，绝不是什么“汉族文化之学”，更不是什么汉代独有的“汉学”，它涵盖中国的一切学问，既有以儒释道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也包含“敦煌学”、“满学”、“西夏学”、“突厥学”以及“藏学”和“蒙古学”等领域。但是一直以来人们对汉学的理解和解释相左，因此便有了“中国学”、“海外汉学”、“海外中国学”、“域外汉学”、“国际汉学”、“世界汉学”等不同的叫法；如果咬文嚼字，推演下来，一定还会有“国内汉学”、“国内中国学”，甚至“北京汉学”、“河南汉学”等。由于汉学的发展、演进，以法国为首的“传统汉学”和以美国为首的“现代汉学”，到了20世纪中叶之后，研究内容、理念和方法，已经出现相互兼容并包状态，就是说Sinology可以准确地包含Chinese Studies的内容和理念；

① 李学勤：《国际汉学漫步·序》，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

从历史上看,尽管 Sinology 和 Chinese Studies 所负载的传统和内容有所不同,但现在却可以互为表达同一个学术概念了。话再说回来,对于这样一个负载着深刻而丰富的历史内涵的学术"域名",我以为还是 Sinology 最好,因为,Sinology 不仅承继了汉学的传统,而且也容纳了 Chinese Studies 较为广阔的内容。另外,中国人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应该称为国学,而外国学者研究中国文化的那种学问则称为汉学。这样,汉学既符合中国文化的学术规范,又符合世界上的历史认同与学术发展实际。

汉学的历史是中国文化与异质文化交流的历史,是外国学者阅读、认识、理解、研究、诠释中国文明的结晶。汉学作为外国人认识中国及其文化的桥梁,是中国文化和外国文化撞击后派生出来的学问,实际上也是中国文化另一种形式的自然延伸。但是,汉学不是纯粹的中国文化,它与中国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既是中外文化的"混血儿",又是可以照见"中国文化"的镜子,是可以攻玉的"他山之石"。"'Sinology'是一门在国际文化中涉及双边或多边文化关系的近代边缘性的学术,它以'中国文化'作为研究的'客体',以研究者各自的'本土文化语境'作为观察'客体'的基点,在'跨文化'的层面上各自表述其研究的结果,它具有'泛比较文化研究'的性质。"① 以上两种表述虽有不同,但学理一致,基本可以厘清我们对于 Sinology(汉学)的基本学术定位。

法国汉学家马伯乐(Henri Maspero)说过:"中国是欧洲以外仅有的这样的一个国家:自远古起,其古老的本土文化传统一直流传至今。"法国哲学家弗朗索瓦·于连(François Jullien)也说:"中国文明是在与欧洲没有实际的借鉴或影响关系之下独自发展的、时间最长的文明……中国是从外部审视我们的思想——由此使之脱离传统成见——的理想形象。"② 他在《为什么我们西方人研究哲学不能绕过中国》中提出:"我们选择出发,也就是选择离开,以创造远景思维的空间。人们这样穿越中国也是为了更好地阅读希腊。"为了获得一个"外在的视点",他才从遥远的视点出发,并借此视点去"解放"自己。这便是一个未曾断流、在世界上仅存的几种古老文化之一的中国文明的意义。中国文明是一道奔流不息的活水,活水流出

① 严绍璗:《我对 Sinology 的理解和思考》,载 2006 年《世界汉学》第四期。

② [法]于连(François Jullien):《迂回与进入》,香港:三联书店,1998 年。

去，以自己生命的光辉影响世界；流出的“活水”吸纳异国文化的智慧之后，形成既有中国文化的因子，又有外国文化思维的一种文化，这就是“汉学”。就是说，汉学是以中国文化为原料，经过另一种文化精神的智慧加工而形成的一种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汉学既是外国化了的中国文化，又是中国化了的外国文化；抑或说是一种亦中亦西、不中不西有着独立个性的文化。汉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具有跨文化性质的学科，是外国文化对中国文化借鉴的结果。汉学对外国人来说是他们的“中学”，对中国人来说又是西学，它的思想和理论体系仍属“西学”。

汉学研究系指对外国汉学家及其对中国文化研究成果的再研究，是中国学者对外国学者研究中国文化的反馈，也是对外国文化借鉴的一个方面。凡是对历史或异质文化进行研究，都有一个价值判断和公正褒贬的问题。因此，对于外国汉学家对于我们中国文化的研究，必得有我们自己的判断，然后做出公正的褒贬。我们说汉学是可以攻玉的“他山之石”，但是这句箴言并非只是适用于中国人，对外国人也是一样。汉学也像外国的本体文化一样，对我们来说有借鉴作用，对西方来说有启迪作用——西方学者以汉学为媒介来了解中国，汲取中国文化的精华，完善自己的文明。人类由于文化背景差异和文化语境的不同，思维方向和方式也会不同，因而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讲出不同的道理。“西方学者接受近现代科学方法的训练，又由于他们置身局外，在庐山以外看庐山，有些问题国内学者司空见惯，习而不察，外国学者往往探骊得珠。如语言学、民俗学、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诸多领域，时时迸发出耀眼的火花。”① 汉学的学术价值往往不被国人重视，并利用汉学家对于中国文化的一些误读贬低汉学的价值。其实，这并不公平，有些汉学家对于中国文化确实有其独到的见解，能发中国人未发之音。法国汉学家马伯乐（Henri Maspero，1883—1945）对中国上古文化和上古宗教的研究就有独到的贡献，被称对中国宗教研究有“先河”之功。他研究中国宗教的宗教社会学的方法，促进和推动了中国学者采用宗教社会学来研究中国宗教，被称为“中国宗教社会学研究的真正创始人”。瑞典汉学家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1889—1978），终生的最高成就是根据研究古代韵书、韵图和现代汉语方言、日朝越诸语言中汉语借词

① 季羡林：《汉学研究·序》第七集，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

译音构拟汉语中古音和根据中古音和《诗经》用韵、谐声字构拟古音，写出了著名的学术专著《中国音韵学研究》、《汉语中古音与古音概要》、《古汉语字典重订本》、《中日汉字形声论》、《论汉语》、《诗经注释》、《尚书注释》和《汉朝以前文献中的假借字》等，他对汉语音韵训诂的研究是不少中国学者所不及的，并深刻影响了对于中国音韵训诂的研究。20世纪著名的日本学者津田左右吉关于中国文化的研究著述甚丰，他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种"人事本位文化"，其核心是"帝王文化"，其他认识上尽管有偏颇，但也有其独异性和深刻之处。这就是"他山之石"的意义和价值。当然，不可否认，汉学家对于中国文化的误读或歪曲也是常见的，诸如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John Gunnar Andersson)于1921年10月对河南仰韶文化遗址发掘之后，便说中国彩陶制作技术源于西方，并在他的《甘肃考古记》和《黄土儿女》著作中反复强调他的这一错误观点。这一观点亦为"西方文化东移造成中国文化之说"提供了说辞。日本学者石田幹之助也推波助澜，闭门造车地推测出西方文化东渐的路线；甚至连我们的国学大师章太炎、刘师培也被"忽悠"得认可了"中国文化西来说"。① 美国现代汉学(中国学)的奠基人费正清对中国历史尤其近代史的研究独具风采，为美国人民认识中国搭建了一座桥梁；但他在研究上的所谓"冲击—回应"模式，却近乎荒谬，认为是西方给中国带来了文明，是西方的侵略拯救了中国。综上所述，对于汉学成果的研究，只有冷静、公正、客观、全面，才能在沙中淘得真金，拥抱"他山之石"。

在中国，汉学的接受与命运，诚实地说，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之前，基本上是无视它的学术价值，更没人把它看做是中国文化的延伸。此外，由于民族心理上的历史"障碍"，我们还曾视汉学为洪水猛兽，甚至觉得它是仇视中国、侮辱中国的一个境外的文化"孽种"。这种"观点"，虽嫌偏颇，但也不是空穴来风。因为自19世纪"鸦片战争"前后，直至20世纪40年代，偌大的中国曾经惨遭蹂躏，整个历史写满了炮火压迫和宗教怀柔，其间也不乏为列强殖民政策服务的传教士、"旅行家"和"学者"深入中国腹地，以旅行、探险、考古之名而实行搜集社会情报、盗窃和骗取中国大批文

① 《章太炎全集·〈訄书·序〉·〈种姓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刘师培《刘申叔先生遗书·〈思念祖国〉·〈华夏篇〉·〈国土原始论〉》。

物。

人类思想的飞翔，是受社会和历史禁锢的，山高水远的阻隔也使得人类互相寻找的岁月特别漫长。交流是人类文化选择的自然形态，汉学就发生在这种物质交流和文化交流之中。

公元前后，中国人被称为赛里斯（Seres），中国叫赛里加（Serice），这是陆路交往关于中国最初的叫法，时间较早；另一种叫法，把中国人称为秦尼（Sinai），中国叫秦（Sin），这是海路交往关于中国的叫法，时间较晚。由商人输往西方的中国丝绸绢绘是当时帝王贵族倾慕的奢侈珍品，Seres 和 Serice 两字系由阿尔泰语所转化，是希腊罗马称谓中国绢绘的 Serikon、Sericum 两字简化而来。西方人当时称中国为“秦”（Sin），称中国人为“秦尼”（Sinai），则是源于秦朝。①

人类在互相寻找的初级阶段，中国和西方试探性的商业交往还很原始，那时的人类，不同的国家、民族和族群处于相对落后和封闭的状态，人类各个角落的不同文化还处于相对不自觉或是相对蒙昧的历史时期。在人类最早的沟通中，中国人走在最前边。公元前 139 年，张骞奉汉武帝之命，越过葱岭，亲历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乌孙、安息等地，直达地中海东岸，先后两次出使中亚各国，历时十多年，开创了古代和中世纪贯通欧亚非的陆路“丝绸之路”，为人类交往开创了先河，也为汉学的萌发洒下最初的雨露。

在文化史上，以孔孟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中国文化最先影响朝鲜半岛，然后才是日本和越南等周边国家。这些周边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复杂，甚至被说成同种同文，因此可以说它们的文化与中国文化有着很深的“血缘”关系。公元 522 年，中国佛教渡海东传日本，从那时开始，中国典籍便大量传入日本，但这只是一种“输入”，只是日本创建自己文化的借鉴，并没有形成对于中国文化的深层研究。及至唐代，由于文化上承接了汉朝的开放潮流，那时与异质文化的交流相对更加频繁，商贸往来和文化沟通有了发展，西方和中国周边国家或地域的人士通过陆路和水路进入中国腹地，长安、洛阳、扬州、广州、泉州等城市，都是中外贸易和文化交汇的重要都会，尤其是前者，更是当时世界最大的商业文化之都；而后者，由于东南沿海经

① 莫东寅：《汉学发达史》，北平文化出版社，中华民国三十八年，第 3 页。

济崛起，人口增多，手工业发达，农田水利的改善，为海外贸易发展创造了条件，再由于唐代中期“安史之乱”切断了陆路“丝绸之路”的缘故，曾称为“鲤城”、“温陵”、“刺桐城”的泉州，便成为联结亚洲、欧洲和非洲的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方第一大港”，是那时以丝绸、金银、铜器、铁器、瓷器为主的国际贸易之都。通过频繁的往来和交流，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的认识越来越多、越来越深，汉学也便在这种交流中不知不觉慢慢衍生。

但是，源远流长的汉学，人们习惯地认为其洪流和网络在西方，西方是汉学的形象代表。这一看法一是源自近代以来西方强势文化和中国人的崇洋心理，二是西方汉学的某些特征也确实有别于朝鲜半岛、日本和越南的汉学。其实，如果我们从世界汉学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日本、朝鲜半岛和越南的汉学要早于西方的汉学，比如日本在十四五世纪已经初步形成了汉学，而那时西方的传教士还没有进入中国。因此，对于汉学的研究，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朝鲜半岛、日本和越南），我们都不能顾此失彼，要以同样的关注和努力探讨其历史。当然，汉学的历史藏在文献里，而隐性源头却在文献之外。

文化往往伴随经济流动，其交流也会在不自觉或无意识状态下发生。到了明代初年，郑和率舰队出使西洋，前后7次，历经28年，到过30多个国家，最远抵达非洲东岸和红海口，真正拓展了海上“丝绸之路”。

在公元八九世纪至十六七八世纪期间，关于中国，多见于西方商人、外交使节、旅行家、探险家、传教士、文化人所写的游记、日记、札记、通信、报告之中，这些文字包含着重要的汉学资源，因此有人把这些文献称为“旅游汉学”。这些人的东来源于文艺复兴，因为思潮的开放影响了欧洲人的思想和生活，他们或通商，或传教，或猎奇，但了解和研究中国文化却是一致的，于是汉学便在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法国、荷兰、英国、德国、俄罗斯等主要的西方国家逐步发展起来。

这类游记和著作较早的有约在公元851年成书的描述大唐帝国繁荣富强的阿拉伯佚名作者的《中国与印度游记》、吕布吕基斯的《远东游记》（1254）、意大利的雅各－德安克纳的《光明城》、贝尔西奥的《中华王国的风俗与法律》（1554）、《利玛窦中国札记》、亚历山大－德－罗德的《在中国的数次旅行》（1666）、南怀仁的《中国皇帝出游西鞑靼行记》（1684）、费尔南－门德斯－托平的《游记》、李明的《关于中国现状的新回忆录》（1696）

和《中华帝国全志》(《中国通志》)等,以及罗明坚、金尼阁、汤若望、卫匡国等名士的著作,还有大量名不见经传的传教士、商人、旅行家、探险家的各种记述,都成为日后汉学兴旺发达的必然因素。这类著作主要涉及中国的物质文明,较多描述、介绍中国的山川、城池、气候,以及生活起居、饮食、服饰、音乐、舞蹈,也涉及到一些中国的观念文化。这些"旅游汉学"著作中,影响最大的是《马可·波罗纪行》(《东方见闻录》)。马可·波罗(Marco Polo)于1275年随父亲和叔父来中国,觐见过元世祖忽必烈,1295年回国后出版了这本书,它以美丽的语言和无穷的魅力翔实地记述了中国元朝的财富、人口、政治、物产、文化、社会与生活,第一次向西方细腻地展示了"唯一的文明国家"——"神秘中国"——的方方面面。

这些包罗万象的文献,不仅记录了不同时代的中国,还以自己的文化视角开始了中西文化最初的碰撞。作为文献,这些游记、日记、札记、通信和报告,有赞美,有误读,也有批评,但因为其中包含大量中国物质文化及政治、经济、历史、地理、宗教、科举等多方面的文化记载,而成为汉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学术史上有重要价值。

汉学的发生、发展与经济、政治、交通以及资讯分不开。有学者把汉学的历史分为"萌芽"、"初创"、"成熟"、"发展"、"繁荣"几个时期,也有的分为"游记汉学时期"、"传教士汉学时期"和"专业汉学时期"三个阶段。但汉学的真正形成是在明末兴起的"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的互动之中。

从16世纪到十八九世纪,在数以千计的散布在中国各地的传教士中,有不少人成为名载史册的汉学先驱,他们为汉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自1540年罗耀拉(S. Ignatins de Loyola)、圣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co Xavier)等人来华,开始了以意大利、西班牙传教士为主的第一时期的耶稣会的传教活动。接着,意大利的范礼安(Alexandre Valignani)、罗明坚(Michel Ruggieri)等著名传教士来华。1583年,即明朝万历十一年,罗明坚将利玛窦神甫(Matteo Ricci)带到中国,从此,耶稣会士在中国的宗教活动无论是对于西方或是东方,都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西班牙的胡安·冈萨雷斯·德·门多萨(Juan Gonzalez de Mendoza)的《中华大帝国史》于1588年问世,这部世界汉学史上的第一部汉学著作,名副其实地对中国的政治、历史、地理、文字、教育、科学、军事、矿产、物产、衣食住行、风俗习惯等做了百科全书式的介绍,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以七种文字印行,风靡欧

洲。以利玛窦为核心的耶稣会士的历史意义在于他们开始了对中国文化的全面“开垦”，不仅著书立说，还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中国文化经典译成西文，不仅开西学东渐之先河，也推动了中学西传，使中国文化对西方科学与哲学产生重要影响，因此这位思想家当仁不让地被视为西方汉学的鼻祖。与其先后到达中国的著名的传教士，都著书立说、传播中国文化，对推动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做出了贡献。在世界汉学史上，除了以上提及的，还有许多汉学家的名字十分响亮，诸如曾德照、柏应理、卫匡国、殷铎泽、南怀仁、汤若望、龙华民、金尼阁、罗如望、熊三拔、李明、张诚、白晋、马若瑟、宋君荣、钱德明、翟理斯、安特生、雷慕沙、儒莲、德理文、安东尼·巴赞、蒙田、冯秉正、尼·雅·比丘林、巴拉第·卡法罗夫、瓦西里耶夫、沙畹、伯希和、马伯乐、葛兰言、斯文赫定、马礼逊、斯坦因、理雅各、翟里斯、李约瑟、韦利、霍克斯、卫礼贤、福兰阁、孔拉迪、高本汉、卫三畏、费正清、戴密微、石泰安、谢和耐、欧文等。他们和东方日本、朝鲜半岛的富有建树的汉学家以及当今散布在各国的汉学家，对中国文化的独特理解，铸造成汉学史上的思想学术之碑，开垦了汉学成长的沃土。

“西方的汉学是由法国人创立的。”但是，在欧洲全面研究中国文明的问题上，“法国的先驱是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①] 戴密微把以上三个国家誉为汉学的先锋，“他们于16世纪末叶，为法国的汉学家开辟了道路，而法国的汉学家稍后又在汉学中取代了他们”，真正建立起作为学术的汉学传统。就传统汉学而言，法国是汉学家最多的国家之一，有许多汉学界的学术巨擘，不断为汉学的崇高而添砖加瓦。

中外文化交流的结果不仅意味着中国文化“外化”的传播，也意味着异质文化对中国文化“内化”的接受。汉学家作为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和使者，在异质文化的交流中，也是人类和谐与进步的推动者。

汉学诞生在与异质文化碰撞、交流和相互浸淫之中。这个结果无异于一枚果子的成熟，只有“风调雨顺”才生长得好。和谐、宽容、理解与尊重，是异质文化彼此借鉴的保证。作为文化形态的汉学，其成长和生存离不开良好的国际语境。就中国而言，历史上凡是开放的时代，文化交流多，汉学

① 戴密微：《法国汉学研究史》，载耿昇译《法国当代中国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就发展;反之,汉学就停滞,这似乎成为一种规律。

作为学术公器的汉学,文化上有其自己的成长过程。汉学是发展的,这一植根于中国文化土壤,生存于异国他乡的文化,同样深受不同时代语境的极大影响。这里所说的语境,既包括中国的历史演变,也包括异国和世界的历史变化。就是说,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汉学的发展方向和内容;换句话说,汉学的形成和发展,不仅受制于中国历史的更迭,也受制于他者社会的变化。这就是以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化为研究对象的汉学发展的基本轨迹。

汉学作为一种学术形态,总体上可以分为"传统汉学"和"现代汉学"。传统汉学以法国为中心,而现代汉学兴显于美国,20世纪中期以来,在西方其他国家葆有传统汉学的同时,现代汉学也很繁荣。随着中国与世界政治关系的变化,随着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交流的拓展,现代汉学有了显著的发展。

虽然20世纪的后50多年,中国文化与世界各国文化接触开始多了起来,但就整体而言,1949年后约有30多年是一个相对"闭关锁国"的时期。公正地讲,这道意识形态的"长城"也并非就是中国的政策,是那时期以美国为首的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上对我国全面封锁的结果。这个时期的"汉学"涂满了政治色彩,以法国为代表的汉学较多地保持着传统汉学的学术精神,而美国的"中国学"却成了充满政治意识的现代汉学的代表。美国的"中国学"所关心的不是中国文化,更不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而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和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问题。这种政治特征,是那个时期美国汉学的基础,这一特征也影响了其他国家汉学的研究方向和内容。

由于中国与世界的隔离,由于西方与中国少有交流,因此汉学家不了解中国最新的文化进展(比如新的考古发现),致使汉学处于断炊或"无米之炊"的状态,没有中国文化的支持,西方汉学要想取得研究上的突破也很困难。陌生感和神秘感困扰着汉学家,这不仅是文化的尴尬,也是汉学家的难堪。

人类文化包含了物质文化和观念文化等。物质文化表现在衣食住行生活方面,是一种看得见摸得着又极易变化的"具象"文化,即如饮食、服饰、住房、音乐、舞蹈等;观念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核心,表现在人的价值观、

道德观、家庭观、宗教观等诸多方面，以及关于自由、平等、民主的理解，观念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思维经过高度抽象后形成的思想、观念和精神，它通过文化灵魂——哲学、文学、语言、宗教、历史等来表达。[①] 观念文化，一俟进入外国汉学家的研究视野，他们的研究也就进入了对中国文化核心的深层研究。

汉学家从对中国物质文化到观念文化的研究，其领域越来越广越来越深。现在，汉学不仅包括对中国的哲学、文学、宗教、历史领域的研究，还包括社会学、政治学和自然科学。Sinology（汉学）和 Chinese Studies（中国学），它们已经发展到可以"异名共体"的地步。

时至今日，传统汉学和现代汉学这两种汉学形态不仅同时存在着、共荣着，而且还互相浸透着。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美国汉学悄然嬗变为中国学，并以自己独有的个性特点和极强的生命力出现在世人面前。美国汉学始自 1830 年东方学会（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的建立，这个学会虽然代表了欧洲那种对东方学文学的兴趣，但这个学会"从一开始就有一种与众不同的使命感"——"为美国国家利益服务，为美国对东方的扩张政策服务"。[②] 这个特点也与"美国海外传教工作理事会"向中国派出基督教传教士的宗旨相一致。可见，美国汉学一开始就和美国的国际战略和对华政策联系在一起。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48 年出版的百科全书式的《中国总论：中华帝国的地理、政府、教育、社会、生活、艺术、宗教及其居民观》就带有较为浓厚的社会科学特点，与欧洲具有人文科学特征的汉学颇有差异，但它依然属于 Sinology 的范畴。

美国从南北战争后的统一中走向强大，加入强国之列。八国联军对中国的侵略行径，是列强联合的第一次尝试。从那时起，承担着相当"政治"角色的传教士进入中国。真正美国式的"汉学"——中国学，就从那时开始，而奠基人和开拓者是之后的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作为美国首席中国问题专家的费正清，他的中国学研究不仅影响了美国，也对其他国家的汉学研究或中国学研究都有强烈的影响。

---

① 任继愈：《汉学发展前景无限》，载《中华读书报》2001 年 9 月 19 日。

② 侯且岸：《费正清与中国学》，载李学勤主编《国际汉学漫步》（上），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 年。

在西方，费正清的魅力在于，没有谁能像他那样以更清晰、更富于洞察力的笔触来表述中国。“在使美国人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传统、中国纷扰不安的近代史，以及中国神秘莫测的现状等方面，谁的贡献也没有像他那样大。”费正清等一批知名的美国中国学家都参与过战时情报工作，在战后作为美国政府的智囊而直接为制定对华政策服务。费正清的研究虽然充满了实用和功利色彩，立场和观点也有偏见，但这并不妨碍他在历史上作为一个贡献巨大的汉学家和中国人民的朋友的光辉。美国学者从事研究的根本出发点是“使命感”、“学术个性”和“反唯理智论倾向”，“蔑视学问，更为强调实用性知识”，“更为明显同自己以外的社会，即政治家、实业家及其实践家始终保持紧密的联系”。① 这就是美国中国学家的基本心态，他们讲究功利和实用，不理会学术上的理智倾向，这与法国汉学家的学术心态、学术个性与学术传统几乎大相径庭。

传统汉学（Sinology）和现代汉学（Chinese Studies）的差异在于前者是以文献研究和古典研究为中心，它们包括哲学、宗教、历史、文学、语言等；而以美国为中心的现代汉学（中国学）则以现实为中心，以实用为原则，其兴趣根本不在那些负载着古典文化资源的“古典文献”，而重视正在演进、发展着的信息资源。但是，汉学发展到21世纪，其研究内容和方式已经出现了融通这两种形态的特点。这种状况既出现在欧洲的汉学世界，也出现在美国的中国学研究之中，可以说世界各国汉学家的研究中，都兼有以上两种汉学形态。

汉学（Sinology）对中国研究者来说，被尘封得太久，所以它的空白很多，浩如烟海的资源还有待于深入开掘。这种开掘，不仅可以收获汉学，还可以无意中发现被历史“放逐”和“遗失”在异国他乡的中国文化。编撰“列国汉学史书系”的目的和宗旨，不仅是为了梳理已有的汉学资源，在世界范围内追踪中国文化的外传历史状况、经验及影响，同时探究汉学的产生、成长、发展与繁荣，还要尽可能厘清这块“他山之石”对于中国文化的作用。当然，“列国汉学史书系”还期望对推动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交流有所裨益。

“列国汉学史书系”作为一个文化工程，其撰写的难度非一般学术著

① ［美］赖肖尔：《近代日本新观》，北京：三联书店，1992年。

作所能比拟。严绍璗教授谈到 Sinology 的研究者的学识素养时提出四个“必须”：一、必须具有本国的文化素养（尤其是相关的历史、哲学素养），二、必须具有特定对象国的文化素养（同样包括历史、哲学素养），三、必须具有关于文化史学的基本学理素养（特别是关于“文化本体”理论的修养），四、必须具有两种以上语文的素养（很好的中文素养和对象国的语文素养）。这几点确实都是汉学研究者必须具备的文化和语文素养，否则很难进入汉学研究的学术境界。

写作“列国汉学史”艰难，而出版可谓难上加难。1995 年曾经“落实”的出版经费，因故而一风吹。人间的事好像天上的云地上的风，飘忽不定没有根，铁板钉钉是没有的，因为钉子可以用“权力”拔出来，一切承诺和协议，都可以化为乌有。虽然“列国汉学史书系”的生长不断受到寒风的袭击，但它终没有自毙于摇篮之中，冬天之后是春天，接着便是收获的季节。这套富有创意和价值的书系，将对中外文化交流和汉学的发展及其比较研究产生深远影响。说到这里，“书系”编辑委员会同仁和作者，要感谢学苑出版社所给予的支持，尤其要感谢社长兼总编孟白先生和不久前病逝的总编辑助理郭强副编审，由于他们慧眼识金才使这一书系得以面世。

有人认为“汉学史中国人写不了”，当然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立论”。日本人石田幹之助写了《欧人的中国研究》（1932），莫东寅写了《汉学发达史》（1949），接下来又有严绍璗的《日本中国学史》（1991），张国刚的《德国的汉学研究》（1994），张静河的《瑞典汉学史》（1995），何寅、许光华主编的《国外汉学史》（2002），刘正的《图说汉学史》（2005）和李庆的《日本汉学史》（2005）相继面世。在人类的文化长廊里，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各种史书琳琅满目，这其中有外国人写中国的各类历史，也有中国人写外国的各类历史。历史，是往事，是记录，是选择，并有相对独立的评论和褒贬。但是，事实上任何一部历史都不是最后的历史，历史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演进，修史很难一步到位，它需要一代代学者“积跬步”才能“至千里”，只有“积土成山，积水成渊”，方能“风雨兴”、“蛟龙生”。学问之事非一夕之功，非得有前赴后继者敢于赴汤蹈火“流血牺牲”，才会达至光明顶峰。

开拓者也许会在某个时候将自己的真诚劳作化为欢乐，因为在以后的岁月里，定会有人踏着自己的肩膀或是踩着自己的鼻子和头顶攀上高峰，以鸟瞰美丽风光。21 世纪是经济的大空间，对汉学来说也是一个“大空

间”。但是，要探索这个“大空间”，需要有个和谐的“太空站”，需要大家联袂共建；当然世界上需要多元文化和谐相处的历史语境，共同创造彼此接近、认识、理解、尊重、沟通、借鉴与融合的机会，这个机会，就是汉学研究发展的机会。

时间在行走，历史在行走。人类创造过历史，书写过历史，但是没有最后的历史。汉学有历史，而且还正在创造新的历史，汉学及其研究将以自己的品格和个性在人类文化的世界里放出异彩。

阎纯德

2006年12月5日于北京半亩春

前 言

一部《法国汉学之我见》的书

记得最早对法国汉学发生兴趣是20世纪80年代第一次赴法任教前的那次培训。那时出国前是要培训的，内容包括前往国家的国情、应注意的礼仪等，自然，还介绍那里的汉学研究历史和现状。记得我当时拿到一份介绍法国汉语教学和汉学研究资料时，兴奋之余，便一口气把它读完。其实，按现在看来，那份材料有点简单，可在当时，我已眼界大开，且被深深吸引。因为，在这之前，我只是在一本医书上看到，说宋代时我国的针灸就已远传法兰西。可惜这条信息后来再也没有找到，也不知是否真实。也许正是这一条模糊而不确定的信息，引起了对那份培训材料的兴趣，也可能，正是这两件在别人看来并不特别的事情，在我的身上却起了作用，并默默地驱使着我去追寻、探秘法国汉学之路。

无奈和令我哭笑不得的是，1991年回国后写了第一篇有关法国汉学的论文，稿子完成后请当时在复旦任教的法国汉学家帮助核实，他也满口答应。可他回国后因车祸不幸去世，那份稿子也就下落不明。在那个年代，复印并不方便，手头只剩一些零星手稿，后又因种种原因，这工作便搁了下来。

重新开始进行这一工作是1995年第二次从法国任教后回国。学院要给对外汉语专业研究生开“国外汉学”选修课，并把任务交给了我，自然正中下怀。但当我踌躇满志、满腔热情投入这一领域时，发现这工作是如此的艰深！我深切体会到，从兴趣到做学问，道路之曲折和艰辛，只有亲身从事者心里明白。

我认为，所谓“国外汉学”，应该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外国学者对中国的研究，二是中国的研究者对国外汉学家成果的再认识和研究，这部《法国汉学史》应属于后者，是中国的研究者对法国汉学的再认识和研究。显然，它主要是姓“中”，而不是姓“外”，更多体现的是中国研究者的思维方式和

观念，还有个人对问题的看法。

法国是世界汉学的主要发源地之一，历史悠久，人才辈出，内容丰富，要想写一部《法国汉学史》谈何容易，且主编要求有一定的理论深度，更是难上加难。好在前人和同时代的国内外学者已有许多成果可供参考（为方便读者，已在书后列出部分参考书目）。对于同样一个事物，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看法和体会，对于法国的汉学亦然。本书可以说是我近年来学习法国汉学，以及跟国内外学者交流后的一点认知和体会的记录。把它称之为“简明”也是勉强，倒不如称之为《法国汉学之我见》可能更为合适和符合实情。也正如此，本书在资料运用上的挂一漏万和认识上的偏颇都在所难免，故热切希望专家学者和同行的批评指正。

《法国汉学史》全书除前言和附录外共有五章，即概述、法国汉学的草创、确立和发展、从传统走向现代（上）、（下）。每章大致包括三方面内容：概况，汉学家列传和该时期的主要汉学成就。全书列传的汉学家约80多个。限于篇幅，除雷慕沙、儒莲、德理文、巴赞、沙畹、考狄、马伯乐、伯希和、葛兰言、戴密微、谢和耐这几位汉学家字数较多，在6000字左右外，其余的都只在500～3000字左右。但不论字数多少，都包括两方面内容，即生平传略和学术成就；篇幅长的对其主要作品也有简要论述和分析；关于这时期的主要成就，凡笔者认为有亮点的都设法点明，并做扼要分析。

本书能得以完成，应该感谢法国的汉学家和朋友，尤其是我工作过的蒙日洪中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和里昂第二大学的老师和同行们，他们或给我提供资料或跟我真诚交谈，还在我回国后，不断寄送资料，发电子邮件；我也感谢法国驻沪领事馆的官员和工作人员，他们的一番话，既令我感动，也增强了我完成此书的信心和责任感。他们热情地告诉我：凡是属于领馆的资料你都可以使用，如若不够，请开出书单，我们将从国外引进。

接下来首先应感谢的是阎纯德先生，没有他的热情支持、催促，本书难以完成。为了早日脱稿，我们不仅电子邮件不断，长途电话也是往来频繁。此外，还要感谢钱林森先生、朱静女士、耿昇、张西平先生等，他们或给我提供资料，或帮我联系汉学家，或提供设想，既给我友谊，也给了我勇气和力量。最后应该感谢的是我北外学法语时的同窗，后来我的领导、原国家汉办代理主任、已故的赵永魁先生，我有两次在法任教都在他直接领导之下。每次见面，他都反复地提醒我们：出国汉语师资的任务，不仅只是教授汉语，同时应加强与汉学家的联系和对他们学术成果的研究。赵先生虽已驾

鹤西去，但这番言论，至今仍在我耳边回荡。

还应该感谢我的学生们，这些现已成为这一学科骨干的年轻学子，在他们学生时代，就对我所从事的课题翘首以待，学有成就后又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和支持，如复旦对外汉语学院的朱丁、外语系的张华女士，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的蒋向艳女士等。

许光华

2008 年 12 月 30 日

目 录

前 言 …… (1)

第一章 概述:法国汉学三百年 …… (1)

第二章 法国汉学的草创
(13 至 18 世纪法国汉学) …… (21)

第一节 法国对中国最早的认知 …… (21)

第二节 法国传教士和欧洲汉学的草创 …… (29)

一、"国王数学家"传教士奉命来华 …… (29)

二、"女神"号首航中国及其意义 …… (32)

三、"草创"期法国汉学格局 …… (35)

第三节 "饱学多能"的传教士汉学家 …… (41)

一、张诚、李明、刘应 …… (41)

二、雷孝恩、白晋、巴多明、马若瑟 …… (42)

三、冯秉正、宋君荣、钱德明、韩国英 …… (48)

第四节 京都巴黎汉学家 …… (57)

一、杜赫德、佛雷烈、傅尔蒙 …… (57)

二、戴早莱、德经、小德经 …… (59)

三、黄嘉略、高类恩、扬德望 …… (60)

第五节 传教士对汉学领域的开拓 …… (62)

一、推出更具学术性的中国史地书 …… (62)

二、创建西方"易学"研究 …… (64)

三、开始重视中国纯文学作品 …… (66)

四、出版欧洲汉学“三大名著” …… (68)
五、开创汉语教学与研究 …… (70)
六、汉语“起源”的论争及其意义 …… (76)
第六节 传教士与法国启蒙思想家 …… (81)
一、关于中国纪元的看法 …… (82)
二、对中国人信仰的评述 …… (83)
三、认为中国人有良好的伦理道德 …… (84)
四、对中国政体的借鉴 …… (86)
五、从科举制度到西方近代考试制度 …… (87)
六、中国农业政策和法国重农主义 …… (88)
第三章 法国汉学的确立和发展
(19 至 20 世纪初法国汉学) …… (90)
第一节 “汉学”(Sinologie)学科的确立 …… (90)
一、Sinologie 的确立及其意义 …… (90)
二、学科建立的背景和特点 …… (91)
三、汉学学科确立的主要体现 …… (95)
四、19 世纪法国汉学的局限 …… (100)
第二节 职业汉学家队伍的形成 …… (101)
一、雷慕沙和他的汉学研究 …… (101)
二、儒莲和他的汉学研究 …… (106)
三、毕欧和他的汉学研究 …… (112)
四、德理文和他的汉学研究 …… (113)
五、巴赞和他的汉学研究 …… (118)
六、哥士耆、冉默德、德韦理亚和微席叶 …… (120)
七、古兰和他的汉语研究 …… (123)
第三节 外交官和传教士汉学家 …… (124)
一、外交官汉学家 …… (124)
二、传教士汉学家 …… (126)
第四节 汉学教学和研究的新成就 …… (129)
一、断代和国际关系史研究 …… (130)
二、对中国多个教派的探索 …… (132)

三、俗文学和唐宋诗词的译介 …… (135)
四、汉语教学和研究紧密结合 …… (139)
五、其他:关注自然科学的考察 …… (142)
第四章　法国汉学(中国学)的发展(上) …… (144)
第一节　法国汉学的繁荣和昌盛 …… (144)
一、西方的汉学,一门法国的科学 …… (144)
二、繁荣昌盛的三个学术景象 …… (146)
三、繁荣昌盛的三个学术背景 …… (154)
第二节　"泰斗式"的"明星"汉学家 …… (158)
一、沙畹和他的汉学研究 …… (158)
二、考狄和他的汉学研究 …… (167)
三、伯希和和他的汉学研究 …… (173)
四、马伯乐和他的汉学研究 …… (181)
五、葛兰言和他的汉学研究 …… (186)
第三节　以中国题材创作的汉学家 …… (194)
一、追求中国题材和美学意识 …… (194)
二、克洛岱尔和中国题材创作 …… (197)
三、谢阁兰和中国题材创作 …… (201)
第五章　法国汉学(中国学)的发展(下) …… (207)
第一节　从困境中走出的法国汉学 …… (207)
第二节　二战后的法国汉学家 …… (212)
一、汉学队伍的扩大和专业化 …… (212)
二、戴密微和他的汉学研究 …… (225)
三、谢和耐和他的汉学研究 …… (234)
四、吴德明、汪德迈和侯思孟 …… (242)
第三节　二战后法国汉学的走向 …… (247)
一、关注近现代中国史的研究 …… (247)
二、1975 年后的中国哲学研究 …… (250)
三、中国文学的三个"热点" …… (260)
四、多元的现代汉语研究 …… (269)
五、蓬勃发展的汉语教学 …… (273)

附录一　法国汉学机构的确立和发展……（290）
附录二　欧洲部分汉学家名录……（304）
附录三　法国部分中文图书馆和博物馆简介……（310）
附录四　法国部分汉学刊物简介……（312）
附录五　主要参考文献……（317）
后　记……（335）

第一章
概述:法国汉学三百年

法国汉学研究历史悠久,内容丰富,思路活跃,一向为世界汉学界所重视。

法国对中国的最早记载,始见于"公元170年,罗马帝国时,马克·奥尔雷(Mark Aurle)作为特使到过中国"①,之后见诸于文献的则是公元13世纪法王派往蒙古的传教士鲁布鲁克(Guillaume de Rubruck,1215—1270)所写的《东行记》(1253—1255),而法国对中国真正有所研究是18世纪。如果我们从这时期算起,至今已有三百多年历史。综观三百多年法国汉学发展史,基本上可以将其分为草创、确立和从传统走向现代三个时期。

一

16—18世纪是西方对华传教第三次高潮②,在这次传教活动中,始唱主角者是葡、西和意,而从17世纪末开始至整个18世纪,法国便独占鳌头。

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病重时,已看到中国教区的冷落,于是向西欧发出呼吁增派教士。他的呼吁迎合了法国太阳王路易十四向世界,尤其是向东方扩张的野心,促使路易十四下决定向中国派遣六名有"国王数学家"之称的传教士,并于1685年3月3日正式踏上东去的征途。其中洪若翰(Jean de Fontaney)、张诚(J. Fr. Gerbillon)、白晋(Joachim Bouvet)、李

① 这一史料见于《法国大百科全书》、《法国小百科全书》及《世界历史大事表》,见阎纯德著《汉学和西方汉学研究》,《汉学研究》第一集,中华书局,1996年,第4页。

② 第一次为唐朝的景教活动,第二次为元朝"也里可温教"活动。

明(L. D. Le Comte)和刘应(C. de Visderou)五人,历经周折终于于1687年7月23日抵达浙江宁波,后入北京,并于1688年3月谒见了康熙皇帝。在华期间,白晋和张诚共任康熙老师,教授数学、天文,深得器重。于是,康熙让白晋回国招更多教士来华。1697年,白晋归国,带去康熙赠给路易十四的49卷汉籍,又招募了马若瑟(Joseph Marie de Prémare)、雷孝恩(Jean Baptiste Régis)、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宋君荣(Antoine Gaubil)、钱德明(也叫王若瑟,Jean Joseph Amiot)、冯秉正(De Maillac)、韩国英(Pierre Marchl Cibot)等共十名教士。

在法国,白晋力促商船"安菲特利特"即"女神"(L'Amphitrite)号开往中国。1698年3月6日,十名教士便乘该船从法国西海岸拉罗歇尔港出发,于1699年3月抵达中国。1701年,该船又直接从广州返法,这便是中法关系史上历史性大事——"安菲特利特"号首航中国。从此,整个18世纪,几乎每年有一艘至几艘船只往来于中法之间,把西欧的文化、物品带到了中国,也把中华文化、物品带到了西方。中国的丝绸、瓷器、画、漆器等工艺品和传教士的记录相得益彰,在西欧广为流传。"安菲特利特"号沟通了中西文化交流。18世纪弥漫在西欧的"中国风"或"中国趣味"就此产生。

16—18世纪的来华传教士,无论是葡、西、意的,还是法国的,他们的使命都是传教,但又都不同程度地从事了中国研究。所不同的是,前者仍然以传教为主,后者则已把主要精力花在中国研究之上。可以说,跟葡、西、意传教士相比,法国耶稣会士在传教事业上,除开初有过"短暂的兴旺"外,并"没有很多成功的记录",而在汉学研究上却成绩斐然。① 不仅作品数量远远超过前者,且已逐渐地进入自觉科学的考察、分析和研究。要交待的是,当我们谈到传教士的汉学成就时,绝不能忽略法国本土传教士和学者对中国研究所做的努力。当来华传教士"努力把自己融入中国文化"的同时,欧洲的一些中国研究者,也正在不遗余力地"使中国文化融入本土",竭力打造出跟来华传教士"不完全一样"的"汉学模型"。② 正是这两者"同"而又"不完全相同"的汉学研究,相得益彰,开创了西方"汉学研

① 忻剑飞:《世界的中国观》,学林出版社,1996年,第126页。

② 张国光等:《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5页。

究”的“草创”时期。[①]

“草创”时期,法国汉学研究队伍已初步形成,一部分就是来华传教士,另一部分是在传教士影响下法国本土的研究者。前者如李明、刘应、白晋、马若瑟、宋君荣、钱德明、冯秉正、韩国英等,后者如杜赫德(Jean Baptiste Du Halde)、佛雷烈(Nicolas Frérer)、傅尔蒙(Etienne Fourmont)、德经(Joseph de Guigne)等。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堪称是一些“知识渊博”、“饱学多能”之士。马若瑟精通汉文,对中国文化有很深的研究,他的“一代大作”《中国语札记》(*Notitia Linguae Sinicae*)[②]、《赵氏孤儿》法译本,在法国和欧洲都有深远的影响;在北京生活了36年的宋君荣,对中国科技史、古代史、边疆民族史、中外关系史等的研究,皆卓有成就,他的《元史及成吉思汗本纪》(1739)、《大唐史纲》(1791,1814)及附录《中国年代纪》(1814)等著、译作达80部之多,令中国学者吃惊,故有“耶稣会中最博学者”之称[③];钱德明,一位“有功于科学、文学”者[④],在中国生活了42年,边传教,边致力于中国民族、中华帝国方言和历史艺术研究,他以《乾隆帝御制盛京赋之法释》(1770)、《中国兵法考》(1772)、《中国音乐古今记》(1776)、《孔子传》(1784)等作品,并以裁判者的口气否定了中国文化起源于埃及的说法而独树一帜;18世纪法国来华传教士殿后者韩国英,对一切科学“皆有禀赋,兼具热心”,“凡有所为莫不成就”,[⑤]他在中国生活了22年,遗留下来的著、译作达60种之多,《中国古代论》、《野蚕说与养蚕法》、《象形文字之转为字母文字》、《论中国语言文字》、《中国陶器》等,内容极广,且都有一定水平。巴黎的汉学家亦然,杜赫德(Jean Baptiste Du Halde)的汉学研究,精深博大,而佛雷烈(Nicolas Frérer)、傅尔蒙 Etienne Fourmont)、德经(Joseph de Guigne)等,原本就是当时著名的思想家或学者。

“草创”时期的法国汉学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超过了他们的前辈。

在史地方面,这时期在通史、古代史、边疆民族史、现状和地理考察等方面都有可喜的成绩,且更加注重史料调查和实地考察,故也更具历料价

---

① 张国光等:《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第144页。

② [日]石田干之助:《中西文化之交流》,商务印书馆,1942年,第109页。

③ 忻剑飞:《世界的中国观》,第131页。

④ [法]费赖之,冯承均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中华书局,1986年,第876页。

⑤ [法]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938-939页。

值。冯秉正在编写的《中国通史》(Histoire de la Chine,1777—1783),虽当时并没有出版,但因史料可靠性和真实性,成为欧洲"中国通史"之"楷模",[①]"西方唯一最全的以中国史料为基础的中国通史"[②],对后世产生深刻的影响。张诚的《鞑靼纪行》、李明的《中国现状新志》(1696)、白晋的《康熙皇帝传》(1679)等,都极受重视。而传教士所绘制的《中华地图》则被认为不但是"当时亚洲""最好的一幅",而且也比"当时欧洲"所有的地图都"更好、更精确"。[③]

18 世纪末是西方《易经》译介第一次高潮,[④]虽为初步,但在中西文化交往和思想交流史上有着开创性的意义。最早向西方人介绍《易经》的是比利时耶稣会士柏应理(Couplet),但在《易经》翻译上"首有其功"的是法国传教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他用拉丁文翻译了这部作品。[⑤] 金尼阁之后,西方"易学"家辈出,"用力最勤,贡献最多"者也是法国传教士。据统计,此时《易经》译著保存下来近 20 种,其中大半为法国传教士所作,白晋、马若瑟、刘应、傅圣泽、汤尚贤、雷孝恩等,都不同程度地从事过《易经》译介,其中以白晋和雷孝恩最为突出。

18 世纪欧洲"中国文化热"的一个主要内容便是"汉语热":学习汉语、教授汉语和研究汉语,成了中华文化西移的主要内容之一。早在 1742 年,法国皇家学院首次开设汉语课,开西欧汉语教学之先声。[⑥] 接着是 1796 年 6 月 2 日法国巴黎东方语言学校的创办,汉学家蓝歌籁(Langle's)教授任校长。虽未开设汉语,只是满语,但该校日后是法国乃至世界汉语教学重镇。更加引起研究者重视的是,为了更好学习汉语,传教士不仅把《四书 》等作为教材,还动手自编教材、辞书。比如金尼阁的《西儒耳目资》(*Vocabulaire disposé par tons suivant l'ordre des mots européens*,1926),马若瑟的《中国语言

---

① [法]雅克·布鲁斯,李东日译:《从西方发现中国到国际汉学的缘起》,《国际汉学》,《国际汉学》编委会编,商务印书馆,1995 年,第 457 页。

② Paul Demiéville, *Aperçu historique des études sinologiques en France*, Acta asiatica,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Eastern culture*, the Tōhō Gakkai, Tokyo, 1996, №11. I.

③ [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 5 卷,第一分册,科学出版社,1976 年。

④ 西方《易经》热可分为 18 世纪末、19 世纪下半叶和 20 世纪下半叶三个时期。参阅王淼洋的《当代西方"易经"热:特点、原因及展望》,《中国文化与世界》第二辑,耿尤明、何寅主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⑤ 杨宏声:《本土与域外——超越的周易文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 年,第 184 页。

⑥ 阎纯德主编:《汉学研究》第一集,中华书局,1996 年,第 9 页。

志略》和黄嘉略的《汉语语法》等,虽然许多作品当时没有出版,但在法国汉语教学和研究方面却发挥了巨大作用,开创了新世纪。

在文学的翻译和研究方面,如果说以往的欧洲传教士并不重视中国纯文学译介的话,那么18世纪法国传教士则开始注意这方面的内容。《诗经》个别诗歌的翻译,昂特尔科尔神父(Pére d'Entrecolles)翻译《今古奇观》中的几个故事,马若瑟节译元曲《赵氏孤儿》等,在欧洲影响都不能低估。伏尔泰的小说《查第格》采用了《今古奇观》中《庄子休鼓盆成大道》作为第二章依据,还根据《赵氏孤儿》译本撰写了《中国孤儿》,运用中国先哲古训,影射法国当时社会人心险恶,提倡理性等,在当时的欧洲影响极大。

18世纪欧洲汉学最大的成就是被汉学家们所共识的欧洲汉学"三大名著":《通信集》、《中华帝国全志》(1735)和《中国丛刊》(1776—1814),三部作品都具有百科全书性质。《通信集》是欧洲旅居中国和东印度教士的书信和报告集,共34卷,其中16至26卷,为读者提供中国教区生活情况,虽内容过杂,但因大多是写信者"亲身""所见所闻"或"经历",有"现场报道"性质,[①]且文笔"细腻",介绍"新鲜物""成千上万种",[②]故很受欢迎。《中华帝国全志》,全面地介绍了中国各省地理、政治、经济、宗教、道德、医药、博物和满、蒙古、藏等少数民族,资料之丰富被称之为明末至当时"欧西中国研究百五十年成绩之大成",西洋汉学之"金字塔"、"纪念碑",[③]为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孟德斯鸠等了解中国的主要资料。《中国丛刊》则以各家各派对中国论述为主,它的出现,标志着"几世纪前顺利地由利玛窦开创的一种事业的完成",耶稣会士中国学已达到一个"顶峰"。[④]

二

19世纪是法国汉学学科确立时期。

18世纪的法国传教士虽然为汉学学科的确立打下基础,但是,使"汉

① [法]杜赫德编,郑德弟、吕一民、沈坚译:《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大象出版社,2001年,第013页。

② [法]雅克·布鲁斯,李东日译:《从西方发现中国到国际汉学的缘起》,《国际汉学》1,第457页。

③ 莫东寅:《汉学发达史》,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年,第88页。

④ 忻剑飞:《世界的中国观》,第128页。

学”(Sinologie)成为举世公认学科的,是19世纪法国汉学的功绩,其标志是1814年12月11日法兰西学院(Collège de France)的教授们做出决定,在欧洲各大学中首创“汉学讲座”,并于翌年1月16日正式开课。首任教授是年仅27岁的汉学家雷慕沙(Abel Rémusat)。

法兰西学院首创“汉学讲座”意义深远。它结束了传教士汉学,“开创近代中国研究”的新世纪。① 继它之后,在法国,1844巴黎东方语言学校(L'Eco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Vivantes)开设汉语课;1888年,远东法兰西学院(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 - Orient)开始创立;1900年,里昂大学开设汉语课程。与此同时,欧洲其他国家大学也相继开设汉学课程:俄国于1851年,英国于1876年。从而国外汉学得到了蓬勃发展。

19世纪是西方科学技术发展的时期,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人们提供了新的思维方式。自然科学中观察、实验的方法,重视实地考察等,同样被运用到了社会科学的领域,语言学、历史学、民族学、“汉学”研究等都不同程度地使用了自然科学的方法。由于有了现代科技的头脑,19世纪法国的汉学家有可能打破18世纪传教士的初级研究,逐渐走向成熟的理论分析和严格的学术考察。19世纪上半期,由于种种原因,法国与东方来往一度减弱,迫使汉学家只能把更多的精力花在翻译和研究传教士们带回来的中国文献上,19世纪后期,当西方“异国热”再度兴起,中西通道再次打通时,汉学家们就有机会亲自踏上中国土地进行考察,而这时,他们所取得的成果也就更有价值了。

诚然,不能忽视,西方的汉学是在其殖民政策和商品出口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兴起和走向繁荣的。因此,汉学,尤其是汉语教学,不可能不带有政治因素和商业气味。但是,作为一门学科,汉学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它既是西方整个科学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西方对汉学(从更大范围来说是东方学)研究逐渐走向成熟和学科化的必然之路,所以商业和外交上的实用性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汉学家们的“学院式”根基,尤其在法国,比之当时其他国家来更为明显。显然,这一特点有利于造就一批职业化的中国学家和建立一支专业化的队伍。

马若瑟选译《赵氏孤儿》是希望让欧洲人通过一部真正的中国悲剧,观察到中国文明和道德观念,即通过文学“窗口”观察中国文明。事实上,

① 莫东寅:《汉学发达史》,第88页。

19 世纪法国汉学家也有这样的思路。但是,要是把 19 世纪法国汉学家们的这一思路仅仅看成是前人思维延续的话,就有失偏颇了。实际上,19 世纪的欧洲,尤其是法国,是现实主义文学全面胜利的时期(现实主义的胜利,本身也是在自然科学的影响下形成的),文学上的这一观察事物的方法,同样也影响到汉学的研究。毕欧(E · Biot)认为,中国的《诗经》是"东亚传给我们的最出色的风俗画之一",同时也是一部"真实性最无可争辩的文献";德理文(De Saint - Denys)通过对《诗经》的研究,了解到了中国上古的文明,当时的房屋建筑、农作物、生产工具,及家庭生活的一切细节;雷慕沙则明确表明,他之所以把《玉娇梨》介绍给法国读者,是因为这是一部"真正的风俗小说",可帮助了解中国文化。① 所有这些都表明了这一事实。

汉学,其本身就是建立在"比较研究"上的一种异质文化的考察。19 世纪法国汉学家们又似乎有意无意地运用了这一研究方法,并取得明显的成果。雷慕沙的《法显撰佛国记》(佛国记),德韦理亚(Gabriel Devéria)的《中国与安南——越南关系史》和费赖之(A · Pfister)神父的《在华耶稣会士传略及书目提要》等,都倾向于考察中国与其他亚洲国家及世界的关系。德理文在研究中国诗歌的时候,将中西韵律、将《诗经》中战争内容跟希腊史诗放在一起考察;德韦理亚在对中国周边地区的西夏文、女真文、彝文和和蒙古碑铭八思巴文进行研究等,都是比较思路的突出体现。

随着汉学的确立,中国文化在欧洲引起更多人的注意,具有无限魅力和神秘感的古老中国,不断地启发了 19 世纪法国作家们的创作灵感,尤其是 19 世纪后期,"寻求中国形象"是法国艺术家们"异国热"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戈迪埃、马拉美等对中国形象的追寻,更影响了 20 世纪许多的法国作家。

此外,教学和研究的结合,学会的建立,刊物的创办和大量资料的收集,也是前时期所未有的。不难发现,这时期汉学家的著作,大都是在教案的基础上整理而成的,这也是这一时期汉学研究带有更多"学院味"的原因。"亚细亚学会"(Société Asiatique,1822)建立,《亚细亚学报》(*Journal Asiatique*,1822)、《通报》(*T' oung Pao*,1890)和《远东法兰西学院学报》(*Bulletin de l'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 - Orient*,1901)的创办等,都为法国

① 钱林森:《中国文学在法国》,花城出版社,1990 年,第 129 页。

的汉学研究大大增辉。

"汉学"学科确立的标志之一是,相应机构的创建和职业汉学家队伍的形成。

19 世纪上半期有法兰西学院和巴黎东方语言学校,后期有里昂大学和法兰西远东学院的汉语教学和研究的确立,尤其是法兰西学院和巴黎东方语言学校汉语教学的确立和教学队伍的形成,在 19 世纪法国汉学的形成和发展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19 世纪后期,除法国本土外,在华的有河北河间府(今河北献县)和上海徐家汇图书馆等的汉语教学和研究。所有这些都使法国的汉学教学和研究机构逐渐趋向完备。①

法兰西学院(Collège de France)是法国一个既古老又富于青春活力的学院,创设于文艺复兴时期。在这里从事教学和研究的,是一些真正的"学院派"教授,既有严谨学风,又有开拓精神。所开课程,实际上都是专题讲座。初建时主要进行希伯来文和希腊文教学,随着时代发展,开设学科有很大变化。1814 年 12 月 11 日,由首任教授雷慕沙开设汉学讲座。自此,法国和整个欧洲汉学界有了自己的教学和培养汉学家基地。法兰西学院就成了 19 世纪法国,也是全世界最早建立汉学研究和教学的机构,并始终在这一领域扮演着重要角色。

法兰西学院首任汉语教授是雷慕沙(Abel Rémusat,1788—1832)。自从受聘为"汉学讲座",即"汉·鞑靼·满语言文学"(Chaire de Langues et Littératures chinoises et tartares - manchous)教授,做题为《欧罗巴汉语研究的起源、进步和效用》演讲以后,他便成了"首先使汉学成为专门学科"的学者。雷慕沙是个博学多才的汉学家,研究内容涉及语言、文学、哲学等诸多方面。他的《汉语语法基础》(*Eléments de la grammaire chinoise*,也译作《汉文启蒙》,1822),是"第一部真正适用的中文语法书"和"第一部在西方大学使用的汉语教材"②。他的《佛国记》第一次向西方人提供了对中国佛教较公正的看法,此外还译有小说《玉娇梨》(1826),出版有《中国短篇小说》(三卷),1822 年与德国汉学家克拉普洛特(Klaproth)在巴黎共同发起建立"亚细亚学会"并刊行会报。继雷慕沙教席的是他的得意门生儒莲(Stanislas Julien,1797—1831),另一个博学多才、成绩卓著的汉学家。他

① Paul Demiéville, *Aperçu historique des études sinologiques en France*. III.

② 张国光等:《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第 342 页。

的《新编汉语句法结构》(汉文指南:*Syntaxe nouvelle de la langue chinoise fondée sur la position des mots*,1869—1870),突出了汉字的分析,强调了汉语语法中词的位置变化所引起词义和语法功能的变化。他译有《赵氏孤儿》(1834)、元杂剧《灰阑记》(1832)和《西厢记》(1872—1880),首次将中国"才子佳人"话本小说《白蛇精记》(1834)、《平山冷燕》(1860)等译介给法国和欧洲读者。他翻译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1853)和《大唐西域记》(1857—1858),跟雷慕沙的《佛国记》一样,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法国汉文佛典的翻译和研究上"标志着他在前人的基础上取得了巨大的进展"①。此外,他还把中国工艺介绍到欧洲,使19世纪法国汉学别开生面。他是法兰西学院教授,同时又是东方语言学院教授和国家图书馆副馆长,由于他的努力,法国汉学在欧洲的领先地位"日益明显"。接任儒莲的是他的学生德理文(De Saint - Denys),他的主要贡献是翻译和研究《离骚》和《唐诗》,此外,他还翻译一部名为《中国异族人的人种学研究》(1867—1883)的巨著。德理文之后是沙畹(Edouard Chavannes)、马伯乐(Henri Maspero)、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等,那已是20世纪的事了。

东方语言学校(L'Eco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Vivantes)②前身是"青年外国语学校"(即:翻译生学校)。1839年,在法国公共教学大臣、商人和意欲将"法律的火把和欧洲的文明""引向天朝"的传教士的多次敦促下,东方语言学校通过决议,责成巴赞(A. Bazin)必须于1843年开设现代汉语课。③ 该校一开始就以教授现代汉语为主,古文只作为补充。法兰西学院授课方式是学术报告,自由听课,没有考试制度,而东方语言学校,则已进入正规教学。该校是培养汉学家的摇篮,欧洲和法国许多著名的汉学家,都曾踏进过这所学校的大门,接受过初级的汉语训练。进入20世纪,在50年代以前,虽然由于受两次大战的影响,教学情况时断时续,但仍然是法国汉语教学重镇,保持着优势。

首先在该校担任汉学教授的是安托讷·巴赞(Antoine Bazin,1799—1863),他翻译有中国戏剧作品和明清小说《合汗衫》、《货郎旦》、《窦娥

① Paul Demiéville,*Aperçu historique des études sinologiques en France*. II.

② Henri Cordier,Les études chinoises (1895—1898), *Librairie et imprimerie Ci - devant* E. J. Brrill. Leide. P. 44.

③ 胡书经:《法国汉语教学和研究的历史》,载《语言和教学研究》(季刊),1983年2月。

冤》、《琵琶记》等，编译过元人文集目录(1850)。在汉语教学方面，他的教材《官话语法》(*Grammaire mandarin*，1856)，因对白话与文言中表示"关系"、"条件"、重读等语法现象进行了"隽智的分析"，[①]在汉学界引起极大反响，[②]并被后人称为"欧洲第一个"把文言和白话区分开来的汉学家。[③]继巴赞之后在该校任汉学教授的是儒莲，他在这里又任职了六年。儒莲之后，基本上是一批从中国归来的外交部翻译人员，他们是：哥士耆(Alexandre Kleczhowski)、冉默德(Maurice Louis Marie Jametel)、德韦理亚(Gabriel Devéria)、微席叶(Arnold Vissière)等。[④]

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法国在华从事外交工作的戴伯理(Dabry de Thiersant)和于雅尔(Camille Imbault - Huart)，传教士顾赛芬(Séraphin Couvreur)、戴遂良(Léon Wieger)、夏鸣雷(Henri Havrit)和费赖之(A · Pfister)等，因对中国文化有极深了解，在从事外事工作或传教的同时，在汉学研究上也极有建树，因此也成了法国汉学队伍的重要成员，尤以顾赛芬和戴遂良最为卓著。顾赛芬尤爱好中国古典文学，翻译了包括《四书》(1895)、《诗经》(1896)、《书经》(1897)、《礼记》(1899)、《春秋左传》(1914)、《仪礼》(1916)等中国古籍；在词书方面，编有《古汉语词典》(1890)、《法汉词典》(1884)、《汉法字典》(1890)等。戴遂良如同顾赛芬，也是19世纪至20世纪初法国汉学家中最卓著者之一，对中国历史、哲学、风俗有浓厚兴趣，著有三卷本的《历史文献》(1903—1905)和十卷本的《现代中国》(1921—1932)，还编有《近代中国风俗志》(1908)、《中国宗教信仰和哲学思想史》(1917)，《汉字》(1924)，翻译有《庄子》、《淮南子》等，达30多卷。

19世纪上半期的毕欧(E · Biot，1803—1850)是个特殊的汉学家，他既没有在法兰西学院，也没有在东方语言学校任教，但被评论认为是19世纪前期法国最有成就和影响最大的三位汉学家之一(雷慕沙、儒莲和毕欧)。他有大量论文涉及中国科学、天文、地理、气候、教育、工艺等。他的《关于

---

① Paul Demiéville，*Aperçu historique des études sinologiques en France*. II.

② *Un siècle d'enseignement du chinois à l'Éco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1840—1945，sous la direction de Marie - Claire Bergère et Angel Pino，Asiathèque，1999，P. 39.

③ Paul Demiéville，*Aperçu historique des études sinologiques en France*. II.

④ *Un siècle d'enseignement du chinois à l'Éco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1840—1945，sous la direction de Marie - Claire Bergère et Angel Pino，P. 39.

远古时代中国领土所有权的条件》(1838),被认为涉及到了"还没有人问津"的中国古代领土和经济问题,译作《周礼》(1851)为欧洲人了解中国"古代宗教和社会"提供了"有价值的证据"(1851),[①]此外,还写有《中国公共教育和儒学史》(1847),也颇受后世重视。

三

20 世纪的法国汉学,是一个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汉学。

20 世纪,随着世界政治、经济、军事风云变幻和现代西方自然科学、哲学、心理学等观念的更新,以及中国本土翻天覆地的变化,法国的汉学研究也显得纷纭多变。

20 世纪法国汉学以二战为分界。二战前,在 19 世纪"东方热"基础上,继承"经院汉学"功底,又有实地考察所得第一手丰富资料,是法国汉学的"昌盛和繁荣"时期;二战后,法国汉学曲折多变,但同时又人才辈出,硕果累累,呈多元发展状态。

二战前的法国汉学

关于这一时期的"昌盛和繁荣",有评论将其归纳为如下三个方面。[②]

其一,继 19 世纪之后,法国又创立了一些新的机构,从而使法国汉学教学和研究机构趋向完备。[③] 如巴黎研究实验(也译实践)学院(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Etudes,1868)、巴黎高等汉学研究所(Institut des Hautes Etudes chinoises,1919)、国立科学研究中心(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ientifique,1939),巴黎大学北京汉学研究所(Le Centre d'études sinologiques d'Université de Paris à Pékin)等。正如戴密微所说:"自本世纪初叶以来,新出现的汉学机构有力地促进了法国汉学的发展。"[④]

其二,本时期初出现了一些"有影响的汉学大师",也就是戴密微所说的"使本学科大放光彩的明星人物"[⑤],他们不仅为法国汉学繁荣做出贡献,且对国际汉学发展起着重大影响。他们是:

---

① Paul Demiéville, *Aperçu historique des études sinologiques en France*. II.

② 参阅钱林森:《中国文学在法国》,第一章,第三节。

③ Paul Dewiéville, *Aperçu historique des études sinologie en France*, III.

④ Paul Demiéville, *Aperçu historique des études sinologiques en France*. III.

⑤ Paul Demiéville, *Aperçu historique des études sinologiques en France*. III.

1. 被称为欧洲汉学泰斗的沙畹(Edouard Chavanne,1865—1918)。一位历史学家,在中国哲学、文学、艺术方面都有卓越的贡献,同时又是国外中国学方法论改革者代表人物之一。他的中国史研究,深受19世纪末欧洲历史主义和科学主义影响,翻译出版的五卷本《史记》(1895—1905)就是这一思想的结晶,虽仅译了47篇(至《孔子世家》止),但译文精确,考据精细,注释详尽而有创见,是公认的难得的"盖世名作"①。此外,他的《两汉时代的石画像》(1905)、《西突厥史料》(1903)、《华北考古图谱》(1915)、《3—8世纪的中国神话》(1921)等,也都是汉学发展史上难得的佳作。他曾两次访华,足迹遍布满洲里、河北、山东、河南、陕西、山西等地,尤其是龙门、云岗石窟考察,获得大量第一手资料。他不仅著作甚丰,还培养了一批有影响汉学家:爱德华·于贝尔、谢阁兰、伯希和、马伯乐、葛兰言等。

2. 以研究中国史地和语言见长的亨利·考狄(Henri Cordier,1849—1925)。他对汉学的一大贡献是第一个辑录《中国书目》(或称《中国学图书志》*Bibliothèica sinica*,五卷,1904—1908,1922—1924补遗)。《书目》"分类得体,子目详细","久为世人所喜用",跟他的《日本学书目》和《安南学书目》,共成为"治东方学必备之书"②,为西方学者编写国外汉学书目所仿效。③ 也因他率先进行该项工作,成就突出,故有目录学和珍本收藏的"大明星"之称。④ 此外,他还写有《法国在远东两个租借地的起源:上海、宁波》(1896)、四卷本《中国通史》(1920—1921)等。1890年他与荷兰汉学施莱格尔(Schlegel)共同创办《通报》,久任编辑。

3. 文献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法国"敦煌学"创始人。伯希和对文献本身的兴趣胜过对历史的兴趣。他的汉籍目录校勘,他的《元朝秘史》(未完成稿)、《马可·波罗游记》注释、《郑和下西洋》(1933)、《中国摩尼教考》(1931,与沙畹合著)等,资料之丰富,令国内学者叹服。最突出的成就是敦煌文献研究。尽管他到达敦煌比英国斯坦因(Aurel Stein)晚了一年,带走的资料数量上也不如前者,但在质量上却胜一筹,其

① 莫东寅:《汉学发达史》,第96页。

② 莫东寅:《汉学发达史》,第100页。

③ Paul Demiéville, *Aperçu historique des études sinologiques en France*. III.

④ Paul Demiéville, *Aperçu historique des études sinologiques en France*. III.

珍本秘笈的价值,得到罗振玉等人的认可。尤其是1905年至1908年考察所搜资料,更使他成为汉学发展史上令人注意的人物。伯希和不像斯坦因,把考古资料整理出详尽报告,但他的简要报告《甘肃发现的中世纪书库》、《高地亚洲三年》、《伯希和考察队中国突厥斯坦考察报告》和后人整理的大量资料等,对"敦煌学"发展影响深远。①

4.意大利人著名古埃及学专家马伯乐之子亨利·马伯乐(Henri Maspero,1883—1945),子承父业,爱好历史,并以"一种清晰而精确"的研究,②严谨和批判的精神,清除了诸多有关古代中国的旧观念,为后来研究者奠定基础。如同伯希和,他也是通过印度支那了解中国。论文喜用比较方法,展现越南北部傣族居民以及古代中国宗教和社会,他的《唐代安南都护府、历史地理短评》(1910)、《安南语言历史语音研究》(1912)、《唐代长安方言考》(1920),《古代中国》(1927)等,都显示出崭新的研究思路。他的音位学研究,为瑞典语言学家高本汉开创了一条道路。此外,他身后留下有关"经济史、天文学和道教"的手稿、笔记,为汉学研究者所重视。

5.受社会学家涂尔干(Emile Durkheim)影响,在汉学研究中引进了一种"当时很新颖"的"社会学研究"③而独树一帜的葛兰言(Marcel Granet,1844—1940),也是属于"明星"类的汉学家。他在《古代中国婚姻习俗》(1912)、《中国古代诗歌和节令》(1919)、《中国封建社会的滕制》(1920)、《婚姻的类别和血缘关系》(1939)等作品中,揭示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家庭中的人际关系和婚姻体制。同时,依照社会学思想并通过语言结构分析,他提出了在语言学和考古学所证实之前,中国已存在"单语家族"和"三皇五帝"的假设,并指出中国古代的信仰跟山、川、树、木、雨、水有着密切的关联。他还研究中国原始宗教场所的建立、宗教组织跟霸主产生及演变情况,指出,领主所拥有的权力,实际上跟"寺院的权力是同等"的,属于领主的城市实际上继承宗教寺院的权力,领主享有"双重"的神圣的权力。此外,他还写过《道教考》(1925)、对《淮南子》、《山海经》等也进行过研究。他的这些观点和方法,在汉学、人类学、神话学都产生影响。

---

① 荣新江:《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第二章,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

② [法]程艾蓝:《法国的古代中国研究》,《国际汉学》1,《国际汉学》编委会编,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368页。

③ Maurice Freedman: *Marcel Granet*, *La Féodalité chinoise de Marcel Granet*, Editions IMAGO, 1981.

诚然，这时期除了上述汉学家之外，还出现了如格鲁赛（René Grousset）、爱斯嘉拉（Jean Escara）、白乐日（E · Balazs ）、席尔宛 · 烈维（Sylvain Lévi）、普散（Louis de la Vallée poussin）等在某些方面做出贡献的汉学家，还有以中国题材进行创作的，如谢阁兰（Victor Segalen）、克洛岱尔（Paul Claudel）、洛蒂（Pierre Loti）等作家汉学家。正是这些各具特色的汉学家，使得这时期法国汉学队伍的阵容更加壮大和势力雄厚。

其三，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宽和著作多样化。由于本时期的汉学家大都具有多方面的学识，又大都到过或客居中国多年，他们既有经院汉学的功底和严谨的科学作风，又有对中国实地考察的体验和对中国文化的感性认识，因此也就有可能拓宽和拓深所探求的领域。他们不仅在中国历史、考古、天文、宗教、思想、经济等领域都有较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同时还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和运用新的思维方式来研究汉学，如伯希和对“敦煌学”的开拓，考狄率先编写出版多卷本《中国书目》①，葛兰言将社会学研究引进汉学研究等，在文学创作上，一些作家汉学家的“追求东方美学”等，都为这时期的汉学繁荣增添了色彩。

二战后的法国汉学

二战使法国汉学遭受摧残，战后，虽有戴密微领导，将法国汉学带出低谷，但他去世后，法国一度又面临新的危机和挑战：随着美、日、苏中国研究的崛起和观念日益更新，以中国古典文化底蕴著称的法国汉学，一时难以适应。然而，法国汉学家没有退却，而是显示出了他们的“敏感、活跃和进取性”，加上一向谨严的治学态度，成绩仍然斐然。毋庸置疑，战后法国汉学成绩的取得，还跟该时期政治背景密切关联。1964 年，戴高乐将军冲破西方封锁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也给法国汉学带来了生机。一批年轻学者来华学习，学成归国大都成为汉学领域的骨干。这一可喜景象虽因中国“文革”而遭挫折，但当 70 年代末中国实施“开放政策”时又春暖花开，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开放政策深入和经济腾飞，西方再度出现了“汉语热”、“中国热”时，法国汉学也又呈现新的局面。

战后法国汉学的“活跃性”和“进取性”有两个明显的标志。

其一，重视现当代中国的研究。60 年代以来，当一批由传统汉学培养起来的汉学家们经过反思取得可喜成绩时，一些年轻的学者则把主要的精

① Paul Demiéville, *Aperçu historique des études sinologiques en France*. III.

力投向现当代的中国研究:中国史学家谢诺(Jean Chesneaux)一马当先研究中国现代革命和社会问题,汉语言学家李嘉乐(A. Rygaloff)积极倡导现代汉语研究,原本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于儒伯(Robert Ruhlmann)也转向中国现代文学,比较文学教授艾琼伯(René Étiemble)竭力提倡加强对各国现当代文学的比较研究。显然,他们的主张符合国际汉学大潮,也迎合年轻学子的要求。于是,20世纪法国汉学界一种新的学术风气就这样形成:法国汉学开始从传统走向现代。与此同时是相应研究机构的应运而生,其中最早、规模最大的是1959年"当代中国研究文献中心"(Centre de Recherche et de Documentation sur la Chine Contemporaine)的建立,标志着法国汉学进入新的阶段。接着是1960年"东亚语言研究所"(Centre de Recherches Lingistiques sur l'Asie Orientale)和1975年"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中国研究中心"(Centre d'Etudes chinoises)的建立。此外,还有巴黎第八大学的"汉学综合研究所"、尼斯大学的"中国研究中心"等。

其二是专题研究组的出现。从70年代开始,学者们打破长期独立研究或者师生相传的传统,注意到发挥集体的智慧和力量,组织起一些"专题研究组"。如苏远鸣(Michel Soymié)领导的"敦煌手稿研究组",施舟人(Kristofer Marinus Schipper)领导的"道教研究组",侯思孟(Donald Holzman)任组长的"中国历史和文学研究组",里昂"东亚城市和都市社会"国立研究中心的第1579联合研究组(URA1579,主持人安可强 Christian Henriot)等。① 此外,有学者发起整理和研究越南、日本、朝鲜的汉文,对印尼华人的研究等,也十分的活跃。而此时,曾为法国汉学作出过贡献的法国耶稣会传教士的"利奇研究所"仍在不断耕耘,发挥作用。

法国战后汉学队伍不断扩大,既有老一辈汉学家培养起来的传统研究者,也有随着新课题而形成的年轻学者。但与战前相比一个明显的特点是:战后的法国汉学,因朝着"日益强化的专业化"方向前进,故这时期除戴密微和谢和耐外,"几乎"难以找到像沙畹、马伯乐那样"全才或几乎全才"的汉学家。这也就是为什么研究者在论述战后法国汉学家时,更多的

① Alain Roux, *La Recherche en France depuis* 1950 *sur l'Histoire de la Chine au XXe Siècle*;译文见[法]鲁林:《法国对20世纪中国史的研究》,《法国当代中国学》,戴仁著,耿昇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是围绕着“研究领域”而不是从“人物出发”的原因。[①] 战后法国汉学家，在历史和社会问题方面，除谢和耐外，有巴斯蒂（Marianne Bastid-Bruguière）、白吉尔（Marie-Claire Bergère）、比昂高（Lucien Bianco）、卡达尔（Claude Cadart，也译高达乐）、卡蒂埃（Michel Cartier）、魏丕信（Wille，Pierre－Etienne，维尔）、鲁林（Alain Roux）；在哲学宗教和历史考古方面有：康德谟（Maxime Kaltenmark）、苏远鸣、石泰安（Rolf，Alfred Stein）、汪德迈（Léon Vandermeersch）、施舟人、毕雪梅（Michele Pirazzolti－t'Serstevens）、程安娜（Anne Cheng）、朱利安（François Jullien）、马克（Marc Kalinowski）等；在文学方面有：吴德明（Yves Hervouet）、侯思孟、雷威安（André Lévy，莱维）、谭霞客（Jacques Dars）、李治华（LI，Tche－houa）、程纪贤（Cheng Chi－hsien），桀溺（Jean－Pierre Diény）、巴狄（Paul Bady）、卢瓦（Michelle Loi）等；在汉语研究方面有：李嘉乐（A. Rygaloff）、贝罗贝（A．Peyraube）、艾乐桐（Alleton Vivianne）等。尤以戴密微和谢和耐最为著名，再就是汪德迈、吴德明和侯思孟。

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1894—1979），战后法国汉学的领路人。他知识渊博，涉及的汉学已不是某几个领域，而是“整个中国”。[②] 在哲学方面，他的中国佛教研究最为卓著，并贯穿他的整个汉学研究。他担任过《法宝义林》主编，著有《吐蕃僧诤记》（1952），《六祖坛经》（1944—1947），翻译过《临济语录》（1972）等。《吐蕃僧诤记》论述了8世纪末汉僧摩诃衍同印度僧人莲华戒在吐蕃王宫中的一次宗教大辩论，是一部评议该时期印、中佛教徒对寂静主义争论的不可多得的论述，也是敦煌学、佛教学和藏学的重要作品。[③] 他对庄子《逍遥游》、《齐物论》、《秋水》等的分析，对荷兰戴闻达（Jau Julius Lodewijik Duyvendark）的《老子道德经》译注和康德谟《列仙传》的评论，都表明他的道教研究也有很高造诣。他的中国文学研究成绩主要表现在敦煌俗文学研究和中国古典诗歌译介上。他的《敦煌曲》（1971）翻译，《王梵志文集》翻译和考据，对敦煌文稿中通俗文学、佛教弟子诗歌的“真伪”研究，是继胡适“初步探讨”之后的一次“全面”、“系统”“论述”和“研究”，直接影响了远东、中国大陆、台湾学者的“王梵志诗“和

---

① ［法］苏远鸣：《法国汉学50年》，《法国当代中国学》，戴仁著，耿昇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② ［日］福井康顺、山崎宏、木村英一、酒井忠夫监修：《道教》，第三卷，第240页。

③ ［法］戴密微，耿昇译：《吐蕃僧诤记》，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

《太公家教》的研究。他主持出版的《中国古典诗选》(1962),内容丰富,收录了上至《诗经》下至清诗共374首诗词,涉及204位诗人,尤以李、杜、白居易等40多位唐朝诗人诗词的译介,直接促使法国《唐诗》翻译和研究的新高潮。《诗选》在法国中国古诗研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①

谢和耐(Jacques Gernet,1921—　),法国最后一位"泰斗式"汉学家,他承继前辈考据学功底,又突破传统,对中国进行系统的研究,使法国汉学向现代前进了一步。他著有《中国5—10世纪的寺院经济》(1956)、《蒙古入侵前中国的日常生活》(1959)、《中国社会史》(*le monde chinois*,1972)、《中国与基督教》(*Chine et christianisme*,*Action et réacton*,1982)等。《中国社会史》全面描述了中国历史发展过程,并注意从相互影响角度进行论述,客观公正。作者指出,在数千年来不停发展过程中,中国与远近不同国家和地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上不断受到外界影响,也"不停地"对其他地区"施加最广泛"的影响"。②《中国和基督教》一书,并不注意研究"基督教在中国的历史",而是重点研究"中国人对基督教的反应"。③作者认为,基督教没能在中国稳固扎下根来,其原因并不如人们常说的是因为中国人排外,而是源于西方的基督教要求中国人完全改变思想方法和宇宙观。

总地说来,战后的法国汉学,无论在研究视野、规模和思维方法上,都有明显而重大的变革,二战后法国对中国文化译介的走向所呈显的情况基本如下:

1)历史学:关注近现代中国史。以往的法国中国史研究,所关注的主要是元之前的中国,清末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段历史,几乎是"真空地带";在教学上,甚至最大学府,也认为不设20世纪中国课程"绝非不正常"。研究者很大程度上停留在考狄的《中国通史及其与外国的关系》(1920),或是皮埃尔·勒努宛(Pierre Renouvin)的《远东问题》(1964)的水准上。法国对中国近现代重视始于20世纪50年代,纪亚玛(Jacques Guillermaz)和谢诺(Jean Chesneaux)是开路先锋。他们两位是研究院院士,前者是军人,后者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从70年代后期开始,部分学

① 钱林森:《中国文学在法国》,第33页。

② [法]谢和耐,耿昇译:《中国社会会史》,中译文 序,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页。

③ [法]程艾兰:《法国的古代中国研究》,《国际汉学》1,第373页。

者对中国现实情况发生了浓厚兴趣，开始开设中国“现实”课题或研究项目，如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开设的“当代中国经济和社会历史”课，东方语言文化学院的《中国现代史：1949—1981》课，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进行的“毛泽东去世后中国的经济形势变化与体制改革”等科研项目。与此同时，相关的文章和著作也相继问世。80 年代，一些重要的科研和教学机构的研究课题或课程，已主要是近现代的内容。

2）哲学：1975 年后“羽毛丰满”。战后法国中国哲学研究，随着 1975 年法兰西学院“中国社会文化史”讲座的设立，“算是羽毛完全丰满”。[①] 谢和耐在该讲座工作至 1892 年，影响了整整一代汉学家。要指出的是，战后法国中国哲学研究跟中国本土 60—70 年代意识形态深刻复杂变化紧密关连，尤其是儒学研究的命运。“文革”期间，中国儒学遭受批判，法国的研究也一度衰落，道家得到重视，直到 80 年代，中国国内儒学恢复名誉时，法国的儒学研究才再度得到青睐。令人感兴趣的是，从 80 年代起，中国哲学不再只是学者的“领地”，而是有着广泛的大众基础，尤其是儒学，授课、报告会、讲演、广播和电视等，异常活跃。战后儒学研究有汪德迈和年轻汉学家程安娜、朱利安、马克等等。汪德迈从法家转向中国古代儒教，在《王道》（两卷，1977 和 1980）中得到集中体现。他提出，所谓“王道”，实际上就是儒家学说中的一种政治人道主义，已成了整个中国文化的基础，构成了一种可普遍使用的模式，且随岁月流逝，移植至亚洲其他文明之中。作品以大量金石文献为基础，大幅度修订了葛兰言《中国人的思想》中所指出的问题。他在《新的汉文化圈》（1986）中，就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汉化”问题作进一步阐述，指出“汉化”实质上大部分就是“儒教化”的过程，并认为中国儒教思想是东亚当代发展的动力。20 世纪法国佛教研究可追溯到沙畹、伯希和与马伯乐，他们一反雷慕沙、儒莲等旨在“旁证印度佛教史实”[②]的思路，而重“汉传佛教”，这一研究在 40 年代至 70 年代的欧洲达到了“黄金时代”，[③]其情形可从三种期刊和“两位佛学大师及其弟子”的著

---

① Léon Vandermeersch et Anne Cheet, *Les études chinoises en France —Histoire de la philosophie, confucianisme*；中译文见［法］汪德迈 程艾兰：《法国对中国哲学史和儒教的研究》，《世界汉学》创刊号，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1998 年，第 095 页。

② ［法］郭丽英：《法国对汉传佛教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世界汉学》创刊号，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1998 年，第 115 页。

③ ［法］郭丽英：《法国对汉传佛教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世界汉学》创刊号，第 116 页。

作中看出。三个刊物是《佛学书目》、《汉学和佛学丛刊》和《法宝义林》,“两位佛学大师及其弟子”的著作,是指戴密微和拉摩特(Etienne Lamotte)[①]等人的著作。戴密微不仅培养了一批研究佛经的弟子,同时在他的推动下,于1974年正式成立巴黎国立图书馆馆藏伯希和敦煌汉文写本编目研究小组(敦煌文献与资料研究组),对敦煌写本中佛教传统经籍、民俗、大众化信仰,开展大量研究。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欧美对于佛教的研究趋向于某一特定宗派研究,法国也是如此,如佛博纳(Bermard Faure)和戴思博(Catherine Despeux)的佛教禅宗研究,罗禅能(Jean - Noël Robert)的日本天台宗研究,吉荷德(Fédéric Girard)的华严宗研究等。[②] 战后法国的法家研究有汪德迈的《论法家思想内部的形成,对古代中国一种典型政治哲学形成的研究》(1965),乐唯的《盐铁论》(1978)和《商君论》(1981)等。此外,晚些时候,法国出现了集体翻译《淮南子》的热情。

3)文学:出现三大“热点”。50年代至七八十年代,法国汉学界形成了空前的中国文学“热”。热点有三:①中国古典诗歌热。六七十年代,由戴密微发起,法国众多知名汉学家共同研究、编译、出版的《中国古典诗歌选》(1962)和唐代民间诗人王梵志研究,把法国的中国古典诗歌译介推上了新的阶段。与此同时,吴德明的《宫廷诗人司马相如》,桀溺的《古诗十九首》、《牧女与蚕娘》,侯思孟的《嵇康的生平和思想》、《诗与政治:阮籍》,程纪贤的《唐代诗人张若虚的诗歌结构分析》、《中国诗语言》等的相继问世,把这一热点推向高潮。②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热。1957年《西游记》法译本问世,推开了这一高潮的门扉。接着是《水浒传》(1979)[③]、《红楼梦》(1981)[④]和《金瓶梅》(1985)[⑤]的全译本问世,其中以《红楼梦》译介反响最大。③中国现当代文学热。也形成于七八十年代,以翻译研究鲁迅作品为先导,接着迎来了茅盾、巴金、老舍、丁玲等作家。整个70年代,几乎每年都有鲁迅的译作问世,《这样的战士·鲁迅诗歌、杂文选》(1973)、《阿Q正传》重译本、《野草》全译本、《鲁迅杂文选》和《朝花夕拾》译本(1976)、《华盖集》(1978)、《故事新编》重版(1979)等,都在这个时期;评

---

① 比利时汉学家,译有《维摩经》。

② [法]郭丽英:《法国对汉传佛教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世界汉学》创刊号,119页。

③ 译者[法]雅克·达尔斯(Jacques Dars,汉名谭露客),加利玛出版社,1978年。

④ 译者[法]李治华(LI,Tche - houa),加利玛出版社,1981年。

⑤ 译者[法]雷威安(AndréLévy),加利玛出版社,1985年。

论方面，卢瓦的《论战与讽刺·前言》，被认为是“法国鲁迅研究史”上“第一次”“全面”评介，而朱利安的《作家鲁迅·1925年展望，形象的象征主义与暴露的象征主义》则提出了“新的见解”。[①] 除鲁迅外，巴金是最受法国读者青睐的“中国现代作家”，[②]玛丽·约瑟·拉丽特夫人翻译的《寒夜》(1978)和李治华翻译的《家》(1979)也在此时问世，而茅盾《子夜》(1972)的出版，老舍《骆驼祥子》的重译(1973)，《茶馆》在巴黎公演(1980)，丁玲短篇小说选《大姐》(1980)的面世，尤其是1980年“中国抗日战争文学国际谈论会”在巴黎召开，都是法国中国现当文学译介高潮的体现。

4)汉语教学和研究：走向多元化。战后法国的“汉语热”，既体现在汉学家们对汉语的研究，而更大量的则是体现在广大法国汉语学习者的热情上。汉语研究在法国获得重大发展始于60年代，七八十年代有更大进展。1976年左右，艾乐桐(Viviane Alleton)和贝罗贝(A. Peyraube)创办的《东亚语言研究丛刊》，标志着法国中国语言学草创结束，进入成熟期，出现“更好协调”并在国际上发行大量出版物的大好局面。[③] 战后法国研究以现代汉语为主，在语法、句法、语音、少数民族语言、聋哑人手势语等方面都取得很大成就。而在汉语教学方面，二战后法国汉语教学在西欧再度兴起的“汉语热”中始终是一支劲旅，教学机构不断增多，规模不断扩大。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巴黎第七大学、巴黎第八大学、里昂三大、波尔多三大、普罗旺斯大学等大学中文系或专业的建立，是战后法国汉语教学巨大成果的重要标志，而1959年始大学里中文专业，汉语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的正式设立，更标志着法国汉语教学迈上更高层次。更可喜的是，法国的汉语教学，不仅有大学、中学，甚至小学也开设汉语课程，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业余学校、民间协会、法中友协及电化教学单位等，说明法国汉语教学有着极广泛的社会基础。

---

① 钱林森：《中国文学在法国》，216页。

② 钱林森：《中国文学在法国》，218页。

③ Viviane Alleton：*La Linguistique chinoise en France*；中译文见，[法]艾乐桐：《法国对中国语言的研究》，《法国当代中国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341页。

第二章
法国汉学的草创
(13 至 18 世纪法国汉学)

第一节 法国对中国最早的认知

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和了解,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4 世纪的古希腊时期,其中经过古罗马、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也就是从我国的东周(前770—前 256)到明朝(1368—1644)这段约 2000 年的历史。如果从他们对中国的认知深浅程度来分,我们可以将这漫长的历史分为:脱离半神话状态(13 世纪以前)、开始全面了解真实的中国(13 和 14 世纪)和追随东方之光(15 和 16 世纪)这样三个时期。①

从现有资料看,法国人对中国的关注,最早见诸于文献的是罗帝国时期。之后,便是 13 世纪,也就是中西文化交流进入"开始全面了解真实中国"时期。促进这次中西文化交流高潮到来的是两个重大事件:一是成吉思汗西征,二是罗马教廷十字军东征。西征的结果把中国文化带到了西方,同时刺激了罗马教廷派遣传教士来华的急切心情和浓厚兴趣;十字军东征,从其性质来说是西欧封建主、大商人和罗马天主教会以维护基督教为名,对地中海东部地区发动的一次侵略性远征,但从文化交流角度来看,其结果是冲破了中世纪西方文化时间和空间上的禁锢,使中国文化有可能进一步延伸到地中海以西和以北的地区。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一度沉

① 16 世纪之后,即 17—18 世纪,西方的中国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时期。

默的西方人对中国的研究和评论又再度形成热潮”。[①] 而这一文化交流热潮的主要参与者和推动者是传教士和旅游家，如传教士柏朗嘉宾（Jean de Plan Carpin，1182—1252）、鲁布鲁克（Guillaume de Rubruck，1215—1270）、约翰·孟高维诺（J. de Monte Corvino，1247—1328），旅游家拉施特（Khodja Rashid - eddin，1247—1318）、伊宾·白图泰（Ibin - Battutah，1304—1377）、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3）、奥得里克（Odoric de Pordenone，1265—1331）、尼哥罗康悌（Nicolo Conti）等，都是当时东来的著名传教士和旅游家，其中鲁布鲁克便是当时著名的法王派遣的东来传教士。

这时期传教士东来的原意是到蒙古地区传教，争取蒙古统治者信奉基督教，使他们不再对基督教地区发动进攻。而在此前，传教士们已经得知，基督教派中的聂思脱利派（景教后裔）也确曾在东方包括中国在内兴旺过一时，说明他们这次传教活动是有基础的。而从东西文化角度来看，传教士们在实际传教活动中，除完成宗教使命外，确也在汉学研究方面做过不同程度的贡献。不可否认，传教士们在向西方人介绍和谈论中国问题时，主要还是宗教内容，即便涉及到其他方面，也往往离不开宗教主题，但是，即便如此，他们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所做的贡献仍为“历来”“汉学家们所重视”。[②]

法国传教士鲁布鲁克（Guillaume de Rubruck，1215—1270）是方济各会会士，实际上是法王路易九世直接派遣的使者。从中西文化交流角度看，评论家们都认为，其功绩可跟柏朗嘉宾相提并论。

法王路易九世为了解蒙古地区情况，拉拢与蒙古统治者的关系，并设法在当地开展传教活动，便命鲁布鲁克组织一个传教团，由他亲任团长来中国传教。传教团于1253年来到蒙古并受到大汗接见，但法王意欲在这里传教的目的并没有得到实现，传教团也不得不打道回程。团队回程途经的黎波里时，当地主教得知情况，便没有让鲁布鲁克回国，而是让他留下写下路途见闻。鲁布鲁克在的黎波里呆了一年，写成一份回忆录，也就是一份报告，并让主教派人将报告送呈法国国王，该报告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东

---

① 此前，既7—12世纪，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和介绍并没有停止，只是这时期阿拉伯势力强大，几乎控制了东西方交往，“欧西人几无直接传之者，有之，仅西班牙国土代拉城犹太牧师班哲明（Benjamin of Tuclela）一人而已。”见莫东寅：《汉子发达史》，第18页。

② 何寅、许光华：《国外汉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9－30页。

方行记》，又名《鲁布鲁克东行记》(1253—1255)，报告用拉丁文写成。

该书是欧洲人早期记述蒙古情况的著作之一，汉学发展史上的一部重要的作品。关于这部著作的贡献，有评论认为，由于作者本人就是"一个罕见的观察力敏锐的人，具有一位艺术家的气质和眼睛"，所以，他的游记能"成为整个游记文学中最生动、最动人的著作之一"，可与马可·波罗等一些著名旅游家的著作相提并论，而在某些方面甚至比之"更为直接和令人信服"。[①] 关于鲁布鲁克的贡献及该书的价值，有评论将其归纳为如下三点[②]：

第一，鲁布鲁克是具体说明了被阿拉伯人和西方人称为"Cathay"(契丹)地区的第一个欧洲人。他从丝的产地，推测到了所谓的"赛里斯"和"契丹"实际上同属一国家，从而弄清了常常被混淆的中国地理和名称的对应和统一称呼。

第二，他对中国文化的观察和介绍涉及一些前人甚至后人都忽略的领域，如关于中医、中国书写和文字及中国的钱币等。他在提到汉语时这样写道："他们(即契丹人)使用毛刷写字，像画师用毛刷绘画。他们把几个字母写成一个字形，构成一个完整的词。"[③]这样的知识，虽然粗浅，却是法国人最早对汉语的一点认识，功不可没。

第三，澄清了西方对中国的谣传和误传。他曾提到了佛徒、喇嘛僧并和他们有过直接交往，还参加过一次有佛、道、基督教、伊斯兰教众信徒一起参加的辩论会。[④] 比起柏朗嘉宾来，鲁布鲁克更不相信传闻。有人告诉他"过契丹国，有一地，人入其境，不论年纪若干，皆不致老也"。[⑤] 对这样听似证据确凿的事，他绝不相信。他对蒙古的风俗习惯也叙述得非常详细，甚至注意到中国的酒不同于西欧的葡萄酒，因此他说："契丹国无酒，其饮料皆制自米，现今其人虽亦种葡萄，然不以制酒也。"[⑥]

13 世纪以后至 18 世纪前，有关法国人了解中国的资料比较少。这一

---

① Michel Jan, *Le Voyage en Asie central et au Tibet*, P. 23, Robert Laffont, 1992；道森：《出使蒙古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年，第 17 页。

② 忻剑飞：《世界的中国观》，第 75－76 页。

③ Michel Jan, *Le Voyage en Asie central et au Tibet*, P. 50；中译文见耿昇、何高济译《柏朗嘉宾蒙古行记 鲁布鲁克东行记》，中华书局，1985 年，第 280 页。

④ 忻剑飞：《世界的中国观》，第 75－76 页。

⑤ 莫东寅：《汉学发达史》，第 28 页。

⑥ 莫东寅：《汉学发达史》，第 28 页。

段时期，欧洲对中国的介绍，唱主角的是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在法国，人们所能获得的一些有关中国的资料，也是从邻国那里传过来的。最早传到法国的有关中国书籍是1585年在罗马用西班牙文出版的门多萨(Juan Gonzalez de Mendoza)的《中华大帝国史》，1588年被译成法文在巴黎问世，在法国文化界引起极大反响。这是一部全面论述中国的大型著作，但是，作者在书中把中国政府描写成为"一朵绚丽的玫瑰"，带有很大的理想色彩。作者说，中国是一个"没有贫困、没有乞丐"的国度，中国的人民是一个"聪明而又谨慎"的民族。① 当时法国最伟大的作家和哲学家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1533—1592)，在阅读了该书的法译本后，在他的《散文集》(1596遗著版)边页上写了这样一段话："在中国，其政府和艺术既不与我们的这一领域交往，又不为我们的这一切所熟悉。该帝国的历史使我们认识到，世界是多么辽阔无垠和五彩缤纷啊！以至于无论是古人，还是我们，都不能深入其中。巡视各省的钦差官员们，惩罚那些贪官污吏，也自由地犒劳廉洁奉公者。"②此外，蒙田的同代人，约瑟夫·斯卡利热(Joseph Scaliger，1540—1609)在1587年阅读了门多萨的西班牙文版著作后，在用法文写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一个令人心驰神往的帝国……它谴责我们，谴责我们这些只有一个与他们比起来微不足道的小国的法国人，谴责我们彼此之间互不谅解，互相残杀，逐渐地自我扼杀(由于宗教战争，法国当时已处于四分五裂之中)。在他们生活的国度里，歌舞升平，法律如此有制，以至他们使一个基督教国家羞愧得无地自容……"③约瑟夫·斯卡利热是一位长期生活在法国的意大利人，蒙田熟悉的同行，也是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人文科学学者之一。他对中国的看法和感受与蒙田相似。

与此同时，法国出现了一股"新的中国热"，煽起了人们"辩论"的极大兴趣。在这一股中国热的浪潮中，持各种观点的人都有，其中既不乏"抱政治和宗教传统偏见"者，也有持一切皆为乌托邦的所谓"唯物论者和怀疑

① Paul Demiéville, *Aperçu historique desétudes sinologiques en France.* I；中译文见[法]戴密微：《法国汉学研究史》，《法国当代中国学》，第2-3页。

② Paul Demiéville, *Aperçu historique desétudes sinologiques en France.* I；中译文见[法]戴密微：《法国汉学研究史》，载《法国当代中国学》，第2-3页。

③ Paul Demiéville, *Aperçu historique desétudes sinologiques en France. I*；中译文见[法]戴密微：《法国汉学研究史》，载《法国当代中国学》，第2-3页。

论者”。[①]

因为中国是如此地“新奇”，又是如此地“矛盾”，以至到了17世纪，当中国的孔子成了人们谈论中心的时候，仍然是众说纷纭，各执一见：有人认为孔子是“哲学之王”[②]，而另一部分人则把他说成为“中国的魔鬼”[③]。

从17世纪下半叶开始，欧洲汉学逐渐从意大利人手中转到了法国人手中。

不难发现，出于种种原因，东来传教士的竞争十分激烈，这里既有教派间的明争暗斗，也有国与国之间为了利益相互划分地盘的角逐。当时教派主要有耶稣会、方济会、多明我会等。从各国的利益角逐来看，1514年，葡萄牙国王从罗马教皇那里获得了对东方天主教区的保护权，这样所有的传教士就必须向葡萄牙国王发效忠誓言。法国无论从政治利益考虑，还是从教会自主论外交考虑，绝不会不关注这方面的事务。1658年，法国摆脱了葡萄牙的权力，获准在中国和越南建立不属葡萄牙的果阿大主教区。这些主教区直接属于1622年在罗马建立的一个主传教区的新机构——教廷传信部。[④] 因此，从总的方面来说，法国在进入远东地区的经济和商业领域方面，落后于其他国家，只是到了17世纪中叶起才有了气色。此时，路易十四及其大臣柯尔培尔（Jean - Baptiste Colbert，1619—1683）开始扶植许多专门从事这种远途贸易的公司。1663年，经国王批准，创建了外方传教会的一座神学院，旨在方便于耶稣会之外招募法国传教士，这些耶稣会神父，都具有高深的文化科学能力，享有盛誉。王国政府找到他们，要在北京创设一个法国传教区。这一传教区所实施、继承的仍然是利玛窦后继者所采纳的布道策略，其目的是与中国统治集团中的精英人物保持联系，并研究中国文明。接着便是1685年，六位有“国王数学家”称号的传教士的来华传教，于是18世纪以法国唱主角的中国传教活动和汉学研究就这样揭开了序幕。

在17世纪法国人对中国介绍和研究做出突出贡献的人物是金尼阁

---

① Paul Demiéville, *Aperçu historique desétudes sinologiques en France. I*；中译文见戴密微：《法国汉学研究史》，载《法国当代中国学》，第2－3页。

② L. Le Comte, *Nouveaux mémoires sur l' état present de la Chine*, Paris, 1696, I, P. 149.

③ L. Le Comte, *Nouveaux mémoires sur l' état present de la Chine*, Paris, 1696, I, P. 141.

④ 在这项工作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普罗旺斯人罗厉山（Alexandre de Rhodes, 1591—1660）神父。他曾在中国的广州、澳门做过传教工作，但他的主要传教生涯是在越南。

(Nicolas Trigault,1577—1628)。金尼阁出生于杜埃城,在该城耶稣会学校修业,1594年得文艺硕士,后入耶稣会,又习修辞学和哲学,曾参与语言、地理天文、数学医学等方面工作。他有志于中华布教,并于1611年(万历三十九年)初至南京,次赴杭州、北京等地传教。为了征募更多的传教士来华,他旋归罗马,历谒各国君主,协同优秀教士32人于1618年(万历四十六年)再度来华。其中就有罗雅各(Jacques Rho)、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等人。其后往来于南京、杭州之间。1623年(天启三年)至开封,入西安,居至1627年(天启七年)。此间,他亲睹当时偶然发现的景教碑,是一位"先于鲁德照(Alvarez de Semedo)",而"目睹景教碑之耶稣会士",为"欧人最初之目击者","1625年(天启五年)之碑文拉丁译,殆出于其手,实为此文译文之权舆。后世学者论景教者,皆据德照之记事及其译文,但金尼阁之功绩,亦不可泯。"①

归纳起来,金尼阁的主要汉学贡献有如下几点:

1. 向欧洲介绍了利玛窦神父的珍贵回忆录,他的拉丁文编译本很快地被翻译成多种文字。② 因此,戴密微说:"金尼阁神甫荣誉的主要原因仍是他向欧洲介绍了利玛窦神甫珍贵的回忆录,他的拉丁文编译本立即被翻译成法文(1616年)、德文(1617年)、西班牙文(1621年)、意大利文(1622年)和英文(1625年)等。"③

2. 为当时的来华传教士编写了"一部精辟的语言词书"④:《西儒耳目资》(*Vocabulaire disposé par tons suivant l'ordre des mots européens*)。该书是按语音和因素分类的汉文方块字,都用西文字母对着音,是为当时在中国的西儒们所作的一部学习汉语手册,于1926年在杭州出版。全书共分三

---

① 莫东寅:《汉学发达史》,第66页。

② [法]戴密微说:金尼阁在利玛窦逝世的那一年(1610)来到北京,把利玛窦回忆录的意大利文原著带回罗马(1614),但没有出版。利玛窦的文本是1911年汾屠立(Tacchi Venturi)神父在罗马发现的,于是他将回忆录和利玛窦的书简一并出版。此后,由德礼贤(Pasquale d'Elia)神父以其原意大利文出版,附有虽丰富却仍显不足的注释(3卷,罗马,1942—1949年版)。至于金尼阁神父,他在其拉丁文编译本中,只在书名中勉强提及利玛窦的名字。见 Paul Demiéville, *Aperçu historique desétudes sinologiques en France. I*;中译文见《法国汉学研究史》,载《法国当代中国学》,第4-5页。

③ [法]戴密微:《入华耶稣会士与西方中国学的创建》,《明清间耶稣会士和中西文化交流》,巴蜀书社,1993年,第165-166页。

④ Paul Demiéville, *Aperçu historique desétudes sinologiques en France. I*;中译文见《法国汉学研究史》,载《法国当代中国学》,第4-5页。

编:第一编《议引首谱》,第二编《列音韵谱》,第三编《列边正谱》。也就是说第一编是总论,第二编是从拼音查汉字,第三编是从汉字查拼音。全书共分析出29个元音,即29个字母。29个中又分为三类:"自鸣音"5个,"同鸣音"20个,"不鸣音"4个。自鸣音,就是元音,同鸣音就是辅音,不鸣音,就是"他国用,中华不用"的辅音。书中又有"字父"(声母),"字母"(韵母),因为声母和韵母配合生出一个字音来,所以金尼阁把它们称为"父"和"母"。此外还有"子母"(复合元音和单元音带鼻音韵尾)、"孙母"(三合元音,及复合元音带鼻音韵尾的音)、"曾孙母"(三合元音加鼻音韵尾)。声调分清(—)、浊(∨)、上(/)、去(\)、入(∧)。

当时欧洲传教士所编语音书,不只是金尼阁的《西儒耳目资》①,而且该书也不是西方传教士最早的语音著作,②但因该书是经过"中国学者的指示",且又根据"中国音韵原理",经过一番"整齐划一的功夫",所以比起先前利玛窦和以后何大化"顺手拼写"的注音都"更为系统",③被称为金尼阁把利氏等人的罗马字注音方案加以"修改补充"后写成的一部用"罗马字注音"的"专书"。④它不仅"把历代认为神秘的等韵学弄得浅显多了",⑤而且,由于"完整系统地记录了明末官话音系",为我们"了解研究汉民族共同语自《中原音韵》到明清时期乃至现代的发展演变规律"提供了"很有"用的"帮助"。⑥

16至18世纪传教士汉语语音的研究,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一件大事,尤其是明末耶稣会士所做的工作,在当时和后世都引起许多学者的重视,产生巨大影响。因此,罗常培在谈到我国音韵学发展史时,对明季耶稣会士在音韵学上的贡献给以很高的评价。他认为,利玛窦的罗马注音和金

---

① 当时郭居静和利玛窦合编有"词汇表",也译成"词典"(*Vocabularium ordine alphabetico europaeo more concinnatum et per acceutus suos de digestum*),利玛窦和罗明坚(Michel Ruggieri)合编的《葡汉辞典》(*Dizionario portoghese—cinese*),利玛窦的《罗马字注音》,也叫《西字奇迹》(*Procédé des caractères de l'Extrême Occident*),何大化(R. P. Antonius de Gouvea)的《昭雪汤若望文件》等,对后世都很有影响。

② 最早的是郭居静和利玛窦合编的"词汇表"。

③ 罗常培:《汉语拼音方案的历史渊源》,《人民日报》,1957年12月18日。

④ 《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册,第414页。

⑤ 王力:《汉语音韵学》,中华书局,1954年,第106页。

⑥ 曾晓渝:《西儒耳目资音韵系统研究》,《汉语史论文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1、47页。

尼阁的《西儒耳目资》，在中国音韵学发展史上，“跟以前守温参照梵文所造的36个字母”，后来“李光地《音韵阐微》参照满文所造的‘合声’反切”，应“具有同等的地位”。[①] 他说：“自从印度文化东来，一班译经的沙门，受了梵语‘体文’（Vyañjanam）的启示，归纳《切韵》和《唐韵》里头的反切上字，造成《见溪群疑》等三十六字母，辨别七音，分‘转’列图，以为沙门‘唱韵’的准则，这是中国音韵学接触外来文化后的第一度演进。但是直接用罗马字母注音，使后人对于当时各个字的音值比较得到清晰的印象，并且给音韵学的研究开辟一条新蹊径的，明季的耶稣会士（Jesuits）要算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功臣了”。[②]

由于明清时期传教士们的努力，尤其是《西儒耳目资》这样的书，使得当时的士大夫，在“欢迎”“西学”的时候，也“很喜欢”这类书，[③]如当时的音韵学者方以智、杨选杞、刘献廷等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方以智在《通雅》中说：“字之纷也，即缘通与借耳；若事属一字，字各一义，如远西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不重不共，不龙愈乎。”杨选杞作书动机，“因为旧韵书的反切，有难有拗，并且所用上下字也没有一定”，后来他读了《西儒耳目资》，便“顿悟切字有一定之理，因可为一定之法”（《同然集纪事》）。刘献廷作《新韵谱》，虽然不能确定他曾参考过金尼阁的书，但他参考过“泰西腊顶语”（即拉丁语）是肯定的。[④] 因此可见，拉丁字母的输入对当时的学者来说，是“一种新的兴奋”剂，启发了他们研究中国音韵新的思路。

金尼阁的书，不仅“为在中国激起音韵学研究做出了贡献”，同时，也是“有关明末官话的一部实用文献”，[⑤]所以，在汉语教学史上和中国音韵史上都是一部重要的著作。[⑥] 20世纪50年代，我国文字改革时，文字改革

---

① 罗常培：《耶稣会士在音韵学上的贡献》，《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三分册，1930年，第268页。

② 罗常培：《耶稣会士在音韵学上的贡献》，第267页。

③ 王力：《汉语音韵学》，中华书局，1954年，第160页。

④ 罗常培：《耶稣会士在音韵学上的贡献》，第308－315页；《国音字母演进史》，第2－9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

⑤ ［法］戴密微：《入华耶稣会士与西方中国学的创建》，《明清间耶稣会士和中西文化交流》，第165－166页。

⑥ 罗常培指出：“近代西洋人，J. Edkins，Z. Volpicelli，Kühnert，S. H. Schaank 以至马伯乐（H. Maspero）、高本汉（B. Karlgren）等，对于中国音韵学研究的逐渐进步；罗马字标音从威妥玛式（Wade System）邮政式（Posta System）演进到国音字母的第二式；如果推溯远源，都可以说，三百年前已经播下了种子。”罗常培：《耶稣会士在音韵学上的贡献》，第317页。

出版社还重出了《西字奇迹》和《西儒耳目资》这两本书，并在内容说明中指出：利玛窦的《西字奇迹》是中国第一个“拉丁字母的拼音方案”，而利玛窦和金尼阁的拼音方案是“后来教会和外国汉学家所拟拼音方案的鼻祖”。①

3. 金尼阁似乎还从事过中国史的研究，写有《中国皇帝纪年》，也可能翻译过《五经》(《中国的五经》，1626)，但这些著作都没有遗留下来。②

第二节 法国传教士和欧洲汉学的草创

法国人开始对中国进行自觉、科学地考察和研究，是17世纪后期至18世纪末，也就是西方第三次对华传教活动时期。西方对华的第三次传教活动，比之第一次唐朝的景教和第二次元朝的“也里可温教”的传教活动，在规模上要大得多，情况也较之复杂。关于这次传教活动，又可划分为两个阶段，16和17世纪为第一阶段，17世纪后期至18世纪为第二阶段。如果说第一阶段唱主角的是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传教士的话，那么后一阶段就是法国耶稣会士独占鳌头。

18世纪法国传教士中国文化的研究成绩卓著，由于他们的努力，西方的中国研究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也就是历史学家们所称的国外汉学研究的“草创”时期，③为19世纪西方汉学学科的确立打下了基础。因此，我们说，18世纪法国传教士为法国，同时也是西方汉学学科“草创”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一、“国王数学家”传教士奉命来华

17—18世纪之交，位于欧亚大陆东西两端，各有一个大国。东边是国力鼎盛时期的大清王朝，当朝者是一代圣君康熙帝(1662—1722)；西端是号称欧洲第一王国的法兰西，当政者乃是以“朕即国家”自居的路易十四(1638—1715)。康熙朝隆盛，为清代特有，杜赫德说：“中国享受太平，又

① 利玛窦：《明末罗马字注音文章》，内容说明，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年；金尼阁：《西儒耳目资》，内容说明，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年。

② [法]戴密微：《入华耶稣会士与西方中国学的创建》，《明清间耶稣会士和中西文化交流》，第165－166页。

③ 张国光等：《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第144页。

康熙皇帝智慧所致。”[①]康熙思想开放，胸怀广阔，善于吸收外来文化与科技，他与耶稣会士“交往甚密，过往和谐，推其原因，康熙重在致和”，[②]当西人争论理解问题时，康熙亲手写道：“凡各国各会皆以敬天主者，何得论比此（彼此之误），一概同居同住，则永无争竞（系竞之误）矣。”[③]故，当时西方人称康熙为“有德之君，使人敬畏”，[④]“清一代度量最大者”，西人目中的“超人”。[⑤] 路易十四（1638—1715），世称“太阳王”，显赫一时。尽管史家对之褒贬不一，但他毕竟叱咤风云，伟业赫赫。“太阳王”当政时期，法国不仅扩张了国土，同时在文化事业上也颇有建树。他的心腹大臣（财政和国务大臣）柯尔培尔（Colbert），不仅支持了深受中国影响的重农学派，倡导引进中国农作物、农具和耕作方法，同时还创建了东印度公司、法国金石和美文学科学院、法国科学院、皇家建筑学院、法兰西罗马学院、法国青年语言学院以及巴黎天文台等。

耶稣会士在中国的传教活动，以南怀仁的病逝完成了第一阶段，他在病重时，已看到中国教区的冷落，曾向西欧发出呼吁，要求增派教士。南怀仁的呼吁引起了法国“太阳王”路易十四的重视，也迎合了这位“太阳王”向世界，尤其是向东方扩张的野心。

虽说，1685 年法国就已获许在中国和越南创建主教区的特权，不再附属于果阿葡萄牙大主教的主教区，而直属罗马管辖。但开始时，法国还只是在越南进行活动，并无实力深入中国。法国传教士正式在中国开展大规模活动，并渐渐打开局面是在 17 世纪后期，也就是从路易十四派遣的“国王数学家”传教士开始。派遣五位耶稣会士学者来华是柯尔培尔接受了加西尼（Cassini）的计划。该计划请求路易十四派遣数学家去考察这个文物发达，繁荣富强的国家，“借中国的科学，改造法国的工业”；另一方面，还

① 转引自阎宗临著，阎守诚编：《从西方典籍所见康熙与耶稣会之关系》，《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大象出版社，2003 年，第 134－135 页。

② 阎宗临著，阎守诚编：《从西方典籍所见康熙与耶稣会之关系》，《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第 133 页。

③ 转引自阎宗临著，阎守诚编：《从西方典籍所见康熙与耶稣会之关系》，《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第 135 页。

④ 阎宗临著，阎守诚编：《从西方典籍所见康熙与耶稣会之关系》，《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第 132 页。

⑤ 阎宗临著，阎守诚编：《从西方典籍所见康熙与耶稣会之关系》，《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第 134 页。

可以此在法国与葡国海外利益冲突中，“予以一种对抗”。[①]

当时为了派遣这样的人才，王国政府曾向较高文化水准并在科学方面享有盛誉的耶稣会士发出呼吁，要求他们不仅要在北京创建一个教区，还要力求与中国的掌权绅士阶层保持联系。王国政府还明确下达了要他们研究中国的敕令。其目的，显然不仅仅在于彻底了解中国，以便使其接受归化，同时还有一种完全从科学方面的考虑，那就是，有利于法国和欧洲科学的发展。

于是，经路易十四精心挑选，于1685年3月3日，派了六名有“国王数学家”之称的传教士来华传教，并从国王私人金库中拨款，为这些数学家提供路资，让他们踏上东去的征途。这六名教士中，除一名在途经暹逻时留在那里传教之外，其余五名，几经周折，终于在1687年7月23日到达浙江宁波，后进入北京，并于1688年3月，谒见了康熙皇帝。这五位传教士是：洪若翰（Jean de Fontaney）、张诚（J. Fr. Gerbillon）、白晋（Joachim Bouvet）、李明（L. D. Le Comte）和刘应（C. de Visderou）。

“国王数学家”的来华，法国北京传教区便从此与葡萄牙传教区分道扬镳。第一任会长为洪若翰神父。无疑，无论是洪若翰神父，还是这一教区的其他传教士，他们是数学，或天文学，或自然史学，或地理学、地图学方面的学者。同时，因很有语言天赋，在学习汉语，尤其在学习满语方面，卓越非凡，故也堪称语言学专家。

在华期间，白晋和张诚一同做过康熙的老师，教授康熙帝数学、天文等，因学识渊博，深得器重，1693年7月4日康熙还在皇城内赐他们一处住院。不难看出，康熙对法国耶稣会士们产生了极大的好感与兴趣，主要的并不是他们是传教士，而是科学家。为了能得到更多这样的能人志士来华，康熙皇帝于是让白晋回国再去招募传教士。我们知道，法国的传教士虽已形成了一股独立于“葡萄牙神父”之外的独特力量，但仍需巩固自己的地位和继续扩大势力。康熙皇帝的这一希望，无疑为白晋等法国传教士提供了一次为法国传教区谋求更大利益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白晋回国后，虽遭遇众多困难，仍能坚持不懈，极力鼓动法国政府继续派出传教士到中国传教的原因。终于，经他多方努力，最后促成了“安菲特利特”号——

① 阎宗临著，阎守诚编：《中西文化西渐之一页——17世纪末中法文化之关系与18世纪之重农学派》，《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第122页。

"女神"号首航中国,为中法文化交流揭开了新的篇章。

二、"女神"号首航中国及其意义

1692年7月8日,白晋带去康熙赠送给路易十四的49卷汉籍离开北京,将以康熙帝"钦差"身份返欧为中国征募新人。

1694年2月1日白晋自澳门启程返法,1697年3月到达法国布雷斯特。白晋离开他的祖国已有四年,这次再度返回,主要使命是代表康熙皇帝向路易十四致谢,感谢他派遣"国王数学家"到中国。为了制造舆论和说服路易十四本人,白晋不敢怠慢,抓紧游说。为此,还于1697年用法文出版了《呈奏国王的中国皇帝之历史肖像》(即《康熙帝传》)一书,将康熙皇帝描绘成另一位"太阳王",以博得路易十四对康熙的好感,派遣更多传教士并支付年金。

路易十四虽然慷慨地答应了白晋一些要求,同时还授予他可花一万法郎为康熙皇帝准备礼物的权限,[①]但白晋的游说并非一帆风顺,最大的困难是运送问题。占据澳门的葡萄牙人以君主保教权名义,向法国耶稣会士们封锁通道。白晋以他四年长途跋涉的亲身体会,也深感让法国传教士通过澳门,既费时又颇多危险。如果法王派遣一艘运送传教士的皇家御船赴华,处境定然不同。但路易十四的大臣们不相信法国国王的一艘皇家御船会受到中华帝国的欢迎,因为康熙帝并没有依礼呈送国书,而仅以对待藩部附庸的模式托传"口信"。官方渠道不通,白晋被迫向私营公司求援。最终,经他多方努力,终于在私营企业儒尔丹(Jean Jourdan)那里取得成功,并得到政府的批准。为了开赴中国,法国政府还向儒尔丹出售了"安菲特利特"号(L'Amphitrite,女神号)快速三桅帆船。这样,"安菲特利特"号船虽不以政府名义出现,但实际上得到政府的批准和支持。该船运载的货物主要是玻璃,人员方面,除了一些分工明确的文武世俗人员外,就是大批耶稣会士。白晋从儒尔丹那里获许免费运送这些耶稣会士,最后确定的人数为十名。他们是:马若瑟(Joseph Marie de Prémare)、雷孝恩(Jean Baptiste Régis)、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1665—1741)、宋君荣(Antoine Gaubil)、钱德明(也叫王若瑟,Jean Joseph Amiot)、冯秉正(De Maillac)、韩国英(Pierre Marchl Cibot)等。

① 张国光等:《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第166页。

1698年3月6日,“安菲特利特”号从法国拉罗歇尔港启锚远航,由德·拉罗克(de La Roque)骑士指挥。6月10日,该船绕行好望角并在那里停泊了20多天以事休整。从好望角到苏门答腊之间,由于未能顺利通过巽他(Sonde)海峡,只得于8月18日在印尼的亚齐靠泊。9月27日在中国西沙群岛又经历一次风暴,10月5日终于到达中国广东上川岛。组织拜谒了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co Xavier)墓以后,于1698年10月24日到达澳门。11月2日,经过7个多月的远航漂泊,终于在广东珠江口抛锚。与“安菲特利特”号的船组人员相比,耶稣会士对中国的国情、语言和风俗习惯方面要熟悉得多。因此,白晋将船只留在珠江口广海,自己偕利圣学(J-Ch. debrossia,1660—1704)和年修士前往广州城。白晋自称是中国皇帝的“钦差”,身负出使“世界第一国王”——法兰西国王的特殊使命。以这样的身份,他享受到在中国应得的荣誉,士兵们向他致敬,鼓乐齐鸣并放礼炮,广州的官吏们都前来迎接这位“钦差”的荣归。同时,“安菲特利特”号也因某些官方的特征,在广州可以停泊近15个月(普通商船只能停泊3个月)。这就是中法关系史上的一件历史性大事——“安菲特利特”号首航中国。

1700年8月3日,“安菲特利特”号顺利返回圣路易港时,护送的耶稣会士洪若翰神父以康熙皇帝的名义向路易十四呈上“绚丽多彩的布帛,非常雅致的瓷器和几大块茶砖”。据资料统计,当时从中国运去的物品有大批红铜、黄铜器皿,布帛等;布帛有:绢、绮、普通罗和绉纹罗、缎面、重绉纹织物、平纹布、织锦等8000匹;还有中国的漆、刺绣和绘画,瓷瓶、瓷碗、瓷盒、瓷壶、瓷碟、大小瓷盘、瓷杯或瓷茶具、瓷酒瓶、平底瓷杯、带把瓷杯、瓷糖罐、瓷盐罐、壁炉瓷器配套物和其他各种细瓷产品,有17箱漆器,其中有4箱各自内装3件小漆匣和带堆金花卉图案的文房四宝,另外9箱中装有各种各样的漆桌、14箱酒具、21箱漆画和人物花卉画等。此外还有36箱中国屏风、4箱树叶屏风和3箱尚未安装好的纸屏风,455根手杖,大批纸张、广州和南京刺绣、12条挂毯以及绣花缎,11条丝巾、6卷绘画、38件麻织品等。①

1698年协议中有一项条款规定,允许儒尔丹在“安菲特利特”号船首

① 以上的资料请参阅耿昇:《从法国安菲特利特号船远航中国看17—18世纪的海上丝绸之路》,《汉学研究》第四集,阎纯德主编,第341-342页。

航中国后，如果认为有必要的话，可以二航中国，为他运回被迫暂存广州的货物，以弥补首航时可能造成的亏损。于是，“安菲特利特”号刚一返航，受到首航成功鼓舞的儒尔丹，便刻不容缓地令人检修船体，以能从事第2次远航中国。根据1700年10月23日与东印度公司续订并于11月9日批准的协议，儒尔丹及其股东们获得了中国贸易特许权。地点仅限于广州和宁波两个港口，在他们自己认为合适的情况下，有权向那里派遣一定数量的船舶和进出口一定数量的商品。但每年首次返航时要交纳2.5万镑的税。“安菲特利特”号二航中国时（1700—1703），其商品主要有1箱书籍，如《圣经》、《宗教史》、《犹太史》等；普散（Poussin）以《圣经》为主题的绘画，勒布伦（Lebrun）、小夸佩尔（Goypel Le Fils）、米尼亚尔（Mignard）等人的版画，国王和王太子的画像，枝形灯架和多枝烛台，布鲁塞尔的羽纱、兰斯（Reims）和亚眠（Amiens）的布帛、带摆的座钟和手表、带人物像的绿色挂毯、纸张、羽笔、西班牙蜡烛、小刀等；镀金刀、珊瑚、望远镜、首饰、鼻烟壶、首饰盒，各种计算器、德国水晶、巴黎水晶等。此外还有3件室内便袍及其他服装样品。白晋日记中还记载了“安菲特利特”号二航中国回程时在广州运载的中国商品清单。除了铜器、生丝、茶叶和药品外，还有93箱瓷器、45箱屏风、22箱油漆茶具、12箱灯笼、4箱扇子、7箱刺绣品、床、梳妆台、便袍，1箱瓷器样品或陈列品以及漆盒。该船同时还运走了首航中国时暂存广州的商品，其中包括30箱瓷器、35箱漆橱、1箱带珐琅的南京铜器、总督的两箱礼品（弓弩、箭囊、马架鞍、镀金钢刀、古瓷等）。法国入华耶稣会士们也利用同一机会而托运回19箱瓷器、9箱生丝和丝绸。“安菲特利特”号二航中国携归了大批家具，其中的漆器便被好奇者称为“中国——安菲特利特漆器”（Vernis Chine Amphitrite）①。

17—18世纪，在法国掀起的“中国热”过程中，“安菲特利特”号两次远航中国起了重要作用。“安菲特利特”号或“女神”号船“肯定是现在所知的第一艘在中国海岸停泊过的法国大船”②，“最先至中国之法兰西商船”③。虽然说，法国在中国的重大商业、宗教和文化活动并不是从这时开

① 请参阅耿昇：《从法国安菲特利特号船远航中国看17—18世纪的海上丝绸之路》，第341-342页。

② 耿昇：《从法国安菲特利特号船远航中国看17—18世纪的海上丝绸之路》，第322页。

③ 莫东寅：《汉学发达史》，第82页。

始，1660年巴黎外方传教会的创建，路易十四派遣的“国王数学家”赴华，1688年创建的法国北京传教区等，都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安菲特利特”号船两次航行中国的确意义重大，它“既是法国长期在华活动的结果”，又是“一次高潮”。[①] 与此同时，来华法国耶稣会士的数量也比以前大为增加，就在“安菲特利特”号抵华后的8个月，即1699年7月，殷弘绪（Francois－Xavier Dentrecolles）、傅圣泽（jean－Francois Foucquet）等另五名法国耶稣会士和助理修士也到了中国。到17世纪末期，在华法国耶稣会士即便在人数上（更不必说在实际影响上了）也具备了挑战葡籍耶稣会士的实力。[②]

“安菲特利特”号两次远航中国，沟通了中西文化交流。为法国后来在华活动又一次“开辟了道路”，“特别是促进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③] 从此以后，整个18世纪，差不多每年有一艘甚至几艘船只来往于中国与法国之间，不仅把西欧的文化和物品带到了中国，同时也把中国的文化物品带到了西方。中国的丝绸、瓷器、画、漆器等工艺品，就是在这个时候大量地运往了西欧，并在西欧广为流传，引起法国和欧洲对中国的极大兴趣和羡慕，整个18世纪，弥漫在西欧的“中国风”或“中国趣味”就这样产生了；运至西欧的中国工艺品，跟传教士们的记录、感想和研究，相得益彰，呈现欧洲汉学研究的新景象。

三、“草创”期法国汉学格局

如上所述，西方第三次对华传教活动第一阶段以葡、意、西为主，第二阶段则由法国独占鳌头。显然，无论是第一阶段还是第二阶段，传教士们都肩负有传教的任务，但是，实际上，传教士们又都不同程度地从事了中国研究。所不同的是，第一阶段的传教士们仍然以传教为主，对中国的考察和研究只是他们传教之外的业余活动，而第二阶段法国传教士们，除了传教使命之外，则另有“了解”和“考察”中国的任务必须完成。

法王路易十四派来的传教士，不仅学识渊博，受过高等教育，而且后来

① 耿昇：《从法国安菲特利特号船远航中国看17—18世纪的海上丝绸之路》，第322页。

② ［法］杜赫德编，郑德弟、吕一民、沈坚译：《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I，中文版序，大象出版社，2001年，第011页。

③ 耿昇：《从法国安菲特利特号船远航中国看17—18世纪的海上丝绸之路》，第322页。

留华多年，又热衷于中国文化知识，他们的汉学研究，无论从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令他们的前辈难以项背。总体状况表明，18 世纪在华耶稣会士关于中国的作品，无论是作者人数还是作品的数量都以法国人居冠。根据有关资料统计，从作者人数来说，来华的传教士共 77 人，其中法国就有 43 人；[①]传教士对中国的考察和研究，第一阶段，他们的作品与中国研究有关的是 69 件，占总数 644 件的 10.9%，而第二阶段法国传教士的作品中与中国研究有关的达 359 件，占总数 745 件的 47.3%；[②]从内容和研究的范围来看，这一阶段传教士们的视野较前期已大大开阔，他们把目光透射到中国的历史、地理、民族、文学、民俗等众多的方面，从而形成了从大文化背景来介绍、研究中国的格局；从作品的质量和研究的手段来看，前一阶段主要的是游记、印象、报告等感性的东西，而第二阶段则是自觉、科学的考察、分析和研究。所以，如果说第一个阶段传教士们的中国研究只是他们业余活动的话，那么，这一阶段的传教士们则是有意识地进行汉学研究，而且向着职业化转变。换句话说，法国传教士传教阶段，是西欧的传教士从业余的汉学研究到职业汉学研究的一个过渡阶段，为 19 世纪欧洲的汉学确立打下了基础。

第二阶段，也就是法国传教士阶段，一支欧洲研究中国队伍的形成，已经初见端倪，而且在这些研究人员当中，许多人已有了自己研究重点。他们的成果，在当时和对后世的汉学研究，都产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影响。李明、刘应、白晋、马若瑟、宋君荣、钱德明、冯秉正、韩国英，此外，还有在来华传教士的影响下从事汉学研究的巴黎的杜赫德等，都是一些当时有影响的中国研究家。这些传教士，以他们杰出的中国研究引起世人的瞩目，也促使欧洲汉学研究出现一个新局面。我们可以看到，李明的《中国现状新志》(1696)，冯秉正编写的《中国通史》(1777—1783)，刘应、张诚对中国少数民族的研究，白晋的《康熙皇帝传》(1679)，白晋与马若瑟、傅圣泽等对《易》、《春秋》、《老子》、《淮南子》、《道德经》等古籍进行的探讨等，都在欧洲产生了巨大影响。总之，跟前一时期的传教士相比，这一时期的传教士，在传教的事业上可以说基本上是失败的，他们除了开始的时候有过“一些短暂的兴旺”之外，并“没有很多成功的记录”，然而，在汉学的研究上，他

① 张国光等：《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第 166 页。

② 忻剑飞：《世界的中国观》，第 133 页。

们却成绩斐然。[1]

第二阶段,法国耶稣会士们之所以能把主要的精力转向汉学研究,并能做出前期传教士们所无法企及的成绩,有其主观和客观原因。从他们本身素质来说,法国的耶稣会士更像学者而不像传教士,因为他们原来的身份就是学者;从客观的原因来看,有许多的因素,促使他们在汉学研究上做出成绩。其一,前一阶段,传教士们曾热衷于"礼仪之争",但是,这一争论非但没有引起教皇的兴趣,反而受到其他教派的攻击,尤其是,随着西欧启蒙理性之光的照耀,教会的论点普遍地受到批判,教会势力日趋衰落,传教事业越来越不受重视,只得退而求其次,在中国宫廷里任职,而这一举动,又招来了新的批评。从中国方面来说,中国的朝廷,对于传教士的宗教观点并不感兴趣,而对于他们的科学技术才华却颇为赏识,而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热情和兴趣,也始终得到中国方面的鼓励和关心。其二,法国的传教士在出发前,都接受了国王所给予的特别使命,明确规定他们所肩负的已不单是"布道传教",而是"布道"和"中国研究"双重任务,并指定有义务向科学院通报他们观察、研究中国的结果。事实上,当时的法国科学院和内阁大臣,确也不时地给他们下达调查提纲,保持频繁的通讯关系。法国传教士之所以会有这一双重使命,是跟当时法国的科学发展和国策密切关联。早在1663年,法国就成立了有关的研究机构,1666年便设立了国家科学院,该学院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派员到世界各地进行考察,尤其是要补订地理学的知识。当时法国已经掌握了世界各地的地理知识,唯独中国和印度等一些国家和地区,因控制在葡萄牙势力范围之下,不易打入。但是毕竟当时葡萄牙传教事业已日益窘迫,而法国无论在财力、人力还是综合实力都独步欧洲。法国传教区的成立正反映了法国政府的胜利,说明法国传教士已具备了主宰来华传教的实力。显然,在这样的形势下,路易十四派出的绝不会是一般的传教士,而是科学家兼传教士,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路易十四首先考虑的是他们的科学的才华,而不是他们对传教事业是否虔诚。因此,当时路易十四的大臣柯尔培尔召见法国传教士洪若翰(Jean de Fontaney,1643—1710)时就这样明确地对他说:"我的神父,那些科学不值得你去承受远涉重洋之苦,不值得你去违背自己的意愿,远离您的祖国和朋友。但是,我也希望在你们布讲福音不很忙的时候,能在当地

① 忻剑飞:《世界的中国观》,第133页。

以一个观察员的身份，去观察那些完美的艺术和科学，而这一点，正是我们所缺乏的。"[①]路易十四国王于1698年2月8日从凡尔赛向拉罗克颁发敕令中，也曾特别提出，一旦在中国港口停泊，就要注意观察那里的季风、潮汐、气候以及与航海有关的一切资料情报，如中国是否有港口、抛锚地、海岸地图和航海指南等。如能找到，就必须呈奏给国王陛下。他们还必须调查中国与欧亚各国之间经商方式、中国的风俗习惯，以利于法国政府将来方便时派船驶往那里。也就是说，实际上他们是有政府使命的，那就是必须搜集有利于王国政府未来事业的一切航海、军事和经济情报。[②] 为此，我们与其说路易十四将他派遣的传教团看作为传播宗教和科学的推行者，倒不如说是把它视为了解中国的接受站。当然，路易十四这样做，是为了发展法国的科技和加强国力，因为在当时，中国的确在许多方面比欧洲人先进。[③] 然而，在客观上，法国传教士所起的作用，远远地超过了路易十四的打算，无论是他们传教活动，或是科学活动，都大大地加强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促进了"中学东移"，促进了欧洲汉学的发展，这是路易十四所始料未及的。

如评论家们所公认的，"19世纪欧洲学术性汉学的诞生是以西方国家殖民扩张为前奏"的，其实18世纪传教士奠定的汉学研究基础"也未尝不是教会与国家拓展权力边界的副产品"，在葡萄牙和法国矛盾的缝隙中诞生的"法国传教区一开始就在传教职责之外代表着法国国王的利益，法国传教区成员身上因此也有比较浓重的世俗气息"，也正是"这一世俗的倾向"，"对推动18世纪欧洲的中国热，对开创汉学研究的新局限有着明显的影响"。[④] 这样，我们也可以看出，法国在中国的传教，从一开始就显示出它的特征：他们的任务并不主要是传教，而是传教和对中国的研究两者紧密地结合。因此戴密微指出，法国希望北京传教区的教士们从事为法国服务的，"不再被认为宗教或科学教义上的布道"，而是要他们成为"有关中国知识的搜集者"，"当时在宗教和科学之间就已经出现了结合，我们的全

① 转引自钱林森的《中国文学在法国》，第5页。

② 耿昇：《从法国安菲特利特号船远航中国看17—18世纪的海上丝绸之路》，第330页。

③ ［法］谢和耐，耿昇译：《17和18世纪中欧文化交流》，《国际汉学》1，商务印书馆，1995年。

④ 张国光等：《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第165页。

部中国学都打上了这种现象的烙印。"[①]他还指出，1685 年，一些非常博学的耶稣会士荣获"国王数学家"的尊号，他们获得了仪器、礼物和年金的犒赏。他们每个人都获得了一道命令，一道"改进科学和艺术"的国王敕令，都被接受进了科学院并将其考察结果寄给科学院。这里是指一种真正的"科学传教区"，"它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法国中国的创建宪章"。[②] 因此我们说，传教士的汉学著作和他们寄回国的资料和研究成果，直接导致了法国汉学的兴起；也因为他们卓有成效的工作，最终奠定了鸦片战争前法国汉学的世界首席地位，并为欧洲汉学的创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③] 沙畹说："以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实肇于 18 世纪，创始者为法国耶稣会士。"[④]这一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戴密微说："事实上，在巴黎也存在着一个中国学学派，至少是在法京师存在着创建这样一个学派的微弱愿望，以与在北京开花结果的传教士们的中国学相呼应。"[⑤]因此，当我们在谈论 18 世纪来华法国传教士汉学成就时，绝不能忽略法国本土中国研究所取得的成就，这当中有宗教人员，还有一些非宗教人士们所做出的努力。宗教人员如杜赫德（Jean Baptiste Du Halde），北京传教士派去巴黎完成宗教和文学学业的黄嘉略（Arcade Hoang）、高类恩（Aloys Ko）、扬德望（Etienne Yang ）等；非宗教人员如佛雷烈（Nicolas Frérer）、傅尔蒙 Etienne Fourmont）和他的弟子德经（Joseph de Guignes）等，他们是一些学者或思想家。[⑥] 这里特别要谈一下非宗教人士，或者说学者们所取得的成绩。

当我们谈到传教士汉学研究的时候，必须看到问题的另一个方面，那就是，传教士毕竟有他们的宗教立场，使得他们的研究不能不带上神学的

---

① ［法］戴密微：《入华耶稣会士与西方中国学的创建》，载《明清间耶稣会士和中西文化交流》，第 169 页。

② ［法］戴密微：《入华耶稣会士与西方中国学的创建》，载《明清间耶稣会士和中西文化交流》，第 169 页。

③ 田永秀、鲜于浩：《鸦片战争前的法国汉学和中法文化交流》，《汉学研究》第四集，阎纯德主编，中华书局，2000 年，第 311 页。

④ ［法］沙畹：《汉学》，转引自田永秀、鲜于浩的《鸦片战争前的法国汉学和中法文化交流》，第 311 页。

⑤ ［法］戴密微：《入华耶稣会士与西方中国学的创建》，载《明清间耶稣会士和中西文化交流》，第 181 页。

⑥ ［法］戴密微：《入华耶稣会士与西方中国学的创建》，载《明清间耶稣会士和中西文化交流》，第 181－185 页。

色彩。法国和整个欧洲汉学的进一步发展，必须超越宗教的界限。尤其是，从18世纪下半叶起，当宗教界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这些非宗教人士的研究更是占有了更重要的地位。

1773年，教皇应法、西、葡、那波里四个国家的要求，命令解散耶稣会，法国的耶稣会也没有新的传教力量而走向衰落，传教士的汉学研究从此陷入了困境。1793年，随着法国最后一位来华传教士汉学家钱德明的逝世，由传教士开始的法国汉学也走向了衰落。

来华耶稣会士对中国的研究和介绍，曾引起了社会各阶层对中国广泛的兴趣，为法国和欧洲的汉学兴起准备了良好的土壤和社会氛围。在传教士汉学尚未衰落时，许多的非宗教知识分子已开始注意和研究中国，法国的专业汉学研究也就此而悄然兴起。这些研究者虽然有的没有到过中国，却热衷于中国文化，他们或与传教士合作，或利用传教士的资料，进行汉学研究，并取得丰硕成果。欧洲汉学三大名著之一《中国丛刊》就是传教士和非宗教界合作的结晶。而早在17世纪的时候，著名的汉学家多尔普罗(Barthelémy d'Herbelot，1625—1695)所编的《东方文库》是17世纪欧洲东方学的总揽性工具书，收入了为数不少有关中国的书目。这位法兰西学院叙利亚语教授，对欧洲汉学有开创之功。随着非宗教界的汉学研究的逐渐兴起，这种倾向也日益明显。法国18世纪大思想家佛雷烈、学者傅尔蒙和他的弟子德经等，在汉学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绩，成为当时欧洲最著名的汉学家之一。此外，还有启蒙思想技术对中国的论述等，都说明这一问题。[①] 非传教士汉学家的一个特点是，没有宗教的偏见，能从科学和客观角度看待分析中国问题。如对中国历史和纪年学特别感兴趣的佛雷烈，对中国的纪元问题提出了跟当时传教士截然不同的看法，断然否定了"索隐派"中国古代神(天)就是犹太基督上帝的谬误，纠正了中国源于西方的错误观点。

这样，我们也可以看出，18世纪法国的汉学，不仅有一批法王路易十四派往中国的传教士，还有一批在来华传教士影响下法国本土的传教士和学者。这些研究者们，各自发挥自己的优势，为法国的汉学发展做出努力。是来华传教士"努力把自己融入中国文化"，在汉学研究上做出他们的努力，而同时代欧洲的一些中国研究者，则"使中国文化融入本土"，打造出

① 关于启蒙思想家的有关中国研究与论述，我们在这一章的第五节中将有专门论述。

跟来华传教士"不完全一样"的"汉学模型"。[①] 正是这两者"同"而又"不完全相同"的汉学研究,相得益彰,相互辉映,才构成并"孕育着学术性"的传教士汉学时代[②],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改变了"急于西学之移植,缓于中国之研究"的状况,开创了西方"汉学研究格局"的"草创"时期。

第三节 "饱学多能"的传教士汉学家

在"草创"西方"汉学研究格局"中,首先努力从事中国研究并取得最大成绩的是法王路易十四派往中国的"国王数学家"和后来白晋招募来华的传教士李明、刘应、白晋、马若瑟、宋君荣、钱德明、冯秉正、韩国英等。他们受过高等教育,热衷中国文化,且又留华多年,对中国文化有着直接的感受,其中不乏"知识渊博"、举世公认的"饱学多能之士"。

一、张诚、李明、刘应

1. 张诚(J. Fr. Gerbillon,1654—1707),法国凡尔登人。1687 年来华,翌年进北京。他不仅学习华语颇具天才,掌握满语亦有惊人悟性。因他很快就熟练地掌握了满语,故颇受玄烨喜欢。在华期间他曾多次参与外交工作,担任翻译,与徐日昇(Thomas Pereiro)一起,在订立《尼布楚条约》的会议上做过许多工作。1693 年,俄罗斯使臣来华之际,他也担任过翻译。1699 年,洪若翰归国后,张诚任中国布道会教长职务。在此期间,他 8 次旅行蒙古,并将旅途所见所闻撰写成《鞑靼纪行》。后来,该书收在杜赫德编的《中华帝国全志》第四卷,史家誉称为"有力史料,裨益后世"。[③]

2. 李明(Louis Lecomte,1655—1729),法国波尔多人。先到北京,后到陕西,继而跋涉各地。他本是一位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在华期间,在观测彗星及其他多种天文现象中表现突出,成绩卓著。1692 年,接受教会任务,奉命赴罗马报告中国传教情况,从此回归法国。他的汉学著作有《中国现世新志》(*Nouveaux Mémoires sur l'Etat présent de la Chine*,1696—1698),三卷,出版于巴黎。此书一面介绍当时中国的情形,一面讨论礼仪问题,为教

① 张国光等:《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第 5 页。

② 张国光等:《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第 5 页。

③ 莫东寅:《汉学发达史》,第 81 页。

会进行辩护，出版后在法国和欧洲引起极大反响。Sorbonne 神学院花了整整两个月时间开了 30 次会议对之进行审查，160 个神学家发表意见，其中在投票表决中有 114 人赞成出版，一时间该书成为耶稣会护教的代表作。这部书中，他向欧洲介绍周敦颐、邵雍和朱熹三人，还专门介绍了朱熹的《太极解义》。该书是一部"小型的简论著作"，但"以一种带有相当明显的倾向性的形式"①形成了当时对该国的看法。② 诚然，也有评论认为该书在描写中国方面有夸张不实之处。此外，他还著有《中国礼仪论》(1700)。

3. 刘应(C. de Visderou，1656—1737)，法国布勒塔涅人。到北京后，先派往山西传教，两年后，因生活困难转往南京，一度去过广州，再回到北京。1709 年离开中国去了印度。他在礼仪问题上与其他传教士认识有所不同。他的中国文化研究，除礼仪问题之外，最关心的是中国中、古历史，北方塞外民族历史等。他在来华之前，就读了多尔普罗的《东方文库》(初版)，但他认为《东方文库》有不足之处，即该刊所刊登的有关资料，并不是直接取自于中国的史籍，于是他便自己翻译中国典籍中关于匈奴、突厥、蒙古等记载，专在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四夷考》中寻求材料，还搜集后世史家的考证，遂写成四册稿本，送往欧洲，这就是他的《鞑靼史》(*Histoire de la Tartarie*)。遗憾的是，稿本在当时不为世人所关注，只是后来在《东方文库》再版时才引起学者的重视。他的《景教碑文的新译》也是一部力作，比之鲁德照(Alvarez de Semedo)、卜弥格(Michele Boym)等人的译作前进了一步，译文也更加正确。

刘应还十分关心中国教派的情况，他曾对巴黎外方传教会的约翰·巴赛(卒于 1701 年)神父提到过中国婆罗门教派、佛教和道教，1725 年，还写过《论出家道士们的宗教》这样的文章。③

二、雷孝恩、白晋、巴多明、马若瑟

1. 雷孝恩(Jean Baptiste Régis，1603—1738)，法国普罗旺斯人。他在

---

① [法]戴密微：《入华耶稣会士与西方中国学的创建》，载《明清间耶稣会士和中西文化交流》，第 170 页。

② [法]戴密微：《入华耶稣会士与西方中国学的创建》，载《明清间耶稣会士和中西文化交流》，第 170 页。

③ [法]荣振华(Joseph Dehergne)：《入华耶稣会士中的道教史学家》，载《明清间耶稣会士和中西文化交流》，第 181、151 页。

汉学方面的主要贡献是，曾翻译《易经》(*Y - King, Antiquissimus Sinarum Liber.*)“备极勤劳”。[①] 在早期的几种《易经》译本中，雷孝恩的译本(1736年)是“最初之西文全译”，[②]“西方现存的第一部完整的《易经》译本”[③]。跟金尼阁一样，雷孝恩用拉丁文进行翻译。他还借助冯秉正的帮助，采用了汤尚贤对《易经》的注释。他的译本的名称叫做 *Y - King antiqunissimus Sinarum Liber quemex Latina interpretation*(《〈易经〉中国最古的书》)，共2册3卷。第1卷是概述，第2卷和第3卷是《易经》经文和注疏的翻译，以及他本人对《易经》注疏的注释和评论。实际上这不是一部译作，而是一部对《易经》进行翻译和研究的综合性作品，在西方《易经》翻译和研究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是“首次为西方完整”“了解和研究《易经》提供了较充分的原始资料，同时也为而后用各种现代欧洲语言翻译《易经》，提供了参考和借鉴的样本”。[④] 此外，他为“监督中国全土之实测制图”做出了努力，且功绩卓著，超过他的《易经》翻译和研究，被誉称为“更属殊勋”。[⑤]

2. 白晋(Joachim Bouvet, 1656—1730)，法国勒芒人，法王路易十四出资派往中国的5位“国王数学家”耶稣会士之一。1688年2月到达北京，留在清朝宫中并得到大清康熙皇帝信任。由于康熙对法国数学家耶稣会士的极大好感与兴趣，还于1693年7月4日在皇城内赐他们一处住院。

康熙曾命白晋返回法国，以携归更多新的学者。白晋以清朝大皇帝“钦差”的身份，于1692年7月8日离开北京，1694年2月1日自澳门启程返法，1697年3月到达法国布雷斯特。当时，法国传教力量虽然形成，并已独立于“葡萄牙神父”之外，但还需巩固地位和继续扩大势力。故此，当白晋再度返法时，便不失时机地开始游说。为了制造舆论和说服路易十四本人，他还于1697年用法文出版了《呈奏国王的中国皇帝之历史肖像》(即《康熙帝传》)一书。实际上，此书是他当时呈奏路易十四的一份有关康熙时代中国国情的秘密报告。白晋在书中将康熙比作路易十四，并对中法两国君主都竭尽美誉之辞。白晋的工作颇为成功，为后来法国在中国的与汉学取得成绩做出巨大贡献。

---

① 莫东寅：《汉学发达史》，第83页。

② 莫东寅：《汉学发达史》，第83页。

③ 杨宏声：《本土与域外——超越的周易文化》，第188页。

④ 杨宏声：《本土与域外——超越的周易文化》，第188页。

⑤ 莫东寅：《汉学发达史》，第83页。

白晋的另一功绩是对中国《易经》研究做出独有贡献。白晋在1687年来华初期就开始学习研究《易经》,且一直得到康熙皇帝的直接关心、指导和支持。1697年,他回巴黎时,做了一次演讲,对当时大多数传教士认为《易经》充满着"迷信"的观点进行了批判,且提出《易经》是与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的哲学一样合理而完善的一部著作,并指出,对《易经》进行研究,从理性方面去发现其意义是一条西方人了解中国哲学的正确可靠之道。诚然,他并不否认,《易经》这本书中有种种令人迷惑的表象,但是,人们不能被这些表象所迷惑,因为其蕴涵的哲学原理是深邃的,其最深刻的意义与基督教有一致性之处。1719年,白晋在傅圣泽的协助下,撰成《易学总旨》(*Ide generalis Doct rinae Libri I - King*)一书,进呈康熙帝。在这部易学著作中,作者解释了"《易》数之头绪",并进而论证"《易经》之内意与天数实有相同"之处。无疑,他的"《易》数头绪"探究与当时欧洲主流学术的某些问题显然有关。①

白晋也是对莱布尼茨的《易经》研究产生重大影响的传教士。早在《易学总旨》完成前10年(1701),白晋就开始与莱布尼茨往返通信,讨论《易经》中象数的原理及其意义问题。他们的讨论与这一时代中西文化交往和思想交流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相关,也直接地影响了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②

3. 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1665—1741),法国贝藏松大鲁赛(Grand - Russey)人。里昂会立学校毕业后,于1685年9月1日入阿维尼翁修院,1692及1693年在昂布鲁与皮涅罗(Pignerol)两地教授文学。1693年赴阿维尼翁研究神学,晋司铎,传教颇有成绩。1689年随白晋东进,10月抵达中国。

巴多明天资聪颖,知识渊博,在物理、地理、几何、文学、历史、国内名阀世系、军事学等方面都拥有丰富的知识。在语言方面,他也是一个天才,能

---

① 杨宏声:《本土与域外——超越的周易文化》,第186页。

② 1697年白晋奉康熙之命回法国,同年10月18日与莱布尼茨通了第一封信,据有关材料说,前后他们共通过7次也可能更多的信。在这些通信中白晋和莱布尼茨讨论了中国哲学、文化、周易六十四卦及二进数学等问题。见焦树安的《莱布尼茨对中国哲学的理解》,《国际汉学》1,《国际汉学》编委会,商务印书馆;又见刘立群的《最早研究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的德国人——莱布尼茨》,《中西文化交流先驱》,许龙明主编,东方出版社;阎宗临著,阎守诚编:《白晋与傅圣泽之〈易〉》,《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

熟练地使用满、汉、拉丁、法、意、葡等多种语言，尤以习满、汉文字成绩极佳，有欧人“操华语者无人能及”之说，因他讲满语与“母国语言无异”，颇得康熙器重，喜与之长谈。[①] 如果说张诚、白晋二神父与康熙谈论的主要是几何、植物、解剖、医科等方面知识的话，那么巴多明与康熙谈论的则主要是世界各国之政治风俗、欧洲各朝的利害关系等，康熙所以重视路易十四，跟巴多明在他面前不断讲述和介绍颇有关系。他还多次担任欧洲人入朝者如传教士、教廷专使的翻译。40 年来，皇帝对他的翻译工作十分满意。巴多明不但语言流利，且下笔如水泉奔涌，脍炙人口。中俄和约得以成立，巴多明为之出过不少力气。中国为办理中俄交涉，设置翻译馆舍，招收满人子弟，研究拉丁文字等，巴多明都努力从事，并被任命为翻译馆舍主馆。古柏察认为，“多明实非闭户研究学术之人”，20 多年，他不时地随康熙皇帝游巡塞外和往来诸省之间，足迹遍布全国各地。中国全图的测绘，虽出至于众多传教士之手，但“应特别归功于巴多明”，因他不但主持该项任务，且身体力行，“亲自测绘”，如辽东、旅顺、沈阳、山东登州等地，他都亲自做过测量。[②] 巴多明汉学研究也成绩卓著。他在致丰特内尔（M. de Fontenelle）信札中说：“十年来余奉康熙皇帝命将不少满文著述译为欧文，同时并将法兰西、拉丁、葡萄牙、意大利各种文字著述转为满文。”[③]只是这些译文现在是否还保存着尚不可知，但他也确实留下许多重要的译作，如《中国史》（1730）、《六经说》六卷（1735）、《自然典则》（1788）、《哈密喀尔喀行纪》、《拉丁文字典》等。他的《自然典则》翻译的是孔子的诗篇；《哈密喀尔喀行纪》翻译的是一个满人的作品，宋君荣神父认为该译本“甚佳”；[④]他的《拉丁文字典》是将达内（Danet）的拉丁文字典译为汉文，但未刊行。此外，他在许多信札中谈论到了有关中国问题，内容涉及政治、风俗、天文、物理、历史等，如中国的大黄（这在当时的欧洲都还不怎么认识）、玻璃、炸药，中国何时发现铁矿，中国以前是否有地图，灯节之起源，中国饥馑及救济方法，中国的多妻制，中国文字与埃及象形文字之比较等。

晚年，巴多明因患痛疾，窘苦异常，于 1741 年 9 月 29 日去世，享年

---

① ［法］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 510 页。
② ［法］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 516 页。
③ ［法］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 522 页。
④ ［法］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 521 页。

76 岁。

4. 马若瑟(Joseph Marie de Prémare,1666—1736),法国瑟堡城人。1683 年在法兰西教区入会,1698 年随同白晋、巴多明二司铎一起来华。抵中国后,专心于传教和研究中文。曾在江西传教 25 年,后因迫于雍正禁教令退居广州,继至澳门。他的研究方法与一般传教士不同,他的用意不仅在于学习传教必需的语言文字,而更注重"寻究中国载籍中之传说,有裨于宗教者予以利用,发挥教理"。[①] 他与白晋、傅圣泽一起,研讨《易经》、《春秋》、《老子》、《淮南子》等古典,努力发现这些古籍中有与基督教一致的论旨。尽管他因旨在汉籍中寻找耶稣教信仰的理论和根据,颇不受其他教士所容,但他精通汉文,对中国的文化有很深的研究,故被公认为"曾经有过的最好的汉学家"之一。[②] 雷慕沙认为:在法国来华的传教士中,对于中国文学造诣最深的,当推马若瑟与宋君荣二神父,他们在中国文学方面的成就,是当时同辈与其他欧洲人所不能及的。[③] 他翻译和写有《六书析义》、《赵氏孤儿》、《中国语言志略》、《中国古籍中之基督教主要教条之遗迹》、《书经》(选译)、《诗经》(八章译文)、《耶稣会士适用之拉丁语汉语对照字汇》、《汉语西班牙语成语》、《经书理解绪论》(三小册子)、《将十二端信德用之于中国》和《怎样应用〈五经〉和解决其中的问题》等。《关于书经所见以前的时代与中国神话之研究》,当时并没有出版,至 1776 年德经刊行宋君荣的《书经》时,才附在卷首得以问世。他的《赵氏孤儿》的法译本,附在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中,巴黎 1755 年刊印。此书为"欧洲最初认识之唯一中国戏曲",[④]成为伏尔泰戏剧《中国孤儿》的蓝本,对法国文学影响极大,19 世纪初,大卫斯(Sir Francis Davis)的英译本出版之前,这部译作是欧洲人翻译中国词曲的唯一材料。有评论指出:综观全局,马若瑟神父《赵氏孤儿》剧本译本"相当精辟",是一部"真正的译稿而不像迪弗赖斯尼的无名氏通讯人的译本那样支离破碎",任何一个阅读该译本的人都会从中看到"崇高的感情和高尚的自我牺牲精神",令人想到"高乃依和拉辛的那些最精彩的悲剧",马若瑟神父在翻译这台戏的剧本时,始终是"一丝不

① [法]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 527 页。
② [法]荣振华著,耿昇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中华书局,1995 年,第 660 页。
③ [法]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 528 页。
④ [法]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 530 页。

苟、严肃认真”。[①]

他的《中国语札记》(*Notitia Linguae Sinicae*,也翻译成《中国语言志略》)是一本汉语教材,也是一本语法书。1728 年在广州编成,后寄回法国请傅尔蒙校阅,一直没有出版。1831 年,金斯博鲁(Kingsborough)出资,该书在马六甲面世。[②] 此书分绪论、白话和文言这样几个部分。在绪论里,作者概述了中国书籍、读法、词典、音韵等;在白话部分,着重论述中国语言的特征,各种语助词,如否定、重叠、开始、结尾类等的使用,对仗、询问等字句的重要性等,都一一做了分析,最后还附有谚语;在文言部分,作者对各种语助词、文体做了研究,并列举了许多成语。该书的特点是打破了法语和拉丁语的语法框架,力求用汉语本身的特征来分析汉语语法,这在当时尚属首创。雷慕沙说:“昔人为此研究者,泥守拉丁文法原则,若瑟则不然。其所用者全为新法,勿宁谓其摒除一切方法,即以语句之结构代替文法规则,质言之,习华语者重实习而不重理论。”[③]

虽然该书论述的主要是语法,但正如许多评论指出的,其内容之丰富,使读者从中同时可以学到丰富的文学知识。雷慕沙指出,该书并不像作者“自谦”所言,只是一部“寻常”的“文法书”、“修辞学”,实际上是“一全部文学讲义”。[④] 他说,为此书,“若瑟不仅搜辑华语之一切文法规则与夫语助词,而且对于文体、古今成语、俗语、常用之比喻广事引证,并加必要之说明”,世人只把它看成为“适用于”“商人初习语言之课本”,其实在此书中也可求得“文学之深造”。[⑤] 不过,雷慕沙似乎太强调该书的“文学”内涵,而忽略了它作为教材的价值。而实际上,就马若瑟编写本书的主要目的来看,确是要编写一本“适于”“商人初习语言之课本”,[⑥]“向传教士提供一本适用的教材”。[⑦] 因此,无论说本书是一部“文学讲义”,或者说本书是一本“系统严格的语法”书,虽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都不甚确切。确切地说,作

① [法]陈艳霞(Ysia Tchen):《入华耶稣会士对中国音乐的研究》,载《明清间耶稣会士和中西文化交流》,第 240 页。

② [法]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 530 - 531 页;Henri Cordier, Bibliothenica sinica, P. 1664 - 1665.

③ [法]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 531 页。

④ [法]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 531 页。

⑤ [法]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 531 页。

⑥ [法]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 531 页。

⑦ 张国光等:《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第 263 页。

者编写本书的意图就是着眼于“教学实践”，强调“学汉语最好通过例子”。他认为，这么做是“因为通过例子比通过规则能更快地通晓中文”，这样做是“合适”和合理的。[①] 无疑，该书在西方汉语研究史的价值已得到充分的肯定。雷慕沙认为，此书是马若瑟“著述中之最重要”者，也是欧洲人此类著作中“最佳”之品。[②] 费赖之认为，雷慕沙的这一看法，“迄今（1884 年）尚能适用”。[③] 日本汉学家石田干之助认为，作为马若瑟的“一代大著”，他的《中国语言志略》是“非举出不可”的，因为这部著作“最先将中国语的性质与其构造，正确地传于欧人”；[④]方豪也认为：该书“博大缜密”，对于汉字的构造及其性质等，“论列颇详”，例举“达 1 万 3 千余则，为西人研究我国文字学之鼻祖”。[⑤] 可能正因为此，该书译本颇多。

三、冯秉正、宋君荣、钱德明、韩国英

1. 冯秉正（Joseph Anne Marie de Moyriac de Mailla，1667—1748），法国贝莱（Balley）教区迈拉（Mailla）堡人，出身贵族家庭。1689 年 9 月 10 日，排除种种障碍，入里昂教区修院，后又经极力要求，于 1702 年被派往中国。1703 年 6 月抵澳门，旋赴广州。在广州习汉语言文字，深入了解中国习惯风俗。既而被派往江西。1710 至 1714 年间，奉命与雷孝思、德玛诺（Romin Hinderer）共同测绘河津、江南、浙江、福建、台湾及附近诸岛地图。期间，他利用来往各地机会，传布教理，鼓励教民。测绘完毕，返京复命。康熙很器重他的才华，命居京师。约五十岁时，开始学习满语，进步甚速，并将已翻译成满文的《通鉴纲目》翻译成法文。1748 年 2 月得病，同年 6 月 28 日去世，乾隆帝赐葬银，参加葬仪达 700 余人，内有大员数人。

冯秉正在中国历史和地理方面有突出成就。

在历史方面，他的主要著作是 12 卷本的《中国通史》（*Histoire de la Chine, ou Annales de cet Empire; traduite du Tong - kien Kang - Mou*，1777—1783）。这位出身于法国安省贵族家庭的神父，1703 年来华后就一直致力于中国历代朝代兴亡史的研究工作，《中国通史》正是他的这一努力的结

① 张国光等：《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第 263 页。
② ［法］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 531 页。
③ ［法］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 531 页。
④ ［日］石田干之助：《中西文化之交流》，第 109 页。
⑤ 方豪：《中国交通史》，岳麓书社，1987 年，第 963 - 964 页。

晶。在他留华期间，康熙皇帝正命人将朱子的《通鉴纲目》译成满文，之后，又想将此书翻译成法文。冯秉正精通满、汉语言，熟习中国古籍中的有关风习、宗教、历史典故，又善于考据，显然是个理想的译者。他的中国、法国、罗马等处道长、朋友也都认为，冯秉正是欧罗巴人中"精研中国历史、文学"的"佼佼者"，且他"研究勤挚，辅以强健之记忆力"，连中国本土的学者也"莫不惊叹"。[①] 于是他在众多方面的关怀和支持下，便着手进行这一工作。当时，已掌握满文的冯秉正，参照满文译本，同时还翻译了明朝的《续通鉴纲目》，补充了宋、元、明的史实。在编写的过程中，他又参考其他有关中西资料，加以订正和补充，关于明末清初的事，他还加入了自己的一些见闻。这样，经过七年的不懈努力，终于于1737年完成了这样一部不朽的历史著作。遗憾的是，当他将稿子寄回法国时，由于"偶然的变故"（一说是，因书中写到古老的中国早于《圣经》所记载的年代而与基督教教义不合）而被搁置了下来，当时并未出版问世。直到1773年，耶稣会解散后，人们在里昂大学院图书馆里发现了原稿，书稿转移到了格鲁贤（Abbé Grosier）手中，并于1777年至1783年陆续在巴黎刊出，名为《中国通史》。[②] 刊出时，格鲁贤将自己编的《中国志》作为第13卷，附录其后，于1780年出版。出版后，罗以礼（François Rossi）曾将之翻译成意大利文，同年间刻于锡耶纳，而奥斯定会士贾明（Jamin）神父，曾将它节录为四开本，两卷。该书是当时最有影响的历史著作，其主要学术价值是在于史料来源可靠性和真实性，历来得到评论家好评，被誉称为在欧洲刊出的"中国通史"之"楷模"，[③]"西方唯一最全的以中国史料为基础的中国通史"。[④] 19世纪后期20世纪初戴遂良神父（Léon Wieger）的《历史文选》（1903—1905），[⑤]20世纪法国汉学家考狄（Henri Cordier）的《中国通史》，清以前史料"大多取资于此书"。[⑥]

在地理方面，《中国大地图》拉丁文译本中的所有地图，几乎都出于冯秉正之手，其中《中国所属鞑靼地域及附近各处地图》（1779）虽出图尔

---

① ［法］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608页。

② ［法］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611页。

③ ［法］雅克·布鲁斯，李东日译：《从西方发展中国到国际汉学的缘起》，《国际汉学》1。

④ Paul Demiéville, *Aperçu historique desétudes sinologiques en France*, I.

⑤ Paul Demiéville, *Aperçu historique desétudes sinologiques en France*, I.

⑥ Paul Demiéville, *Aperçu historique desétudes sinologiques en France*, I.

(Brion de la Tour)之手,也是根据冯秉正的考证绘成,《黑龙江北海东海间舆地全图》(附有西伯利亚全境与西抵圣彼得堡之俄罗斯地图),是冯秉正和宋君荣、徐德神父等同绘,经纬度表,是他们测绘地图时实地测验所得。关于这方面,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和格鲁贤《中华帝国概述》卷一中都有记载。

此外,他还写有《中国之风俗习惯》,1849 年 2 月 10 日及 3 月 15 日的 Voleur 报上有辑录;他翻译的《易经》,曾经雷孝思采录,1725 年冯秉正曾将北京国子监石鼓文录寄法国;1727 年将一种古叙利亚文写本抄寄巴黎;他还给巴黎考古研究院研究员佛雷烈去了四封信,谈论中国纪年的远古与确实。① 对于中国度量衡,中国的台湾、澎湖诸岛及中国文化其他内容等,他也有所研究。②

2. 宋君荣(Antoine Gaubil,1689—1759),法国盖拉克城人,出身名门世家。自幼聪明好学,年轻时就颇有成就。初在故乡跟皮劳伦茨(Paillaurents)学习,后去图卢兹习耶稣会课程。1704 年 9 月 12 日入图卢兹修院,毕业后在法国南方诸中学任教员。曾居巴黎三年,研究神学。为通读《圣经》,研究希伯来文。他对数学、物理、历史、地理,尤对天文持有浓厚兴趣。为进行实习测验,曾数赴巴黎气象台,求教于学界享有盛名的卡西尼(Jacqucs Cassini)与马拉尔迪(Maraldi)。来华之前,在神学、哲学、希伯来文、天文、地理等方面皆有很高造诣。"时人皆期其在学界中享盛名",然他发誓"传教远方"。③ 1721 年 3 月 7 日从法国出发,1722 年 6 月 27 日抵广州,次年 4 月 9 日抵北京。先从巴多明习满语,"进步甚速",不久即为拉丁文教师,训练满族翻译人员与俄国人交涉。在京生活了 36 年,认真学习汉语,研究中国文化。1749 年为伦敦皇家学院联络会员,1751 年被选为巴黎科学院通讯员,同时任铭文学院通讯员。

宋君荣读书既多,又能强记,治学态度严谨,是 18 世纪汉学家中的佼佼者。雷慕沙认为他较巴多明、张诚"丰瞻","不似"马若瑟、傅圣泽"拘

---

① 这是因为,开始时,佛雷烈对于中国天文、若干中国史家对《竹书纪年》、尧时洪水、秦始皇焚书以后之经书等问题发生疑问,故冯秉正作此签书。此四信札载入《中国史》,时间分别是 1735 年 5 月 23 日,1736 年 10 月 19 日至 28 日,1737 年(月日未详)和 1738 年 11 月 16 日。[法]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 613 页。

② [法]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 613 页。

③ [法]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 688 页。

泥”，而“又不似”韩国英“感奋与浅薄”，他的研究“皆以学识鉴别，究其根底”，虽有“文体艰涩”之缺陷，但并不影响他“著述”“全书”的“价值”。①

宋君荣对中国科技史、古代史、边疆民族史、中外关系史等方面都卓有成就。著、译作主要有《中国天文史略》(1729)、《中国彗星简录》(1737)、《中国天文史纲要》、《元史与成吉思汗本纪》(1739)、《大唐朝史》(1791—1814)及其附录《中国年代纪》(1814)，翻译和注释有《书经》(1770)、《易经》和《礼记》等，总数达80部之多，不仅表明他确实“精力过人”、“刻苦努力”，也说明他的“才华超群”，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在材料的掌握和熟悉程度上，甚至令中国的学者都感到吃惊，由此有“18世纪最伟大的汉学家”、“耶稣会中最博学者”之称。②

他的《中国天文史略》一书，编入苏熙业神父辑刊第三册，法文本于1729年巴黎出版，四开本，附有注释，后有附录五个部分：即：中国干支，《书经》中之日蚀，《诗经》中之日蚀，《春秋》首见之日蚀和纪元三十一年之日蚀。雷慕沙认为，“是编引证中国经籍最富，可以完全信任其非伪”，天文家认为，该书“为科学获益不少”。③ 他们还曾计划将宋君荣所有天文撰述汇辑为两类，将其推算一一覆核，附以注释。《中国天文纲要》分上下两篇，被编入苏熙业神父辑刊第三册。上篇叙述古代起至汉初的天文；下篇叙述汉初至15世纪的天文。其中列举的主要事例有：中国分度与吾人分度之对照表；中国星宿表，四至表，求每年诸日太阳所在之赤道与十二宫图；中国测算日蚀、月蚀的方法，中国各地月蚀的测算；中国测算金、木、水、火、土五行星运行的方法；中国日蚀表，中国月蚀表等。④ 他的《元史与成吉思汗本纪》(*Histoire de Gentchiscan et de toute la dynastie des Mongous, ses Successeurs, Conquérans de la Chine*, 1739)就是对中国北方几个民族研究的结晶。原稿在1728年8月8日邮寄。很早以前，宋君荣就对中亚、东亚被称为“半野蛮的民族”在历史发展中“所占地位之重要”引起重视，他十分怀疑中国史书中所记载的鞑靼、蒙古、突厥、匈奴，“即是残破亚洲及一部分欧洲之 Tartares, Mongol, Tures, Huns”⑤，后来他又在中国史书中发现明确

① [法]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685－686页。
② 忻剑飞：《世界的中国观》，学林出版社，第131页。
③ [法]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694页。
④ [法]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695页。
⑤ [法]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698页。

的记录，于是撰写了《元史略》(1725)，寄给了杜赫德和苏熙业神父。但《元史略》只是关于中国元朝和这些民族的一个大概介绍，因此后来他又写了这部《元史与成古思汗本纪》，同时寄送地图两幅，以供参考。时人对于蒙古史了解甚少，而对于蒙古人的起源以及其他诸要点，所知也不多，尤其是康熙时诸传教士对于满洲、蒙古、长城一带的地图测量工作尚未开始，所以这方面的资料更缺，这两幅地图更显得重要。尤其引起研究者重视的是，宋君荣在撰写该书时，能"博采中国史书"，"凡不解汉文而得与波斯人流传关于中纪亚洲史之记载共比较若"，这样，该书在这方面成了独一无二——"独赖是编"的了。[①] 他的《大唐朝史》(*Abrégé de l'Histoire Chinoise de la Grande Dynastie T'ang*，1791—1814)也是关于中国古代、边疆民族和中外关系史的一部出色著作。该书跟他的其他著作一样，也"多取材于正史中之列传"，并在书后附以注释。跟前本书一样，宋君荣在本编论述的也是亚洲高原诸族部落。宋君荣在致德经信中这样写道："迨余接到世人对于所寄唐代史之评论后，乃将所辑汉，晋、六朝以及鲜卑、匈奴、拓跋诸朝与夫《五代史》等记录继续寄还，并以契丹、女真、宋、明与清初之史录附焉诸录"，"皆经整理完竣。"(1755 年 10 月 31 日)[②]这样他对这些民族部落的迁徙原因，以及西方罗马帝国时期跟这些民族的关系，这类民族的风俗习惯、制度等，都做了不同程度的介绍和分析。法文本《中国年代纪》(*Traité de la Chronologie Chinoise*)，虽以《大唐朝史》的附录形式出现，但其学术价值仍被学术界看好。他在致奥特拉耶信中说："余在是编中拟将中国史书确实记录与古今史家评鉴诸说悉为列举"，"并以诸经与他书足以阐明中国古代之记载附焉。"[③] 比欧(Biot)认为："是编写本为君荣最重要之撰述"。[④] 本书始由萨西主持与雷慕沙赞助刊行，与《唐史》续编合订，单行本于 1814 年在特若特(Treuttel)和维尔茨(Würtz)书店出版。"宋君荣说明中国人对其年代之思想，与夫吾人对此年代应有之态度。其说以为自尧(纪元前 2357 至 2255)以来年代大致可以视为确定"。[⑤] 宋君荣说到诸经时，对于白晋、马若瑟等的解说提出异议，其用意不在反对在中国经书中寻

① [法]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 698 页。
② [法]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 699 页。
③ [法]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 700 页。
④ [法]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 700 页。
⑤ [法]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 701 页。

求教义遗迹，而是不赞同对经书过于自由的解释。[①]

他翻译和注释的中国古籍，以《书经》译注最为重要。《书经》语句简略，但难读懂。宋君荣虽辅以满文译本，也遭遇很多困难。译本曾经波蒂埃重校，刻于《东方圣经》之中，为四开本二册，1852 年巴黎出版。译本前有宋君荣序。评论者认为，此序甚为重要，因为"凡《书经》流传之沿革，年代"，"《书经》之天文，《尧典》中星宿之解说，《书经》所载日蚀之讨论"等，"皆备见序中"。[②]

3. 钱德明（Jean Joseph Amiot，1718—1793），法国土伦人。18 岁在里昂入会，初教授古典学，不久便开始研究哲学、神学全部课程。1750 年来华，先到澳门，后转北京。在华 42 年，一面传教，一面致力于中国民族、中华帝国的方言和历史艺术研究。他"学识鸿博"，"满具热情，勤于工作"，[③]在人文科学方面涉足之广，令人惊奇，也是传教士中"饱学多才"之士。他不仅被认为是继马若瑟、宋君荣之后的法国传教士中"有功于科学、文学""无逾于"者，[④]且被誉称为"精赅侔宋君荣，而博雅过之"的传教士。[⑤] 因他在汉学上的成就，在当时也是个佼佼者，因此有幸被后人立传。

《历代帝王年表》（1769）写于北京，按甲子排列，始黄帝六十一年（纪元前 2637），迄当时在位之帝。此表经乾隆帝改订刊行。《中国通史编年摘要》并叙论一篇（1770）撰于北京，是钱德明对《年表》的说明与补编，叙论一篇，本文四篇，但仅后三篇付印。第一篇中国民族重要特性之说明，动物、祭器、卦象，重要部分是为中国古今度量衡的准确图形。诸图附有说明 25 页。第二篇（即付印的第一分篇），包括神话时代，据中国传说为简单之说明。第三篇（即付印之第二篇）为传说时代历史，始伏羲，迄皇帝，凡十一帝，824 年。最后一篇包括历史时代，发表议论较多，文不全。写至禹，后稿已佚。但"叙论颇为重要"。[⑥] 他的译作《御制盛京赋译注》（*Eloge de la Ville de Moukden*，1770）原为汉、满文，经钱德明译为法文，加以注释，巴

① ［法］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 701 页。
② ［法］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 697 页。
③ ［法］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 875，877 页。
④ ［法］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 876 页。
⑤ 莫东寅：《汉学发达史》，第 85 页。
⑥ ［法］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 888 页。

黎刊行。译文并附有东三省地理物产，以及中国古俗与三十二体字[1]的说明。另有乾隆御制两篇：咏茶和咏某村荒年发现藏谷之事。有评论者认为：钱德明翻译此书"偏重于意译，未免疏舛"[2]。他的《由载籍证明中国之远古》(1775)，附图，撰于北京，文后有图三十八幅，附以说明，是中国史籍的总表。在年代的看法上，钱德明跟其他教士不甚相同，他把时间上溯至帝尧以前，将其他人认为的神话时代也列入历史。他所以有这样的看法，主要根据是如下四份资料：(1)已经保存久远的传说；(2)《易经》中之伏羲画卦；(3)《书经》、《诗经》、《春秋》等经文证明；(4)司马迁的《史记》。他的理论是中国的编年史"是为世界最真之撰述，足备学者之参考"，较其他国家的史籍更为可取和可信。[3] 但他的这一说法并没有得到所有学者的赞同。

他对儒家作品的翻译和研究，主要体现在他的《孔子传》(*Vie de Koung-tsée*，1784)、《孔传大事略志》(附图二十四幅)和《孔门诸大弟子传略》(1784 或 1785)中。《孔子传》撰于北京，是钱德明"最博声誉撰述之一种"。[4] 据作者自己说："本书材料皆采之于一切珍贵汉籍，如正史，别史，经序，《论语》、《家语》、《史记世家》、《阙里志》、《圣门礼乐统》、《四书人物别考》、《古史》(后三书名皆从音译)等书"，"余将为孔子诸史家之史家，至若批评鉴别，则待他人为之。"[5]传后附有年表、图说、孔门世系(始纪元前 2637 黄帝在位之时，迄纪元后 1784)和圣迹图一百多幅，但刊行时，出版者将大量图片删去，只留一些重要的。《孔门诸大弟子传略》撰于北京，内有颜回、曾参、子思、孟子、子路诸传。

钱德明也是个语言天才，他不仅在汉语方面发表了自己独特的看法，还编有《满语语法》(1788)、《满法字典》、(1789—1790)、《数种语言对照字书》(即藏语写梵文、藏文、满文、蒙文、汉文)、《中国诸属国文字》等。他的《数种语言对照字书》"在宫内纂辑，命精通满、蒙文之人，与中国翰林，西藏博士合纂"。据雷慕沙引钱德明说法，"是编与其谓字书，勿宁谓为一

---

① 乾隆时期，欲用中国旧有各字体印行，于是集 32 种字，并为满文制造 32 字体以对汉文。

② [法]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 882 页。

③ [法]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 885 页。

④ [法]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 888 页。

⑤ [法]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 888 页。

种佛徒所用之神学、哲学、道德学选录”。[①] 译文仅以汉文、满文做根据。《中国诸属国文字》，稿本二册，巴黎国家图书馆汉文藏书编 986 号。是编西藏文、天城体梵文、波斯文等字都有汉文对照，并经钱德明用拉西字注其音读。关于汉语起源问题，他还从中国古史进行许多文化学意义上的考证，并以裁判者的口气否定了中国文化起于埃及说而独树一帜。当时英、法学者曾为赛索斯特利人（Sésostris）侵略亚洲时，是否有埃及移民从尼罗河畔迁徙至极东之问题争论不休，为此又引出埃及象形文字与中国古象形文字有若干相类点，甚至还有人提出中国人为埃及人移民后裔的说法。虽然巴多明早已驳之，但当都灵城发现一阿伊西斯（Isis）身像，上有埃及象形文字时，这一问题又重新提起。钱德明 1764 年 10 月 20 日的信为解决这一问题起了仲裁的作用。他明确指出：“此半身像上之文字与汉文毫无关系”。[②]

钱德明还知音乐，善吹笛，弹翼琴，他对中国古代音乐舞蹈的研究颇为精审，在西方传教士中也不多见。可以说，“对于法国了解中国音乐并使之在法国传播，贡献最大的作者，无疑就是钱德明神父”。[③] 他的中国音乐著作主要有两部，一是 1754 年对清朝大臣、文渊阁大学士李光地的《古乐经传》的翻译，另一部是他 1700 年于北京写成的《中国古今乐记》（*De la musique des chinois, tant anciens que modernes*），此外还有一些零星的文章。《中国古今乐记》是他有关中国音乐的重要著作，1776 年在巴黎出版问世。在编写过程中，曾一度弃置，后经宋君荣鼓励，于是先把《古乐经传》翻译成法文，然后自己撰写。全书包括“撰写这部著作的宗旨”，“中国音乐史概要”，“中国的乐器等”（八音和八种乐器、律准、古人调整五弦琴和七弦琴的方法），“中国人的音乐大系”（律吕的发明和十二律、律吕的度量、律的相生、音阶、7 种调式和 84 种移调、和声）几个部分，钱德明的结论是：中国乐制发源甚古，在其他国民之前。他的《中国古代宗教舞》（1788 年 9 月 12 日）写于北京，32 页，附有不少墨画，稿本藏西班牙京城马德里 5 家图书馆。

此外，他还为巴黎王室图书馆赠送了许多画册（25 本）、画卷（38 卷），

---

① ［法］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 884 页。

② ［法］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 881 页。

③ ［法］陈艳霞著，耿昇译：《华乐西传法兰西》，商务印书馆，1998 年，第 44 页。

所绘内容包括庙宇、宫殿、别墅、温室、炉灶、坟墓、牌楼与其他华式建筑物；北京的离宫，中国各地风景；中国米粟、蚕、鸡鸟、果实、盛果的瓶碗、妇女衣扣首饰等，还有名人、军将、理学家、法家、诗人等画像。

4. 韩国英（Pierre - Martial Cibot，1729—1780），法国里摩日人。18世纪法国来华传教士的殿后者。16岁在阿奎塔尼教区入会，教授古典学，肄习神学后，请求来中国传教。1758年离法，1760年抵达北京。在中国生活了22年，其中20年在北京度过。韩国英"多才，通文学"，对于一切科学"皆有禀赋，兼具热心"，因此"凡有所为莫不成就"。[①] 他撰述甚丰，遗留下来的著、译作达60种之多，都收在《关于中国之记录》中，如《中国陶器》、《说桃树》、《说木树果子、树、赤枣》、《中国古代论》、《说娱乐庭园》、《记华人之孝》、《华人风俗习惯与以斯帖书所志风俗习惯之比较》、《记中国之犹太人》、《华人若干方剂》、《记痘症》、《论古人特别是中国古人之长寿》、《说中国之实用艺术》、《中国植物图谱》、《说牡丹》、《说皂荚》、《说蜂蜜与蜜变白色之法》、《说玉》、《说琉璃瓦》、《说朱砂、水银和灵砂》、《说硼砂》、《说中国毛帚》、《说马》、《说燕》、《说鹿》、《说蝉》、《野蚕说与养蚕法》、《说香椿》、《说木棉草棉》、《说竹之种植与功用》、《记温室》、《记中国利息》、《说可以输入中国之商品》、《志杭州府城》、《象形文字之转为字母文字》、《论中国语言文字》、别篇《论中国语言文字》，《大学》、《中庸》译本，《感想、格言、谚语》等，内容涉及中国古史、中国孝道、中国文字起源、中国植物和矿物等，且都颇有见地。

格鲁贤认为：韩国英的《中国古代论》是"耶稣会士最重要之撰述"，最值得人们注意的是其意见与其"同辈颇有纷歧"。[②] 他的看法是，中国建国的第一个帝王为帝尧，而"尧以前之七帝为神话中人"。[③] 韩国英的这一说法虽然也有赞同者，但大多数学者持反对意见。韩国英的《中国古代论》原计划如下内容：1. 列举文人对于古代之立说；2. 列举尚存于世之古籍；3. 介绍后来撰修太古史之史家；4. 嗣言有人拟上溯至宇宙创造时之神话时代；5. 最后审查立国与有史之初应断自何时。"前四篇构成此《论》的第一部分，末篇盖为绪言，构成第二部分之全部。"格鲁贤云："其后似曾经深

① ［法］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938－939页。
② ［法］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941页。
③ ［法］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941页。

思熟考,而将原意变更。盖其后此刊布诸作,毫无维护初说之文也。"①

他对中国语言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他的《象形文字之转为字母文字》、《论中国语言文字》等著作中。他的《象形文字之转为字母文字》志在"证明中国文字四千年来尚未能转为字母",被认为"立说颇巧",②而在《论中国语言文字》中,则侧重于"哲理"而不主要是"文法",附注中常因一字发挥及于地理、人口、文学、艺术、法律、风俗、习惯,其中夹杂有《诗经》的若干译文。他的别篇《论中国语言文字》,详述汉字的发明、起源、六书,及其对道德、艺术、历史、宗教、风俗习惯之适用。再述古今书籍与可能学习中国语言的方法。③

第四节 京都巴黎汉学家

正当来华的传教士在汉学研究方面取得极大成绩时,法国本土的中国研究也悄悄兴起,并出现了一批卓有成就的汉学家,他们之中有传教士,也有学者,如杜赫尔德、佛雷烈、傅尔蒙、德经、小德经和北京传教团派往巴黎完成学业的中国学者黄嘉略、高类恩、扬德望等。

一、杜赫德、佛雷烈、傅尔蒙

1. 杜赫德(Jean Baptiste Du Halde,1674—1743),18 世纪法国著名的耶稣会士之一。1692 年 9 月 8 日进耶稣会,1708 年在巴黎书院任教,随后被选为巴黎耶稣会总书记哥比安(Charles Le Gobien)的继承人,哥氏是收集整理各国有关耶稣会士信件的负责人,皇帝的忏悔神父勒特利(P. Letellier)的秘书。1729 年脱落梧(P. Trevou)去世后,杜赫德成为雷让(Regent)之子奥尔良公爵(Duc d'Orléans)的忏悔神父。1734 年 8 月 18 日逝世于巴黎。④

杜赫德学识丰富,治学严谨,精力惊人,他的主要功绩是整理出版 18 世纪的汉学著作:《通信集》和《中华帝国全志》,对中国思想在 18 世纪欧

① [法]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 941 页。

② [法]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 945 页。

③ [法]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 945 页。

④ 阎宗临著,阎守诚编:《杜赫德的著作及其研究》,《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第 48 页。

洲的传播起了重要的作用，且影响深远。评论家们认为：在18世纪，常把“中国作为榜样而加以引述”的有两类作家，一类是自然神论者，另一类是经济学家，他们都被耶稣会士“奉为大师”，而在这些“具有深刻影响的大师中”，“德高望重的当首推杜赫德”。①

评论家在谈到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志》时这样写道：“总之，他是一个文笔简朴、严谨，有判别力和韧性的人，始终受着理性和真理的支配。”②在与耶稣会士的纠纷中，杜赫德保持客观的态度，《学者报》写道：“尽管他有点自负，但考虑到传教士们的文字关系，杜赫德承认，由于传教士们把旅行当做自己的主要目标，并把注意力集中到这个目标上，因此，在充满于他们作品中的事物描写上没有保持足够的谨慎，没有能使之准确可靠，他们有点太附会中国。杜赫德所采取的态度是客观而机智的。”③

在作品中，杜赫德一方面以自己的丰富感情和博大的胸怀，兼收并蓄，容纳他人的观点；另一方面，他又“精练了这篇作品，纯化了这篇作品”，因为传教士们的作品“太古色古香和太具有中国式风格，而这会使法国人感到刺耳”。④

2. 尼古拉·佛雷烈（Nicolas Frérer，1685—1749），法国18世纪大思想家，金石和美文学科学院大文豪。戴密微认为佛雷烈是“18世纪最富猎奇精神、治学最严谨和最具自由主义思想的思想家”。⑤ 当皇家图书馆馆员毕尼翁（Bignon）神父利用福建人黄嘉略（Arcade Hoang）来法国进修成立法国学者小组时，佛雷烈便是小组中的一员。他对中国的历史和纪年学特别感兴趣。当时关于中国年代问题有大量的争论，在这场利益之争中，他就提出了跟当时传教士不同的看法。他对《圣经》中的纪年提出了质疑，认为，中国的纪年是不以亚当作为人类纪年的开始，也否定了“索隐派”的中国古代的神（天）就是犹太基督上帝的说法，从而拒绝把一切起源归于西方的错误观点

他与同时代的人一样都对中国的方块字感到吃惊，从而使他如同莱布

① 阎宗临著，阎守诚编：《杜赫德的著作及其研究》，《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第50页。

② 阎宗临著，阎守诚编：《杜赫德的著作及其研究》，《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第49页。

③ 阎宗临著，阎守诚编：《杜赫德的著作及其研究》，《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第49页。

④ 阎宗临著，阎守诚编：《杜赫德的著作及其研究》，《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第50页。

⑤ ［法］戴密微：《入华耶稣会士与西方中国学的创建》，载《明清间耶稣会士和中西文化交流》，第181页。

尼茨一样梦想产生一种“世界通用语言”。[①] 此外，他还写了《论汉语语法》，其后还附有汉文词汇，但该书始终未能刊行。[②]

福建人黄嘉略去世（1716）以后，佛雷烈继续在金石和美文学院做有关中国的报告，但有关中国的问题已不再是他事业的主要内容。

3. 傅尔蒙（Etienne Fourmont，1683—1745），18 世纪法国学者。年轻的时候，就读于麻萨兰学院（Collège Mazarin），后任家庭教师。当福建人黄嘉略赴法进修时，教皇路易十四令傅尔蒙学习华语，因此，他也是那个学者小组的成员之一。后来他成了皇家学院即后来的法兰西学院阿拉伯语教授，但他对从事中国学研究持有抱负，仍继续研究汉文，写有《中国文典》（*Grammatica Sinica*）一书，也翻译为《双解语法书》或《双向语法》。也就是说既使用汉文方块字，又使用对音转写的语法书，为 500 多页的巨著，1742 年（乾隆七年）刊出。有评论认为，此书不过是以西班牙教士瓦罗（万济国 Francisco Varo）的华语官话文法为蓝本，译成拉丁文，又剽窃了马若瑟神父的《中国语杂记》而成，在学术上并无创意。

关于这位学者，评论界颇有微言，认为他是一个“平庸的学究和办事无条理的人”[③]，“其学智品性，颇无足取”[④]，但法国初期汉学研究者德经（Joseph de Guignes）等，均出其门，故对于中国研究有“筚路蓝缕之功，终不可没焉”。[⑤]

二、戴早莱、德经、小德经

1. 戴早莱（Michel - Ange - André Le Roux Deshauterayes），傅尔蒙侄子，后为皇家文库译官，管理汉满语。曾为校刊冯秉正《中国通史》出过力，为世人所称赞。

2. 德经（Joseph de Guignes，1721—1800），傅尔蒙之出蓝弟子，1736 年执赀傅门，1742 年，傅尔蒙《中国文典》成书后，曾偕同他一起共谒教皇，得

① ［法］戴密微：《入华耶稣会士与西方中国学的创建》，载《明清间耶稣会士和中西文化交流》，第 183 页。

② ［法］戴密微：《入华耶稣会士与西方中国学的创建》，载《明清间耶稣会士和中西文化交流》，第 183 页。

③ ［法］戴密微：《入华耶稣会士与西方中国学的创建》，载《明清间耶稣会士和中西文化交流》，第 182 页。

④ 莫东寅：《汉学发达史》，第 89 - 91 页。

⑤ 莫东寅：《汉学发达史》，第 89 - 91 页。

到奖金。傅尔蒙去世后,他与同门戴早莱共同担任王室文库官。1748年,在巴黎刊出《匈奴突厥起源论》,名重一时。1756年刊出巨著《北狄通史》。此书以中国史籍与欧洲记述对照,比较异同,"为18世纪法国汉学界杰作"。[①] 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虽然社会动荡,他仍然服务于博物馆,不废所业,曾试译《春秋》,但没有完成。他曾发表汉民族为埃及移民、中国人为埃及殖民的论点,虽然受到钱德明等教士驳斥,但在当时却很有影响。他是当时欧洲最著名的汉学家之一。

3. 小德经(Christian Louis Joseph de Guignes,1759—1845),德经之子,继父研究汉学。1784年,被任命于法国驻中国长驻代表和广东领事。1794和1795年,陪同荷兰使团被派遣出使中国。此后,发表有《1784—1801年间在北京、马尼拉和法国岛的游记》。他在这部游记的附图中,发表了一幅清代中国人的音乐图版。这幅图版名为《天子万年》,而德经译为《皇帝万岁》。不过,在这部书中,他对中国音乐的看法十分肤浅。他曾受拿破仑第一的命令,编著《汉法拉丁字典》,并于1813年刊出。该字典,"体势堂皇,象征大帝国事业之一斑",[②]但是,尽管"规模浩大"有"名副其实"的"高雅气派",实际上只是意大利人姬茂纳(Basilio de Germona)的《汉字西译》(*Dictionarium Sinico - Latinum*)稿本为据附以法文翻译而已,"只不过是小德经剽窃而来的作品"。[③]

三、黄嘉略、高类恩、扬德望

1. 黄嘉略(Arcade Hoang,1679—1716)跟高类恩、扬德望一起,是三位巴黎京派学者中的中国人,北京传教士派往巴黎完成宗教和文学学业的学者。

黄嘉略于1702年受来华传教士委派赴法国进修,并准备接受神父职位。他的到来,引起法国著名学者、思想家佛雷烈的注意,后者便聘他在皇家图书馆工作,让他管理耶稣会士从中国寄来的大量图书。皇家图书馆馆员毕尼翁(Bignon)是一位对中国颇有研究的修道院院长,他便利用这一机

① 莫东寅:《汉学发达史》第89-91页。

② 莫东寅:《汉学发达史》,第90页。

③ Paul Demiéville, *Aperçu historique desétudes sinologiques en France*, I.[法]戴密微《法国汉学研究史》,中译文见《法国当代中国学》,第20页。

会,接受撰写汉语语法和汉语词典的工作,于是在黄的周围聚集了一批学者和教士(当然包括佛雷烈和毕尼翁等人),准备编写有关汉语书籍。但是,他们编写汉语语法和字典的事,因黄氏的去世而受到挫折,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果。① 有趣的是,黄氏本人则在法国教士与学者的协助下,曾完成过一部《汉语语法》(*Essay de la grammaire chinoise*)书。该书的手稿现存巴黎国家图书馆抄本部,编号为280,另外巴黎天文台图书馆、巴黎外方传教会档案室也有这部书的部分稿件。书稿除序言外有两大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汉语语法,第二部分是介绍中国概况、政府现状、中国文人、食用食物等。在第一部分中,作者先从总体上论述了汉语的语法,然后对汉语词汇、汉字的起源、官话与方言、礼仪用语、对话,以及书信、收据、悼词等一一举例做了介绍。该书的主要贡献并不在理论上,而在于"实用",因为,黄本人对汉语语法并无深入研究,而且,作为教材的编写目的十分清楚。这从黄完成书稿后呈送给摄政王奥尔良公爵的一段呈文中可以看出。这段呈文是这样写的:"……兹者修成通中语一书,兼夫小录,以佐西方志士学习中土语言风俗礼统者也……",故评论认为,实际上黄氏的语法书,是一部"以欧洲读者为对象","实用性很强"的"汉语常识简介"。②

2. 高类恩(Aloys Ko)和扬德望(Etienne Yang)同黄加略一样,也是北京耶稣会士们派遣到法国完成宗教和文学学业的中国人。他们于1754年到达法国,1759年被接纳入耶稣会。当1762年耶稣会士们的学院被关闭并于1764年颁布对耶稣会的禁令时,他们便由王国政府负责照管,并由王国政府向他们发放年金。这是因路易十五统治时期贝尔坦(Bertin,1719—1792)和杜果(Jacques Turgot,1721—1781)两名大臣的关照。贝尔坦时任国务秘书,他的职务使他成为在华传教士们的保护人和引人注目的通讯人。他与这些传教士们交换的书简现存法兰西学院图书馆。杜果是路易十六时代的财政大臣,他曾进行经济改革,名噪一时。两位大臣都非常关心中国,他们曾想利用这两名中国人在中国本土进行调查研究,搜集某些能引起法国兴趣的资料。但是,当高类恩和扬德望于1766年返回中国时,乾隆皇帝的中国已不再支持基督教徒,甚至不赞助西学,因此高、扬两人似

① 佛雷烈只写过一篇"汉语语法论文",后面附有"汉语词汇表",但没有发表。见 Paul Demiéville, *Aperçu, historique des études sinologique en France*, I.

② 许明龙主编:《中西文化交流先躯》,第279-281页。

乎也并没有出色地完成两位法国大臣所委托的使命。不过,高好像也编写过一本《中国古代史》。①

第五节 传教士对汉学领域的开拓

18世纪的法国,无论是来华传教士,还是巴黎的京都教士和学者,他们以对中华文明的热情,投入了中国研究,或实地考察,或致力于中国经典的翻译和研究,使得"草创"时期的法国汉学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下面择其要者加以论述。

一、推出更具学术性的中国史地书

对于中国历史、现状和地理的研究工作,法国传教士们比起前辈来,一个明显的特征是,更注重史料的调查研究和实地考察,所以他们的著作也更具科学性和学术价值。

这时期的历史和现状的作品有冯秉正的《中国通史》,宋君荣的《大唐史纲》及其附录《中国年代纪》,韩国英的《中国古史》,李明的《中国现状新志》,白晋的《康熙皇帝传》等,尤以冯秉正的《中国通史》因其资料翔实可靠,影响最大。

这一时期,法国传教士对满蒙等中国边缘地区及少数民族的调查、研究、介绍,也做了不少的工作,如宋君荣的《成吉思汉及蒙古史》(1739),张诚的《鞑靼纪行》,刘应的《鞑靼史》等,都是前人所难及项背的。张诚的《鞑靼纪行》,是作者八进八出满蒙等地所见所闻的忠实记录,详细地介绍生活在这个地区的满、蒙古、回等民族的历史、生活、习俗和宗教,比卫匡国的《鞑靼战纪》和南怀仁的《鞑靼旅行纪》视野都要宽广,也更富科学性;刘应的《鞑靼史》因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对中国北方民族的研究纠正了多尔普罗《东方文库》(初版)中的许多错误而富有学术价值,渐渐地引起学者们的注意。

在地理方面主要有丹维尔(D. Anville)的《中华新图》(*Nouvel Atlas de la Chine, de la Tartarie chinoise, et du Thibet*)。该书是西洋传教士对中国科

① 参阅[法]戴密微:《入华耶稣会士与西方中国学的创建》,载《明清向耶稣会士和中西文化交流》,第184页。

技有重大影响的有两项集体工程之一(另一项是明末的修历,这与法国传教士关系不大),于康熙、乾隆年间完成,从事情的缘起到结束,法国传教士始终都起着主导作用。先是张诚趁中俄尼布楚谈判之际,把自己早已绘好的亚洲地图进呈康熙,并指出中国东北部分因地理知识缺乏,无法绘制,建议皇帝组织一次全国大地测量;后来巴多明来华,他在查阅各省地图时,也发现有许多府县城镇的位置与实际情况不附,于是也上奏皇帝,请求重新绘制全国各省地图。法国传教士的奏议及中国旧地图所存在的问题,促使玄烨下定决心绘制全国各省地图。这一工作就由巴多明和雷孝恩主持,从事者有法国传教士白晋、杜德美(Pierre Jartoux,1669—1720)、潘如(也译山遥瞻,Guillaue Bonjour,1670—1714)、德玛诺(Roman Hinderer. Henderer,1669-1774)、德国人费隐(Frielli,死于1740)、葡萄牙人麦大成(Cardoso)等。他们分头负责,于1708开始,自关外各地渐及内地各省,终于于1716年完成了实地测量工作。回到北京,各人将所绘部分送上,进行统一审查,后又加入西藏地图,并参考了朝鲜所绘的半岛地图,在杜德美的监督之下,于1717年,合成一幅中国地图,献给皇帝,被赐以《皇舆全览图》。传教士将地图原稿送往法国,收入杜赫德编著的《中华帝国全志》。在收入之前,杜氏请当时法国著名的宫廷图师丹维尔为之制版,共12页。第二年海牙版的《中华帝国全志》上略去此图,于1737年以《中华新图》单独在荷兰出版。

这次测量工作十分艰巨。当时条件很差,中国的地域又广,传教士们工作的辛苦可想而知。据史书记载,法国教士潘如在云南实测时,因劳累过度,为瘴气所袭,殉职边界。

《皇舆全览图》并不完全,因为康熙年间新疆奴隶主贵族经常叛乱,教士们不能前往测量,直到1755年叛乱平息以后,乾隆才派蒋友仁、明安国赴新疆绘制测量。这次的测量工作,于1758年完工,在《皇舆全览图》的基础上,制成新图,名为《乾隆内府地图》。地图原稿现存在巴黎外交部古文书馆,乾隆时期的抄图,有41幅存在沈阳故宫,有400幅存北京故宫。①

法国传教士所绘制的地图,像冯秉正的《中国通史》一样,得到很高的评价,李约瑟博士认为,《皇舆全览图》"不但是亚洲当时所有地图中最好

① 莫东寅:《汉学发达史》,第83页。

的一幅，而且比当时的所有欧洲地图都更好、更精确”。[1]《乾隆内府地图》的出现，说明“中国在制图方面又走在了世界各国的前面”。[2]

二、创建西方“易学”研究

中国的哲学，是西方传教士们热衷的主题之一，孔子的学术很早就引起西方传教士们的注意，并通过他们的书信和著作，在西方上层社会，尤其是知识分子当中引起普遍的关注，法国传教士们在这方面同样做出了他们的贡献。宋君荣翻译和注释的《书经》(1770)，白晋、马若瑟、傅圣泽等人的“旧约象征派”等，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我们必须指出的是，法国传教士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与他们的前辈相比，也有着明显的不同，其主要特点是，法国耶稣会士的中国哲学研究，不仅研究的范围已大大扩大了，且他们的研究观点中，宗教色彩明显减少，学术气味显著浓厚。如果说，在第一阶段，传教士们出于传教的需要，往往把目光局限于“孔子”，忽视《孟子》、《易经》等著作的翻译和研究而出现“独尊孔儒”的话，那么第二阶段就不同了，第二阶段的法国耶稣会士们，摆脱了这一传教的目的，将目光扩大到中国各类经籍上，《易经》、《道德经》、《春秋》、《老子》、《淮南子》、《书经》、《礼记》等，都成了他们涉及的对象，并增添了理性的色彩，在这里特别要提一下的是，法国耶稣会士在创建西方“易学”上所做出的贡献。

西方的《易经》翻译和研究，曾出现过三次高潮，或称西欧的三次《易经》热：18 世纪末、19 世纪下半叶和 20 世纪下半叶。[3] 18 世纪末的第一次高潮，虽只是西方《易经》翻译和研究的初级阶段，但在中西文化交往和思想交流史上无疑富于启发性和开创性。

17—18 世纪正是西方哲学上的理性主义盛行之时，社会文化领域中的启蒙思想获得了充分发展，而中西文化交往尤其是从思想意识的交流角度来看，也正是中国文化在欧洲享有崇高声誉和发生广泛影响的时代。所以说，这一次西方《易经》的翻译和研究，不仅是西方对中国整体文化，尤其是对中国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适应了当时欧洲的时

① [英]李约瑟：《中国科技技术史》，第 5 卷，第一分册。

② [英]李约瑟：《中国科技技术史》，第 5 卷，第一分册。

③ 王淼洋：《当代西方“易经”热：特点、原因及展望》，《中国文化与世界》第二辑，耿尤明、何寅主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4 年。

代潮流，促进了欧洲的社会改革和发展。

欧洲人开始重视《易经》的翻译和研究，是在中国儒学家学说比较系统地传入的情况下出现的，从现有的材料来看，17—18 世纪，西方在《易经》研究上最有成就最能体现未来研究方向的，并不是法国人，而是德国的科学家兼思想家莱布尼茨（Gottfnied Wilheim Leibnitz，1646—1716）；最早向西方人介绍和传播《易经》的，也不是法国的传教士，而是比利时的耶稣会士柏应理（Couplet）。但是，同样也有丰富的材料可以引证，西方最早翻译《易经》，并最初做出最大努力和巨大成绩的正是法国传教士。

在西方《易经》翻译史上得到“首有其功”称誉的是法国传教士金尼阁。[①] 他所翻译的《易经》用的是当时欧洲通用的学术语言拉丁文。1626 年（明天启六年），他将包括在《易经》在内的“五经”译成拉丁文，在杭州他自己创办的印刷所出版，当时是否传到欧洲，仍有待于考证，他的译作是否失落或者沉睡在某一历史档案馆中，也情况不明，因此，他的译作当时在欧洲反响如何，无资料可查。但有许多资料可证明，作为利玛窦的弟子，金尼阁对中国哲学的主张是赞成他老师做法的，即力图在儒家思想和基督教教义之间进行调和，同时，从他有心翻译《易经》这一举动，也可以看出他并无明显的“独尊儒学”的倾向。继金尼阁之后，西方早期的“易学”家辈出，而在这批“易学”家中，“用力最勤，贡献最多”的是法国传教士。[②] 有关资料统计，在这一时期的《易经》翻译和研究著作保存下来的有近 20 种，其中大半由法国传教士完成，如白晋、马若瑟、刘应、傅圣泽、汤尚贤、雷孝恩等，都不同程度地从事过《易经》的翻译和研究工作，其中又以白晋和雷孝恩贡献最大。白晋提出《易经》是与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的哲学一样合理而完善的一部著作，要求西方人要用理性思维去理解《易经》的意义，他的《易学总旨》对“《易》数头绪”的探究，以及他与莱布尼茨通信讨论《易经》中的象数原理及其意义等问题，都直接地影响了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而雷孝恩的译本（1736）是“西方现存的第一部完整的《易经》译本”。[③]他的《〈易经〉中国最古的书》，实际上是一部对《易经》进行翻译和研究的综合著作，“首次”为西方“完整”“了解和研究《易经》提供了较充分的原始资

① 杨宏声：《本土与域外——超越的周易文化》，第 184 页。
② 杨宏声：《本土与域外——超越的周易文化》，第 185 页。
③ 杨宏声：《本土与域外——超越的周易文化》，第 188，185 页。

料”，同时也“为而后用各种现代欧洲语言翻译《易经》，提供了参考和借鉴的样本”，[①]是西方《易经》研究学术史上一部重要的著作。但要指出的是，总地说来，耶稣会士有关《易经》研究，无论是从他们的“易学”思想，或是从“来源”和“基本研究方法”来看，都“与康熙朝前后中国本土，特别是与京师官方学术圈的思潮的演进有密切的姻缘关系”。[②]

三、开始重视中国纯文学作品

欧洲的耶稣会士在对中国古籍进行研究的时候，实际上已涉及到中国的文学作品，如《诗经》、先秦散文等。但是，在法国耶稣会士来华之前，他们将中国“纯文学”作品“遗憾地忽视”了，甚至可以说是主观上放弃了这类作品的翻译和研究，尤其是中国“俗文学”的介绍和研究更受冷落。其原因是，前一阶段的传教士对于中国纯文学作品抱有一定的偏见。据说，早期最负盛名的耶稣会士之一汤若望（Jean Adam Schall Von Bell）就不赞成清顺治和木陈和尚谈论“西厢红拂”之类的纯文学作品。这种情况，到了法国传教士时期有了改观，特别是法国第二批来华传教士，情况更不一样。因此我们说，这一时期，虽然从总体上说法国耶稣会士翻译介绍的中国“纯文学”作品的数量并不多，从研究的质量来说，也尚属初步，但这是一良好的开始，其意义是重大的。它说明，西方的传教士已从自己的实践中认识到，要深明中国文化要义，单从《四书》、《五经》探究尚显不够，还必须从中国的“纯文学”作品中寻找材料。[③]

这一阶段，由于法国传教士们的努力，被翻译介绍的中国纯文学作品有：《诗经》、《今古奇观》、中国的戏曲等，尤其是小说和戏曲的介绍和研究，在中西文化交流和汉学发展史上，意义更为重大。

在《诗经》的翻译和研究方面，最先翻译《诗经》的是金尼阁，他用拉丁文翻译了《诗经》中的一些诗歌，可惜译文未曾流传下来。继金尼阁之后有马若瑟、傅圣泽、宋君荣、白晋和韩国英等人。马若瑟翻译了《天作》、《皇矣》和《抑》等共8首；后来，18世纪末，《中国丛刊》收入了《蓼莪》、《棠棣》、《文王》、《将仲子》和《谷风》等篇的译作。在研究方面，有杜赫德在

① 杨宏声：《本土与域外——超越的周易文化》，第188，185页。
② 杨宏声：《本土与域外——超越的周易文化》，第188，185页。
③ 钱林森：《中国文学在法国》，第7页。

《中华帝国志》上发表马若瑟的译作时所作的介绍，白晋的《诗经研究稿本》和马若瑟的《经传议论》等，在法国《诗经》研究史上有“开创性”的意义。[①] 而如果说，上述文章学术水平尚流于一般的话，那么韩国英为《诗经》译作所撰写的长篇介绍，就显示出一定的水平了，他在《中国丛刊》上首次向欧洲人解释了什么叫“风、雅、颂”的真实内涵。[②]

在小说和戏曲方面，这一时期有昂特尔科尔神父（Père d'Entrecolles，1662—1741）翻译的《今古奇观》中的小故事和马若瑟翻译的元曲《赵氏孤儿》，跟《诗经》的情况有些相似，这些小说和戏剧，被翻译的数量并不多，在研究上也没有什么惊人之处，但在欧洲所产生的影响却超过了《诗经》。在翻译方面，《今古奇观》当时只翻译了《庄子休鼓盆成大道》、《怀私怨狠仆告主》和《吕大郎还金完骨肉》3 篇，元曲《赵氏孤儿》也只是节译本；在研究方面，当时在法国对《赵氏孤儿》最有影响的评价，该是伏尔泰和他的朋友阿尔更斯侯爵（Marquis D'Argems，1704—1771）。伏尔泰主要是通过作品的内容来了解中国，虽也对作品本身进行了深入研究和分析，但主要是“为我所用”，阐明自己的政治、哲学主张。后者在他的 1739 年出版的《中国人信札》中，对这部元曲进行了评论，但他以“三一律”的艺术规则来衡量我国古典戏曲，显然，这在当时来说，也并不是最先进的艺术观。但是尽管如此，这些中国纯文学作品在欧洲所产生的影响仍然不能低估。[③]伏尔泰在写作他的哲理小说《查第格》的时候，就采用了《庄子休鼓盆成大道》的故事作为第二章的依据，运用中国先哲的古训，来影射法国当时社会的人心险恶，表达他的哲学主张，提倡理性；影响更大的当推马若瑟的《赵氏孤儿》译本，伏尔泰根据这个译本撰写了戏剧《中国孤儿》，不仅轰动了巴黎剧场，而且在 18 世纪的整个欧洲都产生巨大反响，在伏尔泰之后，英国、意大利和欧洲其他一些国家，也都先后出现类似的改写剧本。

法国传教士对纯文学作品的重视，尤其是像《今古奇观》、《赵氏孤儿》这一类被称为“俗文学”的小说和戏曲的重视，说明他们是试图通过这些文学作品作为“窗口”来观察中国文明。在众多的中国戏曲节目中，马若

---

① 宋伯年主编：《中国古典文学在外国》，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 年，第 25 页。

② 钱林森：《中国文学在法国》，第 7 页。

③ 范存忠：《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欧洲》，第六七章相关内容，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1 年。

瑟何以只选译《赵氏孤儿》？就因为他认识到，要想真正了解中国的文明，“纯文学”作品是一个重要的途径，他是希望欧洲人通过一部真正的中国悲剧，观察到中国文明的程度和中国人的道德观念。这种观点比起他的前辈来显然有长足进步。

总之，法国传教士对中国纯文学的重视，虽然无论从量上或是质上来说，都还是初步，但却极大地开阔了欧洲人的视野，为欧洲汉学发展打开了一个新的重要“窗口”，无疑是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一大创举。

四、出版欧洲汉学“三大名著”

法国传教士对欧洲汉学发展的贡献，还在于在他们的努力下，推出了18世纪欧洲汉学的“三大名著”：

1.《通信集》，全称《耶稣会士通信集》(*Lettres édifiants et curieuses écrites des Missions Etrangères par quelques Misssionaires de la Compagnie de Jesus*)，是欧洲旅居中国和东印度传教士们的书信和报告集，由巴黎耶稣会总书记哥比安(Charles Le Gobien，1653—1708)创办、主编，继哥比安之后，先后有杜赫德和帕都叶(Louis Patuille)任主编。第一期于1702年问世，第2年刊出了第二期以后，便成了一种期刊性质的资料汇集，直至1776年，共刊出了34卷。《通信集》分类编辑，其中第16卷至26卷，收载由中国寄来的通信。《通信集》不仅为欧洲读者“提供了有关传教区的生活”，而且用“细腻的文笔提供了有关中国的成千上万种新鲜物”，[①]引起欧洲人的极大兴趣，也为国外汉学提供了详细、生动的原始资料，尤其是有关清代的资料，所以很快地就被翻译成欧洲多种文字。但是《通讯集》内容过于庞杂，个别通信也有夸张、猎奇的之处，所以还不能算是一部学术性的著作。

2.《中华帝国全志》，全称为《关于中华帝国及满蒙地理、历史、年代、政治及物产等的记述》(*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一部多卷本的中国百科全书。该书由法国耶稣会士杜赫德主编，于1735年在巴黎出版，第2年在海牙出第2版，不久，英、德、俄译本相继问世。全书共四卷，第1卷记中国各省的地理，并有从夏至清23个朝代的历史大事记；第2卷记述政治、经济，并论述中国的经书、教育和科举制度；第3卷记述宗教、道德、医

① [法]雅克·布鲁斯，李东日译：《从西方发现中国到国际汉学的缘起》，《国际汉学》1。

药、博物等;第四卷是对中国满、蒙等少数民族的研究,并已经涉及到藏和朝鲜族。书中收录了耶稣会士翻译的十几首《诗经》中的诗歌,《今古奇观》中的几篇小故事,马若瑟翻译的元剧《赵氏孤儿》和丹维尔及其门生一起绘制的《中华新图》等。

杜赫德从未到过中国,专门从事编辑工作,在哥比安死后,担任《通讯集》主编工作,在较阅书简的过程中,萌发了写作此书的念头,于是对100多年来入华耶稣会士的各种著作、通讯,进行加工、编排,整理成此书。书中尤其对20名传教士的成果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对他们的生平做了介绍。虽然此书也还不能说是一部理论性较强的著作,但其对当时文化界的影响是巨大的,产生了"很大"的"引力",①是欧洲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孟德斯鸠等了解中国的主要资料来源。而且其资料之丰富和在汉学发展史上之重要,被评论家们称之为"明末迄于当时欧西中国研究百五十年成绩之大成,西洋汉学空前之金字塔",可"夸耀于世界之纪念碑"。②

3.《中国丛刊》,全称为《北京传教士关于中国历史、科学、艺术、风俗习惯之论考》(*Mémoires concernant l'Histoire, les Sciences, les Arts, les Moeurs, les Usages des chinois par les Missionaires de Pekin*)。虽然该书为了适应当时的社会需要,也收集了一些译文,如为了补足拉丁文译本之不足,刊出了《大学》、《中庸》的法译本,为了适应当时中国式的园林运动,刊出了中国园林诗,此外还收入了《本草纲目》这样科技性的书籍译作等。但是,从总体上来说,《丛刊》收集了各家各派对中国的论述和观点,所收论文的内容之丰富和观点之鲜明,已堪称为一部以学术性论文为主的大型"论文丛书"。《丛刊》于1776年刊出第一卷,至1814年止,历时40年,共刊出16册。先后有勃罗提业(Gabriel Brotier,1723—1789)、德经、萨西(Antoine Isaac Sylvestre de Sacy,1758—1838)担任主编。

从学术价值来看,《通信集》只是原始资料的汇编,《中华帝国全志》则主要是作者的观察和介绍,只有《丛刊》才是真正的论文集,因此,《丛刊》的出版,在汉学发展史上有其重要的地位。从丛刊的主编人员来看,我们也可以发现,已不再都是传教士,而是学者。上述的三位主编,除了勃罗提业做过短期的传教士之外,其他两位则是职业的学者,勃罗提业自己也是

① [法]雅克·布鲁斯,李东日译:《从西方发现中国到国际汉学的缘起》,《国际汉学》1。

② 莫东寅:《汉学发达史》,第87、88页。

希伯来、希腊和罗马古币的研究者。德经是法国王家学院叙利亚文教授，匈奴、突厥和蒙古史专家，萨西是著名的东方学家、波斯和阿拉伯文专家、比较文学的先导者之一。当然，真正意义上的“汉学”还远远没有出现，这些学者所从事的也主要是东方学，而不是专门的中国学，但《中国丛刊》的出现其意义却是重大的，如意大利学者奥纳洛·兰乔蒂所说：“这部巨著的出版标志着几世纪前顺利地由利玛窦开创的一种事业的完成”，说明耶稣会士的中国学已达到了一个“顶峰”。①

上述三部著作，从学术的水平来说尽管不一，但在18世纪欧洲汉学史上是有重大影响的，故被通称为18世纪关于中国的“三大名著”。

五、开创汉语教学与研究

16至18世纪欧洲“中国文化热”的一个主要内容便是“汉语热”：学习汉语、教授汉语和研究汉语，成了我国文化之西移的主要内容之一，而这时期的汉语教学和研究，都带有过渡性的特点。

1. 从个别传授到办学，从随感到专书。

根据史料记载，法国人最早提到汉语可能是1253年法王派往蒙古的传教士鲁布鲁克《东行记》中所载，他这样写道：“他们（即契丹人）使用毛刷写字，像画师用毛刷绘画。他们把几个字母写成一个字形，构成一个完整的词。”②显然，鲁布鲁克只是提到汉语，而且认识也十分粗浅。

到了16世纪，传教士的汉语研究有了进展，一个明显特征是，不仅在书信、报告或一些综合性的著作中给我们留下珍贵的资料，而且，许多传教士已致力于撰写有关汉语的论文，甚至编写专门著作。即便是在一些书信、报告或综合性著作中提及的，也不再是表面的撩影、随感，而是深入到汉语本身的特征及其规律，尤其是到了18世纪法国的传教士，就更加明显。如1769年10月15日，晁俊秀（François Bourgeois）神父在给某夫人的一封信中，谈到学习汉语困难时所做的叙述，就是很有见地的看法：

“汉语很难。我可以向你保证，它跟我们所知道的任何一种语言都没有相同之处。同一个词永远只有一个结尾，我们以性数来区别所讲东西的

① 转引自忻剑飞：《世界的中国观》，第128页。

② Michel Jean, *Le Voyage en Asie central et au Tibet*, P. 50, Robert Laffont, 1992；中译文见《柏朗嘉宾蒙古行记 鲁布鲁克东行记》，第280页。

类别和数量，而汉语却没有这种变化。汉语的动词不表明谁在做事，怎么做和什么时候做，是单独做的，还是跟别人一起做的。总之，中国人说话的时候，同一个词，既可以做名词、形容词，也可以当动词或副词，也不分单数、复数、阳性、阴性。你必须听仔细，密切关注并揣度说话的场合才行。还得注意，汉语所有的字，一共只有三百多个音节，但却可以发出表示八万种不同事物的声音，并有同样数量的词汇来表达这些事物。

"更有甚者，这些所有单音节的组合排列，好像没有任何规律制约似的。因此，为了学会这种语言，学了所有词汇以后，还必须弄懂特定的每一句话。稍有改动，就有四分之三的中国人听不懂你的话。

"对任何一个欧洲人来说，汉语的发音永远是个障碍，简直无法攻克。首先，每一个词都可以发出五个不同的声调，不要以为每个声调都是清晰可辨的。这些单音节的词，在你的耳边一晃而过，好像怕被人抓住似的。中国人还省掉不知多少个元音，几乎听不到双音节的词。从一个送气音的词接着就是一个平平的调；一个嘘音接着就是一个凹陷的音；一会儿气流通过嗓子，一会儿气流通过上腭，几乎总是有鼻音。"①

在晁俊秀神父的信中，我们不难看出，它已涉及到汉语的发音、词汇和语法等问题，还对汉语的一些主要特征和规律性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因此，我们与其说这是一封通常的信件，倒不如把它看成为一篇有见地的"中西方语言比较"文章更为合适。② 这里所举的只是一封信中的例子，至于金尼阁编写的《西儒耳目资》，汤执中(Pierre d'Incarville)《法汉字典》，孙璋(Alexandre de la Charme)的《汉蒙法对照字典》，钱德明的《数种语言对照字书》，马若瑟的《耶稣会士适用之拉丁语汉语对照字汇》，白晋的《汉法小字典》，马若瑟的《中国语言志略》和黄嘉略的《汉语语法》等，就更能显示出他们的水平。

在"汉语热"这一大背景下，是"汉语教学"的逐渐形成。当时的整个欧洲，正如利玛窦在《札记》中所指出的，神父们同中国人交流之余，就把

① Du P. François Bourgeois àmadame de * * *, lettres édiffiantes et curieuses de Chine, 1702—1776, P. 468 – 470, par des missionnaires jésuites, Issabelles et Jean – Louis Vissière, Garnier – Flammarion, 1979.

② 朱静编译：《洋教士看中国朝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221 页。

时间用于研习中国语言、书法和人们的风俗习惯。[1] 他们这样做，一方面是出于传教的需要，另一方面是为了更深入地了解中国，所以学习汉语的要求便由此而生，且越来越迫切。当时教授和学习汉语，开始都只是个别现象，或者说只是聘请私人教师，后来才在学校里出现。当时的法国也不例外。

传教士们学习汉语很勤奋刻苦，方法也很多，但对于来华的传教士来说，学习汉语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有的学得不错，有的却收效甚微。马若瑟说，许多传教士很刻苦努力学习汉语，试图使用汉语与中国人进行交流，但他们讲的话几乎不能被中国所人理解，有的虽然"博学"、"机敏"、"勤勉"，但"终其一生"也往往只能讲一些"含糊不清"的"汉语"。马若瑟自己在学习汉语方面是一个成功者，他认为这些传教士学不好汉语的主要原因是在于不去费心掌握正确的汉语语调，而这对于说好汉语是至关重要的。不过，也有持不同意见者，巴多明就认为，只要正确安排好语序，即使发音错误，也能被理解。[2]

当时一种学习汉语比较普遍的方法，是一个一个地记汉字，沙守信(Emerie de Chavagnac)说，他每天花八个小时抄字典，抄了五个月才终于学会看中文书。[3] 还有一种是采用老手带新手的方式教习中文，即由先已掌握中文的传教士任后来者的老师，如金尼阁跟随郭居静(Lazare Cattaneo)和王丰肃学中文，邓玉函(Jean Terrenz)在嘉兴随费奇观学习中文，白晋在"安菲特利特"号船上就开始教随他赴华的耶稣会士们学习中文和满文等。[4] 这些担任教学的传教士，可以说就是法国也是欧洲"最早"的汉语教师了。事实上，传教士们事务繁忙，而新来的教士又急于为上帝服务，还尚未等到中文娴熟就得开展教务活动，有些人在跟随前辈学习一段时间后，就要独自到别处开教。所以，因种种原因，这种"传承式教习制度"往往不能很好地履行，那就得靠自己努力，在实践中直接向中国人学习，特别是在传教时依靠中国助手的帮助，这就是第三种学习汉语的方法了。要指出的是，这些中国人可以说是最早的"对外汉语或中文教师"了。开始的

---

① [意]利玛窦著，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第143－146页。

② 参阅张国刚等：《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第247页。

③ 转引自张国刚等：《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第247页

④ 张国刚等：《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第251页。

时候，这些汉语教师的成分非常复杂，有商人、译员、学者，也有传教士。在许多的教师中，商人的汉语水平最参差不齐，并不是说所有的商人都不懂“官话”，但有的的确不地道，讲的是南腔北调的汉语。毋庸赘言，他们不是理想的汉语教师。利玛窦在《札记》中就曾这样写道：“那些从内陆到澳门做生意的人，都不熟习使用官话或葡语。本地的商人倒懂官话，但说得很差，因为他们习惯于用他们的地方话交谈。”他们有的“甚至不识普通书写的文字”，“只能写进行交易的文字”，而“一个中文老师若像画师一样地填写出他在语言中所缺乏的东西”，那他对任何人来说，“都很难说是个模范老师了”。[①] 比较理想的中文老师是译员和学者。传教士们或在“译员”的帮助下攻读中国书籍，或高薪聘请有声望的中国学者当家庭教师撰写中国书籍。

在西欧，随着中国文化大量的传入，许多人也有了学习汉语的愿望和兴趣，而且日趋强烈，他们请教的对象，主要是从中国回去的传教士和西去的中国人。

在早期向欧洲人教授汉语的有西去的中国人，如1681年跟随柏应理赴欧的沈福宗（Michal Tchin Fotsang），1700年随法国传教士洪若翰返法的一位中国随行人员和因法国外方传教会派遣而赴法国的黄嘉略等。沈福宗对英国的海德汉学研究帮助很大，随洪若翰去法国的那位中国人，曾在耶稣会路易大王学校教习汉语，可能是由于他在法国逗留时间太短，所以没有留下姓名。与这两人相比，影响比较大的是黄嘉略，而且他的主要活动范围在法国，所以在法国汉语教学史上记有重要的一笔。黄在法国住了10年，在法期间，他与当时的法国知识界交往甚密，其中有些如傅尔蒙、佛雷烈、德里尔（当时著名的天文学家）等是著名的学者。这些人对中国兴趣甚浓，但对于汉字，则是“目不识丁”。为了教学，黄自编有关的汉语书，不仅向他们传播了中国文化知识，同时也教授了他们汉语，把他们引进宏伟的汉学庙堂，使他们成了法国著名的非教会人士汉学家。

除个人的教学之外，当时一些学校也已开始出现了汉语教学。在西欧，最早讲授汉语课程的正是法国，1742年，傅尔蒙在法国皇家学院首次开设汉语课，开了西欧汉语教学之先声。[②] 接着，1796年6月2日法国巴

① 利玛窦：《中国札记》，第144页。

② 《汉学研究》第一集，阎纯德主编，中华书局，1996年，第9页。

黎东方语言学校创办，由汉学家蓝歌籁（Luois Mathieu Langles）教授任校长，虽然当时并没有开设汉语，只是满语，但满语的开设为这所学校成为法国乃至世界汉语教学重镇打下了基础。

汉语教学出现，促进西方人对汉语做更深入的研究，同时加速了中国文化的传播。尽管这时候的汉语教学还是零星的，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但可以说是法国，也是后来整个欧洲汉语教学的开端，意义重大，为1814年法兰西学院正式开设中国语言讲座起了先导作用。

2. 教材和辞书的编写。

学习汉语必须要有教材，当时的传教士有采用中国人的方法，把《四书》、中文辞书作为教材的，也有亲自动手编写他们认为合适的作品等。

将《四书》或辞书作为教材。

传教士们重视《四书》，把它作为教材是跟他们的“文化调和策略有关”。我们知道，利玛窦通过在中国学习与实践，确定了调和儒家和基督教，争取上层人士皈依的传教方针。《四书》是当时儒家传统的基本文本，儒学学说是明清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教士们通过《四书》学中文，自然“既可学习规范的文言文，又可了解儒家学术的基本精神，可谓一举两得”。[①] 马若瑟在他的《汉语札记》中还讲述了他如何通过《四书》学中文的情况：“首先，我抄录整部《四书》。我在练习本的左页写汉字，按照我看到的助手写字的正确笔顺，一笔一画地写。同时，我努力牢记每个汉字的各部分的意义。在相对的一页，我写下想到的各种注释与评论。与此同时，我还在单独的本子上列出人名、地名、动物和花草的名字等等。”[②]马若瑟还在每个本子上按字母做了索引，以便查找，对学习《四书》的恰当顺序、应选的注释和好处都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我们真的应该用心学《四书》，中国人从童年起就被让这么做。我们应该一到中国就开始记忆它们。”[③]被传教士们常常提到一些中国字典，如《海篇》、《字汇》、《正字通》、《说文解字》等，他们都进行了“认真研读”。[④]

第二，自编教材。《四书》果然可以作为教材，但这也只是学习汉语的

① 张国刚等：《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第251页。

② 张国刚等：《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第252页。

③ 张国刚等：《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第252页。

④ 张国刚等：《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第255页。

一种教材，而不是唯一教材，也不一定是最佳的教材，应因人而异。而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要学习外语，双语词典和语法书籍仍然必不可少。因此，在以《四书》为入门教材的同时，传教士也积极地投入编写汉语拼音读物、双语或多种语种词典和汉语语法书，这些就是欧洲早期的汉语教科书了。法国的传教士也不例外。

在语音方面。这时期的法国传教士所编写的语音书，主要有金尼阁的《西儒耳目资》，作为当时在中国的西儒们学习汉语的一种手册。

辞书方面。当时的传教士十分重视辞书在汉语学习中的作用，不仅注意到把中国人编写的辞书作为学习汉语的教材，还亲自尝试编写。

自编的，如汤执中《法汉字典》、孙璋的《汉蒙法对照字典》、钱德明的《数种语言对照的字书》、巴多明和赫苍壁（Julien - Placide Hervieu）把达内特（Danet）的拉丁字典译为汉文的《拉汉对照字典》、马若瑟的《耶稣会士适用之拉丁语汉语对照字汇》、白晋的《汉法小字典》等。除此之外，整个18世纪，巴黎一直在计划着编写一部《汉语大词典》，当然，这一工作要等到第一帝国时期（1813）才得以问世，它是由译员兼领事的小德经完成的，德经以叶宗贤的遗稿资料为基础，加以编辑得以完成，显然，其基本的资料也是这时期传教士辛勤劳动的结果。

必须指出的是，当时传教士编写的词典，大都没有出版，而且从教学角度来看，针对性也不强。但毕竟也是传教士们学习汉语的一种辅助资料。

汉语语法方面。虽然编写汉语语法书的声势不大，但传教士们的努力和成绩仍然显然可见，而且跟他们编写汉语拼音书一样，很明确地是将它作为汉语教材，从教学角度来看，比起辞书来要明确得多了。当时法国所编写的汉语语法书主要有：马若瑟的《中国语言志略》，黄嘉略的《汉语语法》，傅尔蒙的《中国文典》等。这些著作，或从当时的汉语学习，或从汉语教学发展史角度来说，《西儒耳目资》、《中国语志略》和《汉语语法》都有其重要的价值。

此外要提一下的是，通过满文来学习汉语，这也是当时耶稣会士采用的一种比较通用和方便的办法。因为清朝入关以后，将大批中文典籍译为满文，他们要服务于宫廷，需要通晓满文，而且，对于欧洲人来说，学习满文比学习汉语又来得容易，当时许多耶稣会士对中国典籍的研究与翻译正是

通过满文中介的。[1] 当然，学习满文不能代替汉语学习，所以，满文的课本我们不能把它算在汉语教科书之列。

六、汉语"起源"的论争及其意义

从17世纪起，欧洲发生了一连串有关汉语问题的论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关于汉语的"起源"问题。[2] 在这场争论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法国的传教士。

有学者认为，由于汉语本身具有"悠久的历史"，所以当时的欧洲学者中间有人把汉语认为是"最理想"或"人类最早"的语言。[3] 实际上，有关汉语"起源"问题的争论并不那么简单，而是跟这一时期东来传教士的传教政策和当时欧洲语言学界关于"人类语言起源"问题的争论有着密切的联系。

当时的欧洲，曾经围绕着"《圣经》的年代"和"埃及问题"发生过一场争论。[4] 问题是因一些学者发现《圣经·创世纪》第11章第5至9句这样的记载所引起的：

"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语言，彼此不通。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语言，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5]

根据这一段的记载，于是这些学者便认为，汉语很可能就是上帝所教授亚当的这种语言的"残存部分"[6]，而且很有可能是从埃及的象形文字

---

① 张国刚等：《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第341页。

② Viviane Alleton, *L'Oubli de la langue et l'〈invention〉 de l'écriture chinoise en Europe*, Etudes chinioises Vol. XIII, No. 1 - 2, Printemps, automne, 1994. P. 263.

③ 王力达编译：《汉语研究小史》，第128页，商务印书馆，19663年。

④ Viviane Alleton, *L'Oubli de la langue et l'〈invention〉 de l'écriture chinoise en Europe*, Etudes chinoise. P. 264.

⑤ 见《新旧约全书》，中国基督教协会，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印，1982年，第10－11页。巴别，也作巴别塔，原于希伯来语 balal，意为混乱，变乱。

⑥ Viviane Alleton, *L'Oubli de la langue et l'〈invention〉 de l'écriture chinoise en Europe*, Etudes chinoise. P. 264.

"派生出来"的。[1] 这也就是人们称之为的汉语文字"犹太式"的读法。[2]

在那个时代,认为原始的语言可能保存在远东这一看法的人并不少,理由很简单,因为早在巴别塔事件发生以前中国人可能已经跟其他民族分开,既然建塔时中国人不在现场,也就避开了这场混乱。[3]

严格地说,汉语文字"犹太式"的读法,是少数耶稣会士创造的,这些教士掌握了很多有关汉语的资料,但因受传教使命的束缚,始终无法越出"旧约象征说"的轨道,试图"通过分析汉字"来"找到基督教信仰的象征"。[4] 马若瑟、白晋、傅圣泽等耶稣会士,都无法脱俗。白晋在《中国语言中之天与上帝》一文中,为证明中国古今书籍称"真主曰天曰上帝"这一看法,便"引古代载籍,士夫情绪与俗谚"加以印证。[5] 像马若瑟这样当时以"语法家成名"且"只有宋君荣一人能与其媲美"的传教士,也犯了在"汉籍中寻找耶稣教信仰"理论和根据的毛病。[6] 他在致傅尔蒙的信中明确地表明:"余作此种疏证及其他一切撰述之目的,即在使全世界人咸知,基督教与世界同样古老,中国创造象形文字和编辑经书之人,必早知有天主。余三十年来所尽力仅在此耳。"[7]在这批传教士中,陷得最深以致达到"迷乱"程度的是傅圣泽。雷慕沙说:"诸教师中最盼在中国文字中发现基督教之秘迹者,莫逾于圣泽,彼谓其眩惑之极至于迷乱。不特以中国诸经中载有明言预言,而且以为有时在其中发现基督之根本教理。竟谓中国古籍中之某山,即是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山。誉文王周公之词,即是誉救世主之词;中国之古帝,即是圣经中之族长。"[8]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传教士都同意汉语文字"犹太式"的读法,如宋君

① Viviane Alleton, *L'Oubli de la langue et l'〈invention〉 de l'écriture chinoise en Europe*, Etudes chinoises. P. 277.

② Viviane Alleton, *L'Oubli de la langue et l'〈invention〉 de l'écriture chinoise en Europe*, Etudes chinoises. P. 277.

③ Viviane Alleton, *L'Oubli de la langue et l'〈invention〉 de l'écriture chinoise en Europe*, Etudes chinoises. P. 264.

④ Viviane Alleton, *L'Oubli de la langue et l'〈invention〉 de l'écriture chinoise en Europe*, *Etudes chinoises*. P. 277.

⑤ [法]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438页。

⑥ 《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第393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⑦ [法]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521页。

⑧ [法]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550-551页。

荣、巴多明、钱德明、韩国英等,就是一些持反对意见者。

宋君荣指出:多少传教士试图告诉人们,多亏了挪亚,汉族的子孙们才有了他们的知识、他们的道德、他们的上帝,直至他们的出生。这样的做法,其目的就是"篡改"中国思想和语言。①

费赖之在《列传》中还提供了巴多明、钱德明等传教士在这场争论中所做的工作以及有关的情况,证明他们也是一些持反对意见者。他是这样记载的:赛索斯特利人(Sésostris)侵略亚洲的时候,是否有埃及移民从尼罗河畔迁徙至极东?因为埃及象形文字与中国古象形文字有若干相类点,是否就可以证明,中国人是埃及人移民的后裔?所有这些有关的说法,本来巴多明神父早已加以驳斥,事情已经平息,但后来都灵城发现一阿伊西斯(Isis)神像,上面有埃及象形文字,一些人又将这些问题重新提起,于是钱德明被推为仲裁,并于1764年10月20日写了一封信,对此事加以证明并指出,"此半身像上之文字与汉文毫无关系"。费赖之说,该信(1773年在布鲁塞尔发表)解决了"当时英、法学者争持甚久而未能解决之一问题"。② 可见,巴多明、钱德明等神父跟宋君荣一样,在这场争论中也是举足轻重的人物。

传教士关于汉语起源问题的讨论引起社会广泛的注意,法国大学问家佛雷烈在1750年之前,就不同意汉语文字"犹太式"的读法,而同意宋君荣神父的观点,并把宋君荣"视为特别喜欢的通信者"。③ 德国大哲学家莱布尼兹,对这场争论也给以极大的关注。他一直重视汉语研究,在米勒(Andreas Müller)试图撰写《汉语入门》和蒙采尔(Christian Mentzel)准备编撰《汉语入门》时,就曾利用机会向他们请教询问有关问题,他不同意基尔歇(Athanasius Kircher)神父关于汉语方块字源于"埃及象形文字"的说法。

汉语文字"犹太式"的读法,在当今的人们看来十分荒谬,但却真实地反映了当时部分学者和传教士对汉语的一种看法和认识,所以争论意义重大。"旧约象征说"在欧洲并没有市场,汉语文字"犹太式"的读法也最终

---

① Réne Etiemble, *L'Europe chinoise*, I, Editions Gallimard, 1988, P. 204.

② [法]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881页。但该页注①认为此信并"非出钱德明手笔,乃韩国英神父所撰";又第949页也指出:此信札为国英手笔,有以属钱德明神父者,误也。

③ René Etiemble, *L'Europe chinoise*, I, P. 204.

被人否定，但是这场争论在学术界留下“难以磨灭的痕迹”，[①]直到19世纪才有所减弱。有关汉语“起源”争论的影响，也不只是在语言学上，而是涉及到整个汉学的发展，它是当时西方人对中国历史、哲学、现状认识的有机而且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这时期的传教士虽然在汉语研究方面做出了努力，并取得可喜的成绩，但他们在汉语研究方面所留下的失误和遗憾也是显然可见的。戴密微认为，这一时期的传教士虽然编写了许多词典，但无论是出版的还是没有出版的，“差不多都是”一些“内容贫乏，难以理解”的“小词典”；他们尝试编写的语法书，也是令人“相当”的“失望”，尽管马若瑟写了一部有分量的《中国语言志略》，但也要等到“1831年才出版”。他指出，传教士在汉语研究上的最大失误，是没有花大力气编写出一本“精良”的“汉语词典和语法书”。巴黎对此深有感触，整个18世纪，甚至直到19世纪初，一些汉学家主要心事之一就是试图努力“填补”这“两大空白”。[②] 这样的看法是否过于悲观暂且不论，但这一时期的传教士在汉语研究上所留下的遗憾和不足，确不可忽视。

传教士的遗憾及其原因，归纳起来可有如下几点：

其一，从语言的研究水平来说，由于当时欧洲的语言学还不发达，而传教士的汉语研究又大都只是把分析欧洲语言的一套方法搬用过来。基于这一总体水平，当时的欧洲人难以编写出高质量的汉语著作是可想而知的。[③] 传教士当然也不例外。

其二，有意无意地篡改，致使以讹传讹，造成恶果。一些传教士因受“旧约象征说”的影响，在翻译或解释中国文献时，不同程度地曲解和篡改了原文的意思。这些有意或无意的歪曲和篡改，后果十分恶劣，不仅为那些有意把中国文化纳入基督教文化的错误观点提供了方便之门，同时使得那些严肃学者的科学思考也大打折扣。这些学者，在没有中文课本、词典、语法书的情况下，无法有效掌握汉语，所以也就无法通过阅读原文来判别传教士、旅游家所提供资料的“真伪”，并无意中把错误的观点进行了传播。当时的作家和哲学家，如培根、孟德斯鸠、伏尔泰，或是杜果，都曾对中

---

① Viviane Alleton, *L'Oubli de la langue et l'〈invention〉 de l'écriture chinoise en Europe*. P. 278.

② Paul Demieville, *Aperçu historique desétudes sinologieques en France*, I.

③ 王力达编译：《汉语研究小史》，第128页。

国发生过兴趣，但是，他们的思考都有某些“不正确”的地方，因为他们有关中国的知识都获之于传教士或旅行家寄回来的资料，其中有一部分就是经过这样“删改”和“歪曲”的，又由于这些学者都是一些有影响的人物，所以造成的恶劣影响也就更大。孟德斯鸠在他的《法意》第7部分第6章写到，一个叫 Kia - Yventi 的人申言：“我们的奢侈够大了……”这个叫 Kia - yventi 的人是谁呢？实际上，这里讲的是一个叫 Kiay（贾谊）的向 Ven - Ti（文帝 Wen - ti）进言。由于孟德斯鸠是从杜赫德神父那里获得这方面的知识，而杜赫德神父自己对这一点也并没有弄明白，于是便因译音上的混乱，出了差错。[①] 伏尔泰有关中国的知识也获之于传教士或旅行家寄回来的资料，因此，他著作中所涉及到的中国内容，也有许多错误。他赞成耶稣会士认为中国人的“天”就是“天主”的观点，把中国的“天”与西方的“上帝”等同了起来。他对中国 Kieng（敬）与法文里面的 adorer（敬奉）的区别也没有明确地告诉读者。[②] 总之，当时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是在几乎无人懂得中文的情况下，完全依靠多明我会或方济各会，特别是耶稣会士的书信、回忆录和译作来评判来自中国的消息，得出他们的结论，所以错误就在所难免了。

其三，由于“文人相轻”，致使科学的成果不能得到及时的传播，从而影响了汉语水平的提高。法国当代汉学家艾乐桐指出，马若瑟的《中国语言志略》手稿，1728年就存放在皇家图书馆，但直到1815年雷慕沙在法兰西学院任教时才利用它写讲义，他的《汉文启蒙》（*Eléments de la grammaire chinoise*，也译《汉语语法基础》）明显地参考了马若瑟的《中国语言志略》。事实证明，马若瑟的语法书是一部优秀的作品，但是为什么在这段时期内一直没有引起重视？而且，人们始终认为汉语是一种“没有语法的语言”？其实，马若瑟的语法书并不是没有引起重视，而是有人出于“妒忌”，“有意”将其“束之高阁”。因此艾乐桐不无感叹地责问：“这部作品的命运不禁令人产生怀疑，有现成的资料而不加以传播，到底居心何在？”[③]

马若瑟的语法书为什么在当时不能出版呢？根据日本学者石田干之

① René Etiemble, *L'Europe chinoise*, I, P. 206.

② René Etiemble, *L'Europe chinoise*, I, PP. 208 - 211.

③ Viviane Alleton, *L'Oubli de la langue et l'〈invention〉 de l'écriture chinoise en Europe*. P. 262 - 263.

助的分析，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客观原因，因为本书列举众多条例句，需五万个汉字的印刷活字，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样的工程是不易办到的；另一个原因是有人“有意作难”。[①] 作者指出，马若瑟曾好意将稿本送给学者傅尔蒙，而后者却出于“妒忌”，不仅“剽窃”了他的稿本，“自著中国文典”，同时还“频频”放出恶风，“非难”这本著作的“价值”，因而“妨碍”了它的“公开刊行”。[②]

16 至 18 世纪，尤其是十七八世纪，是“我国文化之西被”的“重要关键”时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绝不能忽略”的重要一页。[③] 同样，作为沟通中西文化的纽带和桥梁的汉语，也在这一时期受到了西欧人极大的重视，并在研究上取得可喜的成绩。而在这一研究工作中，用力最勤，取得成果最为显著的，是来华的耶稣会士。比之第一阶段的传教士来，法国耶稣会士的研究显然已大大前进了一步，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他们的缺陷也是十分明显的。这些缺陷，要等到 19 世纪才得以弥补。

第六节　传教士与法国启蒙思想家[④]

18 世纪的法国，教会势力并未受到根本性的打击，神职人员依然是社会中最高等级，职位高者拥有丰厚收入，过着奢靡的生活。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的宗教战争也愈演愈烈。在世俗社会中，封建制度已趋于没落，政治腐败带来了经济危机和尖锐的社会矛盾，下层人们生活贫困，不满情绪与日俱增，反抗运动此起彼伏。同时，随着资本主义的出现，新兴资产阶级正在日益强大，渴望在政治和经济领域获取相应地位，而现有的制度却成为他们继续发展的重大障碍。种种迹象表明这是一个孕育着新思想、新变革的时代。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和开明贵族的代表发起了一场反抗运动。他们反对神学，高举理性、自由、平等旗帜，这就是启蒙运动。18 世纪是欧洲启蒙思想盛行的时期，而法国又是启蒙思想的故乡，一些欧洲主要的启蒙思想家就出现在法国，如被称为四大启蒙思想家的伏尔泰、狄德罗、

① ［日］石田干之助：《中西文化之交流》，第 109 页。

② ［日］石田干之助：《中西文化之交流》，第 109 页。

③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论丛·甲集》，商务印书馆，1948 年，第 80 页。

④ 该小节由葛磊撰写。

卢梭、孟德斯鸠,就出现在法国。

启蒙思想为获得有力的支持,开始在世界的范围内搜寻理论根据。一些有识之士发现中国可以作为他们的楷模。这些学者,或从传教士们发回去的大量见闻和报告中了解中国,或从传教士带回去的中国经卷中得到资料,有的还与传教士保持直接通信和交往,以获取关于中国的第一手资料,有的如伏尔泰、狄德罗,自小在耶稣会学校中学习。这样一来,我们就不难发现,东来的传教士,既为启蒙学者提供大量的资料,而同时,启蒙学者的中国观也或多或少地打上了传教士的烙印。

传教士们对中国的看法,在启蒙思想家中引起较大反响的,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中国纪元的看法

传教士进入中国不久,在中国的纪年问题上发生的分歧,影响到了欧洲的思想界。

开始时,许多传教士为了维护《圣经》的权威,宣称中国人是诺亚的后代,是洪水后的移民,并视伏羲为把中国人从犹太地区携往远东的首领之一。

作为学术界精英的启蒙学者们,在仔细研究了传教士们提供的资料后,确信中国古老文明的真实性,纷纷做出肯定,并且把这一事实作为反对神学的有力依据。

伏尔泰是这方面的代表。他不仅把中国列为其介绍世界各民族文明的专著《风俗论》的第一篇,而且开门见山地说:"我们在谈论中国人时,不能不根据中国人自己的历史……不容置疑,中华帝国是在4000多年前建立的。那些在杜卡利戎时代的大洪水和法埃通从天而降的神话中保存下来又以讹传讹的有关地球的变迁、大洪水、大水灾等等故事,这个古老民族从来没有听说过。"①伏尔泰还赞扬了中国历史修订的严谨:"中国人的历史书中没有任何虚构,没有任何奇迹,没有任何得到神启的自称半神的人物。这个民族从一开始写历史,便写得合情合见","他们与其他民族特别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们的史书中从未提到某个宗教团体曾经左右他们的法律……他们的史书仅仅是有史时期的历史。"②在《哲学辞典》一书中,作者

① [法]伏尔泰著,梁守锵译:《风俗论》,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73页。

② [法]伏尔泰著,梁守锵译:《风俗论》,第74页。

批判了神学家们的荒谬："在西方的一个省份，过去叫做克尔特（即法兰西）的那里，人们的奇谈怪论竟然发展到说中国人仅仅是埃及的殖民地人，或者说是腓尼基的殖民地人。人们竟还以为，就像证实许多事物一样，证实了一位埃及国王被希腊人称做米那的就是中国国王大禹，亚托埃斯就是中国国王后，不过是更换了几个字母罢了。而且人们更进一步竟然这样议论：埃及人有时候在夜间点燃火炬，中国人也点灯笼，所以中国显然是埃及的一块殖民地。"①他称这些人为"笔下生孩子的的人"，认为他们不相信中国的历史，就像不相信2+2=4那么可笑。

其他启蒙思想学者也对中国的历史纪年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认同。莱布尼茨在介绍柏应理神父的编年史写道："……据一般的时代计算法，我们觉得诸如伏羲和黄帝那样的第一批中国君主距洪水发生的时代太近了"，还说"除了犹太人之外，中国人在他们史书的确切性和古老性方面超过了其他民族"。②

孟德斯鸠也不怀疑中国历史的悠久。他明确表示，圣经中的洪水与中国毫不相干，传教士们记载的中国洪水比《圣经》所说的年代至少早500年。

中国历史纪年在欧洲引起对《圣经》纪年的怀疑，或至少是为已有的这种怀疑提供了佐证。这种影响对于近代欧洲的思想启蒙是极为重要的。

二、对中国人信仰的评述

启蒙学者们关心中国人的信仰，认为中国人是无神论者的主要欧洲启蒙家有培尔、马勒伯郎士、孟德斯鸠等人。培尔在他的《历史批判辞典》中认为，暹罗人和中国儒教派都是无神论。他们并且想进一步证明，在中国无神论是一种在整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培尔说："中国人的教理承认东西南北、星、山川、植物、都城、沟渠、家灶万物为神"，③而将其与斯宾诺沙的泛神论相提并论，共同归为无神论。如同许多启蒙学者一样，培尔利用中国的无神论，其实际目的是攻击欧洲的神学和教会与君权相勾结的

① ［法］伏尔泰著，王燕生译：《哲学辞典》，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321页。

② 转引自［法］维吉尔·毕诺，耿昇译：《中国文化对18世纪法国哲学家的影响》，《国际汉学》1，第153页。

③ 朱谦之：《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06页。

专政统治。

笛卡儿学派的中间人物马勒伯郎士在中国人的宗教思想上和培尔持相同的观点。他认为中国人信奉的“理”是指一种事物的本性，存在于物质之中。“总之，中国哲学家以‘理’为依存于物质，‘理’不是如‘神’为永久不变的完全存在，不是如‘神’为精神与物质所由产生，故‘理’非不灭之物。总而言之，中国哲学实不过为无神论罢了。”①

孟德斯鸠也认为中国的儒教是无神论，但与别人有所不同，他认为中同的无神论带来了一些好处，“孔教否认灵魂不死，芝诺的教派也不这样相信。谁能想到呢？这两个教派竟从它们恶劣的原则引申出一些不正确但对社会却是美好的结论。”②

把中国人归入自然神论者的思想家有莱布尼茨、伏尔泰、魁奈等人。

伏尔泰虽然说中国人信“无神论”，但这就是他自己信奉的自然神论，或者说是“有礼的无神论”。伏尔泰借用中国人的教理，目的便是为了攻击基督教。在伏尔泰看来，中国人不像欧洲人那样充斥着宗教狂热。“跟他们一道在北京生活，浸润在他们的文雅风尚和温和法律的气氛中，却比在果阿宗教裁判所系身囹圄，最后穿着涂满硫磺、画着魔鬼的罪衣出狱，丧命在火刑架上，更妙得多。”③

魁奈也同意这样的观点，即中国人崇拜万物的本源，并名之为“天”或“上帝”，这里的“天”并非有形的物质的天，而是一种主宰一切的自然法则。在他的《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中，魁奈明确指出：“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说明了广大的中华帝国的政治制度和道德制度是建立在对于自然法则的认识的基础上，而这种制度也就是认识自然法则的结果。”

处于神学向理性过渡时期的欧洲，在渐渐积累用自然和理性反对教会的力量。启蒙思想家对中国人信仰的评述，实际是以此来批判欧洲的神学。

三、认为中国人有良好的伦理道德

中国的伦理给予欧洲学者们许多的触动，并引发了很多研究。大部分

---

① 朱谦之：《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第213页，369页。

② 朱谦之：《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第369页。

③ 许明龙主编：《中西文化交流先驱——从利玛安到郎世宁》，东方出版社，1993年，第196页。

启蒙思想家对于中国人的良好道德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培尔在其《文学界的新闻》中写道："我不知道为什么基督徒们如此少地思考在被我们公开地认为是蒙昧和残暴的那些异教徒国王中盛行的宽容思想。这就是一名坚信耶稣会士们的宗教为伪宗教并与他及其臣民们宣扬的那种宗教相对立的中国皇帝，他不允许折磨传教士们，而是非常人道地对待他们。"①

除了宽容，中国君主还有别的品行值得赞赏。

欧洲人眼中中国的伦理道德是表现在各个层面的，比如他们不仅在中国的君主身上看到了这种道德的卓越体现，还认为中国政府整个统治就是建立在这种道德基础之上的，即拥有"道德政治"。这样说有两个含义，一个是从"人"的角度来讲，指整个统治阶级便是以道德为基准构成的。标志着与西方一大差别而值得注意的另重大事实是，他们全国都是由知识阶层，即一般叫做哲学家的人来治理的，井然有序地管理整个国家的责任完全交付给他们来掌握。另一个是从"事"的角度来讲，管理国家的法令制度同样建立在伦理原则的基础之上。对这一点，霍尔巴赫和魁奈都有精辟的论述。霍尔巴赫在其《社会的体系》一书中，多次提及并赞美中国，主张以中国的道德政治为模范，甚至在书中大胆宣称"欧洲政府非学中国不可"。魁奈则说："中国的法律完全建立在伦理原则的基础上……在那个帝国的统治中，一切都像它赖以建立的普遍和基本的法则之不可改变一样，是永远稳定和永远开明的。"②

中国人建立在道德基础上的政治，符合当时欧洲对于"自然道德"——即独立于宗教的伦理学说——的追求，故而西方学者纷纷以中国政府为典范，极力推荐，甚至对一些反面的事物，诸如监狱、死刑和妇女所受礼制的束缚，也加以粉饰。

除了霍尔巴赫和魁奈以外，伏尔泰也热情宣扬中国人的道德。伏尔泰在他的剧作《中国孤儿》里集中表现了他对中国人伦理的理解和赞扬。《中国孤儿》的剧情来源于马若瑟翻译的《赵氏孤儿》，只是伏氏将故事的时代移到了成吉思汗征服中国以后。伏尔泰称剧中盛缔（即《赵氏孤儿》中的程婴）"应当像是孔子的后裔，他的仪表应当跟孔子一个模样"，并把

① 《国际汉学》Ⅰ，第135页。

② ［法］魁奈著，谈敏翻译：《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72页。

此剧又名为“孔子之道五幕”。在全剧最后，成吉思汗为盛缔及其妻所感动，改变初衷，赦免遗孤，并准备把他抚养成人之时，盛妻奚氏问他：“是什么东西让你改变了主意？”他答：“你们的道德。”[①]这里，伏尔泰借用成吉思汗之口，表达了他自己对中国伦理的崇敬。另外，孔子教义中尊重理性的精神同狄德罗的百科全书派的精神极为近似。

17 到 18 世纪中国人的伦理道德在经过一定的美化粉饰之后，传到欧洲，在欧洲思想界掀起了巨大的波澜，这种不信神启，从本性中寻求真理而又体现得异常完整的道德观对于欧洲人于启蒙思想的追求无疑起了极大的推动促进作用，以至利奇温称“孔子为此世纪（欧洲）之守护尊者”。

四、对中国政体的借鉴

欧洲学者还很关注中国明清时期的政府组织形式，其关注热点又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中国政体的属性，二是政教合一问题。

伏尔泰和魁奈等启蒙思想家把中国的政治形式归为一种理想状态，并且纳入自己的理论体系。伏尔泰本人倾向于开明君主制度或君主立宪制，而中国，在伏尔泰看来，以“宽容”和“法治”著称，恰恰符合了这个标准。伏尔泰认为，一个国家要有自由，必须有全体成员都服从法律，自由即法治，他极力推崇中国的皇帝能够受法律的约束，并称“人类决不可能想象出比它（中国政府）更好的政府来”。

魁奈则是从自然法角度分析中国的政府的，他认为中国政府的成功之处在于建立了一种保障自然法则得以实行的政治形态和制度，同时，由于立法权并非君主或人民所有，而是根源于“一切物质秩序的法则”，就保证了君主和人民有着一致的目的和利益，避免争执。

中国政治形态的另一特点是政教合一，即行政的领导（皇帝）同时也是精神上的领袖（大祭祀）。

魁奈不无羡慕地说，这种政教合一的做法，可以消除许多纷争和不和。

伏尔泰极赞赏中国政府把宗教团体置于本身地位之下，他称中国是“人们了解的古老国家中唯一从未受制于僧侣的国家”。[②] 启蒙时期欧洲思想家普遍提出的限制教会特权、强化世俗和理性权威之主张，在相当程

① 范存忠：《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1 年，第 133 页。

② 许明龙主编：《中西文化交流先驱——从利玛窦到郎世宁》，第 313 页。

度上是受到了中国政治制度中宗教政治的影响。

此外，中国明清政府的运行机制，还有一些具体制度激发起欧洲学者效仿的灵感，比如谏议制度、官员的任命和监督制度等，他们认为这些制度保证了中国政体的良好运转。

伏尔泰评价道："他们的帝国组织确实是世界上最好的，是唯一把一切都建立在父权的基础上的国家，是唯一对于一个在卸任时没有受到万民爱戴的外省巡抚要加以处分的国家……"①

法国甚于在17世纪兴起了一个学派，提议要在欧洲移植中国的精神。

1602年一个欧洲人的话更为直截了当："如果柏拉图能够重返这个世界，他就会发现，他那理想国的模式在中国已获实现。"②

五、从科举制度到西方近代考试制度

中国的科举制度对启蒙时期的欧洲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西方关于中国"考试制度"（即科举制）的正式描写始见于西班牙人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1585）。③

总地说来，传教士们对科举制是持赞赏态度的，他们的描述给与人们如下的印象：在中国，由于这样种考试制度的存在，社会便只分为两个较为单纯的阶级，两个阶阶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除了极少数人以外，每个平民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到达较高的阶层。这使得阶级之间的矛盾降到了最低，国家则总是能由最有才华的人来治理。

当时的欧洲处于封建制度之下，等级森严，包括新兴的资产阶在内的第三等级提高自己相应社会地位的愿望难以实现。包括启蒙思想家在内的众多资产阶级哲学家正急需一种理论的支持，用以反对现存的制度，中国的科举制度成了他们的典范。

伏尔泰赞扬科举提供了这样一种保障，即政府将以个人的才能为基础，而非同欧洲那样，为世袭权力的支配，故科举制度不失为一种民主和平等的制度。

魁奈的《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一书不仅用专门的章节介绍了科举制

① 伏尔泰：《哲学辞典》，第330页。

② 《国际汉学》Ⅰ，第478页。

③ 《利玛窦中国札记》，第38－39页。

度，并且提议，在国内也应建立类似的制度，以从社会的所有阶级中选拔人才，组成参议国事的智囊团。

即使是在中国问题上一直与伏尔泰等人持不同意见的孟德斯鸠，也注意到了中国科举制度不同于一般专制主义的做法，甚至一度为之动摇了把中国列为专制主义国家的决心。另一位深受中国影响的启蒙思想家霍尔巴赫在他的《自然政治论》中写道："不是出身，而是知识，使得公民有能力为国家服务……这样的国家很快就能找到许多人才……但愿高级职位的分配要以比赛为依据；但愿人人都享有增进社会福利的权利，谁也不被剥夺！"①

科举制度对欧洲的直接影响是，从18世纪起，通过考试选拔公职人员逐渐在欧洲各国确立并发展起来。法国大革命于1791年采纳了考试选拔官员的制度。

六、中国农业政策和法国重农主义

中国文化对欧洲重农学派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重农学派兴起于18世纪中期。当时欧洲（主要是法国）进入封建制度的晚期，经济状况急剧恶化，占统治地位的是重商主义经济学说，由于过分注重商业和货币财产的积累，完全忽视了农业，导致了法国农村经济濒于崩溃的境地。人们迫切寻求一种新的经济政策以振兴国家，这就为重农主义兴起提供了空间和条件。

当时的中国，以一个泱泱农业大国有如世外桃源的形象传入欧洲，深入人心，加上耶稣会士书简中记载了诸如中国皇帝是如何每年一次于春季亲手扶犁把和犁第一趟地，以求天庇护将来的好收成等内容，并大加赞颂，欧洲人对农业重新又加以足够的重视。

在这样的内外因结合下，重农主义诞生了，其创始人就是中国文化的热烈崇拜者并被人称为"欧洲的孔夫子"的魁奈。他对中国君主重视农业生产和给予农业者较高地位表示高度赞扬："在中国，农业总是受到尊重，而以农为业者总是获得皇帝的特别关注。"②他举了中国古代舜帝保障农业的法令，康熙帝挑选最杰出的农民提升到八品官的地位，以及尧帝把王

① ［法］霍尔巴赫著，陈太先、跬茂译：《自然政治论》，商务印书馆，1957年，第165页。

② ［法］魁奈：《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第66页。

位禅让给一位其才智与诚实均受到高度赞扬的青年农民为例,印证自己的观点。

魁奈学派的基本观点是:土地是财富的唯一源泉,只有农业能够增加财富。他为经济政策提出的一切建议都是基于对这一原则的承认之上的。他提出"自然法"是"由最高存在(神)所设定的最高法则",是"恒久不变的"、"无可非议的"而且是"可能最善的法则"。

魁奈的努力就是试图建立一种符合自然法则的经济秩序,使人们回归于一种原始纯真的自然状态,这种理论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得自于孔子的学说。米拉波在魁奈葬礼上致词道:"孔子的整个教义,在于恢复人受之于天,而为无知和私欲所掩蔽的本性的光辉和美丽……对这种宗教道德的伟大教言,似乎不可能再有所增补;但最主要的部分还未做到,即行之于大地;这就是我们老师的工作,他以特别聪睿的耳朵,亲从我们共同的大自然母亲的口中,听到了'纯产品'的秘理。"①

魁奈的继承者杜果,承继了魁奈如"农业劳动是一切财富的唯一源泉"等基本观点,又有所拓展。杜果与中国留法青年高类思和杨德望交往甚厚,他曾委托这两名中国人收集中国的工艺技术资料,同时也从两人那里获取了别的关于中国的情况,其中包括高类思撰写的《中国古代史》。与魁奈一样,杜果把自己的学说和中国维系在一根特殊的纽带之上了。

中国的农业制度对于欧洲影响的顶峰出现在1768年春季,仿效米拉波《农业哲学》(1764)中关于中国皇帝参加春季籍田大礼的插图,法国皇太子也拿起了一副小的耕犁模型,以示他对法国农民的同情和重视。而次年,奥地利的约瑟大皇帝,也用一副真实大小的犁耕种了一方土地。

但是欧洲的自然和政治条件毕竟与中国迥然不同,形式上的仿效并未能收到事实上的成效,加上重农主义本身学说的局限,都使其无法跟上欧洲资本主义的步伐。随着杜果两年财政大臣生涯期满,重农主义学说和中华帝国的影子也都从人们的话题与脑海中淡化出来了。

① [德]李利奇著,朱杰勤译:《18世纪中国与欧洲的接触》,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92页。

第三章
法国汉学的确立和发展
(19至20世纪初法国汉学)

19世纪至20世纪初是法国汉学确立和发展时期。汉学教学和研究机构的建立、教学和研究队伍的形成以及研究领域的新开拓等,都使法国的汉学明显地显示出与前一时期不同的格局,以及体现出作为一门学科已在逐步走向完备和完善的特征。

第一节 "汉学"(Sinologie)学科的确立

一、Sinologie的确立及其意义

Sinologie所以首先在法国得以确立,显然是跟18世纪法国的文化界,尤其是传教士的努力所打下的基础分不开。早在1796年6月2日,在蓝歌籁(Luois Mathieu Langles,1763—1824)的倡议下,法国就创立了巴黎东方语言学校(Ecole spésia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vivantes,1914年后改spésiale为nationale),并由他亲任校长兼授波斯语、满语和马来语。当时虽还没有开设汉语课,但该校的建立,为后来的汉语课的开设准备了条件;蓝歌籁的贡献也并不在汉语,他的主要功绩是创建这所在世界汉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学院。18世纪法国传教士们努力著书立说,翻译中国文献,向欧洲介绍中国,在法国和整个欧洲,尤其是文化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也为汉学的确立打下了厚实的基础,但"汉学"作为一门学科毕竟条件还不具备。使得Sinologie得以确立,并使其成为一门举世公认学科的,是19世纪法国汉学家们的一项伟绩。其主要标志是1814年12月11日

法兰西学院(Collège de France)的教授们做出决定,在欧洲各大学中首次开设汉学讲座(chaire de sinologie),并于翌年1月16日正式开课,首任这一讲座的教授是当时年仅27岁的汉学家雷慕沙(Abel Rémusat)。

1814年是汉学发展史上关键性的一年。从这一年开始,不仅在法国,而是在整个欧洲,汉学研究逐渐呈现出一派令人欣喜的气象。在法国,继法兰西学院汉学讲座之后,是东方语言学校、远东法兰西学院(l'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和里昂大学相继开出汉学课程。巴黎东方语言学校于1844年开始开设汉语课,接着又于1884年增设了远东历史、地理讲座,于是该校便逐渐成为法国培养远东外交官的摇篮;远东法兰西学院创建于1888年,先设在西贡,后于1902年移于河内,是法国东方研究之重要机构,主要研究印度支那,同时也涉及中国,法国众多著名汉学家都曾参加这里的教学和科研活动;1900年,在当地工商会资助下,里昂大学设立了第一个汉语教授职位,也开出了汉语课程,主要培养从事两国经贸交流的人员。与此同时,是欧洲其他国家大学相继开设汉学课程:俄国于1851年,荷兰于1875年,英国于1876年,德国于1912年。正是随着法国和欧洲其他国家汉学课程的开设和汉学研究的进展,一批真正的职业汉学家队伍也开始形成,大量、丰富的中文资料和中国文物也得到收集。因此我们说,法兰西学院汉学讲座的开设,在整个国外汉学发展史上有其重要的意义,它不仅使汉学在法国和欧洲大学里被公认为一门学问,更重要的是,它结束了传教士的中国研究,"开创"了国外"中国研究""近代"模式,[①]使得国外的汉学研究具有了一种"完全不同的面貌",[②]开始了西方汉学的一个新世纪。因此,戴密微称1814年"不仅对法国而且对整个欧洲都是一个有决定意义的日子"。[③]

二、学科建立的背景和特点

纵观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法国汉学,我们可以发现,前后两个时期的情况有所不同。从中法两国的外交关系来看,19世纪40年代之前,由于种种原因,中法两国往来几乎中断。尽管法国自1776年起在广州

① [日]福井康顺等:《道教》,第3卷,第225页。

② Paul Demiéville, *Aperçu historique des études sinologiques en France*. II.

③ Paul Demiéville, *Aperçu historique des études sinologiques en France*. II.

就设有领事馆，但在1801年至1842年间，法国从未向广州派遣自己的领事。然而，这并没有影响法国汉学家对中国文化的研究。热衷于中国文化的法国汉学家们在无法到中国进行直接考察的情况下，把更多的精力投向上个世纪传教士们带回去的中国文献，孜孜不倦地从事翻译和研究，[①]Sinologie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得以确立。从19世纪40年代起法国重新开始对中国派遣外交官或领事，显然，1844年的《黄埔条约》是一个不平等的条约，促使中国走向半殖民地化，把中国人民推向更加深远的灾难；而对于法国的汉学家来说，中法的建交无疑为他们来华考察和研究提供了方便。这样，法国的汉学家便在前期资料研究的基础上，又增添了到中国进行实地考察的机会，从而使法国的汉学研究有可能向前推进一步。实际上，19世纪后期也正是西方再度出现"异国热"，或者说"东方热"的时期。法国汉学家把法国的汉学研究推向了"黄金时代"，[②]出现一个新的高潮，正是19世纪后期西方"异国热"再度兴起、中西交通道再次打通之时。这时期的法国汉学们，一方面继承了19世纪前期经院汉学的功底，同时又有进行实地考察所得的第一手资料，所以能做出比以往任何时期更大的成绩，他们的研究成果也更有学术价值。新的教学和研究机构的建立，一批有世界影响的汉学家的出现，研究领域进一步的拓宽和研究方式方法上的更新等，都使得这时期的法国汉学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所以，实际上，宗观这一时期法国的汉学，我们不难发现，虽然比起18世纪的"中国热"来，19世纪上半期似乎有过一个"沉寂的时代"，而事实上这一"沉寂"只是一个表面现象。因此，当人们"掀开"这"沉寂的地表"时，便可以看到"一股暗

---

① 巴斯蒂(Marianne Bastid - Bruguière)在谈到19世纪欧洲中国史研究时说：19世纪初期欧洲汉学第一个学术活动在对于史学研究而言很有限制的条件下进行。由于无人有机会访问中国，故来自中国的印刷品非常少。主要依靠欧洲图书馆仅有的藏书即17、18世纪中国皇帝的赠品。这些藏书包括编年史、正史、传记和百科全书、地方志、古籍汇编和注释、法令、法规、仪典和古地图。它们只收藏在巴黎、柏林、圣彼得堡和伦敦的图书馆里。直到19世纪最后两个十年，欧洲汉学形成了通过文献研究中国史的一般方法，同时强调翻译基本文献，注意实际发生的事。这个时代的中国史研究仍属旧式汉学范围，即通过语言和现有的文献研究中国文明。汉学方法在西方学术里成为唯一与中国学术相似的研究方法，倾向于促进汉学家考察中国文献，从中寻找分布在集中的和分散的所有中国事物里的杰出思想。这种只有很少人使用的、新出现的研究方法产生的学术成果往往是局部的、零碎的。见巴斯蒂著，胡志宏译：《19、20世纪欧洲中国史研究的几个主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唐史学科网。

② ［日］福井康顺等：《道教》，第3卷，第231页。

流涌动”。[1] 至于19世纪后期开始，这一股“涌动”的“暗流”更是成了一股“热流”，19世纪后期20世纪初法国汉学的“黄金时代”就是这样出现的。

总之，19世纪的法国汉学家们以其“坚实”的基础、优异的成绩，使法国汉学成为国外中国研究的“中坚”，在中法文化交流史上谱写出光辉的篇章，放出异彩。无论是前期还是后期，法国的汉学，在欧洲，其实也就是世界，都居于领先地位，它的这种优势一直保持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美、日、苏中国学的崛起才有所改变。

19世纪是西方科学技术发展的时期，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人们提供了新的思维方式。自然科学中观察、实验的方法，重视实地考察等，同样被运用到了社会科学的领域，语言学、历史学、民族学等，无不用上了现代科技的研究方法，19世纪的法国汉学研究亦然。由于有了现代科技的头脑，19世纪法国的汉学家才有可能打破18世纪传教士和旅行家们那种以介绍、感受、体会为主的初级研究，逐渐走向成熟的理论分析和严格的学术考察，而且视野也大大地开阔，使得19世纪的法国汉学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而如果说，在19世纪前期和中期，汉学家们主要还是运用这一方式对传教士们带来的中国文献进行科学考察的话，那么19世纪后期，当中西方的通道再次打通，汉学家们有机会亲自踏上中国土地进行考察时，这种研究的基础就更加扎实，所取得的成果就更为显著，也更有学术价值了。

诚然，我们也不能忽视，尤其是19世纪后期，西方的汉学是在殖民政策和商品出口这样一个大背景下走向繁荣的，尤其是汉语教学中，外交词汇和商业词汇量的增多，带上过于浓厚的政治因素和商业气味。但是，作为一门学科，汉学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和特点，它既是西方整个科学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西方人对中国研究逐渐走向成熟和学科化的必然之路，所以商业和外交上的实用性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汉学家们做“学院式”研究的根基，尤其在法国，比之当时的其他国家（如英国）来，“学院式”的研究更为明显。显然，这一特点有利于造就一批职业化的中国学家和建立一支专业化的队伍，而且在19世纪的法国实际上也已经形成了一支数量可观的汉学研究队伍，这令欧洲其他国家望尘莫及。与此同时是教学、研究机构和学会的建立，刊物的创办和大量资料的收集等，不仅为法国的汉学研究大大地增添了色彩，也为汉学家们的研究提供了更好的基础。

---

① 轶萍：《梦想中国——“天之女”的中国形象分析》，《中国比较文学》，1995年第1期。

在研究方法上,这时期的法国汉学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注意了跨国和跨文化的比较研究;二是在文学方面,更注重通过文学作品来了解和考察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国情。

实际上,从总体来说,"汉学"作为一门学科,其本身就是建立在比较研究上的,因为它是一门由不同于中国文化培养起来的学者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一种异质文化的考察。在具体做法上,各个汉学家的确又有意无意地运用了这一研究方法。雷慕沙的《法显撰佛国记》,儒莲(Stanislas Julien)的《亚细亚地理与汉梵文学文集》,汉译三卷本的印度神话故事与寓言,德韦理亚(Gabriel Devéria)的《中国与安南——越南关系史》,费赖之(A. Pfister)神父的《在华耶稣会士传略及书目提要》等,倾向于中国与其他亚洲国家及世界关系的考察,德理文(De Saint - Denys)在研究中国诗歌时,喜欢将中西韵律、将《诗经》中的战争跟希腊史诗放在一起比较,巴赞(Antoine Bazin)在翻译研究中国戏剧时,将中国和印度的戏剧进行比较,德韦理亚在对中国周边地区的西夏文、女真文、彝文和和蒙古碑铭八思巴文进行研究等,所有这些都体现了比较研究的思路,属于比较文化的研究和考察。

不难发现,18 世纪的传教士们涉及中国文学的目的并不是文学的本身,而是试图通过文学来了解和考察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国情,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的法国汉学家也没有例外。但是,要是我们把这一时期法国汉学家们的这一思路仅仅看成是前人研究方式延续和继承的话,那就有所偏颇了。实际上,他们的这一思路的产生与当时欧洲文学思潮上的现实主义理论不无关系,可以说是"文学是现实生活镜子"这一理论在汉学研究中的反映。19 世纪的欧洲,尤其是法国,从 30 年代开始,现实主义文学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出现了像司汤达、巴尔扎克、福楼拜、左拉等举世瞩目的现实主义文学大师。文学上的这一观察社会现象和事物的方法,同样也影响到汉学的研究,特别是中国文学的研究。毕欧(E. Biot)认为中国的《诗经》是"东亚传给我们的最出色的风俗画之一,同时也是一部真实性最无可争辩的文献",德理文通过对《诗经》的研究,了解到了中国上古的文明,当时的房屋建筑、农作物、生产工具,以及家庭生活的一切细节。雷慕沙则明确地表明,他之所以把《玉娇梨》这部作品介绍给法国读者,是因为这是一部

"真正的风俗小说",可以帮助人们了解中国文化。[①] 诸如此类的例子都显示,法国的汉学家们对中国文学的研究是侧重于通过文学作品了解中国社会和文化而不在于了解文学本身这一特点。

此外,教学和研究的结合也是这一时期法国汉学的一个特点。这时期的许多汉学家的著作,都是在教案的基础上整理而成的,这是前期传教士无论如何无法实现的,也是这一时期的研究带有更多的学院气味的一个因素。

因此我们说,19 世纪的法国汉学家们,不仅在创立 Sinologie 这门学科上做出了他们的努力和贡献,同时在汉学的发展和壮大方面,也有着他们不可忽视的成绩。

随着汉学的确立和发展是中国文化在欧洲引起更多人的注意。19 世纪的法国,虽然没有出现如 18 世纪的伏尔泰、孟德斯鸠、重农学派等思想家和文学家那样的人物,对中国文化产生极大的兴趣,身体力行做出他们的反应,并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但具有无限魅力和神秘感的古老中国,同样不断地启发了 19 世纪法国作家们的创作灵感,尤其是 19 世纪后期,"寻求中国形象"是法国艺术家们"异国热"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雨果、巴尔扎克、莫伯桑对中国都有不同程度的论述,而泰奥菲勒·戈蒂耶(Théophile Gautier,1811—1872)、马拉梅(Stéphanie Mallarmé,1842—1898)等对中国形象的追寻和运用中国题材或者手法进行他们的艺术和文学耕耘,更深深地影响了 20 世纪众多法国作家的创作。[②]

三、汉学学科确立的主要体现

所以能称得上一门学科,定然是具备了一门学科所要求的条件,如学科队伍的形成,研究机构的建立,以及相应刊物、资料的准备等。19 世纪法国汉学作为一门学科,也不例外。

随着法兰西学院"汉学讲座"的开设,法国汉学取得的可喜成绩,学科的条件也逐渐形成,具体可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

① 钱林森:《中国文学在法国》,第 129 页。

② 法国诗人泰奥菲勒·戈蒂耶的女儿朱迪斯·戈蒂耶(Juduth Gautier,1846—1917)曾出版了一本仿中国诗歌的作品《词》(*Le livre de Jade*,1876);法国诗人马拉梅的创作也颇受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响。

第一,教学和研究机构的建立。

19世纪法国汉学的卓越成就之一是有了正式的汉学教学和研究机构。19世纪初期法国最早建立的汉学教学和研究机构是法兰西学院(Collège de France),接着是东方语言学校,此外是于1900年开设汉语课程的里昂大学。除法国本土之外,有河内的远东法兰西学院,还有在华的河北河间府(今河北献县)和上海徐家汇两个活动中心,1873年建立的徐家汇天文台等一些机构。[①] 所有这些都使法国的汉学教学和研究机构趋向完备。[②]

法兰西学院(Collège de France)[③]是19世纪法国,也是全世界最早建立的汉学研究和教学机构。该学院是法国一个既古老又富于青春活力的教学和汉学机构。学院创设于文艺复兴时期,当时为承担巴黎大学所不能接受的教育科目而建立。在法兰西学院从事教学和研究的,是一些真正的学院派教授,既有严谨的学风,又有开拓精神。所开课程,实际上都是一些

---

① 杨尧深主编:《徐家汇天文台创建的前前后后》,载《老话上海法租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89页。

② 参见:Paul Demiéville, *Aperçu historique des études sinologie en France*, III.

③ 参阅耿昇:《试论法兰西学院的中国学讲座》,李向玉、张西平、赵永新主编,《世界汉语教育史研究》,澳门理工学院,2005年。耿先生在这篇文章的开头部分,交代了当时该学院开设汉语课的背景和经过。他说,法兰西学院是一个世界上独具特色的教学与科研机构,所有在这里执教的教授都要由全国教授委员会推选,国家总统任命。法兰西学院创立于1530年。当时巴黎大学垄断了所有教育学科,拒绝创新,只设神学、法学、医学和艺术四个系,而文艺复兴思想已传遍了整个欧洲,在法兰西斯一世(François Ⅰ er,1496—1547)设立的"皇家教授团"(Lecteurs Royaux)的努力下终于得以实现。法兰西斯一世时代的人文主义者皇家图书馆馆长比代(Guillaume Budé,1467—1504)对东方学持有热情。他极力鼓吹复兴古典研究,向国王进谏,要求加强研究希腊文、拉丁文和希伯来文。法兰西学院主持阿拉伯讲座的教授希尔维斯特·德·萨西(Sylvestre de Sacy,1758—1838)是当时法国东方学的领军人物,《中国杂纂》(第17卷),正是他的呼吁、奔走、具体安排下,才得以于1814年出版。他在法国黄经局任职时,曾收到入华耶稣会士宋君荣从中国寄回的两部手稿:一部是寄于1753年5月的《中国唐代历史纲要》,一部是1749年9月29日寄出的《中国纪年志》,这两部是有关中国历史纪年和天文学史的主要论著,当时被誉称为"法国牛顿"的拉普拉斯(Pierre Simon Laplace,1749—1827)侯爵,授权萨西刊布宋君荣的著作。萨西也继承了路易十五和十六时代崇拜中国与东方的三大名人的传统,与耶稣会士们保持经常联系。这三大明星:第一位是普瓦弗尔(Pierre Poivre,1719—1786),传教士企业家,于1740—1747年间曾赴中国、印度和印度支那旅游访问,1749年任东印度公司的代表,将胡椒等香料运往欧洲,法国即以其名Poivre来命名胡椒;第二位是路易十六的财政大臣和法国重农学派代表人物杜果(Jaques Turgot,1727—1781);第三位是国务部长贝尔坦(Henri Bertin,1720—1792)。萨西正是利用了与东方,特别是与中国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才推动皇家教授团或教授委员会,于1814年2月11日决定,在法兰西学院设立中国语言和文学讲座。

专题讲座，听课者有学生，也有学者，都为自由旁听者。初建时主要进行希伯来文和希腊文教学，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开设学科有很大变化。1814 年 11 月 26 日由首任教授雷慕沙开设的汉学讲座，名为“中国、鞑靼、满洲语文和文学讲座”（Chaire de Langues et Littératures chinoises et tartares – manchous），1919 年起改名“中国语言和文学讲座”（Chaire de langue et Littérature chinoises）。自此，法国和整个欧洲汉学界有了自己的教学和培养汉学家的基地。

首先被该学院聘任汉学教授的是博学多才的雷慕沙，他也成了国外汉学的创始人。继任雷慕沙教席的是他的得意门生儒莲（Stanislas Julien），另一个博学多才、成绩卓著的法国汉学家，他在这里担任了多年的行政和研究工作，后来由他的学生德理文（De Saint – Denys）继任了他的位置。德理文之后是沙畹（Edouard Chavannes）、马伯乐（Henri Maspero）、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等。

无论是从法国汉学学科的建立还是从往后的发展来说，法兰西学院始终在这一领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虽然从 19 世纪后期起，法国出现众多的汉学和教学研究机构，但法兰西学院仍然不失领军角色。因此，谢和耐说，该学院不仅是 19 世纪“法国从事中国历史和文明科学研究的唯一机构”，而且在“20 世纪仍继续在这一领域中扮演着一种重要角色”。①

东方语言学校（L'Eco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Vivantes）②前身为“青年外国语学校”（即翻译生学校），1839 年，在法国公共教学大臣、“热切”跟中国做生意的商人和想把“法律的火把和欧洲的文明”“引向天朝”③的传教士们的多次敦促下，该校通过开设现代汉语课的决议，并于 1843 年 10 月 22 日正式开课。也就是说，该校是因商业活动和外交文书往来需要而开设现代汉语课程的，比起法兰西学院的“学院式”教学来，带有较大的“实践性目的”。因此，东方语言学校的汉语教学有着明显的“实践性”和“实用性”的特点。事实上，鸦片战争之后，法国跟中国的外交和商务事务开始活跃，传教活动等也更加频繁，需要大量汉语人才，该校的汉语课程的

① ［法］谢和耐：《法兰西学院的汉学研究》，《汉学研究》第一集，中华书局，1996 年，第 54 页。

② Henri Cordier, *Les études chinoises* (1895—1898), Librairie et imprimerie Ci – devant E-. J. Brrill. Leide. P. 44.

③ 胡书经《法国汉语教学和研究的历史》，载《语言和教学研究》（季刊），1983 年 2 月。

开设，正是因实际的需要。当时对汉语感兴趣的人，更多的是需要现代汉语，而不是古代汉语，因此，该校一开始就以教授现代汉语为主，古文只作为补充。而且，雷慕沙虽然在法兰西学院首次开设了汉学课，但法兰西学院授课方式是学术报告，自由听课，没有考试制度，而且听课者大多是学者，不能算是正规的汉语教学。而东方语言学校则已进入了正规教学，所以，很快地，该校的汉语教学就成了全法国汉语教学的重镇，也是培养汉学家的摇篮，欧洲和法国许多著名的汉学家都曾踏进过这所学校的大门，接受过初级的汉语训练。

首先在东方语言学校担任汉学教授的是安托讷·巴赞（Antoine Bazin），继巴赞之后在该校任汉学教授的是儒莲，他在这里又任职了六年。儒莲之后，基本上是一批从中国归来的外交部翻译人员，他们是：哥士耆（Alexandre Kleczkowski）、冉默德（Maurice Louis Marie Jametel）、德韦理亚（Gabriel Devéria）和微席叶（Arnold Vissière）。该校进入20世纪后，在50年代以前的教学情况，虽然由于受两次大战的影响，一直处于时断时续、时好时坏的状态，但它仍然是法国汉语教学的重镇，保持着它的优势，一些法国汉学泰斗，如伯希和（Paul Pelliot）在这里担任担任了几个月的课程，戴密微在这里从1931年起，一直工作到1945年。这段时间该校在汉语课程中补充了“远东国家地理历史和制度讲座”，担任这一教职是如下的几位汉学家：考狄（Henri Cordier）和葛兰言（Marcel Granet）分别于1889—1925和1926—1945年间在这里任职，接着是格鲁塞（René Grousset），虽然没有正式担任这一教职，却于1941—1952年负责该课程的教学工作。[①] 在语言教学方面，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中国进一步殖民化，该校汉语教学的实用目的也更加明确，在教学中更加注重口语和实用性。

第二，汉学家队伍的出现和形成。

19世纪之前的传教士，虽然在汉学研究方面做出很大贡献，但他们并不是职业汉学家，只有从1814年开始，法国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汉学家出现，并逐渐形成一支职业队伍。如雷慕沙、儒莲、毕欧、德理文、巴赞等，都是一些卓有成就的真正意义上的职业汉学家。而雷慕沙、儒莲和毕欧是19世纪法国汉学三个主要的人物。

19世纪50年代后，法国的汉学队伍得到极大的发展，他们是一些传

① 许光华：《法国汉语教学发展史概览》，《汉学研究》第七集，中华书局，2002年。

教士、外交官或供职于驻华外交机构如海关等的所谓“实践型汉学家”，如后来在东方语言学院任教的哥士耆、冉默德、德韦理亚、微席叶，在里昂大学的古兰（Maurice Courant）等，还有从事外交工作的戴伯理（Dabry de Thiersant）、于雅尔（Camille Imbault - Huart），传教士顾赛芬（Séraphin Couvreur）、戴遂良（Léon Wieger）、夏鸣雷（Henri Havrit）、费赖之（A · Pfister）等。他们的身份虽然是传教士和外交家，因对中国文化有极深入的了解，在从事传教或外事的同时从事汉学研究并做出杰出建树，因此也是这支队伍中的重要成员。

第三，学会的建立和刊物的创办。

正当19世纪法国汉学逐渐形成的时候，一些汉学学会的建立，刊物创办和图书资料的大量收集，使得法国的汉学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这时期的学会，主要就是“亚细亚学会”（Société Asiatique），雷慕沙协同德国汉学家克拉普洛特（Klaproth）在巴黎共同发起建立的汉学研究学会，并创办有刊物《亚细亚学报》（*Journal Asiatique*，略称J. A）。

主要的刊物有：

1.《亚细亚学报》（*Journal Asiatique*，略称J. A），一份“世界有数的东方学术研究刊物”，以研究埃及为主，也涉及到中国，两卷本，由巴黎保尔·鲍狄埃（Paul Pauthier）书店发行。

2.《通报》（*T'oung Pao*，略称T. P），创刊者亨利·考狄教授和荷兰莱敦大学首任中文教授薛力赫（又名施古德）（Gustave Schlegel）。他们在1889年举行的第八届国际东方学者代表大会期间，决定创设一份致力于东亚研究的学术刊物，同时与会的荷兰莱敦的布里尔（E. J. Brill）出版社的两位经理参加了创刊的计划。两位教授和出版社很快就达成协议，1890年创刊号便由布里尔出版社正式出版。[①]《通报》主要刊出研究东亚各地，尤其是关于中国的历史、地理、语言、风土方面的文章，也有书评和汉学家

① 荷兰主编薛力赫教授于1903年去世后，由沙畹（1865—1918）接任，与考狄联袂主编《通报》。第18、19卷（1917，1920年）的主编均为考狄独自一人，沙畹去世后，伯希和（1878—1945）作为联袂主编于1921年到任。考狄1925年逝世后，伯希和独掌主编大权，直到1935年，戴闻达（J. J. L. Duyvendark，1889—1945）出任，该杂志重新拥有一个法 - 荷联袂编委会。戴密微于1947—1975年间主持该杂志。从1957年起与何四维（A. F. P. Hulsewé，1910—1993）共同主编。从1978年起，莱敦大学的许理合（Erik Zürcher）和法国的谢和耐（Jacques Gernet）联袂主编。自1993年起，主编是莱敦的伊维德（Wilt Idma）和法国的魏丕信（Pierre - Etienne Will）。

生平传略，撰稿者大多是欧洲著名的学者，以英、德、法文同时刊出，编辑部设在荷兰莱顿，每年出一卷，后改一年两期。《通报》是19世纪末第一份国际性的汉学杂志，它的出现更促进了汉学的国际性交流。《通报》的刊名突出体现了"通报"与"交流"相关领域信息的观念。

3.《河内远东法兰西学院学报》(*Bulletin de l' Ecole Française d' Extrême - Orient*，略称 B. E. F. E. O.)，1901年的创办，每年出一卷，后改一年两期，以研究印支和中国为主。

资料和文物的搜集。

法国对于中国的图书资料和文物的搜集从18世纪传教士开始就十分重视，到了19世纪，随着汉学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就更加重视这方面的收集工作，到了20世纪初期，就已具相当规模，如：以搜集中国工艺品为主的吉美博物馆(Musée Guimet)①、卢浮宫(Louvre)的东方部、巴黎国家图书馆(Bibliothèque Nationale)和巴黎法兰西学院的汉学研究所图书馆、以及私人收藏家戴何都(Robert des Rotours)等。对中国图书资料和中国文物的大量收藏，为汉学的研究做了充足的资料准备，至今在世界上仍享有盛誉。巴黎国家图书馆收集的汉籍历史悠久，质量和数量都是欧洲之最，伯希和于1909年将他在中国敦煌搜集的秘籍和北京搜集的孤本、珍本都珍藏在这里。戴何都也是汉学家，他在巴黎近郊的维罗孚拉(Viroflay)私人图书馆里搜集有十几万卷的中国书籍，被称为欧洲第一私人汉籍收藏家。他所搜藏图书后均入藏汉学图书馆。

四、19世纪法国汉学的局限

正如18世纪来华法国耶稣会士在中国研究上留下遗憾一样，19世纪的法国汉学家也留下了他们的缺陷。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他们像18世纪的传教士一样，把研究视野仍然局限于中国的"古代而忽视了当代"，尤其在文学和哲学方面更为突出。在文学方面，像《红楼梦》、《水浒》、《金瓶梅》、《西游记》、《儒林外史》这类忠实反映当时现实且又体现中国人精神、道德、社会活动的小说，他们虽然已经涉及，但量并不多，且大多是节译，而他们对宋、元、明、清的哲学流派，如直觉主义哲学家李贽、颜元、李颙，中国

① 吉美博物馆图书馆馆长马古安(François Macouin)介绍，吉美博物馆已改名为法国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见《汉学研究》第二集，中华书局，第529页。

专制主义批评家黄宗羲，进化论哲学家方以智等的忽视，说明仍没有改变传教士汉学研究中的“厚古薄今”的倾向。实际上，这既是法国汉学的弊病，同时也是整个欧洲的汉学的缺陷。法国汉学家从根本上克服这一弊病，对宋、元，特别是明清之际的思想研究加以较多的关照，对“自己所生活的时代”的作品给以足够的重视，要等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日、苏中国学的崛起，尤其是二战后，在另一个汉学泰斗——戴密微的带领下，才逐渐地有所改变。①

第二节　职业汉学家队伍的形成

19世纪，法国开始诞生了职业汉学家，开始的时候主要有雷慕沙、儒莲和毕欧，后来有巴赞、德理文、哥士耆、德韦理亚等。19世纪像雷慕沙、儒莲、毕欧这样的汉学家，虽然未曾亲自踏上中国的土地，但他们精确运用汉语的程度，认真严肃的研究态度，以及他们在中国历史、语言、文献等的翻译和研究所取得的成绩，都超过了前两个世纪。② 而雷慕沙、儒莲和毕欧，堪称19世纪法国汉学三杰。

一、雷慕沙和他的汉学研究

雷慕沙（Abel Rémusat，1788—1832），法国巴黎人。父亲是个医生，从小聪明过人，后因喜爱植物学，欲读《本草纲目》，自学汉语和满语，从此与汉学结下不解之缘。1811年，他发表第一篇中国文学和语言论文：《中国语言文学论》，同时给自己起了个汉语名字“雷慕沙”。1812年他情不自禁的给朋友写道：我终于采辑成一本《中文/拉丁文词典》手稿，这是我5年里最大渴望，我现在正做一些重要的工作。同年，他发表了《汉语及满语所记一铭文之解读》。此时雷慕沙还在医学院攻读医学课程，虽然汉语的学习逐渐地改变了他的学习方向，但在1813年时，他还是撰写关于“中医舌诊”的博士论文，获巴黎大学博士学位。论文明显受中医基本医理影响。

① 参阅王志平的《谢和耐与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十）》，《国际汉学漫步》上，李学勤主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

② 刘增泉：《汉学研究在法国》，载《汉学研究之回顾和前瞻》（下），林徐典编，中华书局，1995年，第238页。

从这个意义上说，雷慕沙也是最早研究中医的汉学家之一。

1814年11月26日雷慕沙受聘为法兰西学院汉学讲座教授，即“汉·鞑靼·满语言文学讲座”（该讲座一直维持到1918年）。第二年的1月16日开课演讲，题为《欧罗巴汉语研究的起源、进步和效用》（*Sur l'Origine, les Progrès et l'Utilité de l'Etude du chinois en Europe*），从此使汉学成为一门学科，他本人也成了“首先使汉学成为专门学科”的学者。1816年4月5日，他被选为金石文艺院（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 - Lettres）会员，是年，还负责承担建立皇家图书馆中文图书目录。[①] 1822年与德国汉学家克拉普洛特（Klaproth）在巴黎共同发起建立“亚细亚学会”（Société Asiatique）并刊行会报，影响极大。1823年蓝歌籁去世，由他任皇家文库东方部主任，同时担任盲哑教育改革委员会委员、皇家印刷局东方抄本出版委员等。1826年黑格尔访问巴黎时，曾与雷慕沙会面，并聆听雷氏在法兰西皇家学院的讲演。1828年任内政部文艺调查委员，1929年任“亚细亚学会”会长，1830年七月革命时，因站在保守派一边，刊物被停。1832年6月3日死于霍乱。

雷慕沙是个博学多才的汉学家，他在法兰西学院从事汉学教学的同时，努力研究中国，内容涉及到语言、文学和哲学等多方面，尤其在汉语和中国佛学方面的成绩，在汉学发展历史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引起后人极大重视。

在汉语研究方面，首先提到的应是他的《汉文启蒙》（*Eléments de la grammaire chinoise*，也译《汉语语法基础》，1822）。但在此以前，雷慕沙因对汉语抱有浓厚兴趣，已做过不少的工作。他不仅一直认真进行研究，并与同行展开讨论，发表文章，阐述看法。1811年他发表《中国语言和文学论》一文，1812年又发表了一篇有关汉语的论文：《汉语及满语所记一铭文之解读》。自1813年开始，他在皇家图书馆钻研马若瑟的《中国语言志略》，从而渐渐地对古汉语有了一定的认识。几乎就在《汉文启蒙》成书的同时，他还跟德国语言学家洪保德进行了关于汉语问题的讨论，提出自己的看法，并搜集其他语言学家论述汉语的文章，将其编辑成册，以供其他研究者之用，该书后来于1827年正式出版。也正因此，他被一些研究者荣称

① 该目录包括详细的传略、传记等，但未曾完成，于是部分传记被收进4卷本的《亚细亚论集》（1825—1829）。

为一个把汉语研究提到西方语言学界的“倡导者”。[①]《汉文启蒙》，正是他长期汉语研究和七八年教学心得的总结。

《汉文启蒙》是一部教材，但同时又是一部语法书，其全称为《汉语语法基础，或古文及中华帝国通用语言即官话总则》（*Élémens de la grammaire chinoise, ou principes généraux du Kou - wen ou style antique, et du Kouan - hua*）。[②] 该书分前言、绪论、语法和附录等几个部分，重点分析语法。全书的体例，除前言和附录外，从绪论至语法部分，作者以“字”为基础，将有关内容分成许多小条目，排上序号，依次进行讲解，先分析讲解字义，再将其融为语法，通过举例方式，说明字在词、词组、句子中的意义。全书这样的小条目共有413条。在绪论中，作者介绍了“六书”、汉字发展史、异体字、古今字、部首、音节、声调、拼音符号等。接着是语法，分“古典文体”和“现代文体”两部分。“古典文体”部分就名词、形容词、专门术语、数词、代词、动词、副词、介词、连词、感叹词和虚词（共11小节），进行了分析；“现代文体”部分则就名词、形容词、专门术语、数词、代词、动词、副词、介词和连词、感叹词，以及虚词和习惯用语（共9小节），进行分析。重点是在分析代词和动词，文言中的介词、连词和感叹词分析得较少。

该教材长达28页的前言中是欧洲汉学发展史上的一篇重要的论文，文中作者不仅简要地回顾了一百多年来西方各国研究汉语的历史，对十几部汉语语法专著进行了较为中肯的评论，并指出研究中所存在的不足。他指出，路易十四时代一批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和学者，如白晋、张诚、李明、马若瑟、傅尔蒙等，在汉语研究方面的确取得不可否认的突出成就，但进入18世纪末叶，法国汉语研究已呈现衰落之势，只有萨西（Sylvestre de Sacy）仍可堪称“东方学的泰斗”，因此汉语研究存在着一定的危机。但他对欧洲人学好汉语和普及汉语的可能性不但不感到失望，反而寄予了极大希望。他认为，学习汉语并非如人们所想象的那么困难。一方面，来华传教士已总结出不少学习汉语的实践经验；另一方面，汉字虽然数量多，但是只要掌握了其中两三千个，就可以阅读和会话，且还可通过汉字字根，简化学

---

① 胡书经：《法国汉语教学和研究的历史》。

② 下面有关本书的介绍，请参阅 Abel - Rémusat, *Éléments de la grammaire chinoise, ou principes généraux du Kou - wen ou style antique, et du Kouan - hua, c'est - à - dire, de la langue chinois*, Paris, Imprimerie royale, 1822.

习汉字过程。雷慕沙预言,总有一天学习汉语会像学习其他东方语言,乃至西方语言那样容易,那样普遍。[①]

《汉文启蒙》在批判地吸收了傅尔蒙的《中国官话》、英国传教士马希曼(Joshua. Marshman, 1768—1837)的《中国言法》(*Elements of Chinese Grammar*)和英国伦敦宣教会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的《通用汉语之法》(*A Grammar of the Chines language*),尤其是马若瑟的《中国语言志略》的基础上编写而成。在教材中,他没有勉强套用西方传统语言学的框架,而是如实地描绘了汉语的特点。他直截了当地指出,汉语的名词没有性、数、格变化,动词也不存在时态和语态的变化。此外,他还特别强调一些小词的固定用法。他像马若瑟一样,将古文和官话(白话)两种文体加以明确区分,并分别加以阐述。尽管教材在资料和编写观点方法上很大程度参照了马若瑟的《中国语言志略》,并因此受到德国汉学家诺曼(Karl Friedrich Neumann)的指责,认为该书不过是马若瑟著作的摘录,[②]但是,仍然无损该书在汉语教学和研究史上的重要地位及其学术价值。因马若瑟一书一直没有出版,所以雷慕沙的语法书仍有"首创之功",被看作为"西方第一部汉语语法"书,[③]"欧洲第一部对汉语做逻辑综述和结构分析的著作",[④]也是西方"第一部真正适用的中文语法书"和"第一部在西方大学使用的汉语教材",为"推动欧洲汉学发展"做出了"功不可没"的贡献。[⑤] 对于雷慕沙在汉语方面的成绩,汉学家马伯乐(Henri Maspero)给他这样高度的评价:雷慕沙在《汉语语法基础》中对汉语的"逻辑综合和推理建构"进行了"首次试验",一直是"整个19世纪汉学家们着手研究的初始材料"。[⑥]

无疑,该书是法国汉语教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作品,不仅为法兰西学院的听众提供了一本很有实用价值的语法教科书,也给研究人员提供了一本"使用得颇为得心应手"的语法书。在整个19世纪前期,它一直是学习

---

① Preface de *l'Élémens de la grammaire chinoise, ou principes généraux du Kou - wen ou style antique, et du Kouan - hua.*

② 张国光等:《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第342页。

③ 忻剑飞:《世界的中国观》,第258页。

④ [法]贝罗贝:《20世纪以前欧洲汉语语法研究状况》,《中国语文》,1998年第5期,第348页。

⑤ 张国光等:《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第342页。

⑥ [法]马伯乐著,马利红译:《汉学》,《汉学研究》第三集,中华书局,1999年,第46页。

中文的主要书目，故有机会于1857年得到再版，又于1987年出了第三版，[①]并受到欧洲和来自美国的东方学者的一致赞扬和好评。

在中国哲学方面，雷慕沙对中国的佛教、道教等，尤其是佛教方面，都做出过研究和贡献。

关于佛学，他跟儒莲一起，都被认为是首先推动19世纪和20世纪初法国汉文佛典翻译和研究工作的学者。其主要作品是翻译并注释《法显传》（法文书名为 *Foe Koue Ki ou Relation des Royaumes Bouddhiques de Fa-hian*，译为《法显撰佛国记》）。但在此前，他也曾在《名人学报》、《亚洲学报》、《亚细亚论集》等刊物上发表许多关于佛教的论文，表达了前期传教士所未曾涉及的观点，提出新的看法。《法显传》一书虽然是身后出版，但却是一部划时代的作品。我们知道，入华传教士由于蔑视和不理解佛教曾极力给以攻击，因此，如果从当时工具书匮缺及西方对佛教所知甚少这一情况来看的话，该书无疑为人们提供了有关佛教的丰富知识和一种较公正的概念；另一方面，人们还可以从中发现有关古代印度乃至整个古代亚洲的历史、地理和汉文的大量资料。因为19世纪的法国汉学学派有一种倾向：从中国与其他亚洲乃至全世界的关系来考虑中国，而不是从内部研究中国，该书亦然。《法显传》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煌煌巨著，汇集了一批精辟而丰富的考证，所收文献几乎囊括了当时西方所有与西域文化有关的材料。即便是过了百年之后，人们依然可以找到他的价值，所以为历来汉学家所重视。戴密微认为：《法显撰佛国记》是雷慕沙"最重要的也是最有生气的译作，尤其是书中所附的大量注释，首次向西方人提供了对中国佛教比较公正的看法，在汉学发展历史上有着开拓性的功绩"。[②] 马伯乐（Henri Maspero）也给予高度评价：他的译作《法显撰佛国记》中提出了一个"最重要"并"不断地掀起"了汉学家们"热情"的问题，即"中国和西方世界古老的关系"和"往昔世界文化相互影响"的问题。[③]

雷慕沙对《老子》（1832）的翻译和阐释也产生很大影响。在当时，则直接影响了黑格尔对老子和道家的认识。黑格尔在雷慕沙那里认识到了

---

① ［法］艾乐桐：《欧洲忘记了汉语却"发现"了汉字》注⑦，［法］龙巴尔、［中］李学勤主编《法国汉学》第一辑，清华大学出版社，1996年。

② Paul Demiéville, *Aperçu historique des études sinologiques en France*, II.

③ ［法］马伯乐著，马利红译：《汉学》，《汉学研究》第三集，中华书局，第46页。

一个跟耶稣会传教士所展示给他的内涵截然不同的道家:原来这是一个跟形而上学及思辨有着密切关联的道家。

此外他还翻译了《论语》、《大学》、《中庸》、《书经》等,写有大量的论文,被收在《亚细亚论集》(Mélanges asiatiques,1825—1826)、《新亚细亚论集》(Nouveaux Mélanges asiatiques,1829)和《东方和历史遗稿》(Mélanges posthumes d'Histoire et de Littérature Orientales,1843)中。

在文学方面,他主要翻译了小说《玉娇梨》(1826)并编辑出版三卷本的《中国短篇小说》作为教材。《玉娇梨》一书,在18世纪的时候,黄加略神父已有翻译,但只是选译了其中的部分内容,而雷慕沙则让欧洲的读者了解了全貌。雷慕沙是第一个将该书献给法国和欧洲的读者的翻译者,也就是说,他的这个工作让中国小说正式进入西方文化,影响很大。鲁迅在其名著《中国小说史略》中称有法文译本,"故在外国特有名,远过于其在中国"。①

此外,他还著有《于阗城史》(1820),巴黎出版,这是他利用《古今图书集成边裔典》整理了于阗历史资料的一部著作。

二、儒莲和他的汉学研究②

儒莲(Stanislas Julien,1797—1873),19世纪法国另一个卓有成就的汉学家。法国奥尔良人,一个普通手艺人的儿子。从小显示语言天赋,年轻时就在该领域受过多方训练。他兴趣广泛,学业功底扎实,曾学过希腊语、阿拉伯语、希伯来语、波斯语、梵语等。巴黎求学时,希腊学教授加亚(Cail)很快发现了他的才能,1821年便任命他为法兰西学院希腊学助理教授,是年仅22岁。是时,儒莲已在刊物发表过两种希腊文的法译本。然而,不久他喜欢上了中文,跟随雷慕沙学习汉语和满语。经三个月学习便开始借助满文本把《孟子》译成拉丁文,题为《孟子的哲学、才干和信条》(1824—1829)。随后,他便迈上了汉学生涯,并不断地取得可喜的成绩。1832年当雷慕沙死于霍乱时,作为雷慕沙的得意门生,儒莲继承了老师的职位,在法兰西学院任教。1833年儒莲被接纳为铭文和美文学院

① 见《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篇《明之人情小说(下)》。

② 有关儒莲的生平和汉学经历,请参阅[法]高第(即考狄——引者)著,马军译注:《法国近代汉学巨擘——儒莲》,《汉学研究》,第八集,2004年。

(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 - Lettres)成员,1839年成皇家图书馆管理人,1859年成为法兰西学院的行政负责人。1863年,法国政府为了表彰儒莲在汉学方面所取得的丰硕成果,授予他荣誉军团指挥官的称号。[①] 儒莲虽从未来过中国,却因翻译《大唐西域记》与中国学者蒋剑人通过信,1870年又曾会晤了旅欧的中国学者王韬。[②]

在法国的汉学发展史上,儒莲是个极有影响并起过重要作用的汉学家。他是法兰西学院教授,同时又是东方语言学校教授和国家图书馆副馆长,由于他的努力,不仅使法国汉学得到巨大发展,同时使得法国汉学在欧洲的领先地位"日益明显",此外,他还培养了一批出色的汉学家,为法国汉学研究和教学队伍的形成和发展,做出过杰出的贡献。戴密微认为,儒莲是"19世纪中叶欧洲汉学界无可争辩的大师"。[③] 但作为一个具体的人,他的性格上也有一个十分明显的缺点。他是当时汉学界、印度学界大名鼎鼎的好辩者,尤其是长期来他与鲍狄埃论争不休,令人遗憾的是两位学者在这种无聊的争论中,白白耗费了许多宝贵时间![④] 因此,戴密微对他的人品颇有微言,认为他妒忌、易怒、好争吵,独揽大权,排斥对手,个性"令人讨厌"。[⑤]

儒莲的汉学成就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汉语方面,他写有《新编汉语句法结构》,全称是《汉文指南:建立在汉字位置基础上的新编句法结构》(汉文指南:*Syntaxe nouvelle de la langue chinoise fondée sur la position des mots*,1869—1870)。此书是献给19世纪英国最伟大的汉学家,牛津大学第一任汉文教授理雅各博士(Dr. Legge,1814—1897)的一份礼物。全书共分两卷,第一卷于1869年由

---

① 参阅[法]高第(即考狄——引者)著,马军译注:《法国近代汉学巨擘——儒莲》,《汉学研究》,第八集,第147页,附注21。

② 参阅[法]高第(即考狄——引者)著,马军译注:《法国近代汉学巨擘——儒莲》,《汉学研究》第八集,第145页,附注②。

③ Paul Demiéville, *Aperçu historique des études sinologiques en France*, II.

④ 儒莲与鲍狄埃(G. Pauthier)进行论战的文章主要有:《给亚洲报编辑的信》(1836),《对鲍狄埃译〈中国人关于印度的几页资料〉的批评》(1841),《对鲍狄埃最近一篇诽谤性短文中令人憎恶、不近人情的体面事情的简述》(1842),《分析、句法和汉文词典的实践练习》(1842),《对匿名而又所谓公正的朋友的被迫回应》(1871)。见参阅[法]高第(即考狄——引者)著,马军译注:《法国近代汉学巨擘——儒莲》,《汉学研究》第八集,第145页,附注21。

⑤ Paul Demiéville, *Aperçu historique des études sinologiques en France*, II.

巴黎梅索纳弗出版社(Librairie de Maisonneuve)出版,全书除题词、前言外,由四部分组成:第一二部分分别有17和29小节,就名词、动词等的语法现象分析,第三四部分是专题论述和补充;第二卷实际上是一本文化课本,1870年由梅索纳弗和西埃出版社(Librairie de Maisonneuve& Cie)出版。该教材是对其他语法书的一种补充,它的特色是,在教材中编者突出汉字的分析外,特别强调了汉语语法中词的位置不同所引起词义和语法动能的变化。这也正是儒莲汉语语法研究的特点。①

该教材是儒莲晚年的力作,在此之前,他在这方面已作过许多的努力,并积累有丰富的知识和经验。此前他出版的汉语方面的成果主要有:《汉文的字体判断》(曾作为《孟子》译本的附录刊出,1830,巴黎)、《批评的考察:关于语法的讨论》(1841)、《汉语词汇学、句法结构和分析法的实践练习》(1842)和《简单的陈述》(*Simple expose*,1842)、《汉文典籍中梵文名字的识别和标注》(1861)、《中文对话及其他》(1863,巴黎)、《三字经》(*San - Tseu - Kin*,*le livre des phrases de trios mots*,1864,巴黎,同年还出版了拉丁文译本:*San - tseu - king*, *Triumlitterarum liber*)、《千字文》(*Thsien - Tseu - Wen ou le livre des milles mots*,1864)法文译注等。② 其中《批评的考察:关于语法的讨论》是就汉语和其他语言中词的位置规则和变化所进行的讨论,《汉语词汇学、句法结构和分析法的实践练习》和《简单的陈述》也是这方面的内容,而两部汉语基础教材《千字文》和《三字经》,③则是利用中国传统文化读本进行基础汉语和文化教学(这在法国汉语教学历史上也是别开生面的),从语法和教学角度来看,也是突出了这方面的探索。尤其在《三字经》中,作者对每一个汉字都进行了解析,区分部首与笔画,强化汉字概念,使学习者一开始就认识到方块字是用部首和笔画组合而成这一概念,对于了解汉字的意义、结构和学会利用工具书都具有相当意义。这一汉语

① Stanisla Julien,汉文指南:*Syntaxe nouvelle de la langue chinoise fondée sur la position des mots*, Paris,premier volume,Librairie de Maisonneuve,1869;seconde volume,Paris,Librairie de Maisonneuve& Cie),1870.

② 他还编写过《汉法词典》(*Dictionnaire Chinois - Francais*)和《法汉词典》(*Dictionnaire Francais - Chinois*),但未完成。

③ 《千字文》中文课文后附有汉字分析、图表、214个部首、发音,以及逐字逐句的法文翻译和相关哲学、历史知识的注释;《三字经》由中文和拉丁文两种文字组成,全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是以拼音形式出现的全文,然后是句义翻译,共1068字;第二是汉字全文,每个汉字有该字部首的序号和部首以外部分的笔画数;第三是214部首,按照序号排列。

教学法对法国汉语教学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在《新编汉语句法结构》中，作者的这一观点得到更充分的展现。作者并不像其他语法书作者那样，仅仅只是对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等的词性和用法进行分析，更重要的是对一些词因位置变化所产生的词性和词义的变化进行自己独到的分析，而对一些诸如“为”、“之”、“以为”等词，作者还因其前后加入了其他词而引起的多种用法，进行了专门的论述，显得尤为详尽，令人耳目一新。作者的所有这些看法和分析，既有学术上的探讨，同时又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所以该教材的实用性也得到好评，直到20世纪，戴密微还认为，此书仍是一部“有价值”、“精到”而又“明快”的“汉语语法范本”。①

在哲学方面，他翻译有《孟子的哲学、才干和信条》(1824—1829)，该译著在巴黎以8开本出版，共2册，1825年时，译文又在雷慕沙编的《亚细亚论集》(*Mélanges Asiatiques*)第2卷上刊载过。

《太上感应篇》于1835问世，该书的出版得到东方翻译基金(Oriental Translation Fund)的赞助，书中附有400个传说、逸闻和史实。

1842年翻译出版的《老子道德经》(*Lao - tseu Tao Te King*)，由巴黎皇家出版社出版，书中附有中文本和一篇有关历年来的评论。在正式出版之前，译者曾以《老子：纯净、平静之书》的标题分别刊载在1837年12月号和1838年5月号的《亚洲报》(Journal Asiatique)上。该书的第一个译本出自克拉普罗特(Klaproth)之手，1828年刊在他的《满文文献》(*Chrestomathie Mandchou*)上，第二个译本出于鲍狄埃的手笔，于1838年问世，题为《至理和道》。② 显然，儒莲是在其他两位学者翻译本的基础上取得成绩。儒莲翻译的《老子道德经》译本的出版，在法国道教研究史上有着开拓性的意义。有评论指出，在此之前，由于传教士的翻译加入了许多基督教的观念，使得西方人的道教观念带上了“神秘主义的色彩”，形成了一种“奥妙的道教神话”，从而不同程度地曲解了道教的真实含义；而儒莲，不仅由于他精通中文，更主要的是他没有传教的任务所带来的偏见，所以能忠实于原文，使得道教的基本思想得到“廓清”，从而“结束了18世纪道教主义的哲学基督教神话”的局面。③

---

① Paul Demiéville, *Aperçu historique des études sinologiques en France*, II.

② 参阅[法]高第著，马军译注：《法国近代汉学巨擘——儒莲》。

③ 葛雷：《道教思想和法国现代文学》，载《外国文学研究》，1987年1(创刊号)，第115页。

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法国汉学家对汉文佛典的翻译和研究当推雷慕沙和儒莲。儒莲翻译出版有《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Histoire de la Vie de Hiouen - Thsang et de ses voyages dans l' Inde*, 1853)、《大唐西域记》(*Mémoires sur les Contrées Occidentales*, 1857—1868)、《汉文典籍中梵文名字的识别和标注》(1861)、《中国、印度哲学和亚洲地理文集》(1864)等。他在佛学研究方面最大的贡献是关于玄奘的两部译作:《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和《大唐西域记》。这两部作品由于译文"精确和谐"而"令人惊叹",跟雷慕沙的译作《法显撰佛国记》一样,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期法国的汉文佛典翻译和研究上有着重要的意义,"标志着他在前人的基础上取得了巨大的进展"。① 上述两书曾合刊,书名为《佛教朝圣者的旅行》(*Voyages des pélerines bouddhiques*),1858 年巴黎版。

儒莲对中国俗文学也情有独钟,主要体现在他翻译出版了两出元杂剧和向西方翻译介绍了被称为"才子佳人"的话本小说。

他从《元人百种曲》中选译了两个剧本《灰阑记》和《赵氏孤儿》。《灰阑记》于 1832 年在伦敦出版,8 开本。书的出版受东方翻译基金资助,是"第一本中国戏剧的西文全译本"。② 众所周知,《赵氏孤儿》在西方是一部很有影响的中国戏剧,1731 年马若瑟神父的译本曾在欧洲产生巨大影响,但马若瑟神父的译本只是部分内容,且诗歌部分也没有翻译,而儒莲的译本是"逐字逐句地翻译",还附有全部曲子。③ 该书于 1834 年在巴黎问世,8 开本,后又于 1735 年再版。此外,他翻译了《西厢记》(1861),但该书在他逝世后才得以出版,即 1872—1880 年。

在诗歌和小说方面,儒莲译出了《白蛇精记》(1834)、《平山冷燕》(1860)、《玉娇梨》(1863)、《中国小说》(1860)、《刘小官雌雄兄弟》(1530)、《滕大尹鬼断家私》(1830)、《蔡小姐忍辱报仇》(1861)、《花木兰故事》(1832)等。在 19 世纪的法国,《玉娇梨》的法文本已由雷慕沙译出,名为《两兄妹》,于 1826 年在巴黎出版,两卷 12 开本,1827 年还出了伦敦英文版,也是两卷 12 开本的。儒莲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了重译,于 1863 年推出《玉娇梨》的新译本,题为:"玉娇梨,两兄妹,伴随着历史和哲学评

① Paul Demiéville, *Aperçu historique des études sinologiques en France*, II.

② 参阅[法]高第著,马军译注:《法国近代汉学巨擘——儒莲》。

③ Paul Demiéville, *Aperçu historique des études sinologiques en France*, II.

论的一种新的传统”，也是两卷本，于1864年在巴黎出版。而《白蛇精记》和《平山冷燕》则是他首先翻译、介绍给法国和欧洲的读者。可以说，他向西方翻译介绍被称为“才子佳人”的话本小说，在汉学发展史上是一大突破。

儒莲对中国工艺、农业方面的研究成就并不比文学逊色，这在19世纪法国汉学家中独树一帜，令19世纪法国汉学别开生面。他翻译有《天工开物》(1830)、《桑蚕辑要》(1837)、《河北的养蚕》(1842)、《关于中国木版印刷、石印和活字印刷的资料》(1847)、《公元6世纪的中国印刷术》(1847)、《论芝麻》(1856)、《景德镇陶录》(1856)等。其中以《天工开物》的翻译和介绍影响更为深远。1830年，儒莲首次把《天工开物·丹青》章关于银朱的部分译成法文，题为《论中国的银朱》。译文摘自中文名为《天工开物》的技术百科全书，发表于《新亚洲报》第5卷中。1832年，该译本被转译为英文，刊发于《孟加拉亚洲文会报》卷一中。1847年，儒莲的另一篇法文译文《铜合金·白铜·锣钲》，译自《天工开物·五金》章，在译成英文后又被译成德文刊于德国《应用化学杂志》卷41上。1837年—1840年，儒莲在《桑蚕辑要》一书中引用的《天工开物》论桑蚕部分被摘译为意、德、英、俄等欧洲语。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达尔文(1809—1882)在读了儒莲翻译的《天工开物》中论桑蚕部分的译本后，大加赞扬。达尔文在他的《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1868)中把我国古代养蚕技术措施作为论证人工选择和人工变异的例证之一，他在谈到养蚕时写道：“关于中国古代养蚕的情况，见于儒莲的权威著作。”1869年，儒莲和法国化学家商毕昂把《天工开物》有关工业各章的法文摘译，集中收入在《中华帝国工业之今昔》一书中，在巴黎出版。[①] 1851年德理文其所著的《中国和农业及园艺的研究》末尾谈到，儒莲曾奉公共工程部(Ministre des Travaux publies)之命，翻译了《授时通考》的第72至76册，这是一套关于农业的丛书，译文的标题为《桑蚕辑要》，1837年巴黎版，此书被多次转译，由此证明它受到的重视程度。[②]

---

① http://218.24.233.167:8000/Resource/Book/Edu/KPTS/joy02051/0006_ts086052.htm

② 意大利文，1837年都灵版，4开本；德文，1837年斯图加特、图宾根版，8开本，1844年重版；英文，1838年华盛顿版，8开本；俄文，1840年圣彼得堡版，8开本；希腊文修订本，1847年巴黎版，8开本。[法]高第著，马军译注：《法国近代汉学巨擘——儒莲》。

除此之外，他还翻译有《突厥历史资料》，译自《图书集成·边裔典》，刊《亚洲日报》(*Journal Asiatique*)第3册，1864年出版。《台湾岛的火山》，刊《铭文学会与会报告》(*Comptes rendus de l' 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第10册，1840年出版。

三、毕欧和他的汉学研究

一般认为，19世纪前期，在法国的许多汉学家中，最有成就、影响最大的有三位，那就是雷慕沙、儒莲和毕欧(E.·Biot，1803—1850)，但没有资料介绍毕欧曾在法兰西学院或东方语言学校中工作过，他似乎是一个独立于上述两个机构的19世纪上半期另一个博学多才的重要汉学家。

毕欧也是儒莲最优秀的学生之一，他写有大量的论文，涉及到中国的科学、天文、地理、气候、教育、工艺等，影响很大。1847年，他被选为铭文学院院士。他的著作有《关于远古时代中国领土所有权的条件》(*Mémoire sur la condition de la proprété territoriale en Chine depuis les Temps les plus anciens*，1838)、《中国公共教育和儒学史》(*Essai sur l'histoire de l'instruction publique en Chine et de la corpolation des letters*，1847)、《周礼》(1851)的翻译等，都受到了后世的重视。他的《关于远古时代中国领土所有权的条件》被认为是涉及到了"还没有人问津"的有关中国古代领土和经济的问题；译作《周礼》，实际上为欧洲人了解中国"古代宗教和社会"提供了"有价值的证据"。《周礼》在他去世后在他的父亲和儒莲的关心下得以出版(1851)，因译文"质量之高"，被誉为至今仍是西方"绝无仅有"的译本，并有幸被列入巴黎国家印刷局再版书目。[①] 有评论认为，19世纪欧洲中国史研究引人注意和有趣的主题之一是"分析中国历史长期存在的一些现象并考察中国社会固有的特征"，而在这条道路上一部先锋的著作就是毕欧的《中国公共教育史和儒学史》。该书试图在可得到的史料《玉海》和《文献通考》的基础上"描述古代以来的教育机构和借以产生的社会组织"。[②] 此外，毕欧还写过有关《诗经》的长篇专论，从文化角度对《诗经》进行了探

① Paul Demiéville, *Aperçu historique des études sinologiques en France*, II.

② 见巴斯蒂著，胡志宏译：《19、20世纪欧洲中国史研究的几个主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唐史学科网。

索，被认为是这一时期最主要的研究文章。[①]

毕欧应该是19世纪欧洲最具革新精神、新观念的中国史专家。

四、德理文和他的汉学研究[②]

德理文侯爵（Le Marquis d'Hervey de Saint Denys，1822—1892），1822年5月6日出生于巴黎一个富裕的家庭，父亲为一名男爵，母亲为第一帝国一名将军的女儿。1858年父亲去世，德理文被过继给了叔父，并继承了"侯爵"的称号。德理文自幼在家里接受来自家庭教师比较自由的教育，19岁时进入巴黎东方语言学校学习中文和满文。自此投身于中国研究，于1851年出版了《中国农业和园艺学研究》，研究那些可能适应西方水土的中国植物和动物；1859年，出版了《欧洲面前的中国》，树立了人种学家的名声；在1867年巴黎世界博览会上，德理文侯爵是中国展区的专员；1874年，他继法国著名汉学家儒莲教授成为法兰西学院汉学的第三任主座教授，主讲中文和满文；接着被授予法国荣誉军团骑士勋章；1878年，他被选为法国碑铭和美文学会成员，1888年成为该学会的主席；1888年12月9日又成为法国历史－语言学部通讯员。1892年11月2日德理文在其巴黎公寓内逝世，葬于蒙帕纳斯公墓。

德理文的汉学成果主要在于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翻译，主要有《唐诗》（*Poésies de l'époque des Thang*，1862）、《离骚》（1870）、《三字经》（1873）及《今古奇观》12篇小说的翻译（1885，1889，1892），影响最大的是唐诗的法译。"中国诗词曲在法国的风行，无疑应归功于法国汉学家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德理文侯爵，他翻译的中国诗词曾被第三帝国时期的文学沙龙奉为脍炙人口的佳作，他的译文一直流传至今"。[③] 德理文1862年出版于巴黎的《唐诗》是第一部在西方正式出版的唐诗法译集。德理文从《唐诗合解》、《唐诗合选详解》、《李太白文集》、《杜甫全集详注》四部唐代诗集中选译唐诗，共收入35家唐代诗人的97首诗作。这部唐诗译集以一篇对中国古典诗歌（至唐代以前）的长篇分析文章为序言，题为《中国的诗

---

① 钱林森：《法国文学在中国》，第51－52页。

② 本小节作者蒋向艳。

③ ［法］彼埃·卡赛：《中国古典文学在法国》，《法国汉学》第四集，中华书局，1999年，第283页。

歌艺术和韵律》，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中国诗歌的发展，由《诗经》叙至《离骚》、汉赋、六朝诗和唐诗；第二部分由汉字入手，讲解唐以前汉诗体（如四言、楚歌）和唐代诗体（如绝句、律诗）等的韵律。通过这篇序言，尤其是第一部分，德理文表述了他的中国古典诗歌观。他主张以诗歌考察民风，认为"每个历史年代所汇集的诗歌正是反映一个民族风俗人情的最忠实的一面镜子"，[①]因此，"切近地研究中国社会，从其文学作品中寻找时代社会风貌最突出的特征，是一件极富有意义的事"。[②] 基于这一理由，德理文选择了当时在西方尚无一个比较全面的法译本的中国古典诗歌的精华——唐诗——进行翻译。在序言中，德理文时常将中国历史、文化、诗歌和汉语跟欧洲历史、文化、诗歌和语言做比较，展现两者的共同之处，也揭示出两者的不同。比如通过中国历史与古希腊历史的比较，认为中国"置于世界各民族的消长变动之外"，[③]是一个"同质、均一的"（homogène）民族，"是一个不受一切外界影响独立发展起来的社会"，"她并非不曾发生过变革，而只是不曾发生过天翻地覆的变化，而从古至今，一系列的大乱却极其频繁地改变了世界其他地区的政治形式"。[④] 在德理文看来，这是中国民族、中国历史与世界其他民族及其历史最大的不同，也是中国民族最大、最突出的特征。再如，他认为《国风·魏风·陟岵》是《诗经》最有特色的一首诗，如果与产生于差不多相同时代的西方最古老的诗——荷马史诗《伊里亚特》相比，则会形成极其鲜明的对比：《伊里亚特》里，战争频繁，围城攻城无休无止，战士作战的豪情感染着诗人及其笔下的英雄们；而《国风·魏风·陟岵》则描绘了一个留恋家庭生活、思乡心切的年轻战士和一个召唤儿子弃军归家的母亲；不仅母亲在呼唤儿子归家，家里的其他成员——父亲和兄长也无一例外地呼唤和叮嘱儿子和弟弟不要顾念光宗耀祖，而要尽早返回故里。德理文由此指出，古希腊和中国不同的历史遭遇决定了两者形成对待战争的截然不同的态度。他认为，《诗经》以及《尚书》的《尧典》、《舜典》反映了上古时期中国人最主要的性格特征：爱好和平、劳动和家庭，敬重王权，尊重年长者，性格温顺而又坚忍不拔，长于抵

① Le Marquis d' Hervey - Saint - Denys, *Poésies de L' époque des Thang*, Amyot, Paris 1862, P. 13.

② Le Marquis d' Hervey - Saint - Denys, *Poésies de L' époque des Thang*, P. 9.

③ Le Marquis d' Hervey - Saint - Denys, *Poésies de L' époque des Thang*, P. 8.

④ Le Marquis d' Hervey - Saint - Denys, Poésies de L' époque des Thang, P. 14.

御。另一方面，德理文通过对中国古典诗歌的考察，得出了他对于时代民族风貌的一些发现和意见。比如他从《诗经》到后代诗歌内容的变化，看到中国妇女社会地位和生活状况随着历史的进程发生了巨大变化：从远古时代男女比较平等、妇女地位比较高并享有比较大的自由和自主权到地位的急剧降低、所享有的自由和平等越来越少。其二是对中国社会自上古时代就存在的结拜兄弟习俗以及中国男性之间尤其是文人之间友情的认识。其三是对于中国人眷恋家乡情感的认识。这些意见都十分中肯，且显示了比较分析的学术眼光。

德理文的唐诗选译分成四部分，分别为李白诗、杜甫诗、其他著名诗人的诗以及名气略逊诗人的诗；以李白和杜甫两位诗人选诗最多：李白 24 首，杜甫 23 首（包括误为崔灏作的《前出塞》一首）；这两位诗人的诗被放在译集的开头，并以李白为第一位，表现了译者对于李杜尤其是李白诗歌的重视；译诗前附有诗人的生平和诗作介绍，也以李杜介绍最为详细。其他诗人所收的诗则从 1 至 5 首不等。跟他在序言中所提出的以诗歌考社会风俗的观点相呼应，德理文注意选择那些最能展现时代风采和特色的名家名作。比如李白的诗，他选译了表现历史题材、吟咏历史人物的《金陵》、《侠客行》、《于阗采花》、《乌栖曲》，表现游侠、边塞题材的《行行游且猎篇》、《塞下曲》，表现民风民俗的《子夜吴歌》四首、《采莲曲》，表现怨妇题材的《白头吟》、《秋思》、《乌夜啼》，为唐明皇宫廷创作的诗歌《春日行》、《清平调词》，表现宫女生活的《宫中行乐词》，表达人生感慨、纵情饮酒寻欢的《江上吟》、《对酒》、《春日醉起言志》、《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将进酒》和《悲歌行》等。

作为一名享有盛名的汉学家，德理文的唐诗翻译较忠实于原文。他在翻译时，认真阅读了《唐诗合解》、《唐诗合选详解》、《李太白文集》和《杜甫全集详注》四部诗集及其注释，对他正确理解原诗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唐诗》中，德理文将有关的传说、历史故事和解释都在注释中详细地注出，如他译李白的《金陵》："六代兴亡国，三杯为尔歌。苑方秦地少，山似洛阳多。古殿吴花草，深宫晋绮罗。并随人事灭，东逝与沧波"，在译诗后做了六个注，分别解释"六朝"与"南京（金陵）"的关系、"秦地"、"洛阳"、"吴"、"晋"和"沧波"，对这几个中国朝代名和地名的历史意义做了详细的解释，使欧洲读者阅读此诗能够对此诗所吟咏的对象——金陵城的历史背景有一个了解。他所翻译的其他诗歌也是这种风格。注释详尽成为《唐

诗》译诗集最大的特点之一，译诗后的注释所占的篇幅有时远远超过译诗本身，从篇幅上看，似乎注释是主体，译诗反而是次要的了。

德理文翻译这本《唐诗》的目的，如其序言所表明的，是要为欧洲读者提供一个比较清晰的唐诗译本，让他们通过阅读这些所选的唐诗，看到中国唐代社会面貌的一些基本情况；他在选择诗歌进行翻译的时候，尽量选择那些被中国人视为名作的诗歌，使他的选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典型性。从译文本身来看，德理文翻译的诗句都比较长，在形式上更接近于散文诗，这是由于德理文翻译中国诗时，习惯于按法语的思维方式，将原诗缺省的主语一一补出的缘故。

德理文的《唐诗》存在跳译、漏译或译一半的情况。如翻译李白的《将进酒》，他只翻译了16句，从"黄河之水天上来"到"唯有饮者留其名"，而中间的"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侧耳听"以及最后部分的七句都没有翻译。这可能是由于翻译这部分需要做许多注释但对理解本诗劝酒的宗旨影响并不大的缘故。李白的《悲歌行》也只翻译了前十四句，对于原诗每部分开头的"悲来乎，悲来乎"没有在译文中翻译出来，但在第一个对题目《悲歌行》的注解中注明了这两句在原诗每部分为"标志性的感叹"。这首诗后半部分，从"悲来乎，悲来乎！凤凰不至河无图"到最后"莫谩白首为儒生"都没有翻译。这本《唐诗》也存在一些小瑕疵，如在介绍诗人李白时，称"李白"是"李太白"的简称，这显然是一个误解。"太白"是李白的字，"白"才是他的名，不存在"李太白"简称"李白"之说。在这本《唐诗》里，有几首诗的作者被弄错了：如柳宗元的《渔翁》被误为杨炯所作，杜甫的《前出塞》之"挽弓当挽强"则被误为崔灏之作。另外，晚唐的重要诗人中，《唐诗》只收入了李商隐，而缺少杜牧，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遗漏。

德理文的《唐诗》出版后，不断被别的译者所参考，在20世纪末还引起了中国诗界的一段公案。从第二部中国古典诗歌法译集朱迪特·戈蒂耶(Judith Gautier，1845—1917)的《玉书》与它相重复的选诗和翻译特色来看，《玉书》很可能借鉴和参考了《唐诗》；后来，德理文侯爵的《唐诗》和朱迪特·戈蒂耶的《玉书》又被德国人汉斯·海尔曼(Hans Heilmann)参考，转译而成德文《中国抒情诗》，于1905年出版。另一个德国人汉斯·贝特格(Hans Bethge，1876—1946)又根据《中国抒情诗》、《玉书》和《唐诗》于1907年出版了唐诗德译《中国之笛》(*Die Chinesische Flote*)。奥地利作曲

家、指挥家古斯塔夫·马勒(Gustav Mahler,1860—1911)根据《中国之笛》中的唐诗于1908年谱写成交响性套曲《大地之歌》,此曲成为他的代表作品,流传至今。1998年5月,一支德国交响乐团来北京演奏了源于唐诗的乐曲《大地之歌》,引起中国诗界的一阵轰动,为此有学者专门研究考证《大地之歌》中唐诗的来源。实际上,《大地之歌》唐诗最初的来源正是德理文的这本《唐诗》。从这个意义上说,德理文的唐诗法译工作不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对中西文化交流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唐诗》译集由于译本珍贵,于1977年由法国"自由地"出版社(Champ Libre)再版。美国汉学家薛爱华(Edward. H. Schafer)称:"他百年前的这些译作,与当今美国学者的唐诗佳译相比,也毫无逊色,甚至要好过许多译本。"①

在19世纪,德理文曾先后出版过三个《今古奇观》小说的选译本,它们分别是《中国小说三篇》(1885),收入《今古奇观》第39卷《夸妙术丹客提金》、第10卷《看财奴刁买冤家主》和第27卷《钱秀才错占凤凰俦》;《中国小说三篇》(1889),收入第23卷《蒋兴哥重会珍珠衫》、第25卷《徐老仆义愤成家》和第33卷《唐解元玩世出奇》;以及《中国小说六篇》(1892),收入第32卷《金玉奴棒打薄情郎》、第38卷《赵县君乔送黄柑子》、第4卷《裴晋公义还原配》、第11卷《吴保安弃家赎友》、第37卷《崔俊臣巧会芙蓉屏》和第24卷《陈御史巧勘金钗钿》,这三个选本共收入了《今古奇观》12篇小说。1999年,这12篇小说的法文译本由巴黎"中国蓝"(Éditions Bleu de Chine)出版社分两册重印:《中国小说六篇》。德理文所选译的这12篇小说主题各异,反映了译者在从事小说翻译时与他从事唐诗翻译所奉行的相同原则:对所译小说精心挑选,以期读者能通过这些故事探求特定时期中国社会生活的风貌和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以及一些意味深长的哲理。但同时德理文又受到当时西方汉学界对于《今古奇观》评价的影响。在当时,《今古奇观》被西方视为最有代表性的中国小说,但由于其中所含的一些"淫秽"描写而受到西方汉学家的批评。德理文认为,这些小说中的淫秽文字"绝不是经常出现的,而似乎是对淫诗秽词的引用,或多或少是应景

① 江原:《中国古典诗论在西方》,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网站:http://www.cass.net.cn/chinese/s15_wxs/hanxue/03.htm

之作”，并且是“完全不可翻译”[1]的，因此在其译文中有意将这些段落删除，认为删去这些文字并不会对故事本身造成任何影响。这样的译文在客观上造成了对《今古奇观》小说原文的不忠实性，只能算是一种“砍译”(couper pour traduire)。

除了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翻译，德理文的汉学研究成果还包括马端临《文献通考》“东南夷”和“西南夷”两部分的翻译：两卷《中国异族人的人种学研究》(1876、1883)，以及《孔教教义和其他学派教义论文》(1887)。此外，德理文对于睡眠和梦也有所研究，而且至今仍受心理分析学家和神经生理学家肯定。

五、巴赞和他的汉学研究

安托讷·巴赞(Antoine Bazin，1799—1863)，19世纪法国重要的汉学家之一。法国塞纳-瓦兹(省)的圣布里斯人，出身于名医世家。始习法律，后成为儒莲学生，同时随雷慕沙学习汉语。巴赞是个大器晚成的学者，他的名字被列入“亚洲协会”(Société asiatique)成员名单，成为一个我们通常所说的汉学家，得等到1839年他40岁的时候。[2]

巴赞是个在中国白话和通俗文学方面卓有成绩的汉学家。

19世纪的法国汉学，虽然雷慕沙开创了汉语教学，并编写有《汉语语法基础》这样的教材。但是，至此为至，法国的汉语教学主要还停留在古文教学上，而白话教学和教材的使用，尚未真正开始。法国白话教学真正开始是在东方语言学校，使用的第一部教材就是巴赞编写的《官话语法》(*Grammaire mandarin*，1856)。

对于汉语，巴赞一向重视白话研究，并试图在教学中实践白话教学。该书出版之前，他曾在《亚洲日报》(Journal Asiatique)上发表有《关于交趾支那词典的报告》(1840)、《论汉语白话的总原则》(1845)、《关于一本汉语白话实践课本的报告》(1846)、《在“亚洲协会”上关于中国古典名著选的报告》(1846年)等文章，着重就白话问题进行了论述，提出了自己的看

---

① D'Hervey Saint-Denys, *Trois nouvelles chinoises*, traduit du chinois Paris, Ernest Leroux, 1885, Préface, P. X.

② *Un siècle d'enseignement du chinois à l'Éco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1840—1945, sous la direction de Marie-Claire Bergère et Angel Pino, P. 38.

法。而且，在1848—1849年间，他就已正式开设过“白话汉语课程”。[①] 所有这些，都可以说是他编写《官话语法》的前奏。

《官话语法》的全称是《白话官话，或汉语白话的总原则》（*Grammaire mandarine, ou Principes généraux de la langue chinoise parlée*），实际上是一部白话语法著作。全书除引言外，共有10节，分别就名词、形容词、代词、动词、副词、介词和后置词、连词、感叹词，以及与上述词类相关的句法进行了分析。最后第10节，又分为两小节，分别就礼貌语和现代文体跟官话进行了对照。[②] 该教材的特点是，编者就白话与文言中的表示“关系”和“条件”、重读的重要性等进行了“隽智的分析”。[③] 他的这一创新意识，在当时是独树一帜的，因此，在汉学界引起极大反响。当时著名汉学家朱尔·莫勒（Jules Mohl，1800—1876）发表文章说：巴赞在他的《官话语法》里所分析的正是他那个时代中华帝国“上层阶层所说的一种方言”，在这本书里，巴赞以他“新的证据”和“最大的努力”，重新回到了他十几年的主题上，再一次地指出了“古典文体，从来就不是用来讲话的”，而只是用来“进行写作”，“古典文体”是“表达人们的思想”而“不是用来说话”的工具，但它又跟“当今人们所讲的语言”也就是“官话”十分的“相似”，因此说，“书面语”是“口语的骨骼子”。[④] 泰奥多尔·帕维（Théodore Pavie，1811—1896）也指出，《官话语法》的作者，用现代的书名为我们提供了一部“充满着新概况”的书，在这本书中，“他善于用识别的方式，将他的考察和有关的评论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而“这些观察是他长期努力不懈研究的成果”。[⑤]

---

① *Un siècle d'enseignement du chinois à l'Éco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1840—1945, sous la direction de Marie - Claire Bergère et Angel Pino, P. 48.

② Antoine Bazin, *Grammaire mandarine, ou Principes généraux de la langue chinoise parlée*, Paris, imprimé par autorisation de l' Empereur àl' imprimerie imperiale, 1856.

③ Paul Demiéville, *Aperçu historique des études sinologiques en France*, II.

④ Jules Mohl, *Rapport sur les travaux du Conseil de la Société asiatique pendant l'année* 1855 - 1856, fait à la séance annuelle de la société, le 23 juin 1856, Journal asiatique, Paris, Ve série, VIII, *juillet* 1856, *p.* 61，转引自 *Un siècle d'enseignement du chinois à l'Éco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1840—1945, sous la direction de Marie - Claire Bergère et Angel Pino, Asiathèque, P. 39.

⑤ Th. Pavie, *Grammaire mandarine ou Principes généraux de la langue chinoise parlée*, par M. Bazin, professseur àl'Éco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etc. Journal asiatique, juin 1857, Ve série, IX, P. 558 - 567. 转引自 *Un siècle d'enseignement du chinois àl'Éco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1840—1945, sous la direction de Marie - Claire Bergère et Angel Pino, P. 39.

该书被称为“欧洲第一个”把文言和白话区分开来的汉学家。[①]《官话语法》是一部有开拓性的教材，因为它主要是为“商人、传教士和一些认为只能在法国进行中国文学研究的外国人”[②]所编写的，所以比较实用。巴赞也成了东方语言学校乃至整个欧洲的第一个现代汉语教授。

巴赞还以他的老师儒莲为榜样，执著地从事中国戏剧作品的翻译和研究，他的四部元曲作品的翻译受到了好评，《㑇梅香》、《合汗衫》、《货郎旦》和《窦娥冤》(1838 年发表于《中国戏剧》)被称为“精译本”。[③]他还翻译有《琵琶记》(1841)，撰写了作为元代文学概论的《元朝一世纪》，或称《蒙古帝登基至明灭亡时期的中国文学史概况》一书，曾分别于 1850、1851、1852 年在巴黎《亚洲日报》上刊出。

此外，他还出版有《论中国学校的内部组织》(1839)、《山海经简介》(1839，1840)、《当代中国》(1837 至 1853)、《中国市政行政机构研究》(1854)、《北京医学研究院历史简介》(1856)、《中华帝国宗教社团的起源、历史和构成》(1856)、《北京帝国科学院的历史、结构和工作研究》(1858)等，皆在巴黎出版。其中《当代中国》是一部有分量的作品，与鲍狄埃(G. Pauthier)合作的成果，全称为《当代中国，或根据中国资料撰写的有关这个庞大帝国的历史、地理和文学的描述》。共分两部分，第一部分由鲍狄埃撰写，内容包括：前言、北京概述、中国 18 个省份的行政区划、中国行政政治组织、中国语言和哲学；第二部分由巴赞撰写，内容有：中国艺术、文学和风俗，中国戏剧、当代文学、自然史、农业、园艺、工业、节日、娱乐，最后是参考图书目录。该著作由巴黎非尔曼·迪多兄弟出版社出版。

六、哥士耆、冉默德、德韦理亚和微席叶[④]

这几位汉学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原来都是法国驻华使馆的翻译人员，而且在中国任职多年，十分熟悉中国情况，能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

---

① Paul Demiéville, *Aperçu historique des études sinologiques en France*, II.

② [法]白乐桑：《法国汉语教学浅论》。

③ Paul Demiéville, *Aperçu historique des études sinologiques en France*, II.

④ 有关这个几位汉学家的生平和汉学成果，参阅：“*Entre sinologie pratique et sinologie savante, les interpretes – Professeurs de l' Éco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vivantes* 1971—1930”, *Un siècle d'enseignement du chinois à l'Éco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1840—1945, sous la direction de Marie – Claire Bergère et Angel Pino, PP. 131 – 168.

回国后又都在东方语言学校担任汉语课程。也正由于他们熟悉中国，又在中国工作多年，所以在教学中都十分重视“实用性”，这也正是跟巴赞所提倡的教授现代汉语或者说官话的思路是相吻合的。这一批汉学家被评论家们称之为“间于实验汉学家和学者汉学家”之间的“翻译员教授”（les interpretes – Professeurs）。[①]

1. 哥士耆（Alexandre Kleczkowski，1871—1886），一名出色的汉学家。哥士耆原是波兰公爵，在法国做译员，后居留法国。1847 年来到中国，被任命为法国驻上海领事馆翻译，后又去了宁波任领事馆翻译。他拥有法律学士学位，也正因为此，1833 年 8 月 20 日的一条皇家法令，使得他有机会以这样的资格担任商务部门的翻译工作。1850 年加入法国籍。1855—1857 年转任澳门任使馆随员，后任二等参赞。1862 年至 1863 年任法国驻北京使馆代办。1863 年，他阔别了生活、工作了 17 年的中国，返回了法国，同时第一次要求在东方语言学校担任汉语教席职务。后来，他先在索尔邦大学开设汉语课程，聆听的有哲学家、研究者和各类行政官员。1871 年被正式任命为巴黎东方语言学校汉语教授。他根据长期在中国工作的经验和体会，在教学中十分重视汉语口语的教学和实践。因此，他在巴黎东方语言学校任教期间，特别许下诺言，他教的学生不仅将“会说、会读、会写”，而且还能说“像本地人（即中国人）一样”流利的汉语。[②] 他自编的教科书《汉语口笔语渐进大全》（*Cours graduel et complet de chinois parlé et écrit*，也译为《中国语文教科书》，1876），便是按照这一指导思想编写而成。该书由巴黎梅索纳弗和西埃出版社（Librairie de Maisonneuve & Cie）出版。教材分法文和中文两个部分：法文部分共九章，对汉字的有关知识、书写方法、语音系统等做了介绍；中文部分共 14 课，课文为口语体，竖排，七个字一列，每页七列，共 49 个字，编为方框，放在页面上半部，每个字下有注音，并在编者认为需要加注的地方加注，注释内容包括词的发音、含义、语法现象、句法等；此外还有简单段落大意翻译等。第 14 课附有 214 部首。[③] 不

---

① “*Entre sinologie pratique et sinologie savante*，*les interpretes – Professeurs de l' Eco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vivantes* 1971 – 1930”，*Un siècle d'enseignement du chinois àl'Éco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1840—1945，sous la direction de Marie – Claire Bergère et Angel Pino，P. 131.

② 胡书经《法国汉语教学和研究的历史》。

③ Le comte Kleczkowski，*Cours graduel et complet de chinois parlé et écrit*，Volume I，Librairie de Maisonneuve & Cie，1876.

难看出，这也是一部颇具特色、编写体系相对完整的教材，而且因课文为当时北京很流行的口语，尤其是商人们讲究礼貌客套的日常交际话语，编者又注意到体现汉字规律，在课文编排上做到循序渐进、由简到繁逐步加大汉字难度等，因此，实用价值很高，得到了使用者和评论者充分的肯定。[①]不过也有评论认为，该教材是效仿1829年中国出版的《中国语文法》所编写，并以汉字笔画多少组织例句，因此人们对在法国使用这样的教科书能否达到预期的教学目的产生了怀疑。[②]

2. 冉默德（Maurice Louis Marie Jametel，1856—1889），巴黎东方语言学校学生，在华做过翻译工作。1886年5月16日，他戏剧性地战胜了他的两位对手，[③]接替哥士耆的职务，担任了巴黎东方语言学校"汉语课程"的教学工作，但直至1889年才被任命为该学校的教授，离他逝世不到4个月。他著有《北京的搪瓷工匠》（1886）、《北京：中华帝国回忆》（1887）等书，编著有《西藏中国碑铭》第一编（1880）、《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校学生实用公文》（1886）等。

3. 德韦理亚（Gabriel Devéria，1844—1899），也是一名卓有成就的汉学家。他是哥士耆的学生，1860年，任外交部随员，来华从事翻译，相继在天津、福州两地工作，1863年归国，1889接冉默德的工作，担任巴黎东方语言学校汉语课程并从事汉学研究。写有《根据中国资料，中国安南边界以及该地区地理和种族》（1866）、《中国与安南——越南关系史》（*Histoire des Relations de la Chine avec l'Annam - Viêtnam*，1880）等书。他的《中国与安南——越南关系史》是一部十分有价值的著作，曾获1888年儒莲奖。该书的资料全部获至于中文，也是德韦理亚第一次加以翻译和注释，全书还附有地图。1899年，沙畹在《亚洲杂志》上发表的《德韦理亚简介》中谈到这部作品时说："在《中国与安南——越南关系史》这部作品中，德韦理亚为我国的政府人员提供了关于中国和安南间宗祖和附庸关系的翔实资料，通过他对边界的描绘，为Tonkin边界会员会（La Commission d'abornement）

① Paul Demiéville, *Aperçu historique des études sinologiques en France*, II.

② 胡书经：《法国汉语教学和研究的历史》。

③ 一位是比他年长12岁的德韦理亚，另一位是地位十分重要的该学校的行政领导谢非（Schefer）。

作了长期而艰苦的工作。"①

晚年，他对中国的伊斯兰教、摩尼教以及中国周边地区少数民族的语言产生兴趣，并写有不少颇有影响的相关著作。

4. 微席叶（Arnold Vissière，1858—1930 年），一位久居北京，学识渊博、严肃认真，但态度谦虚从不自我标榜的汉语教师。他曾在外交使团充任参赞，熟悉北京官话，善于起草礼仪性文件。这一切，自然有利于他教学工作的开展。他接替了德韦理亚的工作，在巴黎东方语言学校担任汉语课程教学，整整工作了三十年，还结合自己的教学编写了《中文文选》（1907）、《汉语（北京官话）入门》（*Premières leçons de chinois, langue mandarin de Pékin*，1909）等书作为教材，尤其是《汉语（北京官话）入门》，是一本具有特色的中文课本，得到很高的评价。该教材是编者多年汉语研究、教学和教材编写经验的总结。此前，他曾在《中国、西伯利亚》杂志上发表了《汉语实践课》（1901），随后又出版过《汉语入门》（1904），编写过《汉语语音法文拼写法》等作品。在这些研究和作品中，可以看出作者的汉语研究水准和丰富的教学经验，也可以看出他对汉语口语和实用关系的重视，而这一特点，在《汉语（北方官话）入门》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所以他的教材备受青睐，成为"很多法国乃至外国汉学家身边的必备书"。② 该书不仅有机会经过多次修改（1909—1928）得以再版，而且他的汉字注音方法被法国远东学院和整个法国汉学界一直采用至新中国拼音方案的制订和使用。他所写的《汉语语音法文拼写法》，也被荣称为比金尼阁拼音方案更易于法国初学者使用的读物，一直为法国外交部、法国远东学院所使用。

此外，他对中国的伊斯兰教也颇有兴趣，写有《伊斯兰教研究》（1907—1929）；又因对中国数学史的兴趣，促使他写出《关于算盘的起源和它衍生筹算的研究》（1890）一书，该作品是 19 世纪难得的一部介绍中国算数的作品。

七、古兰和他的汉语研究

古兰（Maurice Courant，1865—1935），也是一位实验型的汉学家。里昂

① 转引自 *Un siècle d'enseignement du chinois à l'Éco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1840—1945，sous la direction de Marie－Claire Bergère et Angel Pino，P. 138.

② Paul Demiéville，*Aperçu historique des études sinologiques en France*，II.

大学于1900年开设汉语课程，一开始就由他主持，直至1935年。

古兰早年曾先后在中国、日本、朝鲜当过领事，在华期间曾深入研究过戴遂良的《汉文入门》和德国汉学家嘎伯冷兹(Georg von Gabelentz)的汉语语法书。1914年，他根据自己在华搜集的资料和研究，结合教学经验，写成了《中国北方官话语法》(*Grammaire du Kwanhua sptentional*)一书，在里昂出版。该书颇具创建性，不仅具体地分析了实词、虚词的特性，而且就汉语句法结构以及近代汉语若干语法难点等，都一一做了分析。同时，他明确指出：古今中国学者对汉字的研究是构成汉语语法研究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尤其是，他还指出了汉语双音节和多音节这一特点，颇具学术价值。遗憾的是，他的这一正确看法没有得到当时汉学权威的承认，直到二十年后，马伯乐还对他所列举的双音节词进行逐个的否定。①

他的一部名为《中国人的古典音乐史论》(1912)著作，颇受好评，被称为是一部"精确、全面和纯书本的知识宝库"。② 此外，他还编写有4卷本的《朝文书目》(1894—1901)，并从1902年开始，编写《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汉、朝、日文书籍目录》。巴黎国立图书馆收藏有法国乃至整个欧洲最丰富的汉文书籍和稿本著作特藏，其核心部分要上到17—18世纪入华耶稣会传教士寄往法国的中文图书和著作稿本，但古兰这部目录收录有哪些书稿，是否完成，笔者手头无资料可引。

第三节 外交官和传教士汉学家

19世纪后期20世纪初，法国出现了一些像戴伯理上尉、于雅尔领事这样的外交家汉学家和顾赛芬、戴遂良、费赖之、夏鸣雷等这样的传教士汉学家，他们在从事外交事物或者传教的同时从事汉学研究，他们在汉学方面也取得卓越的成绩。

一、外交官汉学家

1. 戴伯理(Dabry de Thiersant，1826—1898)，法国人，1856年离开圣西尔海军部队成为步兵团上尉，于1860年参加中国远征队，作为法国的一名

① 胡书经：《法国汉语教学和研究的历史》。

② Paul Demiéville, *Aperçu historique des études sinologiques en France*, II.

驻华领事负责军事方面的外交官，曾在上海、武汉、广州等地的领事馆从事工作。1884 年，他以一级全权特使的身份退休。此后，他撰写了大量的有关汉学方面的著作：《中国的军事机构，或中国与他的军队》(1859)、《中国人的医学》(1863)、《公元 8 世纪至当今的中国天主教》(1877)、《中国中原和新疆的伊斯兰教》(1878)等著作，至今仍有学术价值。

2. 于雅尔(Camille Imbault - Huart，1857—1897)，法国人。东方语言学校毕业生，1878—1880 年在上海作为实习翻译，1880 年 9 月开始在北京做助理翻译，1881 年获法兰西学院奖，1882 年在广东任秘书翻译(未就职)，1883 年在上海任二等翻译，1884 年在汉口任第二副领事，1885 年任科学院官员，1887 年任第一副领事，1888 年任名誉领事，1889 年任广东领事专员，1892 年任二级领事，1894 年获荣誉勋章。1897 年刚刚结束休假，突然于香港去世，年仅 40 岁。

他在中国文学和语言方面都颇有成就。在文学方面，他翻译介绍了中国的宋词、清诗、戏曲(翻译了《笠翁千种曲》的第十种《比目鱼》，载巴黎版《亚洲日报》136 卷，1890)和小说。尤其中国诗词的译介，更为突出，得到评论家好评。他的《18 世纪中国诗人袁子才的生平及其著作》(*Un poète chinois du XVIIIe siècle, Yuan Tseu - Ts'ai, sa vie et ses oeuvres*，1884)、《14 至 19 世纪的中国诗歌选》(1886)、《中国现代诗》(1892)等，都不仅只是选编翻译，同时还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有很大的影响。于雅尔把中国诗歌分为三个时期，即：古典时期，复兴时期和第三个时期。他认为，古典时期的代表作是《诗经》，复兴时期，也就是唐代，是中国诗歌的鼎盛时期，而他所指的第三个时期，就是从宋到清这一段时间。他指出，关于这一时期，虽然一般的评论都认为是中国诗坛上模仿之风盛行，是最缺乏生气和创造力的衰落时期。但是，他说，我们也绝不能忽视，这一时期也不乏一些“力图把诗歌从庸俗、炫博和浮华之风中挽救出来”的诗人，如苏轼、袁子才就是这样一些诗人，无论是他们的诗作还是理论主张，都是值得研究者注意的。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使得这一时期产生了一些有分量的诗歌，并因此出现与前两个时期诗歌风格不同的作品，并显示出他们的创作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欧洲人要想了解中国的诗歌，绝不可不给以充分的重视。由于他特别推崇这一时期的苏轼，尤其是袁子才的诗歌创作，

所以在他的选集中，较多地选译了这两位诗人的诗歌。[①]

于雅尔的汉语研究，尤其是“实用”汉语研究，也颇有成就。他在他的“出色的著作”中，让来华的法国人士通过拼音学习当时“中国首都语言”——北京方言，做出了特有的贡献。[②] 1885 年他在北京编写出版的《法国人实用汉语口语手册》(*Mannuel de la langue chinoise parlée à usage des français*)，是一本为法国汉语教材编写打开新局面的作品。[③] 该教科书由语法入门、常用句子、对话和常用词汇等部分组成，实用性很强，得到充分地肯定，并有机会于 1892 年在香港再版，第二版书名略有改动：*Mannuel pratique de la langue chinoise parlée à usage des français*)[④]，其中增加了“pratique”一词。“pratique”和“usage”两个词，在法文里的意思比较接近。“pratique”翻译成中文可译为“实践”、“实用”，而“usage”可以译成“使用”、“应用”，作者在同一本书中同时用了这两个词，而且是在第二版时有意加上去，可见其用心良苦，其目的无非是要突出他这部教材的“实用性”。马伯乐誉称，该书是“19 世纪最好的法文版官话教科书”。[⑤]

二、传教士汉学家

法国传教士的中国研究历史悠久，成绩卓著，在 18 世纪时就已走在了欧洲的前列。19 世纪后期，当法国与中国的交通再次打开的时候，法国在经济实力方面远不如英、美，而宗教的力量则大大地超过他们——这时期法国天主教人数已达到 25 万，声势相当可观。法国在对外政策上，也有意发挥这一特长，而跟英、美在华势力争个高低，于是采用了扩展宗教力量的方式。当时的外交使团团长拉萼尼就认为：“依仗着宗教的因素，法国就能弥补它在商业上的不足”，所以他极力扮演了天主教会代言人的角色，法国国内的舆论对此也大加赞扬，当时有影响的《通讯者》杂志曾直言不讳地说：“假如天主教在该国成为主导的东西，那么作为西方最强大之国，法兰

① 钱林森：《中国文学在法国》，第 33 页。

② Henri Cordier, *Les études chinoises* (1895—1898), Librairie et imprimerie Ci - devant E. J. Brill. Leide. P. 24.

③ 胡书经：《法国汉语教学后研究的历史》。

④ Henri Cordier, *Les études chinoises* (1895—1898), P. 24.

⑤ 胡书经：《法国汉语教学后研究的历史》。

西国王就会成为中国在混乱中的天然盟友和支柱。”①

鸦片战争之后，根据《中法黄埔条约》规定，法国耶稣会士可以在沿海五个港口设立教堂，因此，法国来华的传教士日益增多。他们像前辈一样，利用科学和教育来进行传教，并以此来接触中国的上层人物。于是散居在中国的法国耶稣会士恢复了活动，他们除从事本职工作之外，同时进行汉学研究和汉语教学，他们在中国创办大、小修道院，培养神父、修士、修女，建立男女教会学校，出版报纸、刊物，开办博物馆、医院等来扩大影响，同时也进行中国研究，内容涉及中国文、史、哲、自然科学等多个领域，其中，如中国生态资源的考察和研究，还是他们首次涉及，填补了前辈留下的空白。当时成立的“江南科学会员会”所做的就是这些事情，其研究内容包括天文、中国史地、江南教区历史和人物等，同时出版刊物。此外，浙江的《宁波简讯》，也介绍了许多中国文化风景、名胜和风土人情，为汉学研究提供了资料（该《简讯》现存在杭州天水桥天主教堂，是一部难得的教会史和地理史的珍贵资料）。② 诚然，我们不难看到，他们所做的许多工作是为他们的国家外交政策服务的，但客观上又促使了国外汉学研究的发展。

在汉学方面卓有成就的传教士主要有如下几位：

1. 顾赛芬（Séraphin Couvreur，1839—1919），法国庇卡底人。1853 年入耶稣会，1870 年来中国，在北京学习汉语，后在河间张府天主教堂当神父多年。他酷爱中国古典文学，还写得一手好文章，编写有辞书并翻译了大量的中国典籍，是这时期汉学家中翻译、研究中国典籍成绩最卓著者之一。他几乎翻译了所有的中国古籍，涉及面之广达到惊人的程度，其中包括《四书》（1895）、《诗经》（1896）③、《书经》（1897）、《礼记》（1899）、《春秋左传》（1914）、《仪礼》（1916）等。他通常用双语（法语和拉丁语）对汉语同时进行翻译，在诠释中，他无意加入个人的解释和评论，而是努力忠实于当时中国官方推崇的朱理学派观点。由于拉丁语的结构更自由，所以使他能进行几乎是逐字逐句地直译中文原文，加上他的法文、拉丁文的准确优雅、无可挑剔，使得译文更加可靠，并有很强的实用价值，以至于到了 20 世

① 金重远：《拉萼尼使团和中法黄埔条约·三》，载《中法关系史论》，楼均信、郑德弟、吕一民主编，杭州大学出版社，1996 年，第 120 页。

② 戴成钧、方建中：《赵保禄在浙江的传教活动述评》，载《中法关系史论》，第 50 页。

③ 有评论认为，他所译《诗经》是所有译本中最糟的一种。

纪50年代，仍有机会在巴黎再版。在词书方面，他主要编写有：《法华字典》(1884)，尤其是他的《汉语古文字典》(*Dictionnaire classique de la langue chinoises*，1890)，出版后又经过多次地修改再版，影响深远，在西方汉学界至今还得到好评。该字典与英国翟理斯(Herbert Giles)的《汉英大词典》(*Chineses - English dictionary*，1892，1912)的区别在于，几乎不考虑通俗语言(即白话)，不收方言和专有词语，是古籍研究中十分珍贵的工具书。此外，他还编有法文及拉丁文的《中国诏令、奏议公文选译》(1894)。

2. 戴遂良(Léon Wieger，1856—1933)，法国阿尔萨斯人，耶稣会士。1887年来中国，在直隶耶稣会任职，大部分时间是在献县。他以医生的身份来中国从事传教，并致力于汉学研究。戴遂良的汉学研究也是多方面的。在汉语的方面，他所编写《汉字》(*Caractères chinois*，从1895年开始编写)这本著作，收录了1925年以前的词语，其中包括4部小词典：①《词源》(根据《说文解字》编写)；②《谐音》；③按字母顺序排列的汉字注音字典；④词典。其中关于语音的内容，比比高本汉(Karlgren)《汉语解析词典》(*Analytic dictionary*)还要早，是西方汉语音韵研究上的第一部书，意义重大，贡献突出。他对中国的历史、哲学、风俗方面所具有的浓厚兴趣，以及在中国典籍翻译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跟顾赛芬一样，也是19世纪汉学家中"最卓著者之一"。他著有3卷本的《历史文献》(1903—1905)和10卷本的《现代中国》(1921—1932)，还编写有《近代中国风俗志》(*Folklore chinois moderne*，1908)、《中国宗教信仰和哲学思想史》(*Histoire des croyances religieuses et opinions philosophiques en Chine*，1917)，翻译有《庄子》、《淮南子》等，共达30多卷。然而戴遂良的汉学研究也有明显的弊病，那就是"无所不包"而又"浅尝辄止"。①

戴遂良编写的《汉语汉文入门》(*Rudiments de parler et de style chinois*)，也是一部颇具特色的汉语教材。该书两部十二卷，第一部《汉语入门》(*Rudiments de parler chinois*)六卷，讨论口语，以河间府方言，即中国北方官话写成；第二部《汉文入门》(*Rudiments de style*)也是六卷，讨论汉文。实际上第一部是语言课本，第二部是文化课本。第一部《汉语入门》六卷具体内容和出版情况如下：第一卷有前言、语音、语言结构、成语和中法文词汇表组成，于1895和1996年出版；第二卷《要理问答四本》，1897年出版；第

① Paul Demiéville，*Aperçu historique des études sinologiques en France*，II.

三卷分使团训诫和为周日和节庆训诫两部分内容，于1898年出版；第四卷《民间道德与习俗》，于1894年出版；第五六两卷为《通俗读本》，于1895年出版，课文是一些从《今古奇观》、《聊斋志异》、《官话指南》等作品中选出来的改编故事。[①] 即便不计第二部《汉文入门》的大量文化内容，光第一卷语言部分，内容已极其丰富，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汉语教学课本。

3. 费赖之（A·Pfister，1833—1891）神父，1869年来华，后授命整理上海徐家汇藏书楼图书，是一位学识渊博的传教士汉学家，他编写的《在华耶稣会士传略及其书目提要》（1932—1934）中，共收录了16—18世纪耶稣会传教区人物467人，书目800条，"资料丰富"，"内容广泛"，其范围涉及到明、清两代政治、文化、社会习俗、中外关系等诸多问题，被公认为一部学术价值极高的宏篇巨著。该书传世的只有法文本，但作者引用的资料有德、意、荷、西、葡、拉丁等文。此书虽然撰于1886年，至今已经过了一个多世纪，但仍然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②] 此外，他还写有《江南教会记实》（1869）等。

4. 夏鸣雷（Henri Havrit，1848—1901）神父，于1874年来华，先在芜湖传教，1891年因芜湖反教会斗争发生，被调往上海徐家汇任教区长。在这里，他编写有多卷本的《"汉学"论丛》（70多卷，于1892年完成），另外，还著有《西安府景教碑》（1895— ）、《安徽》（1893）、《崇明县——位于长江口的一个岛》等书。

第四节　汉学教学和研究的新成就

这一时期法国的汉学研究，不仅视野有很大的开拓，而且在研究方法和观念上也更具客观性和科学性。尤其是从19世纪后期开始，传教士、外交官或供职于驻华外交机构如海关等所谓"实践型汉学家"著作的问世，大大地壮大了法国的汉学研究成果，汉学家们不仅在中国历史、哲学、文学、语言等主要学科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同时在汉学目录学、中国少数民族的研究等也有所开拓。此外，耶稣会士在中国创办博物馆等的过

---

① 关于本书的有关情况，笔者主要参考如下两份材料，无特殊情况将不一一加注：*Les études chinoises*（1895—1898），P. 75；Preface du *Rudiments de parler chinois*，*dialecte du* 河间府 par le P. Léon Wieger S. J. 1er Volume，河间府 Imprimerie de la Mission catholique，1895.

② ［法］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传略及其书目提要》，第1214页。

程中，对自然科学的调查、研究，也成绩卓著，为法国的汉学别开了生面。

一、断代和国际关系史研究

关于中国历史和现状的考察和研究，法国评论家雅克·布鲁斯曾这样认为，“如果说欧洲的知识界在1700年就自认为了解了中国的话，那么他们在1830年左右则对它几乎是一无所知”，就是在鸦片战争之后，一些有机会踏上中国土地的商人、旅行家或外事人员，自认为有“义务”将自己的所见所闻告诉欧洲读者，也因为他们仅仅根据自己在澳门或广州道听途说所得的资料来评论中华帝国，所以，不是没有新鲜内容，就是夸夸其谈，错误百出，甚至荒诞无稽。① 按照这一看法，似乎19世纪上半期法国和欧洲汉学家们未曾向欧洲读者较为客观而真实地描写过中国。其实不然。同样是这位雅克·布洛斯，在同一篇文章中，也曾指出，像当时的法国外交官和汉学家德经，曾任香港总督的英国汉学家德庇时（Davis）和法国的古伯察神父（Evariste - Regis Huc，1813—1860）等，就曾向欧洲读者贡献过严肃的、以实地考察为基础的佳作，较为客观而真实地描写了中国。德庇时是英国人，他写有《中国人、中华帝国及居民综述》（1837），该书被认为是一部“资料丰富”的“鼎力之作”。德经和古伯察神父则是法国人，他们的作品能代表当时法国汉学家认识中国的水平。德经写有《北京记行》（1818），古伯察神父写有《中华帝国》（*L' Empire Chinois*，1854）。前者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引起大的反响，而后者的学术价值得到很高度的评价。古伯察神父于1839年到达澳门，两年后抵达北京。在游历中，他习惯于像中国人一样穿戴，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1844年他再度起程，这次是前往西藏。1846年到达拉萨后，被中国当局驱逐出藏，将其押送回澳门。他的西藏之旅被称为一次“危险”的“史诗般”的旅行，在他的《中国鞑靼和西藏旅行记，1844—1846》（1850）中对这次旅游做了介绍。该游记内容丰富，文笔生动。作者并不为那些有高深学问的人写作，而是为普通读者绘声绘色地讲述自己在这些地区的见闻、冒险和感受，亲切而感人，所以吸引了众多

① ［法］雅克·布鲁斯：《从西方发现中国到国际汉学的缘起》，《国际汉学》Ⅰ，第469－471页。

的读者，成了许多意欲旅游蒙古，尤其是西藏者的一本珍贵参考书。[①] 在返回澳门的途中，他游历了从扬子江到南海岸的一段路，补充了南北考察之不足，使他的《中华帝国》一书的内容更加充实丰富。雅克·布洛斯认为：古伯察神父怀着一种"强烈的好奇心"、"丰富的幽默感"，"细腻的文笔"，向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大众提供了"中国的全貌"，勾勒出了一种"令人难忘"的中国人的形象，同时也不忘指责他们的不端行为。[②] 毛磊先生也认为，随着1834年汉语教学在法国东方语言学校开创，语言和文化的学习激励了当年的一些旅行家和最初的使团成员，而在这些人员中，"首先要提到的就是古伯察（Evariste Huc，1813—1860）神父"，他"扮演了一个决定性的角色"，"因为他对19世纪中叶的中国做出了卓越的综述"，其功绩"可与同时代的托克维尔（Tocqueville，1805—1859）对美国，古斯汀（Custine）对俄罗斯的著述相媲美"。[③]

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在中国史方面，主要是戴遂良的《历史文献》，这部3卷本的历史著作，主要选材于朱熹的《通鉴纲目》，是编译的法文与中文对照本，作者补充了为数不少的说明，也是一部有分量的作品。

关于这一时期中国历史和现状的考察和研究，特别要指出的是法国汉学家的研究有两个明显特点，那就是趋向于断代史和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考察。前者如戴遂良的《近代中国风俗志》和《现代中国》等，后者如雷慕沙的译作《佛国记》，儒莲的《亚细亚地理与汉梵文学文集》（1864）、汉译《突厥历史资料》，德韦理亚的《中国与安南——越南关系史》、《根据中国资料，中国安南边界以及该地区地理和种族》，费赖之神父的《在华耶稣会士传略及其书目提要》等。戴遂良的两部断代史是很有分量的历史著作，但严格说起来，他的《近代中国风俗志》并不是一部历史著作，而是河间民间著作的文集，更确切地说是一部民俗史，所以考狄（Henri Cordier）在他的

① 参阅 Michel Jan, *Le Voyage en Asie central et au Tibet: Evariste - Regis Huc*（1844 - 1846），P. 1059; Evariste - Regis Huc（1844 - 1845），P. 1324; Evariste - Regis Huc, Souvenirs d' un voyage dans la Tartarie et le Tibert（1844 - 1846），Paris, Le Livre de poche, 1962.

② ［法］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中指出，欧洲自从马戛尔尼使团之后，对中国看法便发生了变化，伏尔泰等理想中的帝国消失了，代之的是一个野蛮、落后的帝国。由于种种原因，使团的许多材料并没有公开发表。佩雷菲特的看法跟雅克·布洛斯有相似之处。

③ ［法］毛磊（Pierre Morel），黄荭译：《在双方的对话中认识自己》，选自《中法文化之旅》，BBS水木清华站 smth. edu. cn《跨文化对话》第四辑。

《中国书目》(*Bibliotheca Sinica*)中将它归入"民俗部分"。[①] 相对而言,他的《现代中国》评价更高。该书共10卷,是一部有关辛亥革命的编年史,包括中文原文和非常自由的译文。因其"内容丰富"、"结构紧凑",被认为是一部"断代史"的"力作",尤其是涉及到神父本人所在地的语言和民间故事,都得之于"第一手素材",更为珍贵。[②] 雷慕沙的译作《佛国记》,对中国与印度,中国与整个亚洲的历史、地理的考察,儒莲在《亚细亚地理与汉梵文学文集》、汉译《突厥历史资料》中对中国与古印度及中亚古代关系史料的发掘,德韦理亚的《中国与安南——越南关系史》、《根据中国资料,中国安南边界以及该地区地理和种族》对中国与越南的关系的探索,费赖之神父的《在华耶稣会士传略及其书目提要》为研究"中国基督教、明清史和中外文化关系史"所提供的"很有参考价值"的资料[③]等,都用一种跨国、跨文化的研究视野,来考察中国以及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尽管戴密微认为,19世纪法国汉学的这种研究路子,其目的与其说是研究中国内部本身,不如说是为了世界通史而挖掘中国的资料,人们完全可以责备这是汉学研究中的一种"流行病"。[④] 但是,这种研究毕竟是有利于对问题做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其思路开阔,大大丰富了汉学家们研究的内容。

二、对中国多个教派的探索

在哲学方面,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是,由于没有受传教的任务所带来的偏见和束缚,在看法上趋向客观和科学,同时,在研究的视野上,也明显地克服了18世纪"重儒轻佛"(实际上不只是"轻佛",也包括轻视其他的哲学流派)的弊病,而出现关注中国多个哲学流派的情景。比如,在《易经》研究中,这一时期的翻译者和研究者虽然仍然几乎都是圣职人员,但他们的兴趣和动机已不再是宗教的使命、"神学的目的",而是"学术性的"。他们是"试图从中国文化和传统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背景上来加以分析和推论"《易经》的宗旨和价值。[⑤] 当然,最为明显的是汉学家对中国众多的教派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兴趣,汉学家们不仅较为客观地对佛、道进行研

① Henri Cordier, *Bibliotheca Sinica*, P. 3975, 1902—1908, 1922—1924.

② Paul Demiéville, *Aperçu historique des études sinologiques en France*, II.

③ [法]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传略及其书目提要》后记。

④ Paul Demiéville, *Aperçu historique des études sinologiques en France*, II.

⑤ 杨宏声:《本土与域外——超越的周易文化》,第197—198页。

究，而且对中国的伊斯兰教、摩尼教、基督教等也都有不同程度的青睐。如德韦理亚晚年对伊斯兰教史和摩尼教史发生兴趣，考证出中国资料中末尼（摩尼）"Mo—ni"与伊朗改革者 Mâni 的一致性，徐家汇夏鸣雷神父因对唐代大秦景教碑文持有兴趣而完成了巨著《西安府景教碑》等。

令人深思的是，这一时期从总体上论述中国宗教的文章为数不少，尤其是 19 世纪后期和 20 世纪初更为明显。先是 1889 年法兰西学院教授雷维尔（A. Réville）出版了《中国宗教》一书，可以说为这时期全面介绍中国诸宗教揭开了序幕，有着开创意义。此后，便连续地有文章和著作出现，全面或比较全面地介绍和论述中国宗教。1889 年和 1891 年，比利时科学院院士何赖思（Charles de Harlez，1832—1899）分别发表和出版了《中国早期的宗教》和《中国宗教：历史和批评》，前者虽然介绍的只是中国宗教的断代史，但也比较全面地介绍了中国早期的宗教。接下来，有 1893 年雷维尔在《宗教史杂志》（*Revue H. S. des religions*，1983 年，3—4 月）上发表了《中国宗教——关于何赖思先生的一部著作》，对何的作品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此外，1891 年发表了何赖思根据早期文献所得的中国神仙"随笔"——《神仙书》，1917 年出版了戴遂良的《中国宗教信仰和哲学史》等，都说明这时期法国汉学家对中国宗教和哲学流派的关注对象已不是一两个，而是全方位的。尤其是戴遂良的《中国宗教信仰和哲学史》，更是把中国的哲学流派做了全面而综合的论述，从宏观的角度对中国的教派、各教派的主要观点和发展史，做了梳理和探索，这是史无前例的。戴遂良把中国宗教史发展分为四个阶段：①古代神话阶段（从远古到公元前 500 年）；②中国政治和哲学阶段（公元前 500 年到 65 年）；③佛教和道教阶段（公元 65 年至公元 1000 年）；④唯理论和冷漠主义阶段（公元 1000 年至今）。无疑，他对中国宗教的历史发展和演变所做的全面而客观的分析和考察是有着开创性和启发性的。

就具体哲学流派而言，跟前一时期相比，这时期法国汉学家研究较多的是佛教和道教，而对前一时期比较热衷的儒家和《易经》的研究比较冷落。因此，对儒家研究忽视和"《易经》热"的退潮，成了这时期哲学研究的两个明显的"冷落点"。所以，这一时期，专门论述儒教的著作似乎难以获得，《易经》的研究也没有出现什么"热点"①。在儒教方面，毕欧在他的短

① 杨宏声：《本土与域外——超越的周易文化》。

论《中国公共教育和儒学史》涉及到儒学，但该文对后世影响比较大的并不是儒学而是中国的教育。在《易经》方面，这一时期被翻译成法文的《易经》主要有：何赖思的《易经注释》和法国海军军官霍道生(P. L. F. Philastre)的《易经》译作。何赖思的《易经注释》发表在1896年的《通报》上。[①] 霍道生的《易经》译作分别发表于1885年和1893年的《吉美博物馆年刊》第8期和23期，但《易经》译本直到1982年才正式出版。

19世纪和20世纪初法国汉学家对汉文佛典的翻译和研究当推雷慕沙和儒莲。此外，还有何赖思的《汉梵集要：佛教理论概要》(1896)[②]，戴遂良编写的《中国佛教》(1910—1913)。

雷慕沙的法显传《佛国记》和儒莲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大唐西域记》在汉学发展史都具有开拓意义，尽管他们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旁证印度佛教的史实"，[③]但仍得到高度的评价。在18世纪，传教士出于传教的需要，采取了"扬儒抑佛"的方式，使得西方人，包括汉学家在内，对中国的佛教缺乏较客观的认识，资料也非常缺乏。他们两人在这样的条件下从事翻译和研究，其艰难性可想而知，贡献也不可低估。

19世纪法国的道教研究也是由雷慕沙开始的，他于1823年发表了《论老子的生平及其作品》，用法语试译了老子的《道德经》的第1、25、41、42各章，并提出了他的看法。18世纪的欧洲，为了宗教的目的，同样也忽视了道教的研究，而雷慕沙开始给予足够的重视，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认为，老子是公元前6世纪的哲学家，他的思想可以归结到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或他们的弟子中去。显然这一高度的评价在以往传教士们的看法中无法找到，无疑打开了人们的思路，在汉学发展史有其重大的意义。法国《道德经》的第一部法文全译本是1838乔治·鲍狄埃(Georges Pauthier)的译本，该译本比第一部英译本(1868)和第一部德译本(1869)早了20多年。乔治·鲍狄埃的译本之后是1842年儒莲翻译的《老子道德经》，再接着是1898年马切伦(D. Marceron)的《道教研究文献目录》，至于戴遂良的《道藏》总目录，《老子》、《列子》、《庄子》法汉对照本，金葆光(Henri

① C. De Harlez, *L' Interpretation du Yi - King*, T' ong Pao Vol. VII, 1896.

② *Vocabulaire bouddhique sanscrit - chinois* 汉梵集要 Han - Fan Tsih - yao précis de doctrine bouddhique, T' ong Pao, Vol. VII, 1896.

③ [法]郭丽英：《法国队早传佛教的研究》，载《法国当代中国学》，第320页。

Doré,1850—1931)的18卷本的《中国迷信研究》等,已是在20世纪初的作品。儒莲翻译的《老子道德经》译本的出版,在法国道教研究史上也有着开拓性的意义。有评论指出,在此之前,由于传教士的翻译加入了许多基督教的观念,使得西方人的道教观念带上了"神秘主义的色彩",形成了一种"奥妙的道教神话",从而不同程度地曲解了道教的真实含义。而儒莲,不仅由于他精通中文,更主要的是,没有传教的任务所带来的偏见,所以能忠实于原文,使得道教的基本思想得到"廓清",从而"结束了18世纪道教主义的哲学基督教神话"的局面。[①] 马切伦的《道教研究文献目录》是对以往道教研究及当时状况的总归纳,日本的研究家们认为,这部作品编排得当,条目清楚,"令人一目了然",是一本"非常珍贵的资料集",其中附录之一《著名道教徒传记抄》中提到的道教许多人物,如葛洪(号抱朴子)、司马承祯、陶弘景、张道陵、杜光庭、王弼、文子等人的名字,都用法文标音标出,为法国和欧洲人了解道教提供了极大的方便。[②]

法国人称"道教"或"道家"为"老君的宗派"或"道士的宗派"(La religion de Tao - zu)。据考证,用法文Taoïsme来标明"道教"或"道家"也始于19世纪。1845年贝歇雷尔(Bescherelle)首次用"Taossisme"这一词来标明"道教",到了1886年,莱昂·德·罗斯尼(Léon de Rosny)用Le Taosséisme一词出版了道教的书,1889年,法兰西学院教授雷维尔(A. Réville)出版的《中国宗教》第四章《中国的古代宗教》中,同样用了Taoïsme,后来,1891年,何赖思(Charles de Harlez)在莱比锡出版的《道教》一书中,也是的Taoïsme这一词。最后把这一词确定下来,可能是在马切伦的《道教研究文献目录》中。[③]

三、俗文学和唐宋诗词的译介

从某种程度说,18世纪的传教士并不怎么重视中国文学的译介。可以说,法国汉学家对中国文学有较浓厚的兴趣是从19世纪开始的,汉学家们注意到了中国文学的译介在汉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和深远意义,因此,译介工作也有了较大程度的改观,到了20世纪初,情况更有了大的进展。如

① 葛雷:《道教思想和法国现代文学》,载《外国文学研究》,1987年1(创刊号),第115页。

② [日]福井康顺等:《道教》第3卷,第230页。

③ [日]福井康顺等:《道教》,第3卷,第230页。

果说前一段时期,传教士们除了《诗经》、《赵氏孤儿》等部分内容翻译和介绍外,其他文学作品很少涉及的话,那么这时期法国汉学家对待中国文学的视野要开阔得多了:中国诗歌、散文、戏剧、小说等,都有不同程度的涉及,而成绩最为卓著者,主要是中国俗文学和唐宋诗词这两个方面。

1. 关注俗文学。

所谓俗文学,实际上主要是指中国的戏剧和小说。在这个领域,18世纪的传教士,除了《赵氏孤儿》外,其他类别的文学作品很少涉及,小说也只是有限的几篇。《赵氏孤儿》的翻译,在欧洲虽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但也只是节译,而且在理解上差距甚大。19世纪法国汉学家中,致力于这一翻译和研究工作的是儒莲和巴赞。儒莲翻译的《赵氏孤儿》(1834)已是全译本,他把其中的曲词部分也包括进去,显然超过了前辈。此外,他还翻译了元曲《灰阑记》(1832)和《西厢记》,尤其是《灰阑记》,在当时产生极大的影响。至于《西厢记》,因在他身后才得以出版(1873—1880),所以当时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但其历史功绩仍不可没。该译本根据的是金圣叹的批本,由日内瓦T·米勒出版社正式出版。巴赞效仿他的老师儒莲,也致力于翻译和研究中国戏剧,他翻译了《㑇梅香》(1834—1835)、《合汗衫》(1838)、《货郎担》(1838)和《窦娥冤》(1838)四出元曲,还有《琵琶记》(1841)。尤其是他的元曲翻译,译文质量得到戴密微高度评价,称他的译文"准确可靠",一直都有很高的"实用价值"。[①]

19世纪法国汉学家还对当时中国学术界不大重视的"才子佳人"小说备加青睐,十分酷爱那些以大团圆结尾的爱情小说,这不仅是18世纪传教士们所未曾涉及的一个领域,同时实际上也是对当时中国学术界的一种挑战,其中又以雷慕沙和儒莲尤为突出。儒莲之所以选中这些小说,大概是因为他从传教士寄回法国的书籍中找到这些作品,把它当做通俗作品来研究,也可能是因为这些小说能向法国公众介绍当时欧洲人未曾看到的风俗,况且,这类作品比古典作品和诗歌的确更迎合欧洲人的口味。[②] 在雷慕沙和儒莲的努力下,当时已翻译出版了《白蛇精记》、《平山冷燕》、《玉娇梨》等。最引人注目的是《好逑传》,还出现了几种译本:如埃杜斯(M. A. Eidous)的译本,是英托马斯·帕西译本的转译,1766年在里昂出

① Paul Demiéville, *Aperçu historique des études sinologiques en France*, II.

② Paul Demiéville, *Aperçu historique des études sinologiques en France*, II.

版，1828 年修订再版；1842 年问世的达西（Guillard D' Arcy）的《好逑传：中国小说》，莫朗认为，也是英译本的转译；巴赞的《好逑传》，于 1853 年收在他的《现代中国》一书中；德·比西的《好逑传》第四五回，1897 年收在他的《中国文化教程》里。

像《红楼梦》、《水浒》、《金瓶梅》、《西游记》、《儒林外史》等，19 世纪的法国汉学家虽还没有花大力气去翻译和研究，但是毕竟已经给予了一定的关注，部分章节得到翻译和介绍，同时也开始出现节译本。我们且不谈像这些反映当时现实生活，体现中国人精神、道德风貌的明清小说被 18 世纪的传教士几乎给全忘了，就是这些作品的全译本也要等到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才与法国的读者见面，所以，19 世纪的法国汉学家对这些作品章节的翻译和介绍，在法国汉学发展史上无疑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下面是这时期翻译这些古典名著的具体情况①：

《三国》

有儒莲的《董卓之死》（1834），是法国最早有关《三国》的章节翻译，收在他翻译的《赵氏孤儿》之中；接着有巴赞的《黄巾起义》（1853）和德·比西（De Bussy）的《三国演义》（1891）。前者收在他自己编译的《现代中国》中，后者翻译的是《三国演义》中的第十四回，收在《中国文化教程》中。

《水浒》

法国最早翻译的《水浒》片段是巴赞的《水浒传摘译》（1850），发表在《亚细亚学报》57 期，内容是前六回中的鲁智深的故事和第二十三回至三十一回中武松的故事，也收在他的《现代中国》中。接着有德·比西的《水浒传摘译》，收在他的《中国文化教程》中。

《西游记》

法文《西游记》的最早译者是西奥多·帕维（Théodore Pavie）。他翻译了这样几篇：《三藏和尚江中得救》，即《西游记》中的第九回"陈光蕊赴任逢灾，江流僧复仇报本"；《龙王的传说，佛教故事》，即第十回"老龙王拙计犯天条，魏丞相遗书托冥史"和第十一回的"游地府太宗还魂，进瓜果刘金续配"，发表在《亚洲杂志》第九、第十期上。

① 以下所举的作品，主要参考如下几份资料：1）考狄的 Bibliothenica Sinica，pp. 1753—1780，3935—3940；2）Paul Demiéville，*Aperçu historique des études sinologiques en France*. II；3）王丽娜：《中国古典小说戏剧名著在国外》，学林出版社，1988 年。

《聊斋志异》

法文最早的《聊斋志异》单篇是于雅尔的《种梨》(1880),发表在《亚细亚学报》第117期,后有谢翁(Cheon)的《罗祖》(1889),戴遂良的《赵城虎》、《考城隍》、《劳山道士》、《画皮》、《陆判》等数篇,收在他编译的《汉语入门》和《中国近代民间文集》中。此外,还有苏利埃·德·莫朗(Soulie de Morant)的《画皮》(1912)等。较早的"译本"有1884年中国巴黎公使馆总兵衔军事参赞陈季同编译的《中国故事集》,共收26篇。

2. 涉及唐宋诗词。

在中国古典诗词方面,18世纪的传教士们只局限于《诗经》,并没有涉及其他时期的诗歌,而且《诗经》也只是个别诗篇的翻译和研究,到了19世纪,不仅有了《诗经》的全译本和深入的研究,同时《离骚》、唐诗、宋词、清诗都有所翻译和研究。因此,如果说《诗经》的翻译和研究只是前时期的发展和深入的话,那么,《离骚》、唐诗、宋词、清诗的翻译和研究,就是19世纪和20世纪初法国汉学家在中国文学的翻译和研究方面的新开拓了。

这时期法国《诗经》译本有朱尔斯·莫尔的《孔夫子的诗经》(1830),毕欧作注的拉丁文版《诗经》(1838)和顾赛芬的法文、拉丁文、中文对照的《诗经》全译本(1898)等。而其中又以顾赛芬的译本最受青睐,很长一段时间"仍流行于法语世界",而毕欧的《诗经》长篇专论,从文化角度对《诗经》进行了探索,被认为是这一时期最主要的研究文章。①

在《离骚》和唐诗的翻译和研究上做出卓越成绩的是德理文侯爵。他的译文漂亮,研究上有自己的心得,为这一时期的中国诗歌研究增添了光彩。然而,相比之下,他的《离骚》译本影响并不大,只是在第二帝国的文学沙龙里引起重视;唐诗翻译和研究却影响深远,意义重大。德理文的《唐诗》是欧洲第一部唐诗法译集。戴密微说,在他之前,中国诗歌对欧洲公众来说实际上是一片空白,因为耶稣会士虽然也做了一些工作,而严格说起来,实际上他们是"完全忽略了"这方面的内容,只是到了德理文侯爵,法国的学者才真正地对中国的诗歌进行认真的研究,所以他有幸被称为"欧洲最早对中国诗歌感兴趣的人之一"。②

在宋词和清诗方面,于雅尔(Camille Imbault - Huart)付出了辛勤的劳

① 钱林森:《法国文学在中国》,第51、52页。

② Paul Demiéville, *Aperçu historique des études sinologiques en France*, II.

动，做出可喜的成绩，也是具有开拓性的。他不仅曾出版过《18 世纪中国诗人袁子才的生平及其著作》(1884)、《14 至 19 世纪的中国诗》选集(1886)和《中国现代诗》(1892)等多部作品，还在中国诗歌研究方面提出独有的见解，这也是别开生面的。

四、汉语教学和研究紧密结合[①]

我已经指出，尽管汉学研究是多方面的，但汉语研究和教学毕竟是基础。关于这一点，不仅汉学家们明了，就是一些社会人士也深明其中的道理。早在国立东方现代言语学校建立时，法国的汉学界和法国政府就给予汉语足够的重视。1795 年，国民工会议员拉卡纳尔(Lakanal)在一报告中谈到汉文学时就指出汉文学的“惊人”丰富性，并明确表示：“今后，如果我们与中国重建关系(大革命时期，法国处境孤立，中断了与中国的关系)，汉语教学必须补充到波斯语、突厥语、阿拉伯语、马来语、克里米亚(南突厥)语教学中去。”同时，还应该看到，18 世纪后期，由于传教士们的努力，法国确也编写过一些汉语语法书和辞书，还出现了教授汉语的机构。这些都说明，汉语研究和教学在法国很早就引起重视。但是必须指出，这些毕竟只是个别现象，不成规模，就是像马若瑟的《汉语概述》这样的书，虽说有一定水平，也无法得到出版，影响不大。所以，汉语研究和教学真正受重视并有明显进展的是 19 世纪，到了 20 世纪初期，则更具规模。总地来说，当时的汉学机构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既是研究机构又是教学机构。而从某种角度来说，汉学机构开始时的主要任务，或者说主要活动内容是从汉语教学和研究，如法兰西学院、东方语言学校、里昂大学等汉语教学，作为 19 世纪 20 世纪初的汉学机构，其首先开展的活动就是汉语教学和研究；另外，要特别指出的是，19 世纪法国汉语研究和教学的一个特点是，随着教学的逐渐发展，许多教师把自己的研究和教学体会加以结合，写成教材，所以，许多教材实际上既是研究成果，同时又是教师们教学经验的总结，有着明确的针对性和实践性。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可以说，这时期的汉语教材，实际上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这时期汉语研究的成果和水平，尤其是在语法方面。

---

① Henri Cordier, *L' Enseignement du chinois, Les études chinois* (1895—1898), Supplement au volume IX du T' oug - Pao, Librairie et imprimerie ci - devant E. J. Brill, Leide, P. 44.

在教材方面，这时期首先要提到的应是雷慕沙的《汉文启蒙》，再就是巴赞的《官话语法》。此外，有儒莲的《新编汉语句法结构》、哥士耆《汉语口笔语渐进大全讲义》、微席叶的《汉语（北方官话）入门》、古兰的《中国北方官话语法》、戴遂良的《汉语汉文入门》等。这些教材因某一方面有所突破，或因具体使用中显示出来的优点而得到好评并长时间地被使用。雷慕沙的《汉文启蒙》因没有勉强套用西方传统语言学的框架，如实地描绘了汉语的特点而独树一帜。尽管教材很大程度参照了马若瑟的《中国语言志略》，但因马若瑟一书一直没有出版，所以他的语法书仍被看作为西方"第一部真正适用的中文语法书"和"第一部在西方大学使用的汉语教材"，对"推动欧洲汉学发展""功不可没"。[①] 而巴赞的《官话语法》则因编者就白话与文言中的表示"关系"和"条件"、重读的重要性进行了"隽智的分析"，[②]成为法国，乃至欧洲汉语教育历史上第一部白话语法书教材。

在辞书编写方面，我们知道，法国汉学家一向重视汉语词典的编写工作，在拿破仑执政时期，就曾命小德经（Christian Louis Joseph de Guigne fils，1759—1845）完成汉、法、拉丁文大字典（1808），并于1813年由帝国印刷局出版。这部拿破仑字典的汉字字体很大，为四十点，边长一厘米多，约收一万四千个汉字，大部分是上一个世纪傅尔蒙（Etienne Fourmont）在世时法国工匠刻制而成的。拿破仑字典是19世纪法国汉学发展史上令人瞩目的事，不过它只是意大利人姬茂纳（Basilio de Gemona）的《汉字西译》附以法译而已。它在活字印刷术上果然是一件"奇珍"，对汉语研究却并未起到推动作用。对汉语研究起推动作用的，是顾赛芬和戴遂良所编辑的词典。

此外，我们在谈到汉语教学时，不能不涉及到文化内容的介入。就这一方面，我们从这一时期所编写的汉语课本中可以看出，19世纪法国的汉语教学已经十分重视文化的介入。且不说儒莲把《三字经》、《千字文》作为汉语教学课本本身就意味着对文化内容的重视，因为这些中国传统的启蒙教材包含着丰富的中国文化知识，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我们还可以看到，在许多汉语入门教科书中，编者都已注意到，他们要传授给学习者的不仅仅是语言的技能和知识，同时还有中国文化。儒莲在《新编汉语句法结构》的第二卷中，引进了更多的文化内容。他通过

① 张国光等：《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第342页。

② Paul Demiéville, *Aperçu historique des études sinologiques en France*, II.

对两部中国古典文献部分章节的分析和注释，让学习者既学习了语言，也了解了中国文化。这两部文献分别是《玉娇梨》和《赵氏孤儿》。实际上，前一部分是关于《玉娇梨》所选章节的小词典；后一部是《赵氏孤儿》前三幕的译文，题为《赵氏孤儿：中国元代纪君祥五幕悲剧》，编者将剧中人物对话逐字逐句翻译出，让初学加以对照。戴遂良《汉语汉文入门》更为明显。如上所述，该教材共分两部，第一部六卷是关于语言，第二部六卷是文化内容。即便是第一部，除第一卷主要是介绍和分析语音、语言结构和成语等有关语言知识和技能外，从第二卷开始直到第六卷，编者已大量引进文化内容。要加说明的是，笔者虽然没有找到他的第二部作品，但根据编者在第一部前言中所述，可以看出编者下一部所要编写的文化课程的计划：

第七和第八卷是“从小说里取得的一些风俗场景”；第九卷是一些从古典文献中摘取的哲理和道德教训类的名句或段落，外加各个时期的评点文；第十卷是关于孔子、道家和佛教弟子的一些非古典哲学言论；第十一卷为“历史日知录”，是从《通鉴纲目》和《纲鉴易知录》等书中录取的一些历史故事、训诫等法文译文；第十二卷是汉字基本知识的补充，如，一份有5000汉字组成的词汇表，声调，12000个部首，有关汉字组成、它的派生词，不同的书写法和印章图册等。①

该教材是为来华法国传教士所编写。正如编者所说，来华传教士一般都有一定年龄，可又肩负传教重任，为了能得到上级重用和尊敬，必须在最短时间内得到有关中国“最清楚、最明确、最实用的一些概念”，以企快速融入中国人的生活。② 我们可以看出，在这本教材里，编者涉及到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内容十分丰富，但都是一些最基本的，或者说常识性的知识，所以，实际上作者要编的是一部“中国文化概述”之类的教科书。

此外，我们还应注意到，这时期的法国汉语教学除在汉语课教学中注意文化介绍外，也已开始开设一定数量的中国文化课，编写出版了一些中国文化课本。如，德·比西（De Bussy）的《中国文化教程》第一卷，微席叶的《中文文选》等。前者于1897年在上海徐家汇出版，内收《三国演义》、《水浒传》、《好逑传》、《杀狗劝夫》等中国白话小说和戏剧部分章节。在开

① Preface de *Rudiments de parler chinois*：*Dialecte du* 河间府，河间府，Imprimerie de la Mission Catholique，1895.

② Preface de *Rudiments de parler chinois*：*Dialecte du* 河间府。

设的课程方面，如1884年东方语言学校在开出汉语课以后，又增设了远东历史、地理讲座，1888年增设远东政治制度史与远东文明讲座等课程等。更不要说，在世纪之间，伯希和、戴密微、考狄、葛兰言等，都曾在巴黎东方语言学校担任过有关中国文化的课程。可以看出，法国的汉语教学从学科建立开始就注意到，在传授汉语知识和技能的同时，也把介绍和传授中国文化作为己任。这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在20世纪二战以后当一些新的中文系建立起来的时候，能如此迅速完备地配套开设出中国语言和文化课程。

五、其他：关注自然科学的考察

19世纪的法国汉学家对汉学目录学、中国少数民族、中国科技工艺等的涉及，使国外的汉学研究别开了生面。如巴赞着手编写的元人文集目录，1816年雷慕沙受命于皇家文库建立中国图书目录，包括详细的传略、传记等。① 德理文的《中国藩部民族志》(1867—1883)的中国边疆少数民族和"天朝"的关系史，涉及中国天文的有毕欧的《周髀》译本(1841)，涉及到数学的有微席叶的《关于算盘的起源和它的衍生的筹算的研究》，涉及到中国工艺的有儒莲的《中国陶器历史及其制作方法》②和《中华帝国古代现代技艺》③等。这里，特别要提出的是，从19世纪后期开始，耶稣会教士在中国创办博物馆和天文台所取得的汉学研究成果。

早在17世纪后期开始，法国的耶稣会教士就曾利用科学和教育来进行传教，但是自从1742年在华教士被逐后，有关中国的著作基本上属于文化和历史范畴，很少涉及中国的动物、植物、地理、矿物和天文等自然科学。而到了19世纪30年代，这项工作又重新引起了重视，但事情真正开始还要等到60年代郎怀仁(A. Languillat)助教担任江南教区的代理牧主时情况才有了转机。

1860年徐家汇修道院院长达维(A. A. David)在华北采集大批生物标本，1868年法国耶稣会的韩伯禄神父(P. Heude)来到江南。作为一位自然科学家，韩乘木船在中国各地收集了许多有价值的动植物标本，后来，他利用这些资料，在徐家汇建成了一座自然博物馆，中文名称就叫"徐家汇博物

① 没有完成，一部分传记收进四卷本的《亚细亚论文集》(1825—1829)。

② 《景德镇陶器录》的译本，他是专门为塞夫勒(Sèvres)皇家作坊的陶瓷工人翻译的。

③ http://218.24.233.167:8000/Resource/Book/Edu/KPTS/joy02051/0006_ts086052.htm

馆(Sikowei Museum)”,这也就是“中国第一座近代意义的博物馆”。[①]之后,在上海又增设了“震旦博物馆”。前者主要是动植物,后者增加了古物,如铜器、兵器、货币、玉器等。继韩伯禄之后是桑·坡米尔(P. E. Liclht,汉名桑志华),他大约于1914年3月31日来到中国,足迹遍布山东、河北、山西、陕西、河南、甘肃、内蒙、东北南部和西藏东部地区,行程达5万公里,采集大量的动植物、化石、矿石等,仅高等植物标本就达8000多号。他利用这些资料在天津建立了北疆博物馆。

除创办博物馆外,法国的传教士还创办有天文台。1873年2月,传教士在徐家汇肇嘉浜西岸兴建了“上海第一座天文台”[②]。1893年,第二任台长法国传教士蔡尚质集合上海有关的气象单位,组织了一个“最早气象学会,上海气象学会,编辑出版会报”[③]。1899年,天文台内设有气象和地震两个部,1904年,徐家汇天文台进行地震观察,从而成为“上海第一个地震观察站”[④]。法国天主教教士田国柱曾任该台第四任台长。

显然,耶稣会在创办博物馆和天文台的过程中收集的资料和出版的论文和著作,充实了西方汉学研究,加深了西方对东方和中国的了解。如韩伯禄神父对中国动物和油脂植物进行了研究,撰写了不少有价值的论文,而桑志华神父的成绩更为明显。他利用5万多公里行程中采集到的丰富资料,写了《1914—1923年黄河流域勘察报告》(四卷本,1924年出版)和《1923—1933年黄河流域十一年勘察报告》(四卷本,1935—1936年出版)。在天文气象方面,1895年12月31日,天文台利用当时马尼拉、东京、厦门等几十个国内外观测站的气压、气温、风向、风速、天气现象资料,绘制了“我国第一幅东亚地面气象图”。[⑤] 法国天主教教士田国柱写有《中国地震总表》,发表于《徐家汇天文台观测公报》上,由此获得法国科学院奖金。[⑥]

---

① 严建强:《法人在华办博物馆:概述和评析》,载《中法关系史论》,第160页。

② 《徐家汇天文台创建的前前后后》,杨尧深主编的《老话上海法租界》,中共上海市卢湾区党委党史研究室编写,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88页。

③ 《徐家汇天文台创建的前前后后》,杨尧深主编的《老话上海法租界》,第89页。

④ 《徐家汇天文台创建的前前后后》,杨尧深主编的《老话上海法租界》,第89页。

⑤ 《徐家汇天文台创建的前前后后》,杨尧深主编的《老话上海法租界》,第89页。

⑥ 《徐家汇天文台创建的前前后后》,杨尧深主编的《老话上海法租界》,第89页。

第四章 法国汉学(中国学)的发展(上)

20世纪的法国汉学,随着世界政治、经济、军事的风云变幻和现代西方自然科学、哲学、心理学等观念的更新,同时又由于中国本土在这个世纪翻天覆地的变化,从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复杂情况。可以说,20世纪的法国汉学,既是一个经受众多种磨难和挫折,同时又是一个迅猛发展、繁荣昌盛的时期。要是将20世纪法国汉学按阶段划分的话,基本上可以分为二战前和二战后两个时期。20世纪上半期,直到二战前,是个繁荣昌盛时期;二战后的情况较为复杂,是一个机遇和挑战并存、挫折和繁荣相兼的多元时期。

第一节 法国汉学的繁荣和昌盛

一、西方的汉学,一门法国的科学

自从1902年12月3日国际汉学界在河内召开"东方工作者代表大会"之后,国外的汉学研究便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作为老牌汉学基地的法国,自然也不例外。20世纪上半期,在19世纪法国汉学,尤其是19世纪后期西方再度兴起"东方热"所取得成绩的基础上,法国汉学家们一方面继承了前辈"经院汉学"的功底,另一方面,又有机会进行实地考察,获得第一手丰富资料,所以能做出比以往任何时期更大的成绩,法国汉学研究进入了全面的繁荣时期,并以其独有的魅力引起国际汉学界重视和高度评价。

评论家们认为,国外的汉学,如果说二战前所注重的是古代和文献学(或语文学)的话,那么,二战后汉学家们所重视的则是近现代和社会科学

(含人类学)。而如果从世界各国汉学研究的实力来说,二战前,国际汉学界像19世纪一样,"几乎"仍然"是法国一统天下"①。19世纪20年代留法学者李思纯曾这样说过:"西人之治中国学者,英美不如德,德不如法。"傅斯年也说:"中国学在西洋之演进,到沙畹君始成一种系统的专门学问。"沙畹以后,西方的中国学大师虽然可分为巴黎与瑞典两派,但后一派的台柱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学术渊源仍是师承沙畹"。此外,"这一时期在苏俄、美国汉学界居显要地位的阿列克(V. M. Alexeif)和叶理绥(S. Eliseeff)②,也是巴黎学派的弟子门生"。③ 因此戴密微说:"中国学在西方,在骨子里仍是一门法国的科学。"④由此,评论家便下这样的结论:二战前的"'中国学'不仅是一门西洋的科学,而且还是一门法国的科学。"⑤2001年11月马悦然在耶鲁大学第42届爱德华·休谟纪念研讨会上的一份报告中,谈到他的老师高本汉为什么到巴黎求学时,似乎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⑥ 他说,1911年12月,高本汉先生离开中国,在伦敦国王学院呆了几个月。他本意是想在美国的学术机构中谋求一个教职,但当他了解到全美国只有耶鲁、哈佛、伯克利和哥伦比亚四所大学设有汉学专业且没有空缺教职时,便打消了原来的念头。最终,高本汉决定去巴黎,因为当时那里活跃着两位"最伟大的汉学家":沙畹及伯希和。他还说,在此,我想补充说明的是,"20世纪初的巴黎,在当时是欧洲汉学研究的中心"。⑦ 高本汉旅居巴黎所进行的研究,对于马悦然本人的研究影响甚大,后来他的学生也间接受到影响。1946—1948年间,高本汉的几位弟子请求他开设一门汉学研究书目课程,他勉强答应,不过仅提供一些西方汉学研究者的名字,他把这些名字高声念给大家:"沙畹!是的,沙畹是一个伟大的学者!读他!莱比锡的August Conrady!很棒!读他!伯希和,仔细地读他,不要忽略他的脚注,它常常比正文更加重要!你们在图书馆会找到他们的著作的!"⑧显然,在高本汉的心目中,法国是当时汉学研究的重镇,法国的几个

---

① 桑兵:《20世纪国际汉学的趋势与偏向》,中国学术论坛,www. FRChina. net。

② V. M. Alexeif,也译阿里克塞夫;S. Eliseeff,也译艾利塞夫人。

③ 参阅桑兵:《20世纪国际汉学的趋势与偏向》。

④ 转引自桑兵:《20世纪国际汉学的趋势与偏向》。

⑤ 桑兵:《20世纪国际汉学的趋势与偏向》。

⑥ 参阅马悦然著,吴承学、何志军译:《20世纪欧洲汉学》,译文见2002年第2期《书城》。

⑦ 马悦然著,吴承学、何志军译:《20世纪欧洲汉学》。

⑧ 马悦然著,吴承学、何志军译:《20世纪欧洲汉学》。

主要的汉学家是他所尊重的大师。

二、繁荣昌盛的三个学术景象

关于20世纪上半期法国汉学的繁荣景象,有评论将其归纳为如下三个方面。[①]

繁荣景象之一,继19世纪之后,法国又创立了一些新的教学和研究机构,从而使法国的汉学教学和研究机构趋向完备。[②] 这时期的法国汉学机构,除了法兰西学院和东方语言学校外,新开辟的有:

1)巴黎研究实践学院(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Etudes)。1868年由维克托·杜吕易(Victor Duruy)创办,包括第一至第四系,1886年增设第五系,1947年又设立了第六系。其中四、五、六系负责汉学研究,开设讲座。

2)法兰西远东学院(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EFEO)。前身是法国在越南考古研究中心(Mission archéologique d'Indochine)。最早根据法属印度支那总督杜梅(Paul Doumer)1898年12月15日决定而创建。这次决定将新设机构的学术监督权委托给了金石和美文学科学院。一年后,被重新命名为法国远东学院。后将校址设于西贡,1902年随同总督府大部行政机构迁至河内。学院的最早使命是从事考古勘察、搜集稿本著作、保护古建筑物、研究法属印度支那地区的语言文化遗产,促进从印度到日本所有亚洲文明的历史研究。学院在河内有一座图书馆和一座博物馆,后来逐渐扩大。1907年起,学院获保护柬埔寨吴哥窟建筑物遗址的公益性服务权。学院的主要任务不是教学,而是研究。必要时,研究者将被派往有关国家工作。学院在考古学、文学和语言、宗教学和哲学、遗产保存等方面都取得卓越成就。在中国研究方面,这一时期的卓越贡献主要是:考古方面,有1904年沙畹的考察团在华北对汉代墓葬和中世纪佛教雕刻等重要文物的系统勘察和研究,1908年伯希和考察团在敦煌搜集到的6000余卷写本,两次世界大战间越南境内古墓发掘等,所做的学术贡献在汉学发展史上史无先例。文学语言方面,学院成员马伯乐1927年完成了《古代中国》和关于唐代长安方言的创新性研究等。宗教学和哲学方面,继伯希和于20世纪初叶有关中国摩尼教的著作之后,又有马伯乐对佛教传入中

---

① 参阅钱林森:《中国文学在法国》,第一章,第三节。

② 参见:Paul Dewiéville,*Aperçu historique des études sinologie en France*,III.

国的研究、戴密微对中国禅宗的研究,以及谢和耐对神会禅师语录、寺院经济的研究等。

3)巴黎高等汉学研究所(Institut des Hautes Etudes Chinoises)。1919年由巴黎大学教授班乐卫(Paul Painleve)和中法名流共同筹组,1920年正式成立,开办费用由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补助。1929年起改属巴黎大学。研究所最初设有特别讲座,请有名望的汉学教授主讲,课题是中华古今学术与文化。1929年,巴黎大学曾让该所主办"汉学研究结业文凭(Diplôme des Hautes Etudes Chinoises)班"和"汉学研究生合格文凭(Diplôme d'Elève titulaire)班"。

4)国立科学研究中心(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国际著名研究组织之一,成立于1939年,旨在发展、引导并协调各方面的科学研究。中心能为研究人员及技术合作者提供津贴补助、科研材料、出差费用以及出版研究成果。该组织机制既严密又极富弹性。很多附属于科研中心的研究组(简称ERA)及实验室(简称LA)的工作人员由中心提供工资和研究计划的资助,虽然他们的编制属于其他研究机构。

5)1900年,法国里昂大学设立了第一个汉语教授职位,担任这一职务的是汉学家古兰(Maurice Courant)。

6)在华机构,如"巴黎大学北京汉学研究所"(Centre d'Etudes Sinologiques de l'Université de Paris à Pékin)、河北河间府(今河北献县)传教士活动中心和上海徐家汇传教士图书馆等。"巴黎大学北京汉学研究所"的倡导者是学者铎尔孟(André d'Hormon,1881—1965),同时他还创办了法中大学(l'Université franco-chinoise),那里有大量准备赴法,尤其是到里昂继续求学的中国留学生。北京汉学研究所发行各种出版物,还编辑了一套中文著作《通检》,可与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的那套《引得》齐名。

7)"日佛会馆"(Maison franco-japonaise),1926年法方和日方在东京创办,由法国印度学者如傅舍(Alfrd Foucher)、烈维(Sylvain Lévi)、哈干(Joseph Hackin)、勒努(Louis Renou)等担任领导,并出版《日佛会馆报》(*Bulletin de la Maison franco-japonaise*)。1928年,日佛会馆开始编撰《法宝义林》,一部佛教百科全书性的作品,明确表示要以汉日文资料为基础。

与此同时是一些学会刊物的创办,图书资料和文物的收集。如《通报》(T'oung Pao,1890)、《河内远东法兰西学院学报》(Bulletin de l'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略称B. E. F. E. O. 1901)和《亚洲艺术杂志》

(1924)等的创办,此外吉美博物馆(Musée Guimet)①、卢浮宫(Louvre)的东方部、巴黎国家图书馆(Bibliothèque Nationale)和巴黎法兰西学院的汉学研究所图书馆,以及私人收藏家戴何都(Robert des Rotours)等对中国图书资料和中国文物的大量收藏,都为法国汉学的繁荣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研究基地,也为汉学家们的研究准备了充足的资料,为他们的活动提供了广阔的平台,正如戴密微所说:"自本世纪初叶以来,新出现的汉学机构有力地促进了法国汉学的发展。"②

繁荣景象之二,本时期出现了一些"有影响的汉学大师",也就是"泰斗式"的汉学家,是"法国汉学走向成熟的标志"。③

自从1814年法兰西学院汉语讲座开设以后,法国的汉学队伍就已经形成,到了20世纪上半期,这支队伍就更加强大,人数众多。在谈到19世纪法国汉学的时候曾经交代过,我们把一部分世纪间的汉学家放到19世纪介绍,而另一部分放到20世纪初介绍。如顾赛芬、戴遂良、夏鸣雷、微席叶等,已在19世纪加以论述。下面论述的部分汉学家,虽然汉学活动时间也在世纪之间,但还是放在这里加以论述。通常,评论家将20世纪上半期法国汉学家分为三类。

第一类,通常所称的"泰斗式"汉学家,也就是戴密微所说的,在这一时期所出现的"使本学科大放光彩的明星人物"。④他们不仅在法国,同时对整个国际汉学的发展都起着重大的影响,如世纪之交法国最著名的汉学家、公认的"欧洲汉学泰斗"沙畹(Edouaral Chavame),以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语言和中文书目著称的亨利·考狄(Henri Cordier),以研究中国历史和语言著称的马伯乐(Henri Maspero),以文献学家著称的伯希和(Paul Pelliot)和汉学社会学家葛兰言(Marcel Granet)等;第二类是在某些方面取得一定的成绩,为法国和国外汉学发展贡献力量,留下极其宝贵遗产的汉学家,如格鲁赛(René Grousset)、爱斯嘉拉(Jean Escarra)、白乐日(E·Balazs)、烈维(Sylvain Lévi)、瓦累·普散(Louis de la Vallée poussin)等;第三类是以中国题材进行创作和追求东方美学思想的汉学家,他们的作品反映出深厚

① 据吉美博物馆图书馆馆长马古安(François Macouin)介绍,基美博物馆现改名为:法国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见《汉学研究》第二集,中华书局,第529页。

② Paul Demiéville, *Aperçu historique des études sinologiques en France*, III.

③ 钱林森:《中国文学在法国》,第14页。

④ Paul Demiéville, *Aperçu historique des études sinologiques en France*, III.

的中国文化底蕴,如谢阁兰(Victor Segalen)、克洛岱尔(Paul Claudel)、洛蒂(Pierre Loti)等。正是以上三类各具特色汉学家的努力,使得这时期法国汉学队伍的阵容更加壮大,实力更加雄厚。因第一类和第三类将有专门介绍,所以这里先把第二类的汉学家做一介绍。

1. 格鲁赛、爱斯嘉拉、白乐日、烈维、普散等。

格鲁赛(René Grousset,1885—1952)主要从事亚洲历史和艺术研究,曾于1939年出版巨著《草原帝国》一书,并多次重印。[①]他的研究成果被载入教科书和大量的画册,在法国的中学教师和非中文专业学生中颇有影响。

爱斯嘉拉(Jean Escarra,1885—1955),巴黎法学教授,曾作为法国政府法律顾问,在华居住多年并学习中文,对中国法律颇有研究。

白乐日(E·Balazs,1905—1963),一位杰出的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原籍匈牙利,是社会学家韦伯的(Zax Weber)的私淑弟子。他写有许多关于唐代的研究论文,并著有《唐代经济史》(1931—1933)、《中世纪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两卷(1953—1954)。1950年,他还提出共同编写宋史计划,为此发出了国际合作的呼吁,可见他对汉学研究的重视。

烈维(Sylvain Lévi,1863—1935)、瓦累·普散(Louis de la Vallée poussin,1869—1938)都是印度学家,主要运用中国的资料来研究印度、西域佛教。烈维曾与沙畹合作,发表很多论文,研究中国与印度或中国中亚细亚关系,及直接跟中国有关的历史。他在日本声名远扬,25岁时与第一批日本留法学生来往甚密,并开始阅读汉文和中国原版书。他三次访日,每次都顺访印度和尼泊尔(1899,1922,1926—1928)。晚年有机会带了一个中国弟子林藜光(Lin Li-Kouang,1902—1945),福建人,佛教居士,并委托他出版编著他从尼泊尔带回的梵文《诸法集要经》(*le Dharmäsamuccaya*)。林藜光为此经文编制了一种考证版,附有汉、藏、法文对照(有一卷已于1946年出版,其余几卷不详)。《诸法集要经》仅仅是小乘教佛典《正法念处经》(*le Saddharmasmrtyupasthānasūtra*)的语录汇编,林为此写了一部长篇论著,在林去世后出版,名《真经节录》(*L'aide-mémoire de la Vraie Loi*,1949)。林的研究已经"使中国佛教研究在科学的现代化基础上重新焕发青春",但在中国鲜为人知。二战期间,他因衣食无着和对祖国的忧虑客死

① 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前言,商务印书馆,1998年。

他乡。[1] 瓦累·普散是比利时佛教研究专家，出生于法国，译有世亲（Vasubandhu，或译天亲）著的《阿毗达摩俱舍论》（亦称《大法》或《无比法》）。由于他的第一流的附注，使原书内容更为丰富，成为西方最优秀的佛经教科书。[2] 他还利用庚子赔款在布鲁塞尔建立了中国高级研究所，从1931年起，与众多的外国留学生合作，发表了一套优秀的《中国与佛教杂论》。

2. 除上述汉学之外，我们必须提到的还有两位瑞士人和一位定居比利时的意大利人。

两位瑞士人，一位是爱德华·于贝尔（Edouard Hubert，1879—1914），他在法国高校获得学衔，具有文献学家的天才，并通晓多种语言，1902年以来，是法国远东学校的成员，发表有关佛教文学和印度支那历史的著作，可惜过早地死在越南热带丛林中；另一位是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的弟弟奥波尔德·德·索绪尔（Léopold de Saussure，1866—1925），他先在法国当海员，后来到远东，著作有《中国天文学探源》（1902—1922）。

意大利人叫拉法埃尔·贝特鲁奇（R·Petrucci），是位献身于中国画史和美学研究的汉学家，他翻译有著名的《芥子园画传》（1918），死于1917年。

繁荣景象之三，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宽和著作的多样化。

由于本时期的汉学家大都具有多方面的学识和兴趣，又大都到过中国或客居中国多年，这就使他们获得了双重的优势，既有经院汉学的功底和严谨的科学作风，又有早期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感性认识，因此视野也就更加开阔，对所探求领域做更深入地研究。他们不仅在中国历史、考古、敦煌学、天文、宗教、思想、经济等领域都有较广泛深入的涉猎，同时一些领域还有所开拓，为这时期的繁荣景象打造出多姿多彩的局面。

1. 法国汉学"三大创举"。

这时期的汉学家们，不仅兴趣广泛，知识面广，同时，他们还都有思路开阔、勇于探索的精神，使得他们能在汉学的众多领域中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或言前人之未所言，开辟新的路子，或建立新的学科。

首先，随着汉学研究的不断发展和作品的日益增多，人们对汉学书目的迫切需求也提到了日程上来，考狄的《中国书目》（或称《中国学图书志》

① Paul Demiéville, *Aperçu historique des études sinologiques en France*. III.

② Paul Demiéville, *Aperçu historique des études sinologiques en France*. III.

Bibliothéica sinica)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运而生,为国外中国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子,在他之后,西方不时有人仿效他的做法,编写国外汉学研究书目。

第二,开创法国"敦煌学"研究。当今的世界,敦煌学已成为一门"显学",[①]但是,该学科的发轫、兴起和全面发展时期是在20世纪的上半叶。有评论将1909至1983年之间的中国敦煌学分为五个时期:即发轫期(1909—1930)、初建期(1931—1943)、全面展开期(1944—1949)、深入发展期(1950—1966)和新高潮期(1976—1983)。[②] 我们说,法国的敦煌学也是如此。正如法国当代汉学家戴仁所认为的,虽然法国的敦煌学研究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有了转机,但在20世纪上半期,法国的汉学家伯希和和马伯乐,尤其是伯希和,对敦煌这一古老文化的发掘和收集已做了大量的工作,为法国敦煌学的建立立下了不朽的功劳。[③]

第三,开创汉学社会学研究。如果说二战前的法国汉学家中,伯希和、马伯乐分别以文献学和历史学著称的话,那么葛兰言就是受当时法国著名社会学家涂尔干影响(Emile Durkheim,1858—1917)将社会学引进汉学研究而独树一帜的汉学家。[④] 显然,他的这一创举,在法国和整个国外汉学界上来说,影响都是十分重大的。

考狄的《中国书目》、伯希和对法国敦煌学的创建和葛兰言的汉学社会学研究,堪称这时期法国汉学的"三大创举",不仅为法国汉学的繁荣,也为整个国际研究凭添了无限的光彩,成了这时期法国和世界汉学研究最引人瞩目的伟绩,因而极大地震动了国际汉学界。

2.追求中国题材和东方美学。

在谈论这一主题的时候,我们会明显地发现跟以往一个明显的不同是,在这一时期,除了译介之外,一些汉学家还追求中国题材进行创作,做出出色成就,其作品数量之多、影响之巨大是以往任何时期都无法比拟的。

第一,中国文学翻译和研究。

这时期的中国文学的翻译和介绍,无论是在诗歌、戏剧还是在散文、小

---

① 林家平、宁强、罗华庆:《中国敦煌学史》,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1页。

② 林家平、宁强、罗华庆:《中国敦煌学史》,第9页。

③ [法]戴仁:《法国的敦煌学研究》,《法国当代中国学》,第241页。

④ Maurice Freedman: *Marcel Granet*, *La Féodalité chinoise de Marcel granet*, Editions IMAGO, 1981.

说方面，都比前一时期有了很大程度的发展。

在诗歌方面，除了唐诗和诗经之外，汉赋、汉乐府、魏晋南北朝的诗歌等都有进一步的涉及，有的领域还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葛兰言的《诗经》社会学研究、克洛岱尔的诗歌翻译和创作，以及这时期中国留法学生对中国诗歌的译介，都是这时期法国中国诗歌译介中令人瞩目的成就。

这时期中国留法学生的中国诗歌译介，主要有徐仲年的《中国诗五十首》（发表在里昂的《中法季刊》上）、《中国诗人杜甫》（发表在《水星》杂志上）、《李白诗》、《杜甫诗》（发表在《交流》杂志上）、《白居易研究》、《子夜歌选》（发表在《里昂大学杂志》）等，罗大冈翻译的《唐诗百首》（1942 年出版，1947 年再版）、《首先是人，然后是诗人》（1948），梁宗岱翻译的王维诗歌（发表在《欧洲》杂志上）、《陶潜诗选》（1930）等。其中，有的译介颇有影响，如罗大冈翻译的《唐诗百首》，翻译了唐诗百首名作，是圣－德尼的《唐诗》的补充，他的《首先是人，然后是诗人》，译介了屈原、陶潜、李白、杜甫、白居易、李贺、李清照的作品，“第一次在法国读者面前展现了我国七位伟大诗人的形象”；[①]梁宗岱的译作，还得到瓦莱里和罗曼·罗兰的好评。[②]

在中国古典戏剧方面，世纪初有路易·拉卢瓦翻译的元杂剧《黄粱梦》，李治华翻译的《忍字记》、《破家子弟》，潘莫诺的皮影戏研究等。中国古典小说的翻译，虽然在世纪初尚“处于低潮”，[③]除 1925 年莫朗重译的《好逑传》之外，几乎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作品问世，像《红楼梦》、《金瓶梅》、《水浒传》、《儒林外史》等古典名著译介，也要等到 50 年代以后，但 30 年代一些中国留法学生的博士论文则对这一题材有所涉及，而且他们的论文都先后在法国刊物上公开发表，使得法国的中国古典小说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如吴利泰的《论中国小说的书目与批评》（1933）、贺师俊的《论儒林外史》（1935）、郭麟阁的《论红楼梦》（1935）等，这些论文可以说是“法国最早出现的研究中国小说的专论”[④]；到了 40 年代，中国学者傅东华、戴望舒和吴晓铃在巴黎大学汉学研究所刊物上所发表的文章，也为法国的中国古典小说研究增添了色彩。

---

① 钱林森：《中国文学在法国》，第 37－38 页。

② 钱林森：《中国文学在法国》，第 37 页。

③ 钱林森：《中国文学在法国》，第 90 页。

④ 钱林森：《中国文学在法国》，第 130－131 页。

我们说,中国留法人员的汉学研究自古就有,如18世纪的阿尔卡德·黄(Arcade Hoang)跟传教士到法国以后所从事的汉学研究也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像这时期中国留法学生那样做出如许的成绩,以及对后世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显然是前无古人的。

第二,追求中国题材和美学意识。

法国对中国美学意识的追求和用中国题材进行创作并不始于这一时期,甚至也不始于19世纪后期,早在18世纪的时候,伏尔泰的《中国孤儿》就曾轰动整个西欧,且其魅力持久不衰,一直颇受历代评论家们的重视。要说明的是,从19世纪下半叶的西方再度兴起"东方热"以后,法国的这一传统变得更为活跃,也取得了更加令人瞩目的成绩,出现的并不是一两个作家汉学家,而是一大批,如洛蒂、克洛岱尔、谢阁兰、路易·拉卢瓦等,他们的创作成了这一时期法国汉学研究中一道特别令人注目的亮丽风景线。

3.汉语教材和专题研究并举。

尽管这时期的一些汉学家对于古汉语仍持有浓厚兴趣,但同时,对于现代汉语的重视也比前一时期更进了一步,这无论在教学或研究上都有所体现,尤其是在教学中体现得更为明显。

在古汉语方面,伯希和对历史经典《书经》残卷中关于文字问题的研究,把古汉字语音学和字体学研究推向新的高潮,而他也在语音和语言问题研究上成了这一代学者的首倡者和先驱。这项工作后来由马伯乐和瑞典语言学家高本汉(Karlgren)将其向前推进了一步。马伯乐的《安南语言历史语音研究》(1912)、《唐代长安方言考》(1920)等,也都是一些出色的古汉语研究,而葛兰言则从社会学的角度来对《说文解字》进行分析。他认为,过于重视文献的真伪及对其年代的考据有一定的局限性,而通过语言结构的分析和现代民间习俗来探索中国古代的思想和宗教是一条可行之路。他在一份《中国古代宗教研究纲要》的报告(1914年公开发表)中,提出研究中国宗教的三个"有目的有步骤",首先就是考察中国最早的词书《说文解字》,第二是研究《仪礼》有关的章节,最后,再来分析、研究不同时代跟雨、水的礼仪有关的文章和记载,他认为,这些资料中保留了许多民间的宗教观念和习俗,所以是研究中国宗教很重要的资料。

关于现代汉语和教学,汉学家微席叶、古兰、伯希和、考狄、葛兰言、格鲁塞、戴密微等或著述立说、发表文章,或编写词典和教材,为现代汉语的

研究和教学做出努力。在汉语教学内容方面,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中国进一步的殖民化,该校的汉语教学更加明确了政治目的,在教学中,也更加注重汉语的口语和实用性。如微席叶,在教学中就明确表示,要为法国培养精通汉语的在华代理人。法国的里昂大学于1900年设立了第一个汉语教授职位,担任这一职务是汉学家古兰,而这一教授职位正是在当地工商会的资助下设立的,其办学目的十分清楚,主要是培养能从事两国经贸交流的人员。

从具体的汉语教学情况来看,虽然,50年代以前的法国汉语教学由于受两次大战的影响,一直处于时断时续、时好时坏的状态,然而,仍有一些亮点令世人瞩目。首先应提到的是东方语言学校。该校自19世纪以来一直是法国汉语教学的重镇,这时期仍然保持它的优势,一些法国汉学汉学泰斗,如微席叶(一直工作到1929年)、伯希和(他在这里任教了几个月)、戴密微(从1931年一直工作到1945年)、考狄、葛兰言(分别于1889—1925和1926—1940间在这里任职)、格鲁塞(他虽然没有正式担任这一教职,却于1941—1952年间负责该课程),都在这里担任过有关的课程,使得该学校的教学地位显得更为重要。

三、繁荣昌盛的三个学术背景

二战前的法国汉学所以能取得如此成就,归其原因可说有三:

其一,评论者认为,汉学所以能在欧洲成为一门专门学科,原因之一是"学者的专门化",因为,从前欧洲研究东方学的人大半是"海关上的客卿"、"外交机关的通事翻译"或"传教士"出身,本人既不是严格的科学家,也不是素来即有志研究东方学问者,故初期的汉学著作"往往稍欠精确",且"不受史学家的重视",而"这种状况到沙畹时开始转变",用伯希和的话说:"夫中国有史三十世纪而迄未间断,其雄伟深奥,确可成一独立学科而有余,盖非久涉猎之士,不经训练所能操觚者矣"。[①] 1919年1月,法国总统在商业地理协会印度支那部演说时也称:"法国研究中国,已自从来之散漫状态中成为一般学术上之正统,而认为一科;是故研究中国者,正所以为法国之学术。"[②]

① 桑兵:《20世纪国际汉学的趋势与偏向》。

② 桑兵:《20世纪国际汉学的趋势与偏向》。

汉学作为一门学科,在1814年法兰西学院开设出汉语课程的时候就已确立,并经过众多汉学家的努力已取得丰硕的成果,为什么评论者特别提出以20世纪初法国这几位汉学大师作为分界线?其理由是,关于法国汉学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而每个时期的研究都有其特征及代表人物。评论者指出:"兴隆期"使用的是"语文考据法,儒莲为代表","大成期"为"史语方法(含考古、语言、宗教、民族、艺术及科学等辅助学科)","沙畹创始,伯希和走到巅峰","发扬期"以"史语方法加社会学方法,葛兰言独放异彩"。[①] 我们且不论这样的分期是否得到所有汉学家的认可,也暂不论是否符合客观科学,但从中可以看出作者所说的"大成期"和"发扬期"以及他所提及的汉学家沙畹、伯希和、葛兰言等,正是20世纪的上半期法国汉学和这时期的法国汉学家。同时还可以看出,作者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这里也有一个问题,那就是评论者所提及的20世纪几位汉学大师的汉学成就或学术地位问题。关于沙畹和伯希和,一般的评论并无争议,但对于葛兰言,在法国,对其汉学成就似乎"抑扬互见",这也就是为什么他始终未成为法兰西学院院士的一个原因,说明一些学者"对其学术创新多少有所保留"。[②] 然而,尽管如此,葛兰言的学术地位最终还是得到学术界大多数学者的肯定和极大重视。他的《中国古代节令与歌谣》、《中国人之宗教》、《中国古代舞蹈与传说》等书,"连获法国汉学研究最高荣誉的儒莲奖",而所著《中国上古文明论》、《中国思想论》,则在法国新史学运动大师白尔(Henri Berr)主编的"人类演化丛书"中得以问世。白氏倡导综合史学,许多同人与他共同创办《社会学年刊》,可说是影响法国世纪史学最大的年鉴学派源头之一。因此说,葛兰言的学术地位也是得到肯定的,且随着时代的发展,日益受到重视,他"所开创的社会学派"后来确也"起而取代语文学派成为西方汉学的代表"。[③] 戴密微和贝冢茂树说,葛兰言所用方法,"其实就是后来对民族学影响极大的结构主义","随着战后社会学和人类学对历史学的渗透日益加强,以及法国年鉴史学主导地位的确立,此法盛行一时",而此时在法国"葛的身价已经超过马伯乐"。[④]

---

① 桑兵:《20世纪国际汉学的趋势与偏向》。

② 桑兵:《20世纪国际汉学的趋势与偏向》。

③ 桑兵:《20世纪国际汉学的趋势与偏向》。

④ 桑兵:《20世纪国际汉学的趋势与偏向》。

其实,18 世纪的传教士已跟以往的那些旅游者、商人对中国印象式的记录不同,雷慕沙、儒莲则更进一层,已用 19 世纪的科学头脑来研究中国而超过他们的前辈,但他们仍然没有像这时期的沙畹、伯希和那样,用"史语方法"来研究中国,更没有像葛兰言那样"以史语方法加社会学方法"使得国外的汉学研究迈上一个新的台阶,并放出异彩。这大概就是为什么评论家特别提出把这一时期的汉学看成是"学者专门化"时代的原因。

其二,重实地考察和资料的翔实。19 世纪初期,汉学学科虽然在法国建立,但因为中西交通阻塞,法国的汉学家无法亲自来中国进行考察和研究,汉学家们只能利用传教士们的材料进行研究,而这种隔膜的情形到了沙畹、伯希和时期已大为改观。汉学家们能亲临中华大地进行观光、考察,搜集第一手资料。20 世纪上半叶法国汉学就是在这一大的背景下进行研究和考察的,因此这时期的法国汉学成果都有资料翔实可靠的特点,即便是一些翻译作品,译者也往往会加大量翔实可靠的注释,显示出扎实的考据功底和严谨的资料收集功夫,尤其是在中国古代史研究方面显得更为明显。沙畹因有在中国实地研究的经验,深感研究中国文化必须与中国实际社会相接触,虽然可以利用中国近代学者的研究结果以做参考,但因中国文化是一活的而非死的文化,所以必须亲临中国进行考察,不然中国学难能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他多次来中国进行考察,每次都十分重视,做出认真安排,以获得更多的第一手资料。以 1907 年他第二次来华为例,便就对考古、考察进行了有计划的安排。他先到满洲里,然后至河北、山东、河南、陕西、山西等地,尤其是对龙门和云岗石窟进行了详细的考察,搜集到了大量中国文物和碑帖,为他的中国研究,尤其是中国历史研究做了充分的资料准备,打下了厚实的基础。五卷本《史记》译本,就是在这样的前提下进行的。他书中附有渊博的序言、注疏及附录,而且考据精细,注释详尽而丰富,广征博引中外典籍,堪称范本,有着不可辩驳的说服力。伯希和曾三度游华,1906—1909 年间在中亚从事过考古工作和收集了大量资料。他"对纯粹中国材料认识之多"令"北平学界"大可震惊。他还进而提出:治"中国学"必须得有三个方面的预备:1. 目录学与藏书;2. 实物的收集;3. 与中国学者的接近。他希望嗣后研究中国学问,须中外学者合作,以补以前各自埋头研究之缺陷,及使世界了解中国文化的真正价值。[①] 这时期

① 桑兵:《20 世纪国际汉学的趋势与偏向》。

法国不少的汉学著作还直接利用西洋或法国外交部的档案资料,而并非从考古资料中获得。考狄晚年编的《中国通史》(四卷本,1920—1921),主要是利用法国外交部的许多"珍贵""外交史料",[①]他的《法国在远东两个租借地的起源:上海、宁波》(1896),《1860—1902年中国与西方列强关系史》(三卷,1901—1902)等,是大量地利用西洋,尤其是法国的外交档案。也正为此,这些作品享有了"盛名"。[②]

其三,欧洲的学术背景。正如有学者所说:"伯希和时代西方汉学的成熟,以整个欧洲学术的发展为背景和依托"[③]。此言不差。我们说,西方汉学研究的主体对象虽然是中国,但其研究的思维方式却仍然是西方的,因为汉学家们毕竟是西方文化背景下培养出来的学者(也包括华人汉学家),也正是由此他们的研究对我们有所启发。19世纪下半叶以来,实证主义盛行欧洲,法国尤甚,文学、史学一无例外。受科学化倾向制约,考古和文献考证日益成为史学的要项。法国实力最大的写实派史学家古朗日(Fustel de Coularges)声称:"在最细密处去直接解析遗文,只相信遗文所指出的意义。"这种重文献与考古的研究,使汉学逐渐脱离以往的两种偏向:"不通中文只据西文的道听途说"和"虽识中文却不加分析的以讹传讹"。这种做学问的方式虽"与清学颇为接近",但"核心仍是西方近代科学思想"[④]。葛兰言受当时法国著名社会学家涂尔干(Emile Durkheim,1858—1917)影响将社会学引进汉学研究,[⑤]因当时"法兰西史学界颇有欲以社会背景之研讨代替旧派之著重个人心理之解释者"的倾向,葛氏亦然。他改学中文,因为他认识到"中国文化乃世界文化中最古老并最富有连续性"的文化,正适宜他的此类课题。可见其问题来自法国的"历史研究"学家的"个人心理解释法",而这种解释法在法国"已经发挥到极致"。实际上,欧洲的汉学界,包括当时成就最高的"巴黎学派",也只有极少数人开始进入"中国文史学"的"个人心理之解释"阶段,沙畹对《史记》的看法便是一例。而葛兰言的法国"社会学派的社会学"实际上与我们通常所说的"民

① 莫东寅:《汉学发达史》,第100页。

② 莫东寅:《汉学发达史》,第100页。

③ 桑兵:《20世纪国际汉学的趋势与偏向》。

④ 桑兵:《20世纪国际汉学的趋势与偏向》。

⑤ Maurice Freedman: *Marcel Granet, La Féodalité chinoise de Marcel granet*, Editions IMAGO, 1981.

族学或文化人类学，颇为相近”。所谓的“社会学分析法”，其实质就是“一种实际调查与田野研究”方法，结合到汉学，也就是葛氏所主张的要以中国的乡村文化为中心，并选择受都市文化影响最少、最能保存旧日文化形态（如河南郑州一带）的一个乡村为研究对象。如果照此而行，他得到公认的机会可能更大。后来费孝通即首先避开文献的困扰，开创乡土社会研究的先例，然后回头再适应中国学术，结合文献解释皇权与绅权。葛兰言却将社会分析即对社会事实的分析直接用于历史研究，具体地说，用社会分析的研究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的历史。在当时，葛氏的这一做法是符合潮流的。①

第二节 “泰斗式”的“明星”汉学家

我们在谈到繁荣景象之二时，曾经谈到，这时期除了人才济济之外，就是出现了一些有世界影响的汉学家，他们便是沙畹、考狄、伯希和、马伯乐和葛兰言。

一、沙畹和他的汉学研究②

沙畹（Edouard Chavanne，1865—1918），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法国汉学巨擘，公认的“欧洲汉学泰斗”。沙畹出生于里昂一个新教家庭，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所学专业是哲学。1891 年，他发表处女作《关于康德的自然科学基本原则》③，后在东方语言学校学习汉语，很快便掌握了这门对欧洲人来说异常艰深的语言，并在清朝驻法国公使参赞唐复礼帮助下开始翻译《史记》。1889 年沙畹赴北京担任法国公使馆翻译，工作之余继续从事《史记》翻译和研究，后以“《史记》‘封禅书’译注”为名，刊载在《北京东

① 以上内容参阅桑兵：《20 世纪国际汉学的趋势与偏向》。

② 有关“沙畹的生平和汉学研究”主要参考如下几篇文章，无特殊情况不一一注出。戴仁：《沙畹和法国的中国碑铭学》，《法国汉学》第六辑，中华书局，2002 年；海外中国学史研究，海外中国学家（史学研究网）；Paul Demiéville, Aperçu historique des études sinologiques en France. III；[法]苏远鸣《法国汉学 50 年》；《埃玛纽埃尔－爱德华·沙畹》，百度百科学；蒋向艳《法国汉学家沙畹》，《国际汉学》第十三辑，大象出版社，2005 年；李雪涛：《法国汉学巨擘：沙畹》，《中国图书商报》等。

③ 论文与人合作撰写，合作者夏尔·安德烈（Charles Andler），杰出的日尔曼语专家，后来成为法兰西学院教授。

方学会杂志》上。结集出版后,被公认为《史记》最佳西文译本。[①] 1893 年沙畹奉命回巴黎,继德理文(Saint - Denys)主持法兰西学院"汉语及满语言和文学"讲座,成为该讲座的第四位教授,是年仅 28 岁。在这时期,因印度学家烈维要求,沙畹暂放下中国研究转而翻译佛经,连续发表一系列关于印度和西域僧侣传记,同时在东方语言学校、索邦大学、巴黎高等研究实验学院宗教科学系任教,并担任多种社会职务:1895 年任法国亚洲学会秘书长并参加《通报》编辑工作,1903 年协助考狄共同主办《通报》,是年成为法兰西学会会员。1907 年,再度来中国考察,为他搜集大量文物提供了机会,其中有珍贵壁画和碑刻。一战给沙畹带来了灾祸。他为法国命运担忧,同时也为不到年龄就应征入伍的飞行员儿子担惊受怕,健康受到严重影响,但他对学习汉语和汉学研究始终抱着极大热情。凭着坚韧毅力,他继续学习,顽强练习口语,终因出色成绩于 1916 年当选为英国皇家亚细亚协会会员。1917 年,中国加入协约国参战,此时的沙畹作为译员以流利的口语接待了中国的政治家代表团。沙畹不仅自己著书立说,还培养了一批有影响的汉学家:爱德华·于贝尔、谢阁兰、伯希和、马伯乐、葛兰言等,在法国汉学发展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

沙畹的一生是热衷汉学研究的一生,在他离开人世前的几个月,还在索邦神学院大阶梯教室做题为《中国人的一些道德思想》的演讲。由此,苏远鸣(Michel Soymié)说:"沙畹在有生之年,以其耀眼的光芒而显赫一世","从本世纪初叶开始,簇拥在他身边""众多才华横溢""学识渊博"的门生,继承了他的遗产,并将"巴黎所拥有的'西方汉学之都'"的"桂冠""一直维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②]

沙畹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汉学家,他的研究,不仅为法国汉学,也为整个欧洲汉学在研究方法、史料学等方面奠定了基础。

在汉学研究方法上,沙畹最突出的贡献是把历史考证方法引入了 20 世纪的汉学研究。这种考证方法来源于 19 世纪的历史和科学主义,十分注重史料和科学考证,以严谨著称。因此,他的文化修养、他的研究方法和思想的某些方面都属于 19 世纪的,但他的活动又主要在 20 世纪。而且,由于家庭的关系,沙畹养成了严谨治学、严于律己的一丝不苟的性格。两

① 译文原稿现存巴黎吉美博物馆。

② [法]苏远鸣:《法国汉学 50 年》。

者的结合，使他的汉学研究显得精辟、严密和科学化。他的研究既有厚实的传统研究底子，同时又不拘古法，勇于革新，既继承了19世纪法国汉学的传统，又开创了20世纪法国汉学新的局面，加上他知识渊博，涉猎广泛，故对后世影响深远。有评论认为，沙畹对于近代历史科学中一切新的方法全能运用，对于史学的一切辅助科学又全是内行，并主张以整个中国文化与整个活动的中国社会为研究对象，其附于《泰山志》(*Le T'ai - Chan*)一书的论文《中国古代的社神》，实为西洋中国学界空前的杰作，他的重要性就在于"启发后之学者，走上以社会学法研究汉学之途径"。①

沙畹著述甚丰，他翻译注释《史记》，对中国的佛、道、摩尼教，对于中国的碑帖、古文字、西域史、突厥史、地理等领域都颇有研究，且成就斐然。同时他还是世界上最早整理研究敦煌与新疆文物的学者之一，法国敦煌学的先驱者。

首先，作为一位史学家，沙畹最主要的、最大的贡献是翻译和注释中国古代史学巨著《史记》。这部译作在北京只出版了其中一卷《封禅书》，1893年在巴黎由亚细亚学会资助出版了译注稿的三分之一，即150卷中的47卷，至《孔子世家》止，分成五卷，名为《司马迁的传体史》(*Ies Mèmoires historiques de Se - ma Tsien*)。之后，麦松奈文出版社于1967年再版了五卷本；1969年该出版社又出版了其补遗卷，作为第六卷，包括沙畹去世后留下的两三篇译文，一个改编过的总目录和一个自1905年以来出版《史记》译文版本的版本目录。

《司马迁的传体史》全书由导论、注释和附录组成。该书显然不只是翻译的成果，同时也是研究的结晶，尤其是作者在注释中进行了大量发挥，广泛地涉及古代中国的几乎所有问题，并都提出自己尖锐的批判。实际上该书是西方学者第一次用西方考据和历史批判方法对《史记》进行翻译和研究，所以为历来评论家所重视并得到极高的评价。莫东寅认为这部"史记法译为汉学界盖世名著"②；马伯乐认为是"自理雅各《中国经典》以来欧洲汉学界最重大的著作"。③ 令人遗憾的是，沙畹因研究范围过于广泛，无法把全部精力投入对《史记》的译注和研究，致使这部巨作没有最后完成。

① 桑兵：《20世纪国际汉学的趋势与偏向》。

② 莫东寅：《汉学发达史》，第96页。

③ 《埃玛纽埃尔－爱德华·沙畹》。

沙畹在研究古代历史的过程中,效仿研究地中海文明学者的方法,将考古学和碑铭学结合起来,他的史学研究同时包括着对中国古代石雕的考察和研究。而且他在汉学研究中的许多领域多少与碑文研究有些关联。沙畹碑铭学研究"开了""欧洲研究中国古代艺术"之"先河",[①]他解译了许多铭刻和写本,留下了令人惊叹的成果。

他的第一本碑铭学著作是《中国两汉时代的石刻》(*La sculpture sur pierre en Chine au temps des deux dynasties Han*,1898),由巴黎爱尔内斯特·勒鲁(Ernest Leroux)出版社出版,是沙畹第一次逗留中国期间搜集的一系列出自山东武氏祠和孝堂山石室的碑文资料所编成。他通过饰有图像的纪念碑和文学作品的相互比照加以阐释,并编有目录。关于两汉时期的石刻,英国汉学家布全勒(Bushell)曾于1881年为大英博物馆搜集了一批武氏墓的画像石及碑刻拓本,宋代金石家也早已有所记录。欧阳修(1007—1072)的《集古录》是第一部中国金石学的专著,其中就有记述。但是,直到沙畹之前,西方的汉学家很少研究中国碑文,他们更感兴趣的是石刻艺术与画像,而不是碑文。1891年,当沙畹在泰安买到武氏墓刻石拓片后,便立即对之做了翻译并研究。他还翻译了中国学者的考证,特别是黄易在乾隆五十一年(1786)以后的新发现。沙畹在书中发表了66件石刻,除武梁祠外,还有孝堂山与刘村的。之后,沙畹的兴趣又转向记载秦始皇出游巡视的秦代刻石。当时原刻只剩下《泰山刻石》、《瑯琊刻石》两种残石,《峄山刻石》只有宋人的摹刻。沙畹把记录于《史记》中的八种秦代刻石都译注出来,后来收在他翻译的司马迁《史记》第二章的附录中(1897年出版)。

他的第二部碑铭学著作是《华北考古考察图谱》(*Mission archéologique en Chine septentrionale*,1909—1915)。沙畹在完成了《两汉时期的石刻》后,接着对北京附近一处元代修建的居庸关云台墙上的汉、藏、梵、西夏、八思巴和维吾尔六种文字刻写的《佛顶放无垢光明入普门观察一切如来心陀罗尼经》(10世纪末由施护译出)和除梵文外的其他五种文字的《造塔功德记》发生了兴趣。随后是印度的菩提伽耶地区的铭刻。1897年时,他撰述了关于蒙古鄂尔浑地区(Orkhon)古碑的文章,再次表现了他的执著精神,1900年最终完成了关于王玄策出使印度的论文。这一年,他还注意到立于云南大理的《南诏德化碑》有关南诏国历史的长文,后又写了《龙门志》的论文,译出明代

① 蒋向艳:《法国汉学家沙畹》。

都穆《河朔访古记》中有关部分和关于龙门1865年刻的一件碑文。这些工作,都为他1909年起着手撰写的《华北考古记》作了准备。

1907年沙畹第二次来到中国,对中国北方——河北、山东、河南、陕西、山西诸省,尤其是在龙门和云岗石窟地区进行考察,在考古和碑铭方面取得了重大收获,从而使他成为"第一个系统考察这些石窟的人"①。这次考察所收集的大量资料(回国时带回了丰富的文物、碑铭,还有两大箱壁画),为两卷本著作《华北考古考察图谱》做了充分准备。自1909年起,他着手编写《华北考古记》。最后写成为文字两卷和相应的照片图版两册,计488幅。第一卷着重汉画像石,第二卷主要是佛教雕刻。武梁祠画像,嵩山三阙,孝堂山,巩县石窟,刘家村、焦城村的石雕,龙门、云冈石窟等著名的石刻皆包括其中。沙畹还将有关的碑文与题记尽量翻译出来,使该书成了一部集大成的著作,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尽管当时已有很多西方学者写出介绍中国古代艺术的书籍。

在这些考察和研究中,他坚持科学的态度,常常对石碑的真伪提出自己的看法。他在一篇短文当中,根据一件纪年为524年的佛教造像的赝品,提醒人们注意中国石刻中存在的作伪现象。又如,对于《九姓回鹘可汗碑》,沙畹就与薛力赫(施古德)发生了分歧。前者对碑铭的阙文加以推测,认为讲的是关于景教的事。沙畹指出,碑文所言慕阇弟子可能是摩尼教徒或者景教徒,这从佛典中可找到许多佐证。正是这个见解启发了德韦理亚进而论证了《九姓回鹘可汗碑》所记载的不是穆斯林而是摩尼教传入回鹘的历史。沙畹和德韦理亚两人研究往往交叉并相互补充。1898至1900年,沙勒埃德·邦尼(Charles-Eudes Bonin)出使东方将一批拓片带了回来,其中包括敦煌、库车、河西其他地区以及中亚国家的碑刻。沙畹为此作了大量的翻译和考证,深化了他的西域研究。这些碑刻,前人有的已有了解,有的仅仅是简单著录,而沙氏对其中10种碑文翻译、考证颇详,这是与他对中亚史地有着渊博知识分不开的。如东汉刘平国摩崖刻石,在新疆库车地区,永寿四年(158年)刻,它反映出2世纪中叶汉军征战的足迹。又如两种大云寺的碑刻,一为明代,一为清代。从碑文可以了解大云寺的历史,还可以证明盂兰盆(avalambana)这一组织机构在维持寺庙活动上的作用。他又认真地研究敦煌莫高窟的四种碑刻,最后一个在清代徐松(1781—

① 《埃玛纽埃尔-爱德华·沙畹》。

1848)的《西域水道记》中曾经提到过这些碑刻,但不曾发表过碑文。

作为沙畹碑铭学的终结,是他对于投龙简的研究。1919年,他出版了《投龙,关于东亚的回忆》(*Le jet des dragons, Ménoires concernant l' Asie orientale*)共三卷,于巴黎问世。投龙简是道教的礼仪,在玉石或金属简上写刻祈愿文,放入山洞或泉口,希望龙能将它们带往天上。在该书中,沙畹整理和翻译了在泰山、汲水、大房山、华山、嵩山等地发现的8至10世纪的简文,有银、铜、玉等不同质地的。

沙畹的碑铭文研究在西方产生巨大影响,而后,艺术考古和艺术历史包括雕刻、瓷器、漆器等各方面受到了广泛的注意和研究。比如马伯乐对残存于杭州附近和浙江北部宋、元时代古迹进行的研究,布亚尔(Bouiuard)对明帝王陵,彼贝特鲁奇(R · Petrucci)对中国绘画,古兰(Courant)对中国音乐的研究,谢阁兰(Victor Segalen)完成了《宏伟的中国石雕》和《汉代的墓葬艺术》,戴何都(Robert des Rotours)购得一套开封的拓本和对唐碑的论述,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购得几十种碑帖等。

沙畹的历史研究还包括对中国历史地图和省份问题的探讨,如10世纪浙江吴越国的历史和云南丽江的历史,翻译《魏略西戎传笺注》(1905)和《后汉初年之后的西域》(1907)等。1913年他发表了关于苏州文庙石碑的研究文章,探讨了这组刻石上的一幅中国地图、一张历史年表、一幅地方行政区图和苏州城图。这些很特别的内容是南宋宁宗赵扩小时读书用的教材。中国历史地图学方面,如他在《远东法国研究院学报》上发表的《中国地图学中两幅最古老的地图》的论文,讨论了《华夷图》和《禹迹图》的内容,并概略地描述了中国古代地图学的发展。这是近百年来第一篇较有深度的专门讨论中国地图学史的文章,是欧美学者讨论中国地图学史的滥觞。[①] 沙畹还几经周折,通过教父加百列 · 莫黑斯(Gabriel Maurice)弄到了一套较为完整的西安碑林拓本,于是专门研究了其中的《禹迹图》和《华夷图》这两幅刻于1137年的地图。同时他顺便探讨了中国的地图历史,推测最早的地图可能在木简上面,还指出分格绘制地图的原理及方法的功绩,应归于裴秀(224—272),而不是通常所说的贾耽(730—805)。

在宗教历史研究方面,沙畹最大的贡献就是对佛教的大量研究。他继承了雷慕沙和儒莲的传统,翻译了中国朝圣者义净第三次去印度的旅行见

① 蒋向艳:《法国汉学家沙畹》。

闻《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1894),然后又在《通报》上发表了描述几位朝圣者的传记和一些印度来华传教士的传记。他还与烈维合作,撰写了关于佛教思想的文章《十方阿罗汉法难记》,尝试对一系列信仰的起源和演变作出界定。此外,还搜集、翻译出版了大量的佛教故事,此书在1910至1911年间分三卷印出。他的这一研究为其弟子伯希和的汉传佛教研究奠定了基础。1914年,沙畹还研究了六种题记。

除了佛教外,他还关心中国的道教、中国民间宗教信仰等,涉及到中国多个教派问题。他将有关中国宗教社会学的第一部论著格罗特的《厦门的年庆节》译成法文。① 关于道教,沙畹也是西方汉学家道教研究的先驱,他与伯希和都是法国汉学家中最早对道教感兴趣的人。沙畹在对中国北方进行考察时曾登上泰山,并发表了《泰山:中国祭礼专论》(1910),该书后附有一篇《古代中国的社神》的补编,第一次指出了道教科仪的重要性,"另辟中国古代宗教研究的一条新途径"。② 有评论认为,沙畹对于近代历史科学中一切新的方法全能运用,对于史学的一切辅助科学又全是内行,并主张以整个中国文化与整个活动的中国社会为研究对象,其附于《泰山志》(*Le T'ai - Chan*)一书的论文《中国古代的社神》,实为西洋中国学界空前的杰作,他的重要性就在于"启发后之学者,走上以社会学法研究汉学之途径"。③

1911年,沙畹与伯希和把一部分《道藏》弄到了巴黎,研究并利用了这些材料。他去世的那一年(1918),正准备发表他从《道藏》中选出的第一篇译文。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都在对这种仪式进行研究。像他的佛教研究一样,他也通过研究碑文来研究道教。他曾研究过贵州永宁的道教碑铭《红岩碑》,指出那是伪刻,他研究过吕洞宾写的符箓,称"吕祖真迹",原碑在河南汝宁府,此碑是在云南的摹本。他译注了一批元朝的汉文碑,内容涉及皇帝敕令、官府文书,反映了蒙古军队占领南方、对寺院免租、封禁道教书籍等情况,关于成吉思汗时的道教著名人物丘处机,他也发表过文章。他又从山西、河南、山东,特别是登封中岳庙和曲阜搜集有关儒、道两教的很多碑拓,撰写了有关探讨孔子、晏子和孟子尊号变化的文章。沙畹还曾

① 《埃玛纽埃尔 - 爱德华·沙畹》。

② Paul Demiéville, *Aperçu historique des études sinologiques en France*. III.

③ 桑兵:《20世纪国际汉学的趋势与偏向》。

研究过摩尼教,与伯希和合著有《摩尼教流行中国考》(1911—1913),这部著作疏释了京师图书馆所藏的摩尼教残经,并对摩尼教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作了一个大致的勾勒。

沙畹对中国的边疆地区和少数民族也有浓厚的兴趣。他的《西突厥史料》(1903)和《中国之旅行家》就是两本关于中国边疆地区和少数民族的作品。

《西突厥史料》[①]是沙畹"重要撰述之一种"。[②] 全书除导言外,共有四篇:第一篇绪说,第二篇西突厥列传,第三篇关于西突厥之其他史料,第四篇西突厥史略,此外还有附录:西突厥史料补、西突厥史料正补编索引、西突厥时期中亚地图。

1932年冯承钧先生把此书翻译成中文,1958年中华书局再版,陆峻岭在再版的前言一段话中对西突厥的历史变迁及作品的价值和不足之处,做了交代:

6世纪中叶至8世纪中叶前后约近二百来年,古代突厥人在漠北和中亚草原地带有着长期的活动历史。突厥部落兴于阿尔泰山,6世纪中叶摆脱了柔然的统治开始强大起来,其后征服邻近各部及西域诸国,建立了疆域辽阔的突厥汗国。这个汗国是一个多部落多部族的军事行政联合,没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文化,更没有统一的经济基础。6世纪末,由于内部矛盾尖锐化的结果,终于分裂为两国:东突厥和西突厥。东突厥在公元630年被唐朝破灭,变成了唐朝的附庸。……西突厥初由室点密可汗统治,称西面可汗。室点密死后,子达头可汗继立,这时突厥汗国已经形成东西分离,各自独立的局面。达头可汗曾乘东突厥内乱的机会,占领了漠北,企图恢复统一的突厥汗国。601年率兵南下,被隋击败。后因国内铁勒等十余部落的叛乱,达头西奔青海的吐谷浑,不知所终。自是西突厥呈现分裂状态,直到匮射可汗才将各部统一。611—628年间是西突厥国势强盛时期,为了便于管理被统治的国家,更在……千泉建立了夏都,628年玄奘行其地而赴印度之时,西突厥的境界实已达信度河了。……西突厥是一个多部落的国家,国内统治阶级内部和对立阶级之间的矛盾极为复杂,经常进行着剧烈的斗争。国家的统一,主要是建立在武力征服的基础上,所以英勇的统叶护可汗死后,西突厥汗国很快地就发生了咄陆五部与弩失毕五部的

① [法]沙畹著,冯承钧译:《西突厥史料》,中华书局,1958年12月版重版。

② [法]沙畹著,冯承钧译:《西突厥史料》,1958年版,陆峻岭《序》。

东西割据。他们常各自立可汗，争夺统治地位，以致不相统一。……内部矛盾的尖锐化促使西突厥国势削弱，遂为唐朝所乘。652年唐高宗联合回纥骑兵进军西突厥，659年斩真叶护于双河。由是西突厥全境皆属中国，唐朝于其地设置羁縻府州。……当西突厥汗国强盛时，除了与我国唐朝接触以外，和西域、中亚、东罗马、波斯以及印度各国家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它的周围那些在社会发展阶段上较先进的国家，特别是它所统治的西域、中亚，在农业、手工业、商业远比它发达的国家，对于它的社会发展起了推进的作用。同时，由于西突厥地处中国、东罗马、波斯、印度四大文明国家之间，控制着中世纪东西交通的孔道，对于当时东西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也有过重要的贡献。因此，西突厥汗国历史的研究，对于了解中世纪东方史和我国唐代的历史是有所帮助的。……由于西突厥汗国活动范围的广阔，我国古代载籍中保存着有关它和当时的中亚古国的极其丰富的文献记录。这是研究古代突厥史的非常宝贵的资料。此外，西方人中世纪的著述中对于西突厥也有不少的记载，可以作为与我国文献相互参证的重要参考资料。法国人沙畹在1903年出版的《西突厥史料》就是以我国史料为根据并参引西方人的记载，编撰而成的一部较为完整的史料汇编……尽管沙畹采用的中国史料有不少错误和遗漏的地方，但……对于中外学者参考利用还有不小的帮助。已故的冯承钧先生曾于1932年曾将此书译为汉文，并将原书的错误和遗漏的地方加以考订和补正，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二十余年后，中华书局为满足国内的需要，决定加以校订，增附沙畹原书地图一幅，重印发行。

此外，他还出版有《土地神》(*Le Dieu du sol en Chine*)，该书于1903年出版，然后经修改润色于1910年再版，《3至8世纪的中国神话》(1921)和《中国民间艺术的愿望的表达》(1922)等。

由于沙畹在汉学上的重大贡献及其个人魅力，被公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上最有成就的中国学大师，戴密微认为：沙畹是“整个西方世界承认的汉学大师”①；伯希和说：“沙畹之在中国学中，确为全欧巨擘。亦唯有沙畹始能认识中国文化之伟大的价值。”“中国之文化，不仅与其他古代文化并驾媲美，且能支持发扬，维数千年而不坠，盖同时为一古代文化、中世文化而兼近现代之文化也。研究中国古代之文化，而能实地接触当今代

① Paul Demiéville, *Aperçu historique des études sinologiques en France*. III.

表中国之人,此种幸运,绝非倾慕埃及或希腊者所可希冀。知有此幸运而能亲来享受者,以沙畹为第一人。昔余之来中国,亦无非师效沙畹之榜样耳。"①1999 年 10 月法国驻华大使毛磊(Pierre Morel)先生在南京大学举行的"20 世纪法国作家与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中也这样指出:"在法兰西学院沙畹教授的带领下,我们看到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法国汉学家群落出现了。他是将科学的方法引入中国研究的第一人,科学的人文方法,和勒内(Renan,1823—1892)在同时期用来研究《圣·经》的方法是一样的。"②

二、考狄和他的汉学研究

亨利·考狄(Henri Cordier,1849—1925,也译科尔迪埃),一位"书本知识渊博的奇才"。③ 祖籍法国东南部萨瓦(Savaoie)省。父亲欧仁·考狄曾在美国做过商品代理人,婚后居住在美国,1849 年 8 月 8 日,亨利在新奥尔良出生。1855 年随父移居巴黎,先后在夏普塔尔中学(1857)、马森私立学校(1865)和夏尔尼中学就读。期间,父亲奉命在上海建立法兰西银行海外分行,并于 1859 年来到中国,但此时的亨利并没有机会去中国而是去了英国。1869 年,亨利获得机会,于 2 月 18 日从马赛起程,途经两次转乘,于 4 月 7 日到达上海。先在一家叫鲁塞尔和西(Russel and C°)的美国大公司做事,很快就获得了重要职务。

在华期间,考狄和严肃的研究者过往甚密,如美国的传教士汉学家卫三畏(S. Wells Williams)、沙俄驻中国使馆医生贝勒士奈德(Bretschneider)④,法国天主教传教士阿尔芒·戴维(Armand David)⑤,传教士汉学家费赖之,尤其是沙俄传教士和汉学家巴拉弟(Archimandrite Palladius)和英国伦敦布道会传教士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⑥。

① 这是 1933 年中研院的宴会上,因傅斯年对伯希和推崇备至,伯希和在答词中作了这样的回答,特意突出沙畹的地位与影响。转引自桑兵:《汉学家伯希和与近代中国学术》,《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

② [法]毛磊(Pierre Morel)著,黄荭译:《在双方的对话中认识自己》,选自《中法文化之旅》,BBS 水木清华站 smth. edu. cn·《跨文化对话》第四辑。

③ Paul Demiéville, *Aperçu historique des études sinologiques en France*, III.

④ 贝勒士奈德(Bretscheider,1833—1901),著有《中国植物志》(1881)。

⑤ 阿尔芒·戴维(Armand David,1826—1900),西方第一个认识熊猫的人。

⑥ 巴拉弟(Archimandrite Palladius,1817—1878),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7)。

从青少年起，亨利就对书目研究抱有浓厚兴趣。1870 年 11 月 10 日，他在一封信（也是他出版的第一段文字）中写了这样一句话："献给爱书狂们"。1871 年，也就是他到中国后的两年，成了"皇家亚洲协会"中国北方分部的名誉图书管理员。1872 年，他着手的第一项科研工作就是给这个图书馆编一个有条理的书目。正因为他的才智，我们才有可能看到如此详细的用西欧语言写成的有关远东研究的书目。

考狄在上海一直工作到 1876 年 3 月 31 日。此后，他离开中国回法休假，并接受法国一家"中国建筑代表团"的秘书工作。本以为这一工作有利于他再次来到中国，可是，世间有太多难以预料的事，虽然他对中国的兴趣和研究的热情整整占据了他人生道路中的 50 多个年头，且取得成果巨大，也尽管这一工作使他有机会游历欧洲、南北美洲，甚至非洲，却一直没有机会再次回到中国。

尽管如此，考狄的中国研究在继续。1877 年 3 月 19 日，他给《批评杂志》写了第一篇文章，对哲学家、历史学家路易（Louis de Backer）的《中世纪的远东》提出尖锐的批评，通过对这本书的阐释，他涉及到自己所喜爱的另一个研究课题：历史地理。1877 年 3 月 26 日，他回到马赛，立即恢复上一年和知识界的联系。很快地，他与东方语言学校的负责人查理·舍费（Charles Schefer）取得联系。从 1881 年起，考狄在东方语言学校教授"远东历史地理和法律"的课程。此时，他的著名的《中国书目》（*Bibliothenica Sinica*，1881—1885）也开始问世。1882 年，他开始与舍费合作编写《用于地理、历史学的游记和文献汇编（从 8 世纪到 16 世纪末）》（该书至 1923 年，已出版至 24 卷）。此外，他还开始在《批评杂志》、《争鸣报》、《宗教历史杂志》、《历史杂志》上发表一系列文章。但是对他而言，没有一个杂志能适合发表他广博研究的成果以及那些关于远东历史资料的分析。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开始创办《远东杂志》，并于 1882 年出版第一卷，但到 1887 年才出了三卷，原因是期刊的编定过程中无法印刷汉字。

1883 年，考狄出版了《18 世纪中国人视野中的法国》第 1 卷。[①] 同年，他的《17、18 世纪西人在华所刻中文书目录》一书问世。从 1886 年开始直到 1893 年，他一方面为《大百科全书》的前 17 卷撰写大量关于远东的文字，同时还完成了拉维斯（Lavisse）和郎波（Rambaud）《通史》中关于远东

① 没有出版第 2 卷。

的章节。1886 年以后的数年内,他除了在东方语言学校任教之外,又在政治学自由学院(L' Ecole libre des sciences politiques)担任教授,而于 1888 年被正式任命为东方语言学校"远东历史、地理和法律"这门课程的负责人。在此期间,他关于历史地理的研究范围已扩展到整个远东地区。

在创办《远东杂志》不久,他得到荷兰莱顿大学汉学家薛力赫(Custave Schlegel,1840—1930,又名施古德)的大力支持,共同合作办了《通报》杂志,并由莱顿里尔(E. J. Brill)出版社负责印刷。第一期在 1890 问世。

1892 年,考狄被任命为国民教育部历史与科学著作委员会成员之一。之后,他为该委员会的《历史地理和描写地理公报》编纂了数篇论文。1895 年出版《法王查理五世加泰罗尼地图集中的远东》,1896 出版了《法国在远东两个租借地的起源:上海、宁波》。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01 到 1902 间出版的三卷本《1860 到 1902 年间的中国和西欧强国的关系史》(*L' Histoire des relations de la Chine avec les puissance occidentttales*),其资料之丰富,是"那些想了解鸦片战争和 1911 年革命期间的中国人""必不可少的工具"。① 1891 年,他出版关于意大利商人和旅行家奥多利克的作品:《真福者奥多利克 14 世纪在亚洲的旅行》;同时,还在《通报》上发表关于让·曼德维尔(Jean de Mandeville)的书目。②

英国裕尔(henry Yule)是一位博学而又值得尊敬的著名汉学家,在亨利从中国返回时就经人引见并认识了这位汉学家。裕尔生前出版有《东城记程录丛》(*Cathay and the way thiher*)和《马可·波罗之书》(*The Book of Ser Marco Polo*,又译《马可·波罗行纪注释》(1871)。去世后,出版社决定再次印刷该著作时,希望进行一次修订,并增加一些具体的批注。于是这一任务就落到了考狄的身上。新版本于 1903 年出版,1920 年又增加了一卷《注释和附录》。考狄在注释中涉及到 1920 年为止的有关威尼斯旅行者的所有书面作品。1905 年,他出版了《1857—1858 年内在中国的探险》和《1860 年在中国的探险》。

1908 年,考狄被选入法兰西研究院,开始为《金石与美文学院公报》、

① [法]伯希和:《纪念亨利·科尔迪埃》,载亨利·科尔迪埃著,唐玉清译,钱林森校:《18 世纪法国视野里的中国》,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年,第 167 页。

② 他的《奇迹之书》是一部融合梦想和现实而集大成的书。曼德维尔故意让人以为他是英国人,其实他可能是一位法国的医生。他在 1350 年左右出版此书,是用游记里的段落汇编而成。这本书的影响"远远超过《马可·波罗行纪》",保留至今的手抄本还有 250 种之多。

《博学者报》撰写文章。这些论文大部分重新收录在1923年间的美松内弗(Maisonneuve)出版的四卷本《东方历史地理合集》,其中也包括一些发表在《通报》上的作品。1910年他出版了与1883年出版的《18世纪中国人视野中的法国》相对应的作品:《18世纪法国人视野中的中国》。1912年,他的《日本研究书目》出版,1912—1915年,他又出版了另一部书目研究《印度研究书目》。

由于《马可·波罗行纪注释》一书的成功,出版社又邀请考狄重新编定裕尔的《东城记程录丛》,并于1913—1916年间成功地以4卷本的形式取代了原来的两卷本。评论者认为,比起《马可·波罗之书》来,裕尔的《东城记程录丛》"更具有开创性",[①]而考狄的修订工作也"很成功"。[②]该书在第二版的时候,还配备了一个比《马可·波罗之书》更好的索引。

1920年到1921间,考狄在格特(Geuther)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和外国关系通史(古代至满族王朝的衰败》(*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Chine et de ses relations avec les pays étranger depuis les temps les plus anciens jusqu' a la chute de la dynastie mandchoue*)。伯希和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还没有类似的书",但他也指出,这"并不代表书中所有的论述都是可靠的","中国和外国的关系部分是很不错的",对于这方面的研究,亨利"依据的都是第一手的资料"……然而,对于中国通史的研究,"就不是这么回事了","这是一项繁重的工作,也是我们的研究几乎还未开垦的广袤的领地"……亨利曾经在中国生活过,但是"他并未能直接阅读中文文本。他叙述时所用的材料基本上还是源自冯秉正(P. de Mailla)的《中国通史》(1777—1785)"。[③]

对于古代亚洲的欧洲旅游者的研究,占据了考狄的大部分时间,就在他临终前,考狄刚刚交付了对朱丹·卡塔拉(Jourdain Catala)所著的《东方奇观》的加注翻译的清样。

作为一个博学的学者,他的研究主要对象是关于远东研究书目以及对

① [法]伯希和:《纪念亨利·科尔迪埃》,载亨利·科尔迪埃:《18世纪法国视野里的中国》,第163页。

② [法]伯希和:《纪念亨利·科尔迪埃》,载亨利·科尔迪埃:《18世纪法国视野里的中国》,第163页。

③ [法]伯希和:《纪念亨利·科尔迪埃》,载亨利·科尔迪埃:《18世纪法国视野里的中国》,第167页。

中世纪旅行者的研究。但除此之外,考狄还做了许多其他领域的研究,出版了其他的书。如对美洲的研究,对法国文学的研究,都发表过许多相关的书目著作。

考狄所获得的荣誉也不胜枚举:法兰西研究院成员(1908),法国书目学会主席(1908),第五届博学家学会大会主席(1914),亚洲协会副主席(1918),国民教育委员会历史地理与描述地理部主席(1918),东方语言学校校长助理(1919),民俗传统协会主席(1918),国家地理委员会副主席(1920),英国皇家亚洲协会荣誉成员,1921 年以来又成为大不列颠研究院(La British Academy)通讯成员、荣誉兵团官员(1921)、地理协会主席(1924)。

考狄以研究中国史地和语言见长,他知识渊博,能兼收并蓄,集各家之长,加以条理发挥,自成一体。他在中西关系史及文献目录学方面都做出巨大贡献。他的《中国书目》、《17、18 世纪西人在华所刻中文书目录》、《日本学书目》和《安南学书目》等,是研究东方学的重要参考书目,其中以《中国书目》最为著名,而他的《17、18 世纪西人在华所刻中文书目录》也引起学术界广泛的注意。

考狄的《中国书目》(或称《中国学图书志》或《西人论中国书目》*Bibliothenica sinica*)于 1904—1908 年在巴黎出版,并于 1922—1924 年又出了补遗,五卷本,将最初时期到 1924 年的国外中国学著作全数收入。该巨著获 1880 年法兰西铭文与美文学院斯坦尼斯拉斯·儒莲奖,至今仍是欧美研究中国问题学者的必读书。在前言中作者谈到该书的体例特点时说,书目的分类共有三种不同的方式,一是按照作者姓氏的字母编排,二是编年方式,三是按题材分类。考狄的《书目》基本上以题材分类,但作者取各家之长,试图将这三种方式综合利用,加以编排,为查阅者提供方便。全书共分为五大部分,收入第一部分的是直接有关中国本土的作品,其中包括从总体上论述帝国的,有关中国地理、自然、社会发展史、宗教、科学、艺术、语言、文学、风俗习惯等;第二部分是西方人认识和了解中国的作品,如了解和报道过中国的罗马、阿拉伯等历史学家,从中世纪到作者那个时代到过中国的旅行家等的作品;第三部分是中国外交史方面的;第四部分是有关华人的作品;第五部分是关于中国与周边地区和国家关系的作品。① 虽然

① Henri Cordier, *Bibliotheica Sinica*, Preface de la première édition, Tome I Librairie Orientale &Américane, 1904.

考狄并不懂中文,他的《中国书目》有关东方的资料也"颇嫌不足",[①]但他率先进行了这方面的工作并取得突出成就,因此有幸被誉称为"西方中国学家中最伟大的先躯之一"。他的书目"分类得体,子目详细","久为世人所喜用",跟他的《日本学书目》和《安南学书目》一起,成为"治东方学必备之书"。[②] 而且在他之后,西方不时有人仿效他的方式,或编写国外汉学研究书目,或对他的作品进行补充,为研究者提供方便。如袁同礼(Tun - li Yuan)就于1958年把1921—1957年出版的书目补充进去(New Haven),约翰·吕斯特(John Lust)又把1920—1955年间发表的有关中国的文章目录加了进去(1964年剑桥大学版)。[③] 但《中国书目》也有不足之处,它仅收西文著作,而不收中文书目,在这一方面,他的《17、18世纪西人在华所刻中文书目录》正可补前者之不足,使成完璧。[④]

《17、18世纪西人在华所刻中文书目录》一书,初刻于1883年,收入《东方杂纂》。初版时并不完备,只收录51位作者的196种著述,后经增补,于1901年再版,著译者增至77人,收录著作增至395种(其中除去五六种西文书外,皆为中文著述),篇幅增加几近一倍。初版本主要以13种欧洲图书馆目录为依据编成,再版时作者利用了两种北京印制的中文目录:《天主圣教书目》和《历法格物穷理书目》。

此书全名为《中国的中欧印刷术——17、18世纪西人在华所刻中文书目录》(*L' Imprimerie sino - europeenne en Chine, Bibliographie des ouvrages publiés en Chine par les europeens au XVIIe et au XVIIIe siecle*),1901年,巴黎法国"国家印刷局"(Imprimerie nationale)出版。冯承钧先生将书名译为《中国的中-欧印刷术》,取书名前半,但容易使人误解为这是一本讲印刷术的书。该书再版后两年,伯希和于1903年的《远东法兰西学院学报》上发表书评,对全书做了一百余条校正,颇具参考价值。

正如李华川在《考狄〈17、18世纪西人在华所刻中文书目录〉跋》中所言,借助该书所收录的近四百种著作,研究者对明末清初及清中期西方传教士试图在中国知识界传播西学有一个宏观印象。他认为,两百年间,西

① Paul Demiéville, *Aperçu historique des études sinologiques en France*, III.

② 莫东寅:《汉学发达史》,第100页。

③ 见 Paul Demiéville, *Aperçu historique des études sinologiques en France*, III.

④ 参阅《中华文史网》李华川的《考狄〈17、18世纪西人在华所刻中文书目录〉跋》。

人在中国出版的中文著作达四百种,该书目所收390多种,其中宗教类275种,占总数百分之七十,非宗教类115种,占百分之三十。这说明,传教士最看重的"还是传教",而"天文、历算等科学技艺不过是传教之余事罢了"。[①] 通过该书,研究者还可以看到:"纵观这两百年间,除了明末少数士大夫,中国知识界对于基督教教义很少给予积极的回应,相反,传教士带来的西方天文、数学、地理、机械、绘画等却引起士大夫相当大的兴趣,《几何原本》、《职方外纪》、《坤舆全图》对士大夫思维方式的影响要远胜于《天主实义》、《万物真原》等教理书。毕竟,基督教精神与儒家传统分歧明显,要想使国人接受前者,并非朝夕之间可以实现;而技术层面的东西,由于不直接触动传统思想的内核,就更容易为士大夫所接受。"[②]同时,李华川将考狄该书目与晚出的徐宗泽的《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和费赖之的《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进行比较,认为,虽然《17、18世纪西人在华所刻中文书目录》比之《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在规模上略为逊色",但它"有其不可替代之处"。其理由主要有:其一,徐著所收书目全部取自上海徐汇藏书楼,而考狄《17、18世纪西人在华所刻中文书目录》主要依据的材料是欧洲的公、私书目,正可与徐书互补;其二,与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一样,徐书也只收耶稣会士的著译,而考狄该书目,除了收耶稣会士著作外,还兼收了方济各会、奥斯都会及多名我会会士的中文著作。所以,就此而言,该目录更能代表"西方来华传教士的全貌"。研究者在研究明清间西学对中国士大夫的影响问题时,可以同时参考这两种目录,而且是很有必要的。[③]

三、伯希和和他的汉学研究[④]

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法国20世纪上半期最有权威的汉学家之一。生于巴黎,早年就读巴黎斯坦尼斯学院,主修英语,毕业后入法

① 参阅《中华文史网》李华川的《考狄〈17、18世纪西人在华所刻中文书目录〉跋》。

② 参阅《中华文史网》李华川的《考狄〈17、18世纪西人在华所刻中文书目录〉跋》。

③ 参阅《中华文史网》李华川的《考狄〈17、18世纪西人在华所刻中文书目录〉跋》。

④ 本节主要参阅如下有关资料,无特殊情况,不一一指出:[法]路易·勒内、路易·瓦杨,让·菲利奥札著,耿昇译的《法国汉学泰斗伯希和》(《汉学研究》第六集,阎纯德主编,中华书局,2002年),桑兵的《伯希和与近代中国学术界》(《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中国文学网:汉学园地,WWW. Literature. org. cn/asp? ID = 14367,原载《国学与汉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荣新江的《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第二章(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等。

兰西学院师从沙畹和印度学家烈维等习汉语和中国文学。1900年初被派往河内法国远东学院作资助生,同年2月,被派遣往北京为学院图书馆收集中文书。在京期间,不光彩地参与了使馆区镇压义和团起义的行动。1901年返回河内,成为远东学院汉学教授,是年22岁。此后五年,潜心汉籍目录版本的检索和南海史地研究,所著论文陆续发表于远东学报,因成绩卓著,为汉学界所注意。1901年,他有机会第二次到中国考察,并为远东学院带回大批汉、蒙、藏文书籍和艺术品;1902年,第三次来华考察,收罗了大批中文书籍和雕刻艺术品;1903年,他将元周达观著的《真腊风土记》翻译成法文并加注释,在巴黎出版;1904年离越南回国,同年在巴黎发表《交广印度两道考》。

1905年,英人斯坦因(Sir Aurel Stein)中亚考古新发现消息传入欧洲,伯希和受法国金石铭文与文艺学院和法国中亚考察委员会委派,负责组成探险队,进行中亚考察。① 1906年6月15日,探险队从巴黎出发前往中亚。1908年2月到5月到达敦煌,获得约二千余卷文物。同年,在《法兰西远东学院学报》发表《敦煌藏经洞访问记》、《中国艺术和考古新视野》等。1909年10月24日探险队回到巴黎。1911年,他被法兰西学院任命为中亚语文、历史和考古教授,并开设"中亚西亚历史、地理考古学"讲座,从此奠定他的汉学学术地位。此后,他发表《敦煌千佛洞》等多篇论文,在汉学界引起极大反响。1911年—1913年间,和沙畹合著《摩尼教流行中国考》。

一战期间,伯希和参加了战役。1916年奉命至北京法国使馆任陆军武官次官。1921年5月被选为法国金石铭文与文艺学院院士。1922年,

---

① 伯希和受法国金石铭文与文艺学院和法国中亚考察委员会委派,负责组成探险队,进行中亚考察。同行者有军医路易·瓦扬(Louis Vaillant)和摄影师夏尔·努埃特(Charles Nouette)。1906年6月15日,探险队从巴黎出发前往中亚。先乘火车经莫斯科和塔什干,在俄罗斯总领事馆逗留一阵,8月末到达新疆喀什。中国官员对伯希和流畅的中文感到吃惊,并为探险队提供各种方便。离开喀什,第一站到达了图木舒克村,然后前往库车。1907年探险队在库车发现久已失传的婆罗米文文件(该语言后被烈维译解为乙种吐火罗语)。同年9月,探险队到达乌鲁木齐,再到焉耆,10月抵达敦煌。在此,伯希和获得澜国公赠送的沙州千佛洞写本一卷。1908年2月到5月,探险队到达敦煌。为了查阅这里出土的法华经古抄本,伯希和与保护莫高窟的王道人谈判进入藏经洞事项。在谈判中,他的流畅中文又一次发挥作用。经3周藏经洞调查,选出最有价值的文件约二千余卷。经商谈,王道人最后同意以500两银子(约90英镑)把这些文物卖给伯希和。将文物带回河内后,便从事初步整理并作考古报告。9月,伯希和由河内再次来京,将随身带去的一些敦煌珍本秘籍,出示给罗振玉等中国学者观看,文献的重要价值得到了认可。(参阅荣新江:《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第二章)。

为罗马教皇图书馆编写汉文书目,并出席美国波士顿美、英、法三国亚西亚联合会。1923 年,被任命为《通报》主编。此后在《通报》上发表《纪念王国维》(1927)、《15 世纪初年中国人的伟大航海上旅行》(1933)、《吐火罗语与库车语》(1934)等文章。1935 年 12 月,出任法国亚细亚学会主席。同年,再次游历中国,并经日本。1939 年,被聘为中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1945 年因癌症在巴黎逝世。

伯希和的主要贡献是在敦煌学,也可以说敦煌学是他的整个汉学研究的宝库和核心。1905 年,法国金石和美文学科学院与法属亚州委员会,委派他赴中亚进行一次考察,在这次考察中,他对喀什三仙洞(Outchmahravan)佛教石窟,图木舒克地区的脱古孜萨来佛寺遗址(Toqquuez - Sarai),库车范围内的克孜尔(Kizil),库木土拉(Koum - tourâ)石窟和苏巴什(Soubachi)的东西寺址等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了大量包括精美佛像在内的美术品,用婆罗谜字体书写的龟兹语文献和中古伊朗语文献,还有梵文佛典、吐火罗文 B(即鬼兹文)木简文书、佛典和文书残片等。1908 年他在敦煌千佛洞里,又发现了唐及五代的写本及雕刻本,拍摄了大量的壁画和塑像照片,抄录了洞窟中的汉文和其他语言文字所写的题记,并进入藏经洞,选取了佛教大藏经未收的佛教文献、带有年代的文书和文献、非汉语文献和斯泰因(Sir Aurel Stain)所遗绢纸绘画及丝织品等。此外,他还发现了莫高窟北区的第 181—182 窟积沙中的西夏文、回鹘文、藏文文献等。总共从敦煌带走了 2723 个古代手抄卷和 1000 个残卷。①

关于他的敦煌研究,虽然没有像斯坦因那样,把考古资料整理出详尽报告,但他当时所写的简要报告和后人整理出来的大量有关资料,对整个敦煌学的发展却起着重要作用,可以说,他是法国敦煌学的创始人。

诚然,伯希和的敦煌学的学术地位与水平也曾遭到挑战。早在 1910 年前后,法国学术界就有人怀疑伯希和所写的莫高窟敦煌卷子按语和评论是否属实。他们简直不明白,在荒野和远离图书馆的地方,他怎能详细回忆起某些论据;远东学院的同事们激烈地指责说,英人斯坦因已经拿走了敦煌所有文献,伯希和探险队是否浪费公款带回一些伪造文件?但是,最终,伯希和的敦煌学研究还是得到肯定。尤其是 1912 年斯坦因出版了《探险旅行记》,宣布还有大量文件被留在敦煌之后,人们对伯希和的疑惑才烟消云散。因斯坦

① 参阅荣新江《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第二章提供相关的内容。

因不懂中文,带走的文件有很多没有价值,而通晓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伯希和,所选文件全是绝品,其中包括新发现的唐代新罗僧人慧超所著的《往五天竺国传》。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虽然伯希和到达敦煌比斯泰因晚了一年,带走的资料在数量上也不如前者,但在质量上却胜一筹。

对于伯希和的敦煌文书之事是否属于劫掠,中国学者也颇多争议。敦煌史料被伯希和辑录而去,且被封闭在木匣中几十年,学者们不禁颇有感叹,且怀疑伯希和的行动也属劫掠。但学者们也意识到,中国学者与如此重大新发现起初的结缘,是由于伯氏;再说,学者们也认为,不能将伯希和与斯坦因、华尔纳等同等看待,作为一位汉学家,他确能以学者态度对待秘宝。学者和古董商不能混为一谈,[①]应将他与斯、华等人区别开来,且他的治学方式也颇受中国学者钦佩,绝非依赖垄断材料之辈。

在敦煌考察期间,伯希和曾在1908年的9月再次由河内来京,将随身带去的一些敦煌珍本秘籍出示给罗振玉等中国学者观看,文献的重要价值得到了认可。同时,也就在这段时间,他也曾将重要的发现用书信形式报告给塞纳。他的这些报告和书信,后来都编在《甘肃发现的中世纪书库》一文中,发表在《远东法兰西学院学报》第八卷上;回国后他也就此行做过两次讲演,一次题为《高地亚洲三年》,一次为《伯希和考察队中国突厥斯坦考察报告》。可以说,伯希和考察队在当时就向人们展示了研究成果。后来,这些搜集品的文献材料,基本上都入藏法国国立图书馆,美术品入藏巴黎罗浮宫,最后归吉美博物馆。国立图书馆所藏敦煌文献材料,全部用伯希和的名字 Pelliot 标号,简作 P.,中文简称"伯",各种文字资料又按语种大致作了分类的编号。收在吉美博物馆的美术品,大都在展室中公开展出,最早由阿甘(J. Hackin)编过一个简单的目录,名为《吉美博物馆指南目录》,1923年巴黎出版,二战后韩百诗组织一批学者把这些美术品进行系统分类,编成《伯希和考察队考古资料丛刊》,已出版了十几卷。[②]

伯希和的中国研究,除敦煌学外还涉及许多其他领域。1941—1945年《燕京学报》第30期刊登伯希和的生平简历时,编者案语中指出,伯氏的汉学成就已涉及到目录版本、语言文字、考古艺术、宗教文化、东西交通、边

① 桑兵:《汉学家伯希和与近代中国学术》,《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

② 荣新江:《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第二章。

疆史地等多种学科,且皆有"深刻之研究与精粹之论著"。[①]

伯希和一贯注意中国中原王朝与西部民族或文化关系的研究,他有相当部分的游记和人物纪行就是属于这一研究领域,如未完成稿《元朝秘史》、《马可·波罗游记》的注释、《郑和下西洋》等。他与穆尔(A·C·Moule)共同主持写成的有关马可·波罗游记的著作,就是一部庞大的译注本,他一直在准备的《蒙古秘史》也是一部巨著。尤其是对于后一部作品,为了达到完美无缺的程度,他仔细地筛选了所有已知的论据。有关的史料,不仅出自蒙文,同时也包括汉文、突厥文和波斯文。虽然该著作最后未曾杀青,但他的许多研究成果已在当时发表的文章、书评和报告中有所披露。关于中国和周边国家和地区,尤其是中国与印度的关系,他也做了深入的研究。他研究了印度支那道路,根据同一种思想,接受了其他有关安南和柬埔寨等的重要汉文史料,如周达观有关真腊人(古柬埔寨人)风俗的论述。伯希和更不会忘记那些西域古道,那是些在数个世纪期间曾将中国、印度和古代西方联系了起来的通道。显然,他对亚洲大陆大部分地区展开的广泛而又辛勤的耕耘丰富了他为马可·波罗游记所作注释的内容。关于郑和,他于1933—1936年之间,非常详细地研究了15世纪初期郑和下西洋时海上的远航情况,从而为中国向东南亚开拓的特征,提供了一种生动而突出的例证。《郑和下西洋》(《通报》,1933)的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35年),原名为《15世纪初中国的伟大海上旅行》,原是一篇书评,书中主要考察了有关郑和下西洋史实的四部重要著作,即:(1)《瀛涯胜览》;(2)《星槎胜览》;(3)《西洋番国志》;(4)《西洋朝贡典录》。该文详细考证四部书的版本和流传。对于郑和下西洋的史实,汉学家们做过不少研究工作,但伯希和此书有其独特之处。对此冯承钧先生曾评述说,原先的汉学家在地理名物方面的研究固然有不少发现,"但是寻究史源勘对版本的,只有伯希和一人"。作品的一大半内容集中在《瀛涯胜览》等四部典籍的流传过程及版本的考证,对郑和下西洋的年代及所经之地也作了许多有益的探讨,从而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创造了条件。[②]

关于宗教,伯希和对基督教、佛教、道教、摩尼教等教都十分重视,并深有研究。

---

① 桑兵:《伯希和与近代中国学术界》,《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

② 徐怡:《伯希和》,《汉学研究》第五集,中华书局,2001年。

他关注13世纪间蒙古人与教廷间的关系，特别是英诺森四世（Innocent IV）教皇派遣方济各会柏朗嘉宾（Jean de Plan Carpin）出使南斡罗思（Russie，俄罗斯）试图促使成吉思汗继承人之一贵由可汗（Qagna Guyuk）接受教廷归化之事。虽然蒙古首领的答复并不令人鼓舞，而9年后圣·路易（Saint Louis）派遣方济各会士鲁布鲁克（Guillaume de Roubrouck）出使蒙古的成绩是有成效的。鲁布鲁克在喀喇和林（Qaraqorum）的蒙哥（Mongka）大汗宫中逗留了一个时期，后来又做了生动的旅行记述。伯希和在罗马找到了1246年柏朗嘉宾携归的贵由汗复信的波斯文原件，上面还盖有御玺。伯希和还获得了出自波斯蒙古诸首领的多封蒙文书信，和一批出自一位景教大主教的阿拉伯文书信，这些文献为他研究教权与王权间的交易和一个多世纪间西域基督教教团命运的细节问题起了很大作用。此外，伯希和对后来的远东基督教的活动也一直十分关注。如有关利玛窦（Mathieu Ricci）神父、16—18世纪耶稣会和方济各会传教区、亚德兰（Adran）主教、礼仪之争等的情况，都进行了调查研究。

关于佛、道、摩尼等教派及相互的关系，伯希和也有深入的研究。可以说，他的全部著作的“三分之一是关于佛教的内容”，且形成一种“典型的特征”。[①] 他的有关中国中原著作所用的文献，正是千佛洞中的主体，而这些写本中的绝大部分都属于佛教，如大藏经经文、各种疑伪经以及通过唐代经目而为人所知的经文。他在巴黎聆听沙畹和烈维课程时，就曾意识到，如果不顾及到佛教在印度和中国之间建立起来的联系，忽略了这些文献史料中能互相澄清的部分，就不能充分地理解印度和中国。1901年，他重新被派遣中国考察时所搜集的几大套文物，就是有关藏传佛教和蒙古佛教的经典文献和藏传佛教万神殿中的神仙物像。他发表了一些有关梵文字汉文对音的具体论文，还根据汉文史料，针对从中国到印度的汉文路线图写了一部有关药师佛的专著（在该著作中，他继承了有关中国人赴印度旅行之行纪研究的伟大传统），这些研究都促使了雷慕沙、儒莲、沙畹和烈维的学生们对5—10世纪的印度与佛教做出详细的解释，并澄清了许多疑难问题。1903年，他介绍了12世纪佛教的两个异端教派：“白莲宗”和“白云宗”。在他看来，实际上，它们就是将亚洲所有古代文化互相协调和结合

① ［法］路易·勒内、路易·瓦杨、让·菲利奥札著，耿昇译：《法国汉学泰斗伯希和》。

起来的佛教。[1] 1918 年,他完成的《牟子理惑论》小册子的译注本(这是佛教的一种护教书)。他还证明,中国南方的佛教当时就有牢固的基础,一个世纪前楚王受皈依就证明了这一切。此外,他还讨论了《弥烂陀王向经》(*Milindapaha*)汉译本中的专用名词,该经是米弥陀王(Ménandre)和那先比丘(Nägasena)之间的一次著名对话。[2] 他论述了今已佚的《道德经》的梵文本,该文本是在玄奘关怀下为迦摩缕波(Kamarûpa)的拘摩罗王(Kumâra)而主持编定的。这一问题实际上涉及到佛道两教的关系。西域的大发现为道教研究做出贡献,人们在那里发现了公元 4 世纪的一部分道藏经典,由此可以得到证明,佛教和道教间的关系是有时和睦,有时争论相当激烈。从 1906 年起,伯希和就在沙畹的一部著作之末对《魏略》做了注释。《魏略》是公元 3 世纪的文献,它同时说明了中国佛教的起源及其与老子教派之间的最早争论。在敦煌也发现了一部非大藏经的佛教论著《因缘经》,其汉译本已由伯希和与粟特文本同时刊布,借助于汉文和藏文本,其粟特文本已由高狄奥(Gauthiot)解读出来了。他还证明,2—3 世纪的中国佛经译师都是伊朗人,而并非过去所相信的突厥人。除了佛教之外,伊朗人还向东传播了景教,该宗教随阿罗本而从公元 7 世纪起就传入了中国;不少于 30 部景教著作都被译成了汉文;著名的西安府汉文——古叙利亚文的大秦景教碑的碑文,系由带有佛教尊号"僧"的景教徒景净(Adam,亚当)所述。它提供了有关这次传播的见证,汉文文献也证明了在长江畔存在着该教派的一座教堂,西方人仅仅通过和德理(鄂多立克,Odoric de Pordenone)的暗示而知道它的存在。在法国科学院,已有人就这一问题做过多次报告,而伯希和实际是欧洲唯一研究过这一问题的人。[3]

关于摩尼教,伯希和先后分别于 1911 年和 1913 年在《亚细亚学报》中,与沙畹(E · Chavannes)合作,发表了一部相关的译本,其原著是北京一位学者刊行的一部汉文摩尼教论著。《摩尼教流行中国考》是伯希和及其老师沙畹的共同著作(商务印书馆 1931,1933)。这篇文章分前、后两个部分,前一部分主要是疏释摩尼教的教义,后一部分则是对摩尼教在中国流行始末的论述。在后一部分中,作者搜集了《大唐古域记》、《佛祖统记》、

① [法]路易 · 勒内、路易 · 瓦杨、让 · 菲利奥札著,耿昇译:《法国汉学泰斗伯希和》。
② 这是后来戴密微就同样传说所写长篇论文的始因。
③ [法]路易 · 勒内、路易 · 瓦杨、让 · 菲利奥札著,耿昇译:《法国汉学泰斗伯希和》。

《册府元龟》、《通典》、《九姓回鹘可汗碑》等众多材料中有关摩尼教的记叙，按时间顺序加以排列并一一加以诠释。与中国学者王国维、陈垣等人对摩尼教的研究相比，由于此文能够自如地运用波斯文、康居文、突厥文及梵文等材料，因而显得研究范围较为宽阔，成为摩尼教研究中的名篇。[①]这部译作，因为加入了大量注释，又与50多种过去已为人知，或者至少是已有人征引过的其他文献相比较而得以进一步加强，所以很受重视，时至今日仍是研究远东摩尼教的一部重要著作。伯希和还获知，中国天朝政府7世纪末对突厥斯坦的征服为摩尼教徒们开辟了东传的道路；一个世纪之后，回鹘人、蒙古和突厥斯坦的突厥人选摩尼（Mani）宗教为国教，唯有伊斯兰教的压力才最终阻止了该教派的扩张。敦煌重新发现的文献是按照佛经的方式撰写的，可能是中国摩尼教的基本著作《二宗经》的片段，该经文于694年传入中国。伯希和1923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也属于这一研究范畴，文中，他还揭示：直到17世纪"明教"在福州地区仍保持着残余势力。

伯希和还是语言的天才，强有力的语史学家。他精通13种外语，是传教士以外，西方汉学界中罕有能讲流利北京话的学者。在这方面，他的导师沙畹和同辈马伯乐、葛兰言等都远为逊色。关于中国印刷术的起源问题，1918年，伯希和在《东亚论丛》中指出，敦煌提供的历史经典《书经》的残卷早于744年的诏令，并指出，该诏令规定用现代文字取代古文字，由此引出一场文献考订运动，古汉字语音学和字体学研究的新高潮。后来马伯乐和高本汉（Karlgren）将这些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伯希和还非常注重对音问题。他认为，唯有一种非常严格的对音体系，尤其是那些专用名词或靠近外来词的汉文转写对音，才能确定借鉴词汇衔接的真相，而历史的衔接却要依靠语言的衔接。为此，他也成了这一代学者在语音学家和语言学问题上的首倡者和先驱。[②] 伯希和还以同样的精神研究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文字，如契丹金石铭刻中的契丹字，西夏文和八思巴（'Phags - Pa）字母等，还论述了藏文名词的汉文对音，特别是822年竖立的拉萨碑（唐蕃会盟碑）[③]中的对音转写问题。此外，在称之为"东伊朗语"的范畴内，从塞语（Sace）和现在所说的于阗语（Khotanais，一种不规则的伊朗方言）的解读

① 徐怡：《伯希和》，《汉学研究》第五集。

② ［法］路易·勒内、路易·瓦杨、让·菲利奥札著，耿昇译：《法国汉学泰斗伯希和》。

③ 该碑经专家辨认，被认为是亚洲碑铭学中的最重要的碑之一。

起,伯希和也扮演了开拓者的角色。1913年,他还对佛经《金光明经》(*Suvarnaprabhāsa*)的一种残卷进行了翻译,而他所借用的文字,就是该经文的梵文原文和保存下来的汉文片段。

最后要交代的是,他还为振兴藏学研究做出过贡献。

对于伯希和在学术界的地位与水平,虽然也时有微言,甚至到了晚年,还有人指责他的述作多以书评式为之,没有系统巨著,认为他只不过是一位"杂家",或主要是位语文学家,因为他对文献本身的兴趣要比对历史的兴趣大。但是,他的学术地位和成就最终还是得到同行的认可,他在国外汉学上的成就,对近代中国学术所起的重要作用,也得到学术界极高的评价。他与为数众多的中国几代主流学者的交往,很大程度反映了20世纪前半叶国际汉学正统与中国国学主流的相互交汇,不仅推动欧美汉学界对中国学术文化及学者的了解,同时对中国本土的学术发展也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伯希和虽然从未出版过整部著作,但他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和短文,涉及的题目之广,研究之深,非一般学者所能及。因此评论者在论及百年来影响我国的60名国外的学者时,将伯氏列于"华风西被"的七位汉学家的"第二位",[①]而就学术造诣论,"伯希和无疑位居首席"。[②] 傅斯年在谈到国外中国学的时候特别提到的法国三位汉学家,就是儒莲、沙畹和伯希和。[③] 他还认为,伯希和是"中国以外,全世界治汉学者奉为祭酒者也"。[④]

四、马伯乐和他的汉学研究

马伯乐(Henri Maspero,1883—1945,也译马斯佩罗),沙畹的另一个学生,法国20世纪上半期最有权威的汉学家之一。马伯乐的父亲是意大利人,一位声誉卓著的古埃及学专家,曾任开罗博物馆馆长。16岁之前,马伯乐一直与父母住在巴黎,先在蒙田中学,后转入路易大王中学就读。1899年,父亲被派往开罗任埃及文物局局长,马伯乐被托付给塞弗尔师范

① 其余依序为英国的理雅格(James Legge),瑞典的高本汉(K. B. Karlgren),美国的佛里尔(C. L. Freer)、葛思德(G. M. Gest),英国的李约瑟(N. J. Needham),荷兰的高罗佩(R. H. Gulik))。参阅桑兵:《伯希和与近代中国学术界》,《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

② 桑兵:《伯希和与近代中国学术界》,《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

③ 桑兵:《伯希和与近代中国学术界》,《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

④ 桑兵:《伯希和与近代中国学术界》,《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

学校女校长照管，并在该校寄宿就读，直至通过中学会试。1902 年马伯乐获文学学士学位，后在部队服役一年，并随父前往埃及。他在埃及完成了论文《托勒密王朝时期埃及的财富》，并于 1904 年获历史学和地理学高等文凭。从埃及回巴黎后，马伯乐开始学习法律，并于 1907 年获学士学位。与此同时，开始学习中文。汉字的独特性和难度，引起了他极大的好奇心。但是，直接促使他下定决心投身于汉学研究，主要有另外两个因素。其一，法国远东学院丰富的资料为他的汉学研究提供了方便并大开了眼界；其二，他的同父异母哥哥乔治·马伯乐以官员和学者身份到印度支那任职，为他了解汉学提供了许多方便。1907 年他从东方语言学校毕业，1908 年 1 月 27 日，被任命为法国远东学院实习研究员，同年 3 月抵达越南河内，对当地文化的流传有深刻了解，此时他刚满 24 岁。

1908 年到 1920 年，马伯乐在法国远东学术研究院任职。1908 年 11 月 13 日，奉命来到中国，到达北京时恰逢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晏驾，3 岁的溥仪被扶上了王位。在中国，马伯乐亲眼目睹了当时的情景和已经汹涌澎湃的革命风潮。后来他根据梁启超的一部关于 1892 年改良的著作写了一篇文章，描述了革命即将到来前的种种征兆。1910 年 6 月 10 日回到河内，11 月 25 日做了一个关于北京和中国北方的报告，并继续古地理学研究。这段时间，他还发表了一批关于中国佛教起源的研究成果。1912 年 7 月到 1913 年 6 月，马伯乐去欧洲和埃及度假，返回河内后，为考古调查做精心准备。这次考古调查使他有机会第二次前往中国。1914 年 3 月，他前往浙江，发掘和发现了那里的古遗址。在那里，他一直呆到 1914 年 8 月初。原来打算去一趟朝鲜和日本，但因战事被紧急召回，不得不放弃原计划。在这次短暂的中国之行中，他广泛地接触了中国各个阶层的人士。他与僧人们交流佛学，在实地考察几个人口众多的省份中，与当地农民生活在一起，了解他们的社会和宗教习俗，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回法国后，他继续这项研究。起初把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到法国的中国劳工作为调查对象，后来在巴黎的华侨和华人中间展开调查，并以此为依据，写了一篇论述中国现代民间信仰的文章。1915 年 4 月，马伯乐应征入伍。1917 年 7 月，他被法国军方召回，任命为翻译士官。1919 年 3 月退伍复员，之后返回越南。1920 年自河内返法定居，出版了《唐代长安方言研究》(*Le dialecte de Tch' ang-ngan sous les T' ang*)一书。1921 年，他从河内回国，第二年进法兰西学院，继沙畹任法兰西学院中国语言和文学讲座之主讲人。

1921 年 1 月 24 日,正式在法兰西学院开始授课。第一堂课讲的就是他的老师沙畹的研究成果。在定居法国后,他开始撰写一部中国古代史,1927 年出版了 1 卷《古代中国》(1955 年再版,附补编和汉文方块字)。马伯乐对日本汉学研究的重视在西方汉学家中可能是最早的。1928—1929 年,离法前往东京"日佛会馆"工作。1929 年秋季途经中国北方和朝鲜回国。在日期间,他受到日本历史学家黑板胜美和汉学家内藤虎次郎、狩野直喜的欢迎,他们将自己收藏的一些考古和艺术资料展示给马伯乐看,这对他日后的汉学研究有一定的影响。在逗留日本期间,马伯乐举行了多次讲座,其中一部分内容发表在日文期刊上,另一部分收入其《遗著集》。1936 年 2 月 1 日,马伯乐被聘为碑铭与美文学院院士,1942 年 12 月 23 日当选为该院副院长,1943 年底当选为院长。1944 年,任法兰西学院文学部会长。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由于他的犹太血统以及他的儿子让·马伯乐参加反法西斯组织,马伯乐夫妇被捕入狱,后被押送到德国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受到非人虐待,1945 年 3 月 17 日病逝于集中营。

马伯乐首先接触的是中国历史和中国语言学,如同伯希和,他也是通过印度支那了解中国,但他跟伯希和的研究方法截然不同。伯希和是个文献学家,他注重的是对文献的认识、解读和辨别真伪,而马伯乐则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了对历史的爱好以及对"一种清晰而精确的研究方法的追求";[①]也可能是受葛兰言的影响,他喜用比较方法,展现越南北部傣族居民及古代中国的宗教和社会。他还以其严谨的学术态度和批判的精神清除了许多关于古代中国的一些陈旧的观念,提出自己新的看法,为后来的研究者奠定了基础,也因此使得他的研究方法在汉学界独树一帜。在越南时期,他进行音位学研究,为瑞典语言学家高本汉(Karlgren)开创了一条道路。他的《唐代安南都护府、历史地理短评》(1910)、《安南语言历史语音研究》(1912)等,都是关于古代中国的研究,后来的《唐代长安方言考》(1920)和《古代中国》(1927)也无不如此。

在《唐代长安方言考》(*Le dialecte de Tch'ang-ngun sous les T'ang*)中,马伯乐极其成功地考证了古音系统的存在,并以实例加以了证明。但他的中古音体系与高本汉的中古音体系并不相同,也因为两人看法的重大差异,引发了旷日持久的论争。

① [法]程艾蓝:《法国的古代中国研究》。

《古代中国》(*La Chine antique*)是他的唯一的一本著作,书中展示了秦朝建立之前中国历史宏伟画卷,主要是政治史、制度史,同样包括宗教史和文化史。他从1921年起就着手编写该书,至1927年获得成果,出版了第1卷,写至公元前3世纪止。此后,他的许多著作基本上都是以此书为中心撰写,或做补充,或为此书续集积累材料,尤其是汉以后的内容,文献资料的数量比远古部分更为可观。在当时欧洲有关古代中国资料十分缺乏的情况下,他的这一工作,为法国的中国历史研究开辟了一条通道,大大地开拓了研究视野。因为他在运用相关的资料时,必须对这些资料做出考证,从而引发了他做更深入的研究,开拓新的领域,如他在运用其中经济文献时,为了得到更为确实可靠的资料,便导致了他着手从事中国经济史的全面调查。对于中国经济史,当时也还很少有人问津,显然,他的这一工作又起了一个先锋者的作用,也为他后期许多课程和著作做了准备。因为后期他的许多课程和著作大都是关于这一领域。《古代中国》一书,因有许多独到的见解,颇受汉学家重视,而其资料丰富翔实,尤其是书中的原始文献,后来从未经过修订,一直有着很可靠的使用价值,只是上古部分,因二战后考古资料的大量发现,才显得有些单薄。由于该书的学术价值,有机会于1955年重新再版。在再版时,他附上了补编和汉文方块字。

宗教领域方面,在河内期间,马伯乐发表了一批关于中国佛教起源的研究成果。这项成果是他在巴黎早就已开始进行的。其中涉及到佛教传入中国的各种说法、首批佛教信徒群体的形成、中国首批佛教信徒所尊敬信奉的领袖人物等。就此为题,他还对德国一位汉学家相关的论述提出自己的异议。

在道教研究方面,他对汉末以后的中国道教尤有研究,其中最著名的是他的几个讲演,如1937年的《道教的神仙——就其如何与神交感而言》,1940年的《中国六朝时期的宗教信仰和道教》和《古道教及其养生术》等。马伯乐的遗稿后来经由他的弟子和同事戴密微整理出版,以《关于中国宗教和历史的遗稿》(三卷本)为名问世,其中第二卷就是以《道教》为题,收集整理了马伯乐生前的演讲稿以及一些未曾发表的手稿。戴密微在书的序中称:"本卷收有关于公元初数世纪的道教未刊稿三篇。这个时期差不多就是道教基本构架形成的决定性时期。亨利·马伯乐是第一个企图对这一时期的道教历史和道教文献做学术探讨的人,几乎至今仍然是唯一通晓这门学问的人。1971年,第二卷又以《道教和中国宗教》为名单独重新

出版。《不列颠百科全书》称该书为“关于道教的最优秀的先驱者的著作”,“西方权威著作”。①

马伯乐认为:道教是“世界上最奇妙的宗教之一”。他在《老子和庄子以及圣人的生的神秘体验》一文中指出,道家“致力于创造一个对世界的科学化的表象”,“道家和道教并不如一般人们所说的那么不同,他们彼此来自同一种极古老的宗教的根源”。他把六朝的道教视作道教发展史上的焦点,并把六朝和六朝以前的道教称为“古道教”,而唐代以后直到现代的道教则处在一个漫长的衰退过程中。其理由是,道士紧缩在道观之中,逐渐丧失了对民众的影响力,而民间的道士则变成了单纯的“科仪崇拜”。他将唐代以后的道教称为“民众道教”或“近代民间宗教”,其理由是,他们吸收了各种方术、仪式成分。为此,他还将唐朝时期的道教与“古道教”区别开来。对于“古道教”,马伯乐是从文献学研究入手的。他认为,“古道教”是一个以《大洞真经》为传统的道教集团,与另一个以《灵宝经》为传统的集团相对立。“古道教”是“引导信仰者以追求长生和不死为目标的寻求个人解脱的宗教”,其目的是为了长生,因此,“古道教”包含着一整套的养形和养性的道术,并且要信仰者积善行德,从有意识地集中精神到无意识地与道冥合为一,这样就达到了入道的高度神秘主义的境界。正因为如此,马伯乐认为,老庄的道家思想与道教是没有区别的。尽管老庄与六朝道教时隔久远,但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它们有着连续性。他的这一看法的历史功绩,在他的另一名弟子康德谟(Maxime Kaltenmark)那里得到了公正的评价,康德谟在他的单行本《道教和中国宗教》一书的序言中说:“马伯乐的最大的功绩就是对于道教这样一种难于理解的宗教,给予了理解,提出了问题,并且向着这个方向开拓了道路。”日本京都大学已故著名学者川义雄将马伯乐的法文原著翻译成了日文,并曾经评价马伯乐“是通晓欧亚,唯一独立探索道教的历史及其道术的内部体系的人”。马伯乐的道教研究观点为后来的法国研究家们所继承,至今仍保持着强大的影响力。②

马伯乐在中国宗教研究方面的重大业绩,还在于他阐明了在中国流行

---

① 参阅陈耀庭:《法国的道教研究》,道教文化资料库。

② 马伯乐的道教研究主要由他的学生康德谟(又译卡顿马克,Maxime Kaltenmark)和石泰安(又译斯坦安,Rolf - A. Stein)所继承。以上引文参阅陈耀庭:《法国的道教研究》,网址:道教文化资料库。

的三种主要宗教(包括儒教在内)彼此之间的关系。他指出了三种宗教各自用来满足不同的需要,相互间进行了无情的斗争又同时共存,构成了一种十分重要的历史因素。他还孜孜不倦地剖析了古代道教的机制,指出道教借以建立起来的气功实践,论证公元纪元初期道教对于佛教传入中国这件事情上所产生的作用等。

马伯乐身后留下的许多手稿笔记都已整理出版,特别是那些有关"他率先拓展的汉学三个领域的手稿,经济史、天文学和道教"。[①]

五、葛兰言和他的汉学研究[②]

葛兰言(Marcel Granet,1844—1940),沙畹的另一个学生。如果说伯希和、马伯乐分别以文献学和历史学著称的话,那么葛兰言就是一位受当时法国著名社会学家涂尔干影响(Emile Durkheim,1858—1917)将社会学引进汉学研究而独树一帜的汉学家。[③]

1884 年,葛兰言出生于法国 Drome 省的一个小镇。1904 年入巴黎高师,主修历史,并师从涂尔干习社会学,1907 年获高中历史教员资格,并从巴黎高师毕业,开始中学教学生涯。1908 年得法国"狄爱尔氏基金会"资助,重回高师,同时在东方语言学校师从沙畹学习汉语。在基金资助的三年里,葛兰言研究中国家族组织结构和婚姻体制问题,并撰写《中国古代婚俗考》一文,发表于 1912 年的《通报》上,从此走上汉学之路。1911 年,葛兰言获政府资助来到中国。在北京期间与法国汉学家铎尔孟(Andre d' Hormon)成莫逆之交。在中国已生活了 5 年的铎尔孟,与中国学者交往甚密,为葛兰言与中国学者交往提供了方便之门。1913 年葛兰言完成了中国西北(陕西、甘肃)和四川等省的考古学考察,获大量第一手宗教资料,为日后研究打下基础。同年回巴黎,接替沙畹成为法兰西高等实验研究学院远东宗教研究系主任。1914 年,在高等实验研究院开设"中国宗教之研究纲要"讲座,从而确定了把中国宗教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术生涯,同时他的中国文明观与研究方法论也基本形成。1914 年 12 月入伍服兵役,期

---

① [法]程艾蓝:《法国的古代中国研究》。

② 本小节由朱丁撰写。

③ Maurice Freedman: *Marcel Granet, La Féodalité chinoise de Marcel granet*, Editions IMAGO, 1981.

间完成了博士论文《中国古代的祭礼与歌谣》和《中国古代之滕制》。一战后,1918 年奉外交部之命再次到中国,次年回国,仍在高等研究院任前职。1920 年 1 月,博士论文答辩,轰动巴黎,同年,出版《中国古代之滕制》,并开始在索邦大学讲授中国文明史。1926 年,被选为国立东方语言学校历史地理学院院长,同年巴黎大学汉学研究所(Institut des Hautes Etudes chinoises)成立,任第一任所长。从此进入学术事业黄金阶段,相继写出了《中国人之宗教》(1922)、《古中国的跳舞与神秘故事》(1926)、《中国上古文明论》(1929)、《中国人之思维》(1934)等著作及《中国语言与中国思想之特点》(1920)、《置婴于地之古礼与神断》(1922)《中国古丧礼中所见之悲哀语》(1922)等论文。教学方面,1919 到 1926 年间,葛兰言在高等实验学院的课程主要是讲授《仪礼》中的礼俗,1926—1927 年间转向《庄子》与古代历法,1927—1928 年间《淮南子》与古历法,1928—1929 年间及 1938—1939 年,道家和道教,1939—1940 做系列《山海经》昆仑山讲座。按计划,他准备写一本关于中国君权观念的书,但二战爆发打断了他的计划。1940 年,56 岁的葛兰言因对德军入侵法国过度愤怒而过早去世。

作为沙畹和涂尔干的弟子,葛兰言接受了历史学、社会学的严格专业训练,使他能选择将历史学和社会学的方法论结合在一起的汉学研究,并逐渐形成将中国古代宗教社会作为自己的研究中心。

他的《中国古代的祭礼与歌谣》是一部以《诗经》为文献基础研究农民宗教婚姻活动的著作。全书除绪论和结论部分,分《诗经的情歌》和《古代的祭礼》两编。葛兰言对《国风》(及《小雅》个别篇章)68 首爱情诗做了全新独到的译述和阐释,分析了每首诗的《毛序》、《毛传》、《郑笺》及三家异文,并考虑到朱熹《诗集传》的解说,最后做出主题判断。他认为,这些诗都是情歌,可分为田园恋歌、村落恋歌和山川恋歌三种。如《螽斯》(《周南》五),葛兰言一改《毛诗序》与《郑笺》后妃宽容不嫉妒之德的注释,释为"反映了(人和禽兽)种的繁衍的愿望和禁忌性质";《七月》(《豳风》一)一诗,一向认为是周公为了辅佐君王,用王化使人事与自然界秩序保持一致,作诗向成王建议,而葛兰言却认为实际是一首"用诗句连缀而成的历书,其中各句是一年四季的田园俚谚"。在谈到《国风》,包括《小雅》部分篇章,葛兰言认为大部是情歌,是农民青年男女在各类祭礼集会时的即兴歌唱。他说,青年男女们平时生活是对立的群体,而在共同圣地举行节令祭祀时才有可能从单调生活中摆脱出来,在即兴的对歌竞争中展示内心炽热的复

杂情感，由对立走向接近，最终走向婚姻的盟誓。所以即兴诗歌的语言是反复应答。他还运用古希腊、日本、越南，及中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人类学资料进行比照，以验证《国风》的内容和艺术形式。

葛兰言还考察了古代社会组织、宗教信仰、伦理原则和生活风尚。他认为中国古代生产劳动与农事祭礼是遵循季节韵律而进行的，犹如自然界受季节规则交替支配，人们相信这样才能确保人与自然及社会内部的良好秩序。祭礼在山岳、河川等圣地实行，这些地方作为举行宗教祭礼活动的见证也就被作为圣地加以崇拜。

葛兰言以跨文化和异文化的视点、多文化比较的方法，系统地探索了《诗经》的起源、本题内容和深层底蕴，其意义并不仅仅在于为某些诗篇增添一两种说解，而是为《诗经》乃至文学作品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视野。

在《中国人的宗教》中，葛兰言采取社会学分类法，论述了古代中国的农民宗教、贵族宗教和文人官僚宗教，同时也考察了道佛两教。

葛兰言的农民宗教部分是以《中国古代的祭礼与歌谣》研究为基础，把中国广阔的地域作为整体，将历史限定在封建以前（大约公元前6世纪或更早就已开始）①这个范围内，用社会学分析方式，再现了乡村宗教生活画卷。他吸收了涂尔干的“神圣－凡俗”二元对立理论②，认为人类受到自然界交替规则的影响，阴阳观念并不是《周易》时代才有，而是在农民宗教活动中就已经显现出来，并成为自然、人类及历法的最早也是最基本的组织原则。它首先体现为对物的分类要素，如人分为男和女。而后阴阳由对立组成了空间，经过先后轮序形成时间。二元对立观念的发展最终使自然界的一切要素都可以被表达出来。葛兰言认为这种原则在中国信仰与科学体系中一直保持着统治地位，并在道家观念中得到哲学化阐述。

在贵族宗教部分，葛兰言分析了贵族的祭祀与婚俗的关系。与农民生活完全不同，祭祀在贵族生活中几乎占了最重要的地位，因为它与贵族权威相联系，首领就是祭司，国王就是最大的祭司。宗教祭祀的权威性规定了许多道德义务，婚姻生子就是为了保证有合适的男性继承人来继续对祖先献祭。所以贵族的婚姻不仅是维持家族联系、建立同盟的手段，更是最

① 这样的做法当然遭到了重视年代考证的史学家的批评，也如我们在前面提到的那样，由于忽略了本身历史的发展，使描述出来的图像缺乏历史纵深感。

② 涂尔干认为二元对立观念是原始人最初产生的对立观念。

重要的宗教行为。一个贵族只能结婚一次,这是神圣的规则,当然他可纳许多妾。这样,在贵族婚姻中发展出了与上古时代不同的另一种群婚形式——媵制,一个普通贵族可以同娶两姐妹过门,而封臣与国王则分别可一次娶三位和四位姐妹。

他还论述了贵族宗教里国王行为须符合自然韵律的重要性。史前的国王居住在一个神圣的宗教性建筑内。他的生活根据四季的节奏严格控制,如住处朝向、衣服颜色、食物种类都按季改变,否则会造成星辰四季运转失常。他研究了明堂这类宗教建筑的特点,认为这种方形建筑被分为9房间,与中国的九州相合,而每个房间承载数字的象征意义则构成一幅九宫图。[①] 山川祭祀贯穿了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对山川的祭祀是天子的特权。后来的泰山封禅就是山川权威的表现。

在阐述文人官僚宗教时,葛兰言指出它是由孔子的门徒与文人集团[②]这个独特的社会阶层发展出来的,与孔子本人的思想有着很大的不同。文人官僚宗教的形成来源于一个被称作"君子"的专门群体以上古流传下来的古书为经典,从君王身上开始进行道德施教,也代表君王主持祭祀,并在后来逐渐代替了诸侯与贵族来行使地方权力,粉碎了贵族宗教体系。文人官僚宗教以儒家经典为基础教义,但又与孔子本人的思想有着本质的区别,它背离了孔子的初衷,走向形式化与模式化。比如在孔子本人的思想中,宇宙秩序是一个中心的具体的概念,源于上古的宗教信仰;而后世文人眼中更多的是一种抽象的理想。对祖先的祭祀,在封建时代贵族对祖先的祭祀是为了遵其神谕,达到直接交流;而到后来,所有以死者名义举行的礼仪都成为纪念性的,完全象征性的。又比如孔子眼中的"礼"是实现社会有效控制的维持文明秩序的手段,后世的"礼"是僵化的形式化的象征性实践。

葛兰言认为孔子理性智慧的基础来自他以前的上古及封建时代文明,而孔子将之发展从而使人们远离了神秘主义实践、巫术祈祷与救世主权威

---

① 国王在不同方向、不同房间居住的时间严格地依据九宫图内的数字来安排。数字的象征意义使时间与空间神奇地结合在一起,有效地形成了一种循环模式。这种模式图的发展使每一组数字都代表着与其相配的音律、动物种类、谷物、衣食等,从而发展成一种宇宙系统与秩序的代表。

② 葛兰言所说的文人集团是指在封建系统即将崩溃之时所出现的捍卫孔子学说的人,他们包括底层贵族和贵族中的大多数。他们经常制定与传播贵族生活准则并使之成为贵族必须履行的义务。

等道教佛教中的思想。但是孔子在以后的几千年里却赋予了另一种宗教形式以生命，而日后的中国将其作为圣人崇拜成为对文人官僚宗教最大的延续，这恐怕也是他始料未及的，也是与孔子本人的真实愿望背道而驰的。

对道、佛两教的研究，显然他是以道教为中心展开的。

关于道教，首先，葛兰言不赞成将道家与道教严格区分开来。他认为道家思想与儒家思想都根源于上古神话时代的宗教信仰，道家本身体现上古文明包括信仰崇拜、宗教仪式、社会组织与道德意识在内的各个侧面，而王弼对《老子》、郭象对《庄子》在哲学上的评注是将这些著作的各个侧面删落得只剩一个侧面，导致了道教与道家的两分法。葛兰言的观点启发后来学者开始关注道家与道教的共同本质问题。

葛兰言一直未把道教与民间宗教做严格的区分。他指出，道教形成之时正是民间宗教习俗和传统受官方驱逐之时，于是道教变成了民间宗教藏身的避难处。葛兰言将道教的兴起定义为纯粹意义上的迈向神秘主义的上古宗教复兴运动，但它最终没有形成一种稳定的组织，也缺乏一套组织神职人员的体系，所以最终不过是在民间保留与普及了上古发展而来的各种神秘观念、仪式、巫术而已。

葛兰言认为佛教在中古时代的传入促进了中国上层阶级中神秘思潮的复兴，从中诞生了佛教艺术。道教与佛教在中国古代宗教史上起着互补的角色，相互借鉴，满足了官方宗教所不能满足的非文人的宗教生活需要。

葛兰言的《中国人之思想》共分四篇：思想表现工具（对语言文字的叙述）研究，思想时空、阴阳、术、道研究，宇宙观研究和各家各派论。

葛兰言认为，对中国人来说，语言只是众多符号系统中的一种，也是行为方式的一种。汉语重在表述行为，而非阐述思想，方块字的结构清楚地体现这一特点。他以极大的篇幅关注中国人思维的要素——时、空、阴、阳、数、道等的观念，指出它主要用于分类而非计算和测量。

葛兰言认为，中国人思维中的时、空具有统一性，这是从上古国王的宗教仪式活动演变而来的。国王在象征世界中心的明堂里，依据季节周期韵律活动，与宇宙秩序对应（correspondence），体现出时空的统一。自然界冷暖两季的交替产生了人类意识中阴与阳两大范畴。“一阴一阳谓之道”，二重韵律又形成了宇宙之道。所以，葛兰认为道的概念的产生晚于阴阳概念的。

数字在五行中也有对应的位置。数字不仅仅用于运算，更具有象征价

值,能对事物进行限制与分类。在数字之间可以建立一种非算术的同等性;因此作为象征符号的数字更多用于控制而非测量事物。

在总结了中国人思维中的几大范畴之后,葛兰言认为中国人的思想更倾向于行为与实用,而不是观测与抽象的思辨,具有一种非科学与非哲学的气质。他认为古中国事实上没有真正意义的哲学,因为哲学应与数学和算术分析紧密联系,而中国的哲学是面向实用性而形成的综合智慧。古中国的科学家仅仅是工匠,而道德家才是思想的领袖。葛兰言这样的分析显然是以西方的形而上哲学为中心进行参照。

葛兰言进一步分析,中国人眼中自然、社会与人是一体的,既不存在一个纯粹的精神存在的世界,也没有身体之外的灵魂的概念。自然在中国人眼里只是一个范畴,是统治宇宙万物的文明的秩序。人与万物被分成了不同种类,每个人都有其等级、权利、义务与礼法。葛兰言高度评价了"礼"在中国文化史上的意义,"礼"取代了西方人眼中的上帝成为最令人敬畏的力量。礼即人与万物需要遵循的规则与模式。葛兰言认为从社会学的方法来看,如果撇开后世儒家对礼的僵化发挥,礼的合理运用确实行之有效地解决了所有的问题。

对各个思想学派,葛兰言一直强调它们的同源性与发展初期的一致性。他认为这些学派的理论最早都来自对上古习俗的阐述。他根据社会学划分法将学派分为四类:重在探索政治统治的方法,包括法家、政治家、诡辩家与逻辑家;重在增进公共福利方法,包括孔子的人文主义与墨翟的社会义务派。而以道家为代表致力于研究养生之道与神秘主义的乃是第三类;混合前者而别立径途的儒家乃是第四类,包括孟子的仁政说,荀子的礼制说以及董仲舒的历史正统说。

葛兰言的古代神话观点主要体现在他的《古中国的跳舞与神话故事》里,他认为:随着社会由农民们宗教结社性质的社会向封建领主的霸权社会变迁,神话的发展也逐渐由早期农民社会圣地自然崇拜神话向着具有寓言和杜撰性质的英雄传说转变。在封建时代广泛存在很多残酷、原始、野蛮的文化要素,但从孔子与司马迁开始,史学家们的全部努力就是排除一切看似不可能或与其道德标准相悖的因素,并把这些口传的神话传说变为历史史实,即"神话历史化"。但不管保留下来的神话故事与历史传说是否真实,它们仍保存着古中国的痕迹,通过对其研究,可以发现与儒家文化截然不同的中国早期文化特征、社会变迁的轨迹以及封建邦国建立的社会

和技术条件。

葛兰言通过阅读《春秋》、《史记》等文献，参以社会学研究成果[1]进行分析，认为在五霸时期，中国是普遍存在以人为牲、杀人以祭的情况的。一个诸侯死去或诸侯会盟时，常用杀首领祭祀，或牺牲歌舞者来建立王子的威权。这种情况当然会使相当纯良的文化或宗教已人道化的民族惊骇不已。所以中国的传说总爱将这种野蛮风俗推到夷狄身上，说这是"用夷变夏"，由外输入的。葛兰言认为事实上从史料中透露出来的情况是：有野心的诸侯藉着会盟争霸的机会，为恢复堕落的威权，常以人为牺牲来获得一种宗教壮举。每逢一个首领获得新的霸权常常伴随着一个故事。在一个诸侯的盟会上，一个首领被作为牺牲献祭给另一个首领，后者获得威权，新的朝代便建立了，一类舞蹈便由此而成立。于是有了巡行四方以镇方土的机会。这时，又是同样的情况，在"四门"接见"四方"诸侯之后，必须要有一些仪式来证明新秩序的建立。于是一些首领从"四方"跑出，以做重新构建的空间的管理者。而有一个首领就要被斩，裂作几块，从四门掷出，正如在霸权建立时杀歌舞者以祭一样，是为了除旧秽以建新权。由于新秩序的建立必须伴随人血，有宗教的争斗，故常带着面具进行。葛兰言认为这种首领牺牲、朝代的有关舞蹈的故事大都被史家隐藏起来或删改了。

葛兰言对中国上古社会也深有研究，他的《中国上古文明论》著作堪称一部西方读者了解上古社会史的必读之书，在这部著作中，他试图指出公元前1044到公元前87年间中国人在政治生活、礼俗以及行为方面的典型特征。全书分为政治史与社会史两部分。

在政治史部分中，葛兰言首先介绍了从传说中的五帝到汉武帝统治结束的时代里决定性的事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观点是中国文明自发产生的可能性极小。中国早期文明自定居诞生之始就不断有外来移民的加入与来自外族的侵掠。在形成秦帝国之前，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游牧部落与定居部落的斗争融合史。秦帝国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华夏边境侯国与大批蛮族形成联盟的结果。

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葛兰言讨论了中国的地理环境，他根据《禹贡》

① 社会学归纳了半开化民族与准原始民族的风俗、政治组织，并参证埃及考古学的地下挖掘资料，已经把"从图腾部落到封建王朝"变迁的状态整理并解释出来，并已形成共识：在这一阶段中间会经过争霸期，杀人以祭的情况普遍发生。

和《山海经》的描述指出三代时中国的大致疆域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包括整个河南,以及陕西、山西、山东的部分地区,南止于秦岭。早期的华夏族在这片狭小的黄土地上定居耕种,周围地区包围着游牧或游耕的蛮族。在《山海经》中常提到西方的"黑水"、"昆仑山"等神秘地方,沙畹认为这些神秘地代表着中国人思想中的民族的诞生地发祥地。葛兰言不同意这种说法,他大胆地指出"黑水"等地正是人们对祖先受到西来的所谓蛮族侵略向东迁移时经过的地区的记忆。

在论述社会史时,葛兰言跳出传统史学维护的三代社会的虚幻图景,描述了汉以前的社会构成,包括生活习俗、社会组成、家庭结构、社会等级体系、王权与礼、国王与宰相的尊位等问题。最突出的观点是周朝时贵族一直是形成中央集权的障碍。随着封建制的瓦解,文人官僚的出现,贵族的权力受到了约束。君主、贵族与文人官僚因此形成一种制约关系。虽然后来的秦帝国给了贵族以毁灭性的打击,但严格意义上拥有特权与世袭身份的贵族并未在历史上真正消失,甚至在后汉及六朝得到了复兴。葛兰言对君主、贵族、官僚的三重关系的认识在当时是先驱式的而且非常精到的。

在总结中,他提出了有价值的观点:在黄土高原与冲积土平原两种地形上分别孕育产生了谷物文明与稻米文明,他们分别属于人类学上的草原文明与海洋文明。真正的中国文明形成于这两种文明的接触。比如周代表着谷物文明,而殷人正是居住在靠近东海的湿润的平原上。葛兰言这一见解的依据主要是历史文献资料。后来的考古学出土资料以及神话采集资料等一大批人类学资料都证明了谷物文化与稻米文化在整个东南亚的不同特点。

19世纪下半叶以来,实证学在欧洲占据主导,汉学研究继承了清代朴学的考据精神,以沙畹、伯希和、马伯乐、高本汉为代表的语文学派为正统,着重于文献的发现与印证。而葛兰言却率先将社会学引入汉学研究,用社会学理论和社会学分析方法来考察中国古代社会、文化、宗教和礼俗,佐以实际调查与田野研究,并用对比研究的方法,突破了前辈和同时代汉学家的局限,具有了一种综合性的不局限于文本的视野。其研究尤其是其方法论,在汉学、人类学、社会学的发展中代表着一种伟大的转折,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第三节 以中国题材创作的汉学家

一、追求中国题材和美学意识

法国对中国美学意识的追求和以中国题材进行创作并不始于这一时期，甚至也不始于19世纪后期，早在18世纪时，伏尔泰的《中国孤儿》就曾轰动整个西欧，而且魅力经久不衰，倍受历代评论家重视。要说明的是，从19世纪下半叶西方再度兴起“东方热”以后，法国的这一传统显得更为活跃，也取得了更加瞩目的成绩，从而成了这一时期法国汉学研究中一道特别亮丽的风景线。克洛岱尔（Paul Claudel）、谢阁兰（Victor Segalen）、阿历克西·莱热（即圣－琼·佩斯 Saint－John Perse）、亨利·米肖（Henri Michaux），马尔罗（André Malraux）、洛蒂（Pierre Loti）、路易·拉卢瓦等的创作，不同程度地都体现了这一特色。

这些作家和诗人根据他们各自对中国的理解和感受，利用中国的题材，在追求东方美学上各领风骚，创作出各自独具风格的作品。

戏剧方面

20世纪的西方戏剧，曾一度力图突破传统写实而寻求新的表现方式，而在西方的戏剧家们看来，中国传统戏剧是非现实主义最理想的体现，于是特别倾情于中国戏剧的表现艺术。法国汉学家路易·拉卢瓦参照了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从文化角度探讨中国戏剧的起源和特点，对中国戏剧中的念、做、打的综合表演手段，“虚实相生”的舞台特征，更是情有独钟；而戏剧家阿尔托（1896—1948）则从老子的《道德经》中寻找戏剧美学的哲理原理，从而在30年代提出了“从无走向形，又从形返回无”的戏剧构思观念。①

诗歌方面

从19世纪下半叶起，随着西方“东方热”的再度兴起，在题材和在艺术上借鉴中国的法国诗人日益增多，其中以克洛岱尔、谢阁兰、圣－琼·佩斯、亨利·米肖等诗人尤为突出。他们是一些各有自己的特色的诗人，各人以自己的方式“从中国接受”了一种“个人”的，与“各自性格相契合的启

① 钱林森：《中国文学在法国》，第90－91页。

示”,指导他们自己的创作和今后的发展,成了“20世纪的法国文学中”“一个很奇特”,却“处处体现出来”的现象。[①]尤其是克洛岱尔、谢阁兰、圣-琼·佩斯三位诗人,他们的关系更为密切,在法国诗歌发展史上所起的影响也更大。如评论所述,三位彼此认识,几乎又在同一时期来到中国的诗人作家和外交人员,虽然“他们对中国的感受各不相同”,但他们似乎又“都使法国的诗歌发展蜕变”。[②]

对于上述法国诗人,克洛岱尔和谢阁兰我们将有专门介绍,这里只对其他几位做一简要介绍。

圣-琼·佩斯(Saint-JohnPerse,1887—1975),原名阿历克西·莱热,派驻北京的年轻的外交官,他的中国题材的创作为他赢得了荣誉,并成为具有东方色彩的诗人。此前,他写的几部和他安德列斯血统密切相连的戏剧已使他在文学圈里小有名气,受克洛岱尔的鼓励而选择了外交事业,出发到远东,异域生涯使他的生活和创作都发生了变化。1916年到中国,1921年带着他伟大的诗作《阿纳巴斯》离开时已不再是当初的他了。《阿纳巴斯》于1924年付梓,迷倒了整个欧洲文学界。人们从圣-琼·佩斯身上看到了某种变化和启示。但圣-琼·佩斯“并没有在中国迷失自我”,他没有学习汉语,他“以某种纯精神的方式穿越这个古老的国度”,去追求他自己的目标,他所着眼的是当时的亚洲北部,对他而言,“漠漠旅程胜过文化中国”。[③]

亨利·米肖(Henri Michaux,1899-1986),到中国稍晚些,是在20年代。他只是路过,但“中国对他的震动激发了他的代表作《一个野蛮人在亚洲》的问世”,作品“再次提及并深化了从维克多·雨果就开始的对欧洲文明的颠覆:文明在他处,真正的野蛮人是我们”。[④]这种认识“并非一时冲动,而是确定的体验”,在他所有作品中都有体现,在之后的绘画中也一样。他的作品中“有一丝抹不去的借鉴的痕迹”,晚年的一篇小文《中国的表形文字》证实了这一点,尤其“在他对中国书法和文人传统的领悟上”表现得更为明显。[⑤]

---

① [法]毛磊(Pierre Morel),黄荭译:《在双方的对话中认识自己》。
② [法]毛磊(Pierre Morel),黄荭译:《在双方的对话中认识自己》。
③ [法]毛磊(Pierre Morel),黄荭译:《在双方的对话中认识自己》。
④ [法]毛磊(Pierre Morel),黄荭译:《在双方的对话中认识自己》。
⑤ [法]毛磊(Pierre Morel),黄荭译:《在双方的对话中认识自己》。

散文、小说方面

如果说,在散文和小说方面,谢阁兰的小说《天子》和《勒内·莱斯》仍然是神秘中国作为题材的话,那么洛蒂和马尔罗的中国题材创作,就是再现了灾难深重和动荡的中国现实。

皮埃尔·洛蒂(Pierre Loti,1850—1923,原名 Julien Viaud,也译成绿蒂)。19 世纪后期的法国文坛,洛蒂以描绘异域风光、绚丽多彩的景色和奇幻的画面给读者一种新鲜和强烈的印象。1900 年,他作为八国联军的一名海军军官有机会来到中国,见到从未见识过的一切。洛蒂是 9 月 25 日到达中国的,当时义和团已被镇压,慈禧出逃在外,于是他有幸在紫禁城宫殿里逗留居住十余日。由此,诞生了名为《北京的末日》的记实性文学作品。当时的中国深受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双重压迫,传说里"中央帝国"(Empire du Milieu)已不再拥有往日的神采,因此,洛蒂并没有成为一名他所想象中"神奇宝地的探险者",却成了中央帝国"文明末日"的见证人,他向读者介绍的不是这个帝国的"神采",而是"一个巨大悲剧周边的故事"。① 作品字里行间体现出来最为明显的特征是极度的对比反差:战争的丑陋与文明的美丽,饱受凌辱的国民惨状与清朝皇宫的华丽富贵,"在一件爬满虱子的破布衫边上[放着一件]3000 年的古玩",这就是北京末日中的典型描写。② 作品以冷峻,甚至轻蔑的情感,为读者提供了一幅大中华帝国被西方列强宰割、屠杀的真实图画,以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为古老东方文明走向衰亡唱了一曲挽歌。

马尔罗(André Malraux,1901—1976),一个上世纪踏上过中国国土的法国大作家。他显然也很特别,但他同样也受到了中国的再塑造。他真实的体验源自印度支那,但他写了两本以中国为主题的小说:《征服者》和《人类的状况》。他找到了神话的头号熔炼炉去锻造他的作品,法属印度支那只是引人登堂入室的门厅罢了。革命情谊、政治争斗作为现代悲剧的形式,爱的无望、存在的谎言、日常生活中文化的冲突和政治事件一样,马尔罗的故事是围绕 20 年代动荡的中国展开的。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20 世纪上半叶以中国题材进行创作的法国作家

① 王恬:《洛蒂〈北京的末日〉中的中国形象》,《海外中国学评论》,第 1 辑,主编朱政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

② 参阅王恬:《洛蒂〈北京的末日〉中的中国形象》,《海外中国学评论》第 1 辑。

和诗人,他们每一位都"带着深深的迷恋走进中国,得出了对中国、对世界更广袤、更完备的视角",中国不再只是猎奇的对象,不再只是异域风情,而是一个"更真实而神奇","现实和神话"相结合"有广度、有深度的主题",它提供的是"人生在世的另一种方式"。①

二、克洛岱尔和中国题材创作

保尔·克洛岱尔(Paul Claudel,1868—1955),法国诗人、戏剧家、外交家。1868年8月6日生于埃纳省中资产阶级家庭。年轻时就读于巴黎大学法科和政治学院。一年圣诞节,在巴黎圣母院听到大风琴所奏圣歌合唱,心灵深受震动,从此决心以歌颂天主信仰为终生神圣事业。1886年12月皈依天主教。被录取为法国外交部青年见习人员后,便踏上职业外交家之路,先后出使中、美、德、意、日、巴西等国,以在中国任职时间最长,从1895年开始踏入中国到1909年离开,前后共达11~12年之久(据本人说是15年)。② 先在上海任候补领事,后调任福州副领事(1896年3月至1899年10月),1901年任天津领事。他在中国经历之久,经历之丰富而富有传奇色彩,在近代旅华外国人中绝无仅有。在北京期间,他曾拜访过督军衙门或清朝高官,谒见过皇太后和末代皇帝,两次参加皇家"神秘"葬礼,看见过肥胖的袁世凯身披粗麻衣、手执哭丧棒在灵柩后走过,还曾跟孙中山同乘一艘游船,"有好几天,在一起谈论"。中国的生活,成了克洛岱尔主要创作的基础,他的有关中国题材的作品《认识东方》(1900)、《正午的分界》(1906)、《诗艺》(1907)、《五大颂歌》(1910)、《画扇帖》(1942)等,大都创作于中国。1955年2月23日逝世于巴黎。

克洛岱尔的文学活动开始于写诗,后来虽然发表了许多剧本,也都是诗意的抒情剧本,并非反映现实的生活剧。他和瓦莱里一起被称为19世纪末后期象征主义最重要的诗人之一。他的艺术形式富于独创性,写的是自由诗,近似分行的散文,类乎宗教典籍经文,但有节奏感,朗读时产生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克洛岱尔像米肖、谢阁兰,也醉心于中国文字,但更令他陶醉的是中国诗词。他曾翻译李白、贺知章、李清照等人的诗词,并化用他们的诗篇进行

---

① [法]毛磊(Pierre Morel),黄荭译:《在双方的对话中认识自己》。

② 钱林森:《法国作家与中国》,第434页注①。

创作。12 年的中国之行,对他创作影响最大的是唐宋诗词,这一切主要体现在他翻译的《根据中国短诗而做》上。这个诗集中有中国诗词 40 多首,曾先后分别发表在《巴黎杂志》、《费加罗文学报》、《法兰系水星》、《新评论》等刊物上。除了部分直译、意译的诗篇(如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贺知章的《回乡偶书》外,他的译作掺杂了太多的随意性,有些译作甚至面目全非。但我们与其说是诗人随意的改写,倒不如说是西方的一位诗人在利用中国的诗歌这个载体在进行自己的创作,抒发他的情感。

克洛岱尔也像米肖,迷恋于《老子》、《庄子》,他也曾以庄(子)老(子)来解释诗歌含义。他喜欢庄子寓言,并将混沌开窍、黄帝失珠等的故事巧妙地运用到自己的作品中去。他还多次在不同场合利用《道德经》,尤其是其中的第 11 章的内容,或进行创作,或阐发自己的艺术观点。他所以注重老庄哲学,主要是他对老子的"有""无"观念感兴趣,同时也是以此为基础对中国艺术思想,主要是诗歌与绘画进行阐释。此外,他对中国的禅、儒也有了解,特别是对园林、寺院、陵墓等的描写和产生的一种哲理的思考。

他的《认识东方》、《画扇帖》出色地体现了追求东方美学和以东方题材进行创作这一特点。

散文诗集《认识东方》(1896)是一部描画神秘东方的散文集。这位一向神往东方文化的法国诗人,以外交官身份在这个神秘国土逗留期间,游历了华夏大地的众多的地方。每到一处,都令他迷恋,遐想联翩。他怀着好奇心凝视着无数园林、宝塔、树木、泉水、寺庙、陵墓、戏台、节日奇观。虽然每当亲眼目睹鸦片战争后满目创痍的中国底层社会时总是感慨万千,但古老国度的自然与纯朴始终让他觉得亲切,亲切得就像"前往观看上演自己编写的剧本"那样。于是,日积月累,诗人便将自己的见闻及感慨以散文诗的形式,运用纯净、富有音乐性的语言精心描绘下来,成为"一组异域剪影",这就是《认识东方》。有评论认为,就与中国的关系和对中国的认知来说,他跟谢阁兰不一样,谢是一位在中国找到自己创作灵感的法国作家和诗人,而克洛岱尔还只是"停留于中国门楣之外",[①]作为天主教西方作家的他,在中国面前"震惊、痴迷","戛然止步",但同时这个世界上最有巴罗克格调的国度,在这位具有巴罗克风格的法兰西作家的"心灵深处"仍

① [法]毛磊(Pierre Morel),黄荭译:《在双方的对话中认识自己》。

然"唤起了某种默契"。[①] 他的作品《认识东方》,虽然有些章节难免存在误读,如关于"弥勒佛"的阐述,而有的章节则"不啻为绝妙好辞",如关于风景,关于这个在中国极其崇尚、被他称为"符号的宗教",这些文字有它的"现实性"。[②] 在这部作品内里,诗人让我们看到了一幅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往昔凝定画面。[③]"东方"是中国的代称呼,出现在作者的作品中,不仅提供了他终身创作的背景,同时客观上引起了法国人东游的兴趣,以致有人认为《认识东方》一书导致了一场法国文坛的中国热,开始了诗人作家来中国旅游,寻找创作灵感和题材的新纪元。

在《画扇帖》中,作者用毛笔模仿东方的象形文字,书写西方的拼音文字,并利用笔墨之间的空白和文字组合所形成的外形,表达了诗歌的主题。在"le serpent"(蛇)这首诗中,诗人把"serpent"的开头字母"s"夸张地描绘成一条蛇的形状,给人具体形象的直感;在"Eventail"(扇子)中,他模仿东方扇子的形式,来设计诗的物质外形,表现了扇子所扇的凉风,就像是"精神随风"而来这一寓意;在《窗霭》(Fenêtre)中,诗人利用笔墨之间的空白、文字组合的外形和所包含的内容,表达了诗人脑海里独特的"清晨"意境。让我们具体来看看《窗霭》(Fenêtre)这首诗:

窗　Fenêtre　au lever du soleil
霭　quis' o　uvre dan
slebr　ouillard
blan　cunpay
sdebraise et de
fe
u

诗的右边是诗人用毛笔书写的中文和法文的"窗霭"Fenêtre 这个字,左边是用法文写的诗句。诗的书写形式明显地留下一个方块形的空白,让人很自然地想象出诗人思想中"窗"的具体画面和诗歌所要表达的意境:

---

① [法]毛磊(Pierre Morel),黄荭译:《在双方的对话中认识自己》。

② [法]毛磊(Pierre Morel),黄荭译:《在双方的对话中认识自己》。

③ Jacques Madaule, *Le Genie de Paul Claudel*, Paris, 1933; Jacques Madaule, *Le Drame de Paul Claudel*, Paris, 1947.

一个窗口和火红的太阳，还有一层白色的晨雾。显然，方块形布局中所展现的早晨景象，是诗人脑海中的“晨景”表意。

我们可以说，《画扇帖》是法国现代诗形式表意化最出色的一例。作为一个长期生活在东方（日本和中国）的法国外交官和诗人，他所接触到的东方文化，尤其是东方的表意文字的书写形式给了他无穷的启示和灵感，使得这个本来就对符号就情有独钟的诗人，产生了将诗歌的“形式”变成诗人“意境”的想法；同时，作为一个由西方文化抚育成长起来的诗人，他又喜欢对西方诗歌的“叙事方式”作进一步地的探索研究，并希冀将这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因此，我们说，实际上他的诗歌创作是东西方文化碰撞、交流、融合的结晶。

无论是中国诗歌还是外国诗歌，压韵、节奏、诗的分节等都会造成不同的艺术效果，给人不同的美学感受，或有力，或温柔，或紧张，或此时无声胜有声等，同样，中国书法的外形也不仅仅只是一种书写的形式，而同时会让人们从形式的变化中解读出书法家变化无穷的内在世界，引起人们无穷的想象。我们知道，立体三维（长、宽、高）比较实在，看得见，摸得着，计量得出来；第四维度（时间），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可以计算，也比较实在；而第五维度（意境）呢，它却是既看不见，又摸不着，更无法计量，它虚无缥缈，无法言状，但它又确实存在于人们的脑海之中，它无边无际，可以在过去、现在、将来之间无拘无束地跳跃，突破了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时空概念，它是无限的又是不定的，可它又不是孤立的。中国的诗人总是喜欢把实境和虚境结合起来，以实写虚，以虚写实，相辅相成，启发读者的想象力，把诗中的意境开拓得更深更远，妙趣横生，令人神往。从某种角度来说，克洛岱尔领悟了中国诗歌创作的奥秘，他的诗歌创作中的这种“分行”或“突然割断”一个字的内部结构，词汇、诗句和整部作品结构的变化等也都不同程度地包含着内在意义的变化。诗人的意思是说：一本书的外形同样表达了他的内在的灵魂，形式道出了它的内在思想，映入眼帘的外部形态其本身就包含着我们可以读得出来的思想内容。也就是说，诗人在探索诗歌外形变化的同时，也在探索了作品的哲理含义。[①] 因此，对于克洛岱尔《画扇帖》，如果我们不读懂它诗歌的外形，也就无法理解它深层的意境和哲理含义。

① 关于《画扇帖》，参阅的是朱静女士的看法，因没有找到她的文章，特作这样交代。

三、谢阁兰和中国题材创作

维克多·谢阁兰(Victor Segalen,1878—1919)是另一个古老东方文明的探索者,一个以中国题材写作而独树一帜的作家汉学家。他受克洛岱尔影响很深,是后者指引他走向中国之路,但又跟克洛岱尔不同。如果说克洛岱尔"滞留在中国的门槛"的话,那么谢阁兰则是"跨过了这道门槛,投身其中去再塑自我"的法国诗人。[①] 他在中国"找到了主题","找到了激发灵感的东西"。[②] 他学习汉语,每天都坚持,一心想成为文人学士。他"竭力想穷尽中国文化,直至心有余而力不足"。[③] 正是这种孜孜不倦的求索使他成了一位现代作家,并慢慢引起读者的关注。

谢阁兰生于法国西部滨海城市布勒斯特,大学年代就读海军医学院,专攻医学,却爱上了文学、艺术,并先后结识诗人圣-保·鲁(St.-Pol Roux,1861—1940)、作家古尔蒙(Remy de Gourmont,1858—1918)。毕业后,作为医生,曾在南太平洋法属塔希提岛工作一个时期。1902年10月,他横渡大西洋,到了纽约、旧金山,抵达南太平洋的法属波利尼西亚正式任职。他在那里工作,同时搜集高更(Paul Gauguin,1848—1903)的遗画和醉心当地于毛利人饶勇善战事迹及其传统艺术,从而写下小说《远古人》(*Les lmmemoriaux*,1907)。回国不久又写了一部富有神秘色彩的《奥尔菲王》(*Orphec Roi*,1921)。后因将被派往中国任海军译员,学习汉语,于1909年来到中国。到中国后,随即结交在天津任法国领事的诗人克洛岱尔。1909至1917年,他在中国任职并旅游观察各地风光。1912年萌发以"碑"写作诗歌念头,诞生了散文诗《碑》(Stelles)。此外,他还写有《中国西部考古记》,小说《天子》、《勒内·莱斯》,散文诗《画》、《出征》、《一条大江》和《西藏》,戏剧《为土地而战》等,所有这些作品,都深深地植根于华夏文明,渗透着中国文化之水。

谢阁兰所写的并不是真实的中国,他也无意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这个古老国度的"异国风情",他描写的是一个虚构、幻想的中国,是试图借用这个富于东方神秘色彩的国度,来探索、展现他自己这个西方人的心灵历

① [法]毛磊(Pierre Morel):《在双方的对话中认识自己》。

② [法]毛磊(Pierre Morel):《在双方的对话中认识自己》。

③ [法]毛磊(Pierre Morel):《在双方的对话中认识自己》。

程，一句话，他是试图“借华夏文明，发西人幽思”。他的作品无论哪一部，都无不饱含着这样独特的“中国情结”，我们以诗歌《碑》为例，来看一看他的创作特色。①

诗《碑》的最大特点是象征性，诗人无处不在借助华夏文明，但又找不到哪一处是在描写真实的中国。

首先，诗人为何采用“碑”的形式来写诗，其用意是耐人寻味的。1909年，当时这位年届30的海军医学院毕业生，在南太平洋法属塔希提岛工作过一个时期以后，因将被派往中国任海军译员，便在东方语言学校学了一年汉语，然后便来到中国。从1909至1917年，除了在北京、天津、南京等地担任译员、医生、客座教授等工作之外，他主要就是同友人一起观光、考察了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四川盘地、长江流域等地。在旅游、考察过程中，诗人发现，在中国，无论是名山大川，古刹胜地，或是市野路旁，举目所及，到处都竖有石碑，或镌刻着武功胜迹，或记载着游人行踪雅趣，尤其是当他看到西安“碑林”的那种壮观情景时，这个对文学作品形式极其敏感的诗人，顿时对“文字与石头”，“文字”、“石头”与“永恒”产生了无穷的联想，于是便萌发了以“碑”的形式来写诗歌的念头。我们可以看到，在《碑》的序言中，诗人对碑的起源、演变、体制和语言风格有过一番详细的考察和表述，这些考察和表述表面上看来是在说碑，实际上是诗人在论述自己诗：“这是一些局限在石板上的纪念碑，它们刻着铭文，高高地耸立着，把平展的额头嵌入中国的天空”，它们“记载着一件事、一个愿望、一种存在，迫使人们止步佇立”，面对着这些石头，“在这个破烂不堪、摇摇欲坠的帝国中”，只有它们才“意味着稳定”，这些“石头的思想”，“不表达”，却示意着“永存”，“一切都依然如故，祖传的功能无一损失”。正如中国人所树立的“碑”能使文字不朽，使瞬间成为永存一样，诗人也是试图用自己的“碑”诗来刻录心声，歌颂永恒。

诗“碑”的坐向所体现的方位意识，同样具有象征意义。《碑》共有64首，有“南面”、“北面”、“东面”、“西面”、“路边”和“中央”六个部分组成，

① 这里对《碑》的介绍和分析，主要参考如下有关资料。钱林森：《法国作家与中国》；秦海鹰：《古金碑录·序》；梅斌：《法国的马可·波罗》，《勒内·莱斯》译后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郭宏安：《评“勒内·莱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Victor Segalen*, reunis par Jean Balcou et Yves Leroy, Universitéde Bretagne Occidentale, Faculté des Lettres et Sciences Sociales Victor - Segalen, Centre de Recherche Bretonne et Celtique, Le Quartz de Brest.

通过每一个方位,诗人都表达了自己对某些事物的看法。诗人认为,“南面”的坐向与帝王圣贤有关,他通过对天子、圣贤等的思考,抒发了自己对宗教、政治和永恒的看法;“北面”是友谊篇,诗人以火一般的热情赞扬了朋友之间不渝的友谊,否定了失信、猜疑和背叛行为;“东面”是爱情、青春篇,诗人认为,东方的黎明将会“美化”爱情和友谊“最柔和的轮廓,也使凶恶的轮廓变得柔和”,在这里,诗人描写了各种特性的女性和她们的外形美,同时对爱情中的苦涩、失望和怨恨表达了自己的感叹;“武士英雄之碑,面向血红的西方”,所以“西面”是英烈篇,在这里诗人记载了英雄豪杰、忠臣义士的事迹,同时对死亡、战争发表了自己的感叹;“路边”之碑“依照道路的随意走向而立”,它对路过的行人袒露了自己的心扉,诗人随看到的事物展开想象的翅膀,抒发自己的杂感,所以被称为杂感篇;“中央”是心灵篇,也是各路的汇合点,诗人认为是“最杰出的位置”,全诗核心,他运用道家的理论对无所不在的“无”和“空”做了哲理上的探索,表达了诗人心灵深处最奥秘的部分。

可以看出,诗人的这种方位意识,与我国阴阳五行意识有某种联系。我国以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为基础的五行意识,最早见于《尚书·洪范》和《礼记·月令》,诗人曾经读过这两部作品的中法文对照本,无疑受到了影响。问题是诗人并没有机械地借用,而是从中得到启示,为我所用,加以发挥,让其发出新的光彩。中国阴阳五行的要义是把整个世界、整个宇宙和万物的变化都统一在一个由这五种元素组成的普遍对应体系之中。诗人似乎既领悟到了其中的真谛,但又没有囿于这种意识,他在“五行”中增添了一个要素,以“六方”来概括整个宇宙和万物变化,抒发自己对人生的看法,其中“路边之碑”就是诗人独创的一个坐向。因此我们说,他的方位意识与中国石碑的座向和五行意识既有内在的联系,又不是机械地一一对应。

诗《碑》中大量引用的中国典故,更增添了作品的象征色彩,并使诗人的艺术追求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据统计,《碑》中确切出处的典故有32首之多,被引用的中国典籍有《诗经》、《史记》、《左传》、《尚书》、《列子》、《礼记》、《金史》、《道德经》、《淮南子》、《论语》、《古文苑》等;涉及的内容也十分庞杂,从中国神话、传说到史实、人物、习俗、礼仪,无所不包,无所不及,如穆王西征见西王母,唐太宗论“三鉴”,钟子期和俞伯牙,儒家的五伦,道家的无为,《唐书》中的张巡,《金史》中的完颜陈和尚等,有许多连中国的读者也不熟悉。诗人引用如许的中国典籍,是在做汉学研究?是以

此来炫耀自己渊博的中国知识？或是像当时风靡欧洲的许多游记那样，向西方的读者述奇，报道这个东方神秘的国土荒诞故事？都不是。我们说，诗人既不是在做汉学研究，也不是在介绍中国，更不是在向西方人述奇，他是在做他的艺术寻求。

不可否认，谢阁兰有着丰富的中国文化知识，作为一个考古学家，他撰写过为数不少的有关中国陵墓建筑和雕刻艺术的论著，并一直为行家所称道（20年代冯承钧先生曾翻译过他的《中国西部考古记》，商务印书馆出版），作为一个文学家，无论是他的小说、诗歌，还是散文诗，都深深地植根于华夏文明，渗透着中国文化之水。但是，正如我们前面所提到的，这位作家、诗人和汉学家的所有文学作品都不是在写真实的中国，他引用如许的中国典故，也不是在展现自己的中国知识，而且有评论已经提出这样的疑问，谢阁兰的汉学水平是否已经达到能自如地运用如许的中国典籍？这种疑问是值得重视的。的确，即便是同样作为汉学家的谢阁兰，他的汉学功底也未必达到自如运用如许中国典籍的水平。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当我们在阅读诗歌中的有关典故时，不难发现，他的理解有时与典故的原意并不相符。而如果因此有人认为，这是诗人犯了“望文生义”的错误，那也大错特错。其实，诗人并“无意”确切理解典故的本意，也谈不上“望文生义”，他是在借用中国的典故抒发自己的情意，这也正是《碑》所提供给我们的艺术启示的实质所在。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他所写的四部有关中国的作品得到印证。正如有的评论所指出的，作为一个以中国题材进行创作的法国作家和诗人，谢阁兰主要通过这样的四部作品通向中国，而这四部作品所写的都不是真实的中国，而是一个诗人“幻想”出来的，实际上并不存在的“神奇、空灵”的中国。《画》，所展现的是诗人在一幅幅中国画前面所产生的神奇的幻想；《远征》，诗人极力在一个“现实的国度”和一个“想象的国度”之间架起桥梁；《勒内·莱斯》，所展现的是一幅关于紫禁城的神秘、幻想的故事，诗人虽然从未把足迹印在这块禁地之上，却凭借想象的翅膀，把目光投向了宫墙之内的种种风云变幻；《碑》，则是诗人通过中国古代山川风物，幻想出他梦寐以求的中国，作西方人的美学和哲学思考。

说到底，这位在青年时代就受过尼采超人哲学和兰波神秘主义诗学影响的法国诗人，他的趣味、他的诗歌底蕴仍然是西方式的。更准确地说，他是在保持西方诗人的个性和追求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地吸收中国文化，让西方的底蕴与东方的文化发生撞击，使其喷发出奇异的火花，从而产生新

的反响和寓意。在《碑》中,诗人没有对中国景物做印象式的记录,更没有对中国的现实或历史做客观的描写,中国的现实,中国的历史,中国的风土人情,皇陵、园林、黄土高原,都已褪去了它的真实性,乃至中国的神话、故事也都变了形,成了一个"喻体"、一种"形式"和一个"托词",而诗人的"精神探索"才是一个真正的"本体、目的"和"实质"。他的诗并没有中国古典诗歌常见的那种清新自然的情趣和隽永飘逸的意境,更多的则是西方诗人的明理和思辨。诗人让"中国"作为他的隐喻"依附物",在风物、近世、现存、幻觉、感知、美、灵、远古、已逝、未来、未知等所构筑成一个奇异、神秘、梦幻的国度里,进行着艰苦的精神跋涉,抒发着他对宇宙、人生、瞬间、永恒的思考,表达了对美、理想的苦苦追求。这些追求和思索,既是哲理的又是现实的,既是理想的又是实际的,既是古代的又是现代的,但更多的则是现代的,是现代西方文明大厦崩裂时,西方人把求救的目光投向东方古国——中国时所发出的一种心声的反响。

大凡艺术创作最初总得有个依附体,或者说,启发作者灵感的实体,但是艺术的最终结晶体跟原来的依附物之间,已不能用一一对应的方法来找出它们之间的关系,因为这个艺术的最终结晶体已是一个与原来的依附体不甚相同的新的艺术实体。在诗《碑》中我们可以看出,诗人是意识到这一点并且极力在作这样的艺术追寻。正如他在来华之初所写的游记《砖和瓦》中所说的,他的作品之于中国,并不在于说出"我对中国人的看法",更不是在"可笑地模仿文献资料",而是意在说出"我对他们的想象","创作"出"超越一切现实的"、"活生生的"、"真正的艺术品";他在给德彪西的信中也谈到了这一层意思:"实际上,我来这里寻求的既不是欧洲,也不是中国,而是中国的幻想。"是的,谢阁兰的作品处处有中国的影子,但是又哪一处都找不到真实的中国,他在观察中国,却无意描写中国,他是旨在进行艺术创造,创造出一个"幻想"的、"超越现实"的、"完全崭新"的、"活生生"的、"真正"的"艺术品"。

《碑》的形式和语言也十分耐人寻味。1912 年初版在北京刊印发行时,诗《碑》用的是高丽纸装帧成的折迭形式,全诗的六个部分,每部分的右上角标有几个汉字作为"题记",其中"古今碑文"为隶书,各个方位为草书,而所有的"题记"则是正楷,这种形式上的变化和方块字的运用,对于习惯于阅读拉丁字母的法国读者来说,既产生了一种陌生感和神秘感,但同时也增加了他们的阅读兴趣,引起他们有关中国的许多联想。《碑》的

语言在一定程度上也借鉴了中国古典诗歌的句式和特点：简洁、凝练，诗人喜用双关语，增添了作品的含蓄性，也使其更具象征色彩，大量短句、省略句、并列、排比的运用，注重句子的节奏感而不讲究严格的对仗、押韵等，似乎使碑诗更像中国古典的散文，而不像古典诗词。

我们不妨退一步说，诗人在我国游历期间，无论是空间和时间方面自会受到种种震撼和启示：直指天穹的山岳，滚滚东流的江河，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博大精深的精神财富，满布各地的文物和古迹，不仅源远流长而且极尽华美。凡此种种，只要读一读他的论文，便可看出诗人对中国古代文化的钻研之广与精神上受用至深。以诗而论，谢阁兰既是克洛岱尔的爱好者，又是圣－琼·佩斯（St. John Perse，1887—1975）的先躯。就文而论，不幸他壮志未遂，于1917年返国之前，就是说在第一次大战后期，主动受命在北京筹建法国汉学研究所，奔走于巴黎，因而积劳成疾，终遭不测。据说，不是自尽，恐怕也是勤奋过度以致身心交瘁、死于故居密林中树荫之下，手中还握住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

诗人生前始终业余写诗，不求闻达，态度严肃。1926年发表的遗作《赞歌》（Odes），受到好评。他的全部诗稿也就相继经他的后人和学者整理一一公之于世。其人其书，三十年来引起普遍而深入的研究。法国文评界公认他是当代法国最富于特色和吸引力的诗人之一。他开创的新诗样式影响很大。《远古人》、《勒内·莱斯》两部小说对法国当代小说具有先驱性的启示。至于他留下的考古遗篇进一步激起西方研究我国两汉、萧梁和历代墓葬石雕艺术的兴趣。总之，谢阁兰在20年代除在中法两国文化交流方面所起的独特作用而外，他终究以独特的诗人闻名于世，他的诗，如果不具有绘画的技法和临床医生的精确性，如果对我国古代优秀思想文化不持有独到的见解，也许就不会直至今日仍然在各大洲的当代诗人中不断引起反响。

如果说在《碑》诗和《远古人》问世以前，异国情调已风行于法国文学，那么谢阁兰的诗和小说以及写于中国、取材于中国的历史人物和山川乃至宫廷轶事而留下的游记，则在法国当代文学中横扫了所谓变换环境，寻求一己的愉快，或以殖民主义者睥睨被奴役的人民而表现出的种种倨傲和猎奇的心态。谢阁兰的全部作品确实塑造了他自己的形象：无论以诗人或以考古学家或以汉学家还是职业医生面目出现，每部作品都给读者留下做客异域的诗人流连忘返的那种神秘性。

第五章
法国汉学(中国学)的发展(下)
——二战后的法国汉学

第一节　从困境中走出的法国汉学

相对于20世纪上半期来,二战后的法国汉学情况比较复杂,既是一个经受众多磨难和挫折,又是迅猛发展、繁荣昌盛的时期,我们可以称之为是一个"纷繁多变,多元化状态"的局面。

二战使法国汉学遭到了严重的摧残,老一辈的汉学家或受到了迫害,或病故,法国汉学日见衰微,一度处于低谷。但在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带领下,逐渐走出困境,获得复苏和新生。

显然,这一复苏和新生跟这一时期的政治背景密切相关。我们知道,自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便对中国采取了封锁政策,戴高乐将军高瞻远瞩,率先打破僵局,于1964年与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中法两国的建交,不仅极大地增进了两国人民的友谊,促进了相互间的往来,同时也给法国的汉学带来了生机。在戴高乐将军的倡导下,官方与民间的往来日趋频繁,各种层次的文化对话不断增加,于是,法国汉学研究再次获得了生机,得到了发展。在这一大好的形势下,当时就有一批年轻的学子来中国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同时在中国大学里任教法国语言与文学的教学或科研工作。这一批年轻学子回国以后,大都在各个汉学教学和研究机构中担任重要工作,成了汉学研究队伍中的骨干,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在这背景下,一度处于沉寂的法国汉学又迎来了喜人的春天。

但是,这种可喜景象不久又因1966年中国本土的“文化大革命”而遭挫折。面对着这场人类文化史上空前的浩劫,一些汉学家,或忧虑、惶惑,或继续默默耕耘,但难以开拓;而另一些汉学家,虽然直接关注了这场运动,并著书立说,发表自己看法,但终因无法了解当时中国的真实情况,做出客观而公正的判断。当然,在西方,也有一些观察到“四人帮”谎言的学者,但当他们在自己的著作中披露了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真相时,又往往被斥为反动,所以也难以发挥作用。因此,这一时期的法国汉学研究虽然从表面上看起来似乎仍然十分热闹,出版的著作和发表的文章也为数不少,但实际上其学术气氛十分沉闷。直至70年代末中国的“开放政策”的实施,法国的汉学(诚然也包括整个西方汉学)的这种困境状态才有了转机。80年代以后,尤其是90年代,随着中国开放政策进一步深入开展和中国自身经济的腾飞,西方也再度出现“汉语热”、“中国热”,法国的汉学又出现一个崭新局面,取得了以往任何时期所未曾有过的巨大成绩。这一情形一直持续发展至本世纪,至今方兴未艾。

在汉学研究的视野和观念方法方面,法国汉学素来以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化底蕴著称,是西方“传统”汉学的“中坚”,但是这种被研究者称之为以“四书陶养成器”法国汉学,对于中国现状的研究,从18世纪法国传教士的汉学研究起就是弱项。战后,虽然有戴密微为首的汉学家们的开拓,但是,随着美、日、苏中国研究的崛起和观念的日益更新,法国的汉学面对着接受过“政治、经济学训练”的“新兴势力”的冲击,在相当一个时期内仍然显得步履艰难,难以适应。

在犹豫中固步不前,还是急起直追,另辟蹊径,开拓出新的研究路子?法国汉学面临着新的危机和挑战。面对着这场挑战,法国的汉学家们没有停步不前,也没有固步自封,他们义无反顾地进行了反思,尤其是1978年戴密微去世以后,他们更深切地体会到改变现状的迫切性和使命感。汉学家桀溺(Jean Pierre Diény)教授就这样检讨过:“世界平衡局势已有变更与中国时正觉醒,同时欧洲亦开始自我怀疑,失去自信,甚至影响到19世纪以来之学院传统,汉学方面亦须放弃已往之欧洲中心成见,必须重新考虑研究对象,更须自谦、真实与同情。不久,美国大学汉学中心将使古老欧洲研究机关渐渐减色,苏联亦不消极。又应注意一显然事实:不读日文汉学著作,则汉学成果终不免疏漏,际兹旧学催萎,新学分散,法兰西汉学取何

新姿态?"[1]桀溺道出了二战后欧洲和法国汉学所面临的困境和汉学家们的忧心。

诚然,战后的法国汉学家们并没有在挫折中消声匿迹,也没有在新的挑战面前退却。他们面对着新形势,努力改变着研究面貌。二战后的法国不仅又建立了一批新的汉学教学和研究机构,同时,汉学家们在进行了反思以后,把目光也从古代中国转向了当代的中国。随之而来的是研究思路的变化,汉学家们开始注意引进现代哲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尤其是年轻的一代,思路更为活跃。于是法国的汉学开始从二战前的重古代和文献学(或语文学)[2]转向重近现代和社会科学(含人类学)。尤其是80年代后,随着中国的开放政策实施和经济腾飞,更为法国的汉学家的研究打开了更为广阔的天地,法国的汉学研究和教学又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众所周知,法国汉学家队伍不仅阵营强大,且汉学家们一向治学谨严,这也为战后法国的汉学的重振提供了厚实的基础。正如有评论所认为的,一般人都认为,美国汉学的迅速发展令欧西各国"望尘莫及",但评论者认为,法国汉学家一向具有"稳打稳扎","勤耕勤耘","一片愚诚"的治学精神,正是这一精神,使得法国汉学能取得"可观收获",也正是这一精神,使得法国的汉学家们能发扬"光大"这一门"学问"。[3]

战后法国的汉学总体情况大致可归纳于如下几点:

首先是,近现代与当代中国研究的兴起。

法国汉学家对中国近现代与当代历史,甚至现状研究的兴起始于50年代末60年代初。当时有一批研究人员,如学者谢诺(Jean Chesneaux)、语言学家李嘉乐(A. Rygaloff)、文学研究家于儒伯(Robert Ruhlmann)、比较文学教授艾琼伯(René Étiemble)等,竭力主张突破传统汉学研究范围,把目光投向近现代和当代的中国。于是谢诺身体力行,亲自撰写中国现代革命和社会问题的作品,李嘉乐积极倡导现代汉语研究,于儒伯从研究中国古典文学转向现代,艾琼伯从比较研究角度出发,提倡加强对各国现当代文学的比较研究。显然,他们的主张符合了国际汉学研究的大潮,也是从实际工作需要出发,所以在汉学界,尤其是年轻学子中引起极大的反响。

---

① 转引自钱林森:《法国文学在中国》,导言。

② 尽管葛兰言在把社会学引进汉学研究,在汉学研究上也是一大创举。

③ 陈祚龙:《浅评简介法国的汉学研究》,《书目季刊》23卷,第一期。

于是,20 世纪的法国汉学界,一种新学术风气开始形成,法国的汉学研究开始从传统走向现代。与此同时是一些专门研究近现代或当代问题的机构应运而生,其中最早、规模最大的是 1959 年建立的"当代中国研究文献中心"(Centre de Recherche et de Documentation sur la Chine Contemporaine)。可以说,该机构的建立标志法国汉学研究进入新的阶段。接着是 1960 年"东亚语言研究所"(Centre de Recherches Lingistiques sur l' Asie Orientale)和 1975 年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成立"中国研究中心"(Centre d' Etudes chinoises)。此外,当时成立的还有巴黎第八大学的"汉学综合研究所",尼斯大学的"中国研究中心"等。这些中心的研究内容都以中国现当代内容为主,范围涉及社会、政治、经济、历史、语言、文学等诸多领域。这些机构的建立为法国现当代中国研究打下了厚实的基础,直至本世纪,这些机构仍然是法国现当代中国研究的顶梁柱。

随着新的研究课题的提出和相应机构的建立,是一支研究队伍的形成。从 60 年代初开始,法国汉学界便出现了一批上述各领域的专家学者,并在世界汉学界赢得了声誉。如在历史和社会问题方面的有:以研究中国清末历史和教育为主的巴斯蒂(Marianne Bastid Bruguière),重点研究中国资产阶级和经济问题的白吉尔(Marie Claire Bergère),对中国革命有着浓厚兴趣的比昂高(Lucien Bianco),对中国当代问题感兴趣的卡达尔(Claude Cadart,也译高达乐)和夫人程映湘,从重点研究明代转向中国财政制度、人口问题的卡蒂埃(Michel Cartier)和研究中国革命和社会问题的鲁林(Alain Roux);在文学语言方面的有:研究老舍和北京方言的巴狄(Paul Bady),以研究鲁迅闻名的卢瓦(Michelle Loi),对现代汉语语法和语音研究的李嘉乐,探索现代汉语研究史的贝罗贝(A . Peyraube),研究现代汉语语法和字汇的艾乐桐(Vivianne Alleton)等。

第二,传统汉学的反思和发展。

从 60 年代初期以来,正当许多年轻的研究人员把注意力转向了近现代和当代中国研究的时候,法国早已自成体系并在国际汉学界一直处于领先地位的传统汉学并没有停滞不前。60 年代以来,一批由老一辈汉学家培养起来正处于事业大发展阶段的传统汉学工作者主动反思,急起直追,努力改变着自己的思路,同样取得比以往更加可喜的成绩。其中以谢和耐(Jacques Gernet)的成绩最为突出,此外,还有专攻中国古典文学的吴德明(Yves Hervouet),以研究中国古代政体和政治思想为主的汪德迈(Léon

Vandermeersch),擅长道教研究的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专于研究中国青铜器和瓷器的毕雪梅(Michele Pirazzolti - t' Serstevens),以翻译中国古典名著著称的雷威安(André Lévy,莱维)、谭霞客(Jacques Dars)、李治华(LI,Tche - houa)、程纪贤(Cheng Chi - hsien)等,都取得前所未有的成绩。

从70年代开始,法国传统汉学研究还出现了一些新的气象。学者们打破了长期独立研究或者师生相传的传统,组织起一些"专题研究组",发挥了集体的智慧和力量,集思广益,做出比个人更大的成果。如苏运鸣(Michel Soymié)领导的"敦煌文献及有关资料研究组",施舟人领导的"道教文献研究中心",侯思孟(Donald Holzman)任组长的"中国历史和文学研究组",还有曾为法国汉学做出过贡献的法国耶稣会传教士的汉学机构"利奇研究所"也仍然在发挥作用,在法国汉学界占有一席之地。

此外,正如我们在谈到法国19世纪汉学的特点时指出的,在研究方法上,法国汉学有一个明显的特点:"注意了跨国和跨文化的比较研究"。战后部分法国汉学研究者明显地继承了这一传统,他们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把对中国的研究与受汉文化影响的周边国家研究结合起来,并取得极大的成果。

第三,法国汉学的"光大"和"可观收获"。

随着上述两件事情的发展,接着是战后法国汉学面貌的巨大改变。诸如,在中国历史、社会研究方面,汉学家们改变了过去只对元之前中国感兴趣的局面,把目光关注到了近现代的中国,尤其是70年代后期开始,部分从事中国近现代研究的学者,还开始对中国现实情况发生浓厚兴趣;在中国哲学研究方面,随着法兰西学院"中国社会文化史"讲座的开设,尤其在1975年后,法国的中国哲学研究也开始羽毛丰满,在儒、道、佛教方面都取得长足发展。一个令人感兴趣的现象是,中国哲学在战后的法国,主要是80年代以后,不只是学者的"领地",而是有着广泛的大众基础;在文学语言方面从50年代开始,到了七八十年代,出现了中国古典诗歌、中国古典小说和中国现当代文学三大热点;战后法国的"汉语热"既体现在汉学家们对汉语的研究,更大量的则是体现在广大法国汉语学习者的热情上。

总地说来,战后的法国汉学无论在研究的视野、规模还是思维方法上,都有明显而重大的变革,从50年代末兴起的当代中国学研究使得长期形成的法国汉学研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尽管由于国际战略地位以及在人力、才力的投入上,法国的当代中国研究要稍逊于美、苏、日等国,但是法国

的汉学悠久的历史和雄厚的实力使得法国汉学能仍然保持自己的特色和专长，并在国际中国学界享有应有的声誉和地位。战后的法国的汉学虽然经受了种种磨难和困境，但它仍然是世界汉学队伍中的一支劲旅。

第二节 二战后的法国汉学家

二战后的法国汉学虽然曲折多变，纷繁复杂，磨难颇多，但同时也是个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时期，出现了众多著名汉学家，甚至世界级的大师。

一、汉学队伍的扩大和专业化

二战后的法国汉学虽然遭到极大摧残，但是，在天才汉学家戴密微的带领下，不仅排除了困难，走出危机，重显昔日雄风，同时，在他的培养下，一批有影响的汉学家也应运而生，重新形成了一支有实力的汉学家队伍，尤其是60年代以来，这支队伍更加壮大和富有实力。

战后法国的汉学家队伍中，有老一辈的汉学家，有中法建交后来中国学习和工作、回国以后从事汉学教学和研究的汉学家，也有70年代以后成长起来的年轻学者。但不管是哪一类，正如苏远鸣所言，战后法国的汉学家有个明显的特点，即：由于分工更细，研究更具体、更深入，促使每一位汉学家朝着“日益强化的专业化”方向前进，因此，像沙畹、马伯乐那样的“全才或几乎全才”的汉学家“几乎”难以找到。① 这也是为什么一些研究者认为，在论述战后的法国汉学家时，更多的总是围绕着“研究领域”而不是从“人物出发”的原因。② 为行文方便，我们也将从专业分类对战后法国一些汉学家作一简要的介绍，而在每一专业分类中将以出生年月先后加以排列。③

社会历史领域。

---

① ［法］苏远鸣：《法国汉学50年》。

② ［法］苏远鸣：《法国汉学50年》。

③ 有关以下汉学家的生平和汉学成就，主要参阅《世界中国学家名录》（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外事局”合编，孙越生、李明德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中所收录的相关内容，同时也参阅最近几年来相关的资料、文章所提及和出现的汉学家介绍和评论，如［法］戴仁的《法国当代中国学》、［法］苏远鸣的《法国汉学50年》，黄庆华的《法国中国近代史研究》等。因战后法国汉学队伍阵容强大，人才济济，所以挂一漏万在所难免。

谢和耐是二战后继戴密微之后成就最大的汉学家,此外主要还有:

白吉尔(Marie - Claire Bergère,也译贝热尔,1929—　),巴黎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研究组主任,巴黎第四大学教授,"当代中国研究和文献中心"副主任及法国全国科研中心(CNRE)协作组第717研究组即"当代中国跨学科研究组"(ERA 717)①甲级研究员,东方语言和文化学院"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欧洲研究中国协会"(AEDEC)和"法国研究中国协会"(AFEC)会员,《中国研究》编辑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当代中国经济与社会史,尤以中国资产阶级和经济问题研究著称,著有《中国资产阶级与辛亥革命》(1911,1968)、《人民中国的经济》(1979)、《毛泽东逝世后的动摇不定状态》(1979)、《民族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1923年中国纺纱厂的危机》(1980)、《从1911年到1937年: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86)、《1949年至今的中国人民共和国》(1987)等。此外,还负责《辛亥革命资料》和"20世纪上海历史"研究组的领导工作,取得巨大成绩。

比昂高(Lucien Bianco,1930—　),毕业于巴黎国立高等师范学院文学院,获大学讲授历史学课程教师资格,后又获国立现代东方语言学校学位证书,曾在博韦市费利克斯-福尔公立中学、巴黎伏尔泰公立中学任教。1961—1969任法国高等实践学院课业组研究员。1969起任巴黎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研究主任,1977起任"法国当代中国研究和文献中心"主任,法国全国科研中心协作组第717号,即"当代中国跨学科研究组"组长。1971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访问教授,1972—1973美国安阿伯市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1980当选"法国研究中国协会"理事会理事。主要研究中国现代革命,是该领域的著名学者之一,著有《中国革命渊源》(1967初版,1987再版)、《西安事变》(论文,1968)等,与人合著、合编有《冷眼看中国》(1976)、《当代的印度和远东》(1971)、《国际工人运动传记词典,中国卷》(主编,1985),并在多种专业刊物上发表有关中国现当代的文章,如:《关于毛泽东学说定义的论述》、《有关中苏冲突的历史回顾及其前景》、《中国的新面貌》、《1919年至1949年的中国农民与革命》等。

卡达尔(Claude Cadart,也译高达乐,1933—　),"法国全国政治基金

---

① 法国全国科研中心第717号协作组重点研究课题有:1.城市社会,2.处于革命前夕的农村社会,3.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知识界妇女,4.人民中国的工业体系,5.1849年至1911年期间的法中技术合作。

会国际调查研究中心”(Fondation Nationale des Sciences politiques, Centre des Etudes et de Recherches Internationales)“中国与远东部”(Section Chine - Extrême Orient)[1]副研究员兼主任,法国全国科学研究中心实验室第99组(LA99)[2]负责人,“法国研究中国协会”会员,协会刊物《中国研究》编委。研究中国当代问题,著有《中国向何处去?》(1978)[3],《从中—苏战略计划到中美战略计划:新中国在探索一种能够产生全球性影响的战略》(1979)、《周恩来:伟大的爱国者》(1980)、《北京的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1981)、《中国和阿富汗冲突以及柬埔寨冲突》(1982),《彭述之回忆录:共产主义在中国起飞》(1983),《中国的战略,又名龙的蜕变》(1986)[4]等。

巴斯蒂-布律吉埃尔(Marianne Bastid - Bruguière, 1940—),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全国学科研究中心研究课题组长和“当代中国研究和文献中心”法国全国科研中心第717号协作组高级研究员,主持“1849年至1911年间的法中技术合作”项目。曾任欧洲汉学协会会长,法国高等师范学院副校长,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巴黎第七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研究所理事,巴黎第八大学中文专业委员会委员等职。主要研究中国清末历史和教育史,尤其是清末的政治与社会史,19至20世纪中国教育与文化交流史,也从事有关人民中国的教育与科研政策研究。著有《20世纪初期中国的教育改革概况》(1971)、《清代末期(1873年至1911年)中国社会的变迁》(1979),并写有多篇关于晚清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与教育发展的文章。还为美国汉学家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历史》撰写清末部分的章节,题为:《社会变迁趋势》。

魏丕信(Pierre - Etienne Will,维尔,1944—),格莱(杜河)人。曾在巴黎学习古典文学和中文,1969年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助研,1988年为该院教授,1992年主持法兰西学院中国近代史讲座。曾任“当代中国研究和文献中心”秘书长,比昂科退休后,接任中心主任。欧洲研究中国协会、法国研究中国协会会员。主要研究明清历史和中国历史上“救荒政策”问题,出版的《中国18世纪的荒政史》(1982),颇受重视,有英、朝、中文译

① 中心建立于1967年。

② LA是Laboratoires associés的略称。

③ 和夫人程映湘合著。

④ 与日本学者中岛岭雄合著,反映法国和日本对中国改革的看法。

本。90年代以来,重点研究明末到19世纪末中华帝国内部机制动能的运行,发表有多篇论文。1991年,与旅美华裔学者王国斌合作在美国出版《养民:中国1650—1850年仓储制度》。他对中国水利方面也颇有研究,他关注江汉平原、太湖流域和陕西省水利,出版有《中国的一项水利循环设施:从16世纪到18世纪的湖北省情况》(1980)一书,并发表有多篇论文。

米歇尔·卡蒂埃(Michel Cartier,1944—　),欧洲研究中国协会和法国研究中国协会会员。80年代初任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讲师,研究中国经济人类学,并曾担任法国研究中国协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兼司库。原来以研究明代情况为主,后来注重中国现代财政制度、农业、人口统计、饥饿等问题。1982—1983参加当代中国研究和文献中心的教学项目,主要讲题为"从传统的经济思想到现代的理论"。著有《中国的人口和制度》(1971)、《16世纪中国一个州的政治和财税制度》(1947)、《法国国立图书馆馆藏中文期刊目录(1984)、《中国:人口统计学状况》(1979)、《人口统学在人民中国的再生》(1980)、《未来展望,困难重重》(1980)、《人类统计学》、《就业的烦恼》等。

宗教、哲学和考古领域。

康德谟(Maxime Kaltenmark,1910—　),原名马克西穆·卡尔腾马克,康德谟是他的汉名。奥裔法籍汉学家。年轻时就读于查理大帝公立中学,后进巴黎大学文学院、高等汉学研究所,获法学学士和文学学士学位,又在东方语言学校主修汉、日语,获学位。曾任巴黎大学中法汉学研究所所长(1950—1953)、巴黎法国全国科学研究中心课题负责人(1955—1956),1957起任巴黎法国高等学院宗教科学部研究室主任,是"敦煌文献及有关资料研究组"最早成员之一。以研究中国宗教思想,尤其是道教思想著称,同时也从事文学翻译工作。出版有两卷本《制伏波涛的人》(1948)、《列仙传:古代道教仙人的传说传记》(1953)、《老子和道教》(1965,1969)等。文学方面出版有《中国文学》(1955)并参加吴德明和于儒伯主持的《蒲松龄(聊斋志异)选》的翻译工作。

石泰安(Rolf Alfred Stein,原名斯坦因,1911—　),犹太人,生于德国施韦茨(Schwetz)。曾在柏林大学读书,1934年因逃避法西斯迫害移居法国,1939获法国国籍。1940法国远东学院任教,1946—1949受学院派遣来中国实地调查。1951起任法国国立高等实验学院第5部即宗教科学部教授。1966起任法兰西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社会(重点在机构和思想

意识)研究,尤以藏学家著称。著有《西藏人占卜用的33根卜签》(1939)、《藏语词源学札记》(1943)、《"格萨尔传"的西藏画卷》(1958)、《有关西藏的史诗和吟游诗人的各项研究》(1959)、《汉藏边境的古代部族》(1959)、《拔协:一部古代编年史》(1961)、《西藏的戏剧》(1961)、《西藏的文化》(1962)、《一位西藏圣徒诗人》(1964)、《本教团体的象雄语》(1971)、《在敦煌一些藏文写卷中有关本教仪礼的叙述情况》(1971)、《瑜伽行者珠巴衮来的传记和歌吟》(1972)等。

苏远鸣,原名索瓦米埃(Michel Soymié,1921—),80年代初任巴黎法国国立高等学院第4部,即历史科学和文献科学部研究组主任,从事中国中世纪和近代文献史、日本文化、道教和世俗文学等研究,自从成为戴密微领导下的"敦煌文献及有关资料研究组"研究员后,开始转向佛教为主,戴密微逝世后接任研究组主任。主要著作有《道藏研究》第1-4①、《地藏狮子》②、《孔子和项橐的会谈》(1954)、《罗浮山:宗教地理学研究》(1956)、《单道开传记》(1957)、《中国的泉水和占卜地下水源的人》(1961)、《中国肖像画法手记》(1966)、《地藏的侍者们》(1967)、《法国汉学50年,1923—1973》(1973)、《道教辟谷的十天》(1977)、《敦煌道教文集》(1988)等。

毕雪梅,原名皮拉佐利-采尔斯蒂文斯(Michele Pirazzolti-t'Serstevens,1930—),毕雪梅是汉名。巴黎国立吉美博物馆高级馆员,卢浮宫学院教授,欧洲研究中国协会和法国研究中国协会会员。巴黎国立高等学院第4部,即历史科学与文献科学部研究组主任。主要从事中国考古学,尤其是中国青铜器和瓷器的研究,著有《根据云南石寨山的发掘对滇文化进行的研究》(1975)、《汉代的中国》(1982)、《公元2世纪的中国厨灶画》(1985)、《滇文化的年代问题》(1990)、《中国汉代皇家画坛,保护与收藏》(1990)、《滇王国的贝壳币与信誉良好的中国铜钱》(1992)等。

施舟人,原名席佩尔(Kristofer Marinus Schipper,1934—),汉名施博尔,又字舟人(施舟人)。曾在法国攻读中国学,后前往台湾省台南学习中文。法兰西学院附属法国国立高等学院教授兼教务长,该院第5分部,即

① 与日本宗教学家吉冈义丰共同编著,著作用日文写成,于1965、1967、1968和1971年在东京昭森社、丰岛书房、边境社等出版社相继出版。

② 用日文写成的佛教大乘菩萨地藏论文,载于日本茨木追手门学院大学文学部内日本道教学会出版的《东方宗教》,1962年第19期。

宗教科学分部研究组主任、"道教研究文献中心"主任和巴黎第十大学"民族学与比较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曾任欧洲研究中国协会秘书长多年。主要从事中国宗教特别是道教和自闽粤传入台湾岛的民间文学作品(尤其是潮洲纸影戏)以及比较社会学的研究,曾搜集纸影戏唱册旧唱本198册。著有《格林普斯的"列子"法译本》(1963)、《台湾之道教文献》(1966)、《道教仪注中的手书节略》(1974)、《"黄庭经"要目索引》(1975)、《"道藏"要目索引》(1975)、《道士的本体》(1978)、《"道藏"计划:"云笈七签"索引》(1981—1982)、《道教本体:身体,社会体》(1982)、《道教仪式中的目连戏》(1989)等。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他所主持的"《道藏》索引"[①]编辑工作和专著《道教的总体》。

侯锦郎(Hou,Ghin - lang,又作 Ghing - lang,1944—　),1973起在高等汉学研究所第438组(ERA438)即"敦煌文献与有关资科研究组"工作。欧洲研究中国协会会员。主要研究古代中国民间风俗和中国绘画。著有《冥币和中国宗教中的财富概念》(1975)、《高其佩(1660—1734)画鹰》(1981)、《中国肖像绘画研究—卷1,汉代初期,——公元前206年至公元前141年》(1981)等。

戴仁(Jean - Pierre Drège,1946—　)[②],法国高等实践学院、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教授。生于法国特鲁瓦市,在东方语言学院学习汉语期间,对书籍及书籍历史产生兴趣,并于1976年出版博士论文《上海商务印书馆(1897~1949)》。同年,以助理研究员身份进法国高等研究实践学院,参与苏远鸣主持的敦煌写本组工作。1980年为法国远东学院成员。1989年为法国高等研究实践学院"中国图书与铭文史"研究导师。80年代中期起兼任社会职务:1993年为敦煌写本研究组组长,1992—1998年任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所长兼该院与国家科研中心合办的中国写本、金石图像研究组组长,1998年起任远东学院院长。主要研究敦煌文献中的中国古代书籍,内容涉及纸张纤维、装帧、文字、插图、印刷术、写本和刻本、书籍发行、流通等。成果颇丰。代表作为《中国写本时代的藏书》,另写有(或与人合

① 欧洲研究中国协会3项国际研究计划之一,其他两项是:1)"中国的国家,理论和现况",由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学院政治学教授和现代中国研究所所长美国学者施拉穆(Stuart Raynolds Schram)负责,从经济入手,研究中国;2)"当代中国文学",由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马悦然(N,G. D. Malmqvist)教授负责,出版中国作家及其作品的多卷手册。

② 本条目由阮洁清撰写。

作)《远东与南亚的书籍与印刷》(1986)、《马可波罗与丝绸之路》(1989)、《从敦煌到日本》(2000)、《丝绸之路》(2002)、《古代中国的占卜和社会》(2003)、《敦煌和吐蕃研究》(2007)等。还主编过《法国当代中国学》(1998)、《敦煌绘画论集》(1999)等。

马克(Marc Kalinowski,1954—),1978年毕业于巴黎第七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曾任职于法国远东学院,参加过国立科研中心的"道教研究文献中心"、"中、韩、日科学技术史研究"、"敦煌文献和资料研究"等项目,并在上海、香港等地大学做访问研究,后任法国高等研究实验学院第5系研究导师。秦汉时代墓葬中占卜著作稿本的发现对于中国古代占卜法的研究是一种新的促进,马克在此领域取得卓越成就。他用一种更严格的汉学家角度,表现更加专业化的愿望,从而对"已被人接受的思想和被普遍采纳的模式提出了挑战"①。主要作品有:《汉代的星相——历法仪器与六壬法》(1983)、《睡虎地书简书和战国末期的中国编历法》(1986)、《〈道藏〉中的占卜文献》(载《法兰西学院丛刊》,第5卷,1989—1990)、《中国古代的宇宙论著作〈五行大义〉(6世纪)》(法文译注本概要,收入《法兰西学院丛刊》,1991)、《论与六壬卜盘有关的TLV镜》(载1993年《神意》杂志第29卷第1期)、《马王堆书〈刑法〉初探》(1995)等,都颇有影响。

程安娜(Cheng,Anne(Lanlan,1963—),曾攻读于巴黎第七大学东亚语言和文学教学研究单位,1982年11月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获得法国大学第三阶段博士学位。1979—1980获得法国大学部颁发的派遣赴华青年研究人员研究津贴,前来中国进修,并以巴黎第七大学东亚语言和文化教学研究单位的研究生资格来华从事中国文化领域的研究工作,在上海复旦大学进行了6个月有关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研究,获博士学位后留在巴黎第七大学继续研究和著述,后转入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从事研究和担任教授。法国研究中国协会会员。主要研究中国儒学,并在研究中体现了一种政治学和历史学的观点。著有《论语》(1981)、《"公羊传"注释》(是有关东汉儒学中今文传统的一项研究,也是她1982年11月26日通过答辩的第三阶段博士论文)、《汉代儒教研究,一种经典诠释传统的形成》(1985)、《〈大学〉,附有朱熹所作的注释》(1984)和对王弼(226—249)的研究。

① Léon Vandermeersch et Anne Chen, *Les études chinoises en France —Histoire de la philosophie, confucianisme.*

朱利安(François Jullien,1951—　),法国著名比较文学、哲学和汉学家,巴黎第七大学中文系主任。朱利安在《鲁迅,文学与革命》(1979)、《作家鲁迅在1925年:形象性象征性和暴露性象征主义》(发表于1983年《中国研究》第一卷)、《中国—西方:比较的问题》(1988年《中国研究》第7卷,第2期)、《影射的价值,中国传统中的诗歌解释类别,对于文化相异性的思考》、《平淡赞》(1991)、《内在的形象,对〈易经〉的一种哲学读法》(1993)等著作中,他更多的则是借用符号学来分析中国文化。

文学领域。

艾琼伯(René Etiemble,1909—　),又作艾登宝或艾田蒲,法国马耶钠省马耶钠市人。1927年巴黎路易大帝工学高等师范学院预科。因对中国语言学感兴趣,开始学习中文,喜读孔子著作(法文本)。后进巴黎高等师范学院、东方语言文化学校和巴黎大学文法学院攻读语言,获大学授课资格和文学博士学位。1939—1943年芝加哥大学法国语言文学教授。1944—1948埃及亚历山大大学法语及拉丁系主任。1949—1956年法国蒙彼利埃大学法国语言文学教授。1956年巴黎索邦大学普通文学和比较文学教授。后改任新索邦大学教授,1978年退休,获有多种荣誉称号。曾为法文《现代》、《证据》、《新文学》等杂志评论员。1956年起任加利玛出版社《认识东方》丛书主编,威尼斯艺术、文学与科学院院士,文学与科学院院士。主要著作有:《孔子》、《中国之欧洲》,译著《王维》、《陶渊明》、《东游记;又称新朝圣猴子》、《在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有关诗歌翻译的谈话》、《情欲的云雨》、《我的毛主义40年》等。

李治华(LI,Tche-houa,1915—　),1928年于中法大学附中西山中学(碧云寺内)学习法语,1933—1937年就读于中法大学伏尔泰学院,毕业后被保送里昂大学深造,1939年选修法国文学和比较文学,1943年获里昂大学文学硕士学位。1948—1953年法国全国科研中心助理研究员。1953年起,先后任巴黎第八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主要从事元曲研究和翻译工作,尤其在翻译中国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作品方面成绩卓著,主要译作有《向太阳》、《艾青诗选》、鲁迅的《故事新编》(1958)①、《忍字记及其他元代杂剧》(1963)、巴金的《家》(1979与夫人雅歌·阿雷扎艺思合译)、《红楼梦》

① 也是《认识东方》丛书的一辑,另有北京外文出版社的法文译文,标题作 *Contes anciens sur un mode nouveau*。

(1981)、《北京居民》(1982)等,其中以《红楼梦》的翻译和介绍影响最大 。

谭霞客(Jacques Dars,也译达斯),曾在索邦大学学习日耳曼语文学、比较文学、中文,获文学博士。自1969年起任职于法国国家科研中心,后任该中心研究员。在翻译、介绍和注释中国古典小说方面成绩卓著,出版有《水浒传》(1978)、《清平山堂话本》全译本(1978)、《地狱之门,古代中国的志异故事》(1984),瞿佑和李昌祺的21篇短篇小说选:《剪烛花,明代的中国短篇小说》(1986)等,并写有《太平广记》的论文。1989年因翻译成绩突出,尤其是翻译《水浒传》的巨大影响而获国家翻译大奖。自1991年起任加利玛出版社《认识东方》丛书主编。

桀溺,原名递尼(Jean - Pierre Diény,或迪埃尼,1927—),法国上莱茵省科尔马人。曾就读于法国索市(Sceaux)拉卡纳尔公立中学,巴黎亨利四世公立中学和巴黎高等师范学院,获毕业证书和大学文科助教资格证书,后在现代东方语言学校主修汉语,得学位证书。1952—1955年斯特拉斯堡菲斯泰尔 - 德 - 库朗日公立中学教师,1955—1958年获梯也尔基金会津贴进修学业,1959—1962年获"日佛会馆"津贴从事研究工作。先后担任教师和副研究员职务,1970年起任国立高等学院历史科学与语言科学部研究组主任,法国高等汉学研究所图书馆管理委员会负责人。主要从事中国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和翻译,对曹植和老子《道德经》也颇有研究。著译作有:《古诗十九首》(1963)、《中国古典诗歌起源;汉代诗歌研究》(1968)、《世界是属于你们的——中国和为了孩子们写的书》(1971)、《牧羊少女和养蚕少女:论述中国文学的一个课题》(1977)、《曹植文集通检》(1977)等。

雷威安(André Lévy,莱维,1929—),犹太血统,生于中国。欧洲研究中国协会会员、理事会理事、《中国研究》编委、法国高等汉学研究所(Institue des Hautes Etudes Chinoises)教授、全国科研中心协作研究组第586组(ERA586),即中国文学与历史研究组成员。1981年起波尔多第三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此外,他还担任过巴黎第七大学教授。重点研究中国文学和历史,并在翻译中国古典文学名著方面颇有成就,翻译有《喻世明言》、《搜神记》、《金瓶梅》(1985)、《拍案惊奇》、《牦狐的爱情:古代中国商人和文人》、《西山一窟鬼》、《志诚张主管》(1982)等,并主持出版《中国通俗话本小说分析与评论性目录》的编辑工作;论文有《明代两篇富有哲理性的短篇小说和她们的来源》(1967)、《关于古代中国的3篇故事集的论

文汇编》(1971)、《关于《金瓶梅》初刻本的出版年代明代》(1979)和《17世纪通俗小说》(1981)等。

程纪贤(Cheng, François, Chi - hsien, 字抱一, 1934—　)，作家、诗人、翻译家、艺术评论家兼汉学家。江西人，20世纪50年代赴巴黎求学，学有所成。60年代初由戴密微推荐到当时新创设的"展望研究中心"工作，1962年进法国高等研究实验学院"中国语言中心"，在李嘉乐指导下进行硕士论文写作。70年代在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任教，主讲唐诗。此外，他还在法国全国科研中心(CNRS)的协作研究组第350组(ERA350)任研究员，东亚语言研究所出版的刊物《东亚语言学手册》审查委员会委员。他是欧洲研究中国协会和法国研究中国协会会员。2002年6月13日被法兰西学院接纳为终身院士。作为一名汉学家，他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现代文学和中国语言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著译有论文《张若虚诗之结构分析》(1970)、《骆驼祥子》(1973)、《中国诗语言研究》(1977)、《"比"和"兴"》(1979)等。①

卢瓦(Michelle Loi, 1939—　)，欧洲研究中国协会会员。曾在国立东方语言和文化学院任教，70年代转入巴黎第八大学中文系任教授职务，教授中国现代文学，1982年调到普通文学系任教，课程仍列入中文系总教学计划。曾七次来华访问。主要从事鲁迅著作的研究和翻译，并取得卓著成绩，也从事中国女作家作品研究。著有《鲁迅：论中国的语言和文字》(1979)、《坟》(1981)、《像这样的一位战士》(内有《野草》全译本)、《中国女作家短篇小说选》(1987)、《中国妇女和第四根绳索》(1979)、《鲁迅：中国人民的灵魂》(1987)等。此外，她曾出版有法文版《实践论》(1973)并撰写前言，介绍毛泽东在《实践论》中阐述的思想和写作经过。

巴迪(Paul Bady, 或译巴狄, 1944—　)，欧洲研究中国协会和法国研究中国协会会员。1981年任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所属协作研究组第717组，即当代中国跨学科研究组(ERA717)讲师，巴黎高等师范学院(Ecole Normale Superieure)讲师，1987年任该学院"大学讲师"(即讲师中最高一级)。是法国研究中国作家老舍的专家和翻译家，译著作有《骆驼祥子》(1973)、《老舍，老牛破车》(1975)、《北京居民》(1982)、述评《巴金：春，由

① 此外，出版有小说《天一言》(1998年获法国文学"费米娜文学奖")，诗歌《双歌集》，画论《石涛，世界的味道》等，也频频得奖。

埃迪特·西马尔·多韦尔译自中文的小说》(1982)、《本世纪的4位伟大作家》(1987)等。《本世纪的4位伟大作家》一文介绍了郭沫若、茅盾、巴金和老舍的生平和作品。此外,1980年12月间在香港《明报》刊载纪念老舍的文章:《从汉口到重庆的老舍》。

瓦莱特-埃默里夫人(Martine Vallette-Hémery,1954—),翻译家。1981年为高等汉学研究所"中国文学与历史"研究组研究人员,以从事中国文艺美学的翻译工作成绩突出,荣获1983年度"汉学儒莲奖"。译作特点是着意把博大精深的表现手法和出类拔萃的文学翻译质量巧妙地结合起来。如把中文的"性灵"译为法文的"génie naturel",把"本色"译为"Couleur proper e","会心"翻译为"entente de coeur"等。著译有:《袁宏道(1568—1610)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实践》(1982),获"汉学儒莲奖",袁宏道的《云石集》(1983),一部散文集的法文译本,标题系译者所加。她也是《北京居民》(1982)合译者之一。

汉语领域。

李嘉乐,原名里加洛夫(A. Rygaloff,1922—),法国中国语言学"先躯"。[①] 生于法国安德尔-卢瓦尔省,父母为俄国人。早年就读于圣日尔曼-昂-拉耶学院、布封公立中学、巴黎大学文学院和法兰西学院,毕业于东方语言学校。1945—1954年为公派留学生在北京中法大学"巴黎大学中法汉学研究所"学习,后留所工作。1945—1955年任法兰西共和国驻越南北方总代表团文化专员。1955—1956年先后任法国全国科学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和副研究员。1957年起国立高等学院第6部,即经济科学与社会科学部主任。1959—1968年高等汉学研究所教授。1960—1970年东方语言学院讲师;1960年起国立高等学院第6部下设汉语研究中心主任,1970年改为东亚语言研究所,任所长。1972—1980年法国全国科学研究委员会委员。1973—1976年法驻日使馆文化参赞。亚洲学会,巴黎语言学协会会员。法国骑士勋章和法兰西学院棕榈叶奖章获得者。1987年退休。主要著作有《中国与言语学:语言、缀音法和书法》(1982)、《汉语基础语法》(1983年)等,后一著作具有"开创性"。

艾乐桐(Vivianne Alleton,也译阿勒通,1944—),1965—1966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后分别在南京大学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进修。1968

① Viviane Alleton, *La Linguistique chinoise en France*;中译文见《法国当代中国学》,第339页。

年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博士学位,1983 年获巴黎第七大学博士学位,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教授。80 年代初任教于巴黎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亚洲和北极文化地区部(Division des aires culturelles Asie/Arctique, E. H. E. S. S.),后接替魏丕信任高等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和文献中心"秘书长,领导一小组从事语法问题研究。1988 年当选为欧洲研究中国协会秘书长。她也是法国研究中国协会会员。热衷于法中文化交流,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学术交流往来。主要研究中国语言,也写过当代中国文学和艺术方面的文章。著有《现代汉语中的化学术语》(1966)、《汉字》(1970)、《现代汉语副词》(1972)、《汉语语法》(1973)、《中国人对姓名的讲究》(1993)等。

阿兰·佩洛伯(A. Peyraube, 1945—　),汉名贝罗贝。1979—1980 学年度起,接替汪德迈担任巴黎第七大学中国学教授。1986 年底或 1987 年初李嘉乐从东亚语言研究所退休,由贝罗贝接替任所长,并任《东亚语言学手册》编辑委员会委员。法国全国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欧洲研究中国协会会员,并担任该协会理事,主管财务的司库职务。佩洛伯以研究北京方言著称,他提倡历时句法研究,并写有大量的论文,"为法国的汉语研究填补了空白"①。主要成果有《普通话和北京话》(1979)、《汉语中"大概"的几种说法:差不多,几乎,差一点》(1979)、《汉语方位词研究》(1980)、《13 世纪至 14 世纪元曲里的称呼用词》(1982)等。此外,他还写有《中国的新争论》(1979),与其他汉学家合作翻译有《北京居民》(1982)等。

帕里(Marie Claude Paris, 1944—　),法国全国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巴黎第七大学语言学研究系研究专员。在她的领导下有一个研究小组运用语言语义学的方法从事现代汉语语法研究。著有书评:《汉语转换语法研究》第 1 卷:《运动的转换》(1979),书评:《汉语方位词研究》(1980),《官话中对名词的限定:分类用词》(1980),《现代汉语"的"字结构》(1980),《官话中"分类用词"的作用和运用》(1982),书评:《一部功能性参照语法》(1982)等。

白乐桑(Joël Bellassen, 1950—　),1969—1973 年巴黎第八大学中文系得学士学位,1973—1975 年间留学北京语言学院和北京大学。1978 年获巴黎第七大学中文博士。1978 年获汉语中学师资证书。1991—2000 年任巴黎第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1997 年任博士导师。2000 年任东方语言

① 徐丹:《法国汉语研究概况》,《汉语研究在国外》,第 220 页。

文化学院中文系教授。2006年任法国教育部汉语总督学。担任多项社会工作:法国汉语教师协会主席,名誉会长,法国教育部汉语学习大纲编写小组主编,主持法国汉语专业师资合格会考,法国汉语水平考试委员会会长,世界汉语教学学会副会长等。曾获中国语言文化友谊奖,法国骑士勋章。主要从事中国语言文学研究和教学,尤在汉语教材编写方面成绩突出。主要作品有《法国汉语教学状况》(1991)、《中国文字》(1995)、《汉语教学语法》(1996)、《汉语语言文字启蒙》(1997)、《汉语考试》(1998)、《影视语言、主体感应与汉语教学》(2000)、《说字解词》(2002)、《全国高中外语学习大纲——汉语学习大纲》(2002)等。此外有多媒体作品《中文之道》(2000)、《利玛窦》(获1995年Mobius多媒体教育奖)等。翻译有鲁迅作品多篇。

萨加尔(Laurent Sacart,1954—),从事语言学研究,就读于巴黎第七大学语言学研究系,1977年获博士学位,后到东亚语言研究所工作,继续从事中国语言学研究,并任该所《东亚语言学手册》编委。1981年任东亚语言研究所协作研究组第350组(ERA 350)大学讲师。主要从事中国南方方言研究,出版了有关闽、粤方言和汉语历史语言学及汉藏语言比较等方面的著作。1986年曾来我国访问,对陕西方言进行了研究。著有《香港崇谦堂村家方言的音位学》(1982)、《崇谦堂村家方言中有不明语源字词的字表》(1982)等。

其他学科。

特罗利埃(Pierre Trolliet,汉名陶立业,1943—),曾在巴黎大学攻读中国学。70年代担任东方语言和文化学院地理学教授,主讲中国地理课程。1979—1980年学年度在该学院"中国研究中心"从事"巴黎第三大学国立东方语言和文化学院深造进修项目",针对新加坡华人事务团体情况进行研究,撰写国家博士学位论文并取得博士学位。此前,他已担任巴黎第三大学所属"巴黎东南亚馆"(Maison d'Asie du Sud-Est)主任,侧重研究东南亚国家华侨社会概貌。欧洲研究中国协会会员,法国研究中国协会创始(1980年4月)人之一,曾任法国研究中国协会首届理事会理事,并于1982年7月17日当选为该协会副主席,《中国研究》编辑委员会委员。著有《中国的地区特色》(1981)、《河北》(1982)、《中国地理历史和现代文学中的专有名词》(1986)等。

林力娜(Catherine Jami,卡特林娜·雅米,汉名林力娜,约1944—),

犹太血统法国人,生于阿尔及利亚,幼年受伊斯兰文化熏陶。毕业于国立师范学院理学院数学系。1980 年在英国参加国际数学学术会议,走访了李约瑟教授,该年开始自学中文。1981 年到北京语言学院学习汉语和进修中国科学史,攻读中国古代典籍,始研究中国 13 世纪数学家李治著作,对他的《测圆海镜》和《益古演段》颇有研究。1982 年比利时第 1 届国际中国科学史讨论会上宣读论文:《中国古代数学史与算草之间的关系》,同年 10 月获理科博士学位。后法国全国科研中心授予她专门研究中国数学史职务,委派她到巴黎第八大学哲学综合科技学院担任教学和研究工作,开创专门研究中国数学史专业。1983 年再次前来我国洽谈合作项目。1984 年作为法国全国科研中心派遣来华访问,在北京着手将《九章算术》翻译为法文。

二、戴密微和他的汉学研究①

保尔·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1894—1979),法国著名汉学家,二次大战前后法国汉学界承前启后的人物。二战后,当法国老一辈汉学家葛兰言、马伯乐、伯希和相继去世时,法国汉学一度万马齐喑,是戴密微一马当先,以其渊博的知识和坚韧的毅力,把法国汉学带出低谷,再放昔日光辉。

戴密微出生于瑞士洛桑,1914 年从巴黎大学文学系毕业以后,于次年进入巴黎东方语言学校继续学习,原打算学习俄文,结果却随从当时的汉学大师沙畹和烈维学习汉语和梵文,同时也习日文。1919 年东方语言学校毕业后,任法国远东学院研究员,1920 年赴河内远东学院工作。1921 年 6 月至 1922 年 1 月间,被学院派遣赴中国考察,在北京居住了很长时间。在那里,他分享了中国人的生活,并有机会参观云冈石窟、孔陵、孔府和泰山。还因官方明文禁止在泰山自杀的情节,启发了他写了第一篇论文。自北京返回河内时,他经过了中国东南部那些有丰富历史纪念物的城市,后又去过福建。1924 年受聘为厦门大学教授,担任西方哲学史、佛教史和梵文教学工作,直至 1926 年。从 1926 年起至 1930 年,在日本东京"日佛会

① 参阅 Christine Nguyen Tri, *Paul Demiéville, Les Langues' O et les études chinoises, Un siècle d'enseignement du chinois à l'Éco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1840—1945, sous la direction de Marie - Claire Bergère et Angel Pino;[法]谢和耐:《法国 20 世纪下半叶的汉学大师戴密微》,《当代法国中国学研究》。

馆”担任研究员兼馆长工作。1931 年回国，任巴黎东方语言学校教授至 1945 年。是年，被任命为高等研究实验学院第 4 系研究导师，在那里教授佛学文学直至 1956 年。1946 年，在法兰西学院主持中国语言和文学讲座。1951 年，被选为金石和美文学院的普通院士，1959 年承担主席团主席职务。次年，马伯乐去世，戴密微继任法兰西学院中国语言文化教授，直至 1964 年。在此同时，他于 1956 年起兼任《道报》编辑工作，1962 年，在他的领导下，翻译、编辑、出版了《中国古典诗选》。1973 年，在法国科研中心的支持下，着手建立专门研究敦煌手稿小组，直至逝世。

戴密微有“对一切事物都具有一种经久不衰的兴趣和一种令人瞠目结舌的工作能力”，似乎从他青年时期起就形成了这样两种风格特征。[①] 他是位博学的汉学家，由于学识、智慧和非凡的工作能力，在汉学研究上他“同时涉及到宗教、文学和哲学”，[②]乃至“整个中国的研究”，[③]对“大量不同的专题”都进行过研究，并取得卓越成果。[④] 他因佛教、道教、敦煌学、语言学、中国古典文学等方面的辉煌成就在汉学界享有很高的声誉。同时，他还发表了许多有关法国汉学史方面的文章，总结法国汉学发展的经验和成果：《法国汉学研究史简述》、《亨利·马伯乐》、《亨利·马伯乐与汉学的未来》等。此外，正如谢和耐（Jacques Gernet）所言，戴密微不仅是个知识渊博、治学态度严谨的汉学家，同时，他的谦虚和对后学者的关心也一直在汉学界传为佳话，如，马伯乐的《道教和中国宗教》[⑤]一书，实际上是戴密微在马伯乐的大量笔记和手稿中整理出来的，从他所做的大量的编排和订正工作来看，把它看成是马伯乐与戴密微合著的一部作品一点也不过分，但是戴密微并没有署上自己的名字，可见其人品之高尚。[⑥]

戴密微的汉学研究有个明显的特点：他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但他的敦煌学和佛教研究，几乎通领了他的整个汉学研究。程艾蓝说，“由佛学开始，戴密微又对哲学史起了兴趣，特别是对庄子思想，宋明理学，以及中西

① ［法］谢和耐：《法国 20 世纪下半叶的汉学大师戴密微》，《当代法国中国学研究》，第 105－106 页。

② *Un siècle d'enseignement du chinois à l'Éco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1840—1945, sous la direction de Marie－Claire Bergère et Angel Pino, P. 205.

③ ［日］福井康顺：《道教》，第 3 卷，第 240 页。

④ ［法］程艾蓝：《法国的古代中国研究》。

⑤ Henri Maspero, *le Taoïsme et les religions chinoises*, E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50.

⑥ ［日］福井康顺：《道教》，第 3 卷，第 241 页。

哲学思想的最初接触等。也是由于佛学,他又对敦煌手卷感兴趣,特别是对变文";[1]戴仁也指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敦煌学研究取得超乎寻常的迅速发展,戴密微先生是欧洲这方面的"伟大创导者",他"从1944年起,便将他的高等实验研究学院和法兰西学院的大部分课程,都用于分析和翻译宗教或文学领域的佛教写本",直至他"生命的最后",并"通过其教学而导致了一大批敦煌学家的诞生"。[2] 此外,如果注意分析一下他的有关敦煌研究的文章和著作,也可以发现,他的敦煌研究实际上已涉及到整个汉学研究的各个方面,而其中关于佛教的研究又是他敦煌研究的核心。[3] 所以说,敦煌学和中国佛教的研究是戴密微研究的中心,在他的整个汉学研究中始终起着主导的作用,不仅他的《吐蕃僧诤记》和唐代俗文学的翻译和研究《王梵志的诗》是他敦煌学和佛学研究的主要成果,就是他在汉学领域中其他方面的成果也是他的敦煌学和佛教研究逐渐深入而取得的心得结晶。

中国哲学研究。

戴密微对中国哲学的兴趣首先体现在对中国佛教的深入研究上。苏远鸣在《法国汉学50年》中谈到二战后的法国汉学研究时说,他为什么要从中国佛教开始谈起呢?是因为"以便首先追述戴密微的特殊地位",尽管他认为戴密微"并不是专一的佛学家"。[4] 在中国佛教研究方面,戴密微最初师承于汉学家烈维,但他的成就超过了他的老师。

佛教是戴密微"偏爱的领域",[5]他数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地进行研究,并取得卓著的成绩:早在留居日本时,他就担任过《法宝义林》的主编,并于1929—1931年间出版了前三册,这是根据汉日文史资料而编写的一套大型佛教百科全书;1945年起,他在高等实验学院授课期间,开设了大

---

① [法]程艾蓝:《法国的古代中国研究》。

② [法]戴仁著,耿昇译:《法国的敦煌学》,《汉学研究》第一集,阎纯德主编,中华书局,1996年。

③ 戴密微敦煌研究主要的著译作:1944—1949年:《慧能的〈六祖坛经〉》;1952年:《吐蕃僧诤记》和《汉文俗文学的发轫》;1959年:《新妇》;1961年:《有关中国禅书的两卷中国文书》;1962年:《唐代一种变文中的胡族习俗的某些特征》;1973年:《别母》;1971年,戴密微和饶宗颐合著:《敦煌曲,8—10世纪的说唱文》,饶宗颐作汉文序,戴密微译成法文;1978年戴密微、饶宗颐和李克曼:《敦煌白画》;1982年:《〈王梵志诗集〉和〈太公家教〉,唐代的民间诗》等。

④ [法]苏远鸣:《法国汉学50年》,《当代法国中国学研究》,第73页。

⑤ [法]苏远鸣:《法国汉学50年》,《当代法国中国学研究》,第73页。

量有关佛教的课程，使他有机会在这方面做深入的研究并臻于完善，也促使他于1952年发表了著名的佛教著作《吐蕃僧诤记》；1972年，他又出版了《临济语录》的法译本。此外还写有许多禅宗研究的成果，如慧能的《六祖坛经》(1944—1947)等。

在佛教研究上，戴密微关心佛教在中国的表现形态，注意中国佛教在唐代，特别是在武后时代的历史，他研究禅宗史、临济大师的生平与语录，尤其是印度佛学，佛经的汉译及中国僧人所写佛经的真伪问题等，此外，还研究禅对诗词的影响。

在他的所有佛教著作中，最有影响的是《吐蕃僧诤记》(*Le Concile de Lhasa, Une controverse sur le quiétisme entre boudhiste de L'Inde et de La Chine au VIIIe siécle de l'ére chrétienne*)。该书1952年作为法国高等中国研究所丛书第7卷在巴黎出版，由法国大学出版社刊行，国立印刷厂印刷。既是他的成名作，也是一部公认的佛教研究名著，是他多年研究的结晶。此书原名叫《拉萨僧诤记》，计划中把此书作为第一卷，第二卷将是有关佛教教理的注释以及禅宗史的一些概观，但第二卷至他逝世未见问世。

全书除前言和导论外，主体部分是两章："有关吐蕃僧诤会的汉文史料释注"和"史料疏义"；此外有附录(有关吐蕃僧诤会的印度档案片断：I，莲华戒的第一部《修习次第》，据汉文进行的初步分析；II，莲华戒的第三部《修习次第》，E·拉莫特由藏文本译制)，补遗和勘误等。第一章"有关吐蕃僧诤会的汉文史料释注"，内容包括：《顿悟大乘正理决》叙，第一组问答，摩诃衍的第一道表疏，在表疏中加入的一段教理论述，第二组问答，摩诃衍的第二道表疏，在表疏中插入的问答，摩诃衍的第三道表疏；第二章"史料疏义"内容包括：王锡呈奏赞普的第一道表章，王锡呈奏赞普的第二道表章，敦煌汉僧为瓜州节度使和其他吐蕃人的祈祷，吐蕃统治敦煌时代一位汉族节度使的档案文书，大蕃勅尚书令赐大瑟瑟告身尚起律心儿，圣光寺功德颂，为肃州刺史刘臣璧答南番书，窦吴，在吐蕃统治期间的汉文诗词。

该书主要论述8世纪末汉僧摩诃衍同印度僧人莲华戒在吐蕃王宫中的一次宗教大辩论。书中发表了许多敦煌写本，尤其是巴黎国立图书馆第4646号伯希和敦煌汉文写本，即《顿悟大乘正理决》。作者结合各种资料，不仅对这次宗教会议的来龙去脉做了介绍，而且对吐蕃僧诤会的历史背景及其相关的各种问题分别做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自己新的观点。作者认

为,敦煌应是在公元788到794年之间落入吐蕃人之手的,这次宗教会议应是在公元792年到794年之间进行。他强调指出,"几乎完全可以肯定,这一宗教事件是具有政治背景的",它涵藏着唐朝同吐蕃以至印度之间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另外,作者还认为,佛教传入吐蕃是"从8世纪开始,更确切地说是从8世纪末叶传入吐蕃",而不是在7世纪或是8世纪上半期,文成公主和金成公主与佛教的输入没有关系。作者对西北地区居民对国家失志不渝的忠诚也给予高度的评价,热情地赞扬他们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吐蕃压迫下,仍然保持不变的气节,维持着跟唐朝的联系,尤其是他们民族的习俗、他们的服装、他们的语言,及至头发的装束等都始终没有改变。作者说:"在考证有关十几世纪之前外国侵占中国领土资料时,我吃惊地看到,到处都可以证明中国全民族的激烈反抗精神,这类史料比比皆是,俯拾可得。"①该书资料丰富,注释详尽而有见地,受到学术界高度的评价,谢和耐认为,书中的"每一条注释都堪为百科全书的一重要条目"。②该书被认为是评议该时期印度和中国佛教徒对寂静主义争论的一部不可多得的重要作品,敦煌学、佛教学和藏学的代表著作,③对了解西藏和中国文化的历史有着"重要的意义",凡涉及中国佛教的著作,"是不能不提到戴密微的贡献"的。④

比起佛教研究,戴密微的道教研究似乎要逊色些,但是,正如日本的汉学家福井康顺所说的,在道教研究这一领域,无论如何"也不能漏掉"戴密微的名字。⑤⑥ 马伯乐在道教研究上有很高的成就,无疑,他的《道教和中国宗教》⑦一书是一部有很高学术价值的好作品。此书由康德谟作序。书中对道教的论述得到学术界的重视,但戴密微在整理马伯乐的笔记和手稿中做了大量的编排和订正工作。

---

① 参阅[法]戴密微:《吐蕃僧诤记》前言部分,耿昇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

② T'oung Pao, Vol. 65N0. 1 - 3. 1979.

③ 刘国忠:《〈吐蕃僧诤记〉内容提要》,李学勤主编《国际汉学名著提要》,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06-107页。

④ *Un siècle d'enseignement du chinois à l'Éco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1840—1945, sous la direction de Marie - Claire Bergère et Angel Pino, Asiathèque, 206页。

⑤ *Un siècle d'enseignement du chinois à l'Éco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1840—1945, sous la direction de Marie - Claire Bergère et Angel Pino, p. 206。

⑥ [日]福井康顺:《道教》,第3卷,第241页。

⑦ Henri Maspero, *le Taoïsme et les religions chinoises*, E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50.

戴密微对《庄子》情有独钟，他曾经对《庄子》中的《逍遥游》、《齐物论》和《秋水》等篇做了学术价值很高的深刻论述。1945 年，他在京都大学人文研究刊物纪念号上发表了《家教之迷》，分析了《庄子·天运篇》中的问答；1955 年在《通报》上发表详细书评，分别对荷兰的戴闻达（Jau Julius Lodewijik Duyvendark，1889—1954）的《老子道德经》译注和康德谟（Maxime Kaltenmark）的《列仙传》译注进行了评论。[①] 所有这些都表明，他在道教研究方面也有很高的造诣。

由于《庄子》的研究，又促使了戴密微对整个中国哲学的思考，尤其是对中国文化思潮的演变给予了极大的注意和重视。从 1945 年至 1949 年，他在法兰西学院连续多年的研究课题就是对《庄子》和历代对《庄子》的注释进行的分析和研究。他对从上古至乾隆时代以及此后的中国思想史，尤其是庄子思想和宋明理学以及中西最初的哲学思想接触，都做了深入的研究。他还通过这一研究过程提出了为什么《庄子》自汉末至三国时代起随着“清谈”风气和玄学发展而再次受到提倡？为什么它在唐代根据佛教哲学传统而被重新诠释，后来到了宋代又根据理学观点对它做了研究？最后，在“考证学”时代，为什么研究家们又根据训诂学的观点对其进行了新的考察？[②] 不仅如此，戴密微对康熙、雍正、乾隆时代的中国思想家们也颇有兴趣，如颜元及其颜李学派、戴震和章学诚等一代名流的研究就是如此，而有关这些中国哲学家的资料，在他之前法国几乎是无人所知。

戴密微在对中国哲学演变进行研究的同时，还注意到哲学和与哲学有关词汇的研究，他能够将汉文文献与印度和藏文经文进行比较，无疑是由于他具有深厚而广博的哲学知识关系，但跟他的佛教语言学方面的高深造诣显然也是分不开的。他在《吐蕃僧诤记》中对于唐代汉语发音、唐代北方方音以及跟汉藏语言的关系的探讨，以及对“甥舅”或“舅甥”的文化背景上的考察，可以看出他在音韵学、语义学和文化语言学上的功底，而他注意印度和中国佛教中对于“方便”、“顿”、“渐”的涵意的不同理解，[③]“追溯中国古代思想家中‘理’字的意义”、“这种观念从 4 世纪起先在佛教影响

① ［日］福井康顺：《道教》，第 3 卷，第 241 页。

② ［法］谢和耐，耿昇译：《法兰西学院的汉学讲座》，《汉学研究》第一集，阎纯德主编，中华书局，1996 年。

③ 参阅［法］戴密微：《吐番僧诤记》前言部分。

下和后在理学中遭受变化”,分析“分”(指定给个人的份额)的概念,以及该词的“古代用法”和它与韩非子、吕不韦、王弼、郭象等人政治观点的关系等,则主要是有关中国哲学词汇本身的涵意上的探讨和研究。①

中国文学研究。

谢和耐说,戴密微是一个有很高文学艺术修养的人,他似乎“阅读和通晓全世界上所有的音乐、绘画和文学作品”,他也是“德国和英国文学,尤其是意大利文学的爱好者”,②作为一个汉学家,无疑,他这方面的丰富的知识和和厚实的文学艺术修养有利于他对中国文学的深入理解和研究,是一位对中国文学极富鉴赏力的汉学家。苏远鸣说:“关于中国文学,他没有不了解的,尤其是他给予中国的诗歌以极高的评价。”③具体地说,对于中国文学的研究,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跟他佛教研究有直接关系的敦煌俗文学,尤其是敦煌诗歌的研究;二是组织翻译和出版《中国古典诗选》。

在法国汉学界,对于敦煌文学中俗文学的关心是“戴密微先生开始”的。④ 晚年,他在法兰西学院所开设的课程就是以敦煌文学为主要内容,如,敦煌文稿中的伪文,敦煌文稿中的通俗文学,以及佛教弟子的诗歌等。他从50年代初开始,便已向西方揭示了敦煌写本对中国文学史的重要意义,并着手翻译和分析一批数目相当可观、受佛教感应的俗文学文献。除了多篇文章之外,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他的两部重要著作:其一是《敦煌曲》(1971),这是由饶宗颐研究,戴密微翻译的说唱曲子集,附有饶宗颐教授写的导言;其二是敦煌民间诗歌集,即《王梵志文集》的翻译和考据,后来这部作品跟《太公家教》合为一大册,于1982年出版。

考据敦煌文稿中的通俗文学、佛教弟子诗歌的“真伪”,是戴密微敦煌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他跟同时期大陆研究家王重民、日本汉学家入室义高对王梵志其人及其作品所进行的研究,被认为是继胡适的“初步探

---

① [法]谢和耐:《法兰西学院的汉学讲座》。

② 转引自[日]福田康顺等:《道教》,第3卷,第240页。

③ *Un siècle d'enseignement du chinois à l'Éco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1840—1945, sous la direction de Marie - Claire Bergère et Angel Pino, p. 205.

④ [法]戴仁《法国的敦煌学》。

讨”之后的一次“全面”、“系统”的“论述”和“研究”，[1]可以说是敦煌王梵志诗歌研究的一次飞跃；而戴密微所编注、翻译、评论的《王梵志诗集》，又是“王梵志诗歌的第一个全辑本”，其意义更加非凡。[2] 此外，1964 年时，他曾就苏联的《敦煌手稿总目》1456 号刊载王诗 111 首的资料，发表了《列宁格勒的中国敦煌写本》一文（发表在《通报》（法文版），五十一卷，第 4—5 册，1964 年），对 L. 1456 号王梵志诗的写本进行详细的研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指出了这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抄本，可以弥补搜集王梵志诗之不足，他还拍摄出二十来件王梵志的手抄材料……在任何这些手抄件中，没有发现《目录》所引述的列宁格勒写本的第一行和最后一行。显然，这是他对敦煌资料进行全面研究基础上所提出的看法。

戴密微对敦煌俗文学的研究在汉学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不仅使他的许多弟子走上了这条路，同时也推动了远东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后来在中国的大陆、台湾发表了许多有关《王梵志诗集》和《太公家教》的著作，都证明了这一点。

他在中国文学方面的第二项卓越的成就是，在他的主持和带领下，1962 年，于巴黎出版了《中国古典诗选》。

《中国古典诗选》是一部“集法译中国古诗之大成”的作品，[3]翻译了上至《诗经》下至清诗共 374 首古诗（包括词在内），选译了 204 位中国古典诗人的作品，除了直接从中文翻译过来之外，还收集了不少前人的成果，如葛兰言的《诗经》，铎尔孟（André Hormon）40 年代译的诗作等。当时的汉学新秀桀溺、吴德明、于儒伯、李治华和梁佩贞女士等，都在他的带领之下参加了这一工作。

《诗选》的内容涉及到中国古典诗歌的各个方面：有的抒写身陷蛮族草原战士的悲愤，有的抒发被遗弃女子的怨恨，有的描写古代遗迹、冷清的宫殿，有的展现自然风光，勾勒出千姿百态的湖光山色；既有歌颂战争的功绩，也有诅咒生活的苦难，既有抒发萦绕在人们心头的人生无常的情怀，又有诗人以画家的眼光所捕捉到的一些“没有丝毫形态而又与现实事物密切

① 张锡厚：《关于敦煌写本王梵志诗整理的若干问题》，张锡厚辑《王梵志诗研究汇集》，古籍出版社，1990 年。

② ［唐］王梵志诗，项楚校注：《王梵志诗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年。

③ 钱林森：《中国文学在法国》，第 38 页。

相连的小景致”。[①]

《诗选》的长篇序言是法文读者所见到的一篇关于中国诗歌的“最佳综合介绍”,[②]无疑是一篇很有见地的中国古典诗歌研究论文。作者不仅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历史演变做了较为全面的介绍,而且从中西文学和文化的对比中给予了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特色及其魅力以高度的评价。他指出,中国的古典诗歌除了一些受民间文学影响的叙事诗之外,大都没有史诗的色彩,而只是一些短小的诗篇,也许按照“地中海的文化传统”培养起来的读者看来,这些诗歌“太短小”了,而且没有任何“浮华辞藻”,“雄辩色彩”和“抽象的意味”,意念也“单纯而少变化”,惯用词汇又“不断重复”,正如画家塞尚以轻蔑的口吻所说的,这种诗乃是“一些中国的影像”。但是戴密微指出,正是这些短小而不起眼的小诗,表达了中国人的心声,反映了他们的人生,并体现了与其他民族不同的独特的艺术表现手法。他说,这些诗是在诗人的“智力”没有丝毫受到“枯燥乏味”的“侵袭”下所捕捉到的一些“异常清新的印象和感受”的记录,这些“印象和感受”是一些“转瞬即逝的意念”,它们是如此得“难以察觉”,以致人们把它们比作“羚羊,因为羚羊为了隐藏自己的踪迹,便把自己的双角勾挂在树枝间,正如阿尔卑斯山区的岩羚羊在冬天那种隐匿踪迹的做法一样”。但是,中国古代的诗人们却用一种“奇妙的艺术”,从这些“成千上万”“难以察觉”的“意象”中提取出题材,编织出“细小画面”,加以“再现”,给人以艺术的享受。他说,通过这些读者能看到“与自然界紧紧相连”的“全部生活”,发现中国“浩瀚无垠的疆土”,窥视“与人类相适应的宇宙”和“从心灵深处发出来的超越语言的低沉回响”,并从这个“一切都是宁静、纯朴、悠逸”的世界里“发现自我”,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其他诗歌无法企及的。

他还指出,这些表现手法“严谨”、“精巧”的小诗,有的“只有二十个音节”,一共只有“四行”,但是每一个音节本身就是一个“小小的世界”,一个“宛如变化多端的胚芽”,这个“充满着辐射涵意”的“语言单位”,能够在读者的“听觉”上和“视觉”上产生“强烈的共鸣”,因为它是用“本身就是艺术作品的图画似的文字”写出来的,它的发音含有能在“韵律上发生作用”的音调的变化,并“通过一些以继承的方式训练出来的心理重心去触及美

① 钱林森:《中国文学在法国》,第39页。

② 钱林森:《中国文学在法国》,第38页。

学上的敏感性”，而西方人的心理学和生理学却“不能使人产生这种类似的心理重心”。也正由于此，“近三千年来，一个最平凡而又最灵敏的民族能够用这种诗歌来勾通感情”，他们把这种诗歌看成是自己“智慧的最高表现”，并依靠这些诗歌的养分而“获得新生”，“寻找鼓励和慰藉，追求一种近于酒醉、中魔或狂喜似的心摇神荡的境界”。①

《诗选》被称为一部“具有无懈可击的严密结构的集体著作”。② 它的出版是二次大战以后法国汉学界的一件大事，在法国中国古典诗歌翻译研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③不仅推动了法国汉学界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和研究工作，同时在整个汉学界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尤其是《诗选》所翻译的李白、杜甫、白居易等40多位唐朝诗人的106首诗词，更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大大地推动了法国汉学界唐诗的翻译和研究，促使法国20世纪的《唐诗》翻译和研究出现一个新高潮。

三、谢和耐和他的汉学研究

谢和耐（Jacques Gernet，1921—　）④是法国20世纪下半叶著名的汉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法国金石和美文学科学院院士，法兰西学院名誉教授。谢和耐出生于当时法国殖民地阿尔及利亚的首都阿尔及尔，父亲路易·热而内（Louis Gernet，1882—1962）是位古代希腊宗教和法律史的著名专家，曾任法国文学院院长。1942年，当他获得法文、拉丁文、希腊文古典语言文学学士学位和高等教育文凭时，正遇美军登陆北非，于是，年轻的谢和耐便毅然应征入伍，参加了抵抗法西斯德国及其盟军的战斗。三年后，他复员到了河内法兰西远东学院学习，成为戴密微出蓝弟子。1947年

① 序言的引文，转引自钱林森著的《中国文学在法国》一书。

② ［法］苏远鸣：《法国汉学50年》，《当代法国中国学》，第84页。

③ 钱林森：《中国文学在法国》，第38页。

④ 有关谢和耐的生平和著作，主要参看如下几份资料：耿昇的《法国著名汉学家谢和耐教授简介》（《法国汉学》，第一辑，［法］龙巴尔 Denys Lombard，［中］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1996年）、王志平的《谢和耐与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国际汉学漫步》，李学勤主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许光华的《二战后的法国汉学》（《汉学研究》第四集，阎纯德主编，中华书局，2000年）、孙戈的《谢和耐》（《汉学研究》，第五集，阎纯德主编，中华书局，2000年）、钱林森的《关于中西方文化第一次实质性的接触——访问谢和耐教授》，《中国文化研究》，2002年）、耿昇编译的《法国汉学家谢和耐教授》（《国际汉学》2，任继愈主编，大象出版社，1998年）、《法国汉学大师谢和耐》，http://culture.sinofrance.org/renwu/gernet.htm等。

获中文文凭,1948 年高等实验学院毕业后,作为法兰西远东学院成员在河内居住两年。1951 年,被任命为高等实验学院导师(第 6 系,后来改建为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次年,以《中国 5—10 世纪的寺院经济》博士论文获文学博士学位。1957 年,受聘担任巴黎大学中国语言和文明系讲师,1959 年成为该校的教授。1968 年,谢和耐在巴黎第七大学创设"东亚语言和文明教学与研究单位",一直工作到 1973 年。1975 年,被任命为法兰西学院教授,主持中国社会和文化史研究。1984—1992 年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有关中国、朝鲜和日本科学实况研究组负责人,1987 年到 1992 年间,与荷兰莱敦大学汉学研究院前任院长许理和(Erik Zürcher)教授共同担任《通报》主编。1992 年 10 月退休后任法兰西学院的名誉教授。

作为当代法国最具权威的汉学家,谢和耐的汉学研究成绩卓著,著述甚丰,主要著作有《荷兰神会禅师(668—760)语录》(1949)、《中国 5—10 世纪的寺院经济》(1956)、《蒙古入主中原前夕中国中原的日常生活》(1959)、《帝国之前的古代中国》(1964)、《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伯希和敦煌汉文写本目录》第一卷(与吴其昱合作)(1970)、《中国社会史》(1972)、《中国与基督教》(1982)、《唐甄的〈潜书〉》(1991)、《中国的智慧,社会与心理》(1994)等。此外,他还写有大量汉学论文。[①] 谢和耐从事汉学研究和教学工作 50 余年,因其卓越的成绩和贡献,被任命为法国金石和美文学科学院的普通院士,并荣获翟理斯奖、儒莲奖、荣誉骑士勋章、一级教育勋章、东洋文库外籍院士等多种荣誉称号和奖章。

谢和耐是个对中国友好并十分注意加强国际汉学界联系和交流的法国汉学家,他积极参加各种国际性的学术活动,多次来到中国进行学术访问和学术考察。曾于 1949 年 8 月间在昆明一带进行考察,后又于 1957 年、1966 年、1980 年、1985 年多次来华访问,1974 年和 1980 年到过台湾,分别与海峡两岸的中国学者进行过学术交流。1995 年 1 月应邀又一次来到中国,参加在海南省召开的国际汉学会议,并向大会提交了《二战以来法兰西学院的中国学研究》的论文(刊登在《中国史研究动态》,1995 年 3 期,严武译)。此外,他还访问过日本、柬埔寨、朝鲜及香港地区。

在法国的汉学发展史上,无论从学术地位还是研究思路和方法上看,谢和耐都堪称是一位承前启后的汉学家。如果说,他的老师戴密微曾使战

① 据耿昇译编译的《法国汉学家谢和耐教授》一文中统计,约 86 篇。

后的法国汉学重振雄风的话，那么谢和耐就是使法国汉学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的汉学家。他以传统但并不保守的治学方法，在中国历史、宗教、科技等方面的研究开拓了一条新路，他的这一开拓整整影响了一代。法国汉学家一向注意文献的注释和考据而很少进行系统探索，沙畹、伯希和、马伯乐等几乎都是如此，而谢和耐则是一方面继承了前辈考据学的功底，另一方面又突破了他们的框框，用客观、历史的论述和评判进行系统研究，使法国的汉学研究向着现代化的道路前进，形成了法国汉学界的一代新风。

谢和耐的汉学研究无不体现了作为一名著名的历史学家那种高屋建瓴的恢弘的气势，但同时他的微观方面所做的细致研究也达到前人所未曾有过的程度，令人敬佩。1975 年他在法兰西学院任教期间对中国明末社会和文化生活研究时，不仅注意到了 16—17 世纪许多思想家，如王延山、刘献廷、唐、王夫之等，同时对万历到康熙初年中国人与耶稣会士的接触，明末的社会、书院、教育和科举等也给予了充分的关注。他在博士论文《中国 5—10 世纪的寺院经济》中，不仅从整个社会背景来考察寺院经济，同时还根据汉籍、印度佛经、敦煌和其他西域文书等重要文献，对佛图户、寺户、僧祇户、常住百姓、碾户、梁户、长生库、社邑、斋供、三阶教无尽藏等都做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其细致入微程度，令人敬服。

谢和耐视野开阔，涉及面广，且每一领域的研究都有新的发现和独到见解，下面仅就中国社会发展史、敦煌学和中国基督教史三个方面加以分析和介绍。

1. 中国社会发展史。

谢和耐对中国社会发展史的研究既是宏观的又是微观的。也就是说，如果从他的整个立意来看，显然是高屋建瓴，气贯长虹，是宏观的，他是要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做一全面的、历史性的考察。但在具体考察时，我们又不难发现，他是那样地深入细致，尽可能注意到每个细节。这在他的两部主要反映中国社会的著作《蒙古入主中原前夕中国中原的日常生活》和《中国社会史》中分别有明显的体现。

《中国社会史》(*Le monde chinois*)[1]是他宏观构思的典型,全书由导言、上古时代、军人帝国时代、自宋至明的官僚帝国、近代中国、当代中国、跋和附录这几个部分组成。上古时代只有一编,即第一编"从古代王权到中央集权国家";军人帝国时代共三编:第二编"中央集权国家的兴盛衰败",第三编"中国的中世纪",第四编"从中世纪到近代";自宋至明的官僚帝国也是三编:第五编"中国的'文艺复兴'",第六编"从汉化诸帝国到蒙古人入主中原",第七编"专制君主和太监的统治";近代中国共两编:第八编"专制的宗法制度",第九编"从衰退到外辱";当代中国也是两编:第十编"灾难深重的中国",第十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新篇章"。《中国社会史》是一部通史教材,作于1964—1972年中国"文革"期间。1980年第二版修订时又经过增益,增加了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一章,即《从与苏联决裂至毛泽东逝世》一章。1990年第三版修订时又增加了《从毛泽东逝世至八十年代来的中国》一章,随时紧跟历史本身的发展。

作者在撰写此书时注意到了如下两点:一是注重技术史,二是注重中外文化交流史。但无论是在技术史研究还是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作者都是从宏观出发进行论述,力求给读者留下清晰而高屋建瓴的全貌印象。诚如作者在《中国社会史》汉译本序中所言:"我非常注重技术史。同时,我认为虽然技术与社会发展是不可分割的,但它们对于改变历史起着决定影响。诸如中国文明初期的青铜器、战车和文字,公元前1000年就在延伸于东欧到蒙古之间的全部平原和草原地区的作为坐骑的马匹,战国时代的炼铁、以合理方式套马车以及脚镫马驾等等。从10世纪起便经常性地印刷著作使中国印刷术较欧洲先进了500年,而水稻种植业的进步又促使形成一个市民发展高潮并使城市人口高度集中……所有这些新事物都同时要伴生根本的变化。"[2]

在论述到中外文化交流史的时候,作者反驳了中国文化是孤立、封闭的论点。因此,作者在全面地描述中国整个历史发展过程时,注意从相互

---

① 该巨著的英文版标题改称《中国文明史》(*A Histor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法文版的《中国社会史》,收入《世界之命运》丛书,巴黎,阿尔芒-科兰(Arman Colin)出版社,1972年版,1980年修订版,1990年第3版。有意大利文译本(1978)、德译本(1979)、英译本(1982、1983、1985)、罗马尼亚文译本(1985)、朝鲜文本(1985)、西班牙译本(1991)、中译本(耿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等(耿昇:《法国当代汉学大师谢和耐》,《法国当代中国学》)。

② [法]谢和耐著,耿昇译:《中国社会史》,中译文序,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页。

影响这一角度进行论述，且客观公正，条例清晰。作者在谈及此书写作目的时曾指出，在数千年来不停发展的过程中，中国与远近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在政治制度、法律、技术、经济和文化生活上都是相互影响的，虽然中国“以其幅员和气候的差异而独自形成一个世界”，但它在不断受到外界的影响的同时，也“不停地”对世界上其他地区“直接或间接地施加最广泛的影响”。[①] 在作者看来，如果不能认清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所施加的影响，那显然也不能认清西方文化自身。如此，既克服了旧史学缺乏洞察力的弱点，又避免了新史学忽视历史表象的特征，标志着作者新、旧史学方法的打通和兼容。正是从这种辩证的观点出发，作者对中国历史的评价，对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地位的看法，特别是对于中国近代史的论述，才能得出正确而客观的看法，并得到汉学界的好评。

该书一出版，立即在西方汉学界引起极大反响，《史学杂志》(Revue historique)曾称赞此书为“一部巨著，是东西方语言中的第一部通史，是一种坚实的、光辉灿烂的、完美的综合”。[②] 该书曾荣获法国最高学术奖圣杜尔奖(Prix Saintour)，旋即被译成英、罗(罗马尼亚)、意、韩、葡、德、西等国文字。英、美以及西方许多大学还将此书用为中国通史的教科书。但是，《中国社会史》是以一人之力写作中国通史的第一次尝试，又由于是教科书性质，所以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作者思想的发挥。

如果说《中国社会史》一书更为突出的是他的宏观的掌控的话，那么在《蒙古人主中原前夕中国中原的日常生活》[③]一书所体现的则主要是他的微观的考察。该书是法国出版的一套有关各个国家日常生活丛书的一种。[④] 他所选定的时期是南宋王朝末年(1227—1279)，挑选的区域是杭州地区。这一历史时期，正是宋国都陷入蒙古人之手前的数十年；而杭州地区，尤其是杭城本身，也是当时所称的临安是南宋都城所在，既是中国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和最富庶的大都会，因此很有代表性。该书的一大特色就是作者在宏观思路下作微观考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他广泛地研究了这

---

① [法] 谢和耐著，耿昇译：《中国社会史》，中译文序。

② 王志平：《谢和耐与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国际汉学漫步》，第353页。

③ 巴黎，哈切特(Hachette)出版社1959年版，1978和1990年由同一出版社再版。后出版了英译伦敦版(1962)、美国斯坦福大学(1977)版，匈牙利文译本(1980)，中译台北版(1982)、意大利文本(1983)、日译本(1990)、中文新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

④ 关于中国的只有两部，其中一部就是此书，另外一部是有关清代日常生活的。

一时期中国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竭尽全力地详细地描写了包括城市、社会、衣、食、住、生活周期、四时节令、天地万象、消闲时光等,其中还有许多问题是前人未曾注意过的,如火灾与消防、交通与供应等,应有尽有,堪称南宋社会的百科全书。

2. 敦煌学研究。

谢和耐对敦煌学颇有研究,他的《中国5—10世纪的寺院经济》、《从9至10世纪的敦煌文契看中国的销售制度》、《敦煌写本中的租骆驼旅行契》等文章,尤其是他的博士论文《中国5—10世纪的寺院经济》在这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在这篇论文中,作者的重点是在于分析从南北朝到五代期间的中国寺院经济。该文除了因对佛图户、寺户、僧祇户、长生库、社邑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而在微观研究上取得惊人成绩之外,更为突出的(也是他对该领域所做的突出贡献)是,对整个佛教寺院经济现象做出了全面的考察而没有局限于经济范畴。作者从社会方面做了尽可能的解释,并做出了出色的成绩。也就是说,作者并没有把佛教寺院经济看成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把它视为社会现象的一部分,因而将它放在广阔的社会大背景下,从社会学角度加以综合考察,并在许多方面发前人之所未发。显然也是一种方法论上的革新。对此,谢和耐在为中译本写的序中这样认为:他采纳的那种首先把佛教现象看成是社会现象的社会学观点至今仍不是论述中国寺院经济的著作中普遍采纳的出发点。这是因为这种社会学的方法与历史学的方法比较,操作起来相对困难一些,尤其是广阔的社会现象往往不是能一览无余的,它需要大量的广泛的调查和分析工作。因为该文的这一独到之处,至今仍为法国敦煌经济文书研究方面唯一的一部重要著作。

还应指出的是,谢和耐的这篇文章所以能取得如此成绩,跟他所据有的独特资料有关。在谢和耐之前,并不是没有汉学家涉及这一领域,也不是没有学者尝试利用敦煌卷子来研究佛教寺院经济,但许多学者因种种原因无法获得第一手资料,亲眼目睹敦煌文献原卷,所以效果不尽理想,自然也留有遗憾。而谢和耐则是亲自参与编写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的伯希和敦煌汉文卷子详细目录的学者,亲眼目睹了这些宝贵的原卷,并利用了这些第一手资料,如碑铭和写本等,这在当时显然是得天独厚的,也是他取得前人所无法取得的成果的一个重要原因。鉴于以上因素,谢和耐的《中国5—10世纪的寺院经济》得到法国和国际汉学家的高度评价。法国学者将

此书与戴密微先生的《吐蕃僧诤记》并列为两大敦煌学名著，1957年，蒲立本(E. Pulleyblank)在莱顿出版的《东方经济社会史学报》第1卷第1期书评中高度赞扬该书，同年，美国著名的汉学家芮沃寿(A. F. Wright)在《亚洲研究杂志》中发表书评时称此书"为用现代科学标准来编写中国史迈出了重要的一步"。①

3. 基督教研究。

基督教研究是谢和耐主要学术领域之一，他除了著有《中国和基督教》外，还写有《中国人的智慧：社会与心理》和诸多论文，如《论17和18世纪的中欧交流》、《利玛窦的归化政策和1600年左右中国文化生活的演变》、《16世纪末至17世纪中叶的中国哲学和基督教》、《中国对基督教的第一次冲突》、《论1584年的第一部中文教理书的不同文本》、《17世纪的基督徒和中国人的世界观》、《利玛窦时代的中国文化形势》、《基督教在中国的首次同化尝试》等。但他的有关基督教历史的观点主要体现在《中国与基督教》和《中国人的智慧：社会与心理》这两部著作中，尤其是前者。

《中国人的智慧：社会与心理》②是作者的一部论文集，收入作者从1955—1992年的一些文章。从该书所收的论文可以看出作者论述主题之广泛，显然能充分地施展作者的宏观视野。全书分为"导论"、"政治与社会"、"人类学与宗教"、"思维方式"和"文字"等五部分。其中"政治与社会"部分收有"中国城市考"、"关于国家"、"历史与农业"、"人或文陂"、"论责任概念"、"儒教改革"、"16与17世纪的宴集、社团与交际"、"教育"等论文。"人类学与宗教"部分收有"论蛮夷的道德"、"他者的形象"、"裸葬"、"5至10世纪的中国佛教徒的焚身自杀"、"基督教在中国的同化问题"、"中国与耶稣会传教士第一次接触时的政治与宗教"等论文。"思维模式"部分收有"社会与思想史"、"论形神"、"冥想的技术、宗教与哲学"、"王夫之的哲学与智慧"、"怎样读史"、"论变化概念"、"中国与欧洲碰撞中的时空、科学与宗教(17—18世纪)"等论文；"文字"部分收有"文书与历史"、"文字的外形及心理学功能"、"灵祐语录"、"近海集"等论文。内容涉及中国农业发展变化、唐甄及明末清初思想、唐律、宋代及明清思想史、明代的集会及结社、中国一系列教育制度、佛教徒自焚、基督教归化和

① 王志平：《谢和耐与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国际汉学漫步》，第331页。

② 此书是由法国巴黎加里玛尔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

入华时的政治宗教形势、中国社会思想史、基督教与中西文化交流等,应有尽有。

诚然,比起《中国人的智慧》来,他的《中国与基督教》(*Chine et Christianisme*)①一书成就更高,也更具学术价值。

1982年,正值利玛窦入华传教400周年之时,谢和耐在巴黎加利玛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名著《中国和基督教》。该书一出版就引起了学界高度重视,先后被译为意大利文、西班牙文、英文,汉译本就有两种。

犹如在他的其他著作中一样,从该著作中我们可以发现,他也十分注重这样两个方面:一是关于中西文化比较;二是注重技术史的影响,如基督教传教士所带来的科学技术研究。

《中国与基督教》一书由"同情到敌视","宗教态度与同化现象","宗教与政治","中国人的道德与基督教道德","中国人的天和基督教的上帝"等部分组成。书中详细分析了明清鼎革之际中国与西方基督教世界在政治、历史、社会、思想、文化,尤其是世界观和伦理方面的异同,主要对中国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的各个方面加以比较研究,通过中国人和传教士的自述,对比宗教以及社会形态、道德规范、政治、哲学、语言等方面的差异,表现了中西文化在第一次真正接触时所发生的强烈碰撞。

该书的重点并非研究传统的传教史,而是研究传教过程中的中西文化冲突,以此来研究中西文化的特质。因此说,作者并不注意去研究"基督教在中国的历史",而是重点研究"中国人对基督教的反应"。② 他认为,基督教没能在中国稳固扎下根来,其原因并不如人们常说的是因为中国人排外,而是因为源于西方的基督教要求中国人完全改变他们的思想方法和宇宙观。他说,基督教神学里的范畴是与西方逻辑学的范畴不可分割的,并且与所用的欧洲语言密切相关,所以中国人难以接受。他在研究清代中国人对基督教的反应时指出,在中国和在西方,对人和对世界的概念有着根本的不同,上帝的信仰来自于西方人的思维结构,而中国人"把世界看作为

---

① 《中国与基督教:作用与反作用》(*Chine et Christianisme. Action et reaction*,1982),此书的英文版标题改称《中国与基督教的撞击,两种文化的冲突》(*China and the Christian Impact: a Confliet of Cultures*,1985)。此外还有德译本(1984)、意大利文译本(1984)、英译本(1985)、西班牙文译本(1989),中译本(耿昇译),由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出版等。

② [法]程艾兰:《法国的古代中国研究》。

一个有机的整体,因而并不需要一个创世者的上帝”。[1] 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人对外来思想的反应是“消极”或是“否定”的。

谢和耐在谈到传教士传教而带来的科学知识时指出,传教士所带来的科学知识,虽然对中国科技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基督教所传入的并非是当时最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而且其传授科学技术的目的也是为了更广泛地传播宗教。谢和耐对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采纳的是一种理性主义的态度。

四、吴德明、汪德迈和侯思孟

1. 吴德明(Yves Hervouet,1921—),原名保尔·莫里斯(Paul Maurice),汉名吴德明。法国下卢瓦尔省勒穆耶人,就读于格勒诺布尔大学文学院,巴黎国立东方语言学校中文系。1947—1949 作为领取奖学金留学生在北京(当时的北平)从事中法文化交流研究工作。这段时间,他被中国文学所吸引,聆听了游国安、吴晓铃、俞平伯三位先生的课程。回国后,在戴密微的指导下,撰写有关司马相如的论文。1951 年,派往远东学院做研究工作,1954—1955 获洛克菲勒基金资助,参观访问欧洲各国的中国图书馆。利用这次访问所收集的材料,撰写了《欧洲图书馆中国方志目录》和《欧洲图书馆中国期刊目录》,并作了有关 50 年代欧洲图书馆中国图书资料的报告。回国后,于 1955—1959 年间,任法国高等汉学研究所图书馆管理员。1959 年被派往波尔多大学中文系担任系主任工作。1964 年在东方语言学校通过博士考试。也是从这一年开始,接受由白乐日先生提出的《宋计划》的书录工作。1969 年巴黎第八大学成立中文系,被调回第八大学。1973 年 7 月 16 日第 29 届国际东方学家大会[2]在巴黎举行,吴德明任秘书长。他还参加筹备建立法国研究中国协会(AFEC)工作。1974 年起任高等汉学研究所所长。1976 年起任巴黎第七大学中文教授。1978 年在香港出版《宋代书目》。1979 年兼巴黎第七大学东亚语言文化教学研究单位即巴黎第七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主任,任期三年。1980 年 4 月 26 日法国研究中国协会在巴黎召开成立大会,吴德明和比昂科一起共同担任大会主席,并在这次大会上当选为协会主席。在他担任此项领导职务的多年期

① [法]程艾兰:《法国的古代中国研究》。

② 自第 30 届大会起更名为国际亚洲和北非人文科学代表大会。

间,还负责出版协会刊物《中国研究》(*Etudes Chinoises*)。曾获法国骑士级勋章和法兰西学院棕榈叶奖状。担任过前法国总统顾问。退休后,仍任高等汉学研究所所长职务。

吴德明以专攻中国古典文学著称,著有《法国远东学院的中文手稿》(1955)、《汉代宫廷词赋家:司马相如》(1964)、《蒲松龄:聊斋志异选》(1969)、《〈史记〉第117篇——司马相如传,编辑并译注》(1972)、《宋代书目》(1979)、等;此外,他还在《东方经济史和社会史杂志》(英文,莱顿)、《亚洲杂志》(法文,巴黎)等专业刊物上发表有大量文章和书评。

在法国的中国文学研究中,关于"赋"或者说散文诗的研究凤毛麟角,而吴德明的《汉代宫廷诗赋学家:司马相如》和《〈史记〉第117篇——司马相如传,编辑并译注》可以说在这方面做了"非常深入的研究",论述了这位文学家的生平及诗赋作品。但要指出的是,作者主要还是将这位诗人置于了广义的历史背景中加以考察,而并不是文学发展史中加以论述。① 1969年,他与于儒伯一起编译的《蒲松龄:聊斋志异选》由巴黎加利玛出版社出版,书中包括《王成》、《青风》、《辛十四娘》、《白莲教》、《马介甫》等26篇作品,书前有吴德明所撰写的"序言",对《聊斋志异》进行了介绍和分析。

2. 汪德迈,原名莱翁·范德尔梅尔斯(Léon Vandermeersch,1930—　),汉名汪德迈。曾任巴黎第七大学教授,1979—1980年间,改任国立高等实验学院第5部,即宗教科学部(Ve Section: Sciences religieuses)研究组主任,从事中国宗教研究。80年代初期任巴黎高等汉学研究所第586组,即中国文学与历史研究组教授,并主持出版工作。② 法国研究中国协会最早的会员之一和欧洲研究中国协会会员。

汪德迈长期从事语言学、古代中国和中国宗教研究,尤其以古代中国政治思想与制度以及儒家学说史研究著称,著有:《法家的形成》(1965)、《王道:有关古代中国治理体制精神之研究——第1卷:文化结构和家庭结

① [法]苏远鸣:《法国汉学50年》,《当代法国中国学》,第83页。

② 高等汉学研究从90年代开始不再从事经常性的教学工作,主要从事编写《道藏经》书目和图书管理、出版书刊等方面工作。桀溺教授主持图书馆委员会工作,汪德迈教授负责出版委员会工作。曾出版《高等汉学研究所丛书》(*La Bibliothèque de l'I'H. E. C*,即"绿色丛书")、《高等汉学研究所论文集》(les Mémoires de l'I. H. E. C.)和《汉学索引,书目与文献研究丛刊》(*Les Travaux d'index. de bibliographie et de documentation*)3套丛刊。

构》(1977,1978)、《王道:有关古代中国治理体制精神之研究——第2卷:政治结构和礼仪》(1980)、《新的中国圈世界》(*Le Nouveau Monde sinisé*,也译《新汉文化圈》,1986)、《"中国的书法和书写语言"研讨会结束语》(1982)等。

《新汉文化圈》(*Le Nouveau Monde sinisé*)①是作者的一部力作。全书除引言(汉文化圈的昨天与今天)外,共分三部,第一部"经济",共两章:"独特的增长活力"和"相同的发展结构";第二部"政治",共四章:"中日关系","朝鲜问题","中国的统一"和"中越危机";第三部"文化",共两章,加一结论和附录,这两章是:"汉字——共同的遗产"和"儒教社会的演化",结论是,"新文化圈的崛起"。该书从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方面全面论述了汉文化区域各国和地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如何清理历史陈迹,医治战争创伤,步入现代化所走过的不同历程,其中尤以文化部分引人注目。所谓的"新汉文化圈",主要包括长期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日、朝、越等国家,还加上新加坡,中国的台湾、香港等地。这一地区,无论各国政治制度如何不同,经济发展水平怎样悬殊,但历史上都属于中国文化的影响范围,也就是作者所说的"汉化"。正如译者在前言中所述,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这一地区曾长时间称雄于亚洲大陆东端,与印度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基督教文化等区域并行不悖。"同以上其他几个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文化区域不同,汉文化区域并无一个上帝或一个佛祖来作为其精神支柱",但这一文化区域所表现出来的"内聚力"并"不比任何一个其他文化区域弱"。这是什么原因?按照作者的意思,一个重要原因是"有一个共同的文字基础——汉字"。译者指出,文字是写在器物上的语言,是思维的工具,它不可避免地要对思维过程发生影响。文字又是思想的记录、文化的载体,"得力于汉字,汉文化才得以流传经久,光芒远布","汉字的广泛采用,为中国古代各种思想向周边国家和地区传播提供了一个理想的通道,在一千多年的长时间内保证了汉文化源源不断地传入周边国家,成为这一地区占支配地位的文化形态"。随着西方殖民主义势力的东渐,亚洲汉文化区域各国和地区都经受了不同的遭遇,尤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各国经济发展也不平衡。何以会出现这一现象呢?作者指出,这些国家和地

① 关于该书的一些情况和评价,请参阅陈彦的《译者的话》,[法]汪德迈著,陈彦译《新汉文化圈》,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

区,虽然同属于汉文化圈,但"汉化"是相对的,因此,国家的经济发展,现代化进程的快慢,"关键并不在文化因素",而应"将文化与经济、政治因素联系起来考虑",才"有助于我们在对传统文化重新考虑时正确把握文化因素的地位"。古老的汉文化是否能适应我们今天重振中华,实现现代化?综观国内外对这个问题的探索,可以发现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正当国内学术界讨论怎样从传统的泥沼中拔出来,勇于吸收西方文化、建设新文化的同时,国外的汉学界却因为被称为亚洲"四条小龙"的经济崛起,甚至近几年来中国改革带来的经济发展的新速度而大谈汉文化传统对现代经济发生的巨大动力。

该书于1986年5月问世,正值国际上关于世界经济中心由大西洋地区向太平洋地区转移的讨论掀起高潮时。该书从历史文化层面上深化了这一讨论,也可能是满足了当时读者的需求,因此该书一问世,旋即被翻译成日文,并获得普遍的好评。《世界报》的一篇评论文章写道:"将经济与政治的发展放在历史、文化的整体背景上考察,是《新汉文化圈》一书的一个重大成功。通过这本书,汪德迈给我们指明了现代并非只有西方化一途"。①

3. 侯思孟(Donald · Holzman,1926—　),原名铎纳儿 · 霍尔兹曼,汉名侯思孟,法国汉学界一位持有法国国籍却大部分著作用英文撰写的学者。出生于美国伊利诺州的芝加哥城。中学毕业后,考入耶鲁大学攻读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1954年,以阮籍五言诗的论文获博士学位,是年28岁。1957年,年轻的侯思孟来法教书、游学,在戴密微指导下,以嵇康的生平和思想为题,于该年获得第二个博士学位。80年代初任巴黎高等汉学研究所(Institute des Hautes Etueds Chinoises - I. H. E. C)所属第586组,即中国文学与历史研究组(ERA586)主任②,后任高等汉学研究所所长职务(约在1986年或1987年),后任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Ecole des Hautes Etudes en Science Sociales - E,H,E,S,S)研究员,从事中华帝国制度研究,并担任副主任。1993年退休前任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研究所所长,

① 转引自陈彦:《译者的话》,《新汉文化圈》。

② 当时该组有研究人员18人,研究明清话本小说,成绩卓著,翻译出版《喻世明言》、《搜神记》等小说,由雷威安主持,编辑出版了《中国通俗话本小说分析与评论性目录》(*Inventaire analytque et critique du conte chionois en langue vulgaire*,Paris,1978,1979,1981)。

接替白乐日工作。他曾在密西根大学、京都大学、普林顿大学、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加州伯克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校执教。

侯思孟跟他的老师戴密微一样，也是一位兴趣广泛的学者，举凡文学、历史、音乐、绘画、戏剧等，无不爱好，尤其对中国文化和中国诗歌有着很深的体会。他以研究中国文学和历史著称，著有《嵇康的生平及其思想》(1957)、《诗歌与政治：阮籍的生平与作品》(*Poetry and politics: The Life and Works of Juan Chi*, 1976)、《中国上古和中古早期的山水诗的产生》(1996)；此外，还写有《竹林七贤和他们所处的时代的社会》(1956)、《中国诗歌中追溯出的最早期五言诗》(1974)、《公元3世纪早期的中国文字批评》(1974)、《嵇康的诗，第1部分》(1980)、《嵇康的诗，第2部分》(1980)、《老舍：北京居民》(1982, 1983)①、《为政治服务的艺术》(1987)等。

1976年写成的《诗歌与政治：阮籍的生平与作品》一书是部成功的作品，饶宗颐先生对其评价很高，认为："阮公有灵，自当惊知己于千古也已。"②该书一出版，一时间"好评如潮，并最终获得了翟理斯(Giles)奖"③。全书分为：《导论》、《早期的魏朝诸帝》、《东平》、《暗杀与退却》、《反礼教》、《儒家论文与对庄子的奇异理解》、《社会与孤独》、《长生的好人》、《追求长生》、《神秘主义》、《大人先生》、《诗歌》、《结论》几个部分。其中《导论》、《早期的魏朝诸帝》、《东平》、《暗杀与退却》等章节主要介绍阮籍的生平以及他与此时诗歌的关系，其中涉及到他的家庭与曹魏宗室的传统关系，魏晋之际的政治巨变在他诗歌中隐晦、曲折的反映等。当时曹氏政权与司马氏政权的政治地位已经主客移位，而阮籍却能周旋其间，卒以无恙。作者认为，原因是司马氏政权对阮籍有所偏爱。《反礼教》至《大人先生》这些部分则着重从思想角度探讨阮籍诗歌的内在含义，如诗歌中的孝道、儒家的立场、孤独、神仙思想、神秘主义等。《诗歌》一章是对阮籍现存诗篇的数量、形式及艺术特色的研究，着重于诗歌的本身研究；这一章有很多精彩的发现，如阮籍的《咏怀诗》与建安诗歌"午夜烦恼"主题相似，阮籍

① 老舍的中短篇小说选集，合作翻译的有 Paul Bady, Li Tche - houa, Françoise Moreux, Alain Peyraube, Martine Valette - Hemery, Paul Bady 作序，Gallimard, 1982。《北京居民》的载《中国研究》1983年第2期内(Paris, Etudes Chinoises, N. 2/1983)。书名系几位法译者所加，非作者老舍原用名。

② 王志平：《侯思孟与汉魏文学》，《国际汉学漫步》，第443页。

③ 王志平：《侯思孟与汉魏文学》，《国际汉学漫步》，第443页

诗歌与摩尼教的“善”、“恶”观念的相似等。[①] 该书是侯思孟的代表作,有评论认为,该书有两个特点:“其一,本书以阮籍的作品作为主要依据来介绍他的生平、思想,因此,在研究方法和结构方式,表现了与众不一的特色;其二,作者分析阮籍的作品有其独到的见解。”[②]评论者还认为:此书保持了侯氏一贯的“思路开阔、头脑敏捷、治学细致的特点,能够使宏观和微观相结合,并不仅仅局限于就事论事,而纵横捭阖,左右逢源”。[③]

侯思孟对敦煌学、中国人伦理道德观也颇有研究,曾为戴密微的《敦煌曲》一书的编译写有书评(载于《通报》杂志第61卷,1975),给予极高评价。在中国伦理道德观念方面,他曾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信使》杂志专门写有《孝子与孝女:古代中国长期遵奉的孝道》,发表在该刊物的中文版1987年第1期,即总第79期上。该文引述了许多中国典籍,阐述了孝道是中国最古老的崇高目标的基石这样一种看法。

第三节　二战后法国汉学的走向

二战后的法国汉学家们不仅没有在挫折中消声匿迹,反而在新形势下积极进行反思,把目光从古代转向当代中国,在研究思路上更注意引进现代哲学、心理学、人类学等,于是法国的汉学开始从重古代和文献学(或语文学)转向重近现代和社会科学(含人类学),法国汉学的研究出现了新的走向。

一、关注近现代中国史的研究

战后法国汉学界对于中国历史的研究,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仍然停留在古代中国而不是现代。也就是说,汉学家们感兴趣的主要是元朝之前的中国,而从清末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段历史的研究,几乎是“真空地带”,更不用说1949年后的中国历史和现状。在教学方面,甚至是法国最大的学府,都认为不设20世纪中国课程“绝非不正常”。这一情况说明,法国的中国历史研究很大程度上只停留在考狄的4卷本《中国通史

① 王志平:《侯思孟与汉魏文学》,《国际汉学漫步》,第445页。

② 自王志平:《侯思孟与汉魏文学》,《国际汉学漫步》,第450页。

③ 自王志平:《侯思孟与汉魏文学》,《国际汉学漫步》,第450页。

及其与外国的关系》(1920),或皮埃尔·勒努宛(Pierre Renouvin)的《远东问题(1840—1940)》(1964)的水准上。可是,在这一时期的美国、日本、俄罗斯,甚至是英国、德国、意大利等国的大学里,早已开设有现代中国的课程,而且成绩卓著,获得巨大发展。

法国重视中国近现代研究始于50年代,纪亚玛(Jacques Guillermaz)和谢诺(Jean Chesneaux)是两位开创者。两人均为研究院院士,其中一位是军人,另一位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他们的勇敢开拓下,到了80年代,法国的20世纪中国研究有了较大的进展。据有关资料统计,在1985—1993年间,法国出现了96部有关近代和当代中国实况的博士论文(国家级或根据新条例所撰写的论文),其中有半数(48部)涉及到中国与国际关系,且大部分出于汉学家之手。更重要的是一些重要的科研和教学机构已不同程度地开设出研究课题,或开设出相关课程。我们从如下几份资料可以看出,从50年代开始法国汉学家在现当代中国研究方面所做出的努力。

第一,战后法国中国研究中心的三项主要项目,都是关于现当代的研究:(1)《辛亥革命资料》(*Materiaux sur la Revolution de* 1911),原版于1957年至1980年期间共有出版8卷,由白吉尔负责,新版由武汉华中师范大学章开元教授担任准备工作。新版将增添许多西方国家和日本文献。(2)"20世纪上海历史"研究,白吉尔负责。(3)"当代中国文学(Littérature de la Chine Contemporaine)",于儒伯领导的法-中研究和教学合作项目。

第二,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Ecole des Hautes Etudes en Siences Sociales)"当代中国研究和资料中心"90年代的一份研究项目,有关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也已基本占主导地位。主要有:《民国时期的都市社会》、《20世纪中国的农民运动和农村社会》、《19世纪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与现代化问题》、《20世纪中国几位女作家的生平著述》、《毛泽东去世后中国的经济形势变化与体制改革》、《清末的技术转让(1840—1911)》、《1979年以来中国对外政策的调整》、《中国的人口过剩、农田水利及加速农业发展的办法(陕北及湖北中部地区历史和现状考察)》①等。

第三,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中国语言文化系"所开设的课程,主要有:《中国近代史(1840—1949)概论》、《中国现代史(1949—1981)》、《中国近

① 黄庆华:《法国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0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编辑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百年哲学思想》、《中国医药学历史》、《佛教对中国哲学传统的影响》、《明清中国社会史》、《19和20世纪中国经济社会史》、《中国文化运动(1915—1949)》、《20世纪中国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史(1921—1949)》、《中国共产党史文选》[①]等,不难发现,其中除《中国医药学历史》、《佛教对中国哲学传统的影响》之外,其余的均为中国现当代的内容。

第四,全国政治基金会国际调查研究中心中国与远东部(Fondation Nationale des Sciences Politiques-Centre des Etudes et de Recherches Internationales, Section Chine - Extrême - Orient, 1967),一个专门研究中国政治生活的研究单位[②],80年代时,全部研究人员均从事中国现代史研究,主要内容有:(1)1920年至1949年中国共产党主义研究;(2)1949年以来中国国内政治演变的研究;(3)1949年以来中国与世界其他部分的关系演变研究。该单位的中国与远东部在1979年末至1980年初还采用了由高达尔设计的一项集体科研计划,研究当代中国政治史的地区方面的工作,项目名称为:"在社会的各种不同的运转水平上,中国在全国一致和地方多样性之间保持的均势"。该部每年还经常举办介绍中国和远东地区信息的集会,面对全社会,举行"中国,蒙古以及中国的穆斯林"、"中国和日本"、"当代中国的历史和政治生活"、"20世纪中国政治社会史和对外关系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演变"等报告会。[③]

此外,里昂国立研究中心于1992年创建的"东亚研究所"与里昂第三大学合作,成立国立研究中心第1579联合研究组(URA1579)[④],重点研究"东亚的城市和都市社会"。[⑤]

法国战后的中国研究,随着中国国力的日益强大和开放政策的推行,也有可能是受到美国中国学的影响,尤其是从70年代后期起,部分从事中

---

① 黄庆华:《法国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② 1980年底有人员5名(后来曾有6名):让-菲利普,白夏(Jean Philippe Beja,研究专员)、高达乐、程映湘(参加协助者)、让-吕克、多梅纳克(Jean - Luc Domenach)、胡至曦(Hu Chi - Hsi,音译,副研究员),卡达尔任主任。

③ 参阅《世界中国学家名录》高达乐条目,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外事局合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

④ 主持人安可强(Christian Henriot)。

⑤ 参见 Alain Roux, *La Recherche en France depuis* 1950 *sur l' Histoire de la Chine au XXeSiècle*,中译文见鲁林:《法国对20世纪中国史的研究》,《法国当代中国学》;又见[法]近现代中国中心网页(httpééwww. ehess. frécn tres. écecmc)。

国近现代研究的学者对中国现实情况发生浓厚兴趣，开始开设中国“现状”的课题并提出研究项目，如，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开设的“当代中国经济和社会历史”课，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开设的“中国现代史：1949—1981”课，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进行的“毛泽东去世后中国的经济形势变化与体制改革”、“1979年以来的中国对外政策的调整”、“中国的人口过剩、农田水利及加速农业发展的办法（陕北及河北中部地区历史现状考察”等的科研项目等。与此同时，一些有关中国现状的文章和著作也相继问世，如《邓小平时代的中国意识形态与政治》（巴斯蒂）、《80年代初中国的教育、青年和社会透视》（巴斯蒂）、《80年代中国的教育方针与经济发展》（巴斯蒂）、《毛以后的中国》（毕仰高）、《中国的新面目》（毕仰高）、《中国大陆和台湾的人口变化》（毕仰高）、《毛泽东》（毕仰高）、《邓小平时代的人口问题》（毕仰高）、《中国的一次社会危机》（杜铭纳 Fean - Luc Domenach）、《大跃进渊源：1956—1958》（杜铭纳）、《中国人口问题研究复兴》（贾永吉）、《2000年中国人口问题的前景》（贾永吉）、《中国第三次人口普查的教训》（贾永吉）、《一个法国共产党员目光中的社会主义中国三十年》（鲁林）、《人民中国》（鲁林）、《中国的开放政策——新的开端，还是绝路》（谢瑞尔，Yves Chevrier）、《中国，文人“统治的终结”？——西化时期的政治和文化》（谢瑞尔）、《中国，一种新的公产主义》（谢诺）、《中国，人民共和国：1949—1979》（谢诺）等。法国学者的这一研究走向，无疑对加深中国现状研究起了促进作用，但因为这些学者本来大多从事近代研究，因精力和时间有限，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又削弱了法国对19世纪中国的研究力量。①

二、1975年后的中国哲学研究

二战后法国哲学研究，以1975年法兰西学院设立“中国社会文化史”讲座为重要标志，从那以后，法国的中国哲学研究“才算是羽毛完全丰满”。② 占据“中国社会文化史”讲座的是谢和耐，他在这一教席上一直工作到1992年。这位继戴密微的汉学大师，在中国哲学方面的成就跟他的

① 黄庆华：《法国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② Léon Vandermeersch et Anne Chen, *Les études chinoises en France —Histoire de la philosophie, confucianisme*. 中译文见[法]汪德迈、[法]程艾兰：《法国对中国哲学史和儒教的研究》，《世界汉学》创刊号，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1998年。

历史研究一样,也是驰名遐迩,且影响了整整一代汉学家。

特别要指出的是,战后法国的中国哲学研究,跟中国本土60—70年代意识形态的深刻复杂变化有着紧密的关连,尤其是儒教研究的命运更是如此。1966年,中国"文革"期间,当儒教遭受批判时,法国的儒教研究也一度衰落,汉学家们把目光转向了道教和佛教。直到80年代开始,儒教在中国本土得到恢复名誉,法国的儒教研究也再度引起重视。佛教的研究由于得到戴密微及其弟子的重视,则一直在继续地发展。

令人感兴趣的是,中国哲学在这一时期的法国,主要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只是学者的"领地",而是有着广泛的大众基础,尤其是人们对于中国的儒教的兴趣日渐增强,公开的报告会、学校授课或文化机构的讲演、广播和电视等在这方面都表现得十分活跃,这也许是由于从80年代始,中国本土对儒教重新引起重视有关。此外,还有两点必须指出,1)出于对中国诸多哲学观点的关注,战后的法国汉学界出现了集体翻译《淮南子》热情,这是更晚些时候的事。2)在上世纪60年代,法国形成了研究中国占卜的高潮,其范围除了有关本义上的占卜术之外,研究者还关注占卜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它的宗教和思维方式之间的关系等。①

儒家研究。

战后从事儒教研究的主要有谢和耐、汪德迈等。汪德迈从法家转向中国古代的儒教,在他的一部重要的两卷本著作《王道》(1-2卷,巴黎1977年和1980年版)中得到集中的体现。这部作品以广泛的金石文献资料为基础,大幅度地修订了葛兰言《中国人的思想》中所提出的问题,集中地体现了他对上古中国研究的成果。他的工作既是对葛兰言研究的补充,也是批评。葛兰言的结论是建立在中国古代神话这一重要主题上的,而汪德迈的结论则是依据对社会制度的研究。汪德迈努力把研究放入传统的中国历史背景中,并在研究中注意吸收中国现代学者的成果。他应用商周甲骨文和金文中的材料来完善葛兰言的研究,使得西方直到马伯乐一直弃而不用的资料得以发挥作用。汪德迈对这些材料进行了新的综合研究,从中找出一些能够解释所有问题的共同原则,来说明社会组织结构,并赋予上古中国以特有的思维心理结构。他与葛兰言不同,不只是提出中国文化大的

① 参阅马克(Marc Kalinowski):《法国战后对中国占卜的研究》,《世界汉学》创刊号,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1998年。

题目而不顾及历史发展，相反，他从研究整个商周时代社会制度出发，从而得出华夏文明一些大的恒定因子，特别是家族观念及礼仪观念。该著作可分为三个部分：1）商周时代的家族结构；2）政治结构；3）礼仪结构。在结论中他研讨了一些主要的社会制度的原则，认为正是这些原则构成王道的本质，而所谓王道也就是在儒家学说中明白表述出来的一种政治的人道主义。他认为中国儒教的人文主义思想如同商周上古"王道"达到了巅峰一样，已成了整个中国文化的基础，同时也成了一种可以普遍使用的模式，而且，随着岁月的流逝，实际上已移植到亚洲其他的文明之中。他的《新的汉文化圈》（1986）一书，就是研究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汉化"问题，他认为，"汉化"其实其中大部分就是"儒教化"的过程。同时，他还关心当代新儒教思潮的变化和发展，认为中国的儒教思想是东亚当代发展的动力。

继谢和耐、汪德迈等之后，从事儒学研究的是一批年轻的汉学家：程艾兰、朱利安、马克等。他们的研究既体现了法国中国哲学研究的传统，又体现了年轻人的多视角。如程艾兰在《论语》（1981）、《汉代儒教研究，一种经典诠释传统的形成》（1985）和对王弼（226—249）的研究中所体现的就是一种政治学和历史学的观点；而朱利安在《鲁迅，文学与革命》（1979）、《影射的价值，中国传统中的诗歌解释类别，对于文化相异性的思考》、《平淡赞》（1991）等著作中，更多的则是借用符号学来分析中国文化；马克使用的则是一种更严格的汉学家角度，表现更加专业化的愿望，从而对"已被人接受的思想和被普遍采纳的模式提出了挑战"①。

佛教研究。

20世纪法国对佛教的研究，可以追溯到沙畹、伯希和与马伯乐，他们一反雷慕沙、儒莲等19世纪汉学家旨在"旁证印度佛教史实"②的思路，而着重于"汉传佛教"的研究。这一研究在40至70年代在欧洲文化圈内"可称为黄金时代"，③其情形可以从三种期刊的出版和"两位佛学大师及其弟子"的著作中看出。这三个刊物是《佛学书目》、《汉学和佛学丛刊》和《法

① Léon Vandermeersch et Anne Chen, *Les études chinoises en France —Histoire de la philosophie, confucianisme*. 中译文见［法］汪德迈、［法］程艾兰：《法国对中国哲学史和儒教的研究》，《世界汉学》创刊号。

② ［法］郭丽英：《法国对汉传佛教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世界汉学》，创刊号，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1998年。

③ ［法］郭丽英：《法国对汉传佛教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宝义林》。

《佛学书目》主要发表研究印度、中国汉地、西藏等地区的文章。先由让·普祖鲁斯基(Jean - Przyluski, 1885—1994)主编,后由拉露(Marcelle Lalou, 1890—1967)女士继任。第1—3卷(1928—1931)由巴黎保罗·哥特纳书局于1930—1933年出版;第4—32卷(1931—1958)由巴黎麦松奈夫出版社1934—1967年出版。《汉学和佛学丛刊》在比利时普鲁塞尔由瓦累·普散(Louis de la Vallée Poussin)创刊,主要发表包括汉学、佛学、藏学及蒙古学等多方面的文章,已出26卷。《法宝义林》是根据汉文和日文编辑而成的大型佛教百科全书,本是为向印度佛教学家介绍汉文典籍的产物,于1926年创刊。由烈维(Sylvain Lévi)和戴密微及留欧的日本印度学家高南顺次郎(Takakusu Junchiro)共同协助下创办。

法国"两位佛学大师及其弟子",是指戴密微和拉摩特(Etienne Lamotte, 1903—1982)以及戴的学生等人。有关戴密微,请参阅相关部分。拉摩特是比利时执教的汉学家,曾译有《维摩经》(戴密微为此书写有附录:《〈维摩经〉的中国影响》一文),注有大量汉文佛典,如《首楞严三昧经》,近2600页的《大智度论》前52页的译注等。

从1931年开始,戴密微先后在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巴黎大学(Sorbonne)和高等实验研究学院第4部(历史语言研究部)任教,1940年后又在欧、美、日讲学,所以,在佛学研究上,受他影响的弟子不少,如:专门研究印度小乘佛教的安德烈·巴罗(André Bareau,1921—1993),应用巴利文献,研究早期佛教旁证、佛家弟子结集、部派和佛本传等;汉学家谢和耐,利用敦煌写本写成《中国5—10世纪的寺院经济》、《5—10世纪中国佛教僧侣火焚自杀》(1960)等;[①]专攻日本文学的贝纳尔·佛蓝格(Bernard Frank)研究佛家图象,所用基本资料均以汉传佛教典籍为主;在戴密微的推动下,巴黎国立图书馆敦煌文献资料研究组于1974年成立,于是苏远鸣也从道教和世俗文学转向佛信仰的探讨研究,研究地藏信仰、佛教地狱观念、佛教斋日、宝卷与洞窟画像等;专攻唐朝佛教史的福安敦在戴的提拔下,就职法兰西远东学院的日本京都《法宝义林》研究所,在关于唐朝武则

① 此书不仅是研究中国佛教寺院经济,同时也是研究日本、印度寺院经济的必备之书,研究亚洲中世纪经济史的重要参考书。[法]苏远鸣:《法国汉学50年》。

天时期的佛教政治和思想史方面作出不少成绩。[①]

此外，这时期还有一些从事比较研究的汉学家，如福安敦和比利时裔法国人戴路德（Hubert Durt）[②]研究由中土传入东土日本的佛教，而专攻日本佛教的杜见（Robert Duguenne）和弥永信美则主要上溯到印度和汉籍的渊源。[③]

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欧美对于佛教的研究趋向于某一特定宗派研究，法国也是如此，如佛博纳（Bermard Fauer）和戴思博的佛教禅宗研究、罗禅能（Jean－Noël Robert）的日本天台宗研究、吉荷德（Fédéric Girard）的华严宗研究等。[④]

道教研究。

在整个西方的哲学发展历史上，道教研究起步较晚，16—18世纪的传教士因种种原因，不仅没有关注道教，反而对其极其轻视；法国对道教研究真正引起重视的是伯希和和马伯乐两位汉学家。二战后的法国道教研究可以说起始于50年代，开创者是葛兰言和马伯乐的两位弟子康德谟（Max Kaltenmark）和石泰安（Rolf A. Stein）。他们从亚洲归来以后，就在巴黎高等学院第五“科学宗教”组开始了道教研究生涯。在那里，每周举行一次研讨会，后逐渐形成了一种学术气氛和学者的圈子。他们两位便成了法国战后献身于道教研究的第一代学者、法国道教研究的学术带头人。成果颇丰，且培养和造就一大批弟子。从60年代开始，这一学者圈子又不断地有美国的学者加入，使得阵营声势日见扩大。[⑤]

总地看来，战后法国道教研究可分两个时期：康德谟、石泰安时期和施舟人时期。[⑥]

---

① ［法］郭丽英：《法国对汉传佛教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② 拉摩拉的弟子，后继任《法宝义林》的主编。

③ ［法］郭丽英：《法国对汉传佛教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④ ［法］郭丽英：《法国对汉传佛教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⑤ 参阅［法］安娜·塞德尔著，蒋见元、刘凌译：《西方道教研究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一章导言，第5页。

⑥ 林富士先生把法国道教分为这样四代：以马伯乐为开山祖师，则其同辈有戴密微；第二代则有石泰安、康德谟等，而第三代更是人才辈出，道教界熟知的苏远鸣、施博尔、索安士、贺碧来、司马虚等都是。至于傅飞岚、贝桂菊、穆瑞明（Christine Mollier）等则可算是第四代。［中］林富士（留学法国并在法工作的中国台北中研院史语所研究员）：《法国对中国道教的研究》，《法国当代中国学》，第289页。

康德谟和石泰安时期的主要研究家就是康德谟和石泰安。

康德谟以研究中国宗教思想,尤其是道教思想著称,发表有诸多有关道教的著作和文章。他因长期研究东汉历史,对马援(时称伏波将军)颇为崇拜,于1946年在北京出版两卷本《制伏波涛的人》(1948)。1953年,他在北京出版了《列仙传:古代道教仙人的传说传记》,该全译注本的出版为他赢得了荣誉,"一下在世界上引起瞩目"。该书也被誉称为"可能"是欧美"第一部正规的道教研究书",[①]或"第一本道教的'圣传'"。[②]但是,在道教发展史上有更重要地位的是他的另一部作品:《老子和道教》(*Lao tseu et le Taoïsme*,1965,1969)。这是一部全面介绍道教历史的著作,全书对道教作了"各种叙述",具有"教科书"或"百科全书"性质。[③]该书的学术价值一直受到重视,直至1990年,评论家仍然认为,在"全面"介绍"道教史"方面,还没有一本著作"能超过"它。[④]

石泰安(Rolf Alfred Stein)在道家研究方面,并没有大部头著作问世,但他的为数不少的有关道教文章颇具影响,尤其是关于道教礼仪方面的论文。1963年他与康德谟、德国杜宾根大学汉学系创始人艾士宏(Werner ichhorn)共同研究《太平经》,并在《通报》第五十期上发表长篇论文《论公元2世纪道教的政治宗教运动》。此文陈述了后汉道教运动的社会和政治性质,显示出道教在汉代中国社会中制度上的基础,[⑤]"在研究上都反映了新的看法"。[⑥]该书已译成日文出版。他对中国民间灶王爷传说、道教炊事节目和远东微型花园等也颇有研究,发表多篇文章,如《远东之庭院式的盆景——小世界》(1900)。此外,还写有《东亚女神的洞穴——子宫和寺观》(1988)。

施博尔(Kristofer Schipper)时期被称为法国道教研究的第四代。该时期的主要研究者除施博尔外,还有苏远鸣(Michel Soymié)、贺碧来(Isabelle Robinet)、索安士(Anna Seidel)、侯锦郎、劳格文(John Lagerway)、戴思博

① [日]福井康顺等:《道教》第3卷,第242页。

② 李养正主编:《当代道教》中国道教协会网:法国的道教研究 www.taoiste.org.cn。

③ [法]安娜·塞德尔:《西方道教研究史》,序言,第2-3页。

④ [法]安娜·塞德尔:《西方道教研究史》,序言,第2-3页。

⑤ 参阅朱越利的评介文,1981年第3期《世界宗教资料》等,李养正主编:《当代道教》中国道教协会网:法国的道教研究 www.taoiste.org.cn。

⑥ [日]福井康顺等:《道教》,第3卷,第243页。

(Catherine Despeux)、穆瑞明(Christine Mollier)、傅飞岚(Franciscus Verellen)等。这一代与过去不同的是,研究领域广泛,重点突出而又深入,国际学术交流频繁。他们不仅是西方道教学术的带头人,同时也推动了国际社会对中国道教文化的认识;而且,这一代人才济济,有很强的活动能力,不仅汉语应用自如,还精通多种西方语言。他们中大多数人又来过中国大陆、台湾,对中国道教现状十分熟悉,在研究方法上多用西方盛行的人类学、社会学、比较宗教学等,而且紧密联系社会和人的现实需要,故在不少领域都有开拓。①

这一代法国道教研究领军人物是施博尔,他重点研究我国传统道教和自闽粤传入台湾岛的民间文学作品(尤其是潮洲纸影戏),同时也研究比较社会学。他著作甚丰,著有《格林普斯的"列子"法译本》(1963)、《道教传说中的汉武帝》(1965,1969)、《台湾之道教文献》(1966)、《道教:宗教仪式的传统》(1968)、《〈抱朴子内篇〉要目索引》(1965)、《〈抱朴子外篇〉要目索引》(1970)、《略论功过格的作用》(1972)、《道教》(1973)、《道教仪注中的手书节略》(1974)、《〈黄庭经〉要目索引》(1975)、《〈道藏〉要目索引》(1975)、《台湾:庙宇》(1976,署名马里尼斯·普兰斯)、《道士的身体》(1978)、《玉历—"老子中经"注》(1979)、《中国皮影戏唱册写字集》(1979)、《"道藏"计划:〈云笈七签〉索引》(1981—1982)、《道教本体:身体,社会体》(1982)、《在中国的嗜毒癖》(1982)、《道教中的乡土仪式和经典仪式》(1985)、《唐代的道教仪注和地方祭礼》(1985)、《评灵宝派仪式的发展》(1988)、《道教仪式中的目连戏》(1989)等。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他所主持的"《道藏》索引"②编辑工作和专著《道教的总体》。

施博尔曾担任欧洲研究中国协会秘书长多年,该协会曾安排了3项重要国际学术研究计划:"中国的国家、理论和现况"、当代中国文学和编辑"《道藏》索引"。施博尔就是"《道藏》索引"计划负责人。该项目是欧洲科学基金会(European Science Foundation)在中国研究领域中进行的一项补充研究活动,同时也被列为法国全国科学研究中心第625组协作研究项

① 中国道教协会网:法国的道教研究 www.taoiste.org.cn。

② 欧洲研究中国协会3项国际研究计划之一,其他两项是:1)"中国的国家,理论和现况",由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学院政治学教授和现代中国研究所所长美国学者施拉穆(Stuart Raynolds Schram)负责,从经济入手,研究中国;2)"当代中国文学",由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马悦然(N,G。D。Malmqvist)教授负责,出版中国作家及其作品的多卷手册。

目,委托法国远东学院主持,出版《道藏》各种经文索引,参与该项目的中国学家主要来自丹麦、法国、意大利、荷兰、瑞士、德国和英国等。该项研究编号是 RCP625,RCP 是"协作研究项目"(Recherches cooperatives sur programme)的略称。项目名称为"道藏经分析与描述性书目",内容是系统审核《道藏经》中的各种著作,编制索引。要通过分析研究,确定《道藏》经文著作(自明朝时期作品算起,约 5500 卷)为数众多的作者,他们的流派和写作日期。研究开始于 1983 年,工作地点设在现属法兰西学院远东研究院的"道教研究文献中心"。中心还使用电子计算机和汉语拼音,建立一个"道教史信息数据库"(La Banque de données informatisée sur l'histoire du Taoïsme),并将有关资料制成诸多缩微胶片,供学者复制或查阅。他第二项有影响的研究项目是他的专著《道教本体:身体,社会体》(*Le Corps taoiste, Corps phisique, corps social*)。该书于 1982 年在巴黎出版,是部介绍道教信仰和实践的入门书,专门强调有关各种神明等级的教义。有评论认为,该书是一部"最能反映他学术观点"[①]的著作。全书共分十部分,全面地展现了有关道教的内容:道教史、每日宗教、宇宙论、神明和精神力量、众主神及其礼仪、道之体、气功、炼丹术等。该书出版后,意大利学者首先将其译成意大利文于 1983 年在罗马出版,接着荷兰于 1988 年出版了荷兰文本,1993 年美国学者卡伦·杜瓦尔夫人(Karen Ouval)译成英文,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

伊莎贝尔·罗比内(Isabelle Robinet,中国名贺碧来),中国历史和文化教授,以研究上清道教,尤以内丹著称,是位多产的道教研究者。她的《7 世纪以前对道德经的评注》(*Les commentaires du Tao to king Jusqu'au VII e siècle*,1977)和《道教的冥想》(*Métitation taoiste*,1979)在学术界颇有影响,得到好评。[②]《7 世纪以前对道德经的评注》一书系统地阐述了严遵、河上公、王弼、梁武帝、周弘正、成玄英等对《道德经》的评注。她认为,严遵的注"属于'哲学的'道家学说",但由于同佛教学说的"对抗"而做了"一系列的调整"。她又认为"由于河上公的缘故,《道德经》成了既是一本讲统治术的教科书,又是一本讲长生不老方法的教科书。因此,河上公的评注摆脱了庄子、淮南子、韩非子或严遵等把《道德经》看作是掩盖政治考虑的

① http://www.gb.taoism.org.hk/海外道教研究:法国的道教研究,执笔人:陈耀庭。

② [日]福井康顺等:《道教》,第 3 卷,第 246 页。

那种本体论，也完全不同于后来的王弼对《道德经》所作的那种形而上学的解释”，而王弼注是“代表称之为第三世纪玄学的新道学派的看法”。[①]该书被称为通观了从西汉严遵的《老子指归》到唐代成玄英的《老子道德经注》的一部著作，“研究了《老子》的主要注释本”，颇有启发意义，且篇幅浩瀚，长达333页，她的研究是有启发性的。[②]《道教的冥想》“对早期的用以修身养性的《黄庭经》作了导读性介绍”。[③]有评论认为，该书“是过去十年里西方出版的有关中国宗教的最重要的书的一种”，它“对于上清传统的奥妙的和神秘的技术的广泛考察”，“完整而准确地描述了独一无二的想象的宇宙论，躯体的象征体系，星宿旅行，内丹，存想术以及茅山或上清运动的仪式实践——它构成了全部道教的最重要的基础传统之一”。[④]1993年，加拿大帕斯（Julian F. Pas）和美国吉拉多特（Norman Girardot）将该书译成英文，书名为：《道教的冥想：茅山的上清传统》（*Taoist Méditation: The Mao - shan Tradition of Great Purity*），苏尼（Suny）出版社在奥尔巴尼出版。此外，她还出版有《道教历史上的上清派的革命》（1984）《14世纪前的道教发端史》（1991）等。

索安士（Anna Katarina Seidel，安娜·卡塔琳娜·赛德尔，中文名石秀娜），德裔法国著名道教研究学者，也是世界著名道教研究者之一。索安士大部分精力和时间用于编辑和教学工作，虽然没有巨著留世，但她的篇幅不大的专著《西方道教研究编年史（1950—1990年）》（*Chronicle of Taoist Studies in the West* 1950—1990）在西方道教研究历史上有着重要地位。该书用英文写成，发表在《远东亚细亚研究纪要》1989—1990年第五号上，全书共分十部分：序言；I. 导论；Ⅱ. 道藏中老庄的精神；Ⅲ. 资料；Ⅳ. 道教历史；Ⅴ. 道教的世界；Ⅵ. 中国文化中的道教；Ⅶ. 道教和佛教；Ⅷ. 中国域外的道教；Ⅸ. 今后展望；X. 参考文献。其中以第五部分最长，述及神仙、洞天福地、灵宝五符、河图洛书、内丹、外丹、仪礼、偶像等内容。其次第六部分述及皇宫的天崇拜、官场和儒教、艺术、诗歌、书法、绘画、民间宗教和医学。“全文综述了西方汉学界所感兴趣的研究范围，而且还是献给中华人

① http://www.gb.taoism.org.hk/海外道教研究：法国的道教研究，执笔人：陈耀庭。

② 中国道教协会网：法国的道教研究 www.taoiste.org.cn。

③ 中国道教协会网：法国的道教研究 www.taoiste.org.cn

④ http://www.gb.taoism.org.hk/海外道教研究：法国道教研究。

民共和国同行的作品”。[①] 有西方评论认为,该书是一部“令人敬畏的、鼓舞人心的和纪念碑式的”著作。[②] 此外,她还写有《早期道教救世主信仰中理想统治者的形象——老子和李弘》(载《宗教史》1969—1970 年第 9 卷每 2—3 期合刊)、第二次国际道教研究文集《道教面面观》、1974 年为《大英百科全书》第十五版第十七卷撰写的长篇词条“Taoism”[③]和 1990 年在日本东京出版的德文版《道教:中国的非官方宗教》等。

经半个多世纪绵延不断的努力,道教研究在法国学界逐渐形成“一股风潮,一个传统”,并使法国成为“西方道教界的龙头”。值得一提的是,“法国道教界其实也可以说是西方道教界的一个中心或一个缩影”,因为在上述学者中,除少数出身法国本土外,大都来自四面八方:有的来自瑞士,如戴密微;有的来自奥地利,如康德谟;有的来自德国,如石泰安;有的来自美国,如劳格文、司马虚。长久以来,“巴黎可说已成为所有道教研究者想探个究竟的宝山”。[④]

法国汉学界的道教研究既有强项也有“空白或薄弱的地带”,大致情况可以说是这样:如在道教的传播,道教的历史、道教的社会经济活动、道教与政治权利的互动关系、道教音乐、道教医学、道教文学、道士的生命史及群体史研究等方面,“都有待补强”。但是,法国汉学界对道教的基本文献整理、译注和研究,对道教经典、仪式、方术、信仰、艺术及其与佛教的关系的探索,结合历史文献和田野工作而成的“历史人类学”的研究途径,对“跨学科”研究的强调和对梯队工作的重视,对国际学术动态和资讯的掌握和交流,“都有其值得”其他国家研究者“学习的地方”。[⑤]

法家。

战后法国法家研究的主要成果有汪德迈的《论法家思想内部的形成,对古代中国一种典型政治哲学形成的研究》(1965),乐唯(Jean Lèvi)的《盐铁论》(1978)和《商君书》(1981)等。汪德迈通过中国春秋战国的经

① 中国道教协会网:法国的道教研究 www.taoiste.org.cn。

② [法]安娜·塞德尔《西方道教研究史》,序言,第 2-3 页。

③ 该文把道家和道教结合起来探讨中国宗教——哲学传统,主要内容有:性质和意义、道教的基本概念、哲学的道教、宗教的道教、道教和其他宗教、道教和中国文化。中国道教协会网:法国的道教研究 www.taoiste.org.cn。

④ [中]林富士:《法国对中国道教的研究》,《法国当代中国学》,第 289 页。

⑤ 参阅[中]林富士:《法国对中国道教的研究》,《法国当代中国学》,第 289 页。

济社会变化以及同时代其他思潮的比较，极力阐明商鞅、申不害、慎到和韩非子等“法家”的思想，为此，他还关注中国的刑法术。而乐唯则更关心法家的政治、哲学主张。

三、中国文学的三个“热点”

战后法国中国文学的翻译和研究呈多元化现象，从50年代开始，到七八十年代，在法国汉学界形成了空前的中国文学“热”，他们不仅跟前辈一样，寄热情于中国古典文学，同时还把目光投向中国现代文学，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对现代文学的关注超过了古典文学，规模也更大，出现了中国古典诗歌、中国古典小说和中国现当代文学三大热点。①

1. 热点之一：中国古典诗歌热。

法国对中国古典诗歌从19世纪开始就持有特别的热情，二战后又有了重大的发展，其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首先，戴密微的中国诗歌翻译和研究，其主要贡献是：一、进行了唐代民间诗人王梵志研究；二、50年代末至六七十年代，由他发起联合法国当代知名汉学家共同研究、编译、出版《中国古典诗选》(1962)。前者不仅使他的许多弟子走上敦煌俗文学的研究这条路，同时也推动了远东学者有关《王梵志诗集》和《太公家教》的研究；后者不仅推动了法国汉学界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和研究工作，同时，尤其是《诗选》翻译的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唐朝诗人的诗词，促使法国20世纪的《唐诗》翻译和研究出现一个新高潮。

第二，研究方法和思路的活跃和多元局面。有从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和民族心理角度对中国古诗作宏观透视的，也有从某一特定时期的文化背景出发对某个作家、某一主题、某一门类钩沉发微的，归纳起来，其基本方法如下几类：一、从论述整个历史时，论述到作家诗人的生平和创作，如关于“赋”或者说散文诗的研究，吴德明先生的《汉代宫廷诗赋学家司马相如》(1964)和《‘史记’第117篇——司马相如传，编辑并译注》(1972)等，使用

① 战后法国中国文学总体研究，苏远鸣提到马古利埃斯(Georges Margouliès，1949－1951)两卷本的《中国文学史》和康德谟的《七星诗社百科全书，文学卷》第一章的《中国文学》(1955)。他认为后者“出自一位汉学家之手的第一篇有价值的综合论述”。[法]苏远鸣：《法国汉学50年》，《当代法国中国学》。

的就是这种方法,且做过"深入的研究";[①]使用同样的方法是侯思孟,他对公元3世纪文化与文学运动,尤其是对嵇康和被称为"竹林七贤"的其他几位人物的研究。[②] 二、桀溺先生的方式,他更倾向于文学批评而不是历史背景的探索。他认为"必须对著作本身及其当时意识形态和社会背景进行研究",才"能使人了解这种文学的本质",并"领会在中国读者眼中过去使之成为或现在成为美的东西";[③]他在此领域内出版的《中国古诗19首》(1963)和《中国古诗之起源——汉代抒情诗研究》(1969)、《牧女与蚕娘》(1977)、《曹植文集通检》(1977)等中使用的就是这种研究方式。三、程纪贤的研究思路。他在《唐代诗人张若虚的诗歌结构分析》、《中国诗语言研究》等作品中,把中西方文论结合起来研究中国诗歌。前者"用一种严密的分析",即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详尽、透彻地分析这两首诗,在批评方法上是一大突破。后者是前者研究的延续和扩展。在这部著作里,程抱一除了更娴熟、更系统地运用结构主义方法之外,还运用了符号学的理论来分析唐诗,尤其是唐代律诗的语言特征。他认为,如果把整个中国的诗歌当做一种语言,并借用西方的"符号学"的设想,便可发现隐含中的规律。与此同时,他认为,中国诗的结构理论基础是中国的传统思想,中国诗歌的语言和中国宇宙观之间有着共同的因素。于是他选取了"虚实"、"阴阳"和"天地人"三组概念来"透视"中国诗歌。以"虚实"透视中国诗歌的语汇层次,以"阴阳"透视句法层次,以"天地人"透视象征层次。通过这样的分析,他完成了关于中国诗歌的"符号学"研究。[④] 他的研究成果"颇具意义"[⑤]。

第三,最后要提及的是,上世纪末出现了寒山诗歌译介高潮和汉学专著《悲秋:古诗论情》。寒山的热潮是随着敦煌写本大量发现,禅学引起中外学者极大关注而出现,因为这位诗人"无论在言行还是诗歌都禅味十足",[⑥]在西方这一热潮中,法国成了"风向标",直接地影响了德、比、荷、瑞

---

① [法]苏远鸣:《法国汉学50年》,《当代法国中国学》,第83页。
② [法]苏远鸣:《法国汉学50年》,《当代法国中国学》,第84页。
③ [法]苏远鸣:《法国汉学50年》,《当代法国中国学》,第84页。
④ 周发祥:《试论西方汉学界的'西论中用'现象》,《文学评论》,1997年,第7期。
⑤ [法]苏远鸣:《法国汉学50年》,《当代法国中国学》,第84页。
⑥ 胡安江:《绝妙寒山道——寒山在法国的传布和接受》,载《中国比较文学》,2007年第4期。

典、捷克等国。[①] 其主要成绩有吴其昱的《寒山研究》(1957)、雅克·班巴诺(jacques Pimpaneau,中文名字班文干)的《达摩流浪者:寒山诗25首》(1975)、郑荣凡(音)和哈维·科勒合译的《寒山:绝妙的寒山道》(1985)、卡雷·帕特里克的《云深不知处:流浪汉诗人寒山作品集》(1985)和日本学者柴田真澄夫妇的法译著《碧岩录:语录和禅诗》(2000)等。《悲秋:古诗论情》(Tristes Automnes,2001)[②]是郁白(Nicolas Chapuis)的作品。这位外交官汉学家,毕业于巴黎第七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先后任法驻华使馆文化参赞、法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和驻上海总领事。他在外交生涯中深切体会到了中国文化的魅力,也使他有机会同中国文化精英相与往还。他曾翻译出版有钱钟书、杨绛的作品和多部中国文学名著,《悲秋》是他的一部学术力作。书中,作者"凝眸于"中国古典诗歌的"'悲秋'主题",结合中西文学批评,"从《诗》、《骚》源头到唐诗"作"深入研究"。作品中散发着浓烈的西方风味,有龙萨、拉马丁、雨果、马拉美、波德莱尔等与中国古代诗人的遥相唱和,也有着深厚的法兰西人道主义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命运的关注。它既是诸多西方汉学家、文论家对中国问题深邃透视的体现,也是作者对中国古代"本体论"所阐发的"独特""见解",是法国中国古诗词研究的"一次有益探索"。[③]

2. 热点之二: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热。[④]

西方读者对中国古典短篇"风俗和言情"小说"颇为好奇",而对长篇小说则似乎"望而生畏"。[⑤] 法国读者也是如此。但随着1957年《西游记》法译本问世,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的翻译和研究日渐引起法国汉学界的关注,并有了明显突破。先交代一下《西游记》翻译出版的情况。《西游记》最早被译介到法国是19世纪中叶的法国汉学家泰奥多·帕维(Théodore Pavie),在法国出现的最早较完整的注译本是莫朗译的《西游记》百回选译本,书名为《猴与猪:神魔历险记》,1924年由巴黎笛子出版社出版,附有安

---

① 胡安江:《绝妙寒山道——寒山在法国的传布和接受》。

② 郁白著,叶潇、全志刚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③ 许钧:《法公使郁白汉学专著〈悲秋:古诗论情〉》,原载《文汇读书周报》,引自中国台湾网:WWW China taiwan. org,文化与交流。

④ 有关这小节内容,主要参考宋柏年主编的《中国古典文学在国外》(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年)、胡文彬的《〈红楼梦〉在国外》(中华书局,1993年)和钱林森的《中国文学在法国》等作品,无特殊情况不一一注出。

⑤ [法]雷威安《法国对中国文学史的研究》,《法国当代中国学》。

德烈·维尔德的插图。战后《西游记》法译本的译者是路易·阿弗诺尔(Louis Avenol),1957年由巴黎瑟伊尔出版社出版。他根据的是上海文成书店1907年石印本选译的。全书分为两卷,第一卷封面印有孙悟空彩色画像,内容是原书的第一至第五十三回,第二卷封面印有唐僧彩色画像,内容是原书的第五十四回至第一百回。书中有关宗教、地名、人名等专有名词采用上海远东法文学校的译名,译文多采用意译,并附有不少注释,其目的是为法国读者能深入理解原文含义。[①] 该书被认为是"一种语言流畅的译本"[②]。

战后出现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热的关键措施是195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一项决议,该决议决定选译东方国家名著编一套"东方知识丛书",由加利玛出版社负责出版。中国古典名著法译工作由法兰西学院院士罗歇·卡约瓦(Roger Cailois)先生和著名比较文学家艾琼伯先生负责。他们把《红楼梦》、《金瓶梅》、《水浒传》、《聊斋志异》等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古典小说列入翻译计划,从而在七八十年代形成了中国古典小说法译的黄金时代,其中以《红楼梦》所引起的反响最大。

《水浒传》最早由19世纪法国汉学家安托尼·巴赞(Antoine Bazin)介绍给西方读者,最早出现单行本是在1922年北京政闻报社出版的《水浒传》,书名为《中国的勇士们,民俗传奇小说》,全译了《水浒传》的前十二回,全书共219页,附有插图,但并没有太大反响。《水浒传》的译本在法国引起巨大反响的是1978年法译全本的问世。该书由加利玛出版社出版,列入七星文库。全书分上、下两册,有明代绣像插图,用经久的圣经纸印刷,皮面,烫金边。艾琼伯作序。译著的问世轰动了法国文学界和汉学界,尤其与以往不同的是,它在读者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被公众推为"1978年年度之书",译者雅克·达尔斯(Jacques Dars,汉名谭露客),也因此荣获该年度法兰西文学大奖。[③]

《水浒传》法译本所以获此书荣,一方面在于作品本身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征服了颇为本国文学自豪的法国读者。他们认为,该作品"以广阔的生活画面,深刻地反映了中国12世纪的社会面貌,从农民到地主、官

① 宋柏年主编:《中国古典文学在国外》,第424页。
② [法]苏远鸣:《法国汉学50年》,《当代法国中国学》,第86页。
③ 宋柏年主编:《中国古典文学在国外》,第402页。

吏,从佣人到妓女,社会的每一阶层的人物都得到了详尽的描述",是一部"希腊荷马式的'史诗'","《水浒传》之于中国,颇似希腊人的《伊里亚特》、印度人的《罗摩衍那》、日本人的《平家物语》,西班牙人的《堂吉诃德》和俄国人的《战争与和平》",它所提供的"绝妙的东方场景",跟西文的"三剑客,圣格木其、懒骨头"一样驰名,使人感觉在读"大仲马和拉伯雷合写的一部史诗——一部讽刺史诗。"①另一方面,该书的成功跟译者雅克·达尔斯的辛勤工作分不开。译者用了8年的时间圆满地完成了翻译工作,并写了前言和详尽准确的注释。"这是一种艰巨而细致的劳动,艺术家的劳动。"艾琼伯先生称赞说:它是所有译文中"最忠实、最优美的译文","由于达尔(即达尔斯——引者)的工作,这颗中国文学的明珠终于随着其法译本的诞生而成为我们散文中的瑰宝,我们文学作品中的经典"。②

《水浒传》法译全本的发行,"不仅说明了法国人对《水浒传》本身的高度重视和高度评价,而且也表明法国和西方汉学界对中国灿烂文化的尊重和承认"。③

法国人最早知道《红楼梦》是19世纪,那时出版的《法国大百科全书》中就曾谈到这部中国名著,但它的全译本及对它有分量的评论则要等到20世纪80年代(显然要比英国晚得多)。经过漫长的寂寞,使法国的《红楼梦》翻译和研究掀起高潮、迈上新台阶的是华裔汉学家李治华和陈庆浩。

李治华是位颇有影响的教育家。早年赴法,精通中西文化、熟谙法语,且有厚实的汉学功底。40年代,在法国高等学府教授汉语,培养了一批汉学家,当今西方学术界不少有名望的汉学研究工作者大多是李先生的高足。李治华一直热心于将中国文学翻译介绍到法国,译著颇丰,尤以《红楼梦》翻译更为突出。该书是他与法籍夫人雅克琳(Jacqueline Alézai's)几十年心血的结晶。全书由法国加利玛出版社出版,列入《东方文学》丛书,七星文库。全书3200页,卷首有译者及艾琼伯分别作的序,书中附有插图和注释。译本的序言是一篇很有分量的评论文章,颇受评论界的好评。这个译本的前八十回是根据脂砚斋译本译出,后四十回根据程乙本译出。《红楼梦》这样一部反映广阔社会生活的巨著,总计120回,涉及440多个

① 宋柏年主编:《中国古典文学在国外》,第402-403页。

② René Ètiemble: *Au bord de l'eau* · Préface。

③ 宋柏年主编:《中国古典文学在国外》,第403页。

人物,包含各种不同的韵文体载。除诗词外,还有歌、赋、诔文、对联、谜语等。要使译文既忠实、准确而又流畅、优美、实在不是一件易事,它要求译者既有深厚的中国文化修养,熟悉中国的乡土人情,又要精通法语,有坚实的法国文学功底。显然,李治华先生正是这样一位理想的人选。该译本忠于原著,译文优美,充分体现了我国翻译界信守的"信、达、雅"三原则。[①]译本的校译者是李治华的老师铎尔孟,他曾在中法大学和北京大学教授法国文学、诗歌、戏剧等课程,对中国和法国文学都造诣极深。铎尔孟为译文倾注了许多心血,并以诗人的眼光对译文精雕细琢,为译本中诗词翻译做了许多润饰。《红楼梦》的译诗一般采用亚历山大体(Alexandrin),传达了原诗的韵味,保持了中国古典诗词的完整性,为译著增添了独异的魅力。[②]由于译文能传达原著的神韵,所以能使西方读者真正发现了"曹雪芹的文学天地",领略到这部文学巨著的独特魅力。[③]

《红楼梦》全译本出版后在欧洲受到热烈的欢迎。法国、瑞士、比利时等国近20家报纸、杂志和电台都纷纷发表消息和评介文章。[④]

陈庆浩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在台湾著名红学家潘重规的指导下,曾主持过《红楼梦研究专刊》的编辑,后在巴黎第七大学任教,并在远东研究中心任研究员。他的《新编石头记脂砚斋评语辑校》和法文版《脂评研究》等,不仅在法国,同时在国际《红楼梦》研究界都享有重要的地位。《辑校》一书资料完备、校勘精细、注释准确;而《研究》一书在脂评内容、分类、年份的推断、批者研究等方面,都作了全面系统的考察,特别是该书的总论部分,对红学研究发展的历史所做的全面概述和评论,更是见解独到。[⑤]

最早翻译《金瓶梅》的是法国19世纪著名汉学家巴赞,法译文的书名为《武松与金莲的故事》,收入1853年法国巴黎出版的《现代中国》一书第二版中,其实只是选译《金瓶梅》中的第一回。接着是19世纪中期的汉学家莫朗,书名为《金莲》,是根据张竹坡第一奇书本译出,由巴黎夏庞蒂埃与法斯凯尔出版社于1912年出版,全书294页。有资料认为,该书不仅是

---

① 宋柏年主编:《中国古典文学在国外》,第403页。

② 可惜他在第二遍校译至五十四回时,不幸逝世。

③ 宋柏年主编:《中国古典文学在国外》,第534页。

④ 宋柏年主编:《中国古典文学在国外》,第534页。

⑤ 胡文彬:《〈红楼梦〉在国外》,中华书局,1993年,第144-145页。

法国，同时也是欧洲最早的《金瓶梅》节译本。[1] 后来还出现了两种由德国汉学家库恩的节译本转译的《金瓶梅》节译本。一是由波雷（Porret）翻译的《金瓶梅：西门与其六妻妾奇情史》，其第一卷在1949年由巴黎居伊勒·普拉出版社出版，共300多页。这个转译本还有1953年修改版的第1卷，342页；两版都附有保罗·拉维涅（Paul lavigne）撰写的导言一篇。据说，这个译本的第一卷出版后，深受到法国读者的欢迎，但法国官方担心西门庆的生活方式会给法国社会带来不良影响，因而下令将该书查禁。直到1979年禁令取消，出版社才得以将全书的后两卷出版。二是由约瑟夫－马丹鲍尔（Joseph－Martin Bauer）及赫尔曼·海斯（hermann Hesse）等集体翻译的《金瓶梅》，由巴黎卡尔曼－莱维出版社于1962年出版，一卷436页。

《金瓶梅》全译本称《金瓶梅版话》，译者是波尔多大学中文系主任雷威安（André Lévy），一位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专家。该译本于1985年也纳入巴黎加利玛出版社的“七星文库”，译本除雷威安自己写的长篇《导言》外，还有汉学家艾琼伯的《序言》，代表了这一时期法国《金瓶梅》研究最高水平。雷威安翻译的《金瓶梅版话》全译本，“可称西方迄今最完全、最忠实的译本，也是第一部直接从中文译成法文的译本，从而使法国读者得以窥见这部在中国位居‘四大奇书’之首的文学巨著的本来面目”[2]。艾琼伯在序言中称赞它“明畅易懂，完整，而且忠实于原文”。[3] 译著在前言中谈到翻译此书情况时说：“对于用口头叙述方式的传统套语，以及穿插在叙事中用韵文形式表达的评论或回忆，我都完整地给予保留”，对于原书中的诗词部分，他放弃了逐字译出的“直译”的方法，而是更“尊重叙事的自然流畅，同时保持小说的结构和原来的抒情风格一致”。[4]《金瓶梅》中原文开篇有八首韵文辞，译者在译文中尽力保持其原状，译为八首法文诗。这一点是以往译文所不及的。译者还注意到：“《金瓶梅》这部书无疑是中国文学所提供的最‘辛辣’的小说”，由于一部分章节涉及下层社会，因而用语有高雅和粗俗之分，在翻译过程中应注意区分。对于原书中的谚语、成语，

① 宋柏年主编：《中国古典文学在国外》，第442页。
② 宋柏年主编：《中国古典文学在国外》，第444页。
③ 宋柏年主编：《中国古典文学在国外》，第444页。
④ André Lévy, *La Fleur en Fiole d'or*·Introduction.

他也尽可能保持古色古香的风味。[①] 从选择小说译名上尤见雷威安的严谨的翻译态度。原书序中说书名是影射书中的三位女性人物的名字:金莲之"金",瓶儿之"瓶"和春梅之"梅"字。在中文里可以把这三个字并置,而在法文中必须倒置成文:"梅花插在金属的花瓶中。"他说:"'金'指金属,五行属金,属西,属秋,属煞;'瓶'指细颈的花瓶,使人联想起富有生殖能力的花托;'梅'指梅花,严冬或初春盛开,准时,但也有延迟。"[②]

3.热点之三: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国近现代文学或多或少地受到西方影响,它似乎特别吸引了年轻的一代汉学家。然而,在战后的一段时间内却只有诗歌成为最佳研究的对象,其中突出的是鲁阿(Michelle Loi)夫人的《墙上芦苇,中国1919—1947年西化诗人》(1971),在小说方面,有桀溺先生的《世界属于你们,中国的儿童读物》(1971),不过,该作品的意义"超越了儿童文学范畴",是一部"独具风格"的著作,它"填补一项空白而做出贡献"。[③]

中国现当代文学"热"几乎是跟中国古典小说热同时出现,也是在70和80年代形成高潮,呈现繁盛。随着这一热潮的到来,许多大学里都开设出现当代中国文学课程,如波尔多、埃克斯-昂-普罗旺斯、巴黎第七大学、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等。[④]

这一高潮以翻译研究鲁迅作品为先导,从70年代上半期起,无论是翻译、研究,还是队伍形成都有明显的发展。整个70年代,几乎每年都有鲁迅的译作问世,如,1970年出版了《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内收三篇鲁迅的杂文),1972年《如此这般》杂志发表了《为了忘却的纪念》、《对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1973年出版了《这样的战士·鲁迅诗歌、杂文选》,1975年《阿Q正传》重译本和《野草》全译本问世,同时据此改编的《阿Q》剧本公演,1976年《鲁迅杂文选》两卷集和《朝花夕拾》译本问世,1977年《论战与讽刺·杂文选》出版,1978年《华盖集》译本首次出版,1979年《故事新编》重版等。[⑤] 在评论方面,如鲁阿夫人的《论战与讽刺·前言》和弗朗索瓦·朱利安的《作家鲁迅·1925年展望,形象的象征主义与暴露的象征主

① 宋柏年主编:《中国古典文学在国外》,第444页。

② André Lévy, *La Fleur en Fiole d'or* · Introduction.

③ [法]苏远鸣:《法国汉学50年》。

④ [法]居里安(Annie Curien):《法国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法国当代中国学》。

⑤ 钱林森:《中国文学在法国》,第五章。

义》,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前者是"法国鲁迅研究史"上"第一次"对鲁迅做"全面"的介绍与评价,后者则因为就鲁迅的具体作品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被认为是"法国汉学界研究鲁迅少有的佳作"。[①]

鲁迅研究的高潮迎来了茅盾、巴金、老舍、丁玲等作家的翻译和研究高潮。1978 年玛丽·约瑟·拉丽特夫人把巴金的《寒夜》译成法文出版问世,在汉学界和新闻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接着,随着 1979 年李治华翻译的《家》和于儒伯、白月桂翻译的巴金作品的出版,巴金也就成了"除鲁迅外"被介绍"最多的一位中国现代作家"。[②] 随后有茅盾的《子夜》在巴黎首次重译出版(1972 年),1979 年和 1980 年于儒伯与白月桂于分别推出《动摇》和《春蚕》的译本,1973 年老舍的《骆驼祥子》重译出版,1980 年他的《茶馆》在巴黎公演,1982 年《北京市民》译本问世,1980 年翻译出版了题为《大姐》的丁玲短篇小说选,1980 年在巴黎召开"中国抗日战争文学国际谈论会"等。

对于中国的当代文学的翻译和研究,作品来源不成问题,大批的文学刊物源源不断地来到法国,翻译的队伍也十分庞大,有教师、科研人员、独立翻译家,有时甚至还有年轻的大学毕业生,但在研究方面,却显得力度不够,远远地落后于德国、日本和美国。这三个国家不仅是对中国大陆方面的了解,就是对台湾或生活在美国的中国作家的了解,也比法国"先进发达得多"。[③]

从研究的观念来,有的评论将法国这一时期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归纳为政治角度出发的观照、社会观照和以人的命运为视点的观照几种倾向,并指出,前两种主要是非文学的观照,虽然在特殊历史背景下为推动法国现当代中国文学热也起过作用,但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可忽视。至于对人的命运和价值的关注,评论者认为,倒不失为一种真正的文学观照。它原本是西方人文主义者的文化价值取向,依此作为视角来观照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始于 20 年代罗曼·罗兰对鲁迅《阿 Q 正传》的著名评论。70 年代,当中国作家历经磨难、劫后逢生的时候,这种观照便成了法国汉学家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最富激情的切入点,他们对巴金、老舍、丁玲、艾青的介

① 钱林森:《中国文学在法国》,第五章。

② 钱林森:《中国文学在法国》,第五章。

③ [法]居里安(Annie Curien):《法国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法国当代中国学》。

绍与研究都是如此。从对人、对作家命运的切入,进而引起对其作品的考察、认识其内涵及其价值,接着又进一步激发起研究者对作家命运的怀念和对作家人格的崇敬。如此反复循环,确能把握中国文学的真谛,对饱经沧桑得以生还、得以存在的中国现代文学,做比较深入和充分的了解。①

四、多元的现代汉语研究

战后法国汉语研究获得重大发展始于60年代,取得巨大成果是在70年代以后,因此,人们一般把60年代看成为战后法国汉语研究的"草创"时期,70年代以后为"成熟"期。

60年代初,汉语言学家李嘉乐(A. Rygaloff)发起共同探讨汉语问题,吸引了一批汉语研究人员。李嘉乐原有个庞大计划,要编写一本《汉法辞典》,后虽因种种原因,编写工作没有取得预期成果,但却团结了一批年轻力量,从而在法国形成了"中国语言研究中心"。起初有贾永吉夫人(Alice Cartier)、艾乐桐(Viviane Alleton)和程纪贤等,到了70—80年代,又有了一批更年轻的人积极投入。与此同时,也就是1971年,李嘉乐决定将中国语言研究中心改造成"东亚语言研究中心"(Centre de Recherches Linguistiques sur l'Asie Orientale,简称CRLAO),于是,法国的中国语研究获得了更大的发展。法国汉语研究从"草创"到"成熟"的分界是在1976年,其主要标志是艾乐桐和贝罗贝(A. Peyraube)创办的《东亚语言学报》(Cahiers de Linguistique - Asie Orientale)的诞生。此后,法国的汉语研究便出现了"更好协调"的大好局面,并在国际上发行大量出版物,产生了巨大影响,②法国汉语研究的特点、主要机构和主要研究人员,以及他们的研究方向,也都显得比较清晰。

战后法国汉语研究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三句话:历时与共时研究并存,欧洲语言传统与新理论结合和国际交往的加强。③

1. 历时与共时。战后法国汉语研究,在语言史与当代汉语的研究并没有被分隔开来,对于方言的研究确实既包括语法学又包括音位学,其历时

---

① 钱林森:《中国文学在法国》,第一章导言。

② Viviane Alleton, *La Linguistique chinoise en France*;中译文见[法]艾乐桐:《法国对中国语言学研究》,《法国当代中国学》。

③ Viviane Alleton, *La Linguistique chinoise en France*;译文见[法]艾乐桐:《法国对中国语言学的研究》,《法国当代中国学》。

性及其共时性都被考虑在内了，文字也被根据它与口语形式的关系而做了分析。还有“这种在该领域内的视角的多重性与向其他学科——人类学、文学史、哲学——的开放”，也是“相继发生的”。[①]

语言史的研究，在语法（句法和语义学）方面，贝罗贝的专著《汉语历时句法》（*Syntaxe diachronique du chinois. Evolution des construictions datives du XIVe siècle av. J. C. au XVIIIe*, 1988），探讨了汉语“给予式”的历史发展，这种“全面的历时研究在法国尚属首次”。[②] 他在对汉语历时句法研究的同时，还涉及到了“双宾语句”、“把字句”、“比较句”、“被动句”、“处所句”等句型问题，无疑，这些探索在现代汉语研究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③] 同时，他还探讨许多句式的兴起原因及过程，研究数量词及指代词的历史等。与此同时，他主持的研究组为历时性句法和语义，特别是语法化的过程，也做了不少的工作，其最终目的是要拥有一部有关中国语言主要结构的历史著作，写好一部基本的汉语历史语法书。参与这些研究的是东亚语言研究中心的贝罗贝、罗端（主攻甲骨文）、柯理思（写有《汉语历时性句法问题，与方言资料的对照》，有关后动词性的可能性的和结果性的词素“的”，社会科学高等学院的博士论文等）、吕嘉（Alain Lucas）等。

谈到汉语语音，法国当今许多汉语音位学学者都受过李嘉乐的启蒙教育。他以比较的方法研究现代拼音系统、现代广东话及古汉语（以《广韵》为代表）的音节，研究它们之间的联系及来龙去脉，还比较汉语与日语的词序及音位结构等。[④] 其他有沙加尔（Laurent Sagart）的有关江西方言研究（《赣方言》，1993）和德勒（F. Dell）音位学中的表现结构研究，邓士涵（Michel Désirat）的闽方言研究等。

文字方面，有对甲骨文和金文的研究，有佛朗索瓦兹·博泰罗（Françoise Bottéro）对汉文以部首分类的检字法的博士论文（《汉字的语义与分类，对‘说文解字’中的部首分类法制 214 部 的研究》，1994），法比安娜·马克（Fabienne Marc）对公元前 4—前 3 世纪文字的研究，艾乐桐负责的一部集体著作（中国文字的共同概念是怎样形成的问题），游顺剑（Yau

① Viviane Alleton, *La Linguistique chinoise en France*；译文见［法］艾乐桐：《法国对中国语言学的研究》，《法国当代中国学》。

② 徐丹：《法国汉语研究概况》，《汉语研究在国外》，第 220 页。

③ 徐丹：《法国汉语研究概况》，《汉语研究在国外》，第 221 页。

④ 徐丹：《法国汉语研究概况》，《汉语研究在国外》，第 219，224 页。

S. C.)的一种视觉语言学的理论(也就是研究手势、文字和语言的空间因素,如中国古文字字体的成因,特别是研究了孤独的耳聋人的手语的创造和瞎子的语言)。

战后法国的现代汉语研究已取得主导地位,"从70年代到80年代,法国汉语语言学者的论著绝大多数都是关于现代汉语的研究",[①]汉学家们对现代汉语的语法、句法、语音、少数民族语言等都有所涉及,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李嘉乐《汉语基础语法》(*Grammaire élémentaire du chinois*, 1983)言简意赅,反映了作者在汉语语音、词汇、句法等方面的思考成果,被认为是一部具有"开创性的著作"。他对汉语的某些特殊动词,如"是"、"有",某些词缀,如"子"、"儿"等,对汉语的演变史,如"阿尔泰化"的问题等,也颇有研究。其他的有东亚语言研究中心包华莉(W. Paul)的《汉语动词宾语句子的句法:限定与分析》(1988)、罗伯尔·伊吉克的《当代汉语中的名词定语"的",时间蕴涵》(1987)和许丹的《现代汉语中的头语重复现象》(1988)等。中心之外是艾乐桐与白梅丽。艾乐桐特别研究了语式中的副词和助动词(《当代汉语中的语式助动词》,1984)与语气有关的如感叹性直陈式、简捷疑问、非现实式表达等;白梅丽在探讨名词化的不同构成(相对的、有差别的和所谓有差别的结构)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之后她又深入地研究了"就"和"才"等副词(《汉语语言学中的句法和语义问题》,1981)。

在词汇学方面,主要是编写一本8500个字的较小的辞典,此项工作由戴利德(Michel Dallidet)负责完成。[②]

2. 传统与新理论。在研究观念上,法国汉语学家有自己的特色,他们不急于把自己划在某个理论框架之下,一般也不甚重视理论的探讨,而是注重汉语的事实,但对其他国家学者的研究成果也并不忽视。[③] 他们为"实现欧洲语言传统与最新理论"的"结合"做出努力。一方面充分理解汉语语法史学家们向梅耶(Meillet)借鉴语法化概念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则接

---

① 徐丹:《法国汉语研究概况》,石锋编《汉语研究在国外》,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5年,第215页。

② Viviane Alleton, *La Linguistique chinoise en France*;译文见[法]艾乐桐:《法国对中国语言学的研究》,《法国当代中国学》。

③ 徐丹:《法国汉语研究概况》,《汉语研究在国外》,第214-215页。

受乔姆斯基"控制论"的影响。[①]

3. 国际交流。战后法国的汉语学家们大大加强了国际的交流和合作，经常参加专门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东亚语言研究中心"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和北京语言文化学院建立有联系，与"中央研究院"（台北）也有交流协议。

战后法国汉语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单位："东亚语言研究中心"是法国汉语研究的主要力量所在。中心主要研究现代汉语，从80年代开始，便着手编写《汉法词典》，进行"汉语的共时和历时句法"、"普通话的语音学与音位学"、"使用汉语国家和地区的语言政策"等方面研究；中心可招收"深入研究生"和"博士"生。中心学术活动十分活跃，经常派人员参加有关汉语研究的国际会议，并邀请国外学者前来讲学、交流，每年召开一次东亚语言学年会，讨论有关事项；中心出版的刊物在世界各大图书馆都有收藏。社会科学高等学院（L'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s）也是一个汉语研究的重要单位，可招收博士生，由艾乐桐担任研究导师。巴黎第七大学设有研究组，由白梅丽（M. C. Paris）任研究组教授。1985年起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也设了讲座，并于1994年设立了讲师席位。

战后，法国也出版了不少汉语方面的刊物、丛书和辞书。东亚语言研究中心出版有《东亚语言学报》，1977年由艾乐桐和贝罗贝创办，编辑委员会的成员有艾乐桐、贝罗贝、李嘉乐、沙加尔、游顺剑等，由吕卡（Alain Lucas）和瓦尔特罗（Paul Waltraud）具体负责，刊物问世不久即引起国际汉语学界重视，成为一本有国际影响的语言研究刊物；中心还从1980年开始着手编写《汉法词典》，与新加坡、香港等地的语言人员合编《人民中国、新加坡、香港和台湾的语言政策》，中心还出版有《交叉语言》（*Langues Croisées*）丛书，该丛书于1978年由游顺剑创建并任主编的一份刊物。除中心外，其他的机构出版的汉语书籍有"利氏学社"（Institut Ricci，利玛窦研究所）编纂的《汉西词典》（1971）和《汉法综合词典》（1976）[②]；社会科学高等学院出版的《汉学书目杂志》（*Revue bibliographique de sinologie*），每册都有部分

---

① Viviane Alleton, La Linguistique chinoise en France；译文见［法］艾乐桐：《法国对中国语言学的研究》，《法国当代中国学》，第348页。

② 该词典也叫《利玛窦小辞典》，由利氏学社巴黎和台北分社共同组织，所收汉文单词1.1～1.2万，近20～25万个词组，附录中还有许多中国文化知识。见耿昇：《法国利氏学社的汉学研究》，《法国当代中国学》。

内容介绍中国语言。

战后法国汉语学的研究者队伍已经形成,而且每个研究者都有自己的主攻方向,如以研究语法为主的李嘉乐、贝罗贝、艾乐桐、白梅丽、海然热(CL. Hagège)、郭幽(M. Coyaud),华卫民(M. Hua),以研究语音、方言、少数民族语言为主的李嘉乐、沙加尔、郭幽、德勒(F. Dell),以研究手势语为主的游顺剑等。法国战后最有影响的汉语学家是李嘉乐、贝罗贝和艾乐桐。

五、蓬勃发展的汉语教学

作为汉学的一部分或者说基础,二战后法国汉语教学也一度面临着困境。但是,随着中法关系不断地深入,中国本土经济迅猛发展,以及法国汉学家们的奋力拼搏,法国的汉语教学在五六十年代就已取得决定性的改观,进入八九十年代,当西欧再度出现"中国热"、"汉语热"的时候,法国的汉语教学已成绩卓著,得到蓬勃的发展,这强劲的势头一直延续至今。

二战后法国汉语教学的巨大发展,不仅体现在教学规模的不断扩大、教学体制的逐渐完善和健全上,同时也体现在理念上的巨大变化。

首先,教学和研究机构的调整和发展。

二战后法国几所大学纷纷建立中文系,是法国汉语蓬勃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1957 年,巴黎大学文学院一马当先建立中文专业,著名的汉学家谢和耐任该专业的负责人,同时还亲自为学生开设中国语言文化课。1969 年当巴黎大学院系调整时,该系被划归了巴黎第七大学,成了该大学的中文专业(Université Paris 7, Section de chinois)。继巴黎大学之后成立中文专业的是波尔多大学和埃克斯 - 马赛大学。波尔多第三大学中文专业(Université Michel de Montaigne - Bordeau III, section de chinois)成立于 1959 年,汉学家吴德明(Yves Hervouet)和雷威安(André Lévy)先后担任主任;埃克斯 - 马赛大学中文系(或普罗旺斯大学中国研究系,Université de Provence, Département d'Études Chinoises)于 1966 年成立,汪德迈亲任主任。1968 年巴黎第八大学成立中国部(Université Paris VIII, section de chinois),吴德明亲任主任。也就在这一年,原法国国立东方语言学校(Ecole Nationa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Vivantes)改为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Institut National des Langues et Civilisations Orientales),并与巴黎第三大学合作,负责培养东方语人才,中文系负责中文教学与汉学研究,成为该学院第

二大系，注册学习人数在法国所有中文专业中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且逐年上升。接着，1970年，中断了三十五年的里昂汉语教学也在里昂第三大学远东系重新启动，开出汉语课。

在谈到法国汉语教学机构时，绝不能忽视一些理工科大学和中小学汉语教学为汉语教学所做出的贡献。这种现象从60年代开始，到了七八十年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据统计，1985—1986年间，除设有中文系的大学之外，法国还有11所大学开设有汉语选修课，20来所高校设有中文短期培训班。汉语在高校外语教学中占第7位。到了90年代，已有16所大学和36所高等学校设有中文课，同时，有些院校还把汉语作为入校会考的一门课程。如：巴黎高师的当代语言专业（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 section langues vivantes）、巴黎第十大学人类系的中国部（Université de Paris X Nanterre, départment d'ethnologie, domaine Chine）、巴黎政治研究学院国立政治科学基地（Institut d'Études Politiques de Paris, Fondation Nationale des Sciences Politiques）、高等翻译学校（Ecole Supérieure d'Interpète et de Traduction）、巴黎高等商业学校国际语言和通讯系等都不同程度地开设有汉语课程和研究课题。这些院校所开设的汉语课程在法国汉语教学事业发展中所起的重要性已引起有关人士的重视。其原因是：其一，在这些院校中有一部分是属于法国精英型学院，在毕业生中有相当一部分在法国各领域处于决策地位，他们对学习汉语的热情程度往往直接影响到与中国交往和对汉语教学的态度；[①]其二，其中另一部分学生毕业后大都从事东亚，尤其是中国的经贸方面工作，学好汉语是他们就业的必备知识和技能之一，因此，他们很重视汉语的学习；[②]其三，这部分学生的人数正在逐年增长。

战后法国中、小学的汉语教学受到汉学家戴密微、谢和耐、于儒伯（Robert Ruhlmann）、吴德明、苏远鸣、艾琼伯（René Etiemble）、李治华等有远见卓识的汉学家们热情支持和鼓励。

法国中、小学的汉语教学起步于60年代，70年代以后取得了迅速的

① 2004年第一期《国外汉语教学动态》的一则信息《法国巴黎东方语言学院徐丹教授来访》，谈到这一问题。

② 近三年来，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接待了三批从法国里昂二大来华的学生，这些学生在法国大都攻读商贸、经济方面的文凭，已有一定的汉语基础，来华的任务是进修汉语（3个月），然后在中国实习（3个月）。这些学生虽然各自都有自己的专业，但对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都有着异常浓厚的兴趣，学习态度十分认真。

发展。1960年,汉学家艾琼伯扑首先发出呼吁,建议从中学一年级起设立中文课。此前,也就是在1958年,在巴黎南郊蒙日洪(Montgeron)中学一位哲学老师的倡议下,该校首次在法国中学中开设了汉语课。这一实验受到了普遍欢迎,第一年就招收了135名学生。接着,1962年,巴黎西郊的圣日耳曼(St - Germain)中学也开设了汉语课。一年后,巴黎的阿尔萨斯(Alsace)学校中学部开设了中文课。70年代初至1978年,法国开设汉语课的中学一下子从十几所增至32所,90年代增至约40所,到了2002年,全法国已有120所中学教授汉语。[①] 此外,国家函授教育中心还开设了适合中等教育阶段的中文函授班,从1984年起,国家教学法研究所为中等教育制定了一个汉字表,规定400个常用汉字为中学毕业考试测试能力最低标准,重点衡量书面理解能力。

有资料表明,在国外汉语教学事业中,法国中学汉语教学发展之健全,已榜居首位。[②] 在法国,中文已作为正规的语言教学课程列入了中学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汉语教学点在全国分布之广、学生人数之众,非其他国家可以项背。因此"中学汉语教育"发展的迅猛便成为"法国汉语教学的一个主要特征"[③]。

小学开设汉语课要晚些。1985年,巴黎中国城一所小学率先成立中文班,并于1989年正式聘请中文教员,从此法国小学的汉语教学引起社会广泛重视。此外,巴黎阿尔萨斯学校的小学部从一年级开始,也安排有名为"启蒙教育"的中文班。

为此,如果我们把中学和小学合在一起计算的话,80年代全法国已有60所中、小学开设汉语课;90年代有88所学校开设中文课。这个数字应该说是十分可观的。

为了促进和推动汉语教学,从60年代开始,一些院校还纷纷成立相关汉学研究机构。如1975年,在汉学家于儒伯(Robert Ruhlmann)的发起下,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建立了"中国研究中心"(Centre d'Etudes chinoises),研究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哲学、美学、文学、汉语和汉语教学等。中心由研究员、部分教员和已在第三阶段注册的学生组成,并约请国外学者

① 《求学人数逐年增长 法国汉语教学蓬勃发展》,2002 - 2 - 27《华声报》。

② 参阅戴庆厦:《第二语言(汉语)教学概论》,民族出版社,1999年,第53页。

③ 戴庆厦:《第二语言(汉语)教学概论》,第53页。

参加。中心出版的《中国论丛》(*La Chine par les textes*)和《中国研究手册》(*Cahiers d'études chinoises*),在国际汉学界颇有影响。前者是一套中法文对照的专题论文丛书,后者是一份定期刊物。1995 年,由白吉尔和安热勒·毕诺(Angel Pino)主编,中心出版的《东方语言学院百年汉语教育,1840—1945》(*Un siècle d'enseignement du chinoisàl'Éco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1840—1945),对东方语言学院一个世纪来的汉语教学做了全面而系统的回顾和评价,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国外汉语教育史著作。中心还与其他大学和国外相关机构保持联系,举办有关学术讨论会。巴黎第八大学成立有"汉学中心"(Centre de recherche),由教员组成。中心从比较研究的角度着重研究当代中国文化、意识形态、文学,以及汉语教学等问题,还创办有刊物《远东与远西》(*Extrême - Orient - Extrême - Occident*)。里昂三大和里尔三大也成立有相关的研究中心,里昂三大的"近代远东研究中心"(Centre de recherche sur l'Extrême - Orient contemporain)主要从事 19、20 世纪上海社会、经济史研究;里尔三大的"远东研究中心"(Centre de recherche sur l'Extrême - Orient)则涉猎当代云南史问题。由于这些研究机构不同程度地为教师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方便,因此,一些教师在承担教学任务的同时,在科研上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最后我们必须提到的是 1984 年法国汉语教师协会(A. F. P. C)[①]和 2002 年"法国汉语研究与教学会"的成立。法国汉语教师协会的建立是上世纪继"法国汉学协会"(A. F. E. C)成立(1980)之后的汉学界另一件大事。协会的宗旨是发展法国中国语言和文化教学,研讨教学,提高法国中文教学水平,通过召开学术会议、出版书籍和刊物等方式,为会员之间相互交流和传送信息提供方便。同时,协会还协助法国有中文教学的学校和机构开展与中国的校际交流。该协会与法国教育部、法国中文学校、北京世界汉语教学学会、中国驻法使馆教育处、一些商业机构和大众传媒等保持广泛的联系。参加该协会的大都是在大、中、小学从事汉语教学的教师,也有在高等专科学校、民间协会等的汉语教师,此外还有一些热心于汉语教学和中法文化交流的法国各行业人士。学会成立时有 40 多位汉语教师,首任会长是埃克斯 - 马赛大学的杜特莱(Noël Dutrait)先生,之后,由巴黎第七大学东亚语文系白乐桑先生接任。"法国汉语研究与教学会"是法国

① http://www.afpc.asso.fr/

一个综合高等院校研究与教学于一体的汉学学术团体,它的成立是法国汉学界继"法国汉学协会"(A. F. E. C)和法国汉语教师协会之后的又一大举措。学会由徐丹任主席,Pierre de la Robertie 任副主席,齐冲任司库,Marc Fabienne 和金丝燕分别为正副秘书长。徐丹在 2003 年 5 月 24 日"法国汉语教学:问题与思考"的研讨会上对协会的工作做的总结,可以看出学会的主要任务和研究方向:一年来,协会开始法国高等院校汉语教学的摸底工作,制定编写汉语词典的计划并已有进展,并在汉语语言学方面做了研究队伍与专题的架构工作。一项文学与佛学研究计划也在酝酿之中。①

第二,是办学规模和师资队伍的扩大。

进入 70 年代,法国汉语教学的一个明显特点是办学规模不断扩大,与此同时是师资队伍的建设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

1. 教学规模

战后法国汉语教学规模的不断扩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学生人数的激增;二是办学方式日趋多样。

1)学生人数的激增②

首先是战后建立的几所大学中文系或中文专业。巴黎第七大学中文专业,开办时仅一个中文班,1966 年增加到 150 人,自 1981 年后保持在 400 人以上。埃克斯 - 马赛大学,开初只有学生 10 人,1981 年后增至 100 人,90 年代波尔多大学和埃克斯 - 马赛大学的学生分别都达到 250 人。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1966 年约有 200 名学生,到了 1971—1972 年间,已增至 530 多人,1980—1981 年则高达 1840 名,往后一直保持在 1000 人以上。在 90 年代,仅注册第一、第二阶段的学生就达 1500 人,就读一年级的 565 名,毕业班时还有 111 名。里昂第三大学远东系,到了 90 年代,也已有大学生 75 名。

其他大学。据统计,在 1985—1986 年间,11 所设有汉语选修课大学的学生总数已达 2853 人。高等师范学校、高等商业学校、工程师学校等 20

① http://www.hanyuwang.com/htm_library/j_03060501.htm

② 下文所涉及的有关学生数据,主要参考的有胡书经的《法国汉语教学与研究的现状》,北京语言学院世界汉语教学交流中心信息资料部编编撰的《世界汉语教学概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0 年),白乐桑的《法国汉语教学史浅论》(载《中国文化研究》,1993 年,冬之卷),*Livret de l'étudiant*, *Institut National des Langues et Civilisations Orientales*,1993),卡特琳娜·戴思博/钱林森的《汉学教育在法国》(中华读书报,2003 年 3 月 5 日)和 http://www.inalco.fr/

来所设有中文短期培训班的高校，学习汉语的学生总数达3000以上。要指出的是，这些院校的学生人数在逐年增长。

还应强调指出的是，华侨对子女的中文学习也更加重视，因此，在高校，不仅从事工、商、贸易等行业的华侨子女对汉语的兴趣有增无减，而且大学中文系学生中的华侨子女比例也明显提高。[①] 此外还有一些华人的社团。据统计，到2002年，参加各地华人社团周末汉语课程的华裔子弟有8000人。[②]

中、小学习汉语的人数。1985年率先成立了国际中文班的巴黎中国城小学，到90年代时，学习汉语的学生已达271名。80年代全法国中、小学选修汉语课程的学生约2500人；90年代达到约3000名。

到2002年，全法国各地大、中学校里学习汉语的人数超过1.2万人。在巴黎学区，报考中学汉语专业会考的学生，也从1970年的30多名增至90年代120多名。法国每年参加中国汉语水平考试（HSK）的考生人数之多，在欧洲国家中稳居第一。[③] 法国教育部教学司负责人让·保罗·德戈德马尔在2004年3月26日"全法汉语教学研讨会"上介绍说，在其他外语语种的学生都在减少的情况下，学习汉语的学生人数始终呈上升趋势。虽然与传统的德语和俄语等语种相比，学习汉语的学生绝对人数还不够多，但发展势头相当好。与上一年相比，2004年学习汉语的学生人数增加30%，而学习俄语和德语的学生分别减少了3.5%和8.6%。[④]

2）办学方式日趋多样

70年代以后，随着学习汉语人数的增加，学习汉语的目的也趋向复杂化，因此，办学方式便逐渐走向多样。尤其是相当数量的业余学校、民间协会、法中友协、电化教学等机构，他们的教学方式和方法就更加灵活和多样，通过个别聘请教师进行汉语教学的情况也为数不少，尤其是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交往较为密切的城市这种现象更加明显。如法国前总统吉斯卡·德斯坦开始学习汉语（1986），就是通过聘请个别汉语教师进行授课的。[⑤]

---

① ［法］白乐桑：《法国汉语教学史浅论》。

② 《求学人数逐年增长 法国汉语教学蓬勃发展》，2002－2－27《华声报》。

③ 《求学人数逐年增长 法国汉语教学蓬勃发展》，2002－2－27《华声报》。

④ 《全法汉语教学研讨会在巴黎召开》，中国侨网，2004年3月31日。

⑤ 《人民日报》，1987年12月24日。

为应付日益竞争激烈的局面,吸收更多学生到本单位学习汉语,一些大学中文系除正规授课方式之外,也开设了一些夜班、特设班等。如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中文系除开办正规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之外,还为谋求大学教师职位或前往中国的工作人员开办一些汉语短期培训班。该系还和其他系科合办外语应用、当代东亚文化专业等,为这些专业的学生开设相关的汉语及中国文化课程。埃克斯-马赛大学在教育部的支持下,开办了一种名为 MAGISTERE 的特殊专业,专门招收具有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学、社会学硕士文凭的学生,进行中文培训。他们所学的中国语言文化课程,甚至比中文系和其他文科系的学生还要多。此外,他们还组织一些配合教学的活动,如二年级暑假全体学员到中国进行语言实习,平时组织一些与中国方面的专家、企业家座谈,举办有关展览等。①

2. 师资队伍建设

随着学生数量的增多,教师的数量和质量要求也日益引起重视,尤其是中学教师的选拔。法国汉语中学师资合格证书会考开始于 1966 年,1967 年又进行了一次,后因故停办几年,1974 年得以恢复。从此,政府每年授予两名中学汉语教师资格证书,至 90 年代,经会考通过的教师已有 30 多名,其中一半在中学任教,部分在大学任职。汉语教学蓬勃发展的结果是法国教育部不断增设汉语教学职位。各专业师资会考中汉语专业名额增长率最高。除中学师资合格证书会考之外,连续两年开设汉语大中教师学衔考试,并在巴黎地区增加了 4 个中文专业副教授的名额。② 与此同时,法国外聘汉语教师人数也大大增加,60 年代巴黎东方语言学院聘请第一任中国教员,后巴黎第七大学、第八大学、爱克斯-马赛大学和蒙日洪中学都聘有中国教员。至 90 年代,法国大、中学校的本地汉语教师是 130 人,政府或校际交流聘请教师约 20 人,合在一起共约 150 名。

3. 存在的问题

诚然,当我们谈到学校数量和学生人数激增和师资队伍建设不断受到重视的时候,不能不注意到法国汉语教学所存在的问题不时地困惑着法国的汉学家。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其一,各校教学质量、学生水平差距甚大,给教学带来了困难。其二,学生人数常时呈金字塔状分

① 王忠华:《法国南方的汉学中心——埃克斯大学》,《世界汉语教学》,1989 年第 2 期。

② 《求学人数逐年增长 法国汉语教学蓬勃发展》,2002-2-27《华声报》。

布状况，低年级人满为患，但真正坚持下来的并不多；由于汉语在中学大多作为第三或第二外语，且不做中学会考科目，学生自流现象严重，出勤率难保证。据统计，直至20世纪80年代，在中学里将汉语作为第一外语的还只有两所，即里昂的让·穆兰中学（Lycée Jean - Moulin）与巴黎十三区的卡密伊·克洛岱尔中学（College Camille - Claudel），另有少数几所中学将汉语列为第二外语，绝大多数中学汉语课程仅作为第三外语供学生选修。其三，学习汉语的大学毕业学生不易找到对口的工作，甚至到90年代，情形并没有多大的改变，从而影响了学生就读汉语专业的积极性。其四，在师资方面，二战后法国汉语师资数量虽然有较大增加，但从总体上来说，远跟不上学生人数的激增，从而出现学生多教师少的尴尬局面；[①]二战后，法国虽然设立了中等教育任教资格证书（CAPES），但很长时期内未设高等教育资格证书（Agrégation），造成人才流失；汉语教师正式职位少，临时聘请多，临时聘请的老师为生计问题，往往同时奔波于几所学校或同时从事其他工作，业务水平难以提高。所有这些，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法国二战后汉语教育事业更大的发展。

第三，高校中文系学制和课程趋向完备[②]

二战后法国汉语教学的蓬勃发展，还体现在大学中文专业学位和证书的逐渐到位，以及相应配套文化课程的设置。

1. 高校中文系学制

法国正式设立汉语学士学位是在1959年，到了90年代，已有五所大学设有中文硕士专业，两所设有博士学位。法兰西学院、高等研究实践学

① 据统计，自1966年，特别是1968年至1980年，有的学校中文系学生人数几乎增加了一二十倍，而相同的时间内，教育部任命的汉语教师仅十几名。东方语言学院、埃克斯－马赛大学和波尔多大学中文系，教师与学生的比例高达一比五十，对教学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胡书经：《法国汉语教学与研究的现状》）。

② 有关法国大学中文系的学制和课程设置，主要参考如下几份资料，不一一加注。何金兰：《吴德明教授》，载《汉学研究通讯》，1984年第3卷，第3期；*Lettre de l'AFEC*, Numéro spécial, décembre, 1991；*Livret de l'étudiant*, *Institut National des Langues et Civilisations Orientales*, 1993（另有一分打印资料：BROCHURE pédagogique, Année, 1993—1994）；*Un Siècle d'enseignement du chinois à l'Eco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1840—1945, Asiathèque, 1995；吴永毅：《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中文系的学制及课程设置》，《世界汉语教学》第2期，1996年；阮桂雅：《法国国立东方现代语言学院有关中国语言和文化的教学》，《法国当代中国学》；晓阳：《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汉语系概况》，载《中国文化与世界》第6辑，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潘先军：《法国东方语言学院中文专业课程设置及简析》，《国外汉语教学动态》，2004年，第1期；http://www.inalco.fr/

校的第四、第五系,社会科学高等研究学校等的教学带有研究性质,学生在导师的指导下也可取得硕士和博士文凭,但这类学校一般以研究汉学为主,这里不作为重点论述。

法国大学攻读相关文凭,都采用分阶段(由第一到第三)制度。第一阶段学制为两年,考试合格者可得到普通大学毕业证书(DEUG)。第二阶段也为两年,第一年,即三年级,攻读高等教育文凭(DES)或学士学位文凭(Licence),第二年,即四年级,攻读硕士文凭(Maîtrise)①。第三阶段也是两年,第一年,即五年级,攻读"深入研究文凭"(DEA),如第一年修完规定的学分,第二年,即六年级,便可进入博士论文写作阶段,其有效注册期为三至六年,到时不能完成论文者将被取消攻读资格。学生若完成论文并通过论文答辩,则可获得第三阶段"博士学位"(Doctorat),并可在大学或研究机构任教或谋职,论文被放在图书馆公开借阅,跟已出版的作品有同样参考价值。

法国攻读汉语学位的体制跟其他学科基本一致,但略有变化。如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中文系,跟其他普通高校一样,凡持有中学毕业会考文凭即可在该校申请注册入学。进大学后,分阶段逐级攻读相关文凭。中文系分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要学完规定的学分。第一阶段有两年制和三年制的,可攻读这样的证书:语言文化文凭(CLC),两年,10个学分;双语文凭(Diplôme bilingue),两年或三年,20个学分;东方语言文化单一语言文凭(DULCO),两年或三年,20个学分。东方语言文化学院规定,光持有语言文化文凭(CLC)的学生不能升入第二阶段,只有DULCO持有者才允许进入第二阶段学习。第二阶段:第一年(大学第三年),有两种文凭可供攻读,即高级文凭(DS)和现代外语(汉语专业)学士专业(LLVE)文凭,学制都是一年,学分都是10个;第二年(大学第四年),分为应用研究、学习文凭(DREA)和现代外语(汉语专业)硕士(MLVE)文凭,学分也都是10个,学制也是一年,但另外还有一些具体的要求(参看课程设置部分)。要指出的是,第二阶段的"高级文凭"和"应用研究和学习文凭"属于学院文凭,而"学士"和"硕士"文凭才是国家文凭。完成第二阶段后,便可进入第三阶段,即攻读深入研究文凭(DEA)和博士文凭(Doctorat),主要是写作论文。

① 实际上Maîtrise只相当于中国的"本科毕业学位",也就是大学本科四年级,因此故将其翻译成"硕士"实有不妥,而"DEA"即"深入研究文凭"倒跟我国硕士生情况基本相符。

2. 相应的课程设置

下面以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为例，列出与学位相关的选修课程。

第一阶段

分两年制和三年制两种，可攻读如下几种文凭。

语言文化文凭（CLC）。两年，10 个学分，其中语言课 8 个，文化课 2 个。具体分配如下：一年级，语言课 4 个学分：《语法 I》、《课文和书面表达》、《听力》、《会话（日常生活 I）》；二年级，语言课 4 个学分：《语法 II 及汉译法》、《书面表达及模拟法译汉》、《听力》、《会话（日常生活 II）》；文化课 2 个学分，学生可根据自己兴趣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概况：1949—1989》、《中国地域：中国地理概论》、《十三世纪前中国历史》、《元、明、清中国史》、《清王朝末期史：1840—1910》、《鸦片战争至 1949 年中国史》六门课中选读两门。

双语文凭（Diplôme bilingue）和东方语言文化单一语言文凭（DULCO）。两年或三年，20 个学分，语言课 13 个学分，文化课 7 个学分。课程具体安排如下：语言课 13 个学分中，有 8 个学分的课程与攻读语言文化文凭相同，三年级时，另外 5 个学分的课程是：《文言作品》、《白话作品》、《书面表达及模拟法译汉》、《听力》、《会话 III》。7 个文化课学分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概况：1949—1989》、《中国地域：中国地理概论》、《十三世纪前中国历史》三门是必修课，共 3 个学分；可在《元、明、清中国史》、《清王朝末期史：1840—1910》、《鸦片战争至 1949 年中国史》、《元、明、清艺术与社会》、《中国分区地理》、《中国鼎盛时期艺术史》、《汉以前中国文物与艺术史》、《中国哲学通史》、《中国文学通史》课程中任选一门，为 1 个学分；最后 3 个学分，可选读上述科目中未修课程，也可选读其他系科，甚至是其他学校相关的课程，或从校外直接取得文凭充当学分。

第二阶段两年，即大学三年级和四年级。

第一年（大学三年级），攻读如下几种文凭。

高级文凭（DS）。10 个学分，因攻读专业方向不同，可分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现代研究和国际关系方向”。这一方向所需选修课程有：从《现代汉语：汉译法》、《现代汉语：口头表达及汉译法》、《现代汉语：口头表达及法译汉》、《汉译法口译职业预备》、《现代汉语：书面法译汉》五门课程中选修四门，共 4 个学分；另 4 个学分，可在当代研究方向的学士文凭有关课程中选修三门，加一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史》；剩下的 2 个学分，从本

校为中文系第二阶段学生开设的任何课程中选修。第二种情况是“现代语言方向(汉语专业)”,需要10个学分,其中8个是语言学分,需选修如下课程:《现代汉语:汉译法》、《现代汉语:口头表达及汉译法》、《现代汉语:口头表达法译汉》、《汉译法口译职业预备》、《法译汉口译职业准备》、《报刊阅读:政治、行政及经济》、《经、贸、科技汉语》、《现代汉语:书面法译汉》,另外2个学分可从中文专业第二阶段第一年学分中选修。第三种情况是“对外法语教学方向”,需13个学分,其中10个学分的选修课同“现代汉语方向”,另3个学分的课程是有关法文的课程。

现代外语(汉语专业)学士文凭(LLVE)。共10个学分,其中6个学分的必修课程是:《古汉语:文本语法解释》、《现代汉语:汉译法》、《现代汉语:口头表达及汉译法》、《现代汉语:口头表达及法译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史》、《中国现代文学》;1个学分自由选择,可从第二阶段专业第一年的课程中任选一门;剩下3个学分,因攻读方向不同,可分如下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语言文学方向”,选修《中国古典诗歌》和《中国小说和戏剧》两门,2个学分,另1个学分从《远古至唐的书法史》和《现代汉语:书面法译汉》中两选一;第二种情况是“当代研究和国际关系方向”,在《1945年以来远东国际关系》、《18世纪至1949年中国社会经济史》、《1949年以来中国对外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中国法律》课程中选修两门,得2个学分;1个学分从《法译汉口译职业预备》、《现代汉语:书面法译汉》、《报刊阅读:政治、行政及经济》课程中选修一门中获得;第三种情况是“口、笔译方向”,在《汉译法口译职业预备》、《法译汉口译职业预备》、《现代汉语:书面法译汉》课程中选修两门,得2个学分:在《报刊阅读:政治、行政及经济》和《经、贸、科技汉语》中选一门,得1个学分。

第二年(大学四年级),攻读如下两个文凭。

应用研究和实践毕业文凭(DREA)。10个学分,课程安排是:写一篇论文,可充当6个学分;选一门指导老师所开设的选修课程,得1个学分;在剩下的3个学分中,《快速阅读I》和《快速阅读II》两门为必修课,可得2个学分,还有1个学分,可在第二阶段未曾选修的课程中选修。

现代外语(汉语专业)硕士学位文凭(MLVE)。10个学分,课程具体安排如下:撰写一篇约150页的论文,可充当6个学分;选一门导师所开设的选修课程,1个学分;剩下的3个学分,《快速阅读I》和《快速阅读II》为必修课,可得2个学分,还有1个学分,可从第二阶段未曾选修的必修课程

中选修。

第三阶段

攻读深入研究文凭(DEA)和博士文凭(Doctorat),以撰写论文为主,课程不多,且基本上由导师安排,没有统一要求。

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的课程设置中可以看出,一二年级的课程以语言课程为主,且强调口头的表达和翻译,进入三年级,文化类课程逐渐增多。一般情况下,负责语言课技能训练的老师大都是中国人,有大陆、台、港等地的教师;而有关汉语的基本知识,则由母语为法语的老师用法语进行较为系统的解释和介绍,文化课程也由法国教师担任,且用法语讲授。在翻译课上,担任汉译法课程的一般要求是母语为法语的老师,而法译汉则一般由中国教师担任。

法国其他几所院校中文系的体制和所开设的课程,基本也是如此。如巴黎第七大学中文系也可招收攻读大学学士、硕士、博士和中学教师资格考试预备等证书,在本科的教学上,第一阶段(一二年级)主要学习汉语课程,第二阶段(三四年级)偏重中国文学、历史、文化等课程。埃克斯-马赛大学中文系除大学汉语专业普通学习文凭、汉语专业学士、硕士文凭外,还设有汉语应用语大学第一第二阶段文凭。波尔多第三大学一二年级也是以学习汉语课为主,三四年级文化课程逐渐增多,有中国历史、地理、当代文学、古典文学、中国社会及社会组织等。

第四,教材的编写和使用的多元化。

1.教材的使用和编写

要交代一下的是,因篇幅所限,这里主要讨论语言教材的编写和使用,至于文化教材,只略加涉及。

战后法国汉语教材的使用和编写,基本上可归纳为两个特点:

其一,"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法国大、中学校对汉语教材的选用很不统一,甚至在同一学校,几个平衡的班级,所用的教材也不一样,因为在多数情况下,教材的使用是由教师本人决定的。战后法国所采用的汉语教科,有法国教师自己编写的,有大陆、台、港教师编写的,也有美国教师编写的,各校不甚相同。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很长一个时期内采用的是北京语言学院编写的《实用汉语课本》(法文译释,商务印书馆)和其他一些口语教材,埃克斯-马赛大学从一年级到三年级使用的是美国60年代编写的初、中、高级"汉语课本"。

大陆、台、港或美国编写的教材,各有其优点,也有不足之处。大陆的教材能反映大陆政治、经济、文化的情况和变化,也能体现我国对外汉语教学和研究的水平,但法国教师反映,这套教材内容枯燥,政治性太强,科学性也较欠缺(如词汇重复率不符要求),不太适合法国学生学习;埃克斯-马赛大学为什么使用美国的"汉语课本"?据称,这里的教师认为,这套教材内容充实,难度大,口语和书面语兼备,实用性强,文化背景知识丰富,有利于培养尖子学生。[①] 但使用台、港或美国教材,存在着一个明显的问题,即时常会因繁、简汉字使用的混乱而带来不便,影响教学效果。此外,法国在汉语教材的使用中,初、高中和大学课程的衔接,非文科专业高中毕业生进入大学理科后汉语继续学习问题等,很长一个时期内也没有很好地解决。

战后,法国教师也编写了一些汉语教材,这些教材各有自己的特点,也不同程度地都发挥过各自的作用,同样体现着"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特点。[②] 如戴密微编写的《基础汉语教材》(*Pour l'enseignement élémentaire du chinois*,1953),主要是一些文章的汇编;布尔热瓦(P. Bourgeois)的《基础汉语课本》(1965),是法国第一本专以中学生为对象的汉语教材;李治华的《汉语视听课本》(1974),编者的目的是在于使用结构完整的视听教学法教授现代口语;游顺钊和戴乐生(H. Denes)的《有没有护照?》(1974),是一套视听汉语课本;高静的《每日汉语》(1976),是一本口语教材;康多(P. Kantor)的《吸收的方法》(*Méthode assimil*,1981),编者的意图是在于提高学生的口头会话和表达能力;来仙客(N. Lessenko)和德丽芬(D, Weurlesse)的《现代汉语程序教材》(1986),也是一门汉语入门教材,一度被法国不少大学所采用;白乐桑和张朋朋的《汉语语言文字启蒙》(*Méthode d'initiation à la langue et à l'écriture chinoises*,1989—1991),重点放在汉字上,强调记字、组词能力;华卫民(Monique Hoa)的《这是汉语》(*C'est du chinois*,2000),是一本"汉语双轨教程",分"读写本"和"听说本"两册。

其二,注重"实用性"和"现代性"。法国汉语教学虽然不像美国那样一开始就鲜明地表现出它的"实用性",但是法国的汉语教学也有重视鲜活性和实用性的传统。早在19世纪,当东方语言学校开设出汉语课的时

① 王忠华:《法国南方的汉学中心——埃克斯大学》。

② 20世纪末东方语言学学院的汉语老师与大陆汉语教师共同编写的汉语教材,也已于本世纪初正式出版,并得到好评。

候，该校的汉学家巴赞（Antoine Bazin）就曾率先树起教授“白话”的大旗。他把“文言”和“白话”区分开来，编写出《官话语法》（*La Grammaire mandarine*，1836）这样具有开拓性的教材。从那时起，该校的汉语教学，就已实现了在“原则上”以白话为主，文言只作为“补充”的目标。此后，该校一直坚持这一传统，“直到当代”。[①] 战后的法国汉语教学，已不只是东方语言学院，而是所有新建的中文系和汉语教学单位，从一开始就重视教学的“实用性”和“现代性”，做到在教学中坚持以教授现代汉语为主，附带才开设一些古代汉语课的教学原则。如上述所提到的汉语教材，很明显都是非常实用的现代汉语课本，并突出了口头的训练和表达。显然，这既是整个国际汉学研究的大势所趋，更是中法建交以后两国外交、经济、文化交往日益频繁，学生对现代汉语要求更为迫切的结果。战后的东方语言学院中文系，在学生手册（1980—1981 年）中这样明确规定：“中文系旨在造就能说、能写中文，能了解中国现状和它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所取得的人类经验的独创性的专门人材，其教学和研究工作与古代汉语、现代汉语、中国文学、地理、历史有密切联系。”这一计划，充分体现了重视现代和“实用性”的宗旨。而巴黎第八大学中文系的教学内容，几乎全部涉及现代中国课题，如现代汉语、中国现代文学等。该校的“汉学研究中心”及其刊物《远东与远西》（二年刊），也着重研究当代中国文化和意识形态。埃克斯－马赛大学中文系现代语言教学更具特色，尤其是该校的“广播课”和“电影视听课”，其内容和课程安排方式都富于创造性，重点都在于训练学生的听、说、译的能力。在“广播课”上，教师每天收录北京电台对西欧、北非的华语广播，然后按照深浅加以剪辑，装订成册，作为教材，供学生使用。到高年级，教师便把前一晚的录音直接拿来作为教材，有着浓厚的新闻色彩。该教材已于 80 年代正式出版，并配有华语广播录音带和生词的英文注释。再如该系三年级的“电影视听课”，是该系主任杜特莱（Noel Dutrait）所设计的一门新课。他从几部中国电影（以故事片为主）中选取一些片段，上课时放给学生看，或者从头至尾放一部大片，老师跟学生在一起，边看，边交谈，边辅导。放大片时，请中国同学和中国老师参加，看完后讨论。电影语言生动形象，富有个性，对于提高高年级学生的汉语水平很有作用。但电影语言不易理解，最大的难处在于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杜特莱先生认

① Paul Demiéville, *Aperçu historique des études sinologiques en France*. Ⅲ.

为,对于高年级学生来说,学习的重点已不再是解决语言结构问题,而是解决文化差异所带来的难点。这种方法实际上是对法国传统视听教学法的继承和发挥。传统的视听法一般用在初级教学阶段,教学内容是由老师设计的,而"电影视听课"跟"新闻广播课"一样,使用的基本上是原始材料,更加突出语言教学的实践性。[①] 因该系使用了这种方式,使得该校中文系的毕业生的语言表达能力都达到较高的水平。[②]

第五,中法汉语教学的互动。

国外的汉语教学,一向跟中外关系的变化有着紧密的关联,二战后的法国汉语教学也不例外。

毋庸置疑,二战后法国汉语教学能摆脱困境,走出低谷,重振雄风,是法国汉学家们努力的结果,但是,中法关系的改善,两国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加强,为法国汉语教学提供了良好的环境,自然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二战后,尤其是1964年,戴高乐将军率先冲破西方封锁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增进了两国人民的友谊,加强了两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也给法国汉语教学带来了生机。在这一大好形势下,当时法国有一批年轻学者来中国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回国后,大多在汉语教学和汉学研究机构中担任重职,成为法国汉语教学和汉学研究的骨干力量。

70年代以后,中国内地、台、港与西欧贸易的长足发展,大大地刺激了欧洲各国大、中、小学的汉语教学,尤其是大陆对外汉语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③]对国外的汉语教学事业,更是产生了直接的影响。80年代以后,西欧再度出现的"中国热"、"汉语热"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法国更是一片热土。

法国是西欧国家中最早向中国政府聘请汉语教师的国家。1964年9月,巴黎东方语言学院首次向中国聘请了一名汉语教师,接着,巴黎第七大学、第八大学、埃克斯-马赛大学也相继向中国聘请了汉语教师。此外,巴黎近郊的蒙日洪中学也于1965年向中国政府聘请了汉语教员。与此同时,在中国方面,从50年代开始,从全国各大学的中文系毕业生中选拔人

---

① 王忠华:《法国南方的汉学中心——埃克斯大学》。

② 胡书经:《法国汉语教学与研究的现状》。

③ 1983年6月,我国成立了"中国对外汉语教学研究会",后改名为"对外汉语教学学会",1985年和1987年在北京举行了两次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根据与会代表倡议,1987年8月成立了"世界汉语教学学会"。

才，进行外语培训三年，着手培养汉语出国储备师资，语种包括英、法、西班牙、意大利等，其中以英语和法语的出国储备师资为数最多。“文革”前，共培养了三批，“文革”期间，因对外汉语教学几乎处于停顿状态，个别人转行从事其他工作，但“文革”后大部分人归队，仍然从事这一工作；“文革”后又培养了两批。我国政府派往法国的历届汉语教师，除个别教学效果欠佳（有的并非中文专业毕业，加上不懂法语，影响了教学效果）之外，多数业务水平较高。这些师资在法国的大、中院校担汉语教师，课程内容包括基础汉语、中国文化、历史、文学、报刊阅读、翻译（法译汉）等，教学效果好，积累有丰富的经验，有的还多次受到邀请。更令人注意的是，这些汉语教师回国期间，大都继续活跃在对外汉语教学和研究领域，有的担任国家汉办或对外汉语院系领导，有的长期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和研究工作，在法语国家和地区的教学和交流中取得卓著成绩，发挥巨大作用。1999 年 7 月 29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为 1961—1964 年培养的“国家汉语储备师资”召开了一次会议，为他们颁发了“语出华夏 桥架五洲”奖状，以肯定他们几十年来为对外汉语教学方面所做出的贡献。据统计，这次获奖者全国 80 多名，而在法国和法语国家从事教学的约 30 名。

70 年代以后出现的“中国热”、“汉语热”更促进了中法汉语教学的互动，师资的聘请也突破了政府级而走向校际交流，并日趋活跃。如北京大学与巴黎第十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与蒙彼埃大学，北京第二外语学院与法国高等商业经济学校（Essec），北京语言学院与埃克斯－马赛大学，里昂的让·穆兰中学与北京教育学院等，在汉语教学方面都建立有联系，并互派教学人员。又如 1972 年，蒙日洪中学接待过一批中国留学生到学校学习法语，1980 年，中国教育部部长蒋南翔及其一行访法，参观访问了该校；1980 年 6 月 16—18 日，东方语言文化学院的“中国研究中心”得到森格热－波里雅克（Singer－Polignac）基金会的赞助，召开了“中国抗日文学（1937—1945）座谈会”，与会者包括中国作家 7 名，其他国家的汉学家 23 名，并于 1982 年出版了座谈会专刊。1985 年蒙日洪高中毕业班学生应邀来中国进行为期三周的实习访问；1980、1990 年夏季，北京教育学院接待了两批让·穆兰中学的汉语实习生活动等。2004 年 3 月 26 日全法汉语教

学研讨会在巴黎国际大学生城举行。[1] 国家汉办发贺函表示热烈祝贺，世界汉语教学学会会长、北京大学教授陆俭明参加了研讨会。[2] 此外，为配合汉语教学，法国有的中学还设有中国俱乐部，经常组织一些讨论会、讲座、联欢会等，以促进学生学习汉语的兴趣和积极性。

① 此次汉语教学研讨会是在中法文化年的框架内由法国汉语教师协会和法国教育部共同举办的，同时纪念法国汉语教师协会成立20周年而召开。

② 《全法汉语教学研讨会在巴黎召开》，中国侨网，2004年3月31日。

附录一
法国汉学机构的确立和发展

显然，一门学科的发展离不开它的机构的建立和学术队伍的形成。法国是世界上最早成立汉学研究和教学机构的国家，我们暂且不谈18世纪法国传教士们所做过的努力，如果仅从1814年法兰西学院（Collège de France）开设汉语讲座算起，至今也已有两百多年历史。这期间虽然经过许多挫折和磨难，但法国汉学教学和研究机构仍然在不断地发展壮大。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汉学研究的深入和汉语教学需求量的日益巨增，不仅一些老的机构在不断地扩大，继续发挥带头作用，同时一些新机构也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据法国汉学研究协会（Association Française d'Études Chinoises，简称AFEC）的一份资料统计，1991年的时候，有国际影响的机构已有70多个，[①]近年来则又有明显增加。

一、法国汉学机构的建立（19世纪初、中期）

Sinologie所以首先在法国得以确立，显然是跟18世纪法国的文化界，尤其是传教士的努力所打下的基础分不开。但“汉学”作为一门学科得以确立，并使其成为一门举世公认的学科，是19世纪法国汉学家们的伟迹。其主要标志是，1814年12月11日法兰西学院的教授们做出决定，在欧洲各大学中首次开设汉学讲座，并于翌年1月16日正式开课，首任这一讲座教授的是当时年仅27岁的汉学家雷慕沙（Abel Rémusat）。从这一年开始，不仅在法国，而是在整个欧洲，汉学便逐渐呈现出一派欣喜的气象。在法

① *Lettre de l'AFEC*, Numéro spécial, décembre 1991; www//Aassociation française d'études chinoises.

国，继法兰西学院汉学讲座之后，巴黎东方语言学校((L'Eco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Vivantes)于1843年开设出汉语课，1900年远东法兰西学院(l'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 - Orient)创建。与此同时，欧洲其他国家大学也相继开设出汉学课程：俄国于1851年，荷兰于1875年，英国于1876年，德国于1912年。因此我们说，法兰西学院汉学讲座的开设，在国外汉学发展史上意义重大，它结束了传教士的中国研究，使汉学在法国和欧洲大学里被公认为一门学问。

法兰西学院(Collège de France)是法国一个既古老又富于青春活力的教学和研究机构。文艺复兴时期，为承担当时巴黎大学所不能接受的教育科目而建立。初建时学院主要教授希伯来文和希腊文，随着时代发展，开设的学科有很大变化。在法兰西学院从事教学和研究的都是一些真正的学院派教授，既有严谨的学风，又有开拓精神。所开课程，实际上都是一些专题讲座，听课者有学生，也有学者，都为自由旁听者。1814年由首任教授雷慕沙开设的汉学讲座，名为"中国、鞑靼、满洲语文和文学讲座"(Chaire de Langues et Littératures chinoises et tartars - manchous)，1919年起改名"中国语言和文学讲座"(Chaire de langue et Littérature chinoises)，一直沿用至1964年。在这里讲座汉学的，继雷慕沙之后是儒莲(Stanislas Julien)、德理文(De Saint - Denys)。可以说，在19世纪，法兰西学院是"法国从事中国历史和文明科学研究的唯一机构"，[①]从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起，虽然法国出现众多的汉学教学和研究机构，但法兰西学院仍然在这一领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将分别在每个时期进行介绍)。

这时期另一个重要的汉学机构是东方语言学校(L'Eco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Vivantes)，它的前身是路易十四时代的"青年语言学校"(即：翻译生学校)。

1839年，该校通过开设现代汉语课的决议，并于1843年10月22日正式开课，担任这里第一任现代汉语教授职位的是19世纪法国重要的汉学家之一安托讷·巴赞(Antoine Bazin)。他编写有《官话语法》(*Grammaire mandarin*，1856)，是"欧洲第一个"把文言和白话区分开来的汉学家。[②]

与法兰西学院"学院式"的教学所不同的是，东方语言学校的汉语教

① 谢和耐：《法兰西学院的汉学讲座》，《法国当代中国学》，第494页。

② Paul Demiéville, *Aperçu historique des études sinologiques en France*, II.

学有着明显的“实践性”和“实用性”的特点。事实上，鸦片战争之后，法国跟中国的外交和商务事务开始活跃，传教活动等也更加频繁，需要大量汉语人才，该校的汉语课正是为实际需要而开设。当时对汉语感兴趣的人，更多需要的是现代汉语而不是古代汉语，因此，该校一开始就以教授现代汉语为主，古文只作为补充。而且，雷慕沙虽然在法兰西学院首次开设了汉学课，但其授课方式是学术报告，自由听课，没有考试制度，不能算正规汉语教学。而东方语言学校则已进入了正规教学，所以，该校汉语教学很快就成了全法国汉语教学的重镇。欧洲和法国许多著名汉学家都曾踏进过这所学校大门。

接巴赞之后在这里任教的是儒莲，儒莲之后，基本上是一批从中国归来的外交部翻译人员：波兰公爵哥士耆（Alexandre Kleczhowski）、冉默德（Maurice Louis Marie Jametel）、德韦理亚（Gabriel Devéria）、微席叶（Arnold Vissière）。该校进入20世纪后，在50年代以前的教学情况虽然由于受两次大战的影响，一直处于时断时续、时好时坏的状态，但仍然是法国汉语教学的重镇，保持着它的优势，一些法国汉学泰斗，如伯希和（Paul Pelliot）①、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②、考狄（Henri Cordier）、葛兰言（Marcel Granet）③、格鲁塞（René Grousset）④，都曾担任过课程。在语言教学方面，进入20世纪以后，该校汉语教学的政治目的也更加明确，教学中更加注重口语和实用性。

二、法国汉学机构的发展（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

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期，是法国汉学蓬勃发展、繁荣昌盛的时期。主要表现在：又有一些新的教学和研究机构创立，使法国汉学教学和研究机构趋向完备；出现了一批有世界影响的汉学家，如沙畹（Edouard Chavannes）、亨利·考狄（Henri Cordier）、马伯乐（Henri Maspero）、葛兰言（Marcel Granet）、伯希和（Paul Pelliot）等；在研究领域和方式方法上也有进

① 他在这里任教了几个月。

② 从1931年，一直工作到1945年。

③ 分别于1889—1925和1926—1940间在这里任职。

④ 他虽然没有正式担任这一教职，却于1941—1952年间负责该课程。

一步拓宽，在中国历史、考古、敦煌学、天文、宗教、思想、经济等领域广泛涉猎，研究的方式也开始趋向多样化。

这时期又增加了一些新的机构，法国本土和中国都有。

第一，法国本土机构。

1）巴黎研究实践学院（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Etudes）。1868 年由维克托·杜吕易（Victor Duruy）创办，包括第一至第四系。1886 年增设第五系，1947 年又设立了第六系。其中四、五、六系负责汉学研究，开设讲座。

2）法兰西远东学院（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 - Orient，EFEO）。前身是法国在越南考古研究中心（Mission archéologique d'Indochine）。最早是根据法属印度支那总督杜梅（Paul Doumer）1898 年 12 月 15 日的决定而创建。这次决定将新设机构的学术监督权委托给了金石和美文学科学院。一年后，根据 1900 年 1 月 20 日决议，被重新命名为法国远东学院。一度曾考虑将校址设于尚德纳格尔，后实际上设于西贡，1902 年随同总督府大部分行政机构迁至河内。学院最早使命是从事考古勘察、搜集稿本著作、保护古建筑物、研究法属印度支那地区的语言文化遗产，促进从印度到日本所有亚洲文明的历史研究。学院在河内有一座图书馆和一座博物馆，后来逐渐扩大。1907 年起，学院获得了保护柬埔寨吴哥窟建筑物遗址的公益性服务之权力。[①] 可见学院的主要任务不是教学，而是研究。必要时，研究者还将被派往有关国家工作。学院在考古学、文学和语言、宗教学和哲学、遗产保存等方面都取得卓越成就。在中国研究方面，这一时期的卓越贡献主要分为：考古方面，有 1904 年沙畹的考察团在华北对汉代墓葬和中世纪佛教雕刻等重要文物的系统勘察和研究，1908 年赴西域的伯希和考察团在敦煌搜集到 6000 余卷写本，两次世界大战间在越南境内古墓发掘等。所作学术贡献，在汉学发展史上史无先例；文学语言方面，学院成员马伯乐 1927 年完成了《古代中国》，此外还有关于唐代长安方言的创新性研究（1920 年）等；宗教学和哲学方面，继伯希和于 20 世纪初叶有关中国摩尼教的著作之后，又有马伯乐对佛教传入中国的研究、戴密微对中国禅

① ［法］蓝克利，耿昇编译：《法国远东学院简介》，《法国汉学》第一辑，［法］龙巴尔、［中］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1996 年。

宗的研究，以及谢和耐对神会禅师语录、寺院经济的研究等。①

3）巴黎高等汉学研究所（Institut des Hautes Etudes chinoises）。1919年由巴黎大学教授班乐卫（Paul Painleve）和中法名流共同筹组，1920年正式成立，开办费用由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补助。1929年起改属巴黎大学。研究所最初设有特别讲座，请有名望汉学教授主讲，课题是中华古今学术与文化。1929年，巴黎大学曾让该所主办"汉学研究结业文凭（Diplôme des Hautes Etudes Chinoises）班"和"汉学研究生合格文凭（Diplôme d'E1ève titulaire）班"。

4）国立科学研究中心（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这是国际著名的研究组织之一，成立于1939年，"旨在发展、引导并协调各方面的科学研究"。中心能为研究人员及技术合作者提供津贴补助、科研材料、出差费用以及出版研究成果的条件，组织严密，却极富弹性。很多附属于科研中心的研究组（简称ERA）及实验室（简称LA）的工作人员由中心提供工资和研究计划的资助，虽然他们的编制属于其他研究机构。

5）1900年，法国里昂大学设立了第一个汉语教授职位，担任这一职务的是汉学家库朗（Maurice Courant）。库朗先后在中国、日本、朝鲜当过领事，编写有《中国北方官话语法》。该校主要是培养能从事两国经贸交流人员。

第二，在华机构。

19世纪后期、20世纪初，法国本土之外，一些在华外交人员和传教士，如戴伯理、于雅尔、顾赛芬、戴遂良、夏鸣雷和费赖之等，除从事本职工作之外，同时进行汉学研究和汉语教学。外交人员主要是在北京、上海、南京、广州、香港、澳门等地，而传教士主要是在河北河间府（今河北献县）和上海徐家汇。这些人员中，卓著者有传教士顾赛芬（Séraphin Couvreur）、戴遂良（Léon Wieger）等。

三、走出低谷，重振雄风

（二战后至20世纪60年代）

比起20世纪上半期来，二战以后的法国汉学要复杂得多。二战使法国汉学遭到了严重摧残，老一辈汉学家或受迫害，或病故，汉学一度处于低

① ［法］蓝克利著，耿昇编译《法国远东学院简介》，《法国汉学》第一辑。

谷，但在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带领下逐渐走出困境。1964 年戴高乐将军高瞻远瞩，冲破西方对我国的封锁，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促进两国间的往来，给法国的汉学带来了生机。当时一批年轻的学者来中国学习汉语和文化，同时在中国大学里任教法国语言与文学。回国后，他们大都在各个汉学教学和研究机构中担任工作，发挥重大作用。年轻的汉学家与老一辈协同合作，使法国汉学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一些新的研究机构和中文系也纷纷建立起来。

第一，以研究为主的机构。

1）首先要提到的还是法兰西学院。1945 年，可以说既是法国汉学研究关键性的一年，同时也是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有重大变化的一年。是年，虽然失去了马伯乐和伯希和，法兰西学院一度处于群龙无首的局面，但很快，戴密微被选定为接班人，主持马伯乐开设的“中国语言和文学讲座”。他在这里教学、研究直至退休，完成了许多重要著作，如《吐蕃僧诤记》、《敦煌曲》、《临济语录》、《王梵志诗集》等。戴退休后，工作又一度受挫，直到 1975 年谢和耐接任。此外，韩百诗（Louis Hambis）、石泰安（Rolf A · Stein）、魏丕信（Pierre - Étienne Will，也译维尔）等，也担任过研究和教学工作。

2）当代中国研究文献中心（Centre de Recherche et de Documentation sur la Chine Contemporaine）。1959 年 1 月 1 日正式成立。该机构的建立标志着法国汉学进入新的阶段。中心简称“中国中心”，设在“高等社会科学院”内，隶属国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魏丕信。中心有研究人员二十多人，多为国家科研中心人员和各院校教学人员，以各自独立研究为主，也有集体项目。每月第一周的周四举行例会，由专门学术报告。中心研究范围主要是现代和当代中国（19 世纪至今）的社会、经济、科教等。中心出版《中国中心手册》（*Cahier du Centre Chine*）和《文献和书目》（*Documents et Inventaires*），均为系列专题出版物，由高等社会科学院出版，同时定期出版《中国中心研究文摘》（*Les Notes de recherches du Centre Chine*）。此外，“法国汉学协会”（Association française d'Etudes Chinoises）出版的《中国研究》（*Etudes Chinoises*）编辑室也设在这里。中心拥有法国最丰富的现代中国资料，收藏大量中西文书籍和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以及在法国出版的中文报纸、杂志。

3）东亚语言研究中心（Centre de Recherches Lingistiques sur l'Asie Ori-

entale)。成立于1960年,由李嘉乐(A. Rygaloff)领导,后扩大为汉语、蒙古语、日语、越南语、孟-高棉语系各语言、印尼语等多种亚洲语言的研究机构,但以汉语研究为主。中心同时隶属法国国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为国家科学院研究员贝罗贝。中心有20多名研究人员,主要研究古代和现代汉语、现代汉语方言、汉语语音学和音位学、汉语计算机语言、汉语国家语言政策等。中心拥有图书资料约1万卷,中文占6000卷,期刊60种。中心招收博士预备生(DEA)和博士生(Doctorat)。

中心成绩卓著,李嘉乐的汉语音韵学和贝罗贝的汉语语言学受国际学术界重视。中心学术活跃,一般每年一次年会,经常邀请外国专家讲学或出国讲学。中心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北京大学和北京语言学院有联系。中心出版期刊《东亚语言手册》(*Cahiers de Lingistiques - Asie Orientale*),每年二期,由副主任吕卡(Alain Lucas)和瓦尔特罗(Waltraud Paul)负责;另出二套丛书:《东亚语言手册丛书》(由艾乐桐(Vivianne Alleton)和贝罗贝(A. Peyraube)负责)和《交叉丛书》(*Langues Croisées*)。出版图书刊物为世界各大图书馆所收藏。1980年起,中心开始编纂《汉法词典》,还与新加坡、港台等地研究人员合编过《人民中国、新加坡、香港和台湾的语言政策》(1984)

4)汉语世界比较研究中心(Centre d'Etude Comparatives du Monde Chinois),主任卡蒂埃(Michel Cartier),研究人员约10名,主要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表现及其文字的作用"、"俗文化:文化的交接处"等。中心出版期刊《汉学图书杂志》(*Revue Bibliographique de Sinologie*),每年一期。此外,这里还设有"汉学图书杂志"国际联络网。

第二,以教学为主的单位。

二战后法国几所大学纷纷建立中文专业,主要有:

1)巴黎第七大学东亚系中文专业(Université Paris 7, Asie Orientale, Section de chinois)。战后法国最早成立的中文专业。1957年,巴黎大学文学院建立中文专业,1969年院系调整,该专业划归巴黎第七大学,谢和耐负责。该系也招收攻读普通大学学士、硕士、博士和中学教师资格考试预备等证书。教学上,第一阶段(一、二年级)主要学习汉语课程,第二阶段(三、四年级)偏重中国文学、历史、文化、经济、贸易、哲学等课程。

2)波尔多三大远东研究系(Université Michel de Montaigne - Bordeau III)中文专业。成立于1959年,吴德明(Yves Hervouet)和雷威安(André

Lévy)先后担任主任。课程除汉语外,也设中国历史、地理、当代文学、古典文学、中国社会及社会组织等课程。一二年级以汉语课为主。

3)普罗旺斯大学中国研究系(Université de Provence, Département d'Études Chinoises)。1966年成立,旺德迈亲任主任。除大学汉语专业普通学士、硕士文凭外,还设有汉语应用语大学第一第二阶段文凭,开设有汉语、中国文化、中国思想、中国美学等课程。

4)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中文系(Institut National des Langues et Civilisations Orientales, Département Chine)。1968年,东方语言学校(L'Eco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Vivantes)改名为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Institut National des Langues et Civilisations Orientales),并与巴黎第三大学合作,负责培养东方语人才,中文系负责中文教学与汉学研究,为该学院第二大系。注册学习人数在法国所有中文专业中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且逐年上升。进中文系和其他普通高校一样,凡持有中学毕业会考文凭者即可申请注册入学。也像法国其他大学一样,分阶段攻读相关证书。第一阶段分为二年制和三年制。二年制的第一年有四门语言课:语法、书面表达、听力、会话。二年级的语言课有语法及汉译法、书面表达、模拟法译汉、听力、会话等;另加选读两门文化课。二年制发给语言文化证书(CLC)。三年制攻读东方语言文化证书(DULCO),除二年制课程外,另修文言作品、白话作品,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概况1949—1989》》、《中国地域:中国地理概论》、《13世纪前中国史》是必修文化课,只有DULCO的持有者才允许进入第二阶段学习。[①] 学习课程实行学分制,考试方式有连续考试和一次性考试两种,所使用的教材有自编的和中国出版的教材。该汉语系有40名教师,其中法籍人士20名,中国和其他地方的人士20名。

5)巴黎第八大学中国部(Universié Paris VIII),1968年成立中文专业,吴德明任主任。课程有基础汉语、中国现当代历史、中国语言哲学等。该校成立有"汉学综合研究所",着重研究当代中国文化、意识形态,以及汉语教学等问题,办有刊物《远东与远西》(Extrême - Orient - Extrême - Occident),二年刊。

6)尼斯大学中文系(Université de Nice - Sophia Antipolis, Département

① 晓阳:《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汉语系概况》,载《中国文化与世界》第6辑,何寅主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25页。

de chinois)，教授汉语和中国文化。另外还设有由六名教员组成的“中国研究中心”，并与该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共同合办刊物《接近亚洲》。

四、研究中心和研究组交叉并存（20世纪70年代至今）

20世纪70年代末是中国“改革开放”开始实施的年代，8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西方再度出现“汉语热”、“中国热”，法国汉学出现崭新局面。

从70年代起，法国汉学出现两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第一，学者们组织了一批专题研究组，打破长期独立研究的局面。这些研究组均属于“高等汉学研究所”，同时在物质及行政上又附属于“国立科学研究中心”。如“敦煌手稿研究组”（ERA438），成立于1973年，由苏远鸣领导，整理和编纂伯希和从中国带走的大量敦煌汉文手稿，计划出版《敦煌汉文文献目录》，还编辑出版了数卷敦煌研究论文集；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领导下的“道教研究组”（LA140），承担了欧洲汉学会的道藏研究计划，在国家科技中心、法国远东学院、欧洲科学基金会的资助下，编制了“道藏”电脑资料库；建于1975年的“中国历史与文学研究组（ERA586），成员约20人，主要研究、翻译“中国神话”、“中国古典俗文学”，并编纂《中国话本小说目录》，该组与加拿大、日本、台湾地区、中国大陆和越南都有合作关系。

第二，一些大学中文系纷纷成立研究中心，既促进研究，又推动教学。

1975年，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中文系，由汉学家于儒伯（Robert Ruhlmann）发起，建立了“中国研究中心”（Centre d'Etudes chinoises），研究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哲学、美学、文学、汉语和汉语教学等。又具体分：甲、中国哲学及美学，尤其注重荀子思想及章太炎思想；乙、1911—1981年之间的中国政治、经济及社会史；丙、中国古典及现代文学等研究课题。“中心”由研究员、部分教员和已在第三阶段注册的学生组成，并约请国外学者参与。“中心”与其他大学和国外相关机构保持联系，举办有关学术讨论会。1980年6月16—18日，“中心”得到Singer－Polignac基金会赞助，召开了“中国抗日文学（1937—1945）座谈会”，与会者包括中国作家7名，其他国家汉学家23名，并于1982年出版了座谈会专刊。“中心”出版有刊物和研究著作，《中国论丛》（La Chine par les textes）和《中国研究手册》（Cah-

iers d'études chinoises)是中心出版的两本有国际影响的重要书刊。1977年以来,中心出版题为"从文章中分析中国"的专题论文丛书,[①]编纂《辛亥革命史料》,出版关于1978—1982年间200余部中国作品评论性书目,1995年,由白吉尔(Bergère)和安热勒·毕诺(Angel Pino)主编出版了《东方语言学院百年汉语教育(1840-1945)》等。

巴黎第七大学、里昂三大和波尔多三大也组织了一些中心或研究组。1990年巴黎第七大学东亚系成立的"17世纪研究组",重点研究中国、朝鲜、日本和越南的哲学和文学等;1970年,中断了35年的里昂大学汉语教学不仅在里昂三大学重新启动,成立了中文系,并建立了"远东研究中心",研究19、20世纪上海社会、经济史;1992年,波尔多三大远东研究系成立了"远东研究中心"等。

在新的形势下,一些在法国汉学发展史起过重要作用的汉学机构在继续发挥着它们领头的作用:

1)法兰西学院。一向以专题讲座著称的学院,仍然坚持着它的特色,开设出众多有学术水平的专题讲座。1965年,在该院主讲"中亚历史与文明讲座"(Chaire d'histoire et Civilisations de l'Asie Centrale)的韩百诗,与同道一起创立了"中央及高原亚洲研究中心"(Centre de Recherche Sur l'Asie centrale et Haute d'Asie),为法兰西学院的汉学研究开辟一个新的领域。1978年韩去世后,石泰安(Rolf A·Stein)接管。石泰安是汉学家兼西藏学和越南学家,1966年至1981年一直这里进行研究和担任课程,研究宗教思想、组织、生活内容、概念和形态等。他领导的中心,整理与研究了伯希和从新疆、敦煌等地所收集携归的文物、文献,成绩卓著,可谓一个"超越汉学研究的机构"[②],现已出版《伯希和考古团中央亚洲考古文献研究专刊》等。进入90年代,除了谢和耐开设的讲座外,还有魏丕信的"当代中国"(Chaire d'Histoire de la Chine moderne),海然热的"语言理论"(Chaire "Théorie linguistique")等。据统计,仅20世纪以来,这里就约开设有50种专题。

2)法兰西远东学院。自60年代以来,该学院的研究人员有较大的增

① 何金兰:《法国东方语言文化研究院,中国语言文化系及中国研究中心》,载《汉学研究通讯》,1984年第3卷,第3期,第186页。

② 陈柞龙:《浅评简介法国的汉学研究》,载《书目季刊》第23卷,第1期,第23页。

加，曾拥有过29位研究员，其中有5位从事汉学研究。这一时期，他们在各方面都取得了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好的成果。在历史学和哲学方面，有谢和耐（Jacques Gernet）的《中国社会史》（1972）、旺德迈（Léon Vandermeersch）的《王道》（1979—1980）等。道教方面，继马伯乐之后，又有石泰安、施舟人、索安士（Anna Seidel）、劳格文（John Lagerway或拉格威）和傅飞岚（Franciscus verellen）等的学术成就。此外，汪德迈的中国古代法家和马克·卡利诺夫斯基（Marc Kalinowski）的中国占星术思想研究、吴德明的司马相如生平和著作研究、雷威安的中国通俗文学研究等也引人注目。1962年起，还恢复编写汉日佛教百科全书《法宝义林》。在中国遗产保存方面，学院也积极参与包括由伯希和从敦煌携回并入藏巴黎国立图书馆的敦煌文书的整理编目和研究工作等。学院原成员苏远鸣推动了对这批文献中汉文文书进行编目的工作和有关研究。这是在国家科研中心的两个研究小组范围内完成的，参加工作的学院成员有陈祚龙、饶宗颐、戴仁（Jean—Pierre Drège，著有《写本时代的中国图书》，1991年）、郭丽英夫人（著有《中国佛教仟悔文》，1994年）、杜丹王（wan Toutain，她于1992年通过了一部有关地藏菩萨在中国事迹的颇为惹人瞩目的博士论文）等。学院的研究人员如马克·卡林诺夫斯基、劳格文和傅飞岚，也参与了由施舟人主持的一项庞大国际计划，即编写于15世纪中叶形成的道藏中15000部经文的目录。1992年11月，法国远东学院在台北设有研究中心，主要致力于研究中国文化史和地方史，同时也研究中国地区的社会学和人类学。

3）巴黎研究实践学院（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Etudes）。我们已经谈到，该学院成立于1868年，它的四、五、六系负责汉学研究，开设讲座。第四系也叫“历史与文献科学系”（Sciences historiques et philologiques），有桀溺（Jean Piene Diény）的“中国古代史及文献学”、毕雪梅（Michele Pirazzoti－t'Serstevens）的“中国考古学”、苏远鸣的“中国中世纪和近代史及文献学”。第五系为宗教科学系（Sciences religieues），由施舟人讲授道家经典，汪德迈讲授儒家经典和甲骨文；第六系为经济与社会科学（Sciences économiques et sociales），由白吉尔开设的“中国现代经济及社会史”，比昂高的“中国革命史”，卡蒂埃的“中国人类经济学”，侯思孟的“中国古代社会制度”，李嘉乐的“东亚语言及及社会制度”，魏丕信的“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史”。这三个系还分别设有专门研究小组，如第四系历史与语言研究中心的“敦煌文献研究组”（Equipe de Recherche sur les Documents de Touen-

houang)；第五系的中国通俗宗教研究中心(Centre d'études de la Religion populaire de la Chine)、西藏宗教研究中心(Centre d'études sur les Religions tibetaines)和宗教史文献中心(Centre Documentaire d'Histoire des Religions)的远东部(Centre Département d'Extrême - Orient)；第六系的远东文献中心(Centre de documentation sur l'Extême - Orien)和中国语言中心(Centre de Lingustique Chinoise)等。[①] 1975年，第六系即"经济与社会科学系"发展为"高等社会科学院"(Ecole des Hautes Etudes en Siences Sociales)，因而远东文献中心和中国语言中心也改名为"当代中国研究文献中心"和"东亚语言研究中心"。

4)巴黎高等汉学研究所(Institut des Hautes Etudes Chinoises)。1973年从巴黎大学分出，同其他原属巴黎大学的远东文化研究所一起，组成印度及远东亚洲研究所(Institu de l'Asie Indienne et Extrême Orientale)，直属法兰西学院。巴黎高等汉学研究所组织简单，仅有一个行政委员会，由全法教研汉学教授、专家组成，公推一人为所长。历任所长分别为葛兰言(1920—1940，此为任职时间，下同)、伯希和(1940—1945)、戴河都(1945—1959)、韩百诗(1959—1973)、吴德明(1973—1987)、侯思孟(1987—　)。该所专事研究工作，大部经费用来添购图书。1959年，原设在中国的研究所图书馆图书、期刊大都运回巴黎，并入该所。因而该所图书馆所收藏汉学书籍与期刊之齐全为法国和西欧同类图书馆之首。20世纪末统计，约近30万册，以中文最多，其中又以中国古典作品为主，丛书约1500多种，方志2000种，善本书(明代)或钞本数十种。[②] 此外，研究所还拨专款出版研究成果，出版有《巴黎汉学研究所专著丛刊》(Bibliothèque de l'Institut des Hautes Etude Chinoises)、《文献丛刊》(Textes et Documents)、《汉学目录通检丛刊》(Travaux d'Index, de Bibiliographie et de Documentation Sinologiques)、《唐代文明研究丛刊》(Cahiers de la Section des Recherces sur la Civilisation des T'ang)、《巴黎汉学研究所研究纪要丛刊》(Mémoire de l'Institut des Haute Etudes)。

1972年由克洛德·拉雷(Claude Larre)神甫发起成立的"利奇研究

① 陈祚龙：《浅评简介法国的汉学研究》，《书目季刊》第23卷，第1期，第21—22页。

② 陈三井：《巴黎汉学研究所的汉学研究》，载《汉学研究通讯》，1983年第2卷第1期，第47页。

所”，是法国耶稣会传教士组建的一个私人性质的研究所，总部设在巴黎，台湾地区有分所。巴黎人员以研究中国传统医学中的哲学思想为主，并教授针灸。台湾分所研究商代金文、中国哲学、佛教、道教。该所曾编纂出版过《汉法词典》(1976)和《汉西词典》(1977)，尤其是编纂出版的《汉法大词典》更受学术界重视。该词典于20世纪40年代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就着手进行工作，历时50年，先后参与的有约200位宗教的和世俗的学者，终于于2002年1月出版发行。成为该世纪法国汉学研究的一件大事。

五、汉语教学的蓬勃发展

在论述到法国汉学机构的时候，绝不能忽视法国一些非专门汉学机构和中小学汉语教学为法国汉学蓬勃发展所提供的良好基础。这种现象从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开始，到了七八十年代有进一步发展。据统计，在1985—1986年间，除设有中文系的大学之外，法国还有11所大学开设有汉语选修课，学生总数达2853人，20来所高校设有中文短期培训班，学生总数达3000人以上。汉语在高校外语教学中占第7位。到了90年代，已有16所大学和36所高等学校设有中文课，还把汉语作为入校会考的课程。巴黎高师当代语言专业(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 section langues vivantes)、巴黎政治研究学院国立政治科学基地(Institut d Études Politiques de Paris, Fondation Nationale des Sciences Politiques)、高等翻译学校(Ecole Supérieure d'Interpète et de Traduction)、巴黎高等商业学校国际语言和通讯系(Ecole Supérieure de Commerce de Paris, Département langues et communication internationale)、高等经贸学校语言系(Ecole Supérieure des Sciences Économiques et Commerciales, Département de langues)、里尔天主教大学语言、国际关系和外国学生基地中心(Université Catholique de Lille, Centre de langues, relation internationale et formation d'étudiants étrangers)等，都不同程度地开设有汉语课程和研究课题。这些非中文专业院校所开设的汉语课程在法国汉语教学事业发展中的重要性，已引起有关人士重视，且学生人数正逐年增长。

法国中、小学汉语教学情况是，70年代初至1978年，开设汉语课的中学增至32所，90年代增加到40所。1958年，巴黎南郊蒙日洪(Montgeron)中学首次开设了汉语课。这一实验受到普遍欢迎，第一年就招收了135名学生。1962年，巴黎西郊的圣日耳曼(St—Germain)中学也开设了汉语课，

巴黎的阿尔萨斯学校中学部接着也开设了中文课。1985 年，巴黎中国城一所小学率先成立中文班，90 年代该校汉语生达 271 名。此外，巴黎阿尔萨斯学校小学部从一年级开始也安排有“启蒙教育”的中文班。90 年代共有 88 所中小学开设中文课，世纪末更多。

附录二
欧洲部分汉学家名录[1]

阿尔更斯侯爵 Marquis D'Argems,1704—1771
阿尔卡德·黄 Arcade Hoang,中文名黄嘉略,1679—1716
阿兰·佩洛伯(法)A. Peyraube,1945—,汉名贝罗贝
艾乐桐(法)Vivianne Alleton,也译阿勒通,1944—
艾琼伯(法)René Etiemble,1909—
艾儒略(意)Jules Aleni,1582—1649
爱德华·于贝尔(法)Edouard Huber,1879—1914
爱斯嘉拉(法)Jean Escarra,1885—1955
安特生(瑞典)Jhan Gunnar Andersson,1874—1960
安托讷·巴赞(法)Antoine Bazin,1799—1863
奥波尔德·索续尔(法)Léopold de Saussure,1866—1925
奥德里克(也译作鄂多力克)Odoric de Pordenone,1265—1331
巴迪(法)Paul Bady,或译巴狄,1944—
巴多明(法)Dominique Parrenin,1665—1741
巴斯蒂-布律吉埃尔(法)Marianne Bastid-Bruguière,1940—
白吉尔(法)Marie-Claire Bergère,1929—
白晋(法)Joachim Bouvet,1656—1730
白乐日(法)Etienne Balazs,1905—1963
柏朗嘉宾(意)Plano Garpini,1182—1252
柏应理(比)Philippe Couplet,1624—1692
鲍吾刚(德)Wolfgang Bauer,1930—

① 由许敏整理。

比昂高(法)Lucien Bianco,1930—

比欧(法)E. Biot,1803—1850

毕尔（英)Samuel Beal,1825—1889

毕雪梅,原名皮拉佐利－采尔斯蒂文斯(法)Michele Pirazzolti－t'Serstevens,1930—

伯希和(法)Paul Pelliot,1878—1945

勃罗提业(法)Gabriel Brotier,1723—1789

程安娜(法)Cheng,Anne(Lanlan),1963—

程纪贤(法)Cheng,François,Chi－hsien,字抱一,1934—

戴伯理(法)Dabry de Thiersant,1826—1898

戴何都(法)Robert des Rotours,1890—1980

戴密微(法)Paul Demiéville,1894—1979

戴仁(Jean－Pierre Drège,1946—

戴遂良（法)Léon Wieger,1856—1933

戴闻达(荷兰)J. J. Duyvendark,1889—1954

德庇士（英)Davis,Sir John France,1795—1890

德经(法)Joseph Guignes,1721—1810

德理文(法)De Saint－Denys,1823—1892

德韦理亚（法)Gabriel Devéria,1844—1899

邓玉函(德)Jeàn Terrenz,1576—1630

杜赫德(法)Jean Baptiste Du Halde,1674—1743

范礼安(意)Alexandre Valignani,1538—1606

费赖之(法)A. Pfister,1833—1891

冯秉正(法)De Maillac,1669—1748

佛尔克(德)Alfred Forke,1867—1944

佛雷烈(法)Nicolas Frérer,1685—1749

弗朗索瓦·于连(法)François Jullien,1951—

福赫伯(德)Herbert Franke,1914—

福克斯(德)Walter Fuchs,1902—1979

福兰阁(德)Otto Franke, 1863—1946

傅尔蒙(法)Etienne Fourmont,1683—1745

傅吾康（德)Wolfgang Franke,1912—

嘎伯冷兹(德)Georg von Gabelentz,1840—1893
高本汉(瑞典)Bernhard Karlgren,1889—1978
高罗佩(荷兰)R. H. Gulik,1910—1967
哥比安(法)Charles Le Gobien,1653—1708
哥罗特(荷兰)J. J. M. Groot,1854—1921
哥士耆(法)Alexandre Kleczkowski,1871—1886
格鲁塞 (法)René Grousset,1885—1952
葛兰言(法)Marcel Granet,1884—1940
古兰(法)Maurice Courant,1865—1935
顾彬(德)Wolfgang Kubin,1945—
顾赛芬(法)Séraphin Couvreur,1839—1919
郭纳爵(葡)Ignace da Costa,1599—1666
海德(英)Thomas Hyde,1636—1705
海尼士(德)Erich Haenisch,1880—1966
韩百诗(法)Louis Hambis,1906—1978
韩国英(法)Pierre Martial Cibot,1729—1780
何赖思(法)Charles de Harlez,1832—1899
何四维(荷兰)A. F. P. Hulsewe,1910—
亨利·考狄(法)Henri Cordier,1849—1925
洪若翰(法)Jean de Fontaney,1643—1710
侯锦郎(法)Hou,Ghin - lang,又作 Ghing - lang,1944—
侯思孟,原名铎纳儿·霍尔兹曼(法)Donald Holzman,1926—
霍夫曼(德)Alfre d'Hoffmann,1922—
桀溺(法)Jean - Pierre Diény,1927—
金葆光(法)Henri Doré,1850—1931
金尼阁(法)Nicolas Trigault,1577—1628
卡达尔(法)Claude Cadart,也译高达乐,1933—
康德谟(法)Maxime Kaltenmark,1910—
克拉普洛特(德)Heinrich Julius Klaproth,1783—1835
克鲁特(德)J. J. M. de Groot,1854—1921
克洛岱尔(法)PaulClaudel,1868—1955
孔拉迪(德)August Conrady,1864—1925

拉露(法)Marcelle Lalou,1890—1967
拉摩特(法)Etienne Lamotte,1903—1982
蓝歌籁(法)Luois Mathieu Langlès,1763—1824
雷慕沙(法)Abel Rémusat,1788—1832
雷威安(法)André Lévy,莱维,1929—
雷孝恩(法)Jean Baptiste Regis,1603—1738
李嘉乐(法)A. Rycaloff,原名里加洛夫,1922—
李明(法)L. D. Le Comte,1655—1729
李约瑟(英)Joseph Needham,1900—1995
李治华(法)Li Tche - houa,1915—
理雅各 (英)James Legge,1814—1897
利玛窦(意)Mathieu Ricci,1552—1610
林力娜(法)Catherine Jami,卡特林娜·雅米,汉名林力娜,1944—
刘应(法)C. de Visderou,1656—1737
龙华民(法)Nicolas Longobardi,1559—1654
卢瓦(法)Michelle Loi,1939—
鲁布鲁克(法)Guillaume de Rubruck,1215—1270
鲁日满(比)Francois de Rougemont,1624—1676
罗厉山(法)Alexandre de Rhodes,1591—1660
罗明坚(意)Michel Ruggieri,1543—1607
罗如望(葡)Jean de Rocha,1566—1623
罗雅各(意)Jacques Rho,1593—1638
马伯乐(法)Henri Maspero,1883—1945
马丁(德)Helmut Martin,又译作马汉茂,1940—
马尔罗(法)André Malraux,1901—1976
马可·波罗(意)Marco Polo,1254—1324
马克(法)Marc Kalinowski,1954—
马礼逊(英)Robert Morrison,1782—1834
马若瑟(法)Joseph Marie de Prémare,1666—1736
马悦然(瑞典)Göran Malmqvist,1924—
麦都思(英)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1857
门多萨 (西)Juan Gonzalez de Mendoza,1545—1618

米歇尔·卡蒂埃(法)Michel Cartier,1944—
穆勒(德)Müller,1953—
南怀仁(比)Ferdnand Verbiest,1623—1688
诺伊曼(德)Karl Friedrich Neumann 1793—1870
欧森南(英)Edward Lavington Oxenham,1843—1897
帕拉特(德)Johann Heinrich Plath,1802—1874
帕里(法)Marie Claude Paris,1944—
佩特吕茨(法)R·Petrucci,1917—
皮埃尔·洛蒂(法)Pierre Loti,也译成绿蒂,1850—1923
普散(法)Louis de la Vallée Poussin,1869—1938
钱德明(法),也叫王若瑟 Jean Joseph Amiot,1718—1793
冉默德(法)Maurice Louis Marie Jametel,1856—1889
让·普祖鲁斯基(法)Jean - Przyluki,1885—1994
儒莲(法)Stanislas Julien,1797—1831
萨加尔(法)Laurent Sacart,1954—
萨西(法)Sylvestre de Sacy,1758—1838
沙畹(法)Edouard Chavannes,1865—1918
圣-琼·佩斯(法)Saint - John Perse,1887—1975
施舟人,原名席佩尔(法)Kristofer Marinus Schipper,1934—
石泰安(法)Rolf Alfred Stein,原名斯坦因,1911—
硕特(德)Wilhelm Schott,1802—1889
斯当东(英)Staunton,Sir George Thomas,1781—1859
斯坦因(英)Sir Aurel,Stein,1911—
斯文赫定(瑞典)Svon Hedin,1865—1952
宋君荣(法)Antoine Gaubil,1689—1759
苏慧廉(英)William Edward Soothill,1861—1935
苏远鸣(法)Michel Soymié,原名索瓦米埃,1921—
汤若望(德)Jea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1—1666
特罗利埃(法)Pierre Trolliet,汉名陶立业,1943—
瓦莱特-埃默里夫人(法)Martine Vallette - Hémery,1954—
瓦特斯(英)Thomas Watters,1840—1901
汪德迈(法)Léon Vandermeersch,原名莱翁·范德尔梅尔斯,1930—

威妥玛(英)Wader,Sir Thomas Francis,1818—1895
微席叶(法)Arnold Vissière,1858—1930
韦利(英)Arthur Waley,1889—1966
伟烈亚力(英)Alexander Wylie,1815—1889
卫匡国(意)Martin Martini,1614—1661
卫礼贤(德)Richard Wilhelm,1873—1930
魏丕信(法)Pierre - Etienne Will,维尔,1944—
吴德明(法)Yves Hervouet,原名保尔·莫里斯 Paul Maurice,1921—
希尔特(德)Friedrich Hirth,1845—1927
席尔宛·烈维(法)Sylvain Lévi,1863—1935
夏鸣雷(法)Henri Havrit,1848—1901
小德经(法)Christian Louis Joseph de Guignes,1759—1845
谢阁兰(法)Victor Segalen,1878—1919
谢和耐(法)Jacques Gernet,1921—
熊三拔(意)Sabbathin de Ursis,1575—1620
薛力赫(荷兰)Gustave Schlegel,又译名施古德,斯莱格尔,1840—1903
雪菲(瑞典)Carl Fredrik Scheffer,1715—1786
阳玛诺(葡)Emmanuel Diaz Junior,1574—1659
殷铎泽(意)Perosper Intorcetta,1625—1696
于雅尔(法)Camille Imbault - Huart,1857—1897
玉尔(英)Henry Yule,1820—1889
翟理思(英)Herbert Allen Giles,1845—1935
翟林奈(英)Lionel Giles,1875—1958
张诚(法)J. Fr. Gerbillon,1654—1707

附录三
法国部分中文图书馆和博物馆简介[1]

1. 吉美博物馆图书馆[2]

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吉美博物馆图书馆，于1878年草创于里昂，后经重新布置并于1889年起在巴黎开馆。它是领导一家化学企业的实业家——埃米尔·吉美(Emile Guimet, 1836—1918)的杰作。其目的是为了有助于实现教育计划并"解释"所展物品。他本人曾写道："除了宗教物品、供像、宗教崇拜法器之外，还必须能找到《圣经》、编年史、稿本，从而形成能解释清楚一切的一座庞大的图书馆。"

1918年后，吉美博物馆分阶段改造成了一座东亚美术博物馆。1945年，收藏在卢浮宫的一批远东艺术特藏移交到这里，于是，该馆便成了专门负责介绍亚洲艺术的国立博物馆，图书馆也越来越向所涉及艺术和考古专业发展，特别注重东方宗教，尤其是佛教的图书收藏。

该馆图书计约10万卷图书，有西方新的出版物、17—18世纪版本的游记，以及19—20世纪的重要汉学论著。新入藏的重点是中国本土出土的考古物品，此外，图书馆还收有五十多种中文期刊。1914年之前的探险考察也为图书馆带来丰富的资料。该馆还收藏数位名人个人档案，伯希和的论著手稿、西域探险笔记本、他的全部书信，沙畹携归的拓片等。

除了有关中国艺术和考古文献外，该馆还有一些中国邻邦的特有资料。

---

① 由陈超整理。

② 参考文章：[法]马古安的《法国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吉美博物馆图书馆》，《法国当代中国学》。

马古安(Francis Macoin)为该图书馆馆长。

2. 巴黎国立图书馆中文藏书①

巴黎国立图书馆中文特藏是欧洲最大、最有权威的藏书处之一,至今亦然。

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的中文藏书共约20万册,其中有15万册线装的木刻本或石印本,期刊和稿本著作有"屏风装"或"经济装"形式装订。

该馆所覆盖的知识面是百科性的。中文馆藏品始于17世纪末叶,由耶稣会士白晋(Joachim Bouvet)神父于1697年从中国携归的312册书。最早的基本收藏核心是由在华法国神父们经常为供皇家文库收藏而寄回的著作。19世纪时,巴黎本地,主要是向几大藏书家采购,在华的采购直到20世纪初才停止,当时伯希和在北京获得了约3万卷的藏书,此后仍在发展,但特别注重涉及帝制时代的中国论著。

从内容来看,这些文献所分成的多种"特藏"(fonds),反映了形成馆藏品的历史阶段:"中文特藏",也被称为"古兰(Courant)特藏",出自编写刊本目录者的名字——莫里斯·古兰,伯希和获得的书籍入藏时,做了编号或是保留了"新购得书统计表",由此出现了"伯希和特藏A和B"的分类法,另外,"中文拓片"及沙畹、列邦塔尔(Liepenthal)、马伯乐和谢阁兰(Segalen)的拓片也有特藏。

郭恩(Monique Cohen)夫人现为巴黎国立图书馆东方稿本部主任。

① 参考文章:[法]郭恩夫人的《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的中文藏书》,《法国当代中国学》。

附录四
法国部分汉学刊物简介[1]

1.《中国研究》[2]

《中国研究》(Etudes Chinoises)创刊于1983年,是法国汉学研究会(AFEO)的会刊。刊物严格执行研究会的宗旨:"保持并发展学者间的研究与交流,保持并发展不同院校间的对话(特别是在资料、著作、译著方面),保持并发展与法国及外国相关单位的联系。"在魏丕信教授的推动下,《中国研究》已成为一本全面代表法国汉学研究水平的学术期刊。该刊由法国国立科研中心资助出版,每年出1卷,2期,每期250页左右。期刊以中国为中心,涵盖了汉学家们研究的所有学科,历史、社会、文学、哲学、地理学等。

《中国研究》发表的所有文章均经编委会审定,以确认其独创性及学术质量。每期发表3~4篇论文,其后附有法、英文摘要,不久还将有中文,每期登有评述及研究札记,同时还发表大量最新出版的汉学著作的书评及简介。每年集中登载一次有关中国的法文著作书目及法国学者用不同语言在国外发表的著作书目。论文及某些书评后附有文中所引汉语拼音(专有名词、技术术语等)的汉字表。该杂志新近做出了很大努力,为某些论文配上了版画、绘画、书法等图片,以使其更加吸引人。

2.《亚洲艺术》[3]

原名《亚洲艺术杂志》由法国博物馆于1924年创办,1940—1945年期间停刊,再次发行时更名为《亚洲艺术》,副标题为《吉美博物馆(Musée

---

① 由陈超整理。

② 参考文章:[法]白诗薇,博杰峰:《法国的汉学期刊"中国研究"》,《法国当代中国学》。

③ 参考文章:[法]毕梅雪:《"亚洲艺术"期刊的汉学研究》,《法国当代中国学》。

Guimet)和塞努斯基博物馆(Musée Cernuschi)年鉴》。该杂志的主编一直由法国博物馆馆长担任,直至1963年法国远东学院院长接任。

《亚洲艺术》为年刊,其办刊方针为优先发表中等篇幅的文章,保证涉及的问题具有多样性,使读者有可能定期阅读到与各自学科有关的文章。每期杂志包括5~7篇主要文章,一篇有关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和塞努斯基博物馆活动的专稿,另有一些专栏和近期出版消息。两个博物馆的"活动"栏目由馆长撰写,介绍各自部门新近收藏和筹备的展览。专栏由一些篇幅较短的文章组成,内容包括:介绍某件特殊物品,法国境外组织的重要展览,某座建筑的修复工程和围绕同一主题举行的研讨会或一系列著作。论文用法文或英文撰写,其内容提要与正文分别采用两种不同的文字。

《亚洲艺术》自1981年以来发表有关汉学的文章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对中国境内外考古发现的介绍、考古和艺术史领域的论文及最新研究成果。

在介绍性文章中,一类是对中国学者论文的译文,另一类是综述性文章。该杂志也发表某些报告。《亚洲艺术》杂志也发表一定数量的研究古代中国的论文,部分论文也涉及到了敦煌与新疆的佛教艺术以及中国的瓷器艺术。1983年,法国成立了一个专门研究小组,研究由清朝宫中的入华耶稣会士们为乾隆皇帝设计的圆明园西洋楼,其部分成果已在《亚洲艺术》中发表。

《亚洲艺术》对于不同文化区域都敞开大门,将有关中国的资料置于亚洲大陆的整体范畴内进行研究,从而阐明工艺、艺术的交流与影响、传播的经由地区及文化统一体内的广阔空间。该杂志中发表的大批文章涉及到了诸多方面:建筑、绘画、西藏宗教图像、蒙古宗教建筑、西域、亚洲草原,为从事汉学研究的学者们提供了进行卓有成效比较的机会。

3.《汉学书目杂志》①

《汉学书目杂志》(法文刊名为:*Revue Bibliographique de Sinologie*;英文刊名为:*The Bibliography in Sinology*)为一部工具书,是为那些想要跟踪了解在世界上不同领域内中国研究进行状况的学者而创办的,可供史学家、

① 参考文章:[法]叶利世夫作,孟华译《"汉学书目杂志"简介》,《法国汉学》第三辑,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

社会学家、政治学家们所使用。在第八届国际青年汉学家大会上，提出办刊倡议，于1956年正式创刊。第一期于1957年出版，由82位不同国籍的人分别介绍了1955年内出版的工作。而后的25年间又相继出了15期，(1982年出版)最后一期对1968至1970年间出的书目进行了分析。1982年推出了一套"新系列"：在保持原有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及时反映出各种新出版物的情况，同时要给在中国大陆出版的书目留出更多的篇幅。

自1986年起，综述性的文章逐年增多，且多为评述当时的热门话题。自1993年起，又增加了介绍性文章，特别注重在研究上有开创性意义的工作，增设了新栏目(1996年增加了"音乐"栏，1997年增加了"时事"栏)。同时，在排版方面，也做了很多更新。

以下是自创刊以来历任主编：1955—1963：汪德龙(音译，Piet Van Der Loon)；1964—1965：侯思孟(Donald Holzman)；1966—1970：侯思孟、贾永吉(Michel Cartier)；1971—1981：贾永吉；1982—1991：贾永吉、叶利世夫(Danielle Elisseeff)；1992至今：贾永吉、叶利世夫、倪瓦尔(Jacqueline Nivard)。

4.《远东亚洲丛刊》[①]

《远东亚洲丛刊》(简称《丛刊》)是法兰西远东学院京都分部的刊物，在东方学领域占有重要地位，已有10年的历史。

《丛刊》为东亚地区的研究者而创办，成为他们的论坛。其主要研究方向是古今东亚文化和社会，特别重视从人类学和文化角度来考察宗教现象。

《丛刊》为年刊(有时带有延续为两年的几个双号)，遵循一种严格的法英双语制，因在日本出版，所以附有(从第7期开始)日文目录。

《丛刊》是应《法国－亚洲》期刊创办人勒内·德·贝尔瓦勒(René de Berval)在法兰西远东学院的要求下，由索安士(Anna Seidel)推出，由一位主编和一个编审委员会主持。编审委员会主要是集中了一批活跃在日本－中国－朝鲜研究领域的法兰西远东学院的新老成员，同时还包括法国研究亚洲宗教的代表人物。

自第3期(1987年)起，《丛刊》每期都要选定一种专刊号的程式，同时又保留其主要宗旨的内容。该刊关心的另一种事情是向英语读者介绍用

① 参考文章：[法]戴路德的《法国的"远东亚洲丛刊"》，《法国当代中国学》。

法文写成的东方学著作。《丛刊》由法兰西远东学院京都分部负责排版，京都的一家印刷商承印，向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发行。

5.《通报》[①]

1889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和克里斯蒂安尼亚（Christiania）举行第八届国际东方学者代表大会期间，法国巴黎东方语言学校和政治学自由学院教授考狄（Henri Cordier）和荷兰莱敦（Leiden）大学首任中文教授薛力赫（Gustave Schlegel），共同决定创设一份致力于东亚研究的学术刊物。1890年刊行第1卷，刊名全称为《通报，供东亚（中国、日本、朝鲜、印度支那、中亚和马来西亚）历史、语言、地理和民族学研究的档案》，由布里尔出版社承担出版任务。《通报》在当时是欧洲唯一一家专门致力于东亚研究的国际刊物。

《通报》有法－荷联袂主持的传统。自沙畹与考狄共同工作后，《通报》涵盖的研究阵地逐渐缩小，涉及东南亚的内容几乎绝迹，有关日本的内容日益减少。考狄逝世（1925年）后，伯希和独执掌该杂志大权直到1935年。该年开始，新的联袂主编戴闻达（J. J. L. Duyvendark）行使职权，杂志重新拥有法－荷联袂编委会。1947—1975年间是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主持，1957年起与何四维（A. F. P. Hulsewé）共同主编。由于戴密微，《通报》的佛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从1978年起，许理和（Erik Zürcher）与谢和耐（Jacques Gernet）共同主编，他们修改了《通报》的副标题，使之变成《国际汉学杂志》。自1993年起，该杂志的主编是伊维德（Wilt Idma，莱敦）和魏丕信（Pierre－Etienne will，巴黎）。

《通报》的内容不仅仅根据其主编的个性，而且也根据国际政治环境以及在研究方向上出现的动荡而演变。《通报》主要是由“学术论文”（Articles de fonds）、“杂录”、“记事”、“评论简报”和“收到赠书书目”等组成，以“学术论文”为主。随着沙畹出任主编，“杂录”于1904年停止，“记事”按国家而对事件重新分类集中，传播各种信息，诸如学术讨论会的议程和进展情况、突出事件、探险、任命和颁发荣誉称号和奖赏，但也于1931年告终。“评论简报”，从一开始就占据有重要地位，从1927年起将其简称为“书评”，经常以锋芒毕露的口吻写成，1927年后，所占篇幅越来越大，从50年代起，成了《通报》中除论文外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现有的“收到赠书

① 参考文章：[法]洪怡沙、魏丕信《“通报”杂志小史》，《法国当代中国学》。

书目”栏，自1925年起就已存在。故“学术论文”、“书评”和“收到赠书书目”是该杂志现存的主要内容。

《通报》是一份完全学术性的刊物，保持有中国和欧洲人文科学博大精深的传统，既反映汉学国际化特征，同时也不失其原始的欧洲特征。

附录五
主要参考文献

中文部分[1]

1. 著作

[德]利奇温著,朱杰勤译:《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商务印书馆,1962年。

[法]艾田蒲著,许钧、钱林森译:《中国之欧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

[法]安娜·塞德尔著,蒋见元、刘凌译:《西方道教研究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法]安田扑,谢和耐著,耿昇译:《明清间入华耶稣会士和中西文化交流》,巴蜀书社,1993年。

[法]陈艳霞著,耿昇译:《华乐西传法兰西》,商务印书馆,1998年。

[法]戴密微著,耿昇译:《吐蕃僧诤记》,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

[法]戴仁主编,耿昇译:《法国当代中国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法]杜赫德编,郑德弟、吕一民、沈坚译:《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大象出版社,2001年。

[法]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中华书局,1995年。

[法]伏尔泰著,梁守锵译:《风俗论》,商务印书馆,1995年。

① 由许敏整理。

[法]伏尔泰著,王燕生译:《哲学辞典》,商务印书馆,1991 年。

[法]格拉耐著,张铭远译:《中国古代的祭礼与歌谣》,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 年。

[法]霍尔巴赫著,陈太先、跬冒译:《自然政治论》,商务印书馆,1987 年。

[法]金尼阁:《西儒耳目资》,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 年。

[法]魁奈著,谈敏翻译:《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商务印书馆,1992 年。

[法]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商务印书馆,1998 年。

[法]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 年。

[法]荣振华著,耿昇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补编》,中华书局,1995 年。

[法]汪德迈著,陈彦译:《新汉文化圈》,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 年。

[法]谢和耐著,耿昇译:《中国社会会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 年。

[日]福井康顺,山崎宏,木村英一,酒井忠夫:《道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

[日]石田干之助:《中西文化之交流》,商务印书馆,1942 年。

[瑞典]高本汉著,聂鸿音译:《中国上古汉语音韵纲要》,齐鲁书社,1987 年。

[瑞士]秦家懿、孔汉思著,吴华译:《中国宗教与基督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 年。

[唐]王梵志诗,项楚校注:《王梵志诗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年。

[意]利玛窦著,罗渔译:《利玛窦书信集》,光启出版社(台),1986 年。

[意]利玛窦:《明末罗马字注音文章》,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 年

[意]利玛窦著,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 年。

[英]赫德逊著,王遵仲、李申、张毅译:《欧洲与中国》,中华书局,1995 年。

[英]李约瑟:《中国科技技术史》,第 5 卷,第一分册,科学出版社,1976 年。

北京语言学院世界汉语教学交流中心信息资料部编:《世界汉语教学概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0年。

戴庆厦:《第二语言(汉语)教学概论》,民族出版社,1999年。

道森:《出使蒙古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范存忠:《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1年。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论丛》,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36年。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论丛·甲集》,商务印书馆,1948年。

方豪:《中西交通史》,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出版社,1927年。

耿昇、何高济译:《柏朗嘉宾蒙古行记 鲁布鲁克东行记》,中华书局,1985年。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

顾裕禄:《中国天主教的过去和现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

郭朋:《明清佛教》,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

何寅、许光华主编:《国外汉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

侯且岸:《当代美国的显学——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人民出版社,1995年。

胡文彬:《〈红楼梦〉在国外》,中华书局,1993年。

江文汉:《明清间在华天主教耶稣会士》,知识出版社,1987年。

李学勤:《国际汉学著作提要》,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

林家平、宁强、罗华庆:《中国敦煌学史》,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年。

林金水:《利玛窦与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

林徐典主编:《汉学研究之回顾与前瞻》,中华书局,1995年。

卢康华,孙景尧:《比较文学导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

罗常培:《国音字母演进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

罗光发行:《纪念利玛窦来华四百周年中西文化交流国际学术会议》,辅仁大学出版社,1983年。

莫东寅:《汉学发达史》,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年。

钱林森:《法国作家与中国》,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

钱林森:《中国文学在法国》,花城出版社,1990年。

荣新江:《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

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石锋编:《汉语研究在国外》,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5年。

宋伯年主编:《中国古典文学在外国》,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年。

孙尚扬:《基督教与明末儒学》,东方出版社,1994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外事局"合编,孙越生、李明德主编:《世界中国学家名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

王力:《汉语音韵学》,中华书局,1956年。

王力:《中国语言学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

王力达编译:《汉语研究小史》,商务印书馆,1963年。

王丽娜:《中国古典小说戏剧名著在国外》,学林出版社,1988年。

忻剑飞:《世界的中国观》,学林出版社,1996年。

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中华书局,1989年。

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上海书店出版社,1990年。

许明龙主编:《中西文化交流先驱——从利玛窦到郎世宁》,东方出版社,1993年。

阎宗临著,阎守诚编:《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大象出版社,2003年。

杨宏声:《本土与域外——超越的周易文化》,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杨荛深主编:《老话上海法租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尹大贻:《基督教哲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

张国刚等:《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张维华:《明史欧洲四国传注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张星琅:《中西交通史料汇编》,辅仁大学图书馆,1930年。

中国基督教协会:《新旧约全书》,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印,1982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朱静编译:《洋教士看中国朝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

朱谦之:《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

2. 论文

[法]艾乐桐:《法国对中国语言的研究》,《法国当代中国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年。

[法]艾乐桐:《欧洲忘记了汉语却"发现"了汉字》,《法国汉学》第一辑,[法]龙巴尔、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1996 年。

[法]安娜·塞德尔著,蒋见元、刘凌翻译:《西方道教研究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第一章导言。

[法]巴斯蒂著,胡志宏译:《19、20 世纪欧洲中国史研究的几个主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唐史学科网。

[法]贝罗贝:《20 世纪以前欧洲汉语语法研究状况》,《中国语文》,1998 年第 5 期。

[法]彼埃·于阿尔,明翁合著,岳岩译:《法国入华耶稣会士对中国科技的调查》,《汉学研究》第二集,阎纯德主编。

[法]伯希和:《纪念亨利·科尔迪埃》,载亨利·科尔迪埃著,唐玉清译,钱林森校:《18 世纪法国视野里的中国》,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年。

[法]陈艳霞(Ysia Tchen):《入华耶稣会士对中国音乐的研究》,载《明清间耶稣会士和中西文化交流》,巴蜀书社,1993 年。

[法]程艾蓝:《法国的古代中国研究》,《国际汉学》Ⅰ。商务印书馆,国际汉学编委会编,1995 年。

[法]戴密微,耿昇译:《吐蕃僧诤记·前言》,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 年。

[法]戴密微:《入华耶稣会士与西方中国学的创建》,《明清间耶稣会士和中西文化交流》,巴蜀书社,1993 年。

[法]戴密微:《法国汉学研究史》,《法国当代中国学》,[法]戴仁主编,耿昇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年。

[法]戴仁著,耿昇译:《法国敦煌学》,《汉学研究》第一集,阎纯德主编,中华书局,1996 年。

[法]戴仁:《沙畹和法国的中国碑铭学》,《法国汉学》第六辑,中华书局,2002 年。

[法]高第(即考狄——引者)著,马军译注:《法国近代汉学巨擘——儒莲》,《汉学研究》第八集,阎纯德主编,2004 年。

[法]郭丽英:《法国远东学术研究院汉学研究简介》,载《国际汉学》

Ⅰ,商务印书馆,1995年。

[法]郭丽英:《法国对汉传佛教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世界汉学》创刊号,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1998年。

[法]居里安(Annie Curien):《法国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法国当代中国学》,戴仁著,耿昇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法]卡特琳娜·戴思博/钱林森:《法国汉学与太极气功——访戴思博》,《中华读书报》,2003年4月9日。

[法]卡特琳娜·戴思博/钱林森:《汉学教育在法国》,《中华读书报》,2003年3月5日。

[法]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前言》,商务印书馆,1998年。

[法]雷威安:《法国对中国文学史的研究》,《法国当代中国学》,[法]戴仁主编,耿昇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法]鲁林:《法国对20世纪中国史的研究》,《法国当代中国学》,[法]戴仁主编,耿昇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法]路易·勒内、路易·瓦杨和让·菲利奥札著,耿昇译:《法国汉学泰斗伯希和》,《汉学研究》第六集,阎纯德主编,中华书局,2002年。

[法]马伯乐著,马利红译:《汉学》,《汉学研究》第三集,阎纯德主编,中华书局,1998年。

[法]马克:《法国战后对中国占卜的研究》,《世界汉学》创刊号,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1998年。

[法]马若安、弗朗吉尼、梅泰理著,耿昇译:《法国近年来对中国科技史的研究》,《汉学研究》第三集,阎纯德主编,中华书局,1998年。

[法]毛磊著,黄荭译:《在双方的对话中认识自己》,选自《中法文化之旅》,BBS水木清华站smth.edu.cn《跨文化对话》,第四辑。

[法]莫里斯·罗宾:《近代欧洲的"中国神话"》,《中国文化与世界》(论文集),耿龙明、何寅主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年。

[法]荣振华:《入华耶稣会士中的道教史学家》,载《明清间耶稣会士和中西文化交流》,巴蜀书社,1993年版。

[法]苏远鸣:《法国汉学50年》,《法国当代中国学》,[法]戴仁主编,耿昇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法]汪德迈 程艾兰:《法国对中国哲学史和儒教的研究》,《世界汉学》创刊号,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1998年.

[法]维吉尔·毕诺著,耿昇译:《中国文化对18世纪法国哲学家的影响》,《国际汉学》Ⅰ。

[法]魏丕信,[荷]许理和等:《"中国与基督教"述评四则》,《法国汉学》第三辑,[法]龙巴尔、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1996年。

[法]魏丕信:《近代中国和汉学》,《法国汉学》第三辑,[法]龙巴尔、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1996年。

[法]谢和耐著,耿昇译:《17和18世纪中欧文化交流》,《国际汉学》Ⅰ,商务印书馆,1995年。

[法]谢和耐:《法国20世纪下半叶的汉学大师戴密微》,《当代法国中国学》,[法]戴仁主编 耿昇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法]谢和耐:《法兰西学院的汉学研究》,《汉学研究》第一集,阎纯德主编,中华书局,1996年。

[法]谢和耐著,耿昇译:《法兰西学院的汉学讲座》,《汉学研究》第一集,阎纯德主编,中华书局,1996年。

[法]谢和耐著,耿昇译:《中国社会史·序》,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

[法]雅克·布鲁斯著,李东日译:《从西方发现中国到国际汉学的缘起》,《国际汉学》Ⅰ,《国际汉学》编委会编,商务印书馆。

[荷]许理和:《欧洲汉学实况:旧与新的共生》,《当西方遇见东方》,光华杂志社,台湾。

[瑞典]马悦然著/吴承学、何志军译:《20世纪欧洲汉学》,译文见2002年第2期《书城》。

[法]白乐桑:《法国汉语教学史》,《中国文化研究》,1993年,4卷冬之卷。

百度百科学:《埃玛纽埃尔-爱德华·沙畹》。

[法]贝罗贝:《20世纪以前欧洲汉语语法研究状况》,《中国语文》,1998年第5期。

[法]彼埃·卡赛:《中国古典文学在法国》,《法国汉学》第四辑,中华书局,1999年。

陈三井:《巴黎汉学研究所的汉学研究》,《汉学研究通讯》,1983年第2卷,第1期。

陈彦:《译者的话》,《新汉文化圈》,[法]汪德迈著,陈彦译,江西人民

出版社,1990 年。

陈耀庭:《法国的道教研究》,中国道教协会网:道教文化资料库,WWW. taoiste. org. cn。

陈祚龙:《浅评简介法国的汉学研究》,《书目季刊》23 卷,第一期。

程裕祯:《汉学与人类间的文化交流》,《国际汉学》第六辑,任继愈主编,大象出版社,2000 年。

戴成钧、方建中:《赵保禄在浙江的传教活动述评》,载《中法关系史论》,楼均信、郑德弟、吕一民主编,杭州大学出版社,1996 年。

董明:《明代来华传教士的汉语学习及其影响》,《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6 年第 6 期。

方骏:《中国海外汉学研究现状之管见》,《国际汉学》第六辑,任继愈主编,大象出版社,2000 年。

葛雷:《道教思想和法国现代文学》,载《外国文学研究》,1987 年 1(创刊号)。

耿昇:《从法国安菲特利特号船远航中国看 17—18 世纪的海上丝绸之路》,《汉学研究》第四集,阎纯德主编,中华书局,2000 年。

耿昇:《法国利氏学社的汉学研究》,《法国当代中国学》,戴仁主编 耿昇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年。

耿昇:《法国著名汉学家谢和耐教授简介》,《法国汉学》第一辑,[法]龙巴尔(Denys Lombard),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1996 年。

耿昇:《试论法兰西学院的中国学讲座》,《世界汉语教育史研究》,主编李向玉、张西平、赵永新,澳门理工学院,2005 年。

耿昇编译:《法国汉学家谢和耐教授》,《国际汉学》Ⅱ,任继愈主编,大象出版社,1998 年。

何金兰:《法国东方语言文化研究院,中国语言文化系及中国研究中心》,载《汉学研究通讯》,1984 年第 3 卷,第 3 期。

何金兰:《吴德明教授》,《汉学研究通讯》,1984 年第 3 卷,第 3 期。

胡安江:《绝妙寒山道——寒山在法国的传布和接受》,《中国比较文学》,2007 年第 4 期。

胡书经:《法国汉语教学和研究的历史》,《语言和教学研究》(季刊),1983 年 2 月。

黄庆华:《法国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 20 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编辑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年。

江原：《中国古典诗论在西方》，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网站：http://www.cass.net.cn/chinese/s15_wxs/hanxue/03.htm

蒋向艳：《法国汉学家沙畹》，《国际汉学》第十三辑，大象出版社，2005 年。

焦树安：《莱布尼茨对中国哲学的理解》，《国际汉学》Ⅰ，任继愈主编，商务印书馆，2000 年。

金重远：《拉萼尼使团和中法黄埔条约·三》，《中法关系史论》，楼均信、郑德弟、吕一民主编，杭州大学出版社，1996 年。

李华川：《考狄〈17、18 世纪西人在华所刻中文书目录〉跋》，中华文史网。

李养正主编：《当代道教》，中国道教协会网：法国的道教研究 www.taoiste.org.cn。

林富士：《法国对中国道教的研究》，《法国当代中国学》，戴仁主编 耿昇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年。

刘国忠：《〈吐蕃僧诤记〉内容提要》，《国际汉学名著提要》，李学勤主编，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 年。

刘立群：《最早研究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的德国人——莱布尼茨》，《中西文化交流先驱》，许明龙主编，东方出版社，1993 年。

刘增泉：《汉学研究在法国》，载《汉学研究之回顾与前瞻》（下册），中华书局，1995 年。

鲁林：《法国对 20 世纪中国史的研究》，《法国当代中国学》，戴仁主编 耿昇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年。

陆峻岭：《西突厥史料·序》，《西突厥史料》，［法］沙畹著，冯承钧译，中华书局，1958 年。

罗常培：《国音字母演进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年。

罗常培：《汉语拼音方案的历史渊源》，《人民日报》，1957 年 12 月 18 日。

罗常培：《介绍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图书月刊》1 卷 7，8 期。

罗常培：《耶稣会士在音韵学上的贡献》，《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一本第三分册,1930 年。

马克(Marc Kalinowski):《法国战后对中国占卜的研究》,《世界汉学》创刊号,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1998 年。

潘先军:《法国东方语言学院中文专业课程设置及简析》,《国外汉语教学动态》,2004 年第一期。

钱林森:《关于中西方文化第一次实质性的接触——访问谢和耐教授》,《中国文化研究》,2002 年。

阮桂雅:《法国国立东方现代语言学院有关中国语言和文化的教学》,戴仁主编,耿昇译《法国当代中国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年。

桑兵:《20 世纪国际汉学的趋势与偏向》,中国学术论坛,www. FRChina. net。

桑兵:《汉学家伯希和与近代中国学术》,《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中国文学网:汉学园地,www. Literature. org. cn,原载《国学与汉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年。

沈定平:《中西文化的差异性、同一性与互补性——从谢和耐访谈及〈中国与基督教〉说起》,《中华读书报》,2003 年 7 月 2 日。

孙戈:《谢和耐》,《汉学研究》第五集,阎纯德主编,中华书局,2000 年。

藤堂明堡:《东方学》第 5 卷,1952 年。

田永秀、鲜于浩:《鸦片战争前的法国汉学和中法文化交流》,《汉学研究》第四集,阎纯德主编,中华书局,2000 年。

王丽娜:《关、王、马、白名剧在国外》,《河北师院学报》,1990 年第二期。

王淼洋:《当代西方"易经"热:特点、原因及展望》,《中国文化与世界》第二辑,耿尤明、何寅主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4 年。

王恬:《洛蒂〈北京的末日〉中的中国形象》,《海外中国学评论》第 1 辑,主编朱政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

王蔚桦:《根深叶茂,硕果累累——瑞典汉学概述》,《贵阳师专学报》,1996 年第 4 期。

王志平:《侯思孟与汉魏文学》,《国际汉学漫步》,李学勤主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 年。

王志平:《谢和耐与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国际汉学漫步》,李学勤主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 年。

王忠华:《法国南方的汉学中心——埃克斯大学》,《世界汉语教学》,1989年第2期。

吴孟雪:《中学西渐第一页——16世纪欧洲汉学概述》,《汉学研究》第一集,阎纯德主编,中华书局,1996年。

吴永毅:《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中文系的学制及课程设置》,《世界汉语教学》,1996年第2期。

晓阳:《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汉语系概况》,《中国文化与世界》第6辑,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

谢和耐著,耿昇译:《法兰西学院的汉学研究》,《汉学研究》第一集,阎纯德主编,中华书局,1996年。

熊文华:《荷兰的汉学研究》,《汉学研究》第二集,阎纯德主编,中华书局,1996年。

徐丹:《法国汉语研究概况》,《汉语研究在国外》,石锋编,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5年。

徐怡:《伯希和》,《汉学研究》第五辑,阎纯德主编,2001年。

许光华:《16至18世纪传教士与汉语研究》,《国际汉学》第六辑,任继愈主编,大象出版社,2000年。

许光华:《戴密微》,《中国文化与世界》第6辑,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

许光华:《二战后的法国汉学》,《汉学研究》第四集,阎纯德主编,中华书局,2000年。

许光华:《法国汉语教学发展史概览》,《汉学研究》,第七集,阎纯德主编,中华书局,2002年。

许钧:《法公使郁白汉学专著〈悲秋:古诗论情〉》,原载《文汇读书周报》,引自中国"台湾网:www.Chinataiwan.org"文化与交流。

[法]雅克·布洛斯:《从西方发现中国到国际汉学的缘起》,《国际汉学》第一集,任继愈主编,商务印书馆,1996年。

严建强:《法人在华办博物馆:概述和评析》,《中法关系史论》,楼均信、郑德弟、吕一民主编,杭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

阎纯德:《汉学和汉学研究漫谈》,《国际汉学》第六辑,任继愈主编,大象出版社,2000年。

阎宗临:《从西方典籍所见康熙与耶稣会之关系》,阎宗临著,阎守诚

编的《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大象出版社,2003 年。

阎宗临:《杜赫德的著作及其研究》,阎宗临著,阎守诚编:《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大象出版社,2003 年。

阎宗临:《中西文化西渐之一页——17 世纪末中法文化之关系与 18 世纪之重农学派》,阎宗临著,阎守诚编:《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大象出版社,2003 年。

阎宗临著,阎守诚编:《从西方典籍所见康熙与耶稣会之关系》,《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大象出版社,2003 年。

扬福绵:《罗明坚 利玛窦〈葡汉辞典〉所记录的明代官话》,《中国语言学报》第五期,商务印书馆,1995 年。

杨尧深主编:《徐家汇天文台创建的前前后后》,《老话上海法租界》,中共上海市卢湾区党委党史研究室编写,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年。

杨宏声:《本土与域外——超越的周易文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

叶潇:《艾田蒲看"中国礼仪之争"》,《汉学研究》第七集,阎纯德主编,中华书局,2002 年。

轶萍:《梦想中国——"天之女"的中国形象分析》,《中国比较文学》,1995 年第 1 期。

尹斌庸:《〈西字奇迹〉考》,中国语文天地,1986 年第 2 期。

曾晓渝:《西儒耳目资音韵系统研究》,《汉语史论文集》,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汉语史研究室编,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年。

张锡厚:《关于敦煌写本王梵志诗整理的若干问题》,《王梵志诗研究汇集》,张锡厚辑,古籍出版社,1990 年。

郑德弟:《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I,中文版序,[法]杜赫德编,郑德弟、吕一民、沈坚译:《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大象出版社,2001 年。

中国侨网:《全法汉语教学研讨会在巴黎召开》,2004 年 3 月 31 日。

周发祥:《试论西方汉学界的"西论中用"现象》,《文学评论》,1997 年第 7 期。

朱越利:《世界宗教资料》,1981 年第 3 期,中国道教协会网:法国的道教研究 www. taoiste. org. cn。

外文部分[1]

1. 著作

Abel-Rémusat, *Éléments de la grammaire chinoise, ou principes généraux du Kou – wen ou style antique, et du Kouan – hua, c'est – à – dire, de la langue chinois*, Paris, Imprimerie royale, 1822.

BROCHURE pédagogique, Année, 1993—1994, de Langues'o.

Henri Cordier, *Bibliotheca Sinica*, Librairie Orientale & Americaine E. Guilmoto, Editeur Successeur de J. Maisonneuve; Librairie Orientale, Paul-Geuthner, 1924.

Henri Cordier, *Les études chinoises* (1895—1898), Librairie et imprimerie Ci – devant E. J. Brrill. Leide.

Henri Maspero, *Le Taoïsme et les religions chinoises*, Editions Gallimard, 1971.

Hervey – Saint – Denys, *Poésies de l' Époque des Thang*, traduites du Chinois pour la première fois, Amyot, Paris, 1862.

Issabelles et Jean – Louis Vissière, *Lettres édiffiantes et curieuses de Chine*, 1702—1776, par des missionnaires jésuites, Garnier – Flammarion, 1979.

Jacques Madaule, Le Drame de Paul Claudel, Paris, 1947.

Jacques Madaule, *Le Géenie de Paul Claudel*, Paris, 1933.

Jean Balcou et Yves Leroy, *Victor Segalen*, reunis par Université de Bretagne Occidentale Faculté des Lettres et Sciences Sociales Victor – Segalen, Centre de Recherche Bretonne et Celtique, Le Quartz de Brest.

José Frèches, *La sinologie de* 1900 *à* 1945: *II et III*, *La Sinologie*, Presse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75.

Kleczkowski, *Cours graduel et complet de chinois parlé et écrit*, Volume I, Librairie de Maisonneuve & Cie, 1876.

L. Le Comte, *Nouveaux mémoires sur l' état présent de la Chine*, Paris, 1696.

---

① 由许敏整理。

Léon Wieger, *Garactères chinois: étymologie, graphies et lexiques*, quatri - ème édition, Imprimerie de Hien - hien, 1924.

Léon Wieger, *Parler chinois, dialecte du* 河间府, 1er Volume, 河间府 Imprimerie de la Mission catholique, 1895.

Livret Langues'o de l'étudiant, Institut Natioanal des Langues et Civilisations Orientales, 1993.

Marcel Granet, *La Civilisation chinoise: la vie publique et la vie priveée*, La Renassance du livre, Paris, 1929.

Marie - Claire Bergère et Angel Pino, *Un siècle d'enseignement du chinois à l'Éco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1840—1945, Asiathèque, 1999.

Michel Jan, *Le Voyage en Asie centrale et au Tibet*, Robert Laffont, 1992.

René Etiemble, *L' Europe chinoise*, 2 vol. Editions Gallimard, 1988 et 1989.

2. 论文

Abel - Rémusat, Préface de l' *Éléments de la grammaire chinoise, ou principes généraux du Kou - wen ou style antique, et du Kouan - hua, c'est - à - dire, de la langue chinois*, Paris, Imprimerie royale, 1822.

Alain Roux, *La Recherche en France depuis* 1950 *sur l' Histoire de la Chine au XX Siècle.*

Bulletin Critique, T' oung Pao, Vol. II, 1891.

Bulletin critique, T' oung Pao, Vol. IV, 1893.

C. De Harlez, *L' Interprétation du Yi - King*, T' oung Pao, Vol. VII, 1896.

C. De Harlez, *La Religion chinoise dans le Tchün* - tsiu de Kong - Tze et dans le Tao - tchuen, T' oung Pao, Vol. III, 1892.

C. De Harlez, *Vocabulaire bouddhique sanscrit - chinois* 汉梵集要 *Han - fan Tsih - yao*. Précis de doctrine bouddhique, T' oung Pao, Vol. VIII, 1897.

Christine Nguyen Tri, *Lettre de l' AFEC*, Numéro spécial, décembre 1991.

Christine Nguyen Tri, *Paul Demiéville, Les Langues' O et les études chinoises, Un siècle d'enseignement du chinois à l'Éco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1840—1945, sous la direction de Marie - Claire Bergère et Angel Pino.

Du P. François Bourgeois à madame de * * *, *lettres édiffiantes et curieuses de Chine*, 1702—1776, des missionnaires jésuites, Issabelles et Jean -

Louis Vissière, Garnier - Flammarion, 1979.

E. Chavannes, *Note rectificative sur la Chronologie chinoise de l' an 238 à l' an 87 avant J. - C.* T' oung Pao, Vol. VII, 1896.

Entre sinologie pratique et sinologie savante, les interpretes - Professeurs de l' Eco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vivantes 1971 - 1930, *Un siècle d'enseignement du chinois à l'Éco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1840—1945, sous la direction de Marie - Claire Bergère et Angel Pino.

Henri Cordier, *Les Etudes Chinoises* (1891—1894), T' oung Pao, Vol. V, 1895.

Henri Cordier, *Half a decade of Chinese studies* (1886 - 1891), T' oung Pao, Vol. III, 1892.

Henri Cordier, *Gabriel Devéria*, T' oung Pao, Vol. X, 1899.

Henri Cordier, *Le Marquis d' Hervey Saint - Denys*, T' oung Pao, Vol. III. 1892.

Henri Cordier, *Mgr. De Harlez*, T' oung Pao, Vol. X, 1899.

Henri Cordier, Preface de la première édition, de Bibliotheca Sinica.

Henri Cordier, *L' Enseignement du chinois*, *Les études chinois* (1895—1898), Supplement au volume IX du T' oug - Pao, Librairie et imprimerie ci - devant E. J. Brill, Leide.

Herbert Franke, *Sinologie an deutschen Universitaeten*, Wiesbaden, 1968.

Hervey Saint - Denys, Préface de *Trois nouvelles chinoises*, traduit du chinois, Paris, Ernest Leroux, 1885.

http://culture. sinofrance. org/renwu/gernet. htm

http://www. inalco. fr/。

Henri Cordier, Préface de la première édition, *Bibliothenica Sinica*, Librairie Orientale & Américane, 1904.

Jean Balcou et Yves Leroy, *Victor Segalen*, reunis, Universitéde Bretagne Occidentale, Faculté des Lettres et Sciences Sociales Victor - Segalen, Centre de Recherche Bretonne et Celtique, Le Quartz de Brest.

Léon Vandermeersch, Anne Chen, *Les études chinoises en France—Histoire de la philosophie, confucianisme.*

Léon Vardermeersch, Préface de *la Pensée chinoise* par Marcel Granet, La

Renaissance du Livre, 1934, Edition Albin Michel S. A. 1988 et 1999.

Léon Wieger, Préface de *Garactères chinois: étymologie, graphies et lexiques*, quatrième édition, Imprimeriede 献县 Hien - hien, 1924.

Léon Wieger, Préface du *Rudiments de parler chinois, dialecte du* 河间府 1er Volume, 河间府 Imprimerie de la Mission catholique, 1895.

www//association française d'études chinoises.

Li, Tche - Houa, Introduction du *Rêve dans le Pavillon rouge*, par Li Tcke - Houa et Jacqueline Aléoaïs, Gallimard, 1981.

Marcel Granet, Avant - propos de *La Civilisation chinoise: la vie publique et la vie privée*, La Renassance du livre, Paris, 1929.

Maurice Freedman, *Marcel Granet, La Féodalité chinoise de Marcel Granet*, Editions IMAGO, 1981.

Max Kaltenmark, Préface du *Taoïsme et les religions chinoises*, par Henri Maspero, Edions Gallimard, 1971.

Nachrichten der Deutschen Gesellschaft fuer Natur - und Voelkerkunde Ostasien, 1958.

Otto Franke, *Die sinologischen Studien in Deutschland*, Hamburg, 1911.

Pau Demiéville, *Aperçu historique des études sinologiques en France*, Acta Asiatica,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Eastern culture, The TÔHö Gakkai, Tokyo, 1966, №11.

Pau Demiéville, *Le Chinois à l'éco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vivantes*, Cent - cinquantenaire de l'éco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vivantes, 1948.

Paul M. Evans, John Fairbank and the American Understanding of Modern China.

René Etiemble: Préface d'*Au bord de l'eau.*

René Etiemble, Pour la promotion du Chinois à l'école secondaire, *Cahiers pédagogiques*, 15/10/60.

T' oung Pao, Vol. V, VI, 1895.

T' oung Pao, Vol. 65*N*0. 1 - 3. 1979.

T' oung Pao, Vol. 65*N*0. 1 - 3. 1979.

Th. Pavie, Grammaire mandarine ou Principes généraux de la langue chinoise parlée, par M. Bazin, *professseur à l'Éco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etc. Jour-*

nal asiatique, *juin* 1857, 转引自 Un siècle d'enseignement du chinois àl'Éco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1840—1945, *sous la direction de Marie - Claire Bergère et Angel Pino.*

Viviane Alleton, La Linguistique chinoise en France.

Viviane Alleton, L' Oubli de la langue et l' invention de l' écriture chinoise en Europe, *Etudes chinioises*, *Vol. XIII*, *No.* 1 - 2, *Printemps*, *automne*, 1994. *P.* 263.

Yves Hervouet, L' Enseignement du chinois dans le secondaire en France, *Les Langues modernes n*3/4, 1974.

后　记

《法国汉学史》经过几年的艰苦写作终于成书。说实话这是一个很难胜任的艰深的学术课题。本来应该是一部大家集体之作，比如钱林森教授、耿昇研究员，他们学养精湛广博，对于法国汉学研究弥深，但他们都是当代学界著名的大忙人；出于无奈，由于阎纯德教授为尽早地完成“书系”中这部重要的书稿，逼迫我只好孤军奋战。当然，我这个“单干户”也并不太孤单，一些朋友为我分忧，他们帮助我写作了一些章节。这里，我要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这些朋友分别在以下章节给予了我帮助：第二章第六节的“传教士与法国启蒙思想家”由葛磊撰写，第三章第二节中的“德理文和他的汉学研究”，由蒋向艳撰写，第四章第二节中的“葛兰言和他的汉学研究”由朱丁撰写，第五部分第二节中的“戴仁小传”由阮洁卿撰写，附录部分的“法国主要汉学刊物、博物馆”等由陈超整理，中外文参考书目、汉学家（中外文对照）名录由许敏整理。在此，一并向他们感谢！

许光华

2008 年 12 月 31 日

列国汉学史书系
Sinological History Series

法国汉学史

印章篆刻：郑怀宝
责任编辑：杨　雷
封面设计：徐道会

ISBN 978-7-5077-3365-5

9 787507 733655 >

定价：40.00元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法国汉学史
作者=许光华著
页数=335
出版社=北京市：学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9.05
SS号=12283243
DX号=000006752439
简介=本辑收入《伶史》、《梨园佳话》、《同光朝名伶十三绝传略》。伶史》，据民国六年(1917年)宣元阁版影印。《梨园佳话》，据商务印书馆民国四年(1915年)版影印。《同光朝名伶十三绝传略》，据民国二十二年(1943年)版影印。本丛书共16册。
url=http://book2.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06752439&d=2E6D173AA1E699DE40AC1486C0EEFAA8